

VENONA

维诺那计划

前苏联间谍揭秘

[美] 约翰·厄尔·海因斯
哈维·克莱尔

／著

群众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PDG

VENONA 内容简介

1943年，美国怀疑前苏联与德国私下缔结秘密条约，便实施了一项代号为“维诺那”的计划，旨在截获并破译前苏联驻美使馆与前苏联之间的往来电报。令美国惊讶的是，在计划实施的多年中，美国获悉了大量前苏联在美间谍的人员资料情报，共计349人，其中包括美国人。这些间谍打入美国社会各个部门，最高职务的竟然有美财政部长助理及总统顾问；另外还有打入“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研究项目）；甚至在“维诺那”计划内部也发现了苏联间谍。

美国共从25000条电报中破译了3000多份电文，349人中因都有代号，其中一部分人查出真实姓名；另一部分人至今尚无法挖出。此计划因保密性极强，直至1995年冷战结束后，该计划的性质及工作内容才公诸于世。两位作者写成此书的材料不仅依据了“计划”的资料，还使用了俄国档案馆的大部分资料，因此**许多内幕都是冷战前鲜为人知的。**

此书内容涉及“计划”的起因；破译密码的过程；对间谍活动的描述；以及前苏联籍、美籍间谍在军事、政府、科学、工业、原子工业等领域建立活动网络及活动经历。对主要间谍的活动都有较详尽的描述。

本书附有5个附录，分别列出与前苏联有地下联系的被查出和未查出的美国公民名单；暂时居住美国的与前苏联有联系的人名单；前苏联情报机构认为有潜在发展对象的美国人名单；和赴美主要前苏联间谍的小传。



ISBN 7-5014-2719-4



9 787501 427192 >

ISBN 7-5014-2719-4/D · 1280 定价：28.00 元





VENONA

维诺那计划

前苏联间谍揭秘

[美] 约翰·厄尔·海因斯 / 著
哈维·克莱尔

吴妍妍 吴锡林 /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维诺那计划：前苏联间谍揭秘/ (美) 海因斯, (美) 克莱尔著; 吴妍妍, 吴锡林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4

ISBN 7 - 5014 - 2719 - 4

I. 维… II. ①海…②克…③吴…④吴…
III. 间谍—情报活动—苏联 IV. D75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3532 号

维诺那计划——前苏联间谍揭秘

著 者/ [美] 约翰·厄尔·海因斯 哈维·克莱尔

译 者/ 吴妍妍 吴锡林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 [www. qzCBS. com](http://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 com](mailto:qzs@qz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15.875 印张 365 千字 插页 6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 - 5014 - 2719 - 4/D · 1280 定价: 28.00 元



▲ 阿灵顿会堂，美国陆军密码破译部门及一九四四年维诺那计划总部。（国家安全部提供）

知乎网

Ref: [REDACTED]

From: NEW YORK
To: MOSCOW
No. 1747

21 September 1944

To: VIKTOR (1).

Latel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eople [C] has been in progress. LIBERAL (1) recommended the wife of his wife's brother, Ruth GREENGLASS, with a safe flat in view. She is 21 years old, a TOWNSWOMAN [GOROINANKA] (1) (1), a GYMNAST [VIZKUL'TURNITSY] (1) since 1942. She lives on STANTON [STANTAUN] Street. LIBERAL and his wife recommend her as an intelligent and clever girl.

[15 groups unrecoverable]

[C] Ruth learned that her husband [v] was called up by the army but he was not sent to the front. He is a mechanical engineer and is now working at the ENORMOUS [ENORMOZ] (1) plant in SANTA FE, New Mexico.

[45 groups unrecoverable]

detain VOLOK (1) who is working in a plant on ENORMOUS. He is a FELLOWCOUNTRYMAN [IZMELYAK] (1) (1). Yesterday he learned that they had dismissed him from his work. His active work in progressive organizations in the past was the cause of his dismissal.

In the FELLOWCOUNTRYMAN line LIBERAL is in touch with CHESTER (1). They meet once a month for the payment of dues. CHESTER is interested in whether we are satisfied with the collaboration and whether there are not any misunderstandings. He does not inquire about specific items of work [KONKRETNAYA RABOTA]. In as much as CHESTER knows about the role of LIBERAL's group we beg consent to ask C. through LIBERAL about leads from among people who are working on ENORMOUS and in other technical fields.

Your no. 4256 (a). On making further enquiries and checking on LARIN (1) we received from the FELLOWCOUNTRYMEN through EXHO (1) a character sketch which says that they do not entirely vouch for him. They base this statement on the fact that in the Federation LARIN does not carry out all the orders received from the leadership. He is stubborn and self-willed. On the strength of this we have decided to refrain from approaching LARIN and intend to find another candidate in FAET [FAKHT] (1) (1).

No 751
20 September

MWJ (1) (1)

~~SECRET~~

VENO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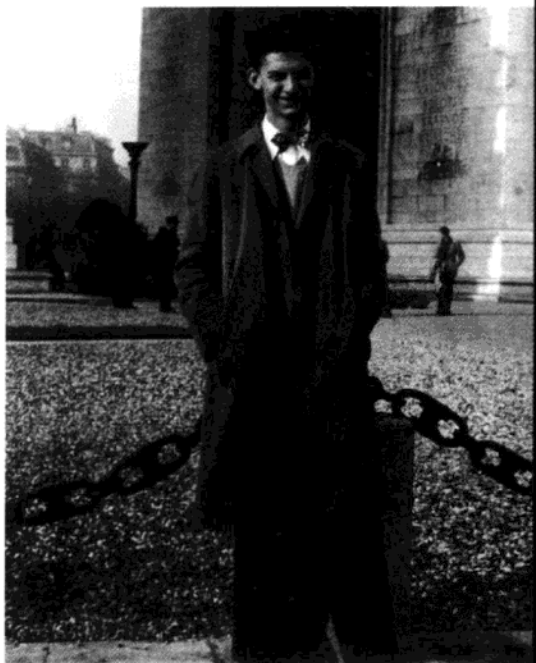


▲ 一九四四年，陆军密码分析员在阿灵顿会堂工作时的情景。最左边的男性于一九四六年成为维诺那计划的首席密码破译员。绝大部分密码破译人员为女性。（国家安全部提供）

▲ 一份被破译的维诺那密电。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总部汇报，“自由”（即朱利叶·罗森堡）及其妻子（埃塞尔）建议将埃塞尔的弟妹鲁思·格林格拉斯招募为前苏联间谍。

克格勃驻海外的情报站在招募间谍时必须得到总部批准。维诺那一三四零，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致莫斯科，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国家安全部提供）

► 塞西尔·菲利普斯，一九四六年摄于巴黎。菲利普斯十八岁时到阿灵顿会堂工作。一九四四年，他发现了前苏联密电中的薄弱环节，从而使破译前苏联密电的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安全部提供）





◀ 卡特·克拉克，美国陆军军事情报部门特种分部的负责人，一九四三年筹划维诺那计划。（国家安全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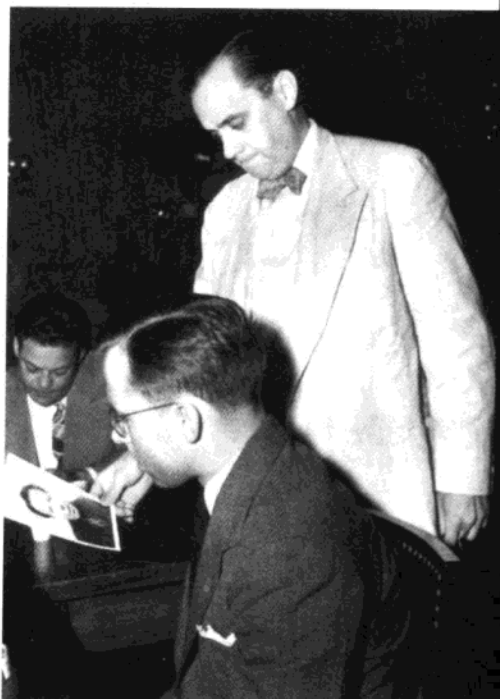
▼ 瓦西里·朱比林，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间任克格勃驻美国情报机构总负责人。（国家安全部提供）



▲ 威廉·韦班，四十年代末期在阿灵顿会堂的语言学家，曾向前苏联发出警报称，美国方面已成功破译前苏联密电。韦班的克格勃特工身份暴露之后，他被国家安全部开除，并因拒绝出席大陪审团的传讯而被判入狱。（国家安全部提供）



▲ 伊丽莎白·本特利，摄于一九四八年出席“众议院侵犯美国权益行为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之前。伊丽莎白为美国共产党人兼克格勃特工，一九四五年向联邦调查局自首，并供认许多条前苏联内线。（国会图书馆提供）



▲ 一九四八年邓肯·李接受“众议院侵犯美国权益行为特别委员会”传讯，图为他被要求辨认各布·格罗照片的情景。邓肯坚称他与本特利的关系只限于普通交往范围。（合众社科比斯·贝特曼提供）



▶ 一九四九年，朱迪思·科普朗正在阅读有关对她审判的报道。科普朗被两次起诉，均因法律技术原因而未被判刑。（合众社科比斯·贝特曼提供）



▲ 维克托·珀洛，一九四八年接受“众议院侵犯美国权益行为特别委员会”传讯。面对委员会成员的提问，身为一大型谍报网负责人的珀洛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提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合众社科比斯·贝特曼提供）



▲ 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一九四八年接受“众议院侵犯美国权益行为特别委员会”传讯。根据伊丽莎白·本特利的指控，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领导的大型谍报网由美国政府部门雇员组成，为前苏联提供情报。西尔夫马斯特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提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合众社科比斯·贝特曼提供）



◀ 劳伦斯·达根，一九四六年在参议员委员会面前作证。达根从三十年代中开始向前苏联特工提供情报。一九四八年被联邦调查局传讯后自杀。（合众社科比斯·贝特曼提供）



◀ 洛赫林·柯里，摄于一九四五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行政助理，苏维埃的秘密支持者，克格勃的情报内线。五十年代初，柯里公开表示从未参与前苏联谍报活动，之后离开美国。并于后来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国会图书馆提供）



▲ 哈里·怀特，摄于一九四六年。罗斯福政府财政部助理部长，是克格勃在美国政府内部职位最高的情报内线。他不仅向前苏联情报部门提供情报，还利用职位之便，协助克格勃设在美国联邦政府内部的多条内线获得提升。一九四八年曾公开参与间谍活动，之后不久死于心脏病。（国会图书馆提供）



◀ 阿尔弗雷德·斯特恩和马莎·多德·斯特恩，百万富翁夫妇，社交界知名人物，秘密共产党人，曾协助前苏联情报部门在美国的工作。为逃避被以间谍罪起诉，他们先逃亡墨西哥，后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合众社科比斯·贝特曼提供）



◀ 戴维·格林格拉斯，摄于一九五一年出庭作证之前。他指控其姐姐和姐夫，即埃塞尔·罗森堡和朱利叶斯·罗森堡将他招募为前苏联间谍，将洛斯阿拉莫的原子弹秘密提供给前苏联。（合众社科比斯·贝特曼提供）



◀ 鲁思·格林格拉斯指正，在罗森堡夫妇的要求下，她协助丈夫开展原子间谍活动。（合众社科比斯·贝特曼提供）

出版说明

《维诺那计划》一书是美国冷战方面的专家约翰·厄尔·海因斯和哈维·克莱尔以前苏联有关解密档案为素材撰写的史实性作品，内容涉及到冷战时期美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以及美国共产党的若干活动，对于了解和研究美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冷战时期对立的两国之间互遣间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和众所周知的惯例；即使当今，美国与其亲密的盟友国家之间也概莫能非，互遣间谍已是公开的秘密。由于作者持有明显的政治偏见，字里行间时而流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歪曲与诋毁之意。当我们阅读这部作品时，应该凭借自己的分析与思考，拂去岁月的风尘，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目 录

1	序 通往维诺那计划
9	第一章 冷战与维诺那计划
26	第二章 破译密电
66	第三章 美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109	第四章 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
138	第五章 高层朋友
198	第六章 军事间谍
231	第七章 美国政府内部的间谍
252	第八章 共产党人
304	第九章 追踪斯大林的敌人
351	第十章 工业间谍和原子间谍
407	第十一章 前苏联谍报活动与美国历史

- 415 附录 A：与前苏联情报特工秘密联络的美国公民及美国居民
- 467 附录 B：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秘密往来，未曾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出现的美国人及美国居民
- 486 附录 C：与前苏联情报部门有秘密联络的短期留美的外国人
- 492 附录 D：前苏联情报部门有意招募为情报内线的美国公民及美国居民
- 497 附录 E：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前苏联克格勃官员简历

通往维诺那计划

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驻扎在美国的前苏联间谍与莫斯科上级之间往来的三千多封电报被美方截获，并成为美国政府的绝密文件。被截获的电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在—项名为“维诺那”计划的活动中被成功破译，并从此被封存在有重兵把守的马里兰州米德堡的档案馆里，其内容足以令我们重新审视二十世纪的美国历史。

米德堡距离华盛顿仅半小时车程。然而，要追溯维诺那密码破解计划，却不得不从九千公里以外，位于莫斯科市中心普金卡大街上一栋肃穆的灰色石头大楼开始。这座大楼里保存着前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以及共产国际的众多资料。众所周知，从一九一九年开始，共产国际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直至一九四三年被约瑟夫·斯大林解散。

苏共方面对于哪些学者有资格接触这些档案以及哪些资料可以提供给学者们参阅有着极为严格的控制。身为美国学者，我们从不奢望能有机会接触如此绝密的文件。然而，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前苏联瓦解，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政府掌握共产党政权。档案馆被重新命名为“俄罗斯近代史文献保存及研究中心”（简称“文献中心”），并很快首次面向西方学者开放。我们先后六次前往文献中心调阅、笔记并复印有关美国共产主义历史的资料。

起初，文献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十分热情，尽可能满足

我们的要求。但是在后来，其中一名女员工显然在用故意苛刻的规定阻碍我们的工作。我们暗地里称她是“阻碍历史车轮的残余分子”，这是俄罗斯人对勃列日涅夫官僚时代的一种戏称。我们询问文献中心的一名官员，为什么那位女员工对我们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转变。他回答说，因为她原先误以为我们是美国共产党人，但现在发现，原来并非如此。虽然文献中心的工作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对于新俄罗斯时代的开放政策持欢迎态度，但仍有少数“残余分子”怀念以前的旧时代，而且这一类人在社会上并非少数。文献中心大楼的前厅偌大，其中的一半出租给一家私人银行。在为文献中心所用的前厅部分，有一幅比真人还要大的列宁像，他那冷峻的目光直射向代表着资本主义精髓的私人银行的办公室。

我们第一次前往文献中心查询共产国际的档案时，工作人员问我们是否对美国共产党（美共）的档案有兴趣。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有关美共的资料居然还会保留在这个世界上。在美国，这一类档案是完全不存在的。虽然有史学家开玩笑地表示，或许它们被隐藏在莫斯科，但是从来没有人信以为真。文献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在苏维埃时代，美共的档案一直无人问津，所以被封存在一个很远的仓库里。工作人员所指的档案里难道真的存有关于美国共产党总部的史料？亦或只是一些零散的报道，甚至是早已发黄的《工人日报》？档案最终被从仓库调运到文献中心，一名档案管理员用手推车装了满满一车的卷宗。后来的事实证明，相关的卷宗竟多达四千三百卷。我们掸去封尘已久的灰尘，解开系住卷宗的丝带，深入地探询进去。正如俄罗斯人传闻所说，这些记载着美共历史的原版记录在多年以前被秘密地从海上运送到莫斯科。

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两部著作应运而生，包括一九九五

年出版的《美国共产主义揭秘》及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美国共产主义苏维埃》。两部著作均阐述了美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对美国共产主义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加以澄清。我们在对文献中心史料进行研究的初期发现，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曾经有人向当时位于乔治亚地米特夫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一系列问询，要求共产国际就某些美国共产党人提供其背景资料，且所有问询文件的落款签字只是一个简单的“费庭”。一个有趣的现象吸引了我们。这些被调查的美国人均在四十年代后期被美国指控为前苏联间谍。发出问询的人叫做帕维尔·米凯洛维奇·费庭（Pavel Mikhailovich Fitin），是前苏联的间谍头子，并于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六年间担任克格勃外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发往共产国际总部的这些问询，其含义不言自明：克格勃正在招募美国共产党人充当前苏联间谍，并向共产国际对招募对象进行背景调查。

费庭的调查对象之一是一个名叫朱迪思·科普朗（Judith Coplon）的美国人。此人曾在美国司法部外国机构登记部工作，有机会接触联邦调查局反间谍档案。正是这个人的名字让我们研究的焦点于朦胧之中聚集在密码破译这一课题上。一九四九年，朱迪思在向克格勃特工瓦伦丁·古比切夫（Valentine Gubitchev）提供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情报时被当场逮捕，古比切夫当时的身份是联合国官员。已退休的前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兰菲尔（Robert Lamphere）在他一九八六年的记录中写道，美国国家安全部于一九四四年破译了克格勃的一封电报，其中提到关于招募朱迪思充当前苏联间谍的事宜，从而引起联邦调查局的警觉。兰菲尔还记载道，由联邦调查局破译的另外一封类似的电报最终导致间谍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的落网，而此人当时的身份是为原子弹项目工作的英国物理学

家。兰菲尔指出，导致一连串间谍落网的源头来自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密码破译项目，然而，有关该项目的细节，兰菲尔并没有涉及。戴维·马丁（David Martin）在他一九八一年的间谍历史记录中也提及美国的一项绝密密码破译计划，指出该计划为逮捕罗森堡等前苏联间谍提供了关键证据。这一说法后来在史学家罗纳德·拉多士（Ronald Rodash）和乔伊斯·米尔顿（Joyce Milton）对罗森堡的案件分析中得到证实。研究间谍史的学者们将国家安全部的这项计划称为“维诺那计划”。

费庭发往共产国际总部的另外一封电文是调查法国的政治领袖，战争期间流亡美国的皮埃尔·考特（Pierre Cot）是否有意为前苏联服务。已经退休的前英国反间谍组织成员彼得·怀特在他一九八七年的记录中写道，正是由于维诺那计划成功破译的密电让英美的安全官员识破了考特的前苏联间谍身份。

我们在文献中心发现，由费庭发出的查询密电中亦有提及维诺那计划。然而，维诺那计划究竟是怎样一项任务？国家安全部所破译的密电是否仅寥寥数封？除了考特、科普朗还有福克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间谍落网？密电的内容究竟如何？

国家安全部一向以口风严密而著称，对其活动守口如瓶的程度远胜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在冷战高潮时期，华盛顿首府里的人曾戏称国家安全部是“无影组织”。我们曾向多方政府官员问及维诺那计划，但碰到的无一不是铜墙铁壁。有一名官员的回答是：不错，曾经是有一个被称作维诺那计划的密码破译任务；不错，该计划的确挖掘出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但情报内容从未公之于众；不错，这项任务中破译的电文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如今已经过时；但是，几十年来，从没有人接触过维诺那计划的档案，如此绝密的密电不可能与世人见面。

在《美国共产主义揭秘》一书中，我们援引文献证明美共确实拥有一支地下武装，而这一事实一直以来为美共及众多史学家所否认。根据书中披露的资料，美共地下党与美共高层官员曾与前苏联情报部门合作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涉及该内容的章节披露了费庭签发的调查朱迪思·科普朗及皮埃尔·考特背景的密电全文，从而证明从莫斯科发出的这些文件显然与鲜为人知的维诺那计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该书出版后不久，我们收到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从纽约打来的电话。莫伊尼汉参议员阅读了该书，他希望就其中的几点问题与我们磋商，同时还将提出一个要求。他在电话中说，他目前在一个新成立的“政府机密保护及精简委员会”担任主席一职，成员共十二人，其中八人由国会任命，四人由克林顿总统任命。莫伊尼汉认为，在与前苏联对峙达四十五年的冷战结束之后，有必要对在此期间形成的保密制度及秘密等级划分制度进行彻底修改。他解释说，要想理解冷战结束之后需要重新审视保密条例的意义，首先需要透彻理解当初建立这些条例的初衷。为此，他要求我们向委员会就该问题做陈辞。

在委员会一九九五年五月的会议上，我们针对书中的发现进行了详尽阐述。当提及维诺那计划时，我们指出，既然俄罗斯方面肯将与前苏联莫斯科有关的电文公布于众，而美国方面依然将有关资料锁进秘密档案，未免显得过于刻板。冷战既已结束，而且这些电文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没有理由继续将它们封存起来。听到这里，莫伊尼汉参议员同坐在他右侧的约翰·多奇（John Deutch）讲了几句。约翰·多奇是由总统任命的委员会成员之一，当时任中央情报局负责人，统领美国的情报活动。莫伊尼汉指示多奇同国家安全部协商，是否有必要继续

密存维诺那计划的档案。多奇表示，他将会和国家安全部探讨这个问题，但对于商讨的结果，他没有把握。

鉴于我们以前遭遇过种种拒绝降低维诺那计划的保密等级的窘境，我们对于莫伊尼汉参议员能否说服有关部门将维诺那计划昭示天下并不持乐观态度。我们并不知道，在铜墙铁壁的内部，美国情报机构的内部人物已经在讨论关于公开维诺那计划的话题。我们直到后来才知道，国家安全部于多年前就已决定，维诺那计划的存在对于美国情报机关已经不再具备实际意义，并下令于一九八〇年完全中止该计划。因此，从理论上讲，维诺那计划早已成为历史。中央情报局反间谍机构前负责人詹姆斯·安格尔顿在一九八七年去世前，曾经对他的同事们表示，在维诺那计划中破译的电文应该公布给世人。他认为，此举的意义在于，可以让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参与进来，利用他们不同于情报人员的职业渠道，或许能解决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以及国家安全部多年悬而未决的难题，即识破至今仍在利用化名活动的间谍的真实身份。事实证明，詹姆斯的想法是正确的。

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官员罗伯特·路易斯·本森（Robert Louis Benson）对于美国反间谍史有着浓厚兴趣。他认为，已经是时候将维诺那计划的档案对外公布，揭发前苏联的间谍行为。塞西尔·菲利普斯（Cecil Phillips）是国家安全部的一名退休官员，亦是最早参与维诺那计划的密码破译员。他代表维诺那计划的众多元老表达心声，希望在这些人谢世之前，将他们成功破译被前苏联认为是坚不可破的密码防线的功绩展现给世人。莫伊尼汉参议员也表示，希望国会通过决意，要求政府大幅降低保密级别。他表示，如果执行官员们一味地不肯让步，毫无道理地拒绝将过时达四十年之久的前苏联电文公布于世，国会

有必要考虑全面调低保密等级。公开维诺那计划不仅是明智的，而且可以保证现行的保密机制免受政策性干预。维诺那计划是美国反间谍史上一项重大成就，情报专家们理应享受一次他们难得有机会获得的公众的赞许。

这些内部的争议自然不为外人所知。就在委员会的秘密聆讯之后两个月，我们收到邀请，参加于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一日在中央情报局位于弗吉尼亚总部举行的维诺那计划公开揭秘活动，此举着实出乎我们的意料。在公开庆祝活动上，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部及莫伊尼汉参议员联袂宣布，维诺那计划正式对外公开，并对仍健在的维诺那计划的密码破译员们给予赞赏，这些成员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退休多年。在这次活动中首次亮相的维诺那计划中破译的部分电文共计四十九封，详细记载着前苏联窃取原子机密的间谍活动，电文中明确显示，朱利叶斯·罗森堡（Julius Rosenbergs）的真实身份为前苏联间谍。部分史学家及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在早前基于没有足够的证据，曾经否定这一说法，如今铁证如山的证据终于摆在面前。

随后的两年里，国家安全部陆续公开其余的密电，共计两千九百封，文字多达五千页，全部用精炼的电报语言写成，夹杂着众多的化名，其中很多化名的真实身份至今尚未破解，所以，要想真正读懂这些电文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此举的意义依然是重大的，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内容填补了史料、联邦调查局的证词档案以及国会聆讯中的许多空白。根据这些最新发现的证据，我们有必要对较早前做出的论断加以修改。

一九九二年，在俄罗斯的文献中心尚未开放之前，维诺那计划的内容远未对外公开，我们出版了一部有关美共历史的著

作《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疾风暴雨的历程》（The American Communist Movement: Storming Heaven Itself）。书中引述可靠证据，证明有部分美国共产党人协助前苏联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然而，毕竟当时的证据有限，对于美国共产党的整体评价，我们仍十分小心地指出：“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起源圣地的忠诚程度远胜于对美国的忠诚。然而在现实中，只有极少数美国共产党人成为间谍。前苏联打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号招募间谍，但美国共产党人从事间谍活动并非一种普遍现象。美国共产党透过政治手段推广共产主义及苏维埃的利益，间谍活动则是前苏联情报部门采用的手段。如果将美国共产党一味地视为间谍工具或是所谓的第五纵队，则误解了美国共产党的真正性质。”



冷战与维诺那计划

维诺那计划的起因是卡特·克拉克（Carter Clarke）对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不信任。克拉克上校是美国战争事务部军事情报部门特种分部的负责人。一九四三年，开始有消息说德国与前苏联之间正在秘密进行和平谈判。有了一九三九年出台的“纳粹—苏维埃协定”的前车之鉴，克拉克担心莫斯科单方面与德国达成和平协议将有助于纳粹德国将全部火力集中对准美国和英国。克拉克决定，必须想办法了解德国与前苏联之间是否真的在进行和平谈判。

克拉克的特种分部下辖信号情报部门。该部门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云集了美国在密码破译领域里的精英。一九四三年二月，克拉克下令组织一小队人马，专门研究前苏联发出的经过加密的外交电报。自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来，联邦政府收集了众多发往及发自美国的国际电报。克拉克相信，如果能够成功破解前苏联电报中的密码，就可以从前苏联驻美外交官与莫斯科上级之间的交流中窥探出蛛丝马迹，以便分析斯大林是否在认真考虑单方面寻求和平的计划。

事实证明，要想破译前苏联电报，其难度远远超出克拉克的想象。美国密码破译人员发现，前苏联采用了极其复杂的二

次加密方法，并使用一次性密码纸，从理论上讲，几乎是不可能攻破的。然而，破译员们运用其智慧，经过潜心研究，并且不辞辛苦地钻研了数千封加密电报，终于从前苏联方面的一个操作性错误中找到突破口。当第一份破译后的电文诞生时已是一九四六年，二战早已结束，克拉克的初衷已经不再适用。虽然这些电文并没有显示斯大林有单方面讲和的倾向，然而，电文的内容依然令美国官方震惊。他们原以为这些电报是前苏联驻纽约领事馆的外交人员与莫斯科的前苏联外交部之间的沟通，经破译之后才发现，竟然是职业情报人员与莫斯科克格勃的外国情报部头子费庭之间的电报。所有电文无一涉及外交事务，而是不折不扣的间谍情报。在第一批被破译的电文里，有一封于一九四四年由克格勃驻纽约情报人员发出，称前苏联的间谍势力已成功渗透到美国最绝密的原子弹项目之中。

截至一九四八年，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报中，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前苏联在美国的军事、外交等每一个重要部门均招募了间谍，并且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美国就已经成为前苏联情报部门的首要目标，总计有数百名前苏联职业特工及上千名美国人与间谍活动有关。在涉嫌的美国人中，大部分为美国共产党人。破译的电文共披露三百四十九名美国公民、移民、永久居民与前苏联情报机构有明显往来。令人担忧的是，维诺那计划中破译的密电仅仅是前苏联情报外来电文中的一小部分。不难想象，在成千上万份尚未破译的电文中，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提及，尚不包括通过其他渠道，诸如投诚美国或是被捕的前苏联间谍提供的证词中所发现的与前苏联间谍机关有联系的人物。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传递的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信息是，有相当一批美国政府高层官员与前苏联情报机构暗中保持联络，一大批机要信息因此被传送到前苏联，从而对美国的国家

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美国财政部第二号最具实权的人物，美国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官员之一，同时亦是为联合国成立奠定基础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哈里·怀特（Harry White），曾经向克格勃透露如何粉碎美国的外交策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及私人助理洛赫林·柯里（Lauchlin Currie）曾经向克格勃发出预警，称联邦调查局正在对前苏联驻美情报特工中的关键人物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Grogory Silvermaster）进行调查。格雷戈里当时下辖的一队间谍人马是克格勃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正是由于柯里的预警，格雷戈里得以大难不死，并待事件平息之后继续从事间谍活动。身为美国最主要情报机构“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部门负责人的莫里斯·霍尔珀林（Maurice Halperin），将长达数千页的美​​国外交电报拱手交给克格勃。威廉·珀尔（William Perl）是一位年轻精干的航空科学家，他将美国喷气引擎及喷气式飞机的高度机密及试验设计泄漏给前苏联。由于他的背叛，前苏联得以打破美国在喷气式飞机开发领域技术领先的局面。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将领本以为由前苏联提供给北朝鲜和中国的战斗机根本不可能和美国战斗机同日而语，并自信美国空军可以夺得制空权。结果，他们大惊失色地发现，前苏联的米格5型喷气式战斗机不仅大大强于美国的螺旋桨式战斗机，其性能甚至超出美国研制的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直到美国手忙脚乱地研制成功萨伯F86型战斗机，才得以在技术上与前苏联的米格战斗机抗衡。所以，美国空军的盛名更多地来自于飞行员的技术水平，而远非飞机的设计水平。

另外一支活跃的间谍队伍是核武器间谍。曼哈顿项目的两名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和西奥多·霍尔（Theodore Hall）以及技师戴维·格林格拉斯（David Gleenglass）向前苏联泄漏的机密包括，从普通铀中提炼原子弹用铀的复杂公式，投产的技术

方案及向心聚爆技术的机械原理。特别是最后一项原理，可以用更加易于提炼的钷代替铀制造原子弹。

由于美国核武器机密被前苏联窃取，结果，前苏联较美国提前数年研制成功核武器，所花费的成本亦低廉许多。冷战初期，约瑟夫·斯大林在得知前苏联通过间谍活动足以打破美国核技术垄断的局面之后，其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大胆，更加敢于同美国抗衡。斯大林一向谨慎，如果前苏联没有在一九四九年成功爆炸原子弹，恐怕他也未必肯于一九五〇年支援北朝鲜与南朝鲜对峙。因为，如果没有本国核武器做后盾，斯大林一定会担心杜鲁门总统将以动用核武器为要挟阻止北朝鲜的进攻。毕竟，杜鲁门总统曾经毫不犹豫地下令将两枚原子弹投向日本，从而结束对日本的战争。然而，在一九五〇年，斯大林手中也同样握有核武器，杜鲁门的核武器威力在朝鲜战场上受到牵制，无法轻举妄动。在当年仲夏的战役中，毫无准备的美军被前苏联军队打得落花流水，退缩到朝鲜半岛的最南端，险些被逼进海里。接下来的冬天，中国共产党派出大规模的部队抗美援朝。朝鲜战争中，双方的部队及当地百姓死伤无数。如果不是斯大林手中拥有了可以同美国抗衡的核武器，或许会是另外一番结局。

前苏联在短于预期的时间内拥有核武器无异于为前苏联注射了一支强心针。一九四九年，前苏联爆破核武器装备之后，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一向独裁的斯大林，如今更加具备了任意摧毁任何一个城市的能力，从而给冷战初期带来一片阴霾。尽管冷战从始至终随时可能演化为导致文明灭绝的激烈冲突，然而，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明显地让美苏之间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如果不是靠成功的间谍活动，前苏联恐怕要等待斯大林去世之后才能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若果真如此，冷

战初期的局势也就不会如此惊心动魄。

一九四八至一九五〇年中期，美国反间谍机构逮捕的前苏联间谍中，绝大部分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都有涉及。维诺那计划破译人员的智慧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助使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反间谍机构最终挖出核武器间谍克劳斯·富克斯。维诺那计划的文件档案里清楚地指出，朱利叶斯·罗森堡是前苏联情报网的负责人，他的内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是打入新墨西哥原子弹基地的情报人员。从破译的电文中可以发现，英国外交官唐纳德·麦克林（Donald Mclean）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中的机要间谍。麦克林觉察到自己可能已经暴露，便伙同他的副手，亦是间谍身份的盖伊·伯杰斯（Guy Bergess）乘飞机潜逃回前苏联。美国的情报部门正是根据破译的电文掌握了间谍朱迪思·科普朗、罗伯特·索布伦（Robert Soblen）、杰克·索布尔（Jack Soble）等人的行踪，从而将他们逮捕归案。前苏联间谍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的供词中指出，数十名美国政府部门中的中等级别官员，其真实身份是最秘密的共产党人，他们曾经协助前苏联情报组织工作。她的证词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得到证实。

随着冷战的到来，诸如科普朗、罗森堡、格林格拉斯、富克斯、索布伦，还有索布尔这些落网间谍已经失去威胁性，其他受到怀疑的人物亦被清除出政府部门，从而对国家安全不再具有威胁。然而，国家的安全依然未能摆脱恐怖状态。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共披露三百四十九名美国人与前苏联情报部门有秘密联络，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被追查出真实身份，仍有近两百人依然掩护在化名之下。美国方面认为，其中的一部分人至今仍工作在机密岗位上。至于他们是否得到提升，是否有机会参与决策制定，便不得而知。比如一个化名缪斯的女间

谍当年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那么在办公室解散之后，她是否被成功地调往国务院工作，甚至后来又回到作为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继任组织——中央情报局工作？还有那个被称作“第十九号”的间谍，身为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他可以在“三巨头会议”期间私下会晤丘吉尔、罗斯福，他如今的状况如何？那个化名拜比的克格勃间谍是否依然在美国的文件部门工作？化名唐纳德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间谍在当时是美国海军上校，如今是否依然服役，或许已经被提升为海军上将？至今仍未能查出其真实身份的核武器间谍昆唐和佩斯，他们是否还在活动？当年就是他们向斯大林提供用铀和钚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如今他们是否又在将更加具有杀伤力的氢弹秘密泄漏出去？代号“道奇”、“教母”和“法可”的三名间谍如今在做什么？维诺那计划的文件中证实，这三名间谍曾经向前苏联提供专门处理前苏联事务的美国外交官的资料。法可本人已经被列入代表美国出使莫斯科的成员之一。那么，在美国的外交官员中，同时又身为前苏联问题专家的人员中，究竟谁是叛徒？既然美国的谈判团中有人在为谈判对手工作，美国又何以在谈判中胜出？西欧是冷战期间当然的主战场，丧失西欧便意味着丧失一切。如何在二战后的欧洲建立稳定的民主并成立北约军事联盟是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然而，维诺那计划的电文中显示，有一名代号“鼯鼠”的克格勃成员被安插在华府内部，源源不断地将美国对欧洲的最高外交政策机密传送到莫斯科。就在美国官员们聚首探讨如何处理与法国、英国、意大利及德国之间的敏感问题时，“鼯鼠”是否一直有机会在场聆听，并尽其所能地对政策制定加以阻碍？斯大林的间谍策略不仅仅挖掘到美国的机密，而且彻底粉碎了美国官员之间的相互信任。

杜鲁门政府认为，随着二战结束，原先用来对付纳粹德国

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庞大军备不再有任何意义，于是下令将它们解除。政府亦开始大幅削减军费，将军工厂转为生产民用产品，停止征兵，将数百万士兵转业回归平民生活。应用于战争期间的情报及安全机构设备全部解除。杜鲁门表示，不希望建立美国的盖世太保，并且预计和平年代对外交情报的需求不会太大，因此下令取消了美国最主要的情报部门“战略服务办公室”。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战争期间紧急启用的对政府公务员的安全审核条例亦被搁置。

一九四五年末到一九四六年，联邦调查局多次向白宫提交报告，汇报在美国境内发现猖獗的前苏联间谍活动，但白宫方面始终反应冷淡并持怀疑态度。有证据显示，在一九四五年的“美亚案件”中（详情见第六章），曾有美国的机密文件遭窃取。然而杜鲁门政府却对这些证据加以粉饰，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美苏之间的战时联盟，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因情报丑闻带来政治上的尴尬。不过，到一九四七年初，政府的冷漠态度结束。根据投诚的前苏联间谍伊丽莎白·本特利和艾哥·郭岑可（Igor Gouzenko）等人的供词以及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杜鲁门政府意识到，所谓前苏联间谍活动猖獗的言论并非联邦调查局危言耸听。如果无法摆脱被前苏联间谍所渗透的阴影，作为政府，根本无法成功地执掌政权。另外，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前苏联的间谍活动大肆猖獗起来，一旦事态发展到引起共和党人的注意并对执政党无视美国国家安全之事进行发难的地步，入主白宫的杜鲁门政府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杜鲁门总统因此于一九四七年下令建立一套复杂完整的针对政府公务员进行安全审核的执行法令，并且在解散战略服务办公室两年之后，重新建立比战略服务办公室更具规模与实力的中央情报局。一九四八年，杜鲁门政府根据一九四〇年颁布的史密斯法

案将美共领袖控以煽动罪。虽然维诺那计划及其破译的电文仍属机密，但电文的内容以及协助前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人名单已经在美国军事及公共安全官员当中传阅，再由安全部门的官员传达到高级政治行政官员及国会成员，并透过他们传达到记者和评论员手中，最终以新闻形式警示社会公众。

美国人民对前苏联及共产党人的 间谍活动的理解

冷战初期，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每隔几个月，报纸上便出现连篇累牍的报道，讲述共产党人如何渗透到美国的实验室、工会，或是政府部门。一时间，美国人心惶惶，生怕那些对共产主义的执著远胜于对美国的执著的共产主义第五纵队打入自己机构内部。五十年代中，陆续有人因从事与间谍有关的活动被捕并被判刑，其中包括高级外交官阿尔杰·希斯 (Alger Hiss)，窃取核武器情报的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 (Ethel Rosenberg)。公众舆论雀起，其中心内容无外乎三点：前苏联的间谍活动猖獗；美国共产党人协助前苏联开展间谍活动；有数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叛国。虽然维诺那计划的文件为这些舆论提供了事实依据，政府并没有对外公开维诺那计划的内容，并成功地掩饰了有关前苏联间谍活动的消息来源，因而剥夺了世人分享由维诺那计划提供的确凿证据的权利。于是，有关前苏联谍报活动及共产党人参与报道，其主要依据来源于投诚的前苏联间谍的证词以及一大批间接证据。至于社会上对这些报道的信任程度，很大部分取决于他们对国家安全官员们的信任程度。无论如何，这些证据远不如维诺那计划所破译的电文证据确凿。证据的模糊性给美国的政治家们及美国人民对本国历史的认识造成一定影响。

对外封锁维诺那计划的消息，将维诺那计划涉及的内容局限于政府内部，这一决定是由美国高级军事官员在征求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意见之后做出的。除了参与任务的密码破译人员，只有极少数军事情报官员、联邦调查局特工及中央情报局官员知道此计划。事实上，在一九五二年以前，中央情报局在维诺那计划中扮演的角色始终是被动的，直至一九五三年后才开始收到被破解的电文。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实，但有消息称，为防止白宫方面将政治敏感信息透露出去，就连杜鲁门总统都不清楚维诺那计划的存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报内容通过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提交给总统的有关间谍活动调查的备忘录以及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工作汇报反映给杜鲁门总统，但从未有人直接告知杜鲁门总统，这些信息来源于被破译的前苏联发出的电报。此举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杜鲁门总统对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缺乏信任，认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过分夸大前苏联的间谍活动。如果杜鲁门总统知道维诺那计划的存在，如果他知道间谍伊丽莎白·本特利和惠特克·钱伯(Whittaker Chamber)的供词在维诺那计划的电文中得到证实，或许他的助手就不敢贸然否认本特利证词的可靠性，不会将钱伯以伪证罪论处，更不会听信美国共产党及阿尔杰·希斯的同党散布的谣言，称钱伯曾经因精神病被送进疯人院。

将维诺那计划作为绝密从而封锁政府其他部门对其存在的认知，这一决定有其背景原因(详见第二章)。然而，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这项保密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惊人的。如果将维诺那计划公开，就无需在罗森堡是否清白这个问题上花上四十年时间，因为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已经明白地指出，朱利叶斯·罗森堡是前苏联在美国间谍网的头目，也就不会有人对罗森堡是否真的参与窃取核机密提出

质疑，因为维诺那计划的电文中已经写明，正是罗森堡将他的内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招募为间谍。如果将维诺那计划公开，哪怕是电文的内容在政府内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传阅，埃塞尔·罗森堡或许会被免于死刑。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并没有替埃塞尔开脱罪责。事实上，电文显示，埃塞尔的确有份参与她丈夫组织的间谍活动，并协助她丈夫将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招为间谍，然而，根据电文内容，埃塞尔一直以来都只在她丈夫的活动中充当从犯，从来不是主谋。如果在审判罗森堡的过程中能援引维诺那计划的内容，埃塞尔的罪行固然会被确认，但罪责却可能减轻许多。

另外，如果将维诺那计划公开，朱利叶斯·罗森堡或许也可以免脱死罪。在公审朱利叶斯·罗森堡期间，公众所知道的核间谍只有两名，其一是由罗森堡招募从此成为情报源泉的戴维·格林格拉斯，其二是克劳斯·富克斯。不过，当时富克斯身处英国，于是，美国的媒体将聚焦集中在惟一的一名前苏联核间谍格林格拉斯身上。格林格拉斯的供词又将朱利叶斯·罗森堡推为核间谍活动的罪魁祸首，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动用死刑不足为奇。

事实上，除了富克斯和格林格拉斯之外，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可以发现，在曼哈顿项目中，前苏联方面还另外有三个情报来源。根据维诺那计划的文件，其中有一名年轻的物理学家西奥多·霍尔，他提供的情报价值远远高于身为机械师的戴维·格林格拉斯提供的情报。联邦调查局对霍尔的审讯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政府手中亦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霍尔的罪行，而维诺那计划中破译的电文作为惟一的证据却因为保密条例无法提供给法庭，霍尔因此被无罪释放。至于代号“弗格”和“昆唐”两人的真实身份一直未能确认。根据他们发往前苏

联的情报推断，“昆唐”是一位资深科学家，“弗格”则有可能是科学家或是工程师。这两个人提供的情报价值亦高于戴维·格林格拉斯。如果将维诺那计划公开，公众视野中的核间谍将会是五个人，而并非只有戴维·格林格拉斯和克劳斯·富克斯，且另外三个人对美国安全造成的危害大于格林格拉斯。如果格林格拉斯的罪责减轻，朱利叶斯·罗森堡作为格林格拉斯的招募人，其罪责也会相应减轻。朱利叶斯·罗森堡最终还是会被量刑，但审判结果可能只是终生监禁，而非死刑。

将维诺那计划作为绝密封锁的决定所造成的影响是广泛的。由于政府内的共产党人与前苏联间谍活动的牵连，使得美国共产党人的忠诚问题成为党派之争的焦点。以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为首，一批保守派分子和共和党党徒对罗斯福政府及杜鲁门政府的忠诚度发起猛烈抨击。有人将“新政”全盘抹煞成为共产党人的阴谋。更有甚者，将杜鲁门的国务部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以及曾在罗斯福时代担任陆军统帅，在杜鲁门时代担任国务及国防部长的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视为该项阴谋的参与者。引用麦卡锡参议员的话说，他们参与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阴谋，一场臭名昭著的阴谋，其主谋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将永世遭到正直人民的唾弃”。在维诺那计划的电文中，根本不存在怀疑艾奇逊和马歇尔参与共产党人阴谋的任何指证。然而，还是出于维诺那计划的保密性，电文的内容不得对外公开，使得麦卡锡之流的政客出于政治野心，抓住时机，利用哈里·怀特及阿尔杰·希斯叛国的确凿证据混淆视听，莫须有地抨击艾奇逊和马歇尔。

麦卡锡的过度叫嚣反而引起一批自由党人和激进分子的反感，并对麦卡锡加以抨击。反共产主义情绪在六十年代末更加

丧失市场，因为那些反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批评家们认为，正是由于反共产主义情绪才导致美国发动这样一场不幸的战争。到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评论家，乃至几乎所有的史学家得出结论，前苏联的间谍活动属于小规模活动，只有极少数美国共产党人参与其中，而且没有高层官员叛国。许多史学文章将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的美国描述为“红色恐怖”，认为美国人被自己的臆想“吓得冷汗涔涔”。越来越广泛的意见认为美国共产党人与间谍活动无关。有一部著作特别强调：“从未有任何一份公开文件证明在二战结束后的岁月里，美国共产党与间谍活动有关”。

由此，共产党人被认定是缺乏理性且过于残暴的美国政府迫害下的无辜牺牲品。正是在这样一片恐怖气氛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期间，根据一名精神失常，同时又是反共产主义狂热分子惠特克·钱伯的虚假证词，“新政”的拥护者（阿尔杰·希斯）被捕入狱；无辜的革新派人士（罗森堡等人）在反犹太主义情绪弥漫之下，被冠以间谍罪送上电椅；数十名清白的公务人员因伊丽莎白·本特利之类的反共产主义职业分子的指控而蒙冤，最终断送职业生涯。同样版本的事件还包括，一名政府官员（哈里·怀特）因本特利的伪证引发心脏病死亡，另外一名官员〔高级外交官劳伦斯·达根（Laurence Duggan）〕因为钱伯的恶意诬告而自杀。与此类似，许多书籍和文章里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杜鲁门总统颁布执行法令，禁止政府部门录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务人员，以及其后颁布的一些针对间谍活动和共产主义颠覆运动的法令，其目的并非真正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因为并没有证据显示间谍活动或是颠覆活动猖獗），而是想从根本上破坏民主自由。更有评论家指出：“政府的法令完全剥夺了异己的合法权益”。

尽管维诺那计划在美国反间谍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同时亦是保密工作执行得最为严谨的政府绝密。维诺那计划完成历史使命时，共破译了三千封往来于前苏联与其在世界各国的使领馆之间的密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八十年代，有关于维诺那计划的零星传闻在社会上流传，但计划的具体内容及最绝密的文件直到一九九五年才对外公开。美国政府向来在短期保密工作方面做得出色，一旦保密期过长，特别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机密，往往很难控制消息外泄。而维诺那计划却足足对外封锁长达五十三年，可谓美国保密史上的一项奇迹。

遗憾的是，政府在成功封锁维诺那计划的同时，亦严重扭曲了世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的认识。多年来，探讨麦卡锡主义、联邦安全计划、前苏联谍报活动、美国共产主义以及冷战初期等课题的书籍有数百部，文章更多达数千份，但其中存在众多误导，令世人对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及五十年代美国历史的认识存在偏差。而维诺那计划档案里的信息则有助于世人修正视角，重新审视冷战初期的历史，重新理解美国对前苏联谍报活动及共产主义颠覆运动的态度。

随着“信息自由法案”的颁布，联邦调查局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陆续将之前的秘密档案对外公开，令公众终于有机会一睹其中的内容，但仍有相当一部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记录是公众接触不到的。由于查询档案的要求云集，积压现象严重，经常出现提出申请之后要等上五年的时间才能收到所需要的材料之事，而且还经常有些强制性补充法案出台，豁免某些资料对外公开的资格，导致公开材料中常常有大篇幅的内容被删节，令档案失去价值。当然，即便是一份完整的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公开供人参考，其中记录的也仅仅是联邦调查局单方面对前苏联谍报活动的了解，相对于整个真相来讲，不过是一面之

辞。尽管存在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档案对外公开,有助于世人公正客观地看待历史。

一九九一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学者们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前苏联的档案。这些蕴含着丰富史料的文件于一九九二年在莫斯科正式公开,为世人全面准确地理解二十世纪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可靠依据,从而掀起新一轮史学研究高潮,不断有新的论著涌现。然而,俄罗斯的许多档案只限于部分对外公开,仍有许多内容被封存,特别是有关前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外国情报部门及克格勃外国情报部门的档案依然保密。由于前苏联的情报机关与目前俄罗斯的情报机关在机构上有很大的延续性,所以在短期内不会将有关档案公开。然而,前苏联情报机关曾与前苏联的其他一些组织有过合作,而这些组织的档案已经对外公开,其中的部分资料涉及情报部门,为学者们提供了一条特殊途径,窥探仍在保密之中的情报机关的档案。

不过,要想更好地了解前苏联在美国的谍报活动,最重要的资料便是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毫无疑问,这些电文同时也保存在俄罗斯尚未对外公开的情报档案里。维诺那计划的档案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资料,更重要的,鉴于其可信性,其内容可以作为判断投诚间谍的供词、联邦调查局调查记录等其他资料可信程度的依据。

斯大林对美国发动的间谍战

纵观二十世纪的历史,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各强国政府无一不在进行着这样或那样的谍报活动,而前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将谍报工作作为一项国策广而用之,是其他任何一

个国家无可比拟的。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由于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对前苏联造成威胁，斯大林将绝大部分间谍力量分布在欧洲和亚洲，美国尚不在他的近期考虑之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国宣布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策略开始转变。他意识到，一旦德国和日本被击败，世界局势将会形成前苏联、英国、美国三足鼎立的局面。三者之中，最强大的当属美国。于是，斯大林决定将谍报活动的重点转向美国。

一九四二年初，前苏联、英国和美国达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抗纳粹德国及其盟军。很快，前苏联成为继英国之后，美国第二大军事援助对象，所接受的援助总计超过九十亿美元。作为援助计划的一部分，美国邀请前苏联大幅增派外交工作人员，并增设特别办事处以协助援助事宜。数以万计的前苏联军事官员、工程师、技师被派往美国，从众多的援助物资中精选出最有助于增强前苏联军事实力的设备、武器、交通工具、飞机等运往前苏联（共计四十万辆卡车被运往前苏联）。大批的设备维修人员前往美国受训，操作说明书被翻译成俄文，一批批物资在经过严格检查，确保无误之后装船运往前苏联。一整支前苏联海军部队前往美国受训以接手美国援助的战舰和货船。

在前往美国的前苏联人员中，其中一部分人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及前苏联海军情报部的特工。这些特工身兼双重任务。其一是保障内部安全，这一点与美国的关系不大。克格勃的国内安全部门雇佣了数十万名全职特务及数百万名兼职线人以确保前苏联公民政治上的坚定与忠诚。由于军事援助计划，前苏联派出数以万计的公民前往美国，与此同时，一批国内安全部的特务人员也被安排在其中，一同派往美国。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提及这项内部任务。电文显示，在到达美国港口承载军事物资的每一条

前苏联货轮上，至少有一名，通常是两名，有些时候多达三名特务被安插在水手当中，直接向克格勃或者前苏联海军情报部汇报。他们的任务并非刺探美国人，而是密切监视船员中任何政治不满及叛国倾向。有电文显示，曾经有船员跳船潜逃，特务人员在捕捉到其行踪后将其秘密绑架，并不顾美国法律，秘密将叛逃者押上前苏联货轮送回国。同样根据电文得知，克格勃在前苏联驻美的每一个办事处均招募或安插特务人员，他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前苏联驻美人员，向总部汇报任何政治上动摇或是叛国迹象。

前苏联特工的第二项任务是在美国境内开展谍报工作，其规模和范围正是本书的主要内容。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证实了前苏联如何成功地招募间谍，借以打入美国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及机密实验室。

看过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之后便不难理解美国政府对国内共产主义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背后的原因。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联邦政府对美国共产党人采取的清查、起诉等手段完全基于政府认为美共在协助前苏联开展谍报工作，因而也就不难理解杜鲁门政府为何在一九四七年颁布执行法令，以及五十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何加强对政府公务员的安全及忠诚审核。同样道理我们也就明白，杜鲁门时代的司法部长为何于一九四八年根据史密斯法案以煽动罪起诉美共领袖，国会为何于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对国内共产主义加以清查，从而进一步理解社会上对共产主义的抵触情绪从何而来。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前苏联在美国展开的间谍活动，其肆无忌惮的手段往往只有在一个主权国家对待敌国时才会采用。四十年代末，根据维诺那计划提供的证据，前苏联在美国谍报活动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令美国反间谍专家及高

层政策决策人感觉到，斯大林其实早已对美国展开秘密攻势，冷战也并非在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而是早在二战结束之前的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本书记载的前苏联在美国的谍报活动大多发生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重点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前苏联展开谍报活动最肆虐也是最有成效的时期。书中记录了前苏联如何利用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建立起广泛基础，成功地在战时开展谍报活动。书中分章节记录了美国共产党人在前苏联谍报活动中的作用，伊丽莎白·本特利领导下的间谍网络，开展的工作虽少但意义重大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和前苏联海军情报部及其与规模更为庞大的克格勃的分别，前苏联在工业及科学领域的间谍活动以及苏维埃联盟在美国领土上与政治异己，诸如托洛茨基分子，犹太复国分子，叛徒及各种流亡分子展开秘密斗争。维诺那计划中破译的电文是本书的主线。成就卓然，被长期封存的维诺那计划的历史详情在第二章中记录。



破译密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苏联驻美机构与莫斯科之间的沟通方式有三种。绝大部分资料通过外交邮袋或是普通邮件寄出。外交邮袋虽然安全性高，但是战争期间，投递时间过长，通常要花上数星期甚至数月才能到达目的地。那些时间上要求紧迫的内容便只有通过室内短波无线电、商业无线电报或是国际商业有线电报发出。但这三种方式均非百分之百安全。只要有适当的设备及足够的监听人手，便可以截获无线电发出的信息。而经有线电报发出的信息，电报在传送过程中途经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电文抄录下来。二战期间，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出于军事防范需要，对国际间往来的电报内容都有抄录存档。

要解决无线电报和有线电报的安全问题，只有对电文加密。如果电文以外人看不懂的密码形式发出，即便在传送途中被截获，也不会泄漏内容。前苏联与其驻美机构之间的沟通通常采用商业有线或无线电报，而很少采用无线电波。维诺那计划中截获的电报大多是商业有线电报，有一小部分为商业无线电报。为简便起见，本书统称其为“电报”。

四十年代初，受技术条件限制，要想利用短波无线电在莫

斯科和北美之间建立稳定的通讯，必须建立功率强大的发射台。然而，前苏联在美国有限的外交领地内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发射台。而且，这样的发射台在美国属于非法。前苏联在驻美的外交部门设置了短波电台，但很少动用，其目的只是作为商业电报瘫痪的紧急情况下的后备资源。

三十年代，苏维埃的机构之一共产国际曾利用短波无线电与其领导下的外国共产党组织联络。由于国外的共产党组织绝大部分在中欧和西欧，接受短波无线电信号的稳定性远胜于遥远的北美。不过，共产国际在三十年代同样与美共通过秘密无线电系统保持联络。莫斯科的前苏联文献中心保存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有上千封被破译的往来于美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报。

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国际与美国之间的无线电沟通是通过一个利用化名身份活动的共产国际成员设在家中的电台进行的。此人的真实姓名是所罗门·瓦迪莫维奇·麦可森-曼纽夫 (Solomon Vladimirovich Mikhelson - Manuilov)。被破译的电文显示，此人的任务是负责将共产国际的经费派往美国，安排美共与共产国际的邮件往来，将莫斯科方面的指示传达给美共，并将美共的活动情况提供给莫斯科。美共在美国有两个短波收发台，其中一个位于纽约市，一个设于长岛，均未申请牌照，属非法设置。麦可森-曼纽夫负责指挥电台的工作，真正的操作由一些值得信赖的共产党人负责。其中一个名叫阿诺德·雷德 (Arnold Reid) 的共产党人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国际纵队时，在简介中自豪地写道，他曾在一九三五年负责长岛秘密电台的工作，足以证明美共对他的信任。

事实证明，共产国际与国外共产党组织之间的无线电联络是脆弱的。一九九七年末，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性质相同的英

国“政府通讯总部”对外公开了上万封共产国际与外国共产党组织之间的密电。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间，“政府通讯总部”的前身组织在一个代号为“面具”的任务中破解了这些电文。

并非只有共产国际的电报被截获并被破译。二战期间，盟军取得的几次重大胜利皆得益于在密码破译方面的突出成就。美国曾破译日本海军统帅的密电，得以用最佳方案部署自己有限的兵力，在中途岛海战中彻底扭转太平洋上的战局。英国也成功破译德国的一个代号“谜”的机选密码系统，得以集中最优势资源在大不列颠战役中以少胜多。

前苏联的外交官员和情报官员十分清楚，即便是加密的电文也有可能被破解。然而，他们仍源源不断地发出上万封加密电报，其中很多电文涉及高度机密，甚至涉及如何在其他国家展开谍报活动。其原因在于，前苏联采用的密码系统远比德国和日本（当然还有共产国际）采用的密码系统更加难以破解。只要正确运用这套加密系统，可以做到牢不可破。

前苏联的密码体系

本书对前苏联的密码体系做一粗略概述，有关资料来源于参与维诺那计划的国家安全部密码分析员，前苏联叛投的密码工作人员，并佐以有关加密、解密以及根据一次性密码纸进行二次加密等程序的基本知识。

前苏联情报官员首先用俄文写出电文。为减轻密码员的工作量且缩短电文传送时间，电文内容越精炼越好。（正式的电文在密码员的工作室里完成。接收的电文亦保存在工作室，情报官员只可以将笔记或电文的摘录带出工作室）。发出电文的情报官员要将电文中的姓名和地址全部用化名代替，这样，即

便中途有人读到电文也无从了解化名的真实身份，而收到电文的情报官员却可以一目了然。

密码工作人员参照密码簿将电文转化为一组组由四位数字组成的密码。密码簿的作用如同字典，针对每一个字母、音节、单字、词组，甚至标点符号和数字，都有对应的一组数字做密码。如果某个单字或词组在密码簿里找不到对应的一组数字，可以用构成字词的字母密码或是音节密码拼写出来。遇上由拉丁字母组成的人名时则要转化为西里尔字母，然后再参考另外一份“拼写表”转化为密码。

举例说明。假设克格勃收到间谍威廉·厄尔曼提供的关于美国地空部队研制新型火箭的报告（厄尔曼是地空部队军官，被派驻五角大楼）。厄尔曼的详细报告由克格勃用外交邮袋寄往莫斯科，但同时要发出电报通知莫斯科，厄尔曼的报告已经上路。克格勃的官员会用俄文起草电文：“厄尔曼提交报告关于火箭”。然后，或是在起草电文的同时，他会用厄尔曼的化名“飞行员”代替真名。交到密码员手中的电文写道：“飞行员提交报告关于火箭”。加密员参照密码簿将电文转化为四位数字密码：

飞行员		提交		报告		关于		火箭
7934		2157		1139		3872		2166

加密员接着从第二组数字中抽出一个数字放到第一组，使第一组由四位数增加到五位数。再从第三组数字中抽出两个数字放到第二组，使其也变成五位数字。依此类推。五组数字变为：79342 15711 39387 22166。

下一步，加密员取出一叠一次性密码纸。每一页密码纸又被称作“钥匙”，上面有六十个密码，每一个密码由五位数字组成。加密员选取左上角第一个密码（在本实例中，该密码为

26473) 作为电文的开头。此举的目的是要通知收电方(收电方的手中也有同样一叠密码纸)应该选用哪一页密码纸解密。

从密码纸上的第二个密码开始,加密员将密码纸上的密码摆在参照密码簿得出的密码下面,将两组数字中的每一位数字对应相加,如果相加之和大于9,则只取个位上的数字(8加6的结果并非取14,而是取个位上的4)。一个全新的密码由此产生,同样由五位数字组成,放在作为页码索引的第一个密码的后面。

参照密码簿得出的密码: 79342 15711 39387 22166

密码纸上的密码: 26473 56328 29731 35682 23798

二次加密后的密码: 26473 25660 34442 64969 45854

最后,将由五位数字组成的密码转化为由五个字母组成的密码。数字与字母之间的对应为: 0 = O, 1 = I, 2 = U, 3 = Z, 4 = T, 5 = R, 6 = E, 7 = W, 8 = A, 9 = P。由此产生:

UETWZ UREEO ZITTU ETPEP TRART……TEERP 23412

“钥匙”上第一个尚未用过的密码放在电文末端(在本实例中,该密码为46659,对应字母为TEERP),其后再加上一组五位数字(在本实例中为23412),其中的前三位数字代表序号,后两位数字代表加密的时间。

莫斯科克格勃方面有专门部门接收电报,然后转给解密员,将字母转化为:

(26473) 25660 34442 64969 45854……(46659)

解密员需要参照他手上的那份密码纸。如果电文传送顺利,没有要求重新发送,则可以肯定,解密员手中那页有26473的密码纸便是正确的用于解密的“钥匙”。此外,如果密码纸上的26473与46659之间的密码个数同电文中的26473与46659之间的密码个数相同,则证明收电方已经收到整条电

文。解密员用电文上的密码中的每一位数字对应减去解密“钥匙”上密码中的每一位数字。如果被减数大于减数，则减数自动加十，之后再运算减法（比如4减6的结果应该是8）。只要解密员的数学运算准确，就可以推算出发电方利用密码纸进行二次加密前的数字：79342 15711 39387 22166。然后，再运用与第一次加密时完全相反的方法将每一组的五位数字转化为四位数字，并参照密码簿解读出电文：

飞行员		提交		报告		关于		火箭
7934		2157		1139		3872		2166

解密后的电文交给相应的克格勃总部官员。情报官员参照他自己的记录将化名转为真名厄尔曼。

攻破前苏联密码系统

美国的密码分析员最终成功地破解了前苏联密电，塞西尔·菲利普斯便是其中的一位功臣。他这样评价前苏联的密码系统：“维诺那计划所破译的电文均经过双重加密。电文在初次加密后，如果再利用一次性密码‘钥匙’进行二次加密，其保密性当属万无一失。即便是对手想办法将密码簿弄到手，甚至从叛变的密码员那里了解到电文加密的过程，仍没办法破解。其原理在于，加密和解密的过程完全依赖由随机模式（即不可预知的模式）设立的一次性密码钥匙，而收发双方所掌握的密码钥匙是举世无双的。”只要操作正确，每一份电文利用“钥匙”加密的过程都是独一无二的，绝不会有重复现象，密码员也就无从下手破解机密程式。

然而，这样一套安全系统的代价也是昂贵的，因为每一份加密的电文都需要一把独一无二的密码“钥匙”进行二次加

密。二战期间，共有数十万份电报发出，意味着要配备数十万把举世无双的密码“钥匙”。为了确保密码系统的万无一失，每一把“钥匙”必须只能使用一次。在高速度数字计算机尚未问世的年代，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

德国和日本也同样意识到一次性密码“钥匙”的安全性。但是，顾及要动用数目惊人的技术力量大批量生产由随机密码组合成的“钥匙”，他们决定另辟蹊径，采用虽然安全性不如密码“钥匙”那样高，但是易于生产和使用的加密系统。德国代号“谜”的机选密码就是由一部原始的电子计算机制造出来的。德日两国都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讲，这一类密码容易被破解，但在实际应用上仍有相当高的安全系数。德日两国犯下的致命性错误在于低估了美国和英国解密人员的智慧，从而加速了他们的战败过程。

前苏联的保密机制久负盛名。他们决定迎难而上，不惜血本雇佣专门队伍生产一次性密码“钥匙”。有一段时间，由于对“钥匙”的需求量激增，导致供不应求。一九四一年六月，阿道夫·希特勒撕毁与前苏联的联盟协议，大举进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夜之间，前苏联外交官员及情报官员发出的加密电报铺天盖地，“钥匙”的库存一天天减少，莫斯科的密码部门开始发出警告。“钥匙”的生产人员每人都收到定额，凡无法保障军需者，将受重惩，甚至遭到杀身之祸。于是，这场危机不仅仅是国家的危机，而且成为个人危机。作为解决方案，一九四二年初，前苏联决定重复生产已经使用过的密码“钥匙”。没有人知道，提出这一解决方案的究竟是惊恐万状的高级官员，还是走投无路的生产品人员。总之，数万份重复使用的“钥匙”于一九四二年出炉。

一段时间内，前苏联利用重复使用的方式将“钥匙”的产

量提高了一倍，亦使得“钥匙”由一次性变为二次使用。或许，前苏联方面认为此举的风险很小。许多密码专家认为，将一次性“钥匙”多用一次，虽然从理论上讲，会令密码系统丧失牢不可破的特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其安全性并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这样一个漏洞即使真的被密码分析员抓住，他们必须手头同时拥有利用同一把“钥匙”生成的两份电报，才有可能破解其中的奥秘，前提是，他们必须有能力分析到这两份电报以同一把密码“钥匙”为基础。为将此举的风险降到最小，密码生产人员并非完全照搬之前的整叠密码“钥匙”，而是从中选出单页复制，再将单页组合成一叠全新的密码“钥匙”，然后发往前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机构。密码破译机关要想攻破前苏联的密码系统，也必须在世界各地拥有足够多的分支机构，才有机会收集到源自同一把“钥匙”的两份电报，并且需要有一支极其出色的密码分析队伍，花上数年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美国的国家安全部刚好具备上述的所有条件。国家安全部的前身是“陆军信号情报服务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该部门的密码分析力量有限。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进攻波兰，信号情报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只有十九人。两年之后，日本制造珍珠港事件时，其工作人员已经增加到近四百名，其中包括密码制造人员，密码破译人员，驻扎华盛顿和各战场的无线电报拦截人员，后勤人员及总部的工作人员。随着美国宣布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数以万计的新增人手被迅速增派到通讯情报及密码破译部门。一九四五年，服务部的总人数激增至超过一万人。为了适应庞大的机构，办公地点搬到位于弗吉尼亚北部的阿灵顿会堂。这里原先是一所女子私立中学的校址，隔着普特玛河与华盛顿相望。此后的很多年，无论其正式名称怎样变化，信号情报服务部在政府内部始终有一个不成文的称谓——

“阿灵顿会堂”。一九四九年，海军及空军的信号及密码情报部门也合并到陆军信号情报服务部，“阿灵顿会堂”被重组成为“部队安全部”，并脱离陆军的领导。一九五二年，更名为现在的“国家安全部”，由国防部长领导，并迁入位于马里兰的新办公地点。为简明起见，本书中一直采用“国家安全部”的名称。

战前只有区区几名密码专家的信号情报服务部在二战期间随着新生力量的加入迅速壮大起来。新的密码破译人员的背景各异：有掌握不同国家语言的语言学家，有专门对付数字密码的数学家，有负责拦截无线电报的工程师和技师，还有热衷于填字游戏的成年人。据一位元老回忆，工作人员当时最主要的娱乐就是玩桥牌，这项活动对数学水平要求颇高，或是钻研《伦敦时报》或《纽约时报》上令人绞尽脑汁的填字游戏。新成员中有很多女性，因为太多的男性早已被派往其他一些实战部门。几乎所有的新成员对密码学的原理和技巧知之甚少，需要培训和自修。但是很快他们就在破译德国和日本的密电中取得重大胜利。到二战末期，这个原本默默无闻，几乎全部由外行人在战争期间紧急拼凑起来的机构已经可以和拥有世界一流破译专家的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媲美。

国家安全部的前身机构虽然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收集前苏联的密电及其他形式的电报，但一直将收集的电报束之高阁。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破译德国和日本的密电在当时属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的密码分析员过去几年里对前苏联密码系统的研究始终未取得进展。然而，一九四二年，国家安全部成功破译日本军事武官的密电后，促使他们重新审视前苏联的密码系统。被破译的日本密电是日本军队长官与日本驻德国及赫尔辛基的武官之间的往来电文，内容涉及芬兰的密码分析员破译前苏联密码系统的事宜。芬兰有优秀的密码专家，

而且几乎是全身心地研究芬兰的最大威胁——前苏联的密码系统。虽然他们尚未成功破译前苏联的外交密电，但已经对前苏联密码系统的一些初步特征有了部分认识，并且抓住了其中一些明显的规律。芬兰方面将研究心得与日本分享，因为日本同样对前苏联充满反感。

根据芬兰与日本之间交流的信息，美国的密码分析员得以将收集的前苏联密电分为几大类，这是进行密码分析必经的第一步。芬兰方面认为，前苏联并非使用一次性，而是在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密码“钥匙”。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芬兰的推断是错误的，但当时的美国密码分析员因此受到鼓舞，认为前苏联的密码很快便能破解。也正在此时，一九四三年，卡特·克拉克下令研究前苏联密电。该项任务在最初阶段并没有被命名，只是被简单地称为“俄罗斯外交问题”。后来，被破译的电文逐渐有了正式代号，先是叫做“玉石”，后来改为“新娘”、“毒品”，直到一九六一年确定为“维诺那”。最终，这项任务被确认为“维诺那计划”。

国家安全部很快发现，利用密码“钥匙”发出的密电主要有五种类型。其中之一是贸易电报，由前苏联贸易部和负责监管前苏联接收美国援助军需物资的前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发出。第二类是由前苏联外交部的外交官们发出。其余三种电报由前苏联的情报部门官员，例如克格勃，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前苏联海军情报部发出。这些情报官员活跃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前苏联使领馆、前苏联贸易部及前苏联采购委员会以外的地方。

重大性突破发生在一九四三年。理察德·哈洛克（Richard Hallock）在研究前苏联贸易部的电报时发现，前苏联从不同的密码“钥匙”簿中抽取出个别“钥匙”重复使用，且这种现象

十分普遍。哈洛克及其同事们的发现为破解前苏联密码系统带来第一线曙光，并将破译工作的重点转向收集用同一把“钥匙”发出的密电上。经过一番浩大的工程之后，美国的密码分析员终于证明，哪怕只是仅仅重复使用过一把“钥匙”，也能令破解工作成为可能。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原先负责破译日本及德国密电的密码分析员开始被分派新的任务，维诺那计划的人手因此增加。新增的人手中有一位名叫塞缪尔·丘（Samuel Chew）的密码分析员人很聪明，充满创意。他在分析前苏联的贸易电文时发现，有关货物装船的电文中有一些极有规律的元素。贸易电文多具有时间性，内容单一，主要是通知莫斯科方面有哪些船只运载哪些物资离开美国港口。

丘的发现为破解“钥匙”带来突破性进展，破译人员终于可以将利用“钥匙”加密的元素从电文中剔除出去，只剩下第一次加密后的骨架。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随着不断有新增人手从破译日本密电的任务中调往维诺那计划，越来越多的前苏联密电被剥去用“钥匙”加密的伪装。尽管如此，密码人员面对的仍旧是由一组组数字构成的密码，它们的真实含义仍不得而知。

打开“钥匙”是维诺那计划走向成功的关键，但任务尚远未完成，因为前苏联采用的是两次加密系统，即首先参照密码簿将电文加密，然后再利用一次性密码“钥匙”令电文内容更加扑朔迷离。被重复使用的密码“钥匙”为国家全部破解这把“钥匙”提供了契机，但破译人员打开的还只是第二层密码，尚有第一层密码挡在面前。要想解开第一层密码，揭示电文的真实面目，惟一的办法是由密码语言学家复制一本前苏联使用的密码簿。

虽然丘具备一定的俄文水准，但是要破解俄文文字与密码

之间的关系，必须有一位全职语言学家，其任务就是要突破对手的密码簿这最后一道防线。于是，一九四六年初，梅雷迪思·加德纳(Meredith Gardner)被派往维诺那计划，担负起这一使命。加德纳来自美国南部，身材瘦高，讲话时轻声细语。他研修过德文、梵文、立陶宛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并在得克萨斯州及威斯康星州的大学教授语言。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入伍从事破译德国和日本密电的工作，并在此期间自修了日语。一九四六年，加德纳又开始学习俄文。如今，摆在他面前的是前苏联贸易部和克格勃利用同一把“钥匙”加密后发出的电报，不过，“钥匙”的秘密已经被解除，只剩下一组组数字等待他去破解。一九四六年仲夏，加德纳成功地破译了相当一部分密码，揭示出电文的雏形，并由此确定，这些电报内容涉及前苏联的谍报活动。一九四六年末，加德纳破译的一封电报揭示了前苏联的核间谍活动。

加德纳终于摸索出克格勃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年初所使用的密码簿的秘密，从而令前苏联在这段时期发出的密电内容大白于天下。维诺那计划有史以来破译的最完整的电文由此诞生。然而，国家安全部也同时发现，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的大部分时间，克格勃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密码簿。数年来，国家安全部的密码分析员对这本早期密码簿一筹莫展，直到一九五三年末，塞缪尔·丘发现前苏联的加密员有节约使用密码“钥匙”的情况，即将同一页密码“钥匙”上没有用完的密码继续使用在另一封密电上。塞西尔·菲利普斯在较早前也留意到同样的情况。正是这一发现，令破解工作有了突破。

就在丘取得突破性发现后不久，美国方面得到一本几乎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前苏联密码簿。国家安全部经研究发现，其中

的一些密码正是在克格勃早年密电中所采用的。这本密码簿是芬兰军队一九四一年六月入侵前苏联驻芬兰的佩萨莫领事馆时得到的。后来，它从芬兰人手中转到德国人手中。一九四五年五月，美国陆军的一支情报小分队在保罗·内夫（Paul Neff）的率领下，在位于德国萨克森一个城堡里的档案馆里找到这本宝贝。这个档案馆本属于前苏联军队的占领区，就在内夫的小分队取走密码簿之后的第二天，前苏联军队进驻占领区。虽然密码簿已经严重受损，但仍然帮助梅雷迪思·加德纳部分地挖掘出克格勃早年使用的密码簿的秘密。但是，这一次的研究成果不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年间的研究成果全面，密码簿的秘密没有被彻底征服，因此，对克格勃早期电文的破译有些七零八落。

一九四四年末，战略服务办公室也从芬兰官员那里得到过一本密码簿，与这本被烧毁的密码簿不大相同。国务院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采取了极其天真的做法，竟然成功地说服罗斯福总统命令战略服务办公室将其完璧归赵地交还给克格勃，以显示美国的善意。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战略服务办公室根本没有留存任何副本。

在五类前苏联密电中，第三个被破解的是前苏联外交部官员发出的电报。一九四六年末，破译人员已经发现，在外交部发出的密电中有重复使用同一把密码“钥匙”的情况，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真正的突破性胜利由数学家理查德·莱布勒（Richard Leibler）于一九五〇年创造。一大批由外交部利用同一把“钥匙”发出的密电被挖掘出来。这一发现为破译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及海军情报部的部分密电铺平道路。

在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和海军情报部的密电中，采用密码“钥匙”上的第一组密码作为确认“钥匙”页码的索引，从而

使这些密电比克格勃的密电更多了一层屏障。直到一九五二年，数学家休·金格里奇（Hugh Gingerich）在莱布勒的研究基础上，依据密码语言家查尔斯·科雷（Charles Condray）及其他破译人员的分析，用自己研制的计算机工具，在有限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密电中挖掘出使用同一把密码“钥匙”的密电。前苏联海军情报部的密电直到一九五七年才被参与维诺那计划的英国密码分析员突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虽然有数千封密电被百分之百或是接近百分之百地破解，但仍有相当一批密电只被部分地破解。常常，在破译电文的一段文字、两三句电文，或是几个词组之间就会出现一个括号，里面是密码破译人员的夹注，比如“（37个未破解密码）”，“（2个未破解密码）”，等等，意味着国家安全部再无能为力将这些密码转化为可读性文字。在维诺那计划中，有两千九百封密电被破译，电文长达五千多页。虽然战果卓著，但被破译的密电毕竟只是前苏联发出的全部密电中的一小部分。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与莫斯科总部之间于一九四四年往来的密电中，几乎有一半（百分之四十九）的电报被维诺那计划全部或部分破译。而在一九四三年往来的密电，只有百分之十五被破译，一九四二年的密电只破译了百分之一点八（近一千三百封密电，只有二十三封被破译）。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与莫斯科总部于一九四五年间的往来密电中只有百分之一点五被破译。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华盛顿的机构一九四三年发出的密电中，有一半电报被维诺那计划破译，但从海军情报部发出的电文却无一被破译。

国家安全部还同英国享有盛誉的政府通讯总部建立合作关系，一九四八年，数名英国语言学家和密码分析员加入维诺那计划。（在一些破译的电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英国式表

达方法，完全不同于美国惯用语，英国专家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维诺那计划初期，国家安全部只掌握前苏联与其驻美外交官之间的往来密电。后来，国家安全部通过多方面渠道收集前苏联与其驻其他国家办事处之间的密电，其中包括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朗、日本、满州、埃塞俄比亚、南非、澳大利亚、智利、乌拉圭、墨西哥以及古巴。维诺那计划一直运作到一九八〇年十月一日，但从七十年代开始逐年缩减。然而，即便是在最后一年里，仍有三十九封密电被破译。国家安全部认为，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报已经过时，对于美国情报机关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于是下令终止这项计划，但其内容一直保密，直到一九九五年才对外公开。

直到一九四七年末，国家安全部基本上在独立运作维诺那计划，只有陆军情报部里的极少数官员知道这项计划。卡特·克拉克此时已升任将军及陆军情报部的副手。他认为，要想令维诺那计划更加行之有效，需要更多部门参与进来。特别是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很多化名，虽然有部分化名的真实身份显而易见，但大部分却是深藏不露。例如，一九四七年中，加德纳破译的一封密电中谈到一名间谍，其最初的化名是“触角”，后来改为“自由”。加德纳完全不了解这个化名的真实身份。但是，另外一封由克格勃驻美情报站发往莫斯科的密电被破译后显示，“自由”的妻子名叫埃塞尔，现年二十九岁，与“自由”结婚五年。所有这些线索都需要进一步调查。然而，国家安全部作为密码破译机构，并不具备职能与人手去走街串巷地调查每一个有嫌疑的“触角”或是“自由”，确认哪一个嫌疑对象的妻子名叫埃塞尔。

克拉克将军与联邦调查局派驻陆军情报部的联络人韦斯

力·雷诺兹 (S. Wesley Reynolds) 探讨此事之后，双方展开试验性合作。一九四八年十月，雷诺兹将特工罗伯特·兰菲尔派往维诺那计划，作为联邦调查局在该项计划的联络人。事实证明，双方的合作是有成效的，很快便在揭露化名的真实身份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加德纳将破译后记录着化名的电文交给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根据电文中提及的特定的时间、地点、使用化名的间谍所从事的职业、家庭背景及个人特征等信息，查阅自己的内部调查档案，从中锁定与电文中所描述的特征相符的对象。在随后的几年里，共有上千个化名被追查出真实身份。正是基于双方的合作，一九五〇年，化名“触角”和“自由”的朱利叶斯·罗森堡落网。他的婚龄以及埃塞尔·格林格拉斯 (Ethel Greenglass) 的年龄与电文中的信息一模一样。

使用化名的目的是为了掩盖间谍的真实身份，同时也是为了减轻密码人员的工作及增加密电的透明度。正式的人名在密码簿里没有对应的密码，必须花费很大力气，参照另外一份密码表，将每一个字母拼写出来，字母的密码由两位数字组成。如果是英文姓名，还要将拉丁字母转化为俄文的西里尔字母，更加伤神。使用化名就简单许多，因为可以在密码簿里找到对应的密码，至少，用一个短小的化名也好过长长的名字，省却逐个字母拼写的麻烦。使用化名还可以避免将两个接近的姓名混淆，碰到非俄文的姓名时尤其如此。

前苏联相信，牢不可破的密码系统才是确保密电安全性的先决条件，而安全系数相对较低的化名系统则次之。所以，虽然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大部分间谍使用的都是化名，偶尔，仍会有真名实姓出现。通常，克格勃驻美情报站在确定一个新的间谍线索之后会致电莫斯科，通告间谍的真实姓名，行将使用的化名，且启用的化名常常与间谍的职业或个人特征

有关，此乃安全常识的大忌。乔治·西尔弗曼（George Silverman）是前苏联安插在美国空军的内线，他的化名是“副翼”。哈罗德·格拉瑟（Harold Glasser）是潜伏在美国财政部的间谍，他的化名是“卢布”，即前苏联的货币名称。曾经有位作者诙谐地指出，前苏联的情报官员热衷于文字幽默，常常在有意或无意间将内心的情绪通过化名表达出来。比如，克格勃将最深恶痛绝的仇敌托洛茨基主义者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分别冠以“臭貂”和“老鼠”的化名。他们认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及反间谍机关远不如前苏联的克格勃完善，故将“战略服务办公室”化名为“伊啞巴”，俄文的意思是“小木屋”。联邦调查局也同样被冠以轻蔑的称谓“卡塔”，俄文的意思是“茅屋”。在克格勃的密电里，“巴比伦”代表旧金山，显然是考虑到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背景。而美国首府华盛顿的化名则是“卡萨奇”。

随着冷战气氛日趋紧张，对通讯安全的保密要求日益加强。前苏联和美国的安全部门都要求以随机方式确定化名。有数名美国间谍的化名就是利用计算机随机选出的，原因是考虑到，如果人为地确定化名，总有机会将原本要掩盖的秘密线索透露出去。前苏联就是因为多次违规操作，不顾及化名的选择，从而将突破口拱手送到美国反间谍机关的手上。美国方面也正是汲取前苏联的教训，加强了在化名上的防范措施。

根据维诺那计划提供的信息，联邦调查局得以挖掘出前苏联几个主要间谍网及数十名特工（绝大多数的前苏联间谍没有受到起诉，其原因在以后的章节里探讨）。但维诺那的成就并不仅仅如此。根据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一小撮潜伏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的前苏联间谍也应声落网。美国政府将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内容与一些适当国家的反间

谍机关分享。这些国家的反间谍机关也长期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本国的政治家们一直以来亦对间谍活动持将信将疑的态度，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让他们的态度彻底改变。其中尤以澳大利亚政府的态度转变最为突出。同杜鲁门政府一样，澳大利亚的左派工党政府于一九四六年解除战时的国内安全机器，不希望二十及三十年代保守派政府迫害左翼分子的局面再次上演。国内安全事务转由司法部办公室下属的联邦调查科负责。联邦调查科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罪案调查，国内安全事务只是它的次要职能。然而，一九四九年，美英政府将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克格勃密电交给澳大利亚政府。密电由前苏联驻堪培拉大使馆发出，内容涉及前苏联精心安插在澳大利亚政府内部的密线。美英表示，如果澳大利亚不能消除内奸，确保机密的安全性，它将无法成为美英核武器研究及其他高级机密事务上的重要伙伴。工党政府的态度从此彻底转变，专门成立“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负责反间谍活动，确保内部安全，特别是要清除克格勃从堪培拉发出的密电中提及的间谍。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一些关于前苏联特工的关键资料，诸如他们的职业、习惯等等。共有数十位职业间谍的详细资料在电文中被披露。这些特工被认为冷战期间能够在谍报领域成为西方国家的对手。其中有一些年轻特工，他们的行踪经常出现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里。他们一直为克格勃效力到八十年代。

维诺那计划最重要的一个用途是用以判定来自其他非可靠途径的信息的准确性。情报机关及反间谍机关的重要情报来源之一是投诚者的供词。投诚者中有前苏联的情报官员、间谍及其他部门的官员。他们投诚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出于信仰的改变，有人出于个人的怨恨、恐惧或是贪婪。大部分人出于自

愿，也有少部分人出于被逼无奈。其中多数人的态度是老实的，只是由于所知有限，往往造成误导。还有的人，虽然态度老实，但过分夸大自己的作用，亦或是夸大所提供的资料价值，甚至为了个人利益编造资料。当然，也有人假意投诚，目的是想用假情报颠覆、误导美国情报机关。

冷战初期的投诚者所提供的资料往往涉及维诺那档案中的人和事，特别是有关四十年代前苏联谍报人员的任务的资料，通常可以在维诺那计划的档案中找到。于是，美国方面可以将投诚者提供的资料与维诺那计划的档案相对照。如果二者吻合，则证明投诚者在这些事情上没有说谎，他所提供的其他方面的资料便有了一定的可信度。相反，如果二者情形相悖，则美方对投诚者的信任度大打折扣。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有关维诺那计划的记录上指出：“维诺那成为美国反间谍机构的试金石——成为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在判定信息的准确度时最机密的参考库。”

维诺那计划和历史文献

一些不肯相信维诺那计划所提供的证据的人，始终拒绝承认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的真实性。他们坚信维诺那计划的全部或是部分文件由美国政府伪造。但是，有几个要点有力地支持了维诺那计划的真实性。

首先，关于伪造的问题，虽然说起来容易，但对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来讲很难成立。二战及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机构的确采取过障眼法，发出伪造文件。在战争期间，利用敌人必须在时间仓促，无法收集旁证辨别真伪的情况下这类手段往往能够屡见奇效。

要真正伪造历史文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伪造的过程中，无论从格式、用辞、术语方面，还是从引述人物、事件以及印刷、笔迹、字体等方面，都极易露出纰漏，被识破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专门研究历史文献的学者们有充裕的时间旁征博引，利用他们多年来从不同渠道积累的史料及历史知识反复推敲，判定文献的真伪。不错，确实有伪造历史文献的情况发生，但伪造的数量通常很少，甚至只是一份。而在维诺那计划中，被破译的电文多达五千页。要想成功伪造数量如此之多的文件而不被提出质疑不仅史无前例，而且绝对行不通。

凡伪造历史文献，总会尽可能掩盖文献的出处，防止有人探究真源。而维诺那计划所破译的电文，其来源一直是公开的，主要工作人员，包括密码分析员、语言学家及调查员的身份均是公开的。虽然有部分工作人员已经辞世，但仍然有人健在，随时可以接受研究维诺那计划的学者们的查询。如果说维诺那计划是炮制的产物，必须有上千人的勾结，这项阴谋才有机会得逞。而且，在前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维诺那计划雇佣过大批人，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已经脱离政府部门，早已不再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对政府机密保持沉默。如果真的存在政府掩护的犯罪行为，相信他们不会守口如瓶。

其次，本书中的维诺那计划从来不是孤立的。维诺那计划的文件一直与其他证据交织在一起，包括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大量书面及口头证词。在证词里面，有前苏联情报机关的叛徒主动提供的，也有慑于法律的威严被迫提供的，有利用窃听装置偷录的对话，也有从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摘选的内容。论据性的文件还包括一大批公开及私人保存的档案中的原始资料以及早期学者研究著作中的资料。在我们看来，维诺那计划档案中的文献与这些证据十分吻合，可以说相当契合。

最后一点，前苏联时代的情报档案有朝一日对外公开，亦将证实维诺那计划的真实性。尽管在短期内这批档案尚没有可能供世人自由查阅，但毕竟已经有部分文献解禁。克格勃的继任机构俄罗斯外国情报服务部已经有选择地将一批文献公开给现职及已经退休的俄罗斯情报官员，方便他们在撰写行将出版的克格勃历史时有据可查。克格勃档案有史以来最大限度对外公开是在一九九九年年初，当时，由美国历史学家阿伦·温斯坦（Allen Weinstein）和克格勃退休官员亚历山大·瓦西列夫（Alexander Vassiliev）合著的《鬼影出没的树林：前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战——斯大林时代》（*The Haunted Wood: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The Stalin Era*）一书公开出版。书中涉及一大批前苏联间谍，其中有五十八人的真实身份在维诺那计划中已经被破解，有九人的真实身份在维诺那计划中仍属未知，但在书中得到破解，当然还有许多维诺那计划中没有涉及的间谍。

另外，通过前苏联曾经与情报机关有过合作的部门所公开的档案，我们也可以窥视到情报机关档案里的部分内容。我们在这些公开档案里同样找到证实维诺那计划真实性的证据。如果维诺那计划中的电文是伪造的，其内容决不会在这些真实文档中被涉及。

证实维诺那计划：莫斯科文件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三年，总部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世界各地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后，有关资料被保存在一个档案馆中，该馆于一九九一年成为“俄罗斯近代史文献保存及研究中心”。文献中心里蕴含着丰富的史料，记载着苏维埃共产党（苏共）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一

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期间的历史。

有关共产国际的史料主要记载着共产国际的使命，即通过政治手段推行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共产国际虽然不属于前苏联情报机关的分支机构，却一直在和情报机关合作。在维诺那计划的档案对外公开之后，我们发现，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有一批往来于克格勃及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密电与维诺那计划中的电文相同，从而进一步证实了维诺那计划所破译的电文的真实性。

安华·穆罕默德（Anwar Muhammed）的案例很好地说明，共产国际的档案如何能够证实维诺那计划档案的真实性。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报中，有一份电报由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发往莫斯科总部，电文称，没有办法收集有关穆罕默德的资料。电文中表示，苏共与克格勃的主要联络人约各布·格罗（Jacob Golo）亦对穆罕默德一无所知。国家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分析人员在该电文的备注中称，他们不了解穆罕默德是何许人，也不清楚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为何对此人感兴趣。

一九九三年，我们在文献中心的档案里发现一份资料，从而解开了这个谜团。一九四三年一月，共产国际收到一个名为莎利亚（Sharia）的前苏联官员对穆罕默德的查询。有关莎利亚的真实身份以及他究竟为哪个部门工作，至今不得而知，不过他很可能是在为克格勃效力。莎利亚在查询中表示，他所在的机构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办事处通知他们，喀布尔师范学校的校长安华·穆罕默德有意访问莫斯科。在决定准许他出访之前，莎利亚首先要确认穆罕默德是否真的像他自称的那样，有着多年共产党党龄。穆罕默德对驻喀布尔的前苏联官员声称，他在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生化博

士学位，并且在就读期间，经他的系友兼马里兰共产党负责人艾伯特·布鲁勃格（Albert Blumberg）介绍加入美国共产党。穆罕默德还介绍说，他的妻子是美国人，亦是共产党员。莎利亚向共产国际查询，是否有资料可以证明穆罕默德的背景。

由此可见，文献中心的资料为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背景做出解释，同时也证实了维诺那电文的真实性。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在向共产国际查询穆罕默德背景的同时，亦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查询穆罕默德自述的真实性。一九四三年七月，克格勃纽约站发出的密电中表示，纽约站以及美共均无法证实穆罕默德的自述。

有人对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价值提出另外一种质疑，即克格勃驻美情报站的官员有可能为了向莫斯科总部邀功，随便找来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然后夸大其辞甚至虚假地向莫斯科报称，他们成功地发展了一条内线。然而，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前苏联情报机关发展内线的程序复杂且完善，情报官员不可以只简单地告知总部，他们发展了某个人成为内线，以此了事。

前苏联间谍网的负责人在发现适合的内线人选之后，首先要与驻当地的克格勃情报站负责人磋商，获得许可之后才可以继续发展内线的工作。接下来是对内线人选的考察。情报官员从不同渠道搜集候选人的背景资料，确认其身世、经历，判定此人是否适合间谍工作。美共与克格勃的联络人中包括驻扎美国东岸的约各布·格罗和伯纳德·舒斯特（Bernard Schuster）以及驻扎西岸的艾萨·弗考夫（Isaac Folkoff）。克格勃经常向他们查询内线人选的有关资料。如果调查所得资料不尽人意，候选人就会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如果背景资料完全符合要求，克格勃驻当地情报站负责人会批准间谍网络负责人的推荐，并

上报给莫斯科总部，由总部签发“招募令”，正式招募候选人为克格勃内线。

莫斯科方面的招募决定并非例行公事。通常，克格勃总部会要求驻美情报站提供更多的资料，证实候选人适合间谍工作。克格勃总部还会自行调查，向共产国际发出查询。共产国际对美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存有丰富的档案，克格勃希望能从中找到有关候选人的资料。有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有意将一个名叫马里恩·戴维斯（Marion Davis）的女性发展为内线。此人在华盛顿的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工作。间谍网负责人的报告中指出，戴维斯曾在美国驻墨西哥城大使馆工作，与前苏联外交官有过接触。克格勃总部的费庭将军不仅向共产国际发出关于戴维斯的查询，而且向克格勃驻墨西哥城情报站负责人发出查询，直到收到满意答复之后才签发“招募令”。

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招募令”下达之后，正式的签约仪式通常在线人与克格勃职业官员之间进行，只有极少数情况由克格勃的全职特工出面。负责签约的前苏联官员随后会将一份报告递交莫斯科，证实招募工作完成。克格勃总部要求间谍网的负责人定期提供报告，汇报其下属内线是否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克格勃驻美情报站的负责人亦经常将不同间谍网络的负责人相互调换。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便有人谎报或夸大线人的情况，很快便会露出马脚，受牵连的间谍网负责人将受到严惩。通常，莫斯科方面要求内线亲自撰写报告，并要求通过外交邮袋将报告的原件或影印件提交莫斯科。如果有人未提交报告，莫斯科方面要求就此做出解释。克格勃驻美情报站有些时候将线人口头提供的情报整理之后转交莫斯科。这种做法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被接受，通常是莫斯科方面所不允许的。

举例说明。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间谍网负责人与克格勃级别最高的内线之一，白宫助手洛赫林·柯里的联络一直通过美国共产党人西尔夫马斯特的间谍网穿针引线地进行，费庭对此极为恼火。而且，柯里通常只提供口头报告。克格勃的官员们不敢强迫柯里遵循他们的规定，因为柯里不受美共纪律束缚，他与克格勃的合作十分谨慎，只通过自己的渠道进行。费庭下令由克格勃直接接触柯里，局面才得以缓和。由于克格勃机制严谨，其官员很难靠浮夸为计，从而大大降低了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被浮夸和虚伪内容充斥的可能。

最后一点，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虽然蕴含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但它们毕竟只是一组普普通通的电文，有其长处和不足，应该和其他所有类似的史料一样，受到同样的待遇，用同样的标准去评判。对历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偶尔，或许会有这样那样的文件给人们造成误导，但又会有其他档案中的文件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更正这些错误。这才是研究历史发展的正常过程，是适用于各类研究的准则。

朱比林事件

一九四三年八月七日，联邦调查局总负责人收到一封用俄文写成的匿名信，声称前苏联克格勃官员利用外交身份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从事谍报活动，且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信中指出，克格勃驻美国重要负责人是瓦西里·朱比林（Vasily Zubbilin），真名为扎鲁宾（Zarubin），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也是克格勃情报人员，负责美国的一个间谍网络。信中还提及其他间谍人员的名字，包括前苏联驻纽约领事馆官员帕维尔·喀拉林（Pavel Klarin）和塞姆扬·塞米诺夫（Semyon Semenov）；前

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瓦西里·道格夫 (Vasily Dolgov) 和瓦西里·米罗诺夫 (Vasily Mironov); 前苏联驻旧金山副领事格里高里·凯菲 Grigory Kheifets); 前苏联贸易部工程师利奥尼德·克瓦斯尼科夫 (Leonid Kvasnikov); 前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官员安德鲁·舍甫琴科 (Andrey Shevchenko) 和瑟奇·卢卡诺夫 (Sergey Lukianov); 前苏联驻加拿大使馆二秘弗拉迪米尔·帕夫洛夫 (Vladimir Pavlov) 以及前苏联驻墨西哥外交官列夫·塔拉索夫 (Lev Tarasov)。

很自然，联邦调查局首先怀疑这封信是假的。然而，在对信中涉及的前苏联外交人员的行踪进行调查之后，联邦调查局很快确信，这批人极有可能就是前苏联情报官员。多年以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面世，进一步确认了信中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

匿名人写这封信的动机很明显，他痛恨瓦西里·朱比林。信中罗列了朱比林的种种罪行，其中包括参与将数万名波兰战俘处死在卡廷森林。最后这项控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在卡廷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凭空飞来的这封信却坚称了解卡廷事件参与人的内幕。卡廷森林位于前苏联境内，靠近斯摩棱斯克附近，曾经被德国入侵。就在收到匿名信几个月之前，德国政府宣称在这里发现一个巨大的墓穴，里面有上万具被处决的波兰士兵的遗体。根据纳粹记录，一九三九年，前苏联根据纳粹—苏维埃协定占领波兰东部，俘虏大批波兰士兵。前苏联将这场屠杀归咎于纳粹，声称德国部队在入侵前苏联的战俘集中营时活捉了这批波兰士兵并将他们杀害。而事实的真相却是，前苏联谋杀了这些战俘。一九四〇年五月，斯大林命令克格勃将一万四千七百名波兰战俘处决。

匿名信中指出，朱比林曾参与克格勃的卡廷血案。事后证

明，这一指控是正确的，但在当时，联邦调查局没有办法证实，最终还是通过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封克格勃密电证实了朱比林亲自参与卡廷暴行。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朱比林电告莫斯科，认为有心怀叵测的情报人员对他进行监视，并有可能发现他在一九四〇年参与屠杀波兰战俘的事件。

虽然匿名信中关于朱比林参与卡廷屠杀的指控是准确的，但信中仍有一些异乎寻常的指控，称朱比林已经背叛苏维埃，目前效力日本情报部门，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政府急于了解朱比林是否真的已经背叛苏维埃政权。如果确有其事，克格勃的另一位官员瓦西里·米罗诺夫将毫无疑问会当场将朱比林击毙。米罗诺夫的对外身份是前苏联外交官，是一位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的克格勃上校，他对朱比林恨之入骨。

联邦调查局怀疑这封匿名信出自一位不满于现状的克格勃官员，但此人的真实身份始终不得而知。克格勃一位退休官员帕维尔·苏托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在他一九九四年的记录中有过一段话，认为写匿名信的人就是米罗诺夫。苏托普拉托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克格勃总部的外国情报部工作，他指出，米罗诺夫曾经写信给斯大林诋毁朱比林（匿名信中对朱比林的真实姓名亦了如指掌），称朱比林是双料间谍。苏托普拉托夫在记录中写道：“米罗诺夫的这封信导致朱比林被召回莫斯科。在对朱比林本人及其妻子进行长达六个月的调查之后，证实朱比林建立的关系网络均属合法且极具价值，他并没有替联邦调查局工作。米罗诺夫随即被从华盛顿召回，并以诽谤罪被捕。审讯期间，米罗诺夫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入院，免于审判。

尽管米罗诺夫出于臆想，分别向联邦调查局和约瑟夫·斯大林诋毁朱比林，但是经调查后确认，他在信中提供的其他信

息全部准确。

匿名信事件发生于一九四三年，就在同年，联邦调查局开始一项名为“共产国际武装”的调查。这或许并非一种巧合。调查档案经汇总共有上万页的报告和备忘录。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武装调查报告”完成。报告长达六百页，详述了联邦调查局在当时所了解的前苏联谍报情况及美国共产党的参与情况。

联邦调查局清楚地知道，苏维埃联盟正在对美国大举发动谍报战。联邦调查局只泛泛地知道前苏联的谍报机关在活动，但缺乏具体线索，而且对于前苏联的谍报活动知之甚少。联邦调查局虽然坚信谍报活动就在周围发生，但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无法将罪犯送上审判台。报告通篇充斥着无奈的情绪。美国政府的决策人也不希望发生法律纠纷，影响美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时政治联盟，所以，一九四四年，联邦调查局仍旧将前苏联对美国的安全威胁视为次要，并未对前苏联的谍报活动采取紧急措施。

联邦调查局在追查美国共产党人和前苏联间谍方面显然困难重重。在报告中着重强调的一些有间谍嫌疑的美共活动其实并没有涉及谍报活动。然而，这只是在事后回过头去分析时才发现的。而报告中提及的美共的另外一些活动显然是针对美国政府进行的谍报活动。间谍活动从来不是一种兴师动众的活动，而且大多数美国共产党人并没有直接参与间谍活动，甚至许多美共领袖及官员也从未直接协助过前苏联的谍报工作。

前苏联何时了解到维诺那的存在？

前苏联的密码官员对于利用一次性密码“钥匙”加密的系

统充满信心，所以，在他们的早期报告中几乎没有研究过是否有其他国家的情报机关正在研究如何攻克前苏联密码系统。一九四一年末，前苏联驻柏林的一名情报员通知莫斯科，德国方面从芬兰手中获得一本前苏联密码簿。前苏联坚信，一次性密码“钥匙”足以保障密码系统的安全，所以一路拖延，直到一九四三年才更改原先的密码簿。在国家安全部设立维诺那计划后大约一年半左右，前苏联便了解到该计划的存在。伊丽莎白·本特利于一九四四年春天向联邦调查局供认，由她领导的克格勃苏共间谍网中，有一个名叫洛赫林·柯里的间谍，此人曾报告，美国方面即将破解前苏联密码系统。柯里是罗斯福总统的助理。维诺那计划在其初期阶段曾向白宫做过过分乐观的汇报，柯里一定是有所耳闻之后提供了这一情报。

面对柯里的情报，前苏联确实采取了应对措施，但对密码系统的改动甚微，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安抚高层在收到情报之后产生的不安，而情报官员自认为高层的反映过激。一九四四年四月末，克格勃下令所有的情报站采用稍作修改后的密码系统，将一次性密码“钥匙”上的第一组密码作为“钥匙”的页码索引。这样一个微小的变动执行起来容易，而且克格勃的密码官员也可以凭此向上级交差。无论此次更改的初衷如何，对于前苏联的密码系统来说却是祸起萧墙。塞西尔·菲利普斯，一个年仅十九岁，刚刚被派往维诺那计划工作的密码分析员，敏感地注意到前苏联密电格式发生了细微变化，经过数月研究，菲利普斯发现，前苏联的密码系统正在使用密码“钥匙”的第一组密码作为页码索引。基于这一发现，凡第一组由五位数字组成的密码完全相同的两份电报一定是利用同一把“钥匙”加密。根据这一理论，敏感的密码分析员们将所截获的前苏联电报加以研究，很快便发现，在克格勃的密电和前苏联贸

易部的密电中有重复使用同一把“钥匙”的现象，这成为破译克格勃密电的关键一步。

有迹象显示，柯里曾经试图在维诺那计划破解前苏联密电之前将其扼杀，只是这一论点的证据不够充分。哈罗德·海斯（Harold Hayes）上校及弗兰克·鲁莱特（Frank Roulett）中校是“阿灵顿会堂”的高级官员，他们回忆，美国战争事务部军事情报部门特种分部负责人克拉克上校曾经告诉他们，他收到白宫命令，要求停止破解前苏联密电的工作。不过，克拉克建议他们不要将命令放在心上，一如既往地继续维诺那计划。战略服务办公室反间谍部门的元老们也曾于一九四四年收到白宫的命令，要求他们停止收集有关前苏联谍报活动的信息。显然，战略服务办公室对白宫命令的重视程度高于陆军特种分部，未做任何争辩便执行了白宫和国务院的命令，将从芬兰人手中获得的前苏联密码簿拱手送还前苏联官员。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反间谍部门从未设立过专门研究前苏联的分支机构。

要求停止破解前苏联密码系统的命令并没有书面材料保存下来。据战略服务办公室和“阿灵顿会堂”的元老们回忆，这项命令来自于白宫，而并非来自白宫的某个人。然而，根据本特利的证词，柯里显然知道美国方面正在研究前苏联的密码系统。考虑到柯里曾经千方百计地阻挠对克格勃间谍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的反间谍调查（详情见第五章），洛赫林·柯里极有可能就是白宫里这项命令的始作俑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前苏联情报机关相继两次收到关于前苏联在战时发出的密电有可能被破解的警报，但未能引起前苏联方面的关注。其中的一个警报发自威廉·韦班（William Weisband）。威廉·韦班出生于埃及，父母是俄国人。他于二十年代来到美国，并于一九三八年获得美国国籍。一九

四二年，韦班加入陆军，凭借出色的语言才能，同时也是为了完成军官预备学校的一项任务，被派往国家全部前身之一的“信号服务部”工作。战争期间，他曾被派往北非和意大利，一九四四年末，回到美国，一九四五年，被指派为“巡回”语言顾问，协助包括维诺那计划在内的国家全部的多个项目的工作。维诺那计划的首席密码破译人员梅雷迪思·加德纳回忆，他曾就俄文的语法问题请教过韦班，并且记得，一九四六年末，他在分析克格勃于一九四四年发出的一份密电时，韦班也在场，而密电的内容正涉及为原子弹项目工作的科学家的情况。尽管韦班没有直接参与维诺那计划，但是他的工作性质能够让他了解到维诺那计划的大概内容。维诺那计划的一位重要密码分析员塞西尔·菲利普斯也表示，韦班“总是很从容地走来走去。他栽培那些能够接触机要信息的工作人员，而且曾经就坐在老板秘书附近，我们整理的材料，无论重要与否，都经秘书打印。”

维诺那计划间接地揭出韦班叛变的真相。韦班的真实身份并没有在维诺那计划中被识破，不过，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一个化名为“连接”，韦班是被怀疑对象之一。“连接”这个化名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出现过三次，其中有一次只是一带而过，未能提供查找真实身份的线索。当它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三次出现时，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在密电中称，“连接”刚刚在弗吉尼亚的阿灵顿完成意大利语课程，即将被派往海外。纽约方面在密电中要求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在“连接”途经伦敦时与他接头。这些细节完全符合韦班。韦班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在阿灵顿的陆军语言学校上学，七月搭船前往英国，再从英国前往北非和意大利。然而，这封密电直到一九七九年才被破译，所以在证明韦班的前苏联间谍身份时并

没有发挥作用。

虽然“连接”这个化名曾经出现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但并未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连接”的身份被暴露完全是因为，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十四份电文涉及一个化名“尼克”的克格勃特工。根据电文中的线索，联邦调查局确认“尼克”的真实身份是阿马德奥·萨巴蒂尼（Amadeo Sabatini）。联邦调查局还发现，多年前，在对前苏联外交官进行例行调查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发现萨巴蒂尼“在洛杉矶街头与凯菲交换信封和包裹”。格里高里·凯菲是克格勃特工，利用外交官身份在前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以外的范围活动。但是，联邦调查局当时缺乏足够的证据继续调查萨巴蒂尼。

萨巴蒂尼于一九三〇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很快被选为美共在宾西法尼亚区的领导班子成员。一九三五年，他不再公开从事美共的政治工作，转为秘密工作，成为共产国际的国际信使。一九三七年，萨巴蒂尼加入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莫斯科的档案显示，萨巴蒂尼曾经是美共“控制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的使命是从政治上规范美国共产党人为国际纵队服务。从西班牙回来之后，萨巴蒂尼开始接受克格勃分派的任务，其中包括与一队人马合作，秘密跟踪沃尔特·克里维斯基（Walter Krivitsky）。此人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高级官员，后来背叛，将克格勃的几项情报活动曝光。克里维斯基死于一九四〇年，有可能属于自杀，但是他的死存有一些疑点，又有他杀的可能。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显示，四十年代初期，萨巴蒂尼相当活跃，为克格勃和美国间谍之间架起桥梁。他居住在洛杉矶，在一家为飞机厂生产零部件的伯恩铝业及铜业公司工作，并利用工作机会为前苏联建立在航空领域的间谍网络。克格勃

负担萨巴蒂尼的差旅费和生活费，并每月支付给他妻子薪金。联邦调查局于一九四九年提审萨巴蒂尼。对于大部分问题，萨巴蒂尼均加以否认，但是慑于联邦调查局的威力，他最终还是供认了一些情报，并且供出另外一名前苏联特工，一个名叫琼斯·约克（Jones York）的飞机工程师。约克化名“针”，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四份密电曾经提到这个名字。

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约克，经过审讯，约克提供了大量信息，讲述他在前苏联情报活动中的作用。一九三五年，他在道格拉斯飞机厂的埃尔塞贡多分厂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一批前来参观的前苏联工程师。其中一位名叫斯坦尼斯罗·舒莫维奇（Stanislau Shumovsky）的人和约克成了朋友，并说服他将道格拉斯飞机厂的技术资料有偿出售。舒莫维奇正是克格勃特工，他的对外身份是前苏联采购委员会成员，事实上专门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约克只是他的发展对象之一。约克承认，他从此一直向前苏联有偿提供技术情报，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三年末，他和前苏联谍报人员失去联系。在充当间谍的八年时间里，约克曾经和不同的前苏联特工联络，其中的大部分人他只知道他们的化名，诸如布鲁克、沃纳、比尔，还有一名女性，约克记不起她的化名了。

约克提供了一些有关比尔的线索。比尔曾经给他一台十分昂贵的照相机用来偷拍文件。比尔与约克联络有一年多时间，期间共付给约克一千五百美元。约克供认，他曾经用相机偷拍了数卷文件，并将胶卷提供给比尔。在所有偷拍文件中，约克惟一能记起的是由北洛普飞机厂开发的 P-61 型夜航战斗机。（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三年的密电中提到，约克通过萨巴蒂尼将五卷胶卷交给前苏联，其中包括有关 XP-58 型飞机的设计及试验用马达的资料）。约克供认，他与比尔的见面大约

在十次左右，其中三四次见面地点是在约克家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得友好且轻松。约克记得，比尔曾经对约克写的一首关于苏维埃抵抗纳粹入侵的诗词赞赏有加，并带走一份副本，表示要提交给苏维埃上级。约克还记得，在闲聊时，比尔提到了他的姓氏，好像是威里班。

一九五〇年，联邦调查局让约克协助辨认一个正在大街上走过的行人，约克认出，此人正是比尔，而比尔就是威廉·韦班。联邦调查局多次审问了韦班。一九五〇年，韦班否认参与任何间谍活动，但拒绝在声明上签字，并拒绝大陪审团的传讯，因此以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同时丧失在国家安全部的职位。一九五三年，韦班再次被提审。这一次，韦班承认认识约克，但拒绝回答如何与约克相识，并且拒绝对他是否参与间谍活动发表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考虑到韦班曾经担任美国首席密码官员，美国方面有理由确信，韦班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损害。无可置疑，韦班早已通知克格勃，国家安全部已经成功破解克格勃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使用的密码系统。就在国家安全部对克格勃密电以及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和海军情报部的密电取得重大突破时，韦班已经落网，未来得及向前苏联汇报。或许，前苏联一直以为这批电报仍然是安全的。

维诺那计划再一次被严重泄密的罪魁祸首是英国情报机关高级官员，同时又是老牌前苏联特工的金·菲尔比（Kim Philby）。一九四九年，英国秘密情报部派菲尔比出访华盛顿，加强与美国情报机关的联络。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的密码分析师与美方合作参与维诺那计划，政府通讯总部驻美国国家安全部的联络人向菲尔比做了简要汇报。菲尔比还参观了国家安全部在阿灵顿会堂的设施，并与官员们进行磋商。菲尔比很快就通知克格勃，称美国的密码破译员正在破解二战时克格勃驻

纽约情报站与莫斯科总部之间的密电。一九五〇年二月，来自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的报告中陈述了岌岌可危的形势：

斯坦利（即金·菲尔比）汇报，美英联合开发破译工具，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一千人用一千年才能完成的工作”。破译的关键要素有三：（1）一次性密码“钥匙”被重复利用；（2）在美克格勃的密电与贸易组织的密电有相似之处；（3）芬兰发现一本被烧毁的密码簿，并交与英国，可凭此破译我们的密电。美方将于一年之内破解成功。查尔斯（即克劳斯·富克斯）案件已经引起反间谍组织关注，认为有必要清查公务员背景——斯坦利、保尔（即盖伊·伯杰斯）及严（即安东尼·布伦特）均认为形势危机。

对于菲尔比来说，形势尤为紧急，因为维诺那计划在早期获得的初步胜利令他随时有暴露的危险。菲尔比、唐纳德·麦克林、盖伊·伯杰斯、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以及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被誉为克格勃“五杰”，是克格勃安插在西方大国政府部门的内线中情报来源最丰富的五人。五人中的前四位均于三十年代初期在剑桥大学读书；布伦特是剑桥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一名艺术专家，他在学生当中招募适合人选。菲尔比后来成为英国情报机关高级专员，麦克林加入外交部成为高级外交官，伯杰斯在英国情报机关和外交部之间交替任职，凯恩克罗斯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同时负责英国财务部的军事及情报事务。除了物色及招募工作之外，布伦特二战时曾在英国反间谍机关工作，更增加了他作为前苏联间谍的价值。战后，布伦特成为英国首席艺术顾问，并充当伯杰

斯同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

菲尔比于一九四九年秋刚刚到达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即与他展开讨论。联邦调查局称，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里有一个化名“家人”的克格勃间谍好像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间与英国大使馆有关。最初几份电文中，关于“家人”的线索很少，而且，在那段时间，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过的人员多达上千，各个都有嫌疑。然而，菲尔比一下子便确认，这个“家人”正是他的朋友兼前苏联间谍麦克林。他随即向莫斯科发出预警。

唐纳德·麦克林是英国知名的自由党派政治家的后代。他于一九三三年加入共产党，很快便被说服放弃公开政治活动，成为斯大林安插在英国政府内部的间谍之一。一九三五年，他以优异成绩通过英国外交部笔试。在面试时，他的考官知道麦克林是激进派，对此，麦克林冷静地回答，他一直在努力摆脱共产主义信条，只是尚未完全成功。麦克林的谎言获得成功，他于一九三五年末加入外交部。一九四四年，他被派往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很快便被提升为一等秘书，一直在使馆工作了四年，有机会接触进出使馆的所有文件。

麦克林偕妻子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六日到达美国。六月底，他已经和克格勃特工弗拉迪米尔·普拉丁（Vladimir Pravdin）接上关系，普拉丁的公开身份是塔斯社的记者。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于六月二十八日密电莫斯科称，普拉丁于三天前见过家人/麦克林，并将于三十日再次于纽约会面。麦克林的妻子和岳母居住在纽约。虽然麦克林在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但他的妻子是美国人，已怀有身孕，一直住在纽约，麦克林因此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前往纽约会晤前苏联上级。麦克林和妻子待儿子出生之后搬去华盛顿居住。

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十几份电文显示，麦克林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情报，其中包括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的密电，他们之间探讨的军事计划以及九月份魁北克会议摘要。麦克林还泄漏了英国方面处理被德国占领的希腊问题计划。德军入侵并占领希腊直至一九四四年末。在德军撤退的喧嚣中，希腊的亲共产主义势力、反共产主义势力以及希腊前流亡政府为夺取政权展开争斗。英国派出军队驻扎希腊稳定局势，且英国方面不希望共产党人掌握政权。针对这一点，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在密电中告知莫斯科，“家人希望我们利用时机粉碎英国的计划。”

一九四四年八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一份篇幅很长的密电，其内容被部分破译。密电中，麦克林将他所能接触到的大量机密情报告知克格勃。密电中称，英美两国将举行高层会晤，商讨在派兵解放西欧的部分国家和地区之后，应对其采取怎样的政治经济政策。电报中称：

这次会晤的准备工作基本上全部由家人/麦克林负责，且他将出席每一次会谈。麦克林借此机会收集到一批相关的秘密文件——包括“公猪”（即丘吉尔）与“船长”（即罗斯福）之间的私人密电——其中一份由“公猪”发给“船长”的绝密电文中指出，威而森（即英国将军亨利）和岛上（即英国）的其他将军强烈要求更改入侵法国南部计划，建议从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港登陆再向东北方向进军。“公猪”对此建议表示支持，但从电文内容来看，“船长”及“国家”（即美国）将军们坚决反对此计划。“公猪”未能说服他们。昨天，家人获知，计划有小小改变，“铁砧”（即英美联军入侵法国南部的计划）将于八月

中实施。

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英美联合开发原子弹计划——曼哈顿项目，麦克林的职责之一是代表大不列颠作为该项目的外交联络人。一九四六年，曼哈顿项目的继任机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麦克林继续充当联络人的角色，于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间，先后二十多次访问原子能委员会，并在一次会议上讨论原子弹的数据资料中有哪些内容不可以被消密。麦克林还一直向前苏联汇报英美在冷战初期关于政策制定方面的磋商内容，直至一九四八年九月，他被调任新职。

一九四九年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关“家人”真实身份的线索极为有限。但是，随着被破译的电文不断增加，嫌疑范围也日益集中。在英国反间谍机关和联邦调查局的通力合作下，嫌疑人的范围由一九四九年的上千人缩减到一九五〇年底的三十五人，一九五一年春，更加减少到不到十人。菲尔比自然十分清楚麦克林的秘密身份已日渐危机。一九五一年四月，维诺那计划最新破译的电文显示，家人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间经常往返华盛顿和纽约之间探望和岳母住在一起的怀有身孕的妻子。麦克林因此被锁定为最终嫌疑人。菲尔比作为英国方面的情报联络人，第一时间获知自己的同党身陷囹圄。由于英国反间谍机关需要收集足够的证据方可逮捕疑犯，菲尔比因此获得先机。盖伊·伯杰斯当时也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与菲尔比同住。由于一次酒后失态，伯杰斯自觉无颜，正准备返回伦敦。菲尔比将情况告知伯杰斯，要求他立即回伦敦，与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的上级联络，帮助麦克林出逃。伯杰斯遵照菲尔比的指示去做。五月二十五日，麦克林和伯杰斯乘渡船前往圣马洛，从等在那里的克格勃人员手中接过假文件前往莫斯科。

麦克林和伯杰斯出逃事件发生后，美国和英国的反间谍部门检讨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疑点很快集中在菲尔比身上，因为他同这两个人，尤其同伯杰斯的关系十分密切。然而，这些只是间接证据。不过，中央情报局要求英国方面更换联络人，菲尔比被调离华盛顿。英国反间谍机关认定菲尔比有罪，但苦于证据不足，无法起诉。秘密情报部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命令菲尔比退休。此后，菲尔比从事记者职业，但是，英国方面对于他的怀疑始终没有消除，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菲尔比是叛徒。一九六三年，菲尔比逃往莫斯科。菲尔比接触维诺那计划的机会到一九五一年夏天被中止。同韦班提供的情报相近，菲尔比有可能知会克格勃，国家安全部已成功破译一九四四年以后发出的密电，但并没有破解克格勃在一九四四年前发出的密电以及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和海军情报部的密电。

韦班和菲尔比发出的警报并没有令前苏联的外交密电加密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前苏联也确实没有必要做出任何修改。毕竟，前苏联密码系统的惟一破绽只在于一九四二年对部分一次性密码“钥匙”的重复使用。到一九四六年时，重复生产的“钥匙”已经用罄，只有极少数位于边远地区的克格勃情报站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将重复生产的“钥匙”用光。不过，韦班和菲尔比发出的警报的确令克格勃向那些有可能暴露身份的特工们发出预警，让他们做好准备，应付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于那些仍在活动的特工，克格勃要求他们立即中止一切有可能被发现并足以成为起诉证据的间谍活动。例如，菲尔比警告莫斯科，英国和美国的反间谍机关已经发现，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提及的间谍之一便是英国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莫斯科在接到这一情报后撤回一至数名正在西方秘密活动的间谍，

因为一旦富克斯被捕，很有可能累及这些人。克格勃同时向与富克斯有直接或间接联络的美国间谍发出警报。其中的一些人逃往苏维埃联盟（莫里斯和劳纳·科恩、乔尔·巴尔以及阿尔弗雷德·萨兰特），另一些人在飞机上被捕（莫顿·索贝尔在潜逃至墨西哥后被捕遣返），有的在准备逃离美国之前被捕（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还有人自认为可以平安无事，结果遭到逮捕（戴维和鲁思·格林格拉斯以及威廉·珀尔）。

尽管国家安全部在五十年代得知，维诺那计划已经被韦班和菲尔比泄漏，安全部仍决定对此计划高度保密。国家安全部不希望莫斯科方面了解维诺那计划已经对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海军情报部的密电及克格勃的早期密电取得突破，更加不希望莫斯科方面了解维诺那计划进展到何种程度，因为他们不希望莫斯科了解到究竟哪些密电已经被破解，哪些依然未能取得进展。只要莫斯科方面无法确定美国究竟掌握了哪些情报，在短期内对美国的利益有益无害，美国的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可以继续利用维诺那计划的内容评判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的可靠性。



美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苏联谍报活动的规模及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美共在三十年代所做的预备性工作。美国共产党最初是作为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诞生。一九一九年的成立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不是要‘俘虏’资产阶级议会政府，而是要征服并最终粉碎资产阶级——为了彻底粉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政府。”

美国共产党最初的活动是合法的。美国共产党人组织公开集会，宣扬革命目的。芝加哥警察局曾因不满集会上用红玫瑰拼设造型并悬挂马克思、托洛茨基及列宁的相片而勒令清除这些装饰。但官方的骚扰也仅限于此。但是几个月后，由于左翼恐怖主义分子连续制造数起爆炸案，联邦政府下令逮捕激进分子，并将没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激进分子驱逐出境。由于绝大多数美国共产党人是没有公民身份的外来移民，政府的命令对他们构成直接威胁，刚刚诞生的美国共产党将活动转入地下。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同样也在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榜样，因而大多数美共成员将地下活动当作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必经模式。

一九二一年，担心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席卷全世界的恐惧有

所消退，美国联邦政府对共产党失去兴趣。美国共产党人在布尔什维克榜样的激励下继续坚持地下运动。事实上，共产国际作为指导世界各地共产党组织并确保他们对莫斯科忠诚的苏维埃机构，在一九二二年时就要求美国共产党由地下转为公开活动。二十年代，除少数几个州政府和市政府偶尔打击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在绝大部分地区，共产主义运动，虽然仍然坚持以革命和取消帝制为使命，已经被认可为自由的公开运动。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曾经是美共主席候选人，直到一九六一年去世前，一直担任美共高层领导人。一九二八年，福斯特面对情绪热烈的共产党人发表演说：“等到共产党人成为美国政府领袖的那一天——那一天一定会到来，正如太阳每天都会从地平线上升起 [掌声] ——政府将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而将成为苏维埃政府，并且将在红军的支持下实现无产阶级领导。”在后来的岁月里，美共刻意保持低调，甚至否认其革命宗旨和一党政策，但是在三十年代，美共则从不隐讳党的目标。一九三二年，福斯特再次为竞选美共主席拉票，他对美国共产党的前景发表展望：

尽管资产阶级不肯相信这样的预言，但是会有那么一天——美国的工人阶级将会证明，他们和苏维埃的工人阶级具有同样的智慧、勇气以及完善的组织去实现革命……

所谓“粉碎”资本主义，我们是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劳苦大众的公开斗争来实现——要彻底粉碎资本主义，需要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依靠劳苦大众的觉醒与革命，才能推翻政权，推翻由统治阶级创立的国家机器，成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政权……

由无产阶级当政，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共和

党、民主党、进步党、社会党等等，将被彻底推翻，共产党将成为代表劳苦大众的惟一政党。同样，在资本主义政策下滋生的其他组织，包括各商会、雇主联合会、扶轮社、美国军团、青年基督教联合会等等都将被消除……报纸、电影、电台、剧院都将由无产阶级政府接管。

虽然美国政府对于福斯特发出的种种革命性示威保持冷漠，但美共始终担心，有朝一日政府会因过度容忍这种反民主、反帝制的运动具有潜在危机而再次对共产党下力加以清除，所以，美共一直保持清醒，根据美国法律，他们的活动依然属于非法。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让美共更加紧筹备地下武装。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美国共产党人成立了“非法部”，专责保护党内安全，确保美共在遭受政府镇压后仍保持运作，出于政治目的渗透到非共产党组织中去，以及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采用各种秘密手段。共产党种种地下组织的初衷并非要充当间谍或是情报部门。然而，正如我们后来所见到的，要将这样的秘密武装利用政治手段支持世界革命转化为利用谍报手段支持世界革命是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共产国际本身也并非情报机关，但同样与前苏联的情报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共产国际内部有一个“国际联络部”，负责秘密资助国外共产党组织及共产国际密使的活动。大批美国共产党人为该部门工作，成为共产国际自己的地下武装。在执行秘密护送共产国际密使和资金穿越国界的任务时，需要制造假护照，选择投递站，建立据点、电报加密系统及无线电通讯。“国际联络部”受“非法委员会”领导。“非法委员会”由共产国际高级官员组成，通常还包括一名来自克格勃外国情报部门的官员。以一九二三年为例，“非法委员会”的成

员包括共产国际的两名高级官员以及来自克格勃的米克黑尔·特里瑟（Mikhail Trilisser）。此人在二十年代一直担任克格勃外国情报部负责人。同年五月，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美国共产党的合法活动同非法活动是否保持平衡。在同美共代表伊斯雷尔·阿姆特（Isreal Amter）磋商之后，出台了几项关于加强美共“秘密工作”的指导性纲领。

一九二九年，美共的喉舌《工人日报》发表文章，称共产党组织决定“做好一切必要准备确保党的领导中心在被迫转入非法条件下的运作”。美共既然敢公然发表建立秘密组织的意向，说明这一言论不会给党组织带来不安全后果，也再次证实了美国政府在当时对美共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一九三〇年，共产国际再次提醒共产党人“合法的活动要与有计划的非法活动配合进行”。在发给美共的一份备忘录上，共产国际再次强调：“所有合法的共产党组织都迫切需要建立并加强非法武装，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在合法的政党内部建立非法核心。”第二年，即一九三一年，“红色国际劳动联盟”领导人所罗门·洛佐夫斯基（Solomon Lozovsky）敦促共产主义者工会成员无视政府的保密法规，“深入到资本主义最核心的核心，深入到部队、外交等各个部门”，将资本主义的秘密揭发出来。共产国际的另一位官员鲍里斯·瓦西列夫（Boris Vasiliev）提醒共产党员，“毫无疑问，共产党组织在得知任何秘密协议、政府的政策及军事命令后，要一刻不能耽误地予以公开”。

二十年代的美国共产党虽然有地下武装，但由于党内纷争激烈，秘密装备始终未得到妥善维护。一九二九年，随着托洛茨基分子、洛夫斯通分子及其他异见分子分裂出党，党内的派系斗争告一段落，回归到纯粹的斯大林政党性质。三十年代，约瑟夫·彼得斯（Josef Peters）决意要恢复美共的秘密武装。

约瑟夫·彼得斯与秘密武装

约瑟夫·彼得斯是共产党内出身欧洲的职业革命家中的典范，正是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令共产主义地下组织和情报组织兴旺起来。约瑟夫的一生用过很多名字，包括亚历山大·高发、伊萨德·布斯坦以及亚历山大·史蒂文。约瑟夫出生于奥匈帝国境内的考普，父母是犹太人，均为工人阶级。在上大学期间，由于家境困难，约瑟夫被迫辍学，在一间办公室找到份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奥匈帝国部队，因为良好的教育背景，被提拔为军官。一九一八年，奥匈帝国瓦解，新成立的共产党暂时夺取政权，治理刚刚独立的匈牙利。正在休假的彼得斯被革命激情所感染，加入共产党，组织铁路工人与“白军”（反共产主义的军队）展开斗争。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彼得斯仍留在党内，在区域性党组织内担任过几个微职。一九二四年，约瑟夫·彼得斯到达美国，在纽约的工厂里工作了八个月之后，成为美共匈牙利联合会的发起人。

到二十年代末，约瑟夫·彼得斯已经成为匈牙利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以代表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会议。一九二九年，美共内部经历了严重的派系纷争，数十名忠于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的部门负责人被排挤出党。彼得斯虽然也曾是洛夫斯通派的一员，不过，他与新领导人和平相处，一九二九年底被委任为美共的“国家少数民族部”负责人。一九三〇年，他被调到美共的主流工作部门，担任纽约共产党组织秘书。纽约共产党是美共最大的地区分部。彼得斯的职责包括为纽约的共产党组织建立非法武装。

一九三一年，约瑟夫·彼得斯被派往莫斯科共产国际接受培训，在共产国际的英美秘书部任高级实习人员，一九三二年年末返回美国。共产国际的档案中记载，彼得斯被中央委员会“委派负责秘密武装。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一九三八年六月”。彼得斯的上级总部位于美共在纽约市联盟广场的办公室。

约瑟夫·彼得斯领导下的秘密武装执行过多项任务，部分任务事关党组织安全，例如侦察警察局对共产党的监视，清除内奸，保护党组织的秘密文件等特殊财产。秘密武装的另一项职责是为共产党一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做准备。彼得斯购买印刷机秘密安装在国内不同地方，便于在紧急情况下印制共产主义宣传材料。例如，有一部印刷机安装在北卡罗来纳查佩尔希尔的“亲密书屋”。这部机器由奥尔顿·劳伦斯（Alton Lawrence）出面购置。奥尔顿名义上是社会党党员，实际上是秘密共产党人，他的活动经费由彼得斯提供。对于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等异己党派，秘密武装的任务是对其进行监视、渗透和颠覆。

华盛顿地下共产党

约瑟夫·彼得斯的另一项职责是同华盛顿的秘密党员保持联络。三十年代，联邦政府出台“新政”，政府规模加速扩大，有数万名新雇员被政府录用，美共就在这些人中招募了数百名党员。三十年代，尽管美共的活动已经合法，但联邦法律禁止政府雇员参与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凡公开加入共产党的雇员将遭解雇。为此，美共组织秘密集会，召集政府雇员中的核心人物学习共产党文化，邀请共产党官员宣扬党的政策。

一九四八年，惠特克·钱伯公开表示，他于三十年代在华盛顿共产党地下组织中工作，由此引发一场公开辩论，当时的华盛顿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地下党。在钱伯的陈述中包括约瑟夫·彼得斯如何在纽约介绍他与哈罗德·韦尔（Harold Ware）相识以及随后三人如何在华盛顿会面，商讨成立后来的“韦尔组织”。韦尔是美共负责农业事务的重要人物。韦尔组织最初的成员包括在“农业调整内阁”工作的律师和经济学家。“农业调整内阁”是“新政”的机构之一，独立于成立多年的农业部之外，直接向农业部长汇报。韦尔组织在最初阶段的性质是秘密共产党人政治俱乐部。尽管它的成员从一开始就向美共提供政府内部消息，但韦尔组织的职能并不包括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开展谍报工作。

钱伯参与韦尔组织的时候，该组织的成员已经达到七十五人，正在考虑如何重新划分成规模稍小、易于组织的不同的小组。韦尔组织的领导人包括阿尔杰·希斯、李·普雷斯曼（Lee Pressman）、约翰·艾伯特（John Abt）、查尔斯·克雷默（Charles Kramer）和内森·威特（Nathan Witt），这几个人全都在“农业调整内阁”工作。其他的领导人还包括亨利·科林（Henry Collins），任职“国家复兴内阁”（“新政”中负责工业重组的领导机构），任职“铁路退休委员会”的乔治·西尔弗曼，马里恩·巴克拉克（Marion Bachrach）（约翰·艾伯特的妹妹），唐纳德·希斯（Donald Hiss）（阿尔杰·希斯的弟弟，亦为政府律师）以及“国家复兴内阁”的统计学家维克托·珀洛（Victor Perlo）。一九三五年，哈罗德·韦尔死于车祸，约瑟夫·彼得斯负责接管华盛顿地下党组织。彼得斯虽然在纽约任职，但隶属于巴尔的摩党组织，经常前往华盛顿同韦尔生前召集并不断壮大的政府雇员们见面。

一九四八年，钱伯首次公开谈到华盛顿共产党地下组织。被他提及的地下组织成员要么矢口否认，要么缄默不语。对于钱伯的言论，有些人表示相信，但有些人嗤之以鼻，认为是偏执的臆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美共在华盛顿建有地下组织的证据越来越多，竟达到惊人的地步。一九五〇年，李·普雷斯曼证实，他本人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间曾是美共的正式党员，尽管他的党员身份是秘密的。一九三六至一九五〇年间，他虽然不再是正式党员，但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普雷斯曼证实，当时在“农业调整内阁”里确实有一个团体定期与彼得斯见面。虽然他将该团体的性质定义为政府雇员磋商政治理论的学习俱乐部，他亦同时承认，团体中的部分领导人（内森·威特、约翰·艾伯特、查尔斯·克雷默）的身份是共产党员。李·普雷斯曼曾私下向“农业调整内阁”的领导人杰罗姆·弗兰克（Jerome Frank）承认，该组织实际上是共产党组织。同样在一九五〇年，“农业调整内阁”前经济学家纳撒内尔·韦尔（Nathaniel Weyl）表示，他也曾是韦尔组织成员，并证实该组织的性质是共产党人集会，商讨如何将美共的政策推行到成员所从事的农业事务中去。

韦尔组织的成员之一约翰·艾伯特是“农业调整内阁”的律师，他直到八十岁那年才公开承认共产党人的身份。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的自传里，艾伯特承认，一九三四年，他在哈罗德·韦尔的邀请下加入韦尔组织。他的妹妹马里恩·巴克拉克也被韦尔招募加入组织。根据艾伯特的回忆，韦尔组织同意将他的党员身份列为高度机密，以保护他继续在政府部门工作，艾伯特得以一路发展成为杰出的工人阶级律师。艾伯特的自传中写道，哈罗德·韦尔去世之后，彼得斯每个月到华盛顿与组织成员召开一次会议。尽管艾伯特否认他和他的同志们从事间谍

活动，但他承认，他们确实向共产党的领导人提供政府政策方面的信息。

韦尔组织的另外一位成员约翰·赫尔曼（John Herrmann）是激进作家约瑟芬·赫布斯特（Josephine Herbst）的丈夫。赫布斯特在关于赫尔曼的传记中写道：“从一九三四年初到一九三五年夏，他为共产党充当信使，并接受酬劳，将哈罗德·韦尔秘密培养的一批政府雇员提供的信息递交给纽约……约翰的上级是怀特克·钱伯……我在一九七四年遇见阿尔杰·希斯的遗孀，据她回忆，是约翰·赫尔曼将钱伯介绍给阿尔杰·希斯。”

霍普·黑尔·戴维斯（Hope Hale Davis）在她的《伟大的日子：记三十年代》（Great Days Coming: A Memoir of the 1930s）一书中更为详尽地记述了美共的华盛顿地下组织。戴维斯和他的丈夫赫尔曼·布兰卡（Hermann Brunck）均任职国家复兴内阁，且双双被发展为美共党员并参加地下组织。戴维斯在书中写道，她所在的小组由查尔斯·克雷默领导，隶属于韦尔组织。她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集会上，维克托·珀洛满怀激情地向大家讲述了中国的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长征。地下组织从隶属于国家复兴内阁的“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及“船舶工业法规委员会”窃取机密文件，由她的丈夫转交美共，协助美共的工人组织运动。戴维斯注意到，约瑟夫·彼得斯时时在他们的集会上出现。不过，戴维斯认为，彼得斯并非像普雷斯曼和艾伯特所说的那样以演讲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地下组织领导人的身份出现。

三十年代末，韦尔组织壮大起来，将来自政府不同部门的人员划分为众多的小型秘密团体，其中的一些成员来自国会。这些小型团体之间彼此联系密切，与美共的联络则透过一级级的领导层进行。维克托·珀洛同时负责几个小型团体的事务。

例如，赫伯特·富克斯（Herbert Fuchs）于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二年间负责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内部的秘密团体，其间，成员队伍由四人壮大到十七人。赫伯特称，他当时向维克托·珀洛汇报，由维克托向更高一级的组织沟通。戴维斯和她的丈夫后来也成为各自秘密小团体的负责人。一位神秘的拉脱维亚移民曾经将一批文件保存在她的住处。戴维斯只知道此人与反托洛茨基组织有关。

华盛顿共产党人秘密组织成立的目的并非为了开展间谍活动。相反，他们是想参与政治，尽管是在秘密地进行，他们是要通过政治颠覆秘密操作政府的决策，为共产主义利益服务。不幸的是，这样的秘密组织极适合谍报活动。惠特克·钱伯在三十年代效力前苏联从事间谍工作的事实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约瑟夫·彼得斯领导下的秘密武装就是美共的地下武装。彼得斯直接向美共领导人厄尔·布劳德（Earl Browder）汇报。在布劳德的指示下，彼得斯亦同前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三十年代，活跃在美国的前苏联情报机关主要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钱伯称，彼得斯意识到共产党在政府部门发展的秘密网络可以为开展间谍工作提供极大方便，并从中精选出几名在机要部门工作的秘密党员作为未来的情报来源。彼得斯还希望所获得的情报能有所报偿，用以资助费用昂贵的地下党活动。一九三六年，彼得斯命令钱伯从两位秘密党员那里获得文件。其中一位是在国务院工作的朱利安·沃德利（Julian Wadleigh），另一位是在“国家标准局”工作的沃德·皮格曼（Ward Pigman）。彼得斯随后将文件交给他在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主要联络人，钱伯只知道此人化名“比尔”。比尔对彼得斯的计划并未表现出热忱，不过，他答应将文件交予莫斯科方面审阅。

在几十年前秘密经海上运往莫斯科的美共档案中，有两份秘密党员从美国国务院偷盗出来的文件样本。这些档案直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后才对外公开。其中的一份文件副本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廉·多德（William Dodd）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件。多德在信中汇报了他与德意志银行主席、希特勒的首席经济顾问哈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即将出任德国驻美大使的汉斯·海因里希·迪克霍夫（Hans Heinrich Dieckhoff）以及德国外交部长巴里奥·康斯坦丁（Barion Konstantin）的会谈情况。另外一份文件来自国务院，至于是谁提供的，不得而知。文件标题是：“布里特大使致国务院穆尔法官密信摘要”。信件由美国派驻法国使节威廉·布里特（William Bullitt）写给国务院助理部长沃尔顿·穆尔（R. Walton Moore），主要涉及欧洲经济如何影响国际上日趋紧张的局势。文件中还摘录了穆尔回复布里特的亲笔密信，对布里特的观点发表看法。偷盗文件的人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信中的观点“既有趣，又重要，因为它披露了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的观点——穆尔能够对罗斯福总统施加影响。而且，布里特在法国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两份文件均属一九三六年的文件，邮戳显示，它们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到达美共。可见，美共的情报来源是多么迅速。

一九三六年末，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委派鲍里斯·拜科夫（Boris Bykov）上校接替比尔。拜科夫对约瑟夫·彼得斯的间谍计划十分重视（很有可能是因为莫斯科方面对彼得斯递交的文件样本产生兴趣）。很快，美共地下组织在美国各政府部门构建的网络从实质上转化为在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领导下的间谍武装，钱伯成为拜科夫与美共秘密网络之间的联系人。

一九三七年末，钱伯对共产主义的激情与忠诚冷淡下来，

有谣言称，许多前苏联的情报官员和特工被召回莫斯科之后便不见了踪影，钱伯越发感到不安。这些谣言并非空穴来风。克格勃国内安全部的上千名官员曾经亲手将数十万人发送到古拉格的工人集中营，甚至将子弹送入他们的头颅，而回过头来，却发现他们也在面临同样的厄运。克格勃国外情报部及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也未能幸免于难，许多高级官员和间谍网的负责人同样成为血洗政策的牺牲品。

钱伯没有公开表示退党，也没有主动靠拢美国政府。考虑到当时的美国政治形势，他认为这两种方案都不会有任何意义，而且一旦他向政府坦白，则有可能以间谍罪被捕，这也是他所不愿意的。于是，一九三八年四月，钱伯不动声色地退出苏维埃间谍活动以及美共组织，希望此举能够保护他自己和家人重新开始正常生活。为了防止报复，他和家人最初躲到佛罗里达隐居数月，并通过中间人告知从前的同志们，只要他们不骚扰他，他不会向政府告发。钱伯同时发出警告，他隐藏了一批材料，如果有人找他的麻烦，这些材料会令他们难堪。到一九三八年底，钱伯觉得不再有危险，可以逐步地回到社会中去了，于是，他和家人移居马里兰的一个农场。二十年代他有一批新闻界朋友，利用这些关系，钱伯在《时代》杂志谋得一个职位。

钱伯的背叛在前苏联情报机关和美共地下组织内部掀起轩然大波，毕竟，钱伯将前苏联特工及美共在政府的内线供认出来的风险依然存在。必需有人为这一事件承担责任，约瑟夫·彼得斯便是牺牲品之一。在钱伯突然失踪后的两个月里，地下党成员发疯般地寻找他的踪影，但都无功而返。六月，彼得斯被取消秘密武装负责人的职务，由鲁迪·贝克（Rudy Baker）接替。一九四八年，钱伯事件被公开，当时用名亚历山大·史蒂

文的约瑟夫·彼得斯被国会调查委员会传讯。彼得斯拒绝回答委员会提出的任何问题。他最终未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被驱逐回匈牙利。

鲁迪·贝克和秘密武装

一九三八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鲁迪·贝克一直担任秘密武装负责人，只是他的活动一直掩藏在重重的幕后。他从未被国会调查委员会传讯过，也从未引起媒体的注意，更未曾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而是在四十年代末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国度，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离开的确切年份。不过，他后来出现在南斯拉夫共和国，在一间政府的出版社和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担任翻译。

鲁迪·贝克如此隐姓埋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在一九三九年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秘密武装的弱点之一在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处于约瑟夫·彼得斯的领导之下”。他亦明白，厄尔·布劳德在决定委任他出任秘密武装的负责人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以最隐秘的形式将工作委派给我，而不像彼得斯那样搞得尽人皆知”。为掩护贝克的这项“秘密任务”，他同时被委派了其他工作，尽管需要耗去一些时间和精力，却可以达到“将特殊任务完全隐秘”的目的。这项策划果然获得极大成功。贝克的秘密武装领导人身份不仅在美共内部一直保密，就连联邦调查局也是在历经多年之后才发现贝克的真实身份。共产国际的档案中记载，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调查化名“阿尔”的秘密武装领导人的真实身份。联邦调查局后来发现，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拉尔夫·鲍曼，殊不知，拉尔夫·鲍曼也是一个化名。直到多年以后才终于查清，阿尔和

拉尔夫·鲍曼的真实身份是同一个人，即鲁迪·贝克。

和约瑟夫·彼得斯一样，鲁迪·贝克也是东欧移民，是共产党组织在美国的元老。贝克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克罗地亚武科瓦尔，出生时的名字大概是鲁道夫·布朗姆。一九〇九年，鲁迪随家人到达美国。他没有受过太多正规教育，只读过四年小学，后来参加过短期技术夜校。鲁迪年轻时就成为激进派好战分子，并因参与匹兹堡大罢工被捕，以暴乱煽动罪被判入狱一年半。一九一八年五月出狱后，又在同年八月因参与骚动被捕，并被当作外国敌人（因为他的出生地克罗地亚属奥匈帝国领土，而当时，美国与奥匈帝国之间正在发动战争），不过，两个月后即被释放。一九一九年，共产党成立，贝克加入党组织，直到一九二六年，一直从事机师的工作。一九二六年，鲁迪成为共产党底特律支部的组织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间被派往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最著名的“国际列宁学校”进修，并在此期间成为苏维埃共产党员。

共产国际档案里的一份传记中记载，贝克于一九三〇年结束在国际列宁学校的学习返回美国，曾在美共组织部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负责人，负责组织在朝鲜、加拿大、英国的“非法活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贝克负责“泛太平洋工会秘书处旧金山分部”的秘密工作。泛太平洋工会秘书处是“红色国际劳动联盟”（即共产国际的工会机构）的秘密组织，旨在向共产党组织仍属非法范畴遭到限制的亚洲国家推行共产党人的工作。鉴于旧金山与中国、日本及其他亚洲港口有密切的船运往来，旧金山分部的地位极其重要。一九三八年，贝克告知共产国际，由于长期从事这项工作，他从一九三二年以来就没有公开参与过美共的活动，这有助于掩护他作为美共秘密武装负责人的身份。

贝克于一九三八年末出任美共地下组织领导人。他和妻子利利（约瑟夫·彼得斯的前妻）以财主的身份居住在纽约的皮克斯基尔。他在美共《新大众》杂志设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拥有一张办公桌，并公开从事一些无足轻重的党的工作，暗地里却在指挥着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秘密武装极成功地保守了它的秘密，有关它的很多详情至今仍是个谜。不过，随着联邦调查局档案的公开，最新发现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最近才向世人公开的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我们还是掌握了秘密武装的大概情况，能够确认其中的一些人物，了解它的一些运作方式。

一九三九年一月，贝克前往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官员会面，对他刚刚就任的地下组织负责人一职进行磋商。返回美国后不久，贝克开始利用加密无线电报和有线电报与共产国际总负责人乔奇·迪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沟通。共产国际的档案中保存有部分往来于贝克与迪米特洛夫之间的电文。二战期间，贝克还通过克格勃，利用外交邮袋与共产国际联络。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两封电文提到贝克。其中一份由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称贝克交来一封邮件，已经被寄往莫斯科。在另外一份电文中，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称，收到一封莫斯科发给贝克的密电，但不知应该委派特工亦或是委派外交官将密电交与贝克。

美共秘密武装的经费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方面承担。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贝克和布劳德向迪米特洛夫发出请求，要求“每两至三个星期提供一张数千元的支票”，隐藏在一本图书的封面里寄到设于布朗克斯的投递站。贝克还另外发出了一封请求经费的电文，并提供了另外一个地址。一九四二年初，贝克提醒迪米特洛夫，他在一九四一年共收到“八五”。根据电文的上下文的含义，“八五”极有可能代表贝克共收到美元八万五

千。贝克指出，其中的三万五千被“国际出版社”负责人亚历山大·塔哈腾勃格（Alexander Trachtenberg）取走，贝克只保留了一万元，其余的全部派发给在海外的组织，尤以拉丁美洲的组织为主。一九四三年初，贝克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在过去的一年里，秘密为主花费的经费为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一美元，剩余的一万八千八百三十四美元留作一九四三年的经费。根据贝克的报告，秘密武装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间的经费总计为三万零一百四十五美元，相当于一九九八年的二十多万美元。

发自共产国际的密电有些时候单独发给布劳德或是贝克，有时也同时发给他们两个人。同样，布劳德和贝克也时而联名，时而单独致电共产国际。贝克在一九四三年发给迪米特洛夫的报告中称，尽管出于安全原因，“我们的武装一直严格独立于党组织之外——父亲（即布劳德）和儿子（即贝克）仍定期聚在一起讨论党组织和秘密组织的问题。”贝克还在电文中列举了他曾与布劳德探讨过的有关秘密武装的问题，寻求共产国际的决议。

作为秘密武装的负责人，贝克的职责之一是要确保与苏维埃联盟的沟通。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纳粹—苏维埃协定成立后，迪米特洛夫通知贝克和布劳德，“鉴于眼下的新形势，建议汽车从本月十号起开始工作”。这里的“汽车”是指共产国际对秘密短波无线电台的密称。两星期后，迪米特洛夫再次致电贝克和布劳德，重申他早前的训诫，“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采用新的联络方式。利用现有资金建造汽车已成为当务之急。”共产国际亦通过贝克以及秘密武装的地下短波电台与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共产党组织保持秘密联络。一九四二年，贝克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中特意提到一个化名“路易斯”的短

波无线电报务员。贝克告知迪米特洛夫：

关于路易斯：你于一年前提出在阿根廷建造汽车。这一指示已经传达给路易斯，并根据你的指示拨款五千美元。我们亦邀请他来吉拉（真实地点未知），但是他说，一旦离开便无法再返回。因此，你建议他前往吉拉建造汽车也遇到阻碍。考虑到一旦他前往吉拉，将失去在南美国家的关系且再无法返回，父亲（布劳德）极力反对让他离开南美。儿子（贝克）一年前曾向你汇报，我们的同志们在吉拉调查汽车行情，发现造价需要四千美元，比这里贵四倍……我们会从这里派人去吉拉解决问题。

除利用无线电报，贝克还通过其他渠道与莫斯科联络。三十年代，只有极少数国家对国际邮件加以审查。美国政府对于国际邮件几乎看都不看，只有发信人或是收信人在黑名单上的信件才会被检查。所以，共产国际通常利用从未引起官方注意的普通党员作为收信人，接收寄自共产国际的邮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政府开始密切注意国际邮件。一九四〇年初，贝克通知共产国际，他将利用肉眼几乎看不到的微缩胶片传递信息。在随后的一封电文中要求，“请确认是否收到藏于邮票背后的微缩胶片。以后在信件收到后，请彻底检查信封，微缩胶片有可能藏于封口或是邮票下面。”

除此之外，贝克还利用海员充当信使将材料带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十分认可这种方法。一九三九年九月，迪米特洛夫在加紧推行无线电报的联络方式的同时，也告知贝克和布劳德，“利用海员是一个好方法”。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有一封一九四二年迪米特洛夫发给贝克的电文：“美国货轮每个星期往返于美

国港口和南波斯的港口之间，为苏联运送军需品。海员中有我们的同志。我们认为可以适时地利用他们为我们传送信件。希望你们委派值得信赖的海员充当信使。我们的信使会在南波斯的港口接头，确保邮件安全地从波斯送到我们手里。请告知此计划是否可行。”一九四三年四月，贝克通知莫斯科方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他在电文中写道：“经过一段长时间耽搁，现在终于可以经波斯运输货物。”他在密电中提供了一位海员的姓名。这名海员在美国货轮上工作，正准备启程前往波斯再将物资运往莫斯科。

事实上，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共产国际和美共一直通过海员中的共产党员运送政治宣传品、信息和情报。美共的“海事工人工业联盟”一直致力于在海员中建立秘密通讯网络。一九三二年，联盟的前负责人乔治·明克（George Mink）在莫斯科以海事方面组织者的身份为“红色国际劳动联盟”筹备一次出访。他自信地表示，作为海事工人工业联盟负责人，“一直在通过海员网络与印度、古巴和墨西哥等地保持联系”。

联邦调查局在一九四四年的《共产国际武装调查报告》（详见第二章）中专门对身为共产党员的海员们建立秘件传送网络的情形进行调查，指出该系统的主要负责人是弗雷德里克·迈耶（Frederick Meyers）（“国家海事联盟”副主席）、约瑟夫·克尼勃格（Joseph Kenegsberg）（洛杉矶共产党圣佩德罗分部的元老）、鲁迪·兰伯（Rudy Lamber）（加利福尼亚共产党劳动委员会负责人）以及艾伯特·兰农（Albert Lannon）（共产党在东海岸的重要海事事务组织人）。在众多秘密充当信使的海员中，联邦调查局没有办法分辨哪些人仅仅是将一般性宣传材料带去海外港口（联邦调查局对此没有丝毫兴趣），而哪些海员却是在协助地下党将机密文件转交给外国共产党或是共产国

际。但是对于从海外港口返回的海员，凡是有被发现将信件交与美共官员或是前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的，他们所携带的文件一定非同寻常。

约瑟夫·彼得斯在担任美共秘密武装负责人时，经常直接与前苏联情报官员会面，这也是为什么当初钱伯的背叛会同时惊动前苏联与美共地下组织的原因之一。因为一旦钱伯投诚美国政府，不但会将他所接触过的特工及前苏联上级官员统统暴露，而且，由于他与彼得斯交往甚密，他扬言会将美共的整个地下组织以及与彼得斯有过接触的所有前苏联情报官员一并曝光。与彼得斯相比，鲁迪·贝克的作风就相当缜密。在他接管美共秘密武装之后，他与前苏联驻东海岸的情报机构的联络完全通过美共的另外一名高级官员约各布·格罗进行，以减少美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直接接触。

美共秘密武装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接触均通过前苏联最高级的情报官员进行。共产国际的档案里有一份一九四一年十月的密电副本，里面用蹩脚的英文写道：“我们的一位朋友库伯在你国工作，想和你见面……我们给了他你的地址……他的接头暗语是：‘你的兄弟托我问候你。’你们见面之后请继续保持联络，无需直接联系，可以通过你的秘密成员进行。”

库伯和贝克果然见了面。一九四二年底，贝克在他的年终报告中向迪米特洛夫指出，由于战争原因，普通的国际邮件不再安全，“从今年开始，我们将通过库伯传递信息”。在报告的后半部分，贝克指出，“我们与库伯的合作十分密切，同时，他为你我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为说明与库伯之间的合作关系，贝克特别指出，秘密武装的乔治“……协助库伯建造汽车”，即短波无线电台。

“库伯”是否是共产国际派往美国从事共产主义推广运动

的代表？一九四三年四月，美国驻西海岸秘密武装的负责人史蒂夫·纳尔逊（Steve Nelson）接待了一位自称库伯的来访者。联邦调查局在纳尔逊家里安装了窃听器，从而发现，库伯正是瓦西里·朱比林。朱比林当时的对外身份是前苏联外交官，直到数年之后，联邦调查局才查清，朱比林是克格勃驻美国机构的总负责人。

纳尔逊和库伯/朱比林用暗语交换了对间谍工作的意见以及纳尔逊领导的西海岸秘密武装如何协助前苏联开展间谍工作，并谈到要通过鲁迪·贝克和厄尔·布劳德的支持，加强前苏联情报部门与美共地下组织的合作。纳尔逊向朱比林保证，目前共有三十至四十五名海员信使往返与西海岸港口与环太平洋各港口之间，替美共传递秘密信件，而这一网络将同样为前苏联服务。不过，纳尔逊也指出，有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情报人员在未曾知会纳尔逊的情况下要求西海岸的共产党员协助他们工作，纳尔逊对此表示不满。朱比林交给纳尔逊一笔现金，金额不详，也无从知道这笔钱究竟是共产国际提供的活动经费，亦或是克格勃提供的津贴。这一年，共产国际即将解体。经过精心挑选，克格勃接管了部分秘密组织。总之，美共的鲁迪·贝克和史蒂夫·纳尔逊与朱比林之间的联络证实了在前苏联情报部门与美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国共产党人在海外的谍报工作

三十年代，美共曾派出几名成员前往海外为前苏联情报机关执行任务。其中的两位罗伯特·斯维兹（Robert Switz）和阿维·雅各布森（Arvid Jacobson）在欧洲被捕。另外一位在亚洲执行任务时付出生命的代价。

犹托库·米亚奇（Yotoku Miyagi）一九〇三年出生于日本，一九一九年移民美国，是一位极有追求的画家，一九二五年毕业于圣迭戈公关艺术学院。在毕业之前，米亚奇已经染上慢性肺结核。二十年代末，米亚奇定居在洛杉矶，参加了美共的一个名为“无产阶级艺术社”的组织，一九三一年正式成为共产党员，并很快得到苏图姆·亚诺（Tsutomu Yano）的赏识。亚诺于三十年代初到达加利福尼亚，主要任务是协助美共在相对滞后的日本人群中发展势力，但同时也负责招募特工协助前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一九三一年，亚诺将米亚奇网罗至旗下，一九三三年将米亚奇派回日本，成为前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领导的间谍网成员之一。佐尔格是德国共产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驻日本的亲纳粹德国记者，后来成为德国驻日本大使的私人顾问。凭借与德国使馆的交往，再加上下属特工分布在日本的政府部门，佐尔格得以向前苏联提供了大量有关日本和德国的极有价值的情报。

米亚奇是佐尔格的主要助手之一，然而他的美共背景却给佐尔格的间谍网带来毁灭性打击。一九四〇年，日本安全局开始在驻日本的海外人士中追查共产党人。一位被查出党员身份的归日人员与米亚奇同时在洛杉矶加入共产党，彼此认识。根据这一线索，日本方面开始监视米亚奇，并于一九四一年将其逮捕。米亚奇在狱中试图自杀，曾头朝下从警察局大楼的窗户跳下去，然而却跌落在一丛灌木中幸免一死。在日方的酷刑之下，米亚奇招供，佐尔格的谍报网被一网打尽。米亚奇早在入狱之前身体状况就十分糟糕，他于一九四三年死于狱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共的地下武装派人前往欧洲为前苏联开展秘密工作。一九四〇年九月，迪米特洛夫在密电中指示厄尔·布劳德，“务必在你的成员中挑选出数名，对外封锁其

共产党人身份，日后安排到你国负责向欧洲提供援救的组织中去”，并强调“所有人员要精心挑选，确保素质全面可靠”，他们的任务是“要渗透到具有国际性网络的组织中去，最终能够为我们服务”。迪米特洛夫所强调的“国际性网络”，是要让挑选出来的人员利用救援官员的身份自由出入参战的欧洲国家（美国当时尚不是交战国），为前苏联充当秘密信使。

美共的一位秘密党员纽·菲尔德（Neol Field）原先在“国家同盟”负责裁军事务。在迪米特洛夫致布劳德的密电发出一个月后，他辞职去了一个国际救援组织“论教派服务委员会”工作，并于一九四一年初前往马赛工作，负责向欧洲国家提供难民服务。菲尔德利用他奔波于欧洲各国从事难民工作的机会，为德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充当信使，收送往来于德国、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的密件。

菲尔德并非第一次从事前苏联及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三十年代，他在国务院就任中层职位时，就已经是前苏联两家间谍组织争夺的对象。当时在克格勃工作的海蒂·马兴（Hede Massing）后来写道，她曾试图说服菲尔德加入克格勃，但菲尔德表示，他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阿尔杰·希斯是老朋友，更倾向于和他共事。（菲尔德一九三六年离开国务院，进入国家同盟工作）。

希斯事件于一九四八年曝光之后，菲尔德害怕被传讯后提供不利于老同事的证据，于是和家人逃往东欧。然而，他前往东欧的时机不好。约瑟夫·斯大林当时正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的领导层实行大清洗。菲尔德在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时，曾经接触过地下党成员，而其中的部分人正是四十年代末斯大林清洗的对象。二战期间，菲尔德曾经向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驻瑞士负责人阿伦·杜勒斯（Allan Dulles）

提供过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情况。在当时，并没有人因此对菲尔德作为共产党员的忠诚性提出质疑。然而，在大清洗的过程中，菲尔德却因此被定性为美国间谍，尽管事实上他是一名纯粹的前苏联间谍。菲尔德和他的妻子、兄弟及一名养女被匈牙利共产党政权以美国间谍的身份关进监狱，菲尔德所从事的活动成为指控在大清洗中或被捕或是被行刑的匈牙利和捷克党人的证据。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菲尔德被释放并恢复名誉。尽管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菲尔德依然对共产主义忠心耿耿。他再没回过美国，于一九七〇年在匈牙利去世。

迪米特洛夫要求布劳德精选数名可靠成员渗透到国际救援机构中去，菲尔德只是被挑选出来的成员之一。一九四二年，克格勃外国情报部发给共产国际的备忘录中指出，布劳德可能已经挑选出不只一个人选。费庭通知迪米特洛夫，在“论教派服务委员会”中有一个人，其化名为“乔医生”，曾经成功地将美共的密信送交给英国共产党。然而，有关乔医生的其他资料便一无所知。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迪米特洛夫要求美共“挑选一两名同志，具有良好的在资本家公司从事推销员工作的背景，或在知名的资产阶级报社从事记者工作的背景，从而能够在欧洲生活，并往来于欧洲各国之间。他们要在斯德哥尔摩等候我们的指示。”迪米特洛夫还提供了接头地点和暗号。

在这封电报发出后不久，美共方面提供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作为从事共产国际秘密工作的人选，此人名叫温斯顿·伯德特（Winston Burdett），在《布鲁克林上空的鹰》做记者。伯德特于一九三七年秘密加入美共。一九四〇年，有一位名叫内森·艾因霍恩（Nathan Einhorn）的记者在“美共报业同业工会”纽约分会任执行秘书。艾因霍恩同时也是一名秘密党员，与伯

德特相识。他将伯德特介绍给知名共产党人、《新大众》总编约瑟夫·诺思 (Joseph North)。诺思告知伯德特，“我们”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他，并将伯德特介绍给另外一个人，至于这个人的姓名，伯德特一直不得而知，直到后来通过照片识别，才确定此人的姓名是约各布·格罗。格罗是美共领导人之一，很少公开露面，他同时负责美共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格罗指示伯德特，要他说服《布鲁克林上空的鹰》新闻社委派他做驻国外记者，所有驻外费用由伯德特自理(格罗承诺将会负担这笔费用)，新闻社只需对所采用的稿件支付报酬。格罗要求伯德特，建议将驻外的第一站定在芬兰，以便收集正在进行中的芬兰与苏维埃之间的战争素材。格罗要伯德特提供党员证，几张本人照片(以便前苏联特工识别伯德特)，并写了一份个人简历。这最后一个步骤实际上是前苏联情报机构招募新闻间谍的例行程序。

《布鲁克林上空的鹰》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位廉价的战地记者，他们采纳了伯德特的建议。格罗向伯德特提供经费，并指导他如何在斯德哥尔摩与一位苏维埃方面的联络人秘密会面。一九四〇年二月，伯德特离开美国。到达斯德哥尔摩后，他给纽约的一个女人发了封电报，证实他已安全抵达斯德哥尔摩。伯德特记不清这个女人的姓名，只隐约记得好像叫盎格鲁·萨克森。他与前苏联的联络人在斯德哥尔摩见了面，那个人要求他利用记者的职务之便调查芬兰人民的士气及他们对战争的心理承受力还能维持多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实力远远胜于芬兰，然而令苏维埃联盟吃惊的是，在他们的大举进攻下，芬兰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成功地阻截了苏维埃的第一次进攻)。联络人给了伯德特一笔经费，作为格罗提供的经费的补充。

一九四〇年三月，芬兰——苏维埃之战结束，伯德特向斯

德哥尔摩的联络人提交了最后一份报告，并额外得到一笔经费。此后，他开始继续新闻社委派给他的任务，前往挪威、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履行记者职责，同时继续与前苏联情报部门联络。渐渐地，伯德特对所从事的秘密工作产生厌倦，对共产主义信仰也淡化起来。一九四二年，他悄悄中断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联系，开始为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新闻部工作，最终成为其永久雇员。

伊丽莎白·本特利身为前苏联间谍及约各布·格罗的合作伙伴，于一九四五年末背叛前苏联。她向联邦调查局供认，曾于一九四〇年收到伯德特的电报，确认他已经抵达斯德哥尔摩。联邦调查局于一九五一年审讯伯德特。伯德特最初承认他在三十年代曾经与美共有过密切联系，但否认认识本特利、格罗和前苏联情报部门的人。然而，第二次审讯时，伯德特承认在四十年代初曾在海外向前苏联提供过情报。一九五五年，伯德特向国会委员会供认，他被艾因霍恩和诺思招募为前苏联间谍。

在伯德特的供词中提到，一九四〇年初，他在斯德哥尔摩巧遇另外一名美国记者彼得·罗兹（Peter Rhodes）。罗兹当时在合众社任职。伯德特称，他对罗兹了解不多，只是从交谈中明显感觉到罗兹有亲共产主义倾向。伯德特并不知道，罗兹和他一样，也是一位秘密工作者，受美共和格罗委派，为前苏联工作。在共产国际的档案里有一份一九四〇年二月鲁迪·贝克发给迪米特洛夫的密电，称彼得·罗兹未能按照原计划前往布加勒斯特，因此他与前苏联特工的接头需要重新安排。一年后，联邦调查局在监视约各布·格罗的过程中发现，约各布·格罗曾经与彼得·罗兹及罗兹的妻子艾恩（Ione）见面。

罗兹与共产主义的渊源由来已久。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罗兹在牛津大学读书，毕业后加入合众社。在美国与国际

纵队在西班牙交战期间，罗兹撰写了大量文章，从此成为一名狂热分子，并作为美国代表加入“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国际协调委员会”。一位曾经参加过国际纵队的德国共产党人甚至利用罗兹的护照违法进入美国。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罗兹在请愿书上签字，要求纽约州赋予共产党候选人投票权。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兹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外国广播监控服务部”工作，后来被调去“战争情报办公室”，一九四四年成为大西洋新闻分部负责人。

一九四四年八月，艾恩与当时接替格罗负责美共与克格勃之间联络的伯纳·舒斯特见面。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份由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的电报中称，罗兹夫人告知舒斯特，她的丈夫与前苏联情报部门失去了联络。舒斯特建议克格勃与罗兹重新建立联络，并提醒克格勃，罗兹原先是通过约各布·格罗与他们联络。

艾恩·罗兹所谓的罗兹与情报部门失去联络，很有可能是指一九四三年格罗的去世。一九四五年，伊丽莎白·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供认，格罗曾经提到，彼得是他手下的秘密工作人员之一，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间曾多次见面。本特利说，虽然她曾与艾恩·罗兹谋面，但从未见过她的丈夫，也不知道罗兹负责提供哪一领域的情报。不过，通过与艾恩的接触以及格罗的介绍，本特利得知罗兹是秘密共产党人，出生于菲律宾，而艾恩则出生于比利时。本特利亦得知，罗兹的职业是一名记者，并且在后来成为美国政府广播部门的官员。罗兹的童年十分不幸，他的母亲曾亲手杀死他的父亲。联邦调查局经调查证实，罗兹的背景与本特利所供认的信息分毫不差。

本特利的供词证实，克格勃接受了舒斯特的建议，的确试图恢复与罗兹的联络，但未能成功。本特利供认，一九四五年

初，她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约瑟夫·卡茨（Joseph Katz）指示她重新接近艾恩·罗兹。本特利曾试图接触艾恩，但艾恩表现得相当谨慎，拒绝见面。几个月后，阿纳托利·格罗莫夫（Anotoly Gromov）接替卡茨的职务，再次要求本特利与艾恩联络。本特利当时已经有了叛变的想法，她以艾恩存有戒心为由，拒绝了格罗莫夫的要求。几个月后，本特利叛变。

一九四七年六月，联邦调查局审讯彼得·罗兹。罗兹否认与约各布·格罗见过面。联邦调查局让他辨认格罗的照片，罗兹亦表示无从认起。事实上，联邦调查局早在一九四一年就发现格罗与罗兹夫妇会面，所以他们肯定罗兹是在撒谎。罗兹的其他供词亦缺乏可信度。他声称不知道那些在国际纵队的朋友是共产党人，对于有人持罗兹的护照冒充他进入美国一事，罗兹表示无可奉告。罗兹还慷慨陈辞地为“纳粹—苏维埃协定”辩护，令审讯官大惊失色。

美共秘密武装与假护照

三十年代早期至中期，约瑟夫·彼得斯领导下的美共秘密武装提供了大量假美国护照给美国共产党人和前苏联间谍，供他们出国使用及从事情报活动。一九三八年中，贝克接管秘密武装之后基本上停止了这项工作，个中原因显而易见。

美国护照在绝大多数国家畅通无阻，因此备受各国情报部门推崇。而且，美国是一个多民族融会的国度，任何一个人，无论种族、背景及英文的口音如何，都可以声称所持有的美国护照货真价实，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由于美国缺乏确认真实身份的系统，使得使用一本假护照易如反掌。一九三八年，钱伯在背叛后不久写了一篇关于前苏

联间谍如何利用假护照活动的文章，交与一位做记者的老朋友赫伯特·索洛（Herbert Solow）。文章的题目是“美国人的假象”，署名“卡尔”，这是钱伯在地下组织的化名。钱伯在文章中揭露，克格勃的一名拉脱维亚特工，人称“阿沃德”，于一九三二年到达纽约，专门负责制造假护照的工作。钱伯不知道“阿沃德”的真实姓名，不过，根据俄罗斯文献中心的档案资料，此人的真实姓名为阿诺德·依卡（Arnold Ikal）。钱伯写道，“阿沃德”的主要联络对象是一个名叫“桑德”的人，此人“专门负责美国共产党最非法的工作”。根据钱伯的描述，很明显，“桑德”就是约瑟夫·彼得斯的化名。

钱伯在一九三八年的文章里称，制造假护照成为秘密武装的经费来源。“桑德工作中的最大障碍就是昂贵的活动经费，而这项作为他的秘密工作提供了一份可观收入”。彼得斯与依卡达成协议，“美共负责提供国籍证明、出生证明、商业及社会保障文件、联络地址以及必要且可靠的联络人。苏维埃政府为此支付费用，作为地下党组织的生命源泉”。

秘密武装的成员们在纽约公关图书馆的人口调查资料中寻找夭折的儿童姓名，然后设法弄到他们的出生证明，再凭出生证明申请护照，同时还找来证人在签发护照的官员面前做伪证，证实申请人的身份。一九三七年依卡在莫斯科被捕。此前，他从美共地下组织那里共收到上千本假护照。

一九三五年，乔治·明克、利昂·约瑟芬森（Leon Josephson）和尼古拉斯·舍曼（Nicholas Sherman）在丹麦被捕，他们的供词再次证实了美共与苏维埃之间的护照交易。一八九九年，明克出生于俄国，一九一二年到达美国。二十年代，他是美共最主要的海事联盟的组织者，并一度担任“海事工人同业联盟”负责人。三十年代初，明克为“红色国际劳动联盟”

工作，协调共产党工会在世界各地海事领域的工作。

在丹麦被捕时，明克身上共有四本护照，其中一本护照上是明克自己的名字，另外一本护照上贴着明克的相片，但身份却是阿尔·戈特利布。另外两本护照，一本护照上的名字是哈里·卡普兰（Harry Kaplan），另外一本的名字是亚布拉罕·韦克斯勒（Abraham Wexler）。卡普兰的那本护照是真实的。当卡普兰本人被美国政府问及为什么他的护照会在明克手上时，卡普兰称，是利昂·约瑟芬森的兄弟巴尼·约瑟芬森（Barney Josephson）窃取了他的护照。韦克斯勒的那本护照同样货真价实。韦克斯勒声称护照被人偷走，但无法提供何时、何地、被什么人偷走。韦克斯勒是“海事工人同业联盟”成员，明克曾担任该联盟的第一任主席。卡普兰则是约瑟芬森兄弟以及明克的同事。显然，韦克斯勒和卡普兰将护照提供给明克，明克可以在护照上换上别人的照片。丹麦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明克十八个月监禁，出狱后，明克被驱逐回前苏联，从此销声匿迹。

与明克一起被捕的利昂·约瑟芬森在狱中呆了四个月，丹麦法院因缺乏足够的证据遂将其遣返美国。美国国务院的笔迹专家后来验证，从乔治·明克身上搜出的护照中，护照持有人的姓名为“戈特利布”的那一本，申请表格上的字迹出自约瑟芬森之手。三十年代中，共产国际驻美国非法机构的代表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也被搜出携带假护照，假护照上的名字是“塞缪尔·利普森”。经检验，这本护照申请表格上的字迹同样出自约瑟芬森之手，而且，约瑟芬森亦曾做伪证，证实“利普森”的身份。

约瑟芬森于一九二六年加入美共。他是一名律师，曾于二十年代多次代表美国共产党的利益出庭。一九三〇年，北卡罗来纳州加斯托尼亚爆发纺织工人大罢工，有数位工会成员被以

谋杀行政长官的罪名遭到起诉。几位共产党人律师组成律师团为工会成员辩护，约瑟芬森便是其中的一位。被起诉的工会成员在获保释之后逃往苏维埃。其中的一名成员弗雷德·比尔(Fred Beal)后来返回美国，自称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心甘情愿服刑。据弗雷德称，正是约瑟芬森负责对那些工会成员安排假护照，帮助他们逃往苏维埃。

与明克和利昂·约瑟芬森同时被捕的另一个人自称是尼古拉斯·舍曼。然而，此人的美国护照上虽然写明是尼古拉斯·舍曼，而他同时携带的一本加拿大护照上的名字是亚布拉罕·格登曼，另外一本德国护照上的名字是维汉姆·布里特·施耐德。舍曼的护照是假的，是凭借一个于一九二六年去世的男人的国籍证明申请到的，由彼得斯的秘密武装派人提供的假证明。被捕时，舍曼身上还有一封信，由一个名叫哈里·卡普兰的人从自己经营的公司寄出。这个卡普兰与明克所携带的护照上的卡普兰是同一个人。丹麦法院以间谍罪判舍曼入狱十八个月，刑满后将其驱逐回前苏联。

那么，这个冒充尼古拉斯·舍曼的人究竟是谁？美国人罗伯特·斯维兹曾于三十年代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他后来通过照片辨认出，舍曼的真实身份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美国非法机构官员亚力山大·佩特洛维奇·乌拉诺夫斯基(Aleksandr Petrovich Ulanovsky)。惠特克·钱伯曾于三十年代初为乌拉诺夫斯基所在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做过间谍武装工作，他在回忆录《证人》中详细讨论了这个人。

明克、约瑟芬森及舍曼/乌拉诺夫斯基的被捕不仅仅证实了美共与前苏联之间的假护照交易，而且，同时被捕的这三个人，明克是美共和“红色国际劳动联盟”的骨干，约瑟芬森是美共的律师兼秘密武装成员，乌拉诺夫斯基则是一名职业间

谍，这些均证明共产党工会、美共（包括公开组织和地下组织）及前苏联谍报部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用冷战时期的谍报术语来讲，三者之间没有“独立分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初，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组织机构间界限的模糊性令前苏联谍报部门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美国政府的姿态漠然，联邦调查局却早已展开大规模调查，美共在组织架构上的弱点愈发明显起来。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与美共有关的间谍活动不断被美国反间谍机关挖掘出来，美共的名誉被染上污点。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一九三五年，丹麦方面逮捕明克等三人，此事引起美国国务院的关注，美国方面开始调查假护照事件。然而，调查进展缓慢。美国的司法部并不热衷于起诉前苏联间谍，各大媒体对此亦缺乏关注。

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的两名成员阿瑟·尤尔特（Arthur Ewert）和他的妻子持假美国护照在巴西被捕，此事同样未引起太多关注。尤尔特在二十年代初期至中期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二十年代末成为共产国际秘密成员。三十年代中，他和妻子从不同路径到达巴西。阿瑟·尤尔特持有的假护照上的名字是哈里·勃格，他妻子所持假护照上的名字是马赫拉·林赛斯基。真正的勃格早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夭折，美共利用勃格的出生文件申请了这本护照，并提供假证人证实尤尔特就是勃格。埃尔西·尤尔特（Elsie Ewert）的假护照则是利用马赫拉·林赛斯基的国籍证明申请的。在假护照被发现之后，真正的林赛斯基声称她的国籍证明被人偷走，她根本不知道会有人利用这一证明申请假护照。然而，林赛斯基的兄弟却是美共制造假护照的成员之一，也正是他为勃格的护照做了伪证。

尤尔特夫妇在巴西的任务是协助一场反对瓦加斯政权的共

产主义暴动。然而，巴西警察局发现了正在筹备中的这起暴动，尤尔特夫妇被捕。鉴于尤尔特夫妇的美国公民身份，美国驻巴西大使馆最初对此事表示关注。当尤尔特夫妇被证实持有假护照而并非真正的美国公民时，美国的外交人员随即退出这一事件。

阿诺德·依卡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与彼得斯的制造假护照部门之间的联络人。一九三七年，阿诺德·依卡被捕，假护照问题开始真正引起关注。然而，依卡并非在美国被捕，被捕的原因也并非因为大批量贩卖假护照一事。当时，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员接到消息称，一名美国妇女唐纳德·罗宾逊夫人在附近的“国家饭店”需要救助。使馆官员前去探望了这位心急如焚的女人。唐纳德·罗宾逊夫人称她的美国籍丈夫突然失踪。使馆官员返回使馆查询罗宾逊夫妇的记录，再返回酒店时发现罗宾逊夫人的房间已经住进一名新房客，而酒店人员解释，罗宾逊夫人已经离开，没有留下任何联络地址。美国使馆代办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拒绝接受这样的解释，他要求前苏联政府务必找到罗宾逊夫人的下落并允许美国大使馆官员与之见面。此事拖延了很久，最终，亨德森被允许前往莫斯科监狱探望罗宾逊夫人。罗宾逊夫人对亨德森说，她不需要，也不想接收美国的外交援助。

与此同时，在检查过美国国务院的护照记录后发现，罗宾逊夫妇各自另外持有一本护照，用名是阿道夫·路本先生和夫人。美国驻拉脱维亚领事馆的一名前外交官夫人在看过唐纳德·罗宾逊的照片后认出，此人是拉脱维亚人，是前苏联间谍。经调查发现，真正的唐纳德·罗宾逊一九〇五年出生于昆斯，死于一九〇九年。罗宾逊夫人的护照则利用鲁思·诺玛·伯克兰的出生证明申请，鲁思生于一九〇九年，死于一九一五年。亨

德森由此推断，这两个人并非无辜的美国人，而是前苏联间谍，是当时席卷整个苏维埃的清洗运动的牺牲品。亨德森认为，美国使馆已没有必要继续追踪这件案子。

然而，莫斯科事件引起媒体的关注。大量报道质疑，路本夫妇究竟何以搞到两本假美国护照。钱伯的朋友赫伯特·索洛利用路本案例，再加以钱伯提供的信息，完成了一篇题为“斯大林的美国护照工厂”一文，发表在发行量很大的《美国水星》报上。文章概述了美共与苏维埃大规模联合制造假护照的情况。

一九三九年，依卡被召回莫斯科，随即被他的同事们逮捕，罪名是参与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的阴谋，企图颠覆苏维埃联盟。同许许多多被捕的同事一样，依卡也违心地在悔过书上签名，承认曾代表拉脱维亚法西斯主义者与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联络，顶头上司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负责人严·伯津（Yan Berzin）。依卡在悔过书中称，他通过纽约的一位牙科医生兼美共地下组织成员菲利普·罗森布里（Philip Rosenblit）将活动经费提供给美国托洛茨基运动负责人詹姆斯·坎农（James Cannon）（坎农的妻子与罗森布里的妻子是一对姊妹）。二十年代，罗森布里在协助共产国际向美共秘密提供经费的任务中担任重要角色，并于三十年代初做出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决定移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九三七年，即依卡签署悔过书那一年，罗森布里失踪。他很有可能被处决，或是被发送到古拉格的工人集中营。

依卡在签署悔过书之后也被发送到集中营。一九三九年，依卡被判处死刑的危险有所淡化，他决定推翻悔过书并反复申诉，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从未有过动摇，要求重新考虑对他的审判。不过，他没能等到获释的一天，最终死在狱中。他的妻子

虽然持有两本假美国护照，却是一名真正的美国人，真实姓名是鲁思·伯格（Ruth Buerger）。伯格在被捕后答应与前苏联合作，拒绝美国的外交援助，因此获释，条件是不能离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前苏联方面派人探视她在美国的家人，警告她的父母不许将他们女儿的事情在美国公开。伯格的父母接受了警告，伯格从此得以过上正常生活。

尽管共产国际的成员和前苏联间谍持假护照事件在丹麦、巴西和莫斯科先后曝光，美国政府依旧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直到一九三九年欧洲战争爆发，美国方面才着手调查假护照事件。结果，由约各布·格罗领导的“世界旅行者”旅行社的非法行为被挖掘出来。在调查人员搜出的旅行社的记录中发现，该旅行社至少为十六名持假美国护照的人士安排行程，由此产生的交通费用及其他费用被分别划入两个特别账户，其中的一个账户持有人名叫乔治·普利莫夫，另外一个账户持有人名叫阿·布雷克。经调查发现，这两个账户的有关费用由美国共产党支付。

根据一九三九年的调查，司法部进行了数起诉讼，其中最知名的一场诉讼是控告美共领导人厄尔·布劳德持有假护照。一九三九年十月，厄尔·布劳德被捕。经审判，布劳德的上诉被驳回，一九四一年，布劳德被判入狱四年。然而，布劳德只在狱中服刑十四个月之后，总统罗斯福鉴于苏维埃与美国达成的反纳粹联盟，决定释放布劳德，作为对前苏联友善的表示。美共的财务主管威廉·韦纳（William Weiner）亦被定罪。由于韦纳患有心脏病，随时有生命危险，对他的行刑暂时搁置。美共官员哈里·甘尼（Harry Gannes）同样因为制造假护照而被起诉。他的案件亦被拖延审讯，一九四一年，哈里在审判尚未开始之前去世。事实上，经调查发现持有假护照的共产党人及提

供伪证的人最终都逃过了法律制裁。

约各布和他的“世界旅行者”旅行社亦被起诉，但量刑甚轻。经过一番法律辩护，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格罗的罪责被定为，身为外国机构的代表，未向有关部门登记。格罗为此被罚款五百美元，并被判坐监，缓期执行。

美国反间谍活动

对厄尔·布劳德的量刑，说明美国政府对美共与前苏联联手从事假护照交易的反响不足，很大程度上证实了美国反间谍体系一盘散沙的局面。三十年代，美国政府颁布的有关内部安全的法令杂乱无章，对于哪些资料属于机密信息没有明文规定，对凡有机会接触机密信息的政府官员应符合怎样的安全规定缺乏指引，至于内部安全事务应该由哪个部分负责更加没有明确的职能划分。

如此一盘散沙的状况有其历史原因。美国于一九一七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政府的机构建设远远不足以应付国家间冲突。在仓促的战备情况下，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美国政府以司法部的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前身）、陆军军事情报部反间谍部门及海军情报办公室为基础，建立了庞大的安全系统。联邦政府考虑到纳粹发展自身的安全机构时在发展速度上受到制约，于是决定资助建立地方职能部门（例如“纽约市外国人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家政府部门的辅助机构，同时批准了一批踊跃的半民间组织（如“美国保护同盟”和“美国防卫社”便是其中最大的两个组织）担负起监察颠覆活动、间谍活动及其他一切妨碍战争的行为。

美国政府的策略果然奏效。在美国参战之前，德国政府曾

注入大量资金给美国的反战运动，如今，经过清查，德国的资金来源被切断，美国的反战人士再没有了声息。德国的情报部门曾多次试图渗透到美国的关键部门，但屡试屡败。美国国内反对应征入伍的势力也同样遭到镇压。然而，美国政府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在仓促中拼凑起来的安全体系运作效率不高，各部门协调不足，时有争执发生，几家州属安全机构甚至成为党派间政治之争的工具。例如，明尼苏达州的“无党派联盟”是平民党的农业组织，对声势浩大的共和党构成威胁，明尼苏达州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借用其官方赋予的权力压制“无党派联盟”的政治野心。几家得到政府认可的民间组织甚至滥用权力，践踏法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争时期的安全武装有一部分还在运作，镇压的重点转移到大有席卷欧洲之势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九二一年，对红色风暴的恐惧开始消退，哈丁政府下令彻底解散战争年代的安全武装。调查局几乎完全退出内部安全事务，军事情报部门的规模大大缩减，陆军和海军的反间谍部门虽然继续负责镇压国内激进势力，但是对于抓获的间谍或颠覆分子，凡不属于军事人员的，两个部门均无权审判。陆军和海军的反间谍部门提交给军事主管部门的报告大多被置之不理，其内容自然无法传递到拥有审判权的政府部门。

三十年代中期，罗斯福总统对国内的亲纳粹势力及“银衫”、“黑色军团”等亲法西斯势力表示关注，要求联邦调查局重新介入国内安全事务。联邦调查局负责人约翰·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对此表现出极大热忱，并将美国共产党人亦列为联邦调查局关注的范围之内。三十年代的联邦调查局规模很小，工作人员不足三百人，到三十年代末，工作人员也不过

九百人。而且，工作人员大多擅长罪案调查，直到数年后，反间谍的知识及手法才逐步走上正规。

三十年代末，法西斯主义开始采用内部颠覆与外部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新战略，使得国内安全问题日渐严重。在西班牙国内战争期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国民军在德国纳粹势力和意大利法西斯势力的支持下，分四路向早已四面楚歌的西班牙共和国首府马德里进攻。国民军的指挥官埃米利奥·莫拉（Emilio Mola）扬言，在马德里城内还有一支“第五纵队”，任务是从共和国内部扫清障碍，确保四路纵队长驱直入马德里，如入无人之境。“第五纵队”从此成为从事秘密间谍及颠覆活动、为军事进攻铺路的地下组织的代名词。随着希特勒利用纳粹同情分子先后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为德军的进攻扫除障碍，第五纵队的恐怖含义愈加深厚。

在这样的形势下，联邦调查局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国内安全事务上。与此同时，陆军和海军情报部也在扩展。但总体来讲，由于受经济大萧条影响，三家机构的经费和人手都相当有限，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一年。对于国内安全事务，由于缺乏明确的职能划分，国务院自认为拥有发言权，负责“秘密服务”的财政部也自认为有份参与。甚至连邮政部也认为对与邮件有关的事件拥有司法权，商业部为防止外国贸易操纵亦坚持拥有一份权力。司法部长弗兰克·摩菲（Frank Murphy）意识到，如此的职能交叠将导致政府资源浪费，于是在一九三九年建议罗斯福总统理顺职能分配。罗斯福总统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颁布秘密备忘录给国务院，财政部、战争部、海军部、商业部部长以及司法部长和邮政部部长，声明“一切有关间谍、反间谍及颠覆活动的调查工作由司法部所属联邦调查局、战争部所属陆军军事情报部门以及海军部所属海

军情报办公室负责……请将此决定传达给上述三个部门之外的其他调查机构负责人，今后凡有关间谍、反间谍及颠覆活动的数据、信息及资料均立即交由最近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处理。”

罗斯福总统的决定给原本混杂的美国反间谍系统增加了一些章法。随着新机制的运作，海军和陆军军事情报部主要负责各自部队内部的人员、基地及设施的安全，联邦调查局则负责海军和陆军之外的一切安全事务。虽然职能交叠的现象依然存在，比如对军工厂的监控，对于从事军事项目建设的民工的监控，军事情报机关时而也会染指非军事领域的反间谍活动，不过，军事情报部门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分工总体上是清晰的，各自所拥有的司法权也界线分明。然而，二者之间的合作一直属于弱项。

总体来讲，新机制运行顺利，基本达到预期目的。一九三九年，德国在入侵波兰之后曾多次试图在美国进行间谍和颠覆活动，但是均未成功。在一份一九四〇年的报告中，胡佛自豪地表示，联邦调查局已成功渗透到德国情报部门，德国的一个秘密短波电台就掌握在打入德国内部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手里。胡佛在报告中称：“德国特工从多个渠道汇集到这个电台，准备进一步发往欧洲的情报，在尚未发出之前就已经被国务院、战争部以及海军部的官员了解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国宣布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的间谍网络被轻易地瓦解。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数十名美国人秘密接受德国和日本的资金，从事支持纳粹，反对参战，反犹太主义的宣传活动。随着国内安全新机制的运行，这些活动从此悄无声息。“德国——美国阵线”也彻底被粉碎，其头目被判入狱。亲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联盟也烟消云散。美国国内其他法西斯主义组织的主要头目一部分被判监，其余的被处于政府

严密控制之下，完全丧失继续从事反战运动的能力。二战期间，居住在西岸的日裔美国人曾遭到大肆拘捕，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对此举表示反对。除了该事件之外，二战期间，国内安全部门对于人权问题及民主自由运动的处理比一战时期谨慎许多。鉴于一战期间将维护国内安全的权力下放给各自治州政府、地方政府机构、甚至半民间组织的做法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这种做法在二战期间被取消。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过去，我们能很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政府官员未能将前苏联间谍活动作为维护国内安全的首选进攻目标，他们由此犯下致命的错误。无可置疑，三十年代后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间谍活动占据安全官员们的主要精力，但即便是将前苏联的谍报活动摆在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美国的情报部门依然远未做足功夫。他们的反映之淡然，跟进调查意识之匮乏，从他们对待美共与前苏联情报部门之间从事假护照交易的态度足以窥见一斑。

坐失良机：惠特克·钱伯在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九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惠特克·钱伯一直在努力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他在《时代》杂志社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而且，他在尽一切可能回避公众及官方的注意。一九三九年八月，纳粹—苏维埃协定的签订促使钱伯不得不打破刚刚宁静下来的生活。他意识到，苏维埃虽然尚属于非参战国，但事实上已经成为纳粹德国的同盟，此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爆发，而美国的苏维埃支持者必将因为此协定与美国国家政策发生冲突。事实证明，钱伯的分析是正确的。一位名叫艾萨·董·莱文（Isaac Don Levine）的记者曾经写过很多关于共产主义的

文章，他对于钱伯的背景略知一二，并极力劝导钱伯将所了解的情况提供给美国政府。钱伯最终表示同意，条件是豁免他的一切刑事责任。莱文于是向白宫负责安排日程的秘书马文·麦金太尔（Marvin McIntyr）介绍了钱伯的情况，要求面见罗斯福总统。麦金太尔拒绝了莱文的要求，但同意安排莱文和钱伯与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见面。

九月二日晚，就在纳粹武装攻陷波兰的前夜，莱文和钱伯与伯利见面。当时，苏联红军按兵不动达两个星期之久，目的是要等波兰军队全线调集到西部后，红军伺机从东部和波兰南部发动进攻。钱伯将他所了解的美共协助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开展间谍活动的情况向伯利作了陈述。他讲了绝大部分情况，但仍有所保留。特别是为避免被判监的风险，钱伯没有和盘托出他在美共与前苏联的间谍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毫无疑问，伯利完全明白钱伯的陈述是关于间谍活动。伯利对这次会面做了书面记录，标题就是“地下间谍组织”。根据记录得知，钱伯提供了一批政府中层官员中的秘密共产党员名单以及在美共政府部门工作的美共地下组织成员名单，并介绍了他们的活动。另外，钱伯还提供了美共地下组织中非政府成员名单。根据伯利的记录，钱伯曾多次暗示，他所提到的这些人，在参加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同时，极有可能也在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间谍活动。

经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证实，在钱伯提供的名单中，有八个人后来曾协助前苏联情报部门从事破坏美国利益的间谍活动。他们中包括国务院中层官员阿尔格·希斯；在国务院“美洲共和国部”专门处理与中美及南美国家外交事务的劳伦斯·达根；财政部专门研究国际经济形势的官员弗兰克·库尔（Frank Coe）；“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成员查尔斯·克雷默；著名的工党律师，与“工业组织代表大会”有着广泛接触的约

翰·艾伯特；加利福尼亚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艾萨·弗考夫；刚刚入选白宫成为罗斯福总统高级助手的洛赫林·柯里以及财政部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艾萨·董·莱文也对这次见面过程做了记录，在他的记录中有怀特的名字，而在伯利的记录中却没有。钱伯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怀特与前苏联间谍活动有关，但据他回忆，他并没有向伯利提到过怀特）。

除了这八个人之外，在钱伯向伯利提供的名单中，另有五人经维诺那计划破译的证据证实，亦有份参与前苏联间谍活动。他们是国务院官员朱利安·沃德利，他于一九四九年供认参与前苏联间谍活动；陆军文职官员文森特·雷诺（Vincent Reno），亦于一九四九年承认参与前苏联的间谍活动；三十年代中期任国务院官员的纽·菲尔德；财政部高级官员所罗门·阿德勒（Solomon Adler），后来成为伊丽莎白·本特利所属间谍网成员；还有菲利普·罗森布里。钱伯并不知道，菲利普·罗森布里已经成为斯大林恐怖政策的牺牲品，再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根据罗斯福总统一九三九年的法令，总统日程安排秘书应该安排莱文与钱伯同联邦调查局见面。同样，助理国务卿伯利在得知钱伯提供的情况与间谍活动有关时，无论是出于对罗斯福总统颁布的法令负责，亦或是鉴于基本常识，应立即通知联邦调查局。然而，伯利却没有这样做。至于他究竟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没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伯利绝对不是苏维埃的同情者，相反，他是一名坚定的反共产主义分子，这也是为什么莱文和钱伯可以放心地与之沟通的原因。在伯利的记事簿上，与莱文和钱伯会面的这件事被记录成为“苏联间谍一事”，另加有备注：“有必要采取些简单行动”。

伯利采取的行动的确极为简单，而且丝毫没有成效。他没

有将会谈记录整理成报告交给联邦调查局或是军事反间谍部门，甚至，尽管在钱伯提供的名单中有几个人就职国务院，伯利亦没有向国务院本部的员工安全办公室汇报。一九四一年三月，与钱伯见面后已有一年多，为了证实钱伯的真实身份，伯利才向联邦调查局问起，他们是否在调查一个名叫钱伯的人，是否有关于该人的资料。调查局的人告知伯利，他们目前没有调查钱伯，只是在一个参加激进运动的人员名单上有这个人的名字。伯利没有将钱伯所讲的内容告知联邦调查局，也没有解释他为什么想要了解钱伯的背景。在伯利的日志上记载，他曾与马文·麦金太尔讨论过钱伯的事情，但那已经是一九四二年的事情了，而且伯利并不知道麦金太尔是否将此事汇报给罗斯福总统。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多条线索向联邦调查局汇报，已任职《时代》杂志社高级记者的惠特克·钱伯掌握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一九四二年五月，联邦调查局接待了钱伯。钱伯指出，他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将所有情况提供给伯利。一年以后，一九四三年六月，联邦调查局向伯利查询此事，伯利的笔录才最终交到联邦调查局的手上。即便如此，联邦调查局仍未加以重视，而是拖延数月，直到接获凯瑟琳·珀洛（Katherine Perlo）的信件（详见第五章）后，以及联邦调查局对共产国际秘密武装进行调查（详见第二章）的报告面世之后，才有所动作。然而，直到一九四五年秋天，伊丽莎白·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自首之前，联邦调查局仍未能给此事件以应有的重视。

钱伯提供给国务院助理部长的名单人数不少于十三人，其中八人是国务院官员，包括与前苏联情报部门有联络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然而，美国政府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原因之一是由于如此重要的情报直到三年半之后方到达相关部门，而此后

的跟进工作又异常缓慢。如果政府在一九三九年获得钱伯的情报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将会为美国国家利益挽回重大损失，而战后的美国国内也就不会有太多关于共产主义和颠覆运动的无谓的激烈争辩。



第四章

格罗—本特利谍报网

约瑟夫·彼得斯和鲁迪·贝克领导下的美国共产党的秘密武装肩负多项使命，包括保护美共免受敌对势力的渗透，清除党内立场不坚定分子，打入左翼竞争党派及右翼敌对党派内部以及与政府雇员中的秘密团体保持联络。至于协助共产国际的国际性事务及前苏联情报部门的谍报工作，并非秘密武装的职责。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特别是纳粹德国一九四一年六月进攻苏维埃联盟之后，美共地下组织开始从党的活动中脱离出来，专心致力于协助前苏联的谍报工作，其主要领导人是约各布·格罗和他的助手及后来的继任人伊丽莎白·本特利。秘密武装的谍报活动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多个网络以及单线联络人相互交结，而这些不同的网络与单线联络人又全部是通过格罗和本特利与前苏联情报部门发生关系。

约各布·格罗

讲到格罗—本特利谍报网，首先要介绍约各布·格罗。在格罗的生平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空白，不被外界所了解，亦或

是外界知之甚少。约各布·格罗于一八九〇年出生于今天的乌克兰，出生时的名字叫做约各布·雷森。他后来向伊丽莎白·本特利透露，曾在早年参加过反对俄国政府的激进活动，因此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他的父母在此期间移民美国，他本人也在流放数年之后潜逃，经日本到达美国与家人团聚。至于具体的细节与时间，约各布没有提及，不过他和他的父母大约在一九〇八年到达美国，一九一五年，约各布加入美国籍，成为美国公民。当时，约各布已经成为社会党中俄语人士联盟的积极分子，该联盟是社会党日渐壮大的左翼势力的核心部分，也是日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地。一九一九年，左翼势力被排挤出社会党之后，形成两个竞争性组织，即“共产主义工人党”和“美国共产党”，约各布加入后者（两个组织于一九二一年合并），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当时的许多共产党人一样，约各布也为自己选用了新名字，即格罗，俄文的意思是“声音”。（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报中，克格勃对格罗的化名是“祖克”，俄文意思是“声响”，显然是考虑到格罗的俄文含义。）

格罗对他在二十年代初期的活动十分隐讳。他向本特利透露，他曾于一九一九年返回俄国，为布尔什维克党工作，在西伯利亚的一间煤矿任工长。他同时还参加了“契卡”，前苏联一个极有实权的政治警察组织，即克格勃的前身。如果格罗真的曾经是一名“契卡”成员，这段经历便为他后来充当美共与克格勃的联络人打下基础。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有一份格罗填写的简历问卷。问卷上没有注明日期，但根据其中的内容推断，应该写于一九二七年之后。只是这份问卷是由美国共产党组织发出，其中的调查内容主要与美国方面有关。格罗在问卷中回答，他的出生

地点在俄国。当被问及入狱记录时,格罗的回答是曾在俄国监狱服刑三年,估计是指在沙皇时代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问卷中并没有问及二十年代初格罗是否身在苏维埃,不过,从问卷内容可以了解,格罗在一九二三年成为美共党员。所以,即便是他于一九一九年前往苏维埃,他也应于四年之后返回美国。

一九二三年后,格罗为美共的一本俄文杂志工作,成为美共在底特律和芝加哥党组织的创办人,后来被提升为“苏维埃俄国技术援助社”的主要负责人。该组织的工作是雇用机师和专家前往苏维埃工作,并通过海运将设备、工具及其他所需物资运往刚刚成立的苏维埃政府。

一九二七年,格罗的共产主义事业有了新的转折。同年六月,格罗与其他合伙人共同成立一家名为“世界旅行者”的旅行社,格罗出任主要负责人,并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到去世。“世界旅行者”的所有负责人及关键职员均为美共党员,资金亦由美国共产党提供。在公开文件上,格罗是最大的股东。

“世界旅行者”与前苏联的官方旅行社“旅游者”签有协议。“世界旅行者”的主要业务是代理“旅游者”推广其旅游服务产品并收取佣金。产品包括前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旅游的往返机票、海关服务、旅行文件以及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的住宿、游览、交通安排。“世界旅行者”的另外一项重要业务是通过海运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投递包裹。由于美国有大批前苏联移民,他们的家人多留在国内,邮件业务量很大,为“世界旅行者”带来可观的利润。同其他旅行社一样,“世界旅行者”同时提供前往其他国家的旅行服务,不过,“旅游者”是前苏联惟一获得经营商业旅游服务许可权的旅行社,与“旅游者”合作为“世界旅行者”提供了稳定的业务来源。同时,前苏联贸易部亦鼓励希望同前苏联建立商

业往来的美国商人透过“世界旅行者”安排行程。“世界旅行者”于是成为前苏联间接资助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渠道，因为毕竟“世界旅行者”背后的真正拥有者是美国共产党。

“世界旅行者”还通过其他方式协助美共。为避免引起美国官方及其他国家官方注意，美国共产党人在出席各国会议时往往持假护照和假旅行证件出入。“世界旅行者”在为他们安排行程时，不仅从不对美共人士证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还利用多种手段加以协助。“世界旅行者”的协助对象不仅局限于美国共产党，甚至还包括持假美国证件执行共产国际任务的外国共产党人以及前苏联情报特工。

由此，约各布·格罗和他的“世界旅行者”与美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搭上关系。由于为美共的秘密武装及前苏联谍报部门提供非法服务，格罗和“世界旅行者”于一九四〇年被起诉，罪名是外国机构未经注册。

尽管美国政府对于“世界旅行者”的判罚过于温和，但很明显，美国政府并非对格罗的活动一无所知。格罗也意识到这一点，并相应地改变商业模式。首先，针对“世界旅行者”被指控为外国机构这一点，格罗与美共重新组建了“美国航运服务公司”，以掩人耳目。其次，为防止政府对他的监视，格罗让尚不为联邦调查局所知的伊丽莎白·本特利作为他的秘密工作的助手和信使。

“美国航运服务公司”

为了掩人耳目，新成立的“美国航运服务公司”需要一位体面的管理者，厄尔·布劳德于是安排知名富豪、亲共产党人士约翰·哈泽德·雷诺(John Hazzard Reynold)出任公司总裁。美共投

入一万五千美元作为原始资金,以现金形式交给雷诺,雷诺再从自己的账户支出这笔投资,从而掩盖资金的真正来源。尽管雷诺本人只出五千美元入股,但拥有公司全部股权。作为公司的头面人物,雷诺的形象远远好过格罗。格罗身为前俄国移民,又是名不见经传的共产党官员,并且有过被判刑记录。而雷诺则不同。他出生于长岛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纽约州法官,他的妻子格雷斯·弗莱希曼(Grace Fleischman)是弗莱希曼·伊斯特家族遗产的继承人。二十年代,雷诺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员,他不仅鸿运当头,而且独具慧眼,在一九二九年经济大崩溃之前将绝大部分股票全部抛售。一九三〇年,他又继承了大笔家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雷诺成为陆军准尉,在财政部队执行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已经升任中校。

虽然雷诺的家境殷实,但他从二十年代早期就开始倾向于苏维埃。他从未加入共产党,却从不介意自己的名字及部分财产与美共联系在一起。前苏联有一份杂志名为《今日苏维埃俄国》,旨在宣传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如何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真正得以实现。这份杂志由美共控制的路斯奇·古罗出版公司负责发行,该公司总裁西奥多·拜尔(Theodore Beyer)与雷诺相识,将他推荐给布劳德。雷诺与美共之间的联络工作由一位同样出身显赫的莱缪尔·哈里斯(Lemuel Harris)负责。莱缪尔·哈里斯很早以前就成为美共的农业专家。

本特利在供词中交代了“美国船运服务公司”的情况。一九四一年,联邦调查局向雷诺提出质询,雷诺避重就轻地对本特利供词中涉及“美国船运服务公司”的大部分内容表示认可,承认他和本特利是朋友,并通过本特利的介绍与布劳德和格罗相识。布劳德和格罗提出建立公司的想法,于是才有了后

来的“美国船运服务公司”。雷诺向联邦调查局强调，“美国船运服务公司”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实体，他否认美共在公司中有投资，并声称他是从莱缪尔·哈里斯那里以个人贷款形式借到一万五千元，而并非由美共提供资金。尽管雷诺一再强调公司的所有活动均为纯商业性活动，但他同时承认，向哈里斯的借贷没有任何贷款协议、发票，或是其他文件。联邦调查局并不相信雷诺的说法。

一九四一年，“美国船运服务公司”成立时，伊丽莎白·本特利被任命为公司副总裁。雷诺对于公司的日常运作并不关心，而且，一九四二年末，雷诺恢复了在陆军的官职，根本不在纽约。所以，本特利事实上是公司总经理，同时又是格罗在“美国船运服务公司”的代理人。格罗继续负责“世界旅行者”，以分包商的形式承担了“美国船运服务公司”的大部分工作。

“美国船运服务公司”在掩护前苏联谍报活动方面的重要作用可以从克格勃一九四四年末发出的两份密电中略知一二。当时，有一个名为“俄国战争救援会”的组织致力于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供捐助物资，其中的几名成员要求前苏联贸易部准许其他公司经营与“美国船运服务公司”及“世界旅行者”相同的业务。克格勃驻纽约情报机构紧急要求莫斯科总部制止这项议案，理由是它将“直接威胁‘麦纳’的掩护身份”，克格勃认为，“与麦纳的公司合作至关重要”。“麦纳”即是克格勃对伊丽莎白·本特利的化名。

伊丽莎白·本特利

伊丽莎白·本特利一九〇八年出生于康涅狄格一个知名但并不富裕的家庭。她从瓦萨毕业，之后参加学生交流项目前往

意大利，最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期间，她加入“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这是一个由美共秘密控制的组织，同盟中有许多共产党人，但他们对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守口如瓶。本特利渐渐引起共产党人的注意，在经历一系列考察之后，一九三五年被推荐加入共产党。

随后的几年里，本特利渐渐参与到地下组织之中。起初，美共只委派她做一些最基本的秘密工作，让她渗透到美共感兴趣的组织中去，搜集这些组织的内部情况并汇报给美共。一九三八年，本特利在“意大利情报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这是一个亲墨索里尼的机构。本特利汇报，图书馆内有一些亲墨索里尼的活动，这引起美共的兴趣。在听取本特利汇报的美共官员中，有一个人更加对本特利本人发生兴趣，此人便是约各布·格罗。格罗原本有家室，他的妻儿于三十年代中移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本特利与格罗相识时，格罗正是寂寞一人，两人之间发生了罗曼蒂克关系，并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三年格罗去世。

格罗开始让本特利作为他在秘密工作中的助手，不过他最初委派给本特利的任务都比较微不足道。一九三九年，本特利充当格罗的投递站，为格罗接收由加拿大共产党人萨姆·卡尔（Sam Carr）和蒂姆·巴克（Tim Buck）寄来的信件（卡尔是加拿大共产党全国组织部长，加拿大政府后来以间谍罪将其囚禁）。格罗的另一个投递站是罗斯·阿里纳（Rose Arenal），罗斯丈夫的兄弟、墨西哥共产党人里奥波罗·阿里纳（Leopolo Arenal）写给格罗的信件全部寄给罗斯，本特利便成为罗斯与格罗之间的联络人，负责传递这些信件。一九四〇年，阿里纳协助发动了一场武装袭击，目标是流亡墨西哥的前苏联领导人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住处。结果，托洛茨基逃过

这次暗杀，他的保镖，一名年轻的美国人丧生。

一九三九年末，有传言称麦克库鲁报业辛迪加的总裁是纳粹分子，格罗派本特利打入辛迪加内部探听虚实。本特利谋得一个秘书职位，但是经过观察，并未发现这位总裁有任何纳粹倾向，于是在一九四〇年初辞去这份职务。当时，美国政府开始对“世界旅行者”动用法律武器，格罗怀疑自己的行踪遭到联邦调查局监视，为防止万一，他成立了“美国船运服务公司”，同时越发依赖本特利与他的方方面面的关系联络。

一九四一年初，格罗担心自己的行踪被人监视，不方便前往纽约以外的地方，便委派本特利作为信使，与他在华盛顿的线人联络，玛丽·普赖斯（Mary Price）便是其中的线人之一。一九四三年以前，普赖斯一直担任美国最著名的新闻评论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的秘书。李普曼与美国众多政界要人交往甚密，因此获得大量信息。但是有些内容，李普曼认为不适宜在文章中公开，普赖斯则将这些未公开发表的内容及其来源提供给格罗。对前苏联来讲，了解这些内容出自哪位政要之口，有助于判断李普曼文章中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可信程度如何。

玛丽·普赖斯：秘书间谍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发自一九四三年中的密电中，曾经有普赖斯的名字出现。虽然对于当时的事件，本特利的供词与克格勃的电文内容属于两个不同版本，但基本事实是一致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本特利与克格勃相互把责任推卸给对方。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供认，普赖斯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从事谍报工作带来的精神压力更加令她的健康状况雪上加霜。普赖斯

决定辞去李普曼秘书一职，前往墨西哥休个长期，疗养身体。本特利认为，秘密工作的重负已超出普赖斯的承受限度，应该让她退出谍报工作。本特利称，一九四四年初，克格勃的一名官员，本特利只知道此人名叫比尔，强迫本特利放弃对普赖斯的领导权，改由克格勃直接指挥。根据本特利对比尔及其妻子的描述，联邦调查局推断，比尔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高级官员依卡·阿布杜拉维奇·阿米洛夫（Iskhak Abdulovich Akhmerove）。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另外一份电文里，比尔的身份得到证实。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供认，一九四四年的数个月里，她一直与比尔就普赖斯是否应该执行新任务而争执。本特利怀疑，比尔是想利用普赖斯施展“美人计”，利用性关系发展内线。在此期间，普赖斯一直担任本特利与其下属间谍网之间的联络人。

根据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本特利所供认的情况则有了另外一层背景。一九四三年六月，就在普赖斯准备前往墨西哥度假时，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与她进行初步接触，试图将她调离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直接接受克格勃的指令，并委派普赖斯将一批材料交与克格勃驻墨西哥特工“诺拉”（此人真实身份未知）。有两份被破译的克格勃密电分别发自一九四四年四月和五月。阿米洛夫在密电中称，已经和普赖斯在她的纽约寓所见过面（从墨西哥返回之后，普赖斯从华盛顿迁居到纽约）。接下来，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七月份一份密电中，阿米洛夫汇报了他与本特利就普赖斯问题所发生的争执。布劳德和本特利以普赖斯的健康状况及精神过度焦虑为由，坚持要普赖斯退出情报工作，改为从事美共的政治性工作。阿米洛夫认为应该尽一切努力说服布劳德，让普赖斯直接接受克格勃领导，理由是，他不想失去一位“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阿米洛夫认为，即便是普赖斯身体欠佳，她的寓所仍可作

为据点，她亦可以继续承担中间人的任务。对于本特利的怀疑，即克格勃有意让普赖斯施用“美人计”一事，阿米洛夫未做任何评论。虽然本特利声称，她的决定是基于对普赖斯的关心，阿米洛夫则向莫斯科方面指出，本特利本人不喜欢普赖斯，所以想将普赖斯排挤出间谍工作。

根据本特利的供词，她最终说服厄尔·布劳德接受她的建议，这一说法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份一九四四年发出的密电中得到证实。在电文中，布劳德通知克格勃，他已经将普赖斯调离地下组织，安排她从事政治工作，克格勃最终予以默认。一九四五年，普赖斯出任主要由共产党人组成的“美国专业工人联合办公室”的法律和教育部部长。一九四六年，她被调往北卡罗来纳，担任“人权利益南方会议北卡罗来纳委员会”的财政部长，并于一九四八年作为进步党候选人竞选州长。普赖斯所在的两个组织，高层领导人中有很多秘密共产党人。

虽然普赖斯靠捡垃圾的做法从李普曼没有采用的资料中挖掘情报提供给前苏联，但这并非普赖斯最主要的工作。普赖斯的任务在于担任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中情报产量最高的莫里斯·霍尔珀林的联络人。普赖斯还协助发展邓肯·李成为内线，这是谍报网中政府职位最高的内线之一。

莫里斯·霍尔珀林：学者间谍

同格罗一本特利领导的秘密武装中的其他成员一样，霍尔珀林也是通过美共的介绍加入到前苏联谍报活动中。三十年代，霍尔珀林在俄克拉何马大学担任拉美问题研究专家，其间秘密加入共产党。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西尔维亚·韦尔（Sylvia Wyle）就任美共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支部的组织部长

时，纳撒内尔·韦尔和妻子得知霍尔珀林的党员身份。尽管霍尔珀林一直隐瞒他的共产党人身份，但他的言行已经暴露他的极左倾向。一九四〇年，纳粹—苏维埃协定令共产党人成为众矢之的，霍尔珀林的激进行为让他陷入困境。任凭霍尔珀林一再强烈否认他是共产党人（当然这是假话），俄克拉何马立法机关仍强迫校方将其开除。俄克拉何马校长倒是相信霍尔珀林，他没有直接解聘霍尔珀林，而是采取一个折中方案，向霍尔珀林提供了大学教师每七年才可以享用的为期一年的假期，发放全额工资，然后让霍尔珀林主动提出辞职。几乎就在同时，一九四一年夏末，一个刚刚成立的机关——“情报协调办公室”在它的研究部门为霍尔珀林提供了一个职位。该机关后来改名为“战略服务办公室”，成为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主要的情报武装，莫里斯·霍尔珀林担任其研究分析部门中拉丁美洲组的负责人。

霍尔珀林的共产党人身份一向保密，如今他又在为美国政府的机要部门工作，所以他并没有同美共在华盛顿的公开组织接触。根据本特利的供词，霍尔珀林通过美共刊物《新大众》的编辑布鲁斯·明顿（Bruce Minton）与党组织接触。明顿意识到霍尔珀林有机会提供大量情报，于是汇报给约各布·格罗。格罗随即安排本特利与霍尔珀林接触，地点选在格罗在华盛顿的一位朋友威拉德·帕克（Willard Park）家里。帕克也是一位拉丁美洲问题研究专家，在“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工作。他虽然不是美共成员，但赞同共产主义。起初，本特利以秘密党员（而非间谍人员）的身份，利用玛丽·普赖斯的住所作为会面地点，接收霍尔珀林缴纳的党费及帕克提供给美共的捐赠。但是很快她便开始强迫霍尔珀林和帕克向她提供文件和情报。她认为帕克的情报价值比较低，渐渐地，帕克不再提供情

报，而霍尔珀林提供的情报却是源源不断。开始阶段，霍尔珀林将情报交给玛丽·普赖斯，再由普赖斯转交本特利，偶尔他也亲自将材料交给本特利。被破译的克格勃电文证实，霍尔珀林的确是一位情报产量极大的间谍。在克格勃的电报中经常可以见到：霍尔珀林“报告”，霍尔珀林“提供材料”，“根据”霍尔珀林“提供的情报”，霍尔珀林“提供……电报”，霍尔珀林“提供一份‘伊哑巴’（即‘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文件副本”，“根据送往‘银行’（即美国国务院）的信息……我们已经得到副本”，由霍尔珀林提供，等等，等等，数不胜数。

霍尔珀林尤其尽心猎取“战略服务办公室”留存的美国外交公文副本等绝密文件。对于霍尔珀林提供的文件，本特利很少阅读，后来她在向联邦调查局供认时表示，她只知道，霍尔珀林提供的文件相当之多。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二十二封密电内容是通知莫斯科方面，霍尔珀林偷窃的文件副本由美共经前苏联外交邮袋寄往莫斯科。霍尔珀林向前苏联提供的情报包括：美国就土耳其对罗马尼亚的政策问题发出的外交电报，国务院对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发出的指令，美国大使馆针对摩洛哥形势的报告，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John Winant）对于波兰流亡政府与斯大林商洽的看法，美国政府与法国各纷争组织及流亡人士的关系报告，美国对南斯拉夫铁托运动的看法，美国同希腊政府关于苏维埃对巴尔干半岛的野心的看法。

霍尔珀林的谍报工作并不仅限于情报收集，他更加将共产党的观点渗透到由他亲自主持编写的“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数份报告中。在一份关于一九四三年玻利维亚新政权的报告中，霍尔珀林指出，新的当权派有亲纳粹的危险倾向。在另外一份报告中，霍尔珀林指出，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分子及欧洲反

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人士有亲希特勒嫌疑，并且声称，美国的主要托洛茨基组织——“社会工人党”与盖世太保有牵连。为了指证墨西哥的罗马天主教政治运动实为亲纳粹性质，霍尔珀林甚至要求“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特工截留墨西哥天主教牧师与美国大主教及红衣主教之间的信件，希冀抓到美国教会援助亲纳粹运动的证据。霍尔珀林的这些指控与美共及苏维埃的观点如出一辙。

一九四五年“战略服务办公室”解散，霍尔珀林的任职结束，他被调往国务院，继续从事拉美问题研究。一九四六年，随着美苏紧张关系升级，再加上霍尔珀林有可能接到克格勃的通知，了解到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自首一事，霍尔珀林自觉离暴露的日子时日无多，决定先行辞职。一九四七年，联邦调查局质询霍尔珀林，霍尔珀林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称他从未见过本特利，与前苏联情报机构没有任何瓜葛。然而，数年之后，霍尔珀林在接受一位传记记者访问时，又自相矛盾地表示，他在布鲁斯·明顿有一位亲戚，经其引见，他本人曾与本特利见过几次面，其中一次的见面地点就在霍尔珀林的住所。不过，霍尔珀林坚称，他只知本特利是厄尔·布劳德的研究助手，对拉美问题深感兴趣，他们之间的谈话绝对是清白的。

本特利的供词于一九四八年公开，但当时的舆论焦点聚集在供词中的其他内容，有关霍尔珀林的部分并未引起广泛注意，更何况霍尔珀林所在的学术精英阶层本来就普遍认为本特利是在谣言惑众。一九五三年，霍尔珀林在波士顿大学担任拉丁美洲地区研究项目负责人。同年，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要求霍尔珀林出席聆讯，但霍尔珀林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出席。之后，波士顿大学委员会再次传讯霍尔珀林，霍尔珀林再次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校方领导不希望将事态扩大化，采

取折中方案，由霍尔珀林向委员会声明，他本人不是共产党人，委员会则对于霍尔珀林不合作的态度进行点到为止的批评，霍尔珀林仍可保留职位，继续担任拉丁美洲地区研究项目负责人。

联邦调查局早在一九四五年便提交调查报告，指证霍尔珀林为前苏联间谍。此报告被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Herbert Brownell）公开之后，霍尔珀林事件开始引起广泛关注。波士顿大学领导层私下通知霍尔珀林，校方委员会将再一次同他讨论这一问题。霍尔珀林急不可耐地携家人立即前往墨西哥。到达墨西哥之后，霍尔珀林拒绝当地一所大学的任职邀请，又自费返回波士顿探讨他的处境问题。霍尔珀林遭到波士顿大学的解雇，理由并非因为他利用“第五修正案”做护身符，而是因为他擅离职守。霍尔珀林在墨西哥居留到一九五八年。因害怕被墨西哥方面驱逐回美国，他又前往前苏联，在知名的“科学院”获得一个职位。一九六二年，霍尔珀林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理想彻底破灭，他前往古巴，希望自己的理想模式能够在卡斯特罗那里得到实现。他在古巴政府的“中央规划委员会”任职，同时在哈瓦纳大学教书。

一九六七年，霍尔珀林对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模式亦产生不满，于是转移到加拿大，在英属哥伦比亚的西蒙·弗雷泽大学教书。霍尔珀林晚年时著书批判苏维埃及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模式。霍尔珀林在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同事唐·克什纳（Don Kirschner）这样描述霍尔珀林，指出霍尔珀林已经成为“新政自由派”，“对于社会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不过，霍尔珀林一直否认他曾与前苏联情报机关合作。霍尔珀林去世后，唐·克什纳发表著作《冷战流亡者：莫里斯·霍尔珀林的未解之谜》（Cold War Exile: The Unclosed Case of Maurice Halperin），当

时，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尚未公开。克什纳在著作中称他的这项研究是一次“令人心痛的过程”，因为他在彻底研究过本特利的供词及霍尔珀林的生平之后得出结论，“在众多的陈述之中，我相信这个女人所讲的一切”。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公开之后，克什纳的判断得到进一步证实。

邓肯·李：长春藤出身的间谍

邓肯·查普林·李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他的父亲是一位主教牧师，并且在弗吉尼亚的一间精英女子学校连续多年担任校长。邓肯本人也在华盛顿著名的圣奥尔本私立中学就读，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深造。他在大学里是校足球队队员，并于一九三五年比同班的其他学生提前毕业。之后，邓肯获得“罗兹”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读书，毕业后又返回耶鲁大学，获法学学位。一九三九年，邓肯加入华尔街知名的“多诺万、莱热、牛顿及伦巴德”法律公司。一九四二年，他接受“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委任。在“战略服务办公室”的高层中有很多耶鲁大学的校友，他们和邓肯一样有着显赫的背景。

邓肯最初的工作是担任威廉·多诺万将军的助手及顾问。多诺万既是“战略服务办公室”的领导人，同时又是邓肯任职的法律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后来，邓肯被“战略服务办公室”派往中国执行任务。（邓肯的父母曾以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生活多年，他本人在中国长大，直到十二岁时离开）。“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绝大多数官员享有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邓肯的军衔是中校。

然而，邓肯却是一名共产党人。至于他何时加入共产党，已经无从考证，但极有可能是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成为共产党

人。邓肯在牛津读书时结识了伊什贝尔·吉布 (Ishbel Gibb)，并结为夫妻。伊什贝尔是一名坚定的左翼分子。三十年代中的牛津大学有一个相当活跃的学生共产党组织，在留学牛津的年轻美国学生中，至少有四人加入党组织（当时在牛津读书的美国人极少），并与前苏联情报部门发生牵连。他们是：邓肯·李，彼得·罗兹，唐纳德·惠勒 (Donald Wheeler) 以及卡尔·马扎尼 (Carl Marzani)。

一九四〇年，邓肯就读耶鲁大学法学院最后一年时，他的邻居向联邦调查局告发邓肯夫妇是共产党人，理由是，在他们的住处有共产党的宣传材料，而且他们的政治言论亦证明他们是共产党人。当时，联邦调查局源源不断地接获市民举报，提供纳粹嫌疑人及共产党第五纵队嫌疑人的线索，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位于纽黑文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只向纽约总部提供了一份十分简洁的报告，纽约方面也只是将报告归档了事，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根本引不起联邦调查局的兴趣。在纽约定居之后，邓肯白天在华尔街工作，下班之后便自告奋勇地为美共工作。一九四一年末，他已经成为“俄国战争救援会”的法律顾问，一九四二年初，他成为“援助中国委员会”执行董事。该委员会向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中国组织提供援助，其领导人是玛丽·普赖斯的姊妹米尔德里德·普赖斯 (Mildred Price)，一位热忱的秘密共产党人。

本特利解释说，经米尔德里德·普赖斯介绍，玛丽·普赖斯与邓肯相识。玛丽·普赖斯在得知多诺万将军邀请邓肯加入“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消息后，将此事告知格罗。格罗命令玛丽·普赖斯将邓肯发展为内线。玛丽的确完成了格罗交代的任务，不过，根据本特利的供词，邓肯提供给玛丽·普赖斯的情报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十分有限。为了能够从邓肯那里

得到更多情报，格罗派本特利到华盛顿与邓肯见面。本特利发现，邓肯虽然很想帮忙，但他十分谨慎。本特利对联邦调查局供认，“我和邓肯初次见面之后，他开始向我提供来自‘战略服务办公室’的不同类型情报。他永远采用口述的方式，从不肯留下任何书面文字，也不许我对他提供的情报做任何记录”。在本特利与邓肯接触的过程中，邓肯一直“异常害怕被联邦调查局监视”。

本特利回忆说，邓肯提供的情报大多是关于“战略服务办公室”在欧洲的运作将如何对前苏联产生不利影响，并且提供战略服务办公室派驻海外的特工名单。在本特利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提供给联邦调查局的证词中，她提到，邓肯曾经“提到‘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特工将从天而降地进入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透过‘战略服务办公室’的代表，操纵和平进程”。联邦调查局和本特利都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然而，他们没有料到，这句话实际上与“战略服务办公室”的一项被称为“麻雀行动”的绝密任务有关。“麻雀行动”的目的是要说服匈牙利政府向盟军投降，从而彻底瓦解纳粹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

一九四八年，本特利的供词被公开，“战略服务办公室”的许多元老拒绝相信他们的领导人、“战略服务办公室”常春藤派的代表人物，居然会背叛他们。许多媒体也认为，本特利对邓肯的指证纯属无稽之谈。邓肯在接到聆讯通知后并没有动用“第五修正案”，他只坚决否认对他的所有指控。传讯方没有深究邓肯与本特利的接触背景，从而令邓肯得以保持一付无辜的姿态。然而，他在被联邦调查局质询时提供的证词却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邓肯承认他曾在两年的时间里，多次在华盛顿以及前往纽约的旅途中与本特利见面。但他坚称，他一向以为本特利的真名是“海伦”。至于与格罗的关系，邓肯承认

他曾见过“海伦”的朋友“约翰”，根据邓肯的描述，“约翰”正是格罗。邓肯说，他从来不知道海伦的姓氏，也不知道她从事什么职业，他和海伦只不过通过朋友玛丽·普赖斯的介绍有过点头之交。身为“战略服务办公室”的高级官员，又曾在战争年代从事过情报工作的邓肯，居然在和某人接触两年之后仍不知其姓氏、职业，这样的解释实在难以令人信服。邓肯同时声称，他是新政自由派人士。邓肯没有透露，联邦调查局在质询邓肯时亦不知道，邓肯于三十年代结婚，他的蜜月之旅就在莫斯科。五十年代初，美国国内对于国内共产主义势力及前苏联谍报活动的争议越发激烈，邓肯离开美国。虽然他也时而返回美国，但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

被破译的克格勃密电显示，邓肯曾向前苏联报告美国和英国就波兰战后命运问题与斯大林谈判的外交策略，美国在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外交活动以及“战略服务办公室”在中国和法国的运作。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进一步证实了本特利关于邓肯处事谨慎的评语。一九四三年五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通知莫斯科，“我们与考哈（邓肯·李）商讨过偷拍文件的事宜。考哈表示，在某些情况下，他可以做到，但总体来讲，他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在谈及邓肯的谍报工作时，本特利这样写道：

我们发现他有机会接触（“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机密档案后，要求他将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我们。他随即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有被“战略服务办公室”列为危险人物的名单。名单分为三类，“已确认前苏联特工身份”，“已确认共产党人身份”及“赞同共产主义人士”。在第一组里有三个名字，我并不认识他们。第二组中有珀洛网络中的一名成员，第三组则是莫里斯·霍尔珀林。我们立即

向霍尔珀林发出警报，要他多加小心。珀洛手下的那名成员由于做事比较鲁莽，我们于是将他打入冷宫，六个月内不得参与任何活动。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三封密电准确无误地证实了本特利的这段文字。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的密电中称：

根据考哈（邓肯·李）的情报，“伊啞巴”（即“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安全部门正在整理名单，其中有四个人向苏联提供情报……

名单包括两组人名：1. 同胞 [即共产党人（其中包括“伊啞拉”，即唐纳德·惠勒）]。2. 赞同者，[即左翼自由人士等等（其中包括“黑尔”，即霍尔珀林）]。考哈正在设法弄到这份名单。

邓肯的确将这份名单搞到手，并通过九月二十二日的密电发出。

这些电文证实了本特利的供词中的内容，邓肯的确将“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安全名单泄露出去。名单上包括三类人：已经被“战略服务办公室”证实为前苏联间谍的人士，在“战略服务办公室”任职的共产党人以及支持前苏联的人士。本特利提供给联邦调查局的证词是在这件事情发生数年之后，它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内容惟一的出入在于，电文中提到，有四人被怀疑是前苏联间谍，而本特利记得，在这一项下有三个名字。本特利称，名单分为三大类，而电文中则写明名单分为两类。

本特利的供词中写道，名单上包括霍尔珀林的名字，这一

点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得到证实。本特利指出，名单中的另外一个名字是珀洛谍报网的成员（详见第五章）。维诺那计划的电文对此也予以证实，名单上的唐纳德·惠勒的确是珀洛手下的间谍。从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发出的第三封电报进一步证实了本特利的供词。这封于九月二十日发出的密电，其内容是回应九月十五日美国方面的电文。电文中要求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通知‘麦纳’（即本特利）停止与‘伊啞拉’（即惠勒）及‘黑尔’（即霍尔珀林）的联络，至于何时可以恢复联络，需征得我们的认可”。本特利在供词中提到，惠勒被暂停一切活动长达六个月，而对于霍尔珀林，只是提醒他要特别小心，这些内容大体上与电文内容一致。

一九四四年末，“战略服务办公室”派邓肯前往中国，试图在被日本占领的中国及朝鲜寻找机会，渗透到日本内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封电文中显示，本特利曾安排邓肯与前苏联间谍在中国接头，从而确保邓肯可以继续为前苏联服务。

朱利叶斯·约瑟夫（Julius Joseph）：

从政治颠覆到间谍活动

本特利在“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另外一名内线便是朱利叶斯·约瑟夫。一九三八年，朱利叶斯·约瑟夫获得密执安大学经济学系公共事务学硕士学位，一九四〇年在政府的“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任职。一九四一年，朱利叶斯被调往“联邦安全部”（一个福利机关），一九四一年被调往“社会安全委员会”，一九四二年就职“紧急管理办公室”（负责战争期间的工业动员），一九四三年就职“工人战争人力委员会”，并成为高级行政官员。朱利叶斯并不过分隐瞒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他于一

九三六年为《工人日报》撰写文章，一九四〇年在支持美共参与纽约州选举的请愿书上签名，一九四二年在与共产主义有关的《科学与社会》的公开论坛上演讲。

一九四二年，约瑟夫与美共联络，提供他认为有价值的政府情报。在随后的两年里，本特利一直负责从约瑟夫那里接获文件，其中大部分情报与个人运动有关，是美共的工人干部感兴趣的内容，但并不符合前苏联的口味。一九四三年五月，约瑟夫应征入伍，在格罗的指示下，他向“战略服务办公室”申请职位并获接受，在远东部工作，他的妻子也就职“战略服务办公室”，在影视及宣传部工作。一九四五年，约瑟夫已经成为远东部的第二把手，主要负责日本情报工作。本特利称，约瑟夫提供的来自于“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情报，不仅包括远东部的情报，还包括他与“战略服务办公室”俄国部的同事们探讨问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情报，所有情报均具有极高的价值。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约瑟夫的名字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关于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建立内线的报告中提及此人，另外一次是在一九四四年，约瑟夫从一位亲苏维埃的同事那里获得俄国部的情报，继而致电汇报给莫斯科。

“战略服务办公室”解散后，约瑟夫就职“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后来担任“纽约艺术、科学和职业委员会”负责人，这是“群众阵线”的政治宣传组织。一九五三年，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传讯约瑟夫，要求他对其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做出解释。约瑟夫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关键性问题。

约瑟夫的妹妹爱玛也是一名共产党人，亦为“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虽然本特利从未向联邦调查局提到过爱玛，但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四年密电中，本特利曾通知克格勃，

爱玛·约瑟夫 (Emma Joseph) 十分适合为克格勃工作，安排爱玛前往锡兰执行“战略服务办公室”的任务时，本特利安排她与当地的克格勃人员接头。

锡德里克·贝尔弗雷奇 (Cedric Belfrage):

双重叛国者

在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中有一位特殊人物，他就是英国情报官员锡德里克·贝尔弗雷奇。锡德里克·贝尔弗雷奇出生于大不列颠，并在那里长大。他第一次到美国是在二十年代中期，后来从事作家和记者的职业时又多次到过美国。贝尔弗雷奇于一九三七年秘密加入美共。他向美国移民局递交了加入美国籍的申请，但始终未获批准。在纳粹进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后，他就职于威廉·史蒂芬森 (William Stephenson) 领导下的英国情报机关下属的“英国安全协调办公室”，这是英国情报部门与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之间的联络机关。

伊丽莎白·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供认，一九四二年末，又或是一九四三年初，贝尔弗雷奇在多个场合与格罗见面。她记得是厄尔·布劳德又或是杰罗美 (V.J. Jerome) (美共的一名高级官员) 将贝尔弗雷奇介绍给格罗。本特利回忆道，贝尔弗雷奇曾向格罗提供过一系列从“英国安全协调办公室”得到的情报，既包括有关英国的情报，亦包括美国提供给英国的情报。本特利还说，在格罗去世之后，一九四四年，克格勃要求她与贝尔弗雷奇建立联络，本特利回答说，她只是从格罗那里些许了解到贝尔弗雷奇的活动，但从未直接与之有过接触，贝尔弗雷奇可能会不信任她。根据克格勃的指示，本特利与布劳德联络此事，因为贝尔弗雷奇是通过美共介绍给格罗，而且他提供

的情报布劳德本人也有分享。但是，布劳德拒绝本特利直接联络贝尔弗雷奇的要求，声称贝尔弗雷奇将不再从事间谍活动。后来，在克格勃的一再坚持下，本特利设法搞到贝尔弗雷奇的住址，但是她本人没有联络贝尔弗雷奇，也不知道克格勃是否重新建立起与贝尔弗雷奇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贝尔弗雷奇在盟军驻德国政府工作，后来回到美国，于一九四八年创刊《国家卫士》，此刊连续数年成为左翼“群众阵线”最具影响力的刊物。

一九四七年，联邦调查局就本特利的供词向贝尔弗雷奇质询。贝尔弗雷奇告知联邦调查局，他于一九四二年见过厄尔·布劳德，当时在场的还有另外一个男人，但他不知道此人的姓名，经辨认联邦调查局提供的照片，贝尔弗雷奇承认，此人很像是照片中的约各布·格罗。贝尔弗雷奇还承认，一九四三年他曾与杰罗美见面八至九次，至于会面的目的，贝尔弗雷奇解释说，“是为了尽可能了解共产党人及俄国政治”。贝尔弗雷奇称，为了让杰罗美向他提供更多的信息，他也回答了杰罗美提出的关于英国对待苏维埃联盟的政策问题，杰罗美就此做了笔录。“我向他提供了伦敦警察厅监视工作的情况以及有关法国维奇政府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并没有任何价值，但它们的来源属于绝密。”贝尔弗雷奇自称曾向杰罗美提供伦敦警察厅的监视活动，这一陈述与本特利供词中的内容相符。本特利在供词中提到，贝尔弗雷奇提供的文件中包括英国安全部门的特工工作手册和技巧。贝尔弗雷奇坚称他从来都不是一名共产党人。

联邦调查局对于贝尔弗雷奇的供认存有疑问。贝尔弗雷奇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会有兴趣向杰罗美了解前苏联政治，而杰罗美却是长期从事对美共中知识分子的指导工作，而且贝尔弗雷奇也没有谈及任何他从杰罗美那里获得并令他感兴趣的内

容。贝尔弗雷奇承认，他与杰罗美联络以及将“英国安全协调办公室”的文件提供给杰罗美，均未征得上级批准，也从未将他的行为报告给上级。贝尔弗雷奇明白，根据英国法律，他有可能遭到审判。

根据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联邦调查局的怀疑是正确的，贝尔弗雷奇的确是在撒谎。电文显示，贝尔弗雷奇曾经将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提供给英国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交给克格勃，报告的内容是关于南斯拉夫德拉萨·米哈洛维奇将军领导的反共产主义抵抗武装的活动情况，当时，德拉萨·米哈洛维奇的抵抗武装与铁托领导的共产主义抵抗武装属于竞争中的两股势力。此外，贝尔弗雷奇还向前苏联提供了“英国安全协调办公室”的南斯拉夫专家名单及活动情况；威廉·史蒂芬森与丘吉尔首相会面并商谈英国对第二阵线的政策；“英国安全协调办公室”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前者在美国的一些活动而引发的紧张关系。贝尔弗雷奇向前苏联方面承诺，如果他本人被长期派回英国，他将与前苏联建立秘密联络。此外，贝尔弗雷奇还将他前往伦敦时获得的文件递交给格罗。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在发给莫斯科的密电中没有对这些文件的内容加以描述，只是告知莫斯科，文件已经外交邮袋寄出。根据维诺那计划的文件同样可以证实，布劳德亦分享到贝尔弗雷奇提供给格罗的文件。其中的一封电报写道，贝尔弗雷奇坚持面见布劳德，格罗为此十分恼火。

联邦调查局将贝尔弗雷奇涉嫌参与前苏联间谍活动的情况反映给美国移民局，移民及国籍事务部决定将贝尔弗雷奇驱逐回英国。贝尔弗雷奇为此提出上诉，并公开声明自己是清白的，被驱逐出境的做法无异于政治迫害。然而，一九五五年，贝尔弗雷奇决定主动离境，返回英国。他后来发表了两本著

作：《大国的恐慌：我与美国悬而未决的问题》（The Frightened Giant: My Unfinished Affair with America）以及《美国式清查：1945 - 1960》（The American Inquisition: 1945 - 1960），书中将美国清查前苏联谍报活动视为毫无根据的多疑。

本特利及其单线特工

本特利还向联邦调查局供认了几名单独活动、直接向她汇报的间谍，其中包括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的海伦·坦尼（Helen Tenny），任职“经济战委员会”及其继任机构“外国经济部”工作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以及在“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工作的约瑟夫·格雷格（Joseph Gregg）和罗伯特·米勒（Robert Miller）。“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是白宫在战争期间成立的机构之一，由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领导，负责在中南美洲国家进行经济战、政治宣传以及情报活动。除了在华盛顿有一名研究人员之外，“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在各美国使馆均有代表。

一九四二年，美共及共产国际的元老格雷丝·格拉尼奇（Grace Granich）建议格罗留意海伦·坦尼。海伦·坦尼是一名秘密共产党人，为“战争情报办公室”的签约公司“短波调查公司”工作，负责招募有外语才能的人员。格罗将坦尼招募为线人。但是“短波调查公司”很快便解体，在格罗的鼓励下，坦尼向位于华盛顿的“战略服务办公室”总部求职。坦尼的西班牙语相当出色，一九四二年末，她在“战略服务办公室”的西班牙部获得职位。当时，玛丽·普赖斯返回纽约居住，本特利安排坦尼承租了玛丽·普赖斯在华盛顿的公寓。战争时期的华

盛顿房屋供应十分紧张，这样的安排有助于坦尼获得“战略服务办公室”在华盛顿的职位，而且，这所公寓还可以继续作为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的安全据点。（联邦调查局在传讯普赖斯时，普赖斯否认本特利参与安排坦尼承租她的公寓，声称她自己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坦尼是第一个见到广告来协商的人。）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坦尼使用的化名是“缪斯”。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有一份一九四三年“战略服务办公室”发出的报告，其内容是针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共产党的势力评估。文件上注有机密的标识。窃取这份文件有可能就是坦尼的间谍活动成果之一。

联邦调查局在相信本特利自首的诚意之后，开始对本特利提供的有关前苏联谍报活动的多条线索加以追踪调查，并且在国务院里发现了正安坐其职的坦尼。当年，“战略服务办公室”解散之后，坦尼和另外一位同事侥幸保住工作，一起被调往新成立的国务院研究部门，负责分析美国方面收集的苏维埃联盟情报。联邦调查局要求国务院悄悄地解聘坦尼，并吊销她的护照。坦尼意识到她已经引起怀疑，险些精神崩溃，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前苏联间谍的事情，并且称她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监视起来。一九四七年一月，朋友们将坦尼送进医院。他们都认为坦尼患上幻想狂，却不曾想到，这一切都是真的，坦尼的确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她也是的确是前苏联间谍。

本特利当时正在和联邦调查局合作，联邦调查局认为，如果派本特利去接近坦尼，或许可以从坦尼那里得到一些线索。一九四七年二月初，本特利主动联络坦尼。坦尼显然还不知道本特利已经叛变，她告诉本特利，她已经和前苏联情报部门失去联系有很长时间。与前苏联关系的断绝，再加上她时刻感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就在周围监视着她，坦尼有一种被抛弃的

感觉，但是，她并没有对前苏联流露出任何不满。联邦调查局最终放弃了从坦尼那里获得最新线索的希望。后来，坦尼被联邦调查局正式传讯，她否认曾经为前苏联工作。很明显，坦尼并没有意识到她和本特利几个月前的见面一直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她只承认认识本特利，但本特利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而且她们之间的见面仅限于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间。

坦尼与克格勃的联络于一九四六年中断，证明前苏联已经意识到本特利的间谍网被出卖，于是切断与间谍网中所有成员的联络。通常情况下，前苏联情报机关会向受到影响的成员发出警报，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一次，前苏联未能通知到坦尼。

迈克尔·格林伯格于三十年代在剑桥大学读书时成为秘密共产党人。格林伯格出生于英国，一九三九年移民美国，任《太平洋事务》杂志编辑，这是由“太平洋关系学会”创办的一份著名刊物。然而，格林伯格遭到学会的一位信托人投诉，称格林伯格令杂志带有亲共产主义倾向。一九四二年，格林伯格成为“经济战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兼委员会负责人洛赫林·柯里的助手。（柯里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见第五章）。本特利称，她从未与格林伯格直接接触，格林伯格提供的情报均由玛丽·普赖斯和米尔德里德·普赖斯转交给她。

“民事服务委员会”的安全官员了解到格林伯格的共产党人背景，出于安全考虑，准备将其开除，格林伯格对此发出投诉并获得成功，他那天真的上级否决了安全官员的提议。一九四五年，格林伯格被调往国务院。一九四六年，他接到本特利叛变的警报后辞职。一九四七年，联邦调查局传讯格林伯格。格林伯格承认认识普赖斯姐妹，并在不同的场合与她们见过

面，但否认向她们提供过任何情报。对于伊丽莎白·本特利何以了解他与普赖斯姐妹的关系，格林伯格未做解释。一九四四年，格林伯格成为美国公民，但在接受联邦调查局传讯后不久，格林伯格返回英国。

罗伯特·米勒三世于一九三四年到苏维埃联盟游览，深深地喜欢上莫斯科，于是便留了下来，靠在美国一家报纸担任兼职记者为生。他在莫斯科结识了后来的妻子珍妮·利维（Jenny Levy），利维为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工作，这是一份亲苏维埃的报纸。一九三七年，米勒离开莫斯科，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新闻机构工作。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米勒与国际纵队中的一名美国人杰克·费伊（Jack Fahy）共同成立“半球新闻服务公司”，重点放在拉丁美洲事务。米勒担任公司总裁，费伊任副总裁，珍妮·利维·米勒任秘书。一九四一年，公司迁往华盛顿，约瑟夫·格雷格加入公司，出任经理。西班牙内战期间，格雷格也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国际纵队。米勒的公司使用“出口信息局”的名称，先是成为“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的签约调研机构，后来被“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合并。费伊在此期间被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招募为间谍。

本特利供认，格雷格和米勒都是通过美共介绍给格罗，他们各自单线联络，均不知道对方与克格勃有关。本特利说，格雷格比较活跃，向前苏联提供了美国海军情报、军事情报及联邦调查局对苏维埃和共产党在中南美洲活动的报告。一九四四年末，格雷格被调往国务院，在填写雇用表格时，他隐瞒了曾参加国际纵队的历史。

米勒也于一九四四年被调往国务院，从事苏美外交工作，并被提升为研究及出版部门的助理负责人。可能是因为接到本特利叛变的警报，米勒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辞职。在被联邦调

查局传讯时，米勒承认认识化名“海伦”的本特利，他和妻子曾经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不同场合见到过本特利，并承认与本特利在随意之间谈论过一些秘密信息。米勒的说法与邓肯·李如出一辙，他表示，虽然他曾多次见过本特利/海伦，并与她讨论过机密情报，却从来不知道本特利的姓氏。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克格勃密电中并没有发现格林伯格、格雷格以及米勒的名字。然而，鉴于伊丽莎白·本特利证词中所体现的高度合作的态度，本特利针对这几个人提供的证词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且，在维诺那计划的电文中，有很多的化名尚未挖掘出真实身份，这些人有可能就潜伏在这些化名的背后，比如化名“查尔斯”（他向克格勃提供美国政府关于中国的报告）、“道奇”（负责提供外交情报）、“鹰”、“法可”（提供外交情报）、“哈罗德”、“刺猬”、“霍里斯”、“利维”、“梦想”（提供外交情报）、“芦苇”、“罗伯特”、“维克”、“维他”，还有“白鲨”。根据电文中的内容可以推断，使用这些化名的美国人在向克格勃提供情报，但具体是谁在充当苏维埃联盟的间谍，便不得而知。



高层朋友

伊丽莎白·本特利负责两个谍报网，其成员均是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美国共产党人。谍报网中，珀洛负责在“战争生产委员会”、参议院的重要委员会以及财政部内部为前苏联发展内线。以西尔夫马斯特为首的另一队内线则不仅分布在财政部、“陆军空军部”，还渗透到白宫内部。这些以一个个小组为单位的共产党人多年来早已彼此相熟，经常一起社交，秘密集会探讨党的政策，交付党费，相互帮助在政府内部寻找就职及升迁的机会，一起描述未来，谈论着有朝一日美国也将像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那样完美。

珀洛组织

一九三四年，惠特克·钱伯到达华盛顿与哈罗德·韦尔会面时，“韦尔组织”已经拥有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兼专业人士，维克托·珀洛就是其中最早的成员之一。珀洛的父母早年从俄国移民美国，珀洛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数学学士及硕士文凭。毕业后，珀洛在“国家复兴内阁”任统计工作，一九三五年被调往“联邦房屋贷款银行理事会”。一九三七年，

珀洛前往“布鲁金学院”修读经济学，两年后毕业，于一九三九年重新回到政府部门，就职于商业部。一九四〇年，珀洛被调往另外一个部门，该部门在战争时期被命名为“价格控制办公室”，三年后，珀洛成为“战争生产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一九四五年，随着战争年代设立的机构被解散，珀洛被调往财政部的“货币研究部”，当时的负责人弗兰克·库尔也是一名秘密共产党人。

霍普·戴维斯与赫伯特·富克斯在谈及珀洛时，都称他是三十年代华盛顿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高级成员。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多份克格勃密电中均提到珀洛。四十年代，伊丽莎白·本特利负责的前苏联谍报网中，珀洛是最重要的人物。

本特利供认，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厄尔·布劳德让格罗负责联络华盛顿的一批共产党人，即本特利后来所领导的珀洛分队。格罗与这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人在纽约开过一次会，商讨如何将他们的活动与格罗的间谍武装配合起来。同月，就在第二次会议召开之前，格罗去世。直到此时，本特利没有见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对他们的工作一无所知。

由于本特利一直担任格罗的助手及信使，与格罗的多条渠道沟通，所以，最初的时候，克格勃和厄尔·布劳德都欢迎本特利接替格罗的大部分工作。一九四四年初，布劳德敦促本特利将格罗未尽的事情做下去，与珀洛的人马联络并召开会议。就这样，大概在三月五日，是个星期天，会议举行。

本特利与珀洛的人马在约翰·艾伯特的纽约寓所里会面。艾伯特一直以来担任布劳德与华盛顿秘密共产党人之间的联络人。由于艾伯特的工党律师身份日趋显著，他本人和布劳德都认为有必要中止秘密活动。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解释说，艾伯特在那一次将她介绍给华盛顿的秘密共产党人之后，就再没有

和她的间谍武装有过任何联络。本特利回忆，那一次会议，除了艾伯特之外，珀洛（“战争生产委员会”）、查尔斯·克雷默（“参议院战争动员小组委员会”）、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战争生产委员会”）以及哈里·马道夫（Harry Magdoff）（“战争生产委员会”）全部从华盛顿专程到纽约开会。

经过这次会议，本特利得知，珀洛的组织中还包括唐纳德·惠勒（“战略服务办公室”）和艾伦·罗森堡（Allen Rosenberg）（“外国经济部”）。后来，本特利得知，组织中的其他成员还包括哈罗德·格拉瑟（财政部）、索尔·列辛斯基（Sol Leshinsky）（“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乔治·佩拉兹（George Perazich）（“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报中，有三份克格勃密电证实了本特利的口供。这三份电报分别发自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十三日和五月三十日。克格勃官员依卡·阿米洛夫在密电中报告，格罗去世之后，克格勃方面正在对透过美国共产党人收集情报的运作方式进行重组。格罗同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合作至少从三十年代中期，甚至更早之前开始，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格罗生于俄国，在俄国长大，参加过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前的运动，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如果他对本特利所讲的一切属实，格罗还是“契卡”元老（苏联秘密警察组织）。他的去世打乱了长久以来建立起的合作关系，需要一番重组，重新确认每一个人应该向谁汇报。

阿米洛夫的三封电报初步汇报了珀洛组织的情况。阿米洛夫指出，格罗去世之后，本特利依照布劳德的指示，接管了华盛顿的两个秘密共产党人组织，这两个组织原先向美共汇报。三份电文没有被完全破译，有几段译文显得支离破碎。不过，

有关珀洛组织的内容，电文清楚地写道，本特利是通过约翰·艾伯特的介绍与珀洛组织建立联络。在四月二十七日的电文中，被破译的部分电文显示，珀洛组织成员包括查尔斯·克雷默、维克托·珀洛、查尔斯·弗拉图（Charles Flato）、哈罗德·格拉瑟、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另外还有其他几名未列出姓名的成员。弗拉图是“经济战委员会”的官员，本特利在向联邦调查局提交的供词以及个人回忆录《挣脱束缚》（Out of Bondage）中都没有提及这个人，令人难以理解。本特利或许是不记得弗拉图这个人，又或许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想泄露他。五月十三日的电报加了这样一句补充：“他们都是可靠的同胞（即共产党人），政治上十分成熟，愿意提供情报帮助。”电文中指出，哈里·马道夫也是珀洛组织成员。

在四月二十七日 and 五月十三日的密电之后，艾伯特的名字就再没在电文中出现，从而证实了本特利的供词，艾伯特在将珀洛组织交接给本特利之后便退出秘密工作。本特利提到的珀洛组织的十名成员中（艾伯特、珀洛、克雷默、菲茨杰拉德、马道夫、惠勒、格拉瑟、罗森堡、列辛斯基和佩拉兹），前面七位成员的姓名不仅在这三份密电中出现，还多次出现在其他密电里。

位于第八位的艾伦·罗森堡的名字在克格勃一九四四年发出的一份密电中出现。电文被部分破译，其内容是向莫斯科确认，国务院的文件已经到手，待全文翻译之后将被寄往莫斯科。罗森堡的名字清晰地出现在电文中，显然，就是他提供的这份报告。罗森堡与珀洛成员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华盛顿共产党地下组织刚刚成立的日子。约翰·艾伯特于一九三五年出任“参议院教育和工人委员会”下属“公民自由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律师，他的手下包括有数位秘密共产党人同事，即罗森堡、克雷默和弗拉图。罗森堡后来成为“国家劳工关系委员

会”的法律人员，与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同属于一个秘密共产党人集会的赫伯特·富克斯。国会委员会就这些问题质询罗森堡时，罗森堡均拒绝回答。

在四月份发出的关于珀洛组织的密电中指出，除了这些指出名字的成员外，珀洛组织另外还有两三名成员。本特利名单中的列辛斯基和佩拉兹或许就是其中的两名。在四月二十七日发出的密电中，阿米洛夫全部采用真名实姓，显然，当时还没有为这些人准备化名，只有格拉瑟例外，他在早年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时就有了化名“卢布”。在阿米洛夫发出的第二封和第三封密电中，绝大多数人被赋予化名，而且很容易对号入座：克雷默的化名是“丰满”，菲茨杰拉德是“泰德”，马道夫是“砍特”，珀洛是“袭击”，惠勒是“伊哑拉”。

然而，在阿米洛夫五月十三日和五月三十日的密电中，出现了一个化名“风暴”，其真实身份一直未能被破解。从电文内容可以推断，“风暴”与珀洛组织有关，但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不得而知。“风暴”不像是罗森堡的化名，因为在后来被破译的密电中，罗森堡一路以真名出现。“风暴”也不大可能是指艾伯特，因为艾伯特的真名曾与“风暴”同时出现在五月十三日的电报里。“风暴”有可能是指弗拉图，但是在五月三十日的电报里有一句被部分破译的电文，里面有一个未能完整破译的姓名，姓名的开头是“查 XX”。那一段电文称，查 XX 是另外一位前苏联特工简·福斯特（Jane Foster）的密友，而福斯特在她的自传中将查尔斯·弗拉图称作是那段日子以来的亲密朋友之一。如果“查 XX”就是查尔斯·弗拉图，那么“风暴”就不会是弗拉图。列辛斯基和佩拉兹自然而然地成为“风暴”真实身份的候选人，不过，同时还会有其他的可能性。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可以看到，本特利并没有记住所有与她有联

络的前苏联内线。

“风暴”的另外一个候选人就是约瑟夫·彼得斯。三十年代中，彼得斯担任美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时，曾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及克格勃有过合作，与克格勃官员依卡·阿米洛夫相识。一九三八年，阿米洛夫发给克格勃的密电中，用“风暴”指代彼得斯。通常，情报内线的化名会经常变更，但是克格勃官员的化名则要很长时间才变更一次。彼得斯并非情报内线，而是美共的官员，很有可能他的化名一直都没有变动，况且，一九四四年出现“风暴”字样的两封密电均出自阿米洛夫之手。

一九三八年，钱伯变节之后，彼得斯被撤销美共秘密武装领导人一职，但仍然在美共的中央委员会工作，从事所谓的“秘密任务”，有可能仍然与华盛顿共产党地下组织中没有参与前苏联谍报工作的成员们保持联系。经查阅共产国际的档案，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一九四三年发出的两封信件中提到，该部门的一位官员曾在华盛顿遇到“一批由美共‘中委’（即中央委员会）挑选的从事信息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的领导人是中委成员‘彼得’”。约瑟夫·彼得斯在美国通常被称为“彼得斯”，而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则被称为“彼得”。“信息工作”是前苏联情报部门对秘密情报活动的称谓。前苏联情报部的信件是想向共产国际查询，其官员所遇到的工作人员是否就是共产国际武装成员。从信件内容上看，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是在评估，可否增加利用美共的一个秘密小组为前苏联从事谍报工作。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另外一封信件中提到，其官员巧遇的那批工作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彼得’不满，认为彼得根本不关心他们的信息工作，对于他们提供的信息也毫无兴趣。”这样的抱怨与阿米洛夫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就珀洛组织提交的报告中的观点有相似之处。阿米洛夫在报告中向莫斯科方

面指出，本特利在与珀洛组织第一次开会时，“他们对她抱怨，他们的组织一直受到冷落”。“风暴”的化名只在阿米洛夫一九四四年五月发出的两份密电中出现，而这两份密电的内容都是有关珀洛组织的背景资料，为克格勃启用珀洛组织从事前苏联谍报工作做准备。从此之后，“风暴”就再没出现过。虽然，涉及“风暴”的电文章节未能被全部破译，很难对“风暴”的真实身份下定论，但是“风暴”很有可能就是彼得斯，且彼得斯一直与珀洛组织保持联络，直到该组织被本特利所牵扯的克格勃武装所接管。

在四月二十七日的电文中，阿米洛夫就珀洛组织的背景资料还向克格勃提供了如下信息：“一年多来，‘马克西姆’（朱比林）和我一直努力联络珀洛和弗拉图。但是出于多种原因，‘赫尔思曼’（布劳德）没有出席会议，而是决定委派‘聪明姑娘’（本特利）与珀洛组织联络。如果我们决定和该组织合作，有必要让她退出。”克格勃的确将本特利赶了出去。本特利与珀洛组织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同年年底，根据前苏联的指示，本特利已经断绝和该组织的所有联系。一九四四年期间，本特利的报告中反复提到，她的前苏联联络人，尤其是阿米洛夫，不停地施加压力，要求直接控制珀洛组织，不仅如此，还要求直接控制由格罗一手建立，由本特利接管的所有谍报内线。

本特利只不过担负起一个过渡的作用。在她接管珀洛组织之前，该组织直接向美共汇报，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联络完全透过中间人（布劳德和格罗）进行，而在本特利接管之后，最初阶段，珀洛组织通过她与前苏联情报部门发生联络，最终则完全转型为直接向前苏联情报部门汇报。显然，克格勃有意以最快速度将本特利的中间人作用取消。根据克格勃联络人的

指示，本特利为她所了解的内线成员准备了个人简历，这是削减本特利作为中间人角色的第一步。作为克格勃对招募对象的审核程序，克格勃的费庭将军于一九四四年九月要求共产国际的迪米特洛夫“就下列美国共产党人提供一切可能的资料。1. 查尔斯……弗拉图，一九四三年在‘美国经济战办公室’工作。2. 唐纳德·惠勒……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3. 克雷默，在华盛顿政府机构工作。4.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在‘战争生产委员会’工作。5. 马道夫，在‘战争生产委员会’工作。6. 哈罗德·格拉瑟，目前在海外执行任务。7. 珀洛，在‘战争生产委员会’工作。”

对珀洛组织的调查结果令克格勃感到满意，于是克格勃决定将本特利剔除出去。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本特利秘密会见克格勃驻华盛顿机构的负责人阿纳托利·格罗莫夫，此人接替朱比林的职位，负责克格勃在美国的工作。在本特利的回忆录中对这次谈话是这样记录的：“（格罗莫夫：）我们对于如何协调格罗生前负责的这些线索有了最后决定，显然，你不适宜继续负责这些网络，因为它们的设置中有太多的漏洞，非常危险。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的朋友格罗不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由于你和他的关系，如果继续由你负责这些网络，将会使危险进一步加大。所以，你需要把他们交付给我们，我们会审查每一个人的背景，决定哪些人可以继续留用。”格罗莫夫命令本特利将即将发生的变化通知所有成员，之后本特利将只负责美国船运服务公司。格罗莫夫告知本特利，不久之后，她在美国船运服务公司的工作也会被停止，她将进入一段休眠期。

根据本特利的记忆，克格勃对于格罗网络最关注的问题在于，其运作远远不能适应正在飞速向专业化发展的安全机制。克格勃的这一担心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得到体现。一九

四四年十月，克格勃的一份密电中指出，由格罗和本特利负责的另外一个间谍网，即规模超过珀洛组织的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间谍网，对于克格勃提出准备将该间谍网分散成规模较小的不同组织，并纳入克格勃直接领导的提议表示反对。阿米洛夫向莫斯科方面抱怨道，西尔夫马斯特的态度很不幸地说明，格罗“流传下来的作风根深蒂固”。

事实上，克格勃方面的立场和思路都是无可挑剔的，只不过本特利未能适应间谍工作的特殊游戏规则。格罗、本特利以及其他特工一直以来同时肩负起美共政治活动以及前苏联间谍活动的双重角色，不停地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毫无保留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亦从不隐瞒各自的政治观点。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美国政府的决策人对于前苏联间谍活动尚无动于衷，联邦调查局尚无力调遣有限的资源打击前苏联谍报活动的情况下，格罗等人这种非职业化间谍手法未曾引发严重后果。然而，克格勃担心，如此轻松的时代即将结束，需要将安全工作推向更高层次的职业化水准。

然而，在向职业化方向过渡期间，克格勃没有很好地处理本特利的问题。本特利曾经与约各布·格罗陷入爱河，一九四三年末，格罗的去世带给本特利沉重打击，本特利惟有将全身心投入到格罗留给她的工作中去，而这样一丝寄托又在一九四四年底被克格勃剥夺。一九四五年，本特利在美国船运服务公司的工作亦被中止，这是最后，也是惟一能够让她感受到格罗的存在的生活，从此也化为乌有。本特利彻底绝望了。一九四五年夏末，本特利感觉到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她，她害怕被捕，再加上失望的折磨，本特利最终决定自首。克格勃为了建立更加安全的谍报体系而将本特利剔除出局，其后果却导致本想严加保护的谍报网被彻底曝光。

珀洛组织的间谍活动

珀洛组织的间谍活动究竟发展到怎样一种地步始终未能找到答案。本特利从内线那里收集文件和报告，通常都不会阅读，也很少留存记录或是副本。她在向联邦调查局自首时，对于收集到的情报只能提供大致的描述，只对极少数情报特别留有印象。她向联邦调查局供认，她与珀洛组织成员的见面地点在玛丽·普赖斯的公寓，大家将材料当面交给她。她记忆中的情报包括一份飞机生产备忘录（珀洛提供），“战略服务办公室”情报摘要以及由“战略服务办公室”保存的国务院电文副本（惠勒提供），占领德国计划（罗森堡提供）。列辛斯基虽然也是珀洛组织成员，但在本特利接管期间没有提交过任何情报。佩拉兹则通过珀洛提供过有关南斯拉夫的情报。本特利认为，在佩拉兹代表“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前往南斯拉夫期间，克格勃曾派人与他接触。

对于珀洛组织提供的情报，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报中有更明晰的记录，但都只是提纲挈领，至于更为详尽的大量内容则通过邮件寄出。毕竟，在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与莫斯科总部之间的往来密电中，维诺那计划所破译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涉及珀洛组织的电文中所列举的情报与本特利的回忆相吻合。以惠勒为例，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期间，他向前苏联提供的情报就包括英国情报部门的组织架构及政策。“战略服务办公室”与英国情报部门有着密切往来，而在当时，前苏联一直将英国情报部门视为比美国情报部门更为强劲的对手。在“战争生产委员会”飞机生产部门担任经济学家的珀洛，将飞机生产的数据以及美国通过海运送往战争前线的物资情况提供给前

苏联。他提供的情报还包括美国在生产第一架，同时也是属于高度机密的喷气式战斗机的喷气引擎时遇到的困难以及美国军方与负责民事事务的政策决策人之间就经济物资分配问题发生的争执。

查尔斯·克雷默：国会助理兼间谍

三十年代，美共地下组织中的许多成员都曾是全国委员会成员。马里恩·巴克拉克（Marion Bachrach）（约翰·艾伯特的妹妹）是最早加入韦尔组织的成员之一，曾经担任国会成员约翰·伯纳德（John Bernard）的首席助理。约翰·伯纳德于一九三六年作为“农民工人党”成员在明尼苏达州当选一任国会成员，而他本人也是一名秘密共产党人。查尔斯·克雷默的身份不仅限于地下共产党人，他同时还是前苏联间谍。在查尔斯·克雷默的生涯中，他曾经为全国委员会中四个不同的委员会工作，包括三十年代就职的“参议院公民自由小组委员会”，“参议院战争动员小组委员会”，“参议院战争时期健康及教育小组委员会”以及战后的“参议院工人及公共福利委员会”。除此之外，查尔斯·克雷默还参与具体职能部门的工作，包括“农业调整内阁”，“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以及“价格控制办公室”。

克雷默的这些职位都是通过美共地下组织中其他成员的协助获得。艾伯特将克雷默招入“参议院公民自由小组委员会”，内森·威特（韦尔组织的另外一位元老）协助克雷默得到“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职位，“价格控制办公室”的维克托·珀洛则专门为克雷默的工作表现写评语，并将他列为推荐雇用者的名单。在这段时期，克雷默一直以自由民主政治的忠诚支持者及积极分子的形象出现在公开场合。一九四四年，克雷默为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工作，一九四六年协助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候选人埃利斯·帕特森（Ellis Patterson）参加竞选。在本特利的供词中曝光之后，克雷默放弃民主党，改为进步党工作，更加鲜明地表达他的激进立场，但他从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

维诺那计划的电文显示，克雷默在“参议院战争动员小组委员会”工作时，向前苏联提供的情报包括美国政策决策人就美国应对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采取怎样的态度所产生的分歧，以及美国政府内部对德国与美国公司之间关系的调查。罗斯福总统去世之后，克雷默向克格勃提供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内部政治情报，包括杜鲁门总统将对国务院领导班子的调整，以及与克雷默有过接触的几位参议员对杜鲁门的评价。

哈罗德·格拉瑟：慎重的斯大林主义者

哈罗德·格拉瑟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虽然不属于最高层，但也是一位极其重要的当权派。他于一九三六年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加入财政部，一九三八年末升任“货币研究部”助理部长。一九四〇年，格拉瑟被财政部和国务院派往厄瓜多尔，担任厄瓜多尔政府的经济顾问，一直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之后，格拉瑟一直担任战争时期各机构的高层负责人，而且职位一路上升，包括“战争生产委员会”副主席，美国驻北非部队的经济顾问，美国财政部驻“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代表，财政部在意大利的“联盟高级专员公署”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格拉瑟随即出任一九四七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外交部长级会议美国代表团的经济顾问，以及出席世界银行理事会会议的财政部部长的经济顾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格拉瑟辞职

时已经是财政部下属国际金融办公室助理负责人。

格拉瑟辞去政府公职时，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John Snyder）为他写了洋溢着赞美之辞的推荐信，向格拉瑟求职的雇主确认，“他的个人品质一向光明磊落，完美无瑕”。然而，斯奈德在这个问题上大错特错。格拉瑟在政府部门一路飞黄腾达的同时，他始终是一名秘密共产党人及前苏联间谍。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一份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于一九四四年发出的密电，电文中称，“哈罗德·格拉瑟是一位老同胞。”“同胞”是克格勃对共产党人的统一称谓。但至于格拉瑟的党龄究竟有多长，没有人知道。一九四七年，格拉瑟被联邦调查局传讯，他只承认曾经在三十年代时对共产主义产生过一点兴趣。后来，格拉瑟在宣誓之后再次被问及共产党人身份问题时，他拒绝予以回答。

一九三七年，格拉瑟曾以美共地下组织中值得信赖的成员身份与惠特克·钱伯发生过接触。当时，钱伯领导的间谍网络中有一位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内线，就任财政部“货币研究部”助理部长。钱伯认为，怀特提供的情报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低于预期。钱伯回忆道，他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上级鲍里斯·拜科夫“大发雷霆”，认为怀特本可以提供更多情报。然而，怀特不是共产党人，他只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虽然他愿意同前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但有自己的定规，无须像共产党人那样无条件地遵从指令。钱伯就这个问题与约瑟夫·彼得斯进行商讨，彼得斯于是将哈罗德·格拉瑟调到钱伯的谍报网。当时，格拉瑟作为美共秘密组织成员并没有与前苏联情报部门发生任何关系。格拉瑟当时已经在财政部工作了两年，是财政部的经济学家。钱伯让格拉瑟调查，怀特究竟可以接触到哪些类型的情报。格拉瑟的报告指出，就其所知，怀特已经将他所

能接触到的重要情报全部提供给钱伯。这项任务完成之后，钱伯便中断与格拉瑟的联络，对于格拉瑟在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活动一无所知。

历史学家艾伦·文森坦的手中有一份文件可以清楚地证实格拉瑟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这是一封克格勃外国情报部负责人帕维尔·费庭写给克格勃组织的总负责人维斯沃罗德·美科洛夫（Vsevolod Merkulov）的备忘录，要求对长期为克格勃服务的特工“鲁伯”予以嘉奖。经维诺那计划破解，“鲁伯”正是哈罗德·格拉瑟。费庭向美科洛夫提出，鲁伯/格拉瑟自一九三七年五月开始为前苏联情报部门效力，主要为克格勃工作，时而也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费庭备忘录中提到的一九三七年刚好和钱伯的陈述吻合。

费庭在备忘录中解释道，格拉瑟曾前往海外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执行任务，但是在颁发苏维埃嘉奖时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对于靠精神力量支撑的特工们，苏维埃颁发的勋章是一种莫大的荣誉。）费庭指出，“‘军事’邻居（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一批特工最近被颁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勋章。鲁伯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从他的朋友及这批特工的负责人阿列斯（即阿尔杰·希斯）那里得知这个消息。”费庭提议，鉴于格拉瑟为克格勃做出的重大贡献，而且仅仅“因为他被调回我站（即克格勃），鲁伯（即格拉瑟）未能和阿列斯的成员一起获得勋章”，克格勃应考虑向格拉瑟颁发红星奖章。

在维诺那计划的档案里，一九四三年七月，格拉瑟两度在克格勃密电中出现，当时，他正担任美国驻北非部队的经济顾问。这两份密电只被部分地破译，其内容大概是关于已经征询过格拉瑟对尤金·丹尼斯，又或是对丹尼斯从事的活动的看法，也有可能是确认已经将丹尼斯想转告给格拉瑟的信息传达给格

拉瑟。丹尼斯是美共的领导人之一，一九四六年成为美共的总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丹尼斯也参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与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及“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的秘密共产党人保持联络。

格拉瑟引起伊丽莎白·本特利的注意是在一九四四年中，当时，格拉瑟刚刚完成战时财政部在意大利的任务后返回美国。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供认，是维克托·珀洛通知她，已经恢复与格拉瑟的联络。珀洛向本特利解释，在本特利接手该组织之前，格拉瑟就已经是该组织成员，只不过被调离执行前苏联的另外一项任务。如今，任务已经完成，格拉瑟希望能再次与珀洛成员合作。本特利说，珀洛并不知道格拉瑟被调离之后为哪个谍报网工作，其领导人是谁，但查尔斯·克雷默曾经告诉本特利，格拉瑟之前参与执行任务的谍报网由阿尔杰·希斯负责。本特利的说法与费庭同美科洛夫之间的通讯内容相呼应。

格拉瑟回到珀洛组织后不久即被派往海外执行财务部的另一项任务，他返回时，克格勃已经直接领导珀洛组织，本特利的工作被局限于美国船运服务公司。因此，本特利并不了解格拉瑟在这段时期执行什么间谍任务。不过，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几封电文中，可以对格拉瑟的活动有所了解。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发出的一封密电中指出，格拉瑟的主要任务是发掘新秀。格拉瑟报告说，同年四月，财政部委派一名年轻律师乔赛亚·杜波依斯（Josiah Dubois）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前往莫斯科出席“联盟赔偿委员会”会议。格拉瑟表示，已经和杜波依斯建立“极为亲密的伙伴关系”，尽管杜波依斯不是美共成员，但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格拉瑟称，他已经提醒过杜波依斯，在表达左翼观点时尽量

“谨慎”，并且强调，他与杜波依斯的个人关系相当好，任何信息，“只要问他，通常他都会提供”。

一九四五年六月，克格勃发出三封密电，汇报格拉瑟提供的情报，包括国务院对苏维埃战争所造成损失的评估，国务院对一家芬兰公司隐藏纳粹金融资产的报告，“战略服务办公室”关于纳粹的黄金经瑞士银行调遣的报告。同年六月发出的第四封电报中，格拉瑟称，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为高级法院的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法官提供咨询，他刚刚成为该委员会成员。罗伯特·杰克逊法官是“联盟战争犯罪”特别法庭中的美国方面成员。

虽然格拉瑟是一位称职的经济学家，但他在财政部的平步青云仍得益于渗透到财政部内部的秘密共产党人的提携。他在财政部的事业生涯中，有很多次的晋升及工作表现评定由共产党人同事弗兰克·库尔和威廉·厄尔曼做最后裁定。他的升迁及工作表现评定同样得到财政部“货币研究部”助理部长，后来的财政部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支持。和格拉瑟一样，弗兰克·库尔、厄尔曼及怀特都在与克格勃合作。安全官员曾经发现格拉瑟身为共产党人的证据，同样依靠这个秘密关系网，格拉瑟才得以化险为夷。一九四一年，财政部的调查部门“秘密安全部”提交的报告中称，有证据显示，格拉瑟涉嫌共产主义运动。如果这份报告真的发生作用，格拉瑟后来为斯大林情报部门所做的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然而，这份报告落到哈里·怀特的手上，于是，完事大吉。

消除珀洛组织隐患

一九四七年，联邦调查局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珀洛组织成

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间谍活动，但是当局方面认为证据尚不够充足，无法让他们受到法律制裁，目前惟一可行的做法是让珀洛组织成员再没有机会从事破坏美国利益的活动。对于那些仍留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成员，联邦调查局将调查结果通告给有关官员。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没有人遭到公开解聘，被涉及的组织成员有的主动提出辞职，也有的因为职位被取消而失去工作。珀洛失去在“货币研究部”的工作，马道夫和菲茨杰拉德辞去在“商业部”的职位，克雷默离开了“参议院工人及公共福利委员会”，格拉瑟也被迫离开在财政部的高级职位。此后的许多年，珀洛一直拒绝承认他的共产党人身份，在被国会委员会质询时，拒绝回答有关美共成员的任何问题，声称他只是“尽微薄之力，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下，实施伟大的新政计划”。然而，一九八一年，珀洛抛开新政自由派的形象，公开以美共的全国领导人的身份出现。一九九一年，美国共产党分裂为两派，一派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派则支持戈尔巴乔夫试图将苏维埃共产主义民主化的做法。珀洛作为美共全国委员会成员，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他痛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背信弃义”，是“背叛”的行为。

珀洛组织的成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原因是由于一些关键性证据无法作为法庭上的证据，而能作为证据公开的又不足以量刑定罪。不过，根据莫斯科的档案，特别是维诺那计划提供的证据，他们的罪责是显而易见的。

西尔夫马斯特组织

虽然珀洛组织成员向前苏联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但是与西尔夫马斯特的组织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同珀洛组织

一样，西尔夫马斯特组织也是最初通过约各布·格罗，后来通过伊丽莎白·本特利向前苏联汇报。

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供认，一九四一年夏末，格罗委派她与一个间谍网络建立关系。该网络原先一直向美共直接汇报，但是由于纳粹入侵苏维埃，美共无法继续从事间谍工作。这个谍报网由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领导，辅佐他的是他的妻子海伦以及和他们同住在一起的好朋友威廉·厄尔曼。本特利主要与西尔夫马斯特和厄尔曼联络，由他们通过多条内线收集情报，之后交与本特利。该组织的其他成员，本特利很少有机会见面，有些人甚至从未谋面。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包括所罗门·阿德勒、威廉·泰勒（William Tylor）、乔治·西尔弗曼、弗兰克·库尔、威廉·戈尔德（William Gold）、索尼亚·戈尔德（Sonia Gold）、欧文·卡普兰（Irving Kaplan）、诺曼·贝斯勒（Norman Bursler）、洛赫林·柯里、阿纳托尔·沃尔科夫（Anatole Volkov）以及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

本特利供认，她经常前往华盛顿收集情报，有时候一个月去一次，有时候一个月两次，直到一九四四年前苏联直接控制西尔夫马斯特组织。由于收集的材料源源不断且越来越多，厄尔曼不得不购置一部高质量照相机，并在西尔夫马斯特的住处建了一间暗室，以便将情报拍照记录，无需再用人手抄写。本特利说，最初的时候，她收到情报后转交给格罗，再由格罗交给前苏联。后来，本特利开始直接与克格勃联络，递送文件。格罗去世后，克格勃反复向她本人及布劳德施压，要求直接控制西尔夫马斯特组织。最初，本特利和布劳德并不情愿这样做，但是一九四四年中，布劳德终于首肯克格勃的要求，交接工作进行了数个月。

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有八十五份被破译的克格勃

密电中提到本特利所供认的西尔夫马斯特组织成员。在本特利提供的十四个名单中，有十一人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出现，包括西尔夫马斯特夫妇、厄尔曼、乔治·西尔弗曼、弗兰克·库尔、戈尔德夫妇、贝斯勒、柯里、阿德勒及怀特。卡普兰、泰勒及沃尔科夫的名字从未在维诺那计划的电文中出现。

有一个未曾破解的化名“伊”多次和西尔夫马斯特组织成员的名字共同出现在维诺那计划的电文中，但是很难确认“伊”究竟是某一位内线的化名，亦或是协助克格勃官员依卡·阿米洛夫管理西尔夫马斯特组织的助手的化名。阿米洛夫的妻子海伦·劳里（Henry Lowry）是一名间谍助理，她的化名是“伊莎”，“伊”或许是其化名的缩写。还有一个未曾被破译的化名“土尔”，和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及厄尔曼的名字同出现在一份电文里。同样，我们无从考证“土尔”是否代表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中的一名成员，亦或是代表一名单独向克格勃汇报的内线，且此人刚巧和西尔夫马斯特组织的成员汇报同一内容，即英美联军进攻法国南部的日期被延迟。

本特利涉及她与西尔夫马斯特组织关系的供词，在多份被破译的克格勃电报中得到印证。有数份电报提及，西尔夫马斯特组织成员获得的情报通过联络人格罗转交给前苏联情报部门。首次提及本特利代替格罗充当联络人的电文发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格罗去世之后。虽然电文内容只是部分地被破译，但大意是说，本特利与厄尔·布劳德见过面，表示将会“继续工作”——估计是要继续格罗的工作。一九四四年二月，克格勃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汇报，由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提供的情报将通过本特利交与阿米洛夫。有数份密电表达了阿米洛夫对本特利的不满，认为本特利在拖延阿米洛夫直接控制西尔夫马斯特组织计划的实施，并且提到，一九四四年中，布劳德

同意由克格勃接管西尔夫马斯特组织，因此导致本特利的不满。

一份发自纽约的电文提到，西尔夫马斯特组织提供了五十六卷胶卷，克格勃已用外交邮袋寄出。本特利交代说，她每次去西尔夫马斯特夫妇家，至少可以拿到两三卷胶卷，有一次甚至多达四十卷。克格勃的电文中称，这些胶卷共涉及十七份窃得的美国文件，包括“经济战委员会”官员针对德国和远东的报告，罗斯福总统关于对法国租赁政策的备忘录以及相关的“租赁委员会”对法国和意大利制定的租赁计划，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关于存放在西班牙的德国资产的报告，对德国工业组织架构的分析，对美国军事工业生产能力的分析，美国方面试图瓦解纳粹政党的计划。后来，西尔夫马斯特在华盛顿的居所出售时，广告上特意注明，该居所有一间设备精良的摄影暗室。

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拥有上层朋友的间谍

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一八九八年出生于俄国，一九一四年到达美国。他就读于华盛顿大学，是该校的杰出学生，于一九二〇年获得哲学学士学位。西尔夫马斯特秘密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人。诗人肯尼斯·雷克劳斯（Kenneth Rexroth）在《自传小说》一书中记录了他在西雅图参加激进运动时的感受，并特别提到，新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原来是华盛顿大学一位十分出色的哲学学生。虽然雷克劳斯并没有写出此人的姓名，但是他所描述的细节完全符合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一九二六年，西尔夫马斯特成为美国公民，随后继续进修经济学，于一九三二年获得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

位，他的学位论文题目是《十月革命之前的列宁经济思想》。一九三五年，西尔夫马斯特受聘成为“安置委员会”的经济学家。这是新政时期成立的机构，隶属农业部。一九三八年，西尔夫马斯特被调往“美国海事工人委员会”，一九四〇年前往“农业安全内阁”（其前身是“安置委员会”），一直工作到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四年末，西尔夫马斯特被调到财政部下属“战争财产部”，一九四五年，西尔夫马斯特随全体部门先被调往商业部，后与“重建金融公司”合并为“战争财产公司”。

一九四二年，西尔夫马斯特虽然名义上还是“农业安全内阁”的雇员，但是他利用谍报武装的关系网将自己调往“经济战委员会”。然而，这一调动引起“海军情报办公室”及战争部所属反间谍部门的反对。虽然这两个部门缺乏确凿证据证明西尔夫马斯特参与间谍活动，但是双方都相信，西尔夫马斯特是隐藏在政府内部的共产党人，对于涉及美国情报信息的部门是一个潜在威胁。

西尔夫马斯特声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都没有将共产主义作为信仰，请求战争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否决安全部门的反对意见。西尔夫马斯特同时要求潜伏在政府内部的其他共产党人兼前苏联间谍向帕特森施压。哈里·怀特当时任职财政部助理部长，他向帕特森表示，对西尔夫马斯特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怀特是斯大林政权的秘密崇拜者，并通过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与前苏联合作。总统助理洛赫林·柯里也在和前苏联情报机关合作，他亲自致电帕特森，强烈要求重新考虑西尔夫马斯特的问题。“农业安全内阁”负责人，西尔夫马斯特的上级卡尔文·勃德温（Calvin Baldwin）也对西尔夫马斯特投赞成票。勃德温虽然不是间谍，但他是秘密共产党人。面对众多高层人物为西尔夫马斯特的事情出面，

帕特森决定相信并且遵从他们的意见，回绝军事反间谍部门的建议。他的天真举动成全了这个斯大林间谍渗透到美国政府内部规模最大、情报产量最高的谍报网中成为领导人，更加为二战后的共和党人提供了大量事实，得以肆意谴责罗斯福政府及杜鲁门政府的高层官员协助前苏联间谍破坏美国利益。

西尔夫马斯特组织成功地左右战争部副部长的意见，说明美国的内部安全程序一直以来存在沟通上的漏洞。军事反间谍部门掌握的不利于西尔夫马斯特的证据并不充分。然而，无论是海军情报部还是陆军情报部都不知道，西尔夫马斯特早已因为与克格勃官员盖卡·奥瓦金米安（Gaik Ovakimian）的联络而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奥瓦金米安在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一年期间负责前苏联谍报工作，对外身份是前苏联贸易部官员。帕特森在权衡柯里和怀特对西尔夫马斯特的关注与支持时，他也并不知道，一九三九年，惠特克·钱伯提供给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的情报中已经涉及柯里和怀特三十年代时曾与美共在华盛顿的地下组织有过合作。

西尔夫马斯特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在一九四二年画上句号。虽然他在“经济战委员会”工作，但雇用关系仍留在农业部。农业部下面的人事部和“民事服务委员会”并不对帕特森负责，它们在一九四三年联合联邦调查局再次对西尔夫马斯特发出质询。西尔夫马斯特的那些身处高位的朋友们亦再一次出面干预。洛赫林·柯里向联邦调查局强调，对西尔夫马斯特加入共产党的怀疑丝毫没有根据。虽然惠特克·钱伯已经告知伯利，柯里于一九三九年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然而联邦调查局尚未看到伯利的记录。不仅如此，联邦调查局好像对海军及陆军反间谍机关在此之前曾经调查过西尔夫马斯特的事情也一无所知。联邦调查局的单方面调查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此事最终

不了了之。一九四四年，西尔夫马斯特在“经济战委员会”任期满（此时，“经济战委员会”已被并入“外国经济部”）正在寻求新的职位。虽然农业部的安全部门并未采取任何对西尔夫马斯特不利的行动，但西尔夫马斯特的安全问题一直是一团阴影，挥之不去。怀特和柯里再次插手。农业部副部长保罗·阿普利比（Paul Appleby）给他下属的备忘录中写道：

前几天，财政部的哈里·怀特与我洽谈公务，之后，他问我是否可以给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安排个职位。西尔夫马斯特在“农业安全内阁”工作多年……“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对西尔夫马斯特有些负面意见，想必主要是因为他出生在俄国，又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尤其以工人阶级经济学家的形象出现。西尔夫马斯特本人极为聪明，又是哈里·怀特和洛赫林·柯里的密友，我们没有理由对他的信仰发生怀疑，应该相信他是一名好公民。

阿普利比的陈述并不准确。“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对西尔夫马斯特的质疑在于他是否隐瞒共产主义信仰，而并非因为他的出身或是职业。然而，阿普利比又不像是在撒谎。他本人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他的想法完全出于他的轻信，很轻易地便被柯里和怀特这样不择手段的人操纵了。阿普利比的备忘录将他的天真以及他对柯里和怀特的过度信任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西尔夫马斯特很快便回到农业部。不过没过多久，怀特便在他所在的财政部下属“战争财产部”为西尔夫马斯特觅得一个更好的职位。

一九四三年，洛赫林·柯里向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报告，

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传讯，追查西尔夫马斯特是否支持共产主义运动。谍报网将这一消息转告给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进而上报给莫斯科。根据联邦调查局向柯里及西尔夫马斯特本人所提问题的内容及性质，克格勃断定，美国方面只是在怀疑西尔夫马斯特信仰共产主义，并没有发现他在从事间谍活动。克格勃决定，西尔夫马斯特可以继续政府部门的工作，只是需要严加小心。事实证明，克格勃的分析是正确的。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提供的供词中写道，阿米洛夫试图说服西尔夫马斯特，将其谍报网中的几条主要内线交由克格勃直接控制，然而，西尔夫马斯特一直持反对态度。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证实了本特利的说法。有数份电文提到，阿米洛夫一直在敦促西尔夫马斯特将庞大的间谍网络重组成一个个小组，并由克格勃直接控制其中的几名成员。在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给莫斯科的密电中，阿米洛夫形容西尔夫马斯特对这项提议的反应是“妒火中烧”，认为此举是在“侵占”他的武装。阿米洛夫表示，“任何想要直接调遣组织成员的做法，无论如何审慎……都将引起罗伯特（即西尔夫马斯特）的反感”。

阿米洛夫一直努力向西尔夫马斯特阐明克格勃意见的明智之处，但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西尔夫马斯特能够创立如此规模的间谍网并一路经营到如今的状况，的确令他人望尘莫及。他提醒莫斯科方面，“我们（即克格勃）能否取得与西尔夫马斯特同样的成绩，还是个问号。”阿米洛夫还特别举例说明他的观点。在财政部有两名雇员，威廉·戈尔德和索尼娅·戈尔德，夫妇俩均是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的“见习人员”。“见习人员”是克格勃内部对所有非克格勃职业官员的特工们的称谓。虽然戈尔德夫妇对共产主义怀有满腔热情，但是个性反复，难

以驾驭。阿米洛夫称，“如何管理这对夫妇以及其他的见习人员，西尔夫马斯特为此付出巨大心血。在他们心目中，西尔夫马斯特是美共的领导人，因此他下达的指令容易被接受。”阿米洛夫特别强调，由于这些特工的全部热忱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执著，西尔夫马斯特的美共地下组织领导人的身份增加了他的权威性，有助于他的指令得到贯彻执行。“我们的人（即克格勃官员）很难拥有美共旗帜的号召力。”

阿米洛夫反复向西尔夫马斯特解释，将谍报网拆散为数个规模稍小一些的组织完全是出于安全角度考虑，并非针对西尔夫马斯特的领导地位，他将仍然“保留统领权”。

伊丽莎白·本特利在供词中写道，海伦·威特·西尔夫马斯特（Helen Witt Silvermaster）也是她丈夫领导的谍报网中的积极分子。海伦承担了大量的抄写任务，并且从不同的内线那里收集情报，亲自交给本特利。和她丈夫一样，海伦也生于俄国，一九二三年移民美国，一九三〇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海伦与西尔夫马斯特结婚，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海伦与前夫育有一子，名叫阿纳托尔·沃尔科夫。沃尔科夫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偶尔在西尔夫马斯特的谍报网肩负通信员的职责。后来，沃尔科夫应征入伍，从此退出谍报工作。海伦的化名“多拉”曾在被破译的克格勃密电中出现。根据电文可知，海伦对西尔夫马斯特的谍报工作相当了解，是一名得力助手。一九四七年，海伦被联邦调查局传讯。她声称自己从未信仰过共产主义，并且抱怨说，“如今，任何人只要有自由化观点，就被当作是共产党人。”海伦承认与本特利相识，承认她们经常见面，本特利还在她的家中过夜。海伦坚称，她一向只知道本特利是“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发言稿撰稿人，负责为美国政府官员的公开讲话收集资料。

根据被破译的维诺那密电，为了表示对西尔夫马斯特辛勤工作的嘉奖，克格勃定期向西尔夫马斯特支付报酬，一九四四年又支付了一笔三千美元的奖金。这封电文没有被完全破解，电文中好像提到，鉴于西尔夫马斯特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贡献，授予他苏维埃勋章。阿米洛夫汇报，“根据指示，已向罗伯特（即西尔夫马斯特）颁奖，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与自豪。他表示，从事这项工作是他一生中最明智的选择，并且强调，这并不是他个人的荣誉，而是他的组织中全体成员的荣誉，他想亲眼目睹勋章和证书。”

在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提供给前苏联的大量情报中，根本无从分辨哪些情报由西尔夫马斯特本人提供，哪些则来自他的下属成员。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总共有六十一份电文涉及西尔夫马斯特提供的情报，情报内容包括来自“经济战委员会”的大量关于武器、飞机、坦克、大炮及船舶的生产数据；“经济战委员会”对德国工业的分析报告及美国的人力、食品和原材料储备的报告；美国外交电报，特别是涉及美国正在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商谈的问题的电报简介及副本；“战略服务办公室”涉及方方面面问题的报告；对美国政府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权力斗争的分析，特别是美国国务卿赫尔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英国在希特勒战败后如何看待巴尔干问题的分析以及二战后美国军事规划文件。西尔夫马斯特亦根据克格勃特别要求的内容搜寻情报。例如，在克格勃发出的一份电报中就提到，西尔夫马斯特已经根据克格勃的要求搜集到美国不同型号轰炸机和战斗机的技术及维护手册。威廉·厄尔曼当时在五角大楼陆军空军部总部工作，这些情报有可能就是由他提供的。

威廉·厄尔曼：好友间谍

一九〇八年，威廉·厄尔曼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富有家庭。一九三二年，厄尔曼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一九三五年到达华盛顿，在“国家复兴内阁”工作。也就是在那一年，他结识了西尔夫马斯特。一九三八年，厄尔曼与西尔夫马斯特合资买下一所住宅，从此西尔夫马斯特夫妇与厄尔曼一直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直到一九四七年遭到政府驱逐。之后，三个人搬去新泽西州，在那里合伙成立一间建筑公司。

一九三七年，厄尔曼被调往“安置委员会”（即后来的“农业安全内阁”）。一九三九年，在财政部下属“货币研究部”工作的哈里·怀特雇用了厄尔曼。“农业安全内阁”助理卡尔文·勃德温在推荐信中给予厄尔曼很高的评价。厄尔曼在财政部的顶头上司是弗兰克·库尔。怀特后来向联邦调查局承认，他是鉴于老朋友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的推荐，决定雇用厄尔曼。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勃德温本人也是一名秘密共产党人，他和怀特、弗兰克·库尔及乔治·西尔弗曼同为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成员。厄尔曼在怀特办公室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之后应征入伍，在陆军空军部执行任务。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供认，乔治·西尔弗曼当时是陆军空军部的文职官员，在他的安排下，厄尔曼得以到乔治·西尔弗曼所在的五角大楼总部工作，这样，厄尔曼可以继续同西尔夫马斯特住在一起，并继续从事谍报工作。一九四七年，厄尔曼被联邦调查局传讯。他承认是乔治·西尔弗曼将他安排在五角大楼工作。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厄尔曼的化名“飞行员”及“唐纳德”在二十四封密电中出现，显然，他是一名重要谍报内线，同时又是协助西尔夫马

斯特管理谍报网的搭档。卸掉军职之后，厄尔曼返回财政部，在另外一名前苏联间谍哈罗德·格拉瑟手下工作，直至一九四七年被迫悄悄辞职。

乔治·西尔弗曼：连接高层内线的纽带

乔治·西尔弗曼在美共地下组织中的根基十分深厚。三十年代中，霍普·黑尔·戴维斯和丈夫加入美共地下组织时，西尔夫马斯特就已经是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五年初，霍普的丈夫赫尔曼·布兰卡在一篇经济学论文中指出，新政的改革成效正在显现。美共是在一九三五年底才转入“群众阵线”的阵营，支持罗斯福总统，而在一九三五年初，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赫尔曼的观点极其错误，在一次地下组织会议上遭到乔治·西尔弗曼的强烈抨击。

惠特克·钱伯也是在三十年代中与乔治·西尔弗曼相识。身为秘密共产党人，乔治·西尔弗曼是钱伯负责的谍报网的联络人。钱伯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时，曾经将一批昂贵的布卡拉地毯分发给他的谍报网领导人，乔治·西尔弗曼也在其中，此外还有阿尔杰·希斯、哈里·怀特和朱利安·沃德利。（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初，前苏联情报机关时兴在新年时向特工们分发礼物，同时也作为圣诞节的奖金。）钱伯解释说，这些地毯经海运抵达美国，先被送往乔治·西尔弗曼的住处，然后再派发给有关人士。钱伯说，乔治·西尔弗曼是怀特的好朋友，他在谍报网中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怀特的合作。根据钱伯的回忆，属于怀特的那张地毯是由西尔弗曼亲自送去的。

乔治·西尔弗曼后来承认，他与钱伯相识于三十年代，但只是泛泛之交。西尔韦曼还承认，从钱伯那里收到两张地毯，

但那是因为钱伯向他借过七十五美元，于是想以物抵债。根据乔治·西尔弗曼的说法，他当时付给钱伯三百美金，并将那笔债务一笔勾销。但是，西尔弗曼提供不出钱伯向他借钱的字据或是他向钱伯支付地毯价钱的收据。

三十年代，西尔弗曼在政府的多个部门任职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其中包括“国家复兴内阁”、“关税委员会”以及“铁路退休委员会”。虽然他是美共地下组织的积极分子，并且协助钱伯负责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挂钩的谍报网，他本人在政府部门的职位却无法接触到重要情报。一九四二年，这样的情形得到改观，乔治·西尔弗曼被调往陆军空军部，成为“空军物资及服务部”助理部长办公室文职主管，负责分析及规划工作。之后，他将威廉·厄尔曼调入自己的部门。乔治·西尔弗曼化名“副翼”，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可以看到，西尔弗曼向克格勃提供了美国飞机生产与分布以及飞行员的培训与供给等方面的报告。

虽然乔治·西尔弗曼提供的情报对于前苏联具有重大价值，但前苏联情报机关委派给他的最主要的工作是确保与哈里·怀特和洛赫林·柯里两位高层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供认，虽然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和怀特与柯里也建立起亲密关系，但在谍报网中，乔治·西尔弗曼一直是这两个人最主要的联络人。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最高层间谍

在斯大林渗透到美国政府内部的所有内线中，身为财政部助理部长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官职最高的间谍。怀特于一九三四年进入财政部。作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十分擅长

将复杂的货币政策问题深入浅出地解释给在学术方面并不精通的政策决策人，从而成为财政部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有一本内容翔实的日记，从中不难看出，在三十年代后期，怀特对摩根索的政策理念影响之大，无人能出其右。

怀特在财政部一路平步青云，一九三八年升任“货币研究部”部长，一九四一年出任财政部助理。一九四四年，怀特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共同创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协议”具有划时代意义，奠定了数十年来国际上通用的货币政策。一九四五年，怀特坐上财政部第二把交椅，升任财政部副部长。一九四六年，杜鲁门总统任命怀特为“国际货币基金”美国方面负责人。“国际货币基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机构之一。怀特本可以升得更高。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就任美国副总统，并且是一九四八年的总统候选人。他曾对传媒表示，怀特是他心目中财政部部长的第一人选。如果罗斯福总统迟一年去世，如果在一九四四年大选时华莱士的总统候选人资格没有被撤换，华莱士本可以成为美国总统。

惠特克·钱伯称，三十年代，怀特之所以备受情报机关的重视，完全是因为他的才干与潜力，事实上，他并没有向钱伯负责的美共及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谍报网提供太多情报。怀特当时刚刚在财政部崭露头角，而且，当时的财政部并不涉及前苏联感兴趣的情报。钱伯指出，怀特并非美共成员，他只是凭自己的想法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合作，没有责任必须要执行某一特定命令。

虽然三十年代的怀特并没有向钱伯提供过多的情报，但他毕竟是一条情报线索。一九四八年，阿尔格·希斯控告钱伯

谤，钱伯于是将他在一九三八年藏匿的一批文件及微缩胶片公布于众，其中的大部分是由希斯提供的情报，但有一篇长长的备忘录是出自哈里·怀特之手。

钱伯后来在书中写道，在他停止为前苏联从事情报工作之后，他曾与几位主要内线碰面，力劝他们立即停止活动，希望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信仰，至少，为了避免暴露身份要停止情报工作。伊丽莎白·本特利听说，在钱伯背叛之后，怀特的确中止了情报工作。西尔夫马斯特曾经对本特利说，怀特“在三十年代曾经向前苏联提供情报，但是，一九三八年，他的联络人背叛后，他立即中断活动。”不过，西尔夫马斯特对本特利解释说，怀特在一九四〇年重新恢复与美共华盛顿地下组织的联系。

怀特协助前苏联间谍活动的另外一个方式是为数名前苏联谍报人员提供在政府任职的机会。在怀特任职财政部期间，财政部内最具实权的官员当中，至少有十一名前苏联间谍，包括弗兰克·库尔、哈罗德·格拉瑟、路得维格·厄尔曼（Ludwig Willmann）、维克托·珀洛、索尼亚·戈尔德、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乔治·西尔弗曼、欧文·卡普兰、威廉·泰勒以及所罗门·阿德勒。在西尔夫马斯特和格拉瑟的安全背景遭到审查时，怀特还利用职权出面干预。

一九四一年，怀特成功促使中国国民党任命迟照庭（译音）为财政部高级官员。迟照庭于北京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于一九二六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直到一九四一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成员。二十年代末，他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担任翻译，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迟照庭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三十年代在美期间，他用“韩苏昌”、“冬平”、“黄路易”及“王福田”等笔名为《工人日报》、《美亚》等刊物撰稿。然

而，迟照庭的共产党人身份一直是秘密的。

一九四〇年，迟照庭前往重庆，当时，北京被日本军队占领，重庆成为临时首都。共产国际的档案中记录，同年八月，毛泽东通知乔奇·迪米特洛夫，迟照庭已经和毛泽东派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见面。毛泽东请迪米特洛夫转告厄尔·布劳德，迟照庭将返回美国，任务有三：其一，招募日裔美籍共产党人，以便打入侵占中国的日军内部，从事间谍活动；其二，利用美国共产党员船员，以香港为枢纽，将中国共产党同日本、菲律宾及美国的共产党组织联系起来；其三，负责以美共中国政治局的名义向海外华人募捐，资助中国共产党。然而，迟照庭返回美国后停留时间十分短暂。在怀特的运作下，迟照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于一九四一年回到重庆，成为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官员。从此，迟照庭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从内部瓦解蒋介石政府。一九四九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迟照庭留在大陆，公开了其长期以来的共产党人身份，成为毛泽东政府的高级官员。

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间，十五份被破译的克格勃密电中涉及到怀特或其提供给前苏联情报官员的情报。在密电中，怀特向前苏联就如何迫使美国政府放弃对波兰流亡政府（波兰流亡政府属于敌视斯大林势力）的支持提出建议，并且向前苏联确认，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试图吞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立陶宛的行为，美国的决策人虽然公开反对，但暗地里采取默许的态度。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成立大会，怀特是美国代表团的高级顾问。在谈判制订联合国章程期间，怀特与前苏联情报人员秘密会面，透露美国方面的谈判策略。他向前苏联保证，“只要能确保会议成功，杜鲁门和斯退丁纽斯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怀特建议前苏联外交官坚决要

求拥有对联合国行动的否决权，并且称，美国“终将会同意”。怀特同时提供了很多策略性建议，指点前苏联如何粉碎或削弱美国及英国政府抢在前苏联之前获得的利益。与怀特见面的前苏联官员甚至准备了一份问卷，罗列了前苏联外交官想要了解的美国方面的谈判策略，怀特一一予以详细解答。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克格勃向莫斯科汇报，称西尔夫马斯特从怀特的妻子特里·安·怀特（Terry Ann White）那里了解到，怀特有意转去私人公司任职，目的是想为即将上大学的女儿筹措学费。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西尔夫马斯特认为，克格勃“应该非常乐意予以援助，因为不可以让他们离开‘卡萨奇’（即华盛顿）。罗伯特（即西尔夫马斯特）认为，理察得（即哈里·怀特）不会接受定期支付报酬，不过有可能接受我们出于感激而送上的礼物 [未破译电文]，他女儿的学费每年大约两千美元。艾伯特（即阿米洛夫）对罗伯特表示，我们会同意负担理察得女儿的学费。”克格勃驻纽约机构批准了阿米洛夫的承诺，之后提交给莫斯科方面做最终决定。（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没有发现莫斯科方面的最终决定。）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可以看到，西尔夫马斯特对于克格勃方面经常越过他直接与怀特联络表示强烈不满，但是克格勃方面对西尔夫马斯特的抗议置之不理。怀特接触的范围不仅包括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人，而且直接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官员联络。从一封一九四四年八月发出的密电中可以得知，同年七月，一个化名“科斯托夫”的克格勃官员与当时化名“法学家”的哈里·怀特曾经当面会晤。密电中写道：

有关进一步合作的方式问题，法学家表示，他的妻子愿意随时做出牺牲。他本人虽然并不顾及个人安全，但是

为了避免政治丑闻，避免对其他成员不利，他仍需要十分审慎。他问，是否可以〔未破译电文〕与我们合作。我建议他最好不要。法学家没有一个适合做固定接头地点的公寓，他的朋友全部都是家里的亲戚，他建议可以轮流在各家住处会面，并且可以不定期地在他的汽车里谈话，每次不超过半小时。

除了从事间谍活动之外，怀特还曾试图左右美国的政策向着有利于共产主义利益的方向发展，这样的企图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其中的例子之一就是在对前苏联战后重建实施贷款的问题上，怀特试图发挥他的影响力。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要求美国以极优惠的百分之二点二五的利率向其提供长达三十年的六十亿美元贷款。一个星期之后，身为财政部副部长的怀特说服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建议罗斯福总统，向斯大林提供数额更大、更加优惠的贷款，即利率为百分之二，还款期长达三十五年的一百亿美元贷款。在美国政府内部，向苏维埃提供贷款的事宜属绝密范畴，至少美国的政府官员是这样认为。然而，怀特作为贷款事宜的重要参与者，却在一九四五年一月，通过数封密电将白宫方面对此事的态度以及他本人和摩根索的意见通报给前苏联。由于罗斯福总统和国务院均不赞成战后贷款，此建议被否决。试想，如果贷款建议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前苏联的谈判代表将会获得渗透在美方谈判对手内部的领导层的指点，前苏联将在谈判中拥有怎样的优势。

怀特试图左右政府政策的另外一个实例体现在对中国的黄金贷款方面。一九四二年，美国国会决定向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提供五亿美元贷款。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要求其中的两亿

美元贷款以黄金的形式运送到中国。中国当时处于战争时期，国内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严重损害了国内经济，国库增加黄金储备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避免经济崩溃。罗斯福对于这项黄金贷款予以认可，一九四三年七月，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向中国政府签发信件，同意运送黄金。

怀特则在弗兰克·库尔（“货币研究部”负责人）和所罗门·阿德勒的协助下，对运送黄金的计划表示反对。他们借口国民党内部腐败，而且未采取金融改革措施，提供黄金贷款并不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并一次次地争取到摩根索的支持，推迟黄金运送日程。一九四五年七月，黄金贷款已经生效两年，而运送到中国的黄金价值只有两千九百万美元，在此期间，中国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飞涨到百分之一千，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再加上一九四五年底，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爆发国内战争，国民党政府的地位被根本动摇。

怀特、弗兰克·库尔和阿德勒的观点并没有错，国民党政权内部的确腐败成风。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一半，中国的主要生产性地区沦陷为日本殖民地的情况下，怀特等人一再强调货币改革的重要性，根本只是一种托辞。他们只围绕着如何提供其他援助方式消磨时间，将黄金运送的时间一拖再拖。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原本支持推延黄金运送计划的摩根索才幡然醒悟，原来他在最关键的问题上被蒙蔽了双眼。他对弗兰克·库尔、怀特及其他人表示，他们“将他置于一个极不光彩的位置，我认为这个错误是无可原谅的”。然而，摩根索只认为他的下属在处理黄金运送问题上存在失误，从未想过他们会另有企图。

一九三九年，惠特克·钱伯向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提供的秘密共产党人名单中包括有弗兰克·库尔。弗兰克·库

尔的化名“山峰”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四份密电中出现，其中只有一份密电提到弗兰克·库尔提供的情报。那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由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的密电，通知莫斯科方面，由弗兰克·库尔提供的五卷胶卷已经寄出。密电中称，这些文件是有关美国租赁计划的报告以及美国同英国的谈判情况。

怀特于一九四六年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美国方面负责人，他很快为弗兰克·库尔寻觅了一个职位。一九四七年，联邦调查局传讯弗兰克·库尔，弗兰克·库尔否认参与前苏联间谍活动，否认支持共产主义，并否认与任何共产党人有过联络。一九四八年，弗兰克·库尔接受“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的质询，并否认本特利供词中有关其从事间谍活动的所有陈述。从一九四七年开始，美国政府部门采取非解聘方式，逐一清除在政府内部任职的前苏联间谍，弗兰克·库尔由于当时在“国际货币基金”工作，职位暂时得以保留，直到一九五〇年才被排挤出政府部门。自一九四八年遭到传讯之后，不利于弗兰克·库尔的证据日渐丰富，为避免因伪证罪遭到起诉，弗兰克·库尔改变策略，援引当事人可以拒绝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的法律规定，拒绝回答大部分问题。一九五六年，弗兰克·库尔再次被传讯。他否认参与间谍活动，但是对于具体问题，包括他与美共的关系问题，弗兰克·库尔再次拒绝回答。一九五八年，弗兰克·库尔彻底投奔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的政府里工作。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展开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一九五九年，弗兰克·库尔为“整风运动”撰写文章，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运动中得以净化，将极大地提高经济生产水平。

所罗门·阿德勒作为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的成员，其化名“萨哈”曾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出现，并提供有关中国

方面的情报。本特利只记得阿德勒曾在二战期间在中国驻扎过一段时间，除此之外的情况，本特利一无所知，她甚至不记得曾经与阿德勒见过面。一九四七年末，阿德勒被联邦调查局传讯时承认，他曾经在一个社交场合经路得维格·厄尔曼介绍，见过本特利，当时，海伦·西尔夫马斯特也在场。阿德勒否认自己支持或参与共产党的活动。阿德勒当时就任财政部高级职位，联邦调查局本想将他解雇，但是鉴于不利于阿德勒的证据远远少于其他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的成员，阿德勒得以在他的职位上工作到一九五〇年，直到联邦调查局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向财政部证实阿德勒的间谍身份，阿德勒才被迫悄悄辞职。阿德勒已经拥有美国护照，他先去了英国（阿德勒出生在英国，一九三六年成为美国公民，并于同年就职美国政府部门）。阿德勒在海外漂泊三年多，直到他的美国护照过期，从此失去美国国籍。

五十年代期间，阿德勒曾经移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一名移民中国的美国共产党人西德尼·里顿勃格（Sidney Rittenberg）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九六〇年，阿德勒、弗兰克·库尔和他本人合作将毛泽东的著作翻译成英文。一九八三年，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刊物证实阿德勒曾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长达二十年，该部门的职能之一便是从事外国情报工作。毛泽东政府里有一位名为陈恨深（译音）的高级官员，此人从三十年代末开始，一直在美国从事情报工作，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役取得胜利。在中国发行的陈恨深回忆录中有一幅照片，阿德勒作为陈恨深的同事出现在其中。陈恨深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他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联络人期间，他的对外身份是《太平洋事务》的杂志编辑，以及“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研究员。

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美国共和党人抨击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称政府内部的一小撮秘密共产党人将“中国拱手送给”共产党。怀特、弗兰克·库尔及阿德勒在中国黄金贷款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共和党人指控的把柄之一。共和党人的指控因党派纷争有其夸大的方面，毛泽东能够夺得中国的政权，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内部的原因。国民党的黄金贷款受阻只是成就共产党胜利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怀特、弗兰克·库尔和阿德勒只是扮演了几个小角色。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是雇用了弗兰克·库尔和阿德勒，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们两个人均在中国度过余生，弗兰克·库尔于一九八〇年在中国去世，阿德勒于一九九四年在中国去世。

洛赫林·柯里：白宫助理兼前苏联间谍

哈里·怀特和阿尔杰·希斯是前苏联渗透在美国政府内部职位最高的两名内线，洛赫林·柯里的政府职位仅次于两人之后，排在第三位。柯里出生于新斯科舍，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之后前往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一九三四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柯里成为政府雇员，在财政部的“研究与统计部”与哈里·怀特成为同事，后来被调往“联邦储备委员会”。

一九三九年，柯里被调入白宫，担任总统的高级行政助理，从而结束学术性职位。当时，白宫刚刚开始考虑增加工作人员，总统助理只有寥寥数人，行使的权力十分显赫。一九四二年，柯里被派往中国达数月，身份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以及美国驻国民党政府经济师团负责人。一九四三年，作为“租赁内阁”一部分的“经济战委员会”与其他几个战争时期成立的机构合并，共同组建“外国经济部”。柯里被从白宫借

调到“外国经济部”担任副部长，负责日常工作。他集总统助理及“外国经济部”部长的双重职务于一身，是战争时期的华盛顿极有实权的人物。

柯里与华盛顿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中期。钱伯在回忆录中指出，柯里与哈里·怀特一样，只是地下组织的追随者，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人。阿道夫·伯利在一九三九年会见钱伯的笔记中写道，柯里与地下组织合作，“但并非完全听从地下组织的指挥”。本特利也指出，柯里与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的合作十分谨慎，而且完全按照他自己的准则做事。本特利记得，柯里从不提供文件，只提供口头情报，通过乔治·西尔弗曼和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转达给前苏联。本特利说，阿米洛夫曾敦促西尔夫马斯特，由克格勃直接同柯里联络，但是遭到西尔夫马斯特的拒绝。本特利记得，柯里曾经提醒前苏联，美国的密码分析员即将破解前苏联的外交电报，显然他指的是维诺那计划。本特利对于柯里的特别印象还在于，柯里曾在安全调查问题上帮助过西尔夫马斯特，并帮助数名前苏联情报人员在政府部门谋到职位。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九份密电提到化名“书页”的柯里。从密电内容可知，正如本特利所说，柯里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合作十分审慎而且有限。克格勃的密电证实，柯里也曾提供过文件给克格勃，对此，本特利可能并不了解，也可能是她忘记了。一九四三年八月由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的密电通知莫斯科，柯里提供了一份有关某个政治问题的备忘录。文件来自国务院，其内容没有在电文中出现。一九四四年六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再次通过密电汇报，柯里提供了两条情报，其中之一是罗斯福总统为什么与戴高乐保持距离，另外一条情报则对斯大林至关重要。柯里知会前苏联，罗斯福总统

愿意接受斯大林的要求，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保留根据一九三九年纳粹—苏维埃协定所获得的波兰一半的领土，并将向波兰流亡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向苏维埃妥协。美国在公开表态时一向支持波兰流亡政府，在一九四四年总统大选之前，罗斯福总统以个人名义向波兰裔美国人民表示，将会支持波兰人民。柯里的情报让斯大林明白，他可以不顾及美国的公开立场，在波兰问题上不做重大让步。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亦证实了本特利的说法，克格勃的确试图直接联络柯里。一九四五年二月，莫斯科克格勃总部致电在美国的官员，要求他们向阿米洛夫和西尔夫马斯特了解，“我们能否直接接触‘书页’（即柯里）。”根据电文内容可以感受到，莫斯科方面已经开始感到不耐烦。克格勃外国情报部门负责人费庭将军于同年三月通知驻纽约官员，要求从柯里那里得到更多的情报。费庭承认，“书页信任罗伯特（即西尔夫马斯特），不仅向他提供口头情报，还提交文件”，这再一次证实，柯里的确向前苏联情报部门提供文字情报。然而，费庭表示，“在我们看来，到目前为止，书页与罗伯特的关系只限于泛泛表达个人的赞同观点。〔未破译电文〕需要更加深入的关系，让书页更多地了解罗伯特的工作。如果罗伯特不能让书页成为我们的人，他〔未破译电文〕向书页询问他与罗伯特关系的深入程度。”

费庭对克格勃驻纽约站的指责是不公平的，因为较早前的电文已经证明，柯里并非只是口头上赞同地下组织，他亦有提供情报。但是，从费庭的这封密电可以看出，前苏联方面原本指望柯里能做得更多。费庭的电报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发出，这是“国家安全局”破译的最后一封与柯里有关的密电，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没有反应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对费庭的密

电如何答复。不过，有其他方面的证据证明，莫斯科方面要求越过西尔弗曼和西尔夫马斯特直接与柯里联络的指示最终得以执行。一九四五年末，本特利自首之后，联邦调查局开始对本特利的前苏联上司、克格勃官员阿纳托利·格罗莫夫进行调查。格罗莫夫的对外身份是前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外交官。一九四六年二月，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罗列了格罗莫夫与柯里之间的几次会面。一九四七年，联邦调查局传讯柯里。柯里承认在一九四五年初曾与格罗莫夫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格罗莫夫的住处，一次是在他自己的住处。一九四五年六月，柯里辞去政府公职之后又曾与格罗莫夫见面两次以上。柯里表示，他与格罗莫夫的会面主要探讨文化话题，并否认知道格罗莫夫克格勃官员的身份。多年之后才发现，柯里还曾在一九四三年与格罗莫夫的前任瓦西里·朱比林会面，朱比林当时的身份也是前苏联外交官。白宫的记录中显示，柯里与朱比林的会面有堂而皇之的理由，会面的时间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与那封俄文“匿名信”（详见第二章）中提及的时间相符。在匿名信中，一位前苏联克格勃官员称，朱比林“在白宫办公室高层设有内线”。

联邦调查局质询柯里，是否曾向乔治·西尔弗曼透露，美国的密码破译人员即将破解前苏联密电。在本特利的记忆中，这是柯里提供的情报内容之一。柯里的回答很是特别。他声称，他不记得曾经特别向乔治·西尔弗曼提到破译前苏联密码的事情，不过他和乔治·西尔弗曼是相当要好的朋友，有可能在不经意中讲起这件事。柯里还承认，他有可能因为不小心而透露过其他内部消息。显然，他是在试图用疏忽为自己的间谍行为辩护。

随着联邦调查局掌握的证据日益充足，“疏忽”一词早已不足以为柯里的行为辩护。例如，一九四一年初，“援助中国

华盛顿委员会”计划为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受难者募捐。委员会邀请保罗·罗宾逊（Paul Robeson）在募捐音乐会上演出，音乐会的赞助人包括受人尊敬的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共和党人、宾西法尼亚州州长吉福德·品考特（Gifford Pinchot）的夫人科尼莉亚·品考特（Cornelia Pinchot），以及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然而，品考特夫人和罗斯福夫人未曾料到，“援助中国华盛顿委员会”实际上为美共所控制。直到音乐会召开前几天，她们才得知，此次募捐只有一半经费提供给中国，另外一半则提供给“国家黑人会议”。“国家黑人会议”亦为共产党秘密领导，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曾根据纳粹—苏维埃协定的要求，大肆抨击罗斯福总统。

品考特夫人和罗斯福夫人在发现自己被人利用之后，要求音乐会必须根据原定计划举行（即将全部募捐提供给中国），否则她们将不再担任赞助人。洛赫林·柯里身为“援助中国华盛顿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时刻出面，劝说两位夫人为了避免发生争端，同意只将一半的募捐基金提供给中国。两位夫人拒绝了柯里的建议，她们发表公开声明，取消对音乐会提供赞助。只有在了解柯里与美共的特殊关系之后，才能明白，身为罗斯福总统助理的柯里何以会有如此异常的举动。

联邦调查局缺乏足够的直接证据对柯里提出刑事诉讼。本特利与柯里的联络通过乔治·西尔弗曼和西尔夫马斯特进行，她本人无法指控柯里。即便本特利可以出庭作证，她的证词也不足以为柯里定罪。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本可以为指证柯里提供直接证据，但维诺那计划属于绝密，其文件不可以在法庭上公开。

一九四八年，“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再次传讯柯里。柯里可能意识到联邦调查局手中只握有本特利提

供的间接证据，于是一改一九四七年接受联邦调查局传讯时的防卫策略，改用更为激进的策略。他否认一切渎职的可能性，并且声称，他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的好朋友及同事西尔夫马斯特、乔治·西尔弗曼、厄尔曼、弗兰克·库尔和格拉瑟是共产主义支持者。柯里称，他过问战争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的决定是受一位官员的委托，至于这位官员的姓名，他已经记不清，而且，他也并未要求帕特森一定按照他的意愿去做决定。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白宫助理，与帕特森这一级别的官员谈论某位雇员的安全问题是“例行公事”。柯里的这一狡辩显然不合逻辑。作为总统的六位行政助理之一去过问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件反常的事情。可惜，在“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中，只有一名成员对柯里的这一漏洞加以抨击。

“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中一位最保守、最敢于发表意见的民主党代表、来自密西西比的约翰·兰金(John Rankin)却是站在柯里一边。兰金是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他坚信充当奴役已经是上帝对非洲裔美国人的仁慈，而他尤其深恶痛绝犹太人。兰金认为，新政、自由主义、种族平等以及共产主义全部是犹太人的阴谋。共产主义如果不是和犹太人有关，根本不会引起兰金的注意。他认为斯大林有反犹太主义的倾向，因此偶尔甚至会赞美一番斯大林。就在本特利证实柯里通过乔治·西尔弗曼和西尔夫马斯特向她及前苏联提供情报之后，兰金认为本特利“是在借用被她遥控的两名共产党人诬蔑柯里”。兰金完全相信乔治·西尔弗曼和西尔夫马斯特是共产党人，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不相信本特利对柯里的指控，因为柯里是苏格兰人，他的种族决定了他不可能被共产主义迷惑。

然而，到一九五〇年，柯里日益感觉到朝不保夕。联邦调查

局搜集的证据越来越多,维诺那计划的电文进一步证实了本特利的说法。同年夏末,柯里移民哥伦比亚,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数年后,柯里放弃美国公民身份。

本特利背叛

虽然伊丽莎白·本特利自己觉得联邦调查局的人在步步向她逼近,但事实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本特利主动自首之前,联邦调查局对她一无所知。本特利的这一举动究竟是出于真心叛变,还是因为患有幻想狂?在经过几次详细审讯并且调查了本特利提供的部分线索之后,一九四五年秋,联邦调查局确信,本特利确实曾经从事间谍活动。

在本特利自首之前,联邦调查局收到一封由凯瑟琳·珀洛发出的信件,对一些人提出指控,而这些人名在本特利的证词中亦有出现。凯瑟琳于一九三三年与维克托·珀洛结婚,一九四三年两人离婚。万念俱灰的珀洛夫人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向罗斯福总统发出匿名信,称她的前夫以及其他一批秘密共产党人在三十年代的华盛顿从事地下活动。联邦调查局根据这封信找到凯瑟琳,凯瑟琳承认这封信出自她的手笔。除了她的丈夫珀洛,凯瑟琳提供的名单里还包括乔治·西尔弗曼、约翰·艾伯特、查尔斯·克雷默、哈罗德·格拉瑟、哈里·怀特、赫尔曼·布兰卡、霍普·布兰卡(即霍普·黑尔·戴维斯)以及亨利·科林。

就在克格勃接管本特利的谍报网,中断她与情报内线的联络,让她转入休眠期之后的六个月后,本特利叛变。一旦本特利被取消联络人的资格,如果她再试图与从前的内线联络,内线便会视之为警报,愈发地小心谨慎。联邦调查局对于本特利提供的内线进行了广泛监视,希望能够取得他们与前苏联特工联络

的证据后诉诸法律。然而,一九四五年末,就在联邦调查局开始着手监视本特利提供的内线时,前苏联方面好像已经怀疑到他们的谍报网已被出卖,向所有内线发出警报,要求他们停止一切活动。

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发现,确实有一名介于本特利原有内线与前苏联机构之间的联络员正在替克格勃向谍报网成员发出警报,通知他们停止一切联络。本特利的谍报网络中,最先被置于联邦调查局监视下的是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一九四五年一月,联邦调查局特工发现,有一名男子与西尔夫马斯特夫妇见面长达数小时之久。在跟踪此人返回纽约的途中,联邦调查局更加重了对此人的怀疑,原因是“他曾采用多种反跟踪手段,跟踪人员认为,他是在试探是否有人跟踪。”联邦调查局经调查确认,此人名叫亚历山大·科罗(Alexander Koral),是一名共产党人,在纽约市学校系统任维修工程师。

联邦调查局在几年前监视盖卡·奥瓦金米安时就遇到过科罗。奥瓦金米安是前苏联贸易部官员,一九三三到一九四四年在美国工作。在纳粹—苏维埃协定签署及二次大战爆发之后,一直忽略前苏联谍报活动的美国政府才有条不紊地开始间谍清查工作,从而发现奥瓦金米安的情报人员身份。一九四一年五月,奥瓦金米安被捕。联邦调查局希望奥瓦金米安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国务院与前苏联经协商后达成协议,允许奥瓦金米安离开美国,以换取被前苏联禁止离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六名美国公民及家属的离境自由。奥瓦金米安实际上是克格勃驻美国的总负责人,但是联邦调查局当时并不了解他的真实职务。在监视奥瓦金米安的过程中,联邦调查局发现,他曾多次与科罗见面。虽然联邦调查局没有任何证据在手,但是前苏联的一名情报官员与校区的一名维修工之间的谋面通常总会有些

非正大光明的原因。

一九四七年,科罗被联邦调查局传讯,他供认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他一直担任秘密通信员。科罗解释说,他从一个名叫弗兰克的人那里得到两千美元作为交通费用,前往不同的城市,从不同的人那里收取或递送小型包裹及信件,其中就包括西尔夫马斯特。科罗供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他与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见面,也就是遭到联邦调查局监视的那次会面,他将雇主托他转告给西尔夫马斯特的口信告知西尔夫马斯特,“再不会有人去探望他。”或许,这就是克格勃在本特利叛变之后决定与原谍报网中断一切联络的口信。

通过照片辨认,科罗指证,他曾经向克格勃驻纽约官员塞姆扬·塞米诺夫递送邮件,塞米诺夫当时的身份是前苏联贸易部官员。然而,科罗的招供只是一种战略性退让,他害怕联邦调查局在监视中已经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索兴如实招认。接下来,他要确保他所招认的内容不至于带给他刑事上的责任。因此,他隐瞒了自己与美共的关系,显然,他自以为联邦调查局并不了解他的共产党员背景。科罗强调,他对所递送的包裹及信件的内容一概不知,他纯粹是为了挣些外快而打些零工,并声称,他通过这项工作所接触的人们好像在从事与政府战争合约有关的秘密生意。

通过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可知,科罗和他的妻子实际上是克格勃下属的一对夫妻档通信员。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科罗的化名“伯杰”,他妻子海伦·科罗的化名“米兰达”和“艺术”都曾在十一份密电中出现。密电显示,一九四五年,克格勃向他们每人每月支付一百美元的酬劳。包括海伦·科罗(又或是包括科罗夫妇两个人在内),共有三名通信员专门负责从西尔夫马斯特夫妇那里收集资料,并充当以外交官身份做掩护的克格

勃官员奥尔加·瓦伦天那·科普卡娃(Olga Valentinovna Khlopkova)及克格勃非法官员依卡·阿米洛夫之间的联络员。通常,科普卡娃都是同海伦·科罗或是阿米洛夫的妻子海伦·劳里见面。克格勃认为,女人之间的会面更加容易让人觉得好像是普通的社交活动,不像男人间的见面容易引起联邦调查局的警觉。

在迈克尔·斯特雷特(Michael Straight)向联邦调查局提供的供词中,也提到亚历山大·科罗为克格勃充当联络人的工作。斯特雷特是美国一位富有的自由党人,其父亲是《新共和》杂志的创始人。一九三四年,斯特雷特在剑桥大学读书,一九三五年加入英国共产党,并且同剑桥大学的艺术专家兼克格勃的招募人安东尼·布伦特建立友谊。一九九八年公开的前苏联文件中,有一份布伦特写于一九四三年的报告,称他“一方面要尽力避免自己给人以左倾印象,另一方面又要与左翼学生保持密切联络,以便为我们发掘可招募的人材,要协调二者的平衡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已经落实的招募人选包括迈克尔·斯特雷特以及……”。在回忆录《长期沉默之后》(After Long Silence)中,斯特雷特对当年的情形做了描述。一九三七年初,布伦特要求他放弃公开的共产党人活动,返回美国,利用他的家庭关系从事华尔街银行家的事业,与此同时,秘密为共产党工作。斯特雷特表示,他对经商没有丝毫兴趣,希望留在英国,成为英国公民。他与布伦特的对话记录如下:

“我们的朋友经过反复考虑……他们要我告诉你,你必须这样去做。”

“我必须去做什么?……什么朋友要你告诉我……”

“我们在国际的朋友。共产国际的朋友。”

根据斯特雷特的回忆,布伦特当时向他保证,会考虑他的不满。一个星期后,斯特雷特再次与布伦特见面,并被告知党的决定。“如果我不想成为银行家,他们可以接受。但是我的其他想法被拒绝。我必须返回美国,必须进行地下工作……这就是讨价还价后的结果,我决定接受。”于是,斯特雷特开始在公开场合疏远共产党员学生。在他离开英国之前,布伦特将他介绍给一个“矮小结实,长着黑发的俄国人”,那个人教授给他一些从事间谍工作的技巧。

依靠家庭的关系,斯特雷特有机会面见罗斯福总统和夫人,探讨他的事业问题。一九三七年,斯特雷特被国务院雇用,担任助理的工作,但是没有薪水。一九三八年末,他获得一份有薪水的工作,出任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名义上属于内务部雇员。一九三九年,他在这个职位上与罗斯福总统的首席撰稿人及几位政治顾问詹姆斯·罗(James Rowe)、汤姆·科科兰(Tom Corcoran)以及本·科恩(Ben Cohen)密切合作。一九四〇年,斯特雷特重返国务院,成为欧洲部的正式雇员。然而,一九四一年,斯特雷特离开国务院,前往《新共和》任职,直到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

一九三八年,前苏联一名自称迈克尔·格林的特工与斯特雷特联络。在随后的四年时间里,斯特雷特偶尔与格林见面。其中有几次见面时,斯特雷特将他在国务院和内务部亲自撰写的备忘录及报告交给格林,不过,斯特雷特说,这些材料里并没有重要内容。迈克尔·格林是一个假名,是克格勃驻美国非法负责人依卡·阿米洛夫的化名之一。

在间谍术语中,“合法”的情报官员是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的情报人员。在前苏联大使馆或是其他被认可的前苏联政府部门,例如前苏联贸易部,工作的克格勃官员均为“合法”官员。虽

然他们的外交身份及贸易官员的身份只是一种掩护,而且他们经常采用假名,但他们在美国的公开身份是前苏联官员,他们在美国活动被认为是得到认可的前苏联活动。例如瓦西里·朱比林,他的对外身份是前苏联大使馆的外交官,因此是一名“合法”官员。而像阿米洛夫这样的“非法”人员则是典型的间谍小说中的谍报人员,他们没有外交身份,与前苏联政府部门没有官方联系,使用假身份,甚至连国籍都是假的。

根据“俄国外国情报部”编写的传记,依卡·阿布杜拉维奇·阿米洛夫生于一九〇一年。一九一九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后不久他加入共产党,他的才能很快得到赏识,于一九二一年被党组织送往共产主义大学就读,后被送往莫斯科大学攻读国际关系。毕业后,阿米洛夫即加入克格勃工作,先是在国内安全部协助镇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中亚共和国的反苏维埃运动。一九三二年,阿米洛夫被调往外国情报部,以驻土耳其外交官的身份做掩护,成为合法的情报官员。一九三四年,阿米洛夫成为非法的情报官员,利用假证件前往中国,并在美国人开办的学院里进修英文,为执行下一项任务做准备。一九三五年,阿米洛夫持假证件到达美国,居住长达十年之久,并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担任克格勃非法情报站负责人。“俄国外国情报部”的传记中对阿米洛夫的生平充满赞美之辞,盛赞他“从国务院、财政部及情报部门招募数名特工”,获取了“政治、科技及军事方面的重要情报”。一九四五年,阿米洛夫返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为克格勃外国情报部下属的非法分支的负责人,被晋升为上校,并多次获得奖章,包括“荣誉奖章”,两枚“红旗勋章”以及“荣誉契卡人”称号。

曾经与阿米洛夫接触过的美国人一致认为,阿米洛夫的英文虽好,但是有口音,能很明显地听出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所以,阿米洛夫通常以美国移民的身份出现。他用过的部分笔名外界有所了解,但至于他利用怎样的假身份证件以及他的对外职业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美国的反间谍官员有线索显示,阿米洛夫有可能以从事男子服饰生意为掩护。阿米洛夫居住在美国东岸,有可能是在纽约,有报告称,他在彻底离开美国前不久曾搬去巴尔的摩。阿米洛夫之所以秘密返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可能是担心本特利的叛变引发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追查,但也有说法认为,他离开美国是出于身体原因。

迈克尔·斯特雷特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经和格林/阿米洛夫及其太太一起吃饭。斯特雷特认为阿米洛夫的太太是纯美国人,讲话时有中西部口音。阿米洛夫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成功的非法情报官员,阿米洛夫夫人自然功不可没。她是阿米洛夫谍报工作的搭档,充当阿米洛夫发展的内线与阿米洛夫之间的联络人。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美国女人,阿米洛夫夫人不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外界了解的阿米洛夫夫人的姓名是海伦·劳里。前苏联和美国方面均有消息称,阿米洛夫夫人是美共领导人厄尔·布劳德的侄女,至于他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亲戚关系就没有人知道了。布劳德的老家在堪萨斯(布劳德一直都有堪萨斯口音),斯特雷特对阿米洛夫夫人的口音及美国本土出生的描述刚刚符合她作为布劳德侄女应具备的条件。本特利也认识阿米洛夫夫妇,但只知道他们分别叫做“比尔”和“凯瑟琳”。和斯特雷特一样,本特利也知道比尔来自俄国,他的妻子则是美国人。依卡·阿米洛夫及海伦·劳里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多份密电中出现。

在斯特雷特的回忆录中,他对于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一直轻描淡写,坚称他与阿米洛夫的联络是断断续续发生的,并不构成一个重要关系,他本人从未参与过间谍活动。虽然克

格勃的档案尚未公开，但有部分文件已经提供给公众查阅，其中有涉及迈克尔·斯特雷特的内容。一九三八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斯特雷特在国务院从事由白宫方面替他安排的工作。五月，阿米洛夫发出密电，向莫斯科上级汇报，“奈吉尔”（斯特雷特当时的化名）向他推荐了国务院的一位后起之秀阿尔杰·希斯，称此人有“进步”（即亲共产主义）观点。阿米洛夫早就知道希斯已经在通过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为前苏联的情报部门工作，他担心斯特雷特由于年轻及过分热忱将会断送一个本已成熟的前苏联特工。阿米洛夫向莫斯科方面指出，他的处境十分为难，如果他要求斯特雷特不要干扰希斯，“他或许能猜到希斯是我们的人。”阿米洛夫同时还担心，如果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要求希斯将斯特雷特招募为内线，“‘奈吉尔’将会发现希斯的底细。”这份电文的引申含义即：阿米洛夫希望克格勃莫斯科总部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接洽，确保各自的谍报网络不会交叉。同时也说明，阿米洛夫认为斯特雷特太过年轻，没有经验，不宜让他对希斯这样可靠且成功的内线有太多了解。

斯特雷特表示，纳粹—苏维埃协定令他极为震惊。到一九三九年末，他自觉已经同共产主义疏远，成为彻头彻尾的新政自由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于是离开政府部门，摆脱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联系。不过，他还是经常与阿米洛夫见面，直到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斯特雷特并不知道，克格勃曾经派出非法官员阿诺德·杜哈（Arnold Deutsch）前往纽约，试图重新恢复与斯特雷特及其他几名内线的联络。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间，杜哈一直在英国从事谍报工作。然而，杜哈搭乘的船只在从苏维埃驶向美国的途中，在大西洋被德国船只撞沉，杜哈葬身海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特雷特前往英国拜访他的老朋

友，克格勃的招募人安东尼·布伦特。通过克格勃的密电，布伦特向莫斯科方面汇报，斯特雷特“大体上依然是我们的人”，不过，他对美共已经丧失兴趣。斯特雷特依然支持“群众阵线”，因此和亨利·华莱士走到一起。斯特雷特在《新共和》任职时，曾聘用华莱士担任编辑，为华莱士一九四八代表进步党参加总统竞选提供了一个舞台。但是后来，斯特雷特得知进步党处于美共的秘密领导之下，遂对进步党产生反感，《新共和》最终同进步党疏远，转为纯粹宣扬自由主义的杂志。一九六〇年，斯特雷特全力支持反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翰·肯尼迪。一九六三年，肯尼迪总统邀请斯特雷特出任“艺术顾问委员会”主席。面对联邦调查局的安全检查，斯特雷特先是将自己的历史情况全盘告知白宫的阿瑟·施雷辛格，后来又如实向联邦调查局坦白。联邦调查局安排斯特雷特与英国的反间谍部门会面，将他与安东尼·布伦特之间的情况和盘托出。英国的反间谍部门一直怀疑布伦特从事间谍活动，但苦于没有确凿证据。有了斯特雷特的证词，英国方面传讯了布伦特。布伦特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提供的线索十分有限。布伦特事件本属于机密，但是英国新闻界于一九七九年将此事曝光，斯特雷特的历史也因此曝光。

斯特雷特对联邦调查局说，亚历山大·科罗是克格勃的联络员，负责克格勃官员与内线之间的沟通。斯特雷特称，由于他和阿米洛夫之间不能经常见面，阿米洛夫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这个联络人正是亚历山大·科罗。国会调查委员会曾传讯科罗，但是科罗拒绝出庭作证，最终遭到“纽约学校委员会”的解聘。七十年代，有一位作家将科罗遭到解聘的事件归咎于麦卡锡主义。然而，对于科罗这样一名间谍，他所犯下的严重罪责仅仅导致丧失公职的代价，实在是重罪轻罚。

科罗与西尔夫马斯特之间的会面令联邦调查局怀疑前苏联情报部门正在向本特利曾经负责的谍报网成员发出警报。联邦调查局在一九四六年发现的另外一幕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推测。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监视珀洛组织成员查尔斯·克雷默时，发现克雷默拎着几袋东西从住处走出来，一直走到距离住处很远的一个孤零零的汽车站，然后将手里的东西丢进路边的垃圾筒。克雷默如此鬼鬼祟祟的行为引起特工的注意，他们查看了垃圾筒，发现克雷默丢弃的是一批美共的宣传材料。显然，克雷默是在提前做好住所被搜查的防备工作。

克格勃究竟如何得知本特利叛变，从而向受到牵连的内线发出警报，要求他们停止一切活动，这始终是个未解之谜。本特利投诚之后，联邦调查局立即要求本特利安排与她的克格勃上级、克格勃非法机构负责人阿纳托利·格罗莫夫见面。会面的时间定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会面的过程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行为有可能被克格勃的反监视人员发现了，从而暴露了本特利叛变的内幕。也有可能，格罗莫夫在与本特利的交谈过程中断定本特利已经叛变。然而，最大的可能性在于，克格勃从安插在司法部内部的前苏联特工那里得到本特利叛变的警报。在维诺那计划最先破译的一批电报中（这批电文于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七年间被破译），有一封电报提到，前苏联从司法部招募的一名特工能够接触到反间谍情报。正是这条信息引发联邦调查局内部大规模的清查内奸的行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朱迪思·科普朗落网。自一九四五年初开始，朱迪思·科普朗一直在司法部“外国机构登记部”任职分析员。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十四份克格勃密电，莫斯科文献中心保存的有关科普朗的档案以及美国司法部对科普朗的裁决，有助

于我们了解科普朗背叛美国的全过程。科普朗就读于巴纳德学院，毕业于一九四三年。她在大学期间加入共产党学生组织。一九四四年，科普朗在司法部的“经济战争部”纽约办公室谋得第一份工作。在对新职员例行安全背景检查时，安全部门注意到，科普朗曾在学生时代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然而，当时的安全检查重点在于被检查人是否支持纳粹，因此科普朗与共产党的牵连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就职资格，甚至没有在她的档案里留下污点，以备将来复查。在科普朗的朋友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兼克格勃特工弗洛拉·沃欣（Flora Wovschin）。科普朗的新工作无疑能给克格勃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沃欣因此向克格勃汇报，科普朗是一条极宝贵的线索。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同意沃欣的看法，并于一九四四年向莫斯科总部申请招募科普朗。

由于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生人事变动，需要重新安排各条秘密内线的负责人，招募科普朗的工作被暂时搁置。一连数月，克格勃总部对此事未曾过问，直到十月份，费庭将军才向共产国际发出问询，要求提供科普朗的背景资料。同年十一月，沃欣报告，科普朗正在迫不及待地等待克格勃与她直接联络。十二月，克格勃驻纽约站接获莫斯科方面的认可，称科普朗在司法部“外国机构登记部”的职位极大地增加了她从事间谍活动的潜力。

以塔斯社记者身份做掩护的克格勃官员弗拉迪米尔·帕夫洛夫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与科普朗见面。在写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帕夫洛夫认为，科普朗“为人严肃认真，政治上成熟，非常真诚地希望帮助我们。她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帕夫洛夫相信，科普朗能够向克格勃提供大量有关联邦调查局运作的重要情报。由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发出，经维诺那计划破译的

电文显示，科普朗工作进展顺利。不过，克格勃方面要求科普朗不要急于求成，要首先确保在司法部的职位得到巩固之后再伺机盗取文件。

在其中的一封密电中，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报告称，科普朗正在学习俄文，希望能够从事与苏维埃有关的工作。科普朗的小算盘果然奏效，她终于有机会接触到联邦调查局内部针对前苏联间谍嫌疑人采取行动的档案。因此，有绝对理由相信，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直到一九四八年底科普朗被捕，在此期间，科普朗向前苏联预报了大量的联邦调查局反间谍情报，克格勃因此有充裕的时间通知受到牵连的内线停止间谍活动。由此可以联想到本特利的案件。估计早在联邦调查局部署监视行动以便获得罪证之前，受到牵连的内线就已经得到风声，令联邦调查局惟有空手而归。

一九四九年，朱迪思在向克格勃特工瓦伦丁·古比切夫提供司法部反间谍情报时被联邦调查局当场逮捕。古比切夫的对外身份是联合国官员，他虽然被判间谍罪，但是依照外交豁免权，获准返回莫斯科。

对科普朗的审判说明，在和平年代要想判定间谍罪名成立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科普朗的辩护律师坚决要求政府检控官将科普朗被捕时提供给古比切夫的反间谍档案在法庭上公开，这无疑于将罪犯费尽心机搞到手的机密公开呈现在前苏联面前。而其中的一份文件更加令美共的地下武装感到震惊。那是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称一九四四年，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曾经秘密潜入美共地下武装成员菲利普·利维（Philip Levy）的住所，发现利维的家中有一批文件原本属于美共的另外一名地下党人利昂·约瑟芬森（详见第三章），其中的部分材料则是一九三八年从美共的头号对手杰伊·洛夫斯通的住所窃得。这样一

来，前苏联特工盗取政府机密的事件引发了联邦调查局行窃共产党人住处的秘密，进而又将美共成员窃取对手文件的不光彩事件曝光。

政府的检控官原以为，只要他们不惜将原本属于机密的部分内容公开，就足以令科普朗被绳之以法。毕竟，科普朗是在向前苏联官员提供文件的一刹那人赃俱获地被捕。然而，美国的刑事审判标准异常复杂，即便是有如此确凿的证据，也未必为法庭所接受。前苏联一直认为他们的密码系统牢不可破，然而，联邦调查局正是根据被破译的电文才顺藤摸瓜地捕获到科普朗。但是，美国政府不想让前苏联知道，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密码体系已经遭到瓦解，否则，前苏联将放弃利用密电保持与内线的沟通，并将中断密电中提及的所有谍报活动，维诺那计划将从此失去意义，联邦调查局则再不能像逮捕科普朗那样，利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情报，确认间谍嫌疑人，加以跟踪监视，在嫌疑人从事犯罪活动的现场人赃俱获将其捉拿归案。政府方面在向法庭陈述监视并逮捕被告的行为依据时没有涉及维诺那计划，上诉法庭认为政府的行为理由不充分，驳回起诉，要求重新审理。

政府方面重新归纳证据，做足准备，尽可能绕开在一审时令检控官碰壁的法律技术性问题，但是依然没有动用维诺那计划作为证据。然而，上诉法庭依然认为政府检控官所提供的关键证据不能成立，将案件退回终审法庭。万般无奈之下，检控官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前苏联间谍被无罪释放。科普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丧失在司法部的工作，政府将保留对她进行第三次起诉的权利。然而，第三次起诉始终没有发生。一个罪责昭彰的前苏联间谍如此轻而易举地逃脱法律的惩罚，科普朗案件激起广泛的民愤。

科普朗案件说明，美国的司法体制对于裁决刑事案件，在证据方面有相当高的要求。然而，对于本特利供认的前苏联间谍中的大部分人，作为起诉方的美国政府根本无法向法庭提供足够的证据，尤其缺乏指证科普朗那样的直接证据。政府方面的惟一证人只有本特利，一个公认的前苏联间谍，其证词的可信度在辩方律师的抨击下根本不堪一击。虽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但大多属于间接证据，且涉及的人和事均发生在数年以前。再没有任何被窃取的文件或是其他物证可以用作直接证据。一九四七年初，联邦调查局围绕本特利的证词开始着手调查。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曾经咬牙切齿地发表感慨：“这个案件里的人物都绝顶聪明，至少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教育背景，甚至还有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这样知名的大人物被牵扯进去。可以想象，一旦提起公诉，将有美国最出色的律师为他们辩护。就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这个案件基本上是格里格瑞（联邦调查局对本特利的化名）对几名同谋的内讧，结局很可能十分难堪，所有的被告将被判无罪。”

联邦调查局在反复调查之后得出结论，他们惟一的希望及突破口寄托在对间谍嫌疑人的审讯上，希望“能有人妥协”，成为继本特利之后的第二位证人，又或是能有人提供虚假证词，从而以伪证罪遭到起诉。然而，联邦调查局的预想只在一个人身上得以实现。

本特利的供词中交代的谍报人员在被联邦调查局传讯时，对于联邦调查局提出的问题，要么给予模棱两可的回答，要么索性拒绝回答。大多数人拒绝在证词上签名。后来，在被大陪审团传讯时，被告需要宣誓，声明在陪审团面前所讲的全部是事实。这些人十分清楚做伪证的后果，便纷纷援引“第五修正案”中当事人有权拒绝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之条款，拒绝回

答问题。有四个人在法庭上作证，但是他们随即离开美国，从而逃脱伪证罪的后果，他们是莫里斯·霍尔珀林、邓肯·李、弗兰克·库尔以及洛赫林·柯里。另外有两人在大陪审团传讯之前就已离开美国。

那些既没有援引“第五修正案”，又没有离开美国的人员则为他们不审慎的做法付出代价。本特利供认，在她负责的谍报网中，有一个不是十分重要的内线在“战争生产委员会”工作，名叫威廉·雷明顿（William Remington）。雷明顿由美共的招募人，《新大众》的编辑约瑟夫·诺思（Joseph North）介绍给约各布·格罗，格罗决定录用此人。本特利证实，雷明顿曾经提供过关于飞机生产、高辛烷值汽油以及合成橡胶方面的情报，并且向本特利交纳党费。本特利称，雷明顿从事地下工作十分紧张，所提供的情报不多，并且在一九四四年参加海军之后便中断联络。

根据本特利提供的信息，联邦调查局于一九四七年传讯雷明顿。雷明顿承认认识诺思，是诺思介绍他与格罗和本特利相识。不过，他只知格罗和本特利的名字分别为约翰和海伦。雷明顿甚至承认曾经向海伦/本特利提供情报。不过，他坚决否认从事间谍活动，声称一直以为本特利是名记者，且他所提供的信息均属于公开资料。雷明顿承认曾经向本特利付钱，但那是在支付本特利为他订购的报纸费用。至于与诺思及格罗的会面，雷明顿称，这些会面都是清白的，他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诺思有可能是名共产党人。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雷明顿答应充当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与诺思见面，诱使诺思吐露真相。雷明顿否认自己曾加入共产党。他表示，虽然自己在纳粹—苏维埃协定期间曾经是共产党反战前线组织“美国和平动员组织”成员，但他一向反对共产党。

雷明顿的证词并不可信，至于他做出这样的供认动机何在，一直是个谜。一九四七年，联邦调查局传讯雷明顿时，雷明顿正在向“原子能委员会”申请职位。他或许是想对本特利关于他的指证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好让联邦调查局相信他的清白，使他能够继续在政府部门任职。然而，雷明顿没有想到，早在传讯他之前，联邦调查局就已经确信他曾参与间谍活动。在此之前，雷明顿曾经试图申请一个政府部门要职，也因为联邦调查局的干预化为泡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雷明顿从海军卸任，在“战争动员及规划办公室”获得一个职位。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联邦调查局听说雷明顿将被调往白宫出任杜鲁门总统特别助理的助手。联邦调查局警告有关部门，雷明顿涉嫌参与前苏联间谍活动，从而令雷明顿的升职被搁置。至于他今次向“原子能委员会”提出的申请能否被录用，联邦调查局并不看好。果然，雷明顿的申请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在被大陪审团传讯时，当被问及共产党人的背景时，雷明顿没有引用“第五修正案”中的权利。政府检控官在雷明顿的证词里发现存有假证。假证之一在于，雷明顿否认曾经参与共产党的活动，而大量的证据，包括雷明顿前妻的证词轻而易举地驳斥了雷明顿的说法。雷明顿因伪证罪被判刑入狱，他的谍报罪责只起到辅助作用。

本特利供认的另外一名谍报人员入狱的原因更加特别。一九五四年，美国国会通过“自觉供认法案”，允许被告在主动坦白的情况下享有免于起诉的权利，当然，“第五修正案”不可以与豁免权同时启用。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是本特利供认的前苏联情报内线之一，他援引豁免权，却拒绝在法庭上作证，结果被送进监狱。

在本特利供认的数十名前苏联谍报人员当中，除了雷明顿

和非茨杰拉德，其余大部分人均逃脱审判，被判有罪及入狱的人少而又少，联邦调查局搜集的大量证据作为绝密资料被无谓地保存了三十多年。国会的调查委员会，特别是“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以及“参议员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传讯了本特利所供认的绝大部分人，但多数人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作证。委员会收集的一些证据与本特利的证词吻合，但这些证据并不全面，远不及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丰富。再加上国会调查委员会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政党的纷争方面，公众舆论及多名出席审讯的评论员对于所听到的证词持怀疑态度。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得舆论对本特利的证词发生质疑，正如一位作家写道，舆论认为本特利的指证无异于“一名老处女的疯狂想象”。然而，舆论的判断是错误的。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证实，伊丽莎白·本特利所讲的全部是事实。



军事间谍

对于前苏联谍报活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克格勃外国情报部门的前苏联间谍身上。然而，克格勃在前苏联谍报领域的主导作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才逐步树立起来，在二十和三十年代，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比克格勃拥有更为广泛的谍报网络。二十年代末，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在美国成立第一个间谍机构。拉脱维亚人阿尔弗雷德·蒂尔顿（Alfred Tilton）与俄裔美国人莉迪亚·斯塔尔（Lydia Stahl）利用信使服务、摄影技术搜集军事情报。尼古拉斯·杜森伯格（Nicholas Dozenberg）是蒂尔顿雇用的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服务的第一名美国特工。

尼古拉斯·杜森伯格

尼古拉斯·杜森伯格于一八八二年出生于拉脱维亚，一九〇四年移民美国，并加入社会党附属的拉脱维亚语系组织——“工人社团”。该组织于一九一九年从社会党分离出来，形成新兴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二三年，杜森伯格已经是工人党（即后来的共产党）的宣传负责人。一九二七年，杜森伯格退出党的公开工作，成为阿尔弗雷德·蒂尔顿领导下的前苏联军

事情报部特工。

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杜森伯格为前苏联情报部门执行了各种任务，其中的几项任务是在美国的领土上从事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罗马尼亚的间谍活动。（在当时，前苏联谍报工作的首要目标是这些国家，而不是美国。）杜森伯格还协助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一名官员以弗兰克·克里奇的名义获得美国的身份文件及美国护照（真正的克里奇已经过世）。假冒的克里奇利用美国身份前往法国执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任务。在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期间，杜森伯格还在中国建立密码机构，他在中国的活动身份是美国半导体制造商。同样，他以推销“拜尔和霍威尔”的动画制作设备的名义在菲律宾活动。

杜森伯格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获得“拜尔和霍威尔”的连锁权，足以证明前苏联情报部门在三十年代的美国建有广泛的关系。杜森伯格是通过“拜尔和霍威尔”公司电影部门负责人威廉·克鲁泽（William Kruse）的帮助获得公司授权的。和杜森伯格一样，克鲁泽在二十年代也是美共的中层领导人，并且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一九二九年，杰伊·洛夫斯通及其数百名狂热的追随者因意识形态上的分化被驱逐出党，克鲁泽便在其中。在其后的几年里，洛夫斯通及其随从自称为“共产党（异见派）”，并且一直宣称对苏维埃忠心耿耿，并且秘密协助前苏联开展谍报工作。杜森伯格加入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时，洛夫斯通尚未遭到美共的排挤。他一直与洛夫斯通保持联络，并充分利用洛夫斯通的追随者执行前苏联的情报任务。

三十年代末，斯大林清洗前苏联情报部门，数千名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官员及克格勃官员被行刑。大批前苏联情报官员被从海外召回国逮捕。出于对命运的忧虑，开始有人退出前苏联情报工作。惠特克·钱伯曾经在美国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谍

报网工作，他承认自己叛变的部分原因是害怕被召回莫斯科。尼古拉斯·杜森伯格也于三十年代末退出间谍工作。他本打算在俄勒冈安静地生活，但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一名叛徒沃尔特·克里维斯基（Walter Krivitsky）在《星期六晚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杜森伯格是军事情报部特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杜森伯格被捕。杜森伯格认罪，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方面对杜森伯格的起诉只限于利用假护照的罪名，结果，他于一九四〇年被判入狱十二个月。杜森伯格的证词供认，在纽约从事牙医工作的菲利普·罗森布里是一名共产党人，协助安排将苏维埃的资金提供给前苏联在美国的谍报网以及协助共产国际向美共秘密提供经费。杜森伯格还承认，曾经招募美国共产党人元老菲利普·阿朗伯格（Philip Aronberge）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执行任务。

三十年代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的美国特工

杜森伯格的证词提供了一条惊人的线索，即一桩较早发生的普通伪钞案居然与前苏联情报部门有关。一九三三年，负责审理伪造案件的“美国秘密委员会”发现一位名叫瓦伦丁·伯坦（Valentine Burtan）的博士持有伪钞，但是伯坦拒绝透露这些价值近十万美元的假钞来自何处，他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一九四〇年，杜森伯格被捕并承认其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间谍的身份，伯坦才开始招供。伯坦向联邦调查局供认，杜森伯格是他的情报内线，那些伪钞的用途是要资助前苏联的秘密机构。伯坦还供认，为协助前苏联情报部门渗透到罗马尼亚，杜森伯格成立了“美国罗马尼亚电影公司”，伯坦曾经是杜森伯格的合作伙伴。二十年代时，伯坦是美共成员，一九二九年追

随洛夫斯通被排挤出美共。

由于伯坦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他得以重新返回共产党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伯坦被关在联邦监狱时，曾经有一位名叫朱利叶斯·海曼（Julius Heiman）的珠宝商探望他。二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提供给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资助大多以珠宝的形式，而非提供现金。海曼是一名秘密共产党人，美共曾利用他的珠宝生意渠道将珠宝转化为现金。在伯坦入狱期间，美共的一位高级官员马克斯·贝塔赫（Max Bedacht）筹集资金资助伯坦的家人。威廉·爱德华·克兰（William Edward Crane）曾在三十年代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是惠特克·钱伯手下的摄影师。他向联邦调查局供认，他记得曾经受钱伯又或是鲍里斯·拜科夫的委托，将一笔钱交给住在曼哈顿上区的一个女人，在他印象当中，这个女人的丈夫因为伪钞案被判入狱。这个女人很可能就是伯坦夫人。伯坦出狱后（他在入狱十年后获得假释）与美共重新建立联系。

三十年代初期，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马克·兹伯特（Mark Zilbert）替代蒂尔顿出任驻美机构的负责人。马克·兹伯特又名莫舍·斯特恩，在西班牙国内战争期间，人称克雷伯将军。然而，由兹伯特招募的一名专门盗取军事情报的谍报人员转投“海军情报办公室”，一连数月向俄国方面提供假情报，令兹伯特的机构受到重创。在兹伯特的继任者中，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乌拉诺夫斯基的人，曾经负责惠特克·钱伯领导的谍报网。乌拉诺夫斯基的另外一条线索是罗伯特·戈登·斯维兹。斯维兹出身豪门，他通过美国共产党人网络猎取了美国政府关于巴拿马运河的军事计划。斯维兹情报来源之一是美国陆军下士罗伯特·奥斯曼（Robert Osman）。奥斯曼被判处窃取国防情报罪，经上诉，这一判决被撤销。然而，陆军方面仍旧将他开除。斯

维兹于一九三三年在法国执行任务时被法国反间谍部门逮捕后认罪。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另外一名特工，芬兰裔美国共产党人阿维·雅各布森于一九三三年在芬兰执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任务时被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在美国从事过很多活动，其中已经为人所知的活动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并没有被提及。无可质疑，它们一定隐藏在上万封尚未被破译的密电中。不过，从被破译的电文内容推断，可以大致看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活动与克格勃的活动十分接近，只是在规模上小于克格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克格勃一样，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亦惯于利用意识形态因素激励美国共产党人（诸如杜森伯格和钱伯）及国际纵队的退伍军人从事谍报工作。

阿尔杰·希斯

受意识形态驱使，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从事间谍活动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阿尔杰·希斯。希斯作为前苏联间谍的名气不是很大，但是在三十年代初，希斯任职“农业调整内阁”时，是最早一批加入韦尔组织的年轻共产党人之一，成为惠特克·钱伯领导下的美共及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谍报网中极具价值的成员。一九三八年钱伯背叛时，希斯只是国务院的中层官员，但已经被列入后起之秀的名单。希斯的确如人所料地平步青云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已经升任国务卿的高级助理。一九四五年，总统罗斯福前往雅尔塔与约瑟夫·斯大林及温斯顿·丘吉尔磋商二战在最后阶段的事宜，随行的外交代表团中便有希斯。希斯曾担任国务院“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负责人，负责联合国策略，并主持召开一九四五年在旧金山召开的

联合国成立大会。一九四六年，希斯被调离国务院，负责主持一项著名的国际和平援助计划。

在华府，希斯是一位备受尊崇的人物。然而，外界包括新闻界未曾料到，由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希斯涉嫌与前苏联情报部门暗中联络，杜鲁门政府的官员们担心希斯的安全隐患终将给政府带来难堪，于是以不为人觉察的悄然手法将希斯驱逐出政府部门。一九四五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密码员艾哥·郭岑可在渥太华叛变，向加拿大政府提供了一百多份前苏联军事情报文件，以及他所了解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情况。加拿大政府吃惊地发现，原来前苏联利用与加拿大结成的战争同盟关系，在加拿大国土上肆意开展情报活动。根据郭岑可提供的文件及情报，加拿大政府破获数个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谍报网络，开除了一名暗中协助前苏联情报活动的政府雇员，将五名前苏联间谍送进监狱，其中包括阿伦·南·梅（在加拿大参与英加合作原子弹项目的英国科学家）、弗雷德·罗斯（Fred Rose）（加拿大国会中的共产党人）、萨姆·卡尔（加拿大共产党全国组织部长）。加拿大总理马坎兹联络杜鲁门总统，加拿大皇家警察局将郭岑可案件中涉及美国的内容提供给美方官员，其中之一便是，郭岑可曾经听见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官员自得地声称，美国国务卿的助理是他们的内线。同年，伊丽莎白·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供认，珀洛组织中的一名成员曾经在阿尔杰·希斯领导的前苏联另外一个谍报网中工作。此时，钱伯于一九三九年提供给助理国务卿伯利的情报已经引起联邦调查局的关注，联邦调查局得知，希斯曾经是秘密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员。

一九四八年，钱伯向“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供认，三十年代初期，希斯是韦尔组织成员。起初，钱伯

并没有指控希斯从事间谍活动，他只确认希斯的共产党人身份。希斯要求对此项指控加以澄清，获得许可。希斯否认与共产党人有任何关系，甚至否认认识钱伯。然而，希斯的每一项辩驳均遭到钱伯的驳斥。钱伯提供了详细资料，证明三十年代他与希斯一家的亲密关系。希斯于是又出尔反尔地声称，他的确认识钱伯，但钱伯与他接触的过程中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而且他们之间很少接触。希斯依然否认与共产党有牵连。

希斯发现，他日益陷入被动状态，忙于为自己辩护。例如，钱伯称，希斯曾经将他不再需要的一辆旧汽车送给共产党，由一位组织人员使用。希斯则反驳说，那辆汽车是钱伯租用他的寓所时，作为租约的一部分，希斯将汽车卖给钱伯。国会调查人员找到一张汽车收据，上面有希斯的亲笔签名，将这辆汽车的所有权转让给共产党的一名官员。新闻界的立场因此一下子由轰轰烈烈地支持希斯转为中立态度。钱伯在国会委员会面前的证词被豁免诽谤罪。为了争取占据主动，希斯向钱伯发出挑衅，试探钱伯是否敢于在国会听证会以外的场合重复对希斯的指控。希斯的这一决定铸成大错。钱伯在《面对媒体》的电视节目中重申了对希斯的指控，令希斯的支持者们感到万分错愕。三个星期后，希斯起诉钱伯。

在为这场诽谤官司做准备的过程中，希斯的律师要求钱伯提供其指证希斯为共产党人的证据。令希斯的律师们大惊失色的是，钱伯的手中居然握有证据，而这些证据均未曾在“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面前展示。证据中包括：由希斯亲笔抄写，长达四页的国务院情报简要；六十五页用打字机打出的一九三八年国务院机密文件（经专家鉴定，其中的很多页是用希斯住处的打字机打印）；两卷摄有一九三八年国务

院文件的微缩胶卷，被偷拍的文件上还有希斯的小签。虽然这些文件并不能证明希斯曾经是一名共产党人，却强有力地证明希斯是一名间谍。大陪审团在看过这些材料之后宣判希斯犯有伪证罪。虽然陪审团对间谍罪案的裁决权力有限，但是希斯曾经在陪审团面前宣誓，之后却依然谎称从未向钱伯提供过文件，由此构成的伪证罪罪责难逃。陪审团成员的意见也分作两派，经过长时间相持之后，一九五〇年，希斯终于被判有罪，入狱三年半。

根据法庭上的证供以及后来俄国文献中心的档案资料可以确认，希斯在三十年代确实为前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然而，在三十年代之后，希斯是否依然继续背叛美国的活动，这个话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直到近几年才找到答案。钱伯本人对希斯的了解以及他所提供的证据都只限于三十年代，有很多在三十年代为前苏联从事谍报活动的特工都相继退出共产主义运动。包括钱伯在内的一批人后来公开承认了他们的行为，另外一批人则只是悄无声息地退出。

一些评论家们认为，希斯属于悄然退出谍报活动的那一类人，并且推测，一九三九年的纳粹—苏维埃协定令希斯意识到，他对苏维埃寄予的理想破灭了。然而，一九九〇年，曾经任克格勃官员的奥利·格地维斯基（Oleg Gordievsky）声称，希斯在四十年代时依然为前苏联效力。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证实了格地维斯基的说法。一九四三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发出的密电中曾公开提到希斯的名字，电文内容涉及克格勃针对美国国务院的报告。电文的其余内容未能被破解，因而无法确定情报的价值。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另外一封克格勃密电中，涉及克格勃官员与一个名为“阿列斯”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内线之间的会晤。有证据显示，“阿列斯”就是阿尔杰·希斯。虽然克

格勃、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以及前苏联海军情报部各自的谍报网络均独立运作，但是三者之间交叉利用情报内线的情况并不少见。而且，克格勃有权插手军事情报部、海军情报部的事务，如有需要，更可调遣这两个部门的资源。在前苏联谍报史上最可圈可点的谍报活动是原子间谍活动。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一早就已渗透到英国的原子弹计划中，从中发展了前苏联最重要的内线克劳斯·富克斯。随着斯大林将原子弹谍报活动确定为情报机关的首要任务，克格勃接管了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原子间谍工作。富克斯被调往美国的原子弹项目工作时，他已经处于克格勃的牢牢控制之下。

在探讨维诺那计划中涉及“阿列斯”的电文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由史学家阿伦·温斯坦发现的克格勃的一份电报。电报发出的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由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发往莫斯科。报告称，华盛顿方面已经要求其特工“卢布”汇报有关“阿列斯”的情况。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卢布”是隐藏在财政部内部的前苏联间谍哈罗德·格拉瑟的化名。电文中称，“‘阿列斯’是共产党人，‘卢布’对‘阿列斯’的政治评价极高，认为此人果断、坚决，且意志坚强。”同希斯一样，格拉瑟也是三十年代共产党在华盛顿地下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完全有资格对希斯进行评估。

继三月五日的密电之后，三月三十日又有另外一封密电发出，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对该电文的批注是，阿列斯“可能就是阿尔杰·希斯”。在这封密电中，有关阿列斯的描述完全符合阿尔杰·希斯，令人无法不将二者联系起来。

密电中称，“A与阿尔杰的见面确认如下几点：1. 阿列斯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一直为‘邻居’工作。”“邻居”是克格勃对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称谓。钱伯于一九三四年将希斯纳入美共

地下组织，并从一九三五年开始窃取文件。钱伯十分满意能够有希斯这样的人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A 的身份未能确认。但是，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克格勃其他密电中可以发现，A 是艾伯特的名字缩写，而艾伯特正是克格勃非法官员依卡·阿米洛夫的化名（格地维斯基将阿米洛夫介绍给希斯）。

“2. 在过去几年，他一直担任邻居的一个‘见习人员’小组负责人，小组的主要成员是他的亲属。”“见习人员”是克格勃内部对特工的称谓。在希斯的谍报工作中，他最亲密的同事包括他的妻子普利希拉（Priscilla）和他的兄弟唐纳德。普利希拉负责抄录希斯从国务院窃取的文件，唐纳德也曾在国务院工作过一段时间。

“3. 阿列斯及其小组负责猎取军事情报。显然，‘邻居’对‘银行’的情报不感兴趣，阿列斯也不经常提供‘银行’的情报。4. 过去几年，阿列斯一直与‘波尔’（身份未确认）合作，‘波尔’偶尔与小组其他成员见面。5. 最近，阿列斯及其小组成员被授予苏维埃勋章。”根据这段电文可知，阿列斯在国务院（即“银行”）工作，这一点符合阿尔杰·希斯。电文指出，邻居/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要求阿列斯窃取军事情报，而不是阿列斯唾手可得的外交情报。这是因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在前苏联的情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所涉猎的情报包括政治情报、战略情报以及更具局限性的军事情报。然而，随着克格勃在外国情报领域的统领地位的确立，军事情报部的活动范围逐步缩窄。为了防止旗下的特工被克格勃挖走，军事情报部要求特工专注在军事情报领域。一九四五年九月，希斯曾经报告，国务院将在他任职的“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设立一个新职位——“军事事务特别助理”。密电中提到，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十分强调要求希斯窃取军事情

报，可能和希斯的这一报告有关。正是由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对军事情报的特殊需求，一九四六年，美国安全官员在密切留意希斯的活动之后发现，希斯所窃取的情报均属于绝密级别的“关于原子能……以及其他与军事情报有关的信息”，超越了“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要处理联合国策略的职能。

“6. 雅尔塔会议之后，阿列斯前往莫斯科，苏维埃的一位要员（在阿列斯的印象中，此人应该是维辛斯基同志 [前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与阿列斯会晤，应军事‘邻居’的要求，向阿列斯表达感激之情。”根据这段电文可以推断，阿列斯出席了雅尔塔会议，并且途经莫斯科返回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代表团的绝大部分成员经伊朗直接回国，代表团中驻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成员虽然返回莫斯科，但之后并没有像阿列斯那样很快返回美国。（该电文在雅尔塔会议结束一个月后发出。）不过，国务院的四位官员确实在雅尔塔会议后前往莫斯科做短暂停留，同苏维埃方面对会议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扫尾工作，之后返回华盛顿。其中的三个人分别是国务卿爱德华·斯特第尼（Edward Settinus）、“欧洲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弗里曼·马修（Freeman Matthew）以及斯特第尼的新闻助理威尔德·福特（Wilder Foote），他们从未被指控充当前苏联间谍，而第四位官员就是阿尔杰·希斯。

除了惠特克·钱伯的供证以及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包括本章中涉及阿列斯/希斯的电文以及第五章中提到的涉及格拉瑟、维克托·珀洛、查尔斯·克雷默的电文），还有温斯坦提供的克格勃文件之外，伊丽莎白·本特利一九四五年向联邦调查局提供的一段证词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阿尔杰·希斯的间谍行为：

关于哈罗德·格拉瑟，我记得他被美国财政部派往欧洲，或许是意大利执行任务后返回。维克托·珀洛曾经对我说，格拉瑟向珀洛表示，希望重新回到他的组织工作。我问珀洛，格拉瑟当初如何离开他的组织？珀洛说，格拉瑟和另外一两个人有段时间在华盛顿政府内部一个美国人的领导下工作，那个美国人后来又让他们替前苏联工作。珀洛表示，他不知道这个美国人的身份，不过，据他所知，只有查尔斯·克雷默了解此人的背景。后来，我在纽约见到克雷默，向他问及此事。克雷默说，将格拉瑟从珀洛组织拉走的那个人名叫希斯，在美国国务院工作。

根据本特利的证词，再加上维诺那计划中涉及阿列斯的电文以及温斯坦在莫斯科发现的克格勃文件，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三十年代之后，至少在一九四五年之前，阿尔杰·希斯依旧在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

阿瑟·亚当斯（Authur Adams）

阿瑟·亚当斯是一名老牌前苏联特工，他与美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前苏联在美国展开谍报活动的最初期。苏维埃联盟成立后不久，亚当斯就开始发展谍报网络，四十年代时，他的谍报网络硕果累累。在原子间谍活动中，亚当斯的谍报网比克格勃的谍报网最先遭到联邦调查局的摧毁，但是有关亚当斯谍报网的成员情况及活动情况有很多未解之谜。亚当斯的名字以及他的几位紧密合作的同事均未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出现。或许，他们依然隐藏在未曾确认真实身份的化名之下，又或许隐藏在尚未破译的密电当中。

亚当斯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他有可能出生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有可能出生于俄国版图内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亚当斯就和列宁相识。一九一〇年，他以移民的身份到达美国，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期间，担任“苏维埃俄国情报局”技术部负责人。美国政府从未正式认可列宁的新苏维埃政权，“情报局”是苏维埃政府驻美国的非官方使馆。“情报局”负责人路德维格·马腾斯（Ludwig Martens）称，亚当斯出生于俄国，后来取得英国公民身份，毕业于俄国喀琅施塔得科学院及多伦多大学。美国政府于一九二〇年下令关闭“情报局”，马腾斯和亚当斯被驱逐出境。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亚当斯重返美国，名义上为前苏联贸易部工作，实际上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官员。一九二〇年，亚当斯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元配妻子于一九一四年到达美国），与多萝西娅·基恩（Dorothea Keen）结婚。多萝西娅在美国出生，是俄国移民的后代，曾经在“苏维埃俄国情报局”任职。一九三八年，亚当斯利用假护照经加拿大进入美国，随后与一位名叫菲利普·利维的新泽西人合伙成立“工业技术实验室”。利维出生于一八九三年，对外，他是一名令人尊敬的商人，任“联邦贸易公司”总裁，从事纺织品进出口生意。然而，一九三五年，他的同事利昂·约瑟芬森在哥本哈根被捕，罪名是充当苏维埃联盟的间谍。约瑟芬森自称是代表利维的公司前往哥本哈根公干。与约瑟芬森一同被捕的另一个人被查出持有假美国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尼古拉斯·舍曼。舍曼的真实身份是亚历山大·乌拉诺夫斯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官员，三十年代初负责前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利维的工作不仅限于向约瑟芬森提供商人身份做掩护，约瑟芬森以及美共地下组织其他成员的档案全部保存在利维家中，一九四四年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秘密潜入利维家中发现了这些档案。然而，利维向国会委员会表示，他并不知晓约瑟芬森的活动，也不了解亚当斯领导的“工业技术实验室”，尽管他本人也是该实验室的一名官员。

亚当斯的另外一些同事亦是美共地下组织的成员。和克格勃的头号非法官员阿米洛夫一样，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亦将美共成员作为特工人员首选，并将美共的地下组织纳为谍报活动的附属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调查局对亚当斯实行监视，发现他几乎每天都与“维多利亚·斯通珠宝公司”的老板维多利亚·斯通（Victoria Stone）见面，见面地点有时在斯通的寓所，有时在她位于麦迪逊大街的店铺。一九三五年，斯通寻找律师为瓦伦丁·伯坦博士寻求法律援助。瓦伦丁·伯坦因参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特工尼古拉斯·杜森伯格操纵的伪钞案被捕。一个名叫朱利叶斯·海曼的人曾经去监狱探望伯坦，此人正是斯通珠宝公司的财务部长。正如前面提到的，二十年代初，海曼协助美共将共产国际秘密提供的珠宝兑换成现金。三十年代，亚当斯的另外一名合作伙伴名叫卡恩（M. G. Kahn），此人曾于一九一九年被捕，罪名是从俄国向美国偷运珠宝。

一九四三年，亚当斯试图从曼哈顿项目在芝加哥实验室的科学家中招募内线，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在与数位科学家见面之后，联邦调查局和曼哈顿项目的安全人员秘密潜入亚当斯在纽约的寓所，在他的家中发现了十分复杂的摄影器材，制作微缩胶片的材料以及有关田纳西州原子弹实验室中正在进行的试验记录。

为掩护间谍身份，亚当斯同时在共产党领导的两家公司里任职，其中一家是由萨姆·诺维克（Sam Novick）领导的“美国电子公司”，负责为海军生产雷达。一九三八年，亚当斯以非

法手段从加拿大进入美国后，正是诺维克为亚当斯签署移民申请，并谎称亚当斯已经为他的公司工作了十年。另外一家公司是“主音录制公司”，由曾经在《新大众》担任编辑的埃里克·伯奈（Eric Bemay）负责，亚当斯从这家公司领取薪水。一九四五年初，伯奈协助亚当斯逃避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离开纽约。当时，亚当斯从维多利亚·斯通的寓所出来，他走上一条单行路，然后突然截住一辆出租车，在联邦调查局人员做出反应之前摆脱监视，之后与伯奈一起登上火车。联邦调查局在芝加哥发现了亚当斯和伯奈，跟踪亚当斯到了波特兰，并阻止亚当斯登上一艘前苏联船只。美国国务院担心触怒前苏联，要求联邦调查局不要逮捕亚当斯，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亚当斯最终还是摆脱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消失得无影无踪。很有可能，他回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约瑟夫·伯恩斯坦（Joseph Bernstein）

与美亚事件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密电中虽然没有发现亚当斯的名字，却可以找到军事情报部其他几位特工的踪迹，其中之一便是化名“侯爵”的约瑟夫·伯恩斯坦。伯恩斯坦的第一个重要职位被安排在《美亚》杂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亚事件作为谍报案例引起瞩目，伯恩斯坦也被列入嫌疑名单，只是没有遭到起诉。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部分内容涉及美亚事件，同时也记录了伯恩斯坦参与的其他间谍活动。

《美亚》杂志由亲苏维埃的富商、经营贺卡生意的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创办。“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安全官员们发

现，该杂志经常刊登一些秘密报告的章节。为了查清其消息来源，便派人于一九四五年春秘密潜入杂志社办公室，结果发现上千份政府的秘密文件。案件被转送到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窃听了杂志社的几位编辑与华盛顿内线之间的对话。其中的一次对话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在贾菲住华盛顿的一个饭店房间里进行，谈话对象是“海军情报办公室”分配在国务院的联络官员安德鲁·罗思（Andrew Roth）。贾菲向罗思提到《美亚》杂志的前雇员约瑟夫·伯恩斯坦，并且告知罗思，伯恩斯坦已经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达数年之久。贾菲表示，伯恩斯坦曾经对他说：“希望你能将国务院远东部有关重庆方面的情报提供给我。”

贾菲很愿意帮助伯恩斯坦，但是他坚持要先确认伯恩斯坦的前苏联间谍身份的真实性。于是，在伯恩斯坦提出要求后的第二天，贾菲先约见了《新大众》的作家约翰·斯图尔德（John Stuart），然后又在他自己的家中与厄尔·布劳德见面。虽然贾菲与伯恩斯坦、斯图尔德及布劳德的会面全部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下，但是联邦调查局无法窃听他们的谈话内容。不过，贾菲将这几次的谈话内容如实转告给罗思，联邦调查局最终窃听成功。布劳德建议贾菲一定坚持要求与伯恩斯坦的前苏联方面联络人见面。如果伯恩斯坦所讲都是事实，“他会想办法证实他的间谍身份。如果他没有办法证明，就不要与他合作。有可能他（即伯恩斯坦）根本没有背景……只是利用前苏联的幌子，希望能打探到什么。如果他只是出于个人意愿，不要理睬他。”

其后，贾菲与伯恩斯坦又约见过几次，均处于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控之下，他们甚至还相互交流了一些情报。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贾菲、罗思及其他几名同党以阴谋间谍罪被捕，

在此之前，伯恩斯坦一直未能安排贾菲与他的前苏联上级见面。虽然联邦调查局确信伯恩斯坦是前苏联间谍，但一直未将其捉拿归案，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负责监听的速记员将伯恩斯坦的名字误写成“贝斯利”，也可能是因为通过监听获得的证据不为法庭所承认。

根据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可以证实，伯恩斯坦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特工。维诺那计划的电文清楚地显示，伯恩斯坦通过多条渠道为军事情报部窃取信息。电文中还披露了分别为克格勃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的另外两名间谍的活动，他们是菲利普·基尼（Philip Keeney）和玛丽·简·基尼（Mary Jane Keeney）。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五封密电提到侯爵/伯恩斯坦，均发自一九四三年。在其中的一封密电中，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负责人帕维尔·米卡洛夫（Pavel Mikhailov）报告称，他已经和比森（Bisson）成为朋友。在这封电文中，比森采用真名，在后来的电文中，比森化名为“阿瑟”。比森刚刚离开“经济战委员会”，被调往“太平洋关系学会”，同时“在侯爵的刊物编辑办公室工作”。伯恩斯坦当时仍然在《美亚》杂志社工作，比森则是贾菲的密切合作伙伴。多年来，比森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拥护者，是《今日中国》及《美亚》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他一贯宣扬，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并非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文章中表示，对“所谓的共产主义中国”应该称之为“民主中国”，毛泽东所采纳的机制“从本质上讲，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九四三年，比森被“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传讯，他否认支持共产主义，并发誓声称，他的一切活动只是为了让美国更好地理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国。或许，正是为了更好地推行

他的理念，比森于一九四三年将“经济战委员会”的绝密情报提供给伯恩斯坦，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随即将情报通过外交邮袋寄往莫斯科，并通过密电告知莫斯科，这批情报极具价值，其中包括英美联合对苏维埃及德国前线的军事状况的评估，美国部队从海路前往中国的报告，驻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关于中日两国实业家贸易往来情况的报告以及美国领事对海参崴情况的报告。

在另外一封密电中，伯恩斯坦汇报了美国驻印度特使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的报告以及《美亚》杂志记者采访中国战争部长的报告。在第三封密电中，比森提供了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情况以及美国政府准备直接联络国民党，意图在美国控制的中国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的情况。

图书馆间谍：菲利普和玛丽·简·基尼

菲利普和玛丽·简·基尼是伯恩斯坦领导下的一对间谍夫妻，是一对颇有意思的激进派人士。身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基尼夫妇一举成名是在一九三七年，当时，菲利普·基尼因参与激进活动被蒙大拿大学解聘，从而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基尼夫妇向法院提出起诉。在等待裁决期间，他们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经常与共产党人接触。从玛丽·简的日记中可以发现，基尼夫妇是美共俱乐部的成员。一九四〇年，菲利普受聘于国会图书馆，随即被调往“战争服务办公室”，担任图书馆工作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玛丽·简为“经济战委员会”工作。夫妻二人在华盛顿的美共阵线中十分活跃，与西尔夫马斯特夫妇、威廉·厄尔曼、莫里斯·霍尔珀林等后来被确认为前苏联间谍的共产党人交往频繁。一九四五年十

一月一日，玛丽·简前往欧洲，为“盟国赔偿委员会”工作。与此同时，菲利普前往东京，在麦克阿瑟将军的统领下，协助重建日本图书馆系统。玛丽·简·基尼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返回美国，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特工约瑟夫·伯恩斯坦见面。菲利普于同年秋天回到美国，一九四七年一月，再次回到日本。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三封电文提及基尼夫妇。第一封电文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发出，由费庭将军从莫斯科致电纽约的朱比林。电文只被部分地破译，隐约可以推断，其内容有可能是克格勃莫斯科总部针对派人渗透到“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建议，也有可能是莫斯科方面对朱比林较早前提出的建议做出回应。四十年代初，“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国会图书馆办公，电文中提到，约各布·格罗正是在国会图书馆与菲利普·基尼见面。五月二十二日，朱比林回电费庭指出，基尼“已经获得我们的信任”，言外之意，将会履行对基尼的录用程序。然而，基尼未能在一九四二年被克格勃正式录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在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克格勃的一位极任劳任怨的特工、俄国移民瑟奇·库纳科夫（Sergey Kurnakov）在一九四四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显然，‘邻居’（即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早在一九四〇年就已经录用了基尼和他的太太。”

一九四四年，克格勃决定完全取代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对基尼夫妇的控制权。通过“一条绝密线索”，联邦调查局得到玛丽·简的一本日记，记录了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发生的事件，截获并拆阅了玛丽与菲利普之间的书信。这些材料详细记载着库纳科夫如何逐步将基尼夫妇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挖到克格勃旗下。就在库纳科夫涉及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报告发出一个月前，在玛丽的日记中记载道，基尼夫妇与一位自称

“托马斯上校”的人共进晚餐。玛丽写道：托马斯“带我们去吃晚饭，后来他才发现，原来他是在白费功夫。”联邦调查局确信，托马斯上校正是库纳科夫，玛丽为了保密起见，为库纳科夫选用了化名“托马斯”。这一论断的根据之一在于，在玛丽的日记中提到，托马斯即将离开美国返回祖国，这与库纳科夫返回前苏联的时间相吻合。在基尼夫妇的通信中多次提到托马斯即将回国的事情。十二月二十日，菲利普在信中写道，托马斯“能够回国真是件大喜事，我快要羡慕死了”。有一张托马斯亲笔写的便笺，上面提到他将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回国，而库纳科夫正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离开美国。玛丽所谓的“白费功夫”自然是指托马斯发现原来基尼夫妇已经在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

基尼夫妇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已确立的关系并没有打消库纳科夫网罗他们为克格勃工作的念头，而且就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这段期间，基尼夫妇果真投身到克格勃的旗下。十一月份，菲利普正在纽约为前往日本做准备。他给玛丽写过几封信，清楚地表达他的忠心与决心。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信中，菲利普写道：“我们的朋友们，包括托马斯在内，已经清楚地表示，将会交给我一项任务。”十一月二十四日，菲利普提出，他准备在纽约期间与托马斯上校以及伯恩斯坦见面。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中，菲利普自豪地宣布，他“与托马斯上校”面谈数个小时，“他的名字在高层当中无人不知。”十二月一日的信中写道：“昨晚，我和托马斯上校长谈，我感觉到自己肩负着沉重的使命。”

菲利普·基尼虽然成为克格勃的一分子，但是在日本期间，他未能提供任何情报。菲利普在写给妻子的几封信中提到，他在约瑟夫·伯恩斯坦的领导下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门的工作不

见成效。一九四六年二月二日，菲利普从东京写信给玛丽·简：“我觉得托马斯上校很快会向我们下达命令。我能肯定，会有任务交给我们。我有一种感觉，我们随时都会出征。这种感觉比过去几个月的任何时候都强烈。”然而，两个月后，菲利普在信中写道：“如果不是因为和托马斯上校的那次长谈，我也不会来到日本。只是，现在在日本同在伯恩斯坦手下工作没有什么分别，都很沉闷。或许，我应该听从格雷格的建议，不要太过心急。”

一九四六年，随着伊丽莎白·本特利的投诚以及艾哥·郭岑可在加拿大叛变，美国政府加紧对前苏联间谍的清查，基尼夫妇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一九四六年三月，玛丽通过朋友将一封信转交给在日本的菲利普，提醒菲利普在给西尔夫马斯特等老朋友们写信时措辞要谨慎，因为他们的朋友们担心自己的住处被窃听，私人邮件被查阅。玛丽在信的末尾写道：“约瑟夫通知我和在纽约的其他人要多加小心。对你我来说，虽然目前没有任何不好的动向，但是小心行事总是必要的。”两个月后，玛丽在信中通知菲利普，他们在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联络线索被暂时冻结。“约瑟夫·伯恩斯坦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重新开始工作，他说，加拿大事件后患无穷。”“加拿大事件”指的就是郭岑可在渥太华叛变的事件。

基尼夫妇双双丢掉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但并未因间谍罪被起诉。玛丽·简在联合国谋到一个职位，但是最终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被联合国解雇。夫妻二人被国会调查委员会传讯，但二人采取不合作态度，被判以藐视国会罪，经上诉之后，此项罪名被撤销。基尼夫妇后来开办了艺术电影俱乐部。他们在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联络人约瑟夫·伯恩斯坦也最终逃避罪责，成为一名翻译兼作家。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和林肯兵团

通过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所发现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特工中，有几位特工曾经在亚伯拉罕·林肯兵团服役。有一封从纽约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提到一个名叫丹尼尔·亚伯拉罕·扎拉特（Daniel Abraham Zaret）的人，这也是惟一一封涉及扎拉特的电文。扎拉特曾经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第十五支队担任副官，一九三八年返回美国。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以前，他曾就职于多间火药工厂，最后一个职位是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波特火药厂任助理董事。之后，他被推举为设在芝加哥的战争部火药分部的安全生产监测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发给莫斯科的密电中称，扎拉特提供了有关炮弹、炸药、鱼雷等生产材料方面的数据。

共产党组织委员、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托马斯·巴宾（Thomas Babin）也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内线之一。巴宾一九〇一年出生于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一九二五年因参与共产主义运动被驱逐出美国，但于一九二八年返回美国，并以非法手段滞留，成为在美国的克罗地亚共产党人的领导人以及美共在纽约港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间，巴宾参加西班牙内战，最初在巴尔干分队，后来被调往亚伯拉罕·林肯兵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新泽西州霍博肯从事码头工人工作，后来在“战略服务办公室”任职很短一段时间。

巴宾化名“布雷姆”。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可以发现，他一直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保持密切联系，频频汇报他在“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工作情况。显然，巴宾当时正准备与一批南斯拉夫人一同前往开罗受训，之后将被派往南斯拉夫，充

当反纳粹政党的联络人。巴宾曾建议将其中的几名受训成员发展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内线。但是，就在受训人员准备离开美国之前，巴宾因病，又或是因为受伤，未能与他们同行。一九四三年七月，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致电询问，“应我们的要求，布雷姆（即巴宾）推荐他们去学校受训，布雷姆问，如果他不能一同前往，应该如何处理。”除了向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提供“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情报之外，巴宾还源源不断地提供纽约港的航运情况，包括货品、船舶类型、目的地等数据，这些情报很可能来源于巴宾网络中任职水手及码头工人的共产党人。

伦纳德·明斯（Leonard Mins）：一个 不容忽视的间谍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特工中，最知名的人物当属伦纳德·明斯。像伦纳德·明斯这样有着鲜明的共产主义倾向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到绝密信息并能提供给苏维埃联盟，可见美国的政府部门是多么容易被间谍势力渗透。明斯在“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只有一年多，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末，他的主要工作是在亚洲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探测战略性矿产及油田储备。一九四三年，明斯被“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传讯。明斯坚决否认自己是美共成员，否认参与过任何共产党组织。不过，他承认曾经在共产党开办的工人学校教书，亦曾在共产党控制的《党派评论》编委会任职，为美共的《新大众》撰稿，并且是与美共有关的“美国作家同盟”的会员。明斯亦承认曾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居住在莫斯科，但他声称只是在“苏维埃科学院”从事翻译工作。

明斯证词的可信度受到怀疑。几个月后，“战略服务办公室”将明斯解雇。虽然“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对于明斯的陈述持怀疑态度，但是，明斯背景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委员会的想像。明斯在委员会面前声称，他在莫斯科居住期间曾经在“苏维埃科学院”工作，但实际上他是在为共产国际工作。一九二五年，美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向美共索取意见，要求就明斯向莫斯科共产国际提供的个人资料加以确认。明斯向共产国际表示，他于一九一九年加入美共；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在德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担任翻译；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在德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在美国从事党的工作；一九三四年，将党组织关系转至苏维埃联盟。一九三八年，明斯在法国与一批流亡的反纳粹德国作家一同工作，其中有一位作家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东德间谍头子及秘密政治警察局官员马库斯·沃尔夫（Marcus Wolf）的父亲。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他的老朋友伦纳德·明斯，称他是“一名流亡共产党人，我父母的好朋友。我父亲在法国被拘禁期间正是通过他与家人沟通。”

伊丽莎白·本特利在她的证词中写道，她的谍报网成员曾经在“战略服务办公室”碰巧遇到明斯，很是担心被别人看见他与明斯接触，因为明斯的共产党人特征过于鲜明。本特利曾经就此事向格罗抱怨，格罗表示认同，认为不应该启用这样一个有着明显共产主义倾向的人充当间谍。格罗说，“他几乎是将镰刀斧头印在胸前，手里挥舞着红旗在华盛顿招摇过市。”

尽管如此，明斯还是在“战略服务办公室”的俄国部谋得职位。明斯的化名“史密斯”曾经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出现，他在密电中向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透露了美国军事情报官

员正在试图破解前苏联的密码体系，并曾试图攫取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进行磋商的绝密文件。

明斯的另一项任务是为前苏联发掘有潜力的情报内线。他向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汇报，他的一位朋友伊萨多·斯坦伯格（Isador Steinberg）受雇于“战争部出版局，对于军事出版事务了如指掌。他是美共成员，在纽约开办‘图文生产公司’。”明斯与斯坦伯格私交长达十五年，他强力推荐将斯坦伯格招募为内线。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评估后指出，“我们认为他（即斯坦伯格）既可以向我们提供战争部内部刊物中的情报，又可以提供军事及政治方面的一般情报。”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另外一封密电涉及一位化名“克拉克”的政府官员的情况，明斯有意将其招纳为内线。此人的真实身份未知。由于克拉克不是共产党人，明斯与之接触时表现得比较谨慎。在另外一份密电中提到，明斯与美国陆军的一位中校有过接触，并且将一位经济学家提名为招募对象。由于“战略服务办公室”已经开始对明斯进行调查，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指示明斯，“在目前情况下，不要以私人名义约见”这些招募人选。

一九四三年八月，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发出的密电阐述了明斯对于忠诚与背叛所谓的价值观。在多纳文将军将明斯开除出“战略服务办公室”之后，明斯提出上诉，要求恢复其在“民事服务委员会”的职位。在这封电文中，明斯自豪地向前苏联情报部门宣称，“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六位同事，包括俄国部负责人阿瑟·罗宾逊在内，均向有关部门证实，明斯对于“战略服务办公室”忠心耿耿，完全值得信赖。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鼯鼠”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在美国政府内部安插了至少一名以上长期潜伏的内线，“鼯鼠”便是这场间谍战中的经典。虽然鼯鼠对外持移民身份，但他实际上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职业官员。一九三八年，鼯鼠出现在洛杉矶，他自称是出生在波兰的加拿大移民，他的加拿大护照上的名字是伊格纳斯·维萨卡（Ignacy Witczak）。他被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取，获得政治科学学士及硕士学位，之后继续修读博士学位。他有妻子和一名幼童。一九四五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密码员艾哥·郭岑可在加拿大叛变，维萨卡被曝光。郭岑可之所以熟悉维萨卡，是因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向维萨卡提供的假身份证件发生了问题。

维萨卡（真名未知）所持的加拿大护照，其真正的主人是一名波兰移民。真正的伊格纳斯·维萨卡于一九三〇年移民加拿大，一九三六年成为加拿大公民。之后，维萨卡参加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期间，维萨卡向自愿提供身份证明的美国人及加拿大人收集他们的护照，提供给前苏联情报机构使用。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误以为维萨卡在西班牙阵亡，于是将他的护照提供给特工们使用。然而，真正的维萨卡并没有战死疆场，而是回到加拿大。因此，一九四五年，当维萨卡的加拿大护照到期时便发生了问题。如果“鼯鼠”持这本护照申请延期，加拿大方面将会发现，有两个维萨卡存在。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官员指示加拿大共产党组织领导人兼前苏联特工萨姆·卡尔向加拿大官员行贿三千美金，将此事蒙混过关。然而，就在维萨卡的身份问题刚刚得到解决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郭岑可叛变，并将此事告发给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方面将维萨卡知会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对维萨卡实行监视。联邦调查局发现，维萨卡一直以来的工作是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兼职讲师，年薪不过一千七百美元，然而他在银行的存款却高达一万六千美元。一九四六年，维萨卡从洛杉矶前往纽约和华盛顿。联邦调查局一路跟踪监视，发现维萨卡将一些材料交给在内务部工作的律师伦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他们之间的会面显然经过事先安排，见面地点选择在国会图书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秘密潜入维萨卡在纽约的旅馆房间，发现一本通讯录上有温斯顿·伯德特的家庭住址（有关伯德特的详情见第三章）。维萨卡可能已经获悉郭岑可叛变的消息，并且觉察到自己的行动遭到监视，他于一九四五年底销声匿迹，有可能返回苏维埃联盟。

在郭岑可的印象中，维萨卡发展了一批藏匿至深的间谍力量，一旦美苏外交关系破裂，或是有任何意外发生，导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官员无法继续以外交身份活动时，这批备用队伍便会启动。根据联邦调查局退休官员罗伯特·兰菲尔的说法，联邦调查局在加利福尼亚逮捕了数名被维萨卡招募的间谍，其中有人招供，但是没有人遭到起诉。前共产党人阿诺德·克里格（Arnold Krieger）博士后来承认，维萨卡曾经试图网络他在亚洲及拉丁美洲从事秘密使命。虽然联邦调查局的分析人员未能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确认到维萨卡的踪迹，但是他们在电文中发现一个缩写为“R”的前苏联非法谍报官员，相信极有可能就是维萨卡的化名缩写。一九四六年一月，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向莫斯科汇报，“R”的家人已经登上前苏联的“萨卡林”号轮船离开美国。维萨卡的妻子布娜同样持有虚假的加拿大护照。联邦调查局监视发现，布娜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儿子一同于一九四六年一月搭乘“萨卡林”号轮船逃往国

外，由此推断，“R”可能就是指维萨卡。

在被破译的维诺那电文中，曾经提到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加拿大特工弗雷德·罗斯。此人是加拿大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罗斯出生于波兰，一九二六年成为加拿大公民。四十年代初，罗斯一直与约各布·格罗保持秘密联络。伊丽莎白·本特利在证词中指出，萨姆·卡尔和罗斯向格罗提供过数名加拿大人作为同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黑曾·赛斯（Hazen Sise）便是其中之一。黑曾·赛斯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后来在华盛顿的“加拿大电影局办公室”工作。一九四三年，罗斯作为共产党的分支——工人进步党——候选人竞选下议院席位。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负责人帕维尔·米卡洛夫通过密电自豪地向莫斯科宣布：“弗雷德，我们在‘列索维亚’（俄文意思是‘森林’，前苏联情报部对加拿大的秘密称谓）的同志当选‘列索维亚’议会成员。”郭岑可背叛之后，罗斯被捕，被判入狱六年。一九五一年，罗斯出狱后前往共产主义波兰，一九八三年于波兰去世。

四十年代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

效力的其他美国特工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另外一批特工由共产党秘密武装成员查尔斯·欧文·维尔森（Charles Irving Velson）负责。维尔森有着非同寻常的共产党人家庭背景。他的母亲克拉拉·莱姆里奇·莎维森（Clara Lemlich Shavelson）是一名普通的制衣女工，然而，她在一九〇九年发表过一次令人群情激昂的讲演，引发一场由“国际妇女制衣工人联合会”领导的全行业的罢工浪潮，从此踏上漫漫的共产党人征途。查尔斯·维尔森（从一九

三九年或一九四〇年开始改用此名)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厂担任机械师。国会调查员相信,维尔森在此期间已经开始充当秘密武装负责人约瑟夫·彼得斯的投递站,并参与罗伯特·奥斯曼代表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策划的在巴拿马运河区的间谍活动。对于维尔森参与在巴拿马运河区的间谍活动,其根据来源于美共成员、林肯纵队老兵以及维尔森的相识罗伯特·格莱尼克(Robert Glandnick)。格莱尼克称,三十年代初期,维尔森还曾协助美共反军国主义运动负责人伯纳德·切斯特(Bernard Chester)工作,主要任务是在美国军事部门发展秘密共产党组织。三十年代中,维尔森接替切斯特成为反军国主义运动负责人(切斯特是伯纳·舒斯特在美共内部的化名,四十年代初,他是美共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国会委员会曾质询维尔森与彼得斯的关系,但是维尔森拒绝回答。

被破译的维诺那电文证实,维尔森多次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执行任务,并曾受命与前苏联情报部门准备发展的一名招募对象会面。维尔森曾在一封密电中报告,据悉,美国方面正在试验口径为七十五毫米的机关炮,但一直未能获得有关数据。在另外一封密电中,另一名特工米尔顿·施瓦茨(Milton Schwartz)向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申请借款一千两百美元,用以支付其父亲的医药费,维尔森对施瓦茨的申请加以认可。

前苏联海军情报部

在前苏联的三个情报机构中,海军情报部的规模比隶属于陆军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要小,与克格勃相比,其规模仅相当于克格勃的一个部门。然而,海军情报部也在美国设有情报

站，并且发展了几条相当有价值的情报来源。杰克·费伊是海军情报部的内线之一。他曾参加共产国际的国际纵队出征西班牙国内战争，从此与前苏联建立起渊源。费伊一九〇八年出生于华盛顿，在纽约长大，他的父亲是“沃特费伊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从事股票交易。一九二八年，费伊协助赫伯特·胡佛进行总统竞选，之后，进入家族公司工作。一九二九年的股灾令费伊对共和党彻底失望，他转而加入社会党。费伊生性喜欢冒险，曾先后在纽约大学、日内瓦国际事务学院、秘鲁的圣马科斯大学、北卡罗来纳的黑山学院读书，并在蒙大拿州立大学修读畜牧业。费伊自己成立了几家小型公司，并于一九三三年在秘鲁成立一家从事食品生意的公司。一九三七年，费伊在社会党的感召下加入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此举与共产党的宣传无关。

在西班牙期间，费伊担任卡车司机，并于一九三八年因伤回到美国。很快，他与社会党领导人诺曼·托马斯在西班牙内战问题上发生分歧，费伊在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上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社会党。一九三九年夏，费伊与曾在莫斯科担任记者，后来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新闻机构工作的罗伯特·米勒碰面，两人成立了“半球新闻服务公司”，向美国报界提供拉美国家的情况。公司的资金主要来自米勒继承的家产。他们雇用约瑟夫·格雷格负责公司的业务运作。格雷格曾与费伊一起在西班牙担任卡车司机。公司成立后一直举步维艰，直到一九四一年成为“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的签约调研机构，后来更进一步被其合并。“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成立于战争时期，专门负责协调中南美洲外交、宣传及经济事务。

费伊很快便离开“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任职“经济战委员会”，头衔是“首席情报官”。一九四三年，就在费伊即

将被调任内务部“领土事务局”主席时，众议院议员马丁·戴斯将费伊列入被怀疑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染的政府雇员名单。费伊接受了“科尔委员会”的传讯，认为他当年公开声明退出社会党的行为“是愚蠢的”，并且将他过去与共产党的联系视为年少无知。委员会经调查确信，费伊在一九三八年之后“走上正规，没有加入过任何组织，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或演说”，并且有很多人对于费伊的品质赞赏有加。委员会一致认为，费伊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忠心耿耿”，“没有参加任何颠覆活动”。然而，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的证据可以将“科尔委员会”的论断驳斥得体无完肤。几乎就在费伊向国会委员会否认参与任何共产主义运动，声称早已退出政治活动的同时，费伊还在向前苏联海军情报部官员、前苏联驻华盛顿海军武官乔治·斯特帕诺维奇·帕斯科（George Stepanavich Pasko）提供情报。一九四三年一月，海军情报部莫斯科总部决定向马克斯威尔（费伊的化名）支付一笔特殊费用，作为对他的工作的奖励。同年二月发出的两封密电中再次强调费伊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海军情报部莫斯科总部的海军中校指示驻华盛顿情报站，“就马克斯威尔（即费伊）提供的两条重要政治情报，与‘大师’（即前苏联大使）磋商，并将结果电报给我。附言注明：‘已报大师’。”

尤金·富兰克林·科尔曼（Eugene Franklin Coleman）从未在政府部门担任过要职，从未被国会委员会传讯，也从未被人指控是共产党人或是反共产党人，总之从未引起公众的注意。然而，从维诺那计划的电文中可以发现，他是前苏联一名十分重要的特工人员。一九四二年八月，前苏联海军情报部向共产国际发出问询，调查有关科尔曼的资料。海军情报部称，科尔曼在一家电话公司工作，是一名共产党人。身为电子工程师的科

尔曼先后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六份密电中出现。从电文内容可知，一九四三年初，前苏联海军情报部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录用科尔曼，并于七月做出录用的决定。当时，科尔曼在新泽西州的一家实验室工作，负责开发协助飞机高空轰炸的无线电导航设备。一份密电中提到，科尔曼负责编写该设备的实用手册。除了提供情报之外，科尔曼还将目光投向另外四名从事其他国防设备开发的工程师共产党人身上，向前苏联海军情报部提供了他们的姓名及背景，意在将他们逐步发展为情报内线。由于人手有限，海军情报部请求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机构代为考察这几名工程师的背景。

前苏联海军情报部亦曾向兄弟机构请求协助，设法让一名非法情报官员进入美国。这名非法情报官员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的化名是“澳大利亚女人”或“萨丽”，她的真实姓名是弗朗西斯·亚克尼娜·米第能（Francis Yakilnilna Mitynen），她进入美国所持假身份文件上的姓名是伊娜·玛格丽特·帕特森。萨丽/米第能是苏维埃公民，出生于澳大利亚。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十九份密电涉及萨丽。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向莫斯科发出一封冗长的电文，详细列数了如何“让澳大利亚女人拥有合法身份”，包括所需要的文件，诸如出生证明、驾驶执照等；协助萨丽从苏维埃船只上登陆进入美国可能遇到的麻烦（他特别指出，苏维埃的女水手与美国妇女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别是苏维埃妇女常穿的袜子，贝雷帽……手袋等等均不同于美国妇女的装束。而且，苏维埃妇女不注重整洁，也不讲究发型与化妆）；在旧金山或是波特兰登陆的利弊比较以及经美国内陆前往纽约的多种途径。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有关萨丽潜入美国的种种细节被一一落实。旧金山被选定为进入美国的第一站，在旧金山和纽约均

安排有人接应，暗语及接头信号业已确定，选购了符合美国妇女着装风格的服饰，并为萨丽准备了一份详尽的“身世背景”。不过，海军情报部依然需要寻求援助，莫斯科方面为此大为光火，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的密电中指出：“你们有足足八个月时间为萨丽的登陆做准备，而且你们自己有充足的人手，却仍要向邻居（即克格勃或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求援，令人感到羞愧。”电文要求最后一次确认有关细节。一九四三年八月，萨丽到达美国，并成功地混入美国社会。联邦调查局据悉，萨丽于一九五六年离开美国，至于她在美国的具体任务，至今未知。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分布在美国的秘密内线中，另有两名特工的名字通过破译电文，又或是通过反间谍行动被捕获。其中的一名是路斯奇古罗出版公司总裁西奥多·拜尔，另外一名是被称为“戈登”的女共产党人，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在纽约的一个谍报网的负责人选。虽然“戈登”这个名字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并没有出现，但是此人很可能就是洛提·戈登（Lottie Gordon）。三十年代，她在俄亥俄州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部长。她的丈夫戴维曾参加过亚伯拉罕·林肯纵队。

另有二十五名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秘密内线未能被联邦调查局或国家全部挖掘出来。例如在财政部任职的瑟贝鲁斯，他一度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失去联络，一九四五年时曾试图通过美共重新与军事情报部建立联系。还有杰克，曾经向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泄露美国导弹情报。其他内线则分布在“战争生产委员会”、美国海军、“经济战委员会”以及“海运局”。还有人任职记者。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特工，在人数上可能不及克格勃，但是依然从美国源源不断地攫取到重要情报。

美国政府内部的间谍

前苏联情报部门得到美国政府内部多位身居要职的高层官员的协助，其中包括哈里·怀特（助理国务卿），阿尔杰·希斯（国务卿助理），洛赫林·柯里（总统行政助理）。与此同时，前苏联在美国政府基层发展的内线人数亦相当惊人，且遍布军事和民事的所有重要部门。本章针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逐一分析前苏联间谍势力的渗透情况。

战略服务办公室

欧洲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领导人才意识到，美国掌握外国情报的力量十分有限。陆军及海军的情报部门偏重于军事应用领域，特别是战地情报和信号情报，只有极有限的资源用于搜集政治、外交及经济领域的情报。国务院的工作虽然包括对外交及战略情报的收集，但是利用秘密手段收集情报并不在其职能范围之内。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有能力组建敌后突击队或游击队，又或是开展宣传攻势或心理战。因此，一九四一年中，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罗斯福总统授命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上校组建“情报协调办公室”，专门负责这

类事务的运作。随着美国宣布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情报协调办公室”迅速扩大，一九四二年，它被分拆为几个独立的机构。“情报协调办公室”中，原先负责对美国国民及盟国国民开展宣传攻势的部门独立成“战争情报办公室”；专门负责对中南美洲局势分析及宣传工作的部门被并入纳尔逊·洛克菲勒领导的“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联邦调查局依然负责在中南美洲猎取情报。“情报协调办公室”的主要职能，即外国情报收集与分析、秘密活动及突击队行动，以及针对敌对国家展开的宣传攻势，依然由多诺万负责，更名为“战略服务办公室”。

多诺万领导的战略服务办公室是美国第一家专门从事战略情报分析的机构，上千名学术专家（包括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垃圾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被纳入战略服务办公室，对从公开及秘密渠道获取的情报加以分析，为总统、军事首脑及国务院制订战略决策提供依据。战略服务办公室还在欧洲及亚洲国家派驻谍报人员，负责在当地招募特工，组建谍报网；向欧洲被占领区空投颠覆部队；利用无线电手段展开宣传攻势；向敌区发放传单，扰乱敌人军心，唤起被德日占领地区人民的反抗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略服务办公室是美国最主要的外国情报机构，是现时“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随着有关战略服务办公室被共产党人渗透的传闻日盛，一九四五年三月，国会委员会就战略服务办公室四名官员的背景向多诺万发出疑问。这四个人包括米尔顿·沃尔夫（Milton Wolf）、文森特·洛索维斯基（Vincent Lossowski）、欧文·法加斯（Irving Fajars）以及欧文·戈夫（Irving Goff）。他们都曾参加国际纵队，并于一九四五年在战略服务办公室驻意大利机构工

作。多诺万向国会委员会作证，他已经调查过这四个人的背景，“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是共产党人。我本人也不认为他们是共产党人。”国会委员会追问多诺万，这四个人是否曾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多诺万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然而事实上，这四个人全部是共产党人，其中有两个人，即法加斯、沃尔夫和洛索维斯基曾于三十年代加入共青团。

多诺万向国会委员会保证，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背景都经过审核，“我一直在尽可能收集信息，判断他们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或是共产党人。我一向坚持疑人不用。”鉴于某些情报工作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相当高，有国会成员问多诺万，他是否会因此雇用一些人，“即便此人曾经是共产党人……又或是参与……某些共产党杂志。”多诺万依然坚定不移地表示：“我在此确认，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事实上，多诺万是在撒谎。从一九四一年“情报协调办公室”建立初始，多诺万就招募了数十名共产党人，而且他对这些人的共产党背景了如指掌。通过米尔顿·沃尔夫的介绍，多诺万从国际纵队的退伍军人当中招募人手，派往欧洲被占领区，开展突击队工作。其中的大多数人是共产党人。多诺万要求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能够与不同的抵抗团体和游击队合作，这就需要工作人员具备外语技能，有与外国部队并肩作战的经验以及实战经验。而国际纵队的这批共产党人人选正具备这些苛刻的条件。而且，一些抵抗组织本身就为共产党领导，如果战略服务办公室派出的工作人员同样具有共产主义信仰，则与他们建立联络就方便许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战略服务办公室的高层官员一直为多诺万保守秘密，对外宣称，战略服务办公室从未主动招募过共产党人，但是不排除有极少数共产党人混入办公室内部。

但是亦有人毫不讳言当初录用共产党人的情形，指出被录用的共产党人都具备要求的技能，从不隐瞒自己的共产党人背景，而且愿意遵从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政策章程。据悉，曾经有数位战略服务办公室的雇员因为隐瞒共产党人身份，或是利用共产主义信仰破坏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既定目标，最终被多诺万解雇。其中的实例之一便是史蒂芬·第提杰（Stephen Dedijer）。第提杰是塞尔维亚人，被战略服务办公室录用后派驻南斯拉夫工作。有确凿证据证明，第提杰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派往美国的工作人员，在共产党的塞尔维亚语报纸担任编辑，他的弟弟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的助手。战略服务办公室认为，第提杰的共产主义烙印过深，无法与南斯拉夫的非共产党人士合作成功，决定解聘第提杰。另外一个实例已经在第六章中涉及，即伦纳德·明斯因为隐瞒他与共产党的联系遭到多诺万的解雇。

多诺万在国会委员会面前并没有道出实情。不过，他曾经颇为坦白地对一位助手说过：“如果能让我相信斯大林会帮助我们粉碎希特勒，我会同样把他列入雇用名单。”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的共产党人包括两类，一类是在多诺万雇用他们时就已经了解其共产党人身份，另一类则是隐瞒了共产党人身份在战略服务办公室谋求到职位。研究人员在战略服务办公室的俄国部、西班牙部、巴尔干部、匈牙利部、拉美部和分析部门，以及战略服务办公室驻扎在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及德国的分部均发现有共产党人任职。虽然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的共产党人的确切人数一直未知，但预计其总数至少在五十人以上，甚至可达一百人以上。

在二次大战期间，希特勒是美国的头号劲敌，多诺万将军录用共产党人的决定虽然不失为一项明智之举，但隐患无穷。战略服务办公室利用了共产党人的力量，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

高昂的，为克格勃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在美国最主要的情报部门发展内线打开方便之门。多诺万有充分的理由解释他录用共产党人的决定，然而他在国会委员会面前的谎言却是不可饶恕的。而且，他的决定并不符合政府的明文规定。一九四二年，在二战初期，罗斯福政府曾下令立即将共产党人从政府部门驱逐出去。后来，一九四四年，政府令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在军事部门任职，但是不可以进入军事技术、秘密及情报等绝密部门。

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涉及到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的十二名前苏联间谍。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另外有四个使用化名的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充当前苏联情报部门内线，其中有三个人真实身份已经被落实。另外一个化名始终未能被破解，国家全部将此人称作“未破解化名第六号”。此人于一九四三年在战略服务办公室驻阿尔及利亚机构工作。根据克格勃密电中的内容，此人曾参加国际纵队，被战略服务办公室派往阿尔及利亚工作，主要任务是与意大利和巴尔干的抵抗力量合作。

被确认出真实身份的三名内线包括弗朗兹·纽曼（Franz Neuman）、林·法拉什（Linn Farish）和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纽曼化名“羽毛”，于三十年代初逃往德国，一九三六年返回美国，成为美国公民。一九四二年，纽曼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就职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德国部。法拉什化名“阿提拉”，在战略服务办公室负责与南斯拉夫铁托党势力联络。一九四四年九月，法拉什在巴尔干的一场飞机失事中遇难。一九四二年五月，瓦西里·朱比林在一份密电中涉及战略服务办公室的俄国部的情况，他指出，“我们的内线伊瓦诺夫”在俄国部担任分析员，此人正是指约翰·斯科特。斯科特的父亲是激进作家

斯科特·尼尔林。斯科特从未公开承认其共产党人身份，只是承认他曾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在美共的“工会团结同盟”担任组织委员。一九三二年，斯科特移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作近十年。这座城市在斯大林的五年中被列为首要发展的钢铁城市。斯科特在苏维埃结婚，后来带着俄国妻子返回美国。一九四二年，斯科特的著作《乌拉尔背后：一个美国工人在俄国钢城》（Behind the Urals: An American Worker in Russia's City of Steel）出版。他在书中记录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兴建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认为这座钢城是集体力量下诞生的奇迹。然而，斯科特的这部著作并不只一味地歌功颂德，他如实记录了在过度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工业事故、高劳动强度以及生产效率低下而付出的惨重的人类代价。他同样记述了在集体化过程中，农民们丧失土地而被迫转为工人的悲惨境况以及在实施意识形态领域的清洗活动中所带来的种种创伤。然而，他并没有对苏维埃共产主义丧失信心。他在书中阐述，苏维埃人民相信（斯科特本人也表达了同样的信念），“值得流血、流汗、流泪”，为“建立远远进步于西方的新社会奠定基础，人民在新社会中不仅可以享受到自由，而且拥有绝对的经济保障。”

在维诺那计划的电文里，另外还有一些未被破解的化名，这些前苏联情报内线有可能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也有可能是在二战时期建立的其他机构工作，且有机会接触到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文件。例如，在一九四五年的一封密电中提到，一个缩写为“I”的克格勃内线盗取了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文件。在一九四三年克格勃发出的密电中，涉及克格勃安插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及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内线，其中包括一个未能确认真实身份的化名。这个被称作“未破解化名第十九号”的内线就职于

上述两个办公室其中的一个，但究竟是哪一个，不得而知。一个名叫霍鲁斯的人就曾将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情报提供给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美国公民卡扎，有可能是南斯拉夫血统，曾经将战略服务办公室派往南斯拉夫被占领区的人员名单提供给克格勃。在一封密电中指出，战略服务办公室曾要求卡扎参与这项任务，至于卡扎是否接受任务，不得而知。另外还有“欧可”（又或许是“欧友”，西班牙文的含义是“眼睛”）亦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服务，并于一九四四年向克格勃提供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情报，至于他本人是否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无人知晓。

在战略服务办公室活跃的前苏联特工究竟有多少人？鉴于维诺那计划未能破译的化名特工有可能与通过其他途径确认的特工是同一个人，所以战略服务办公室内前苏联特工的具体人数不详。估计至少在十五人以上，确切数字应该在二十人左右。这个数字已相当保守，因为尚有大量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及克格勃的密电未被破解。考虑到战略服务办公室内的共产党人人数至少在五十人以上，甚至高达一百人，其中至少每七名共产党人中间，甚至是每三名共产党人中间就有一人是前苏联间谍。

战争情报办公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情报办公室是美国最主要的宣传机构。一九四一年，战争情报办公室是多诺万领导的“情报协调办公室”的一部分，一九四二年六月独立出来，由著名的电台新闻评论员、罗斯福总统的热忱支持者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领导。战争情报办公室的职责包括利用印刷、

电台、电影及其他媒体手段向美国国民、盟国国民及中立国国民宣传正面的、具有鼓舞性的战事消息。针对敌对国家的宣称攻势则主要由多诺万的战略服务办公室负责。虽然战争情报办公室对于国内媒体不具备审核权，但是它基本上控制着国内的印刷媒体，并利用非正式途径迫使美国报界及杂志界遵从它的纲领。对于违背纲领的电台媒体，战争情报办公室则向对电台拥有管理权的“联邦通讯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吊销该电台的广播执照。

同战略服务办公室一样，战争情报办公室亦录用共产党人。尤金·丹尼斯在发给前苏联的密电中称，共产党组织与渗透在战争情报办公室宣传部及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共产党人保持联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之后，有国会成员及其他方面人士谴责战争情报办公室录用共产党人，令战争情报办公室为苏维埃的利益服务。一九四三年，共和党人约翰·列辛斯基（John Lesinski）在议院发表演说，提醒战争情报办公室负责人埃尔默·戴维斯，在战争情报办公室波兰语部门中，有几个人有亲苏维埃倾向。波兰流亡政府驻美国大使简·契卡诺斯基（Jan Ciechanowski）也曾在私下向戴维斯提出同样的警告。受到批判的戴维斯气急败坏地声称，列辛斯基的演说中“比以往任何有关战争情报办公室的言论更加谎话连篇”。他还指责简·契卡诺斯基企图干预美国内部事务。然而，事实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争情报办公室波兰语部门的几名工作人员公开支持共产党人执政波兰，更加与波兰的共产主义新政权中的官员保持密切联络，其中的一名工作人员阿瑟·萨曼（Authur Salman）则成为华沙的共产党首要报纸《工人》的编辑。除了萨曼事件以外，设在纽约的战争情报办公室捷克斯洛伐克部的负责人则摇身一变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高

层人士，随后就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法国大使。

万尼·蒙塔纳（Vanni Montana）是“国际妇女制衣工人联合会”官员，前共产党人。一九四四年前往意大利时，蒙塔纳发现有数名共产党人在战争情报办公室领导下的宣传电台——意大利广播电台工作。意大利广播电台的节目主要针对被纳粹占领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但是蒙塔纳抱怨说，这些节目符合意大利共产党人在战后的政治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埃尔默·戴维斯向国会证实，他已经解聘十几名战争情报办公室雇员，其中包括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人新闻部的负责人以及希腊部的负责人。戴维斯称，有证据显示，这两个人在为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期间仍积极参与共产党的活动。但是，在波兰共产党人问题上，戴维斯一直拒绝认同，并声称，有关战争情报办公室雇员中存在共产党人的证据微不足道，坚称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工作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国会委员会特别问及，对于苏维埃将一万五千名波兰战俘处死在卡廷森林的事件，戴维斯如何解释战争情报办公室所持的态度。在此之前，战争情报办公室支持苏维埃的说法，认为处决波兰战俘的恶行是纳粹所为，并且迫使几家国内电台停止发表有关苏维埃应对卡廷屠杀负责的评论。对此，戴维斯的解释是，他相信苏维埃方面对此事件的解释，战争情报办公室的态度并没有受到内部共产党人的影响。

在战争情报办公室中另外活跃着数名前苏联间谍，他们的化名在维诺那计划的密电中出现，但是未能被破解。其中包括“哲学家”（在战争情报办公室法国部工作）、“弗雷德”和“列娜”。克格勃的密电中指出，“哲学家”的任务是提供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背景资料及性格分析。“弗雷德”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负责提供有关奥地利的情报。此人很可能在战争

情报办公室工作，但也不排除在其他部门工作的可能性。克格勃的电文中称，“列娜”是纽约一位电台记者的妻子，正试图在战争情报办公室谋得职位。至于列娜是否申请职位成功则无法确认。

根据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隐藏在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前苏联间谍中，最为活跃的当属弗洛拉·沃欣。在被破译的克格勃电报中，有二十份密电详述了沃欣为前苏联情报部门服务的情况。沃欣的母亲玛丽亚·威赫（Maria Wicher）及继父伊诺斯·莱格尼特·威赫（Enors Regnet Wicher）都是美共的积极分子。威赫夫妇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前苏联的特工，并且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出现。玛丽亚·威赫的化名是“大莎”，她对丈夫及女儿所从事的工作了如指掌。伊诺斯·威赫化名“热切”，他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的电波宣传小组工作，透过克格勃特工瑟奇·库纳科夫向克格勃提供美国军事电子领域的情报。一九四五年七月，伊诺斯·威赫向克格勃上级汇报，他的领导向他出示一封信件，由陆军反间谍部门发出，称他涉嫌与共产党组织有秘密联络。伊诺斯称，信中甚至列出他多年前在美共的威斯康星支部担任组织委员时使用的假名。

弗洛拉·沃欣比威赫夫妇更为积极地投入到间谍活动中。一九四三年九月，她在战争情报办公室谋得职位，并一直工作到一九四五年二月。从维诺那计划的电文中可以发现，弗洛拉肩负着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多项使命。一九四三年，克格勃想在“海兹坦电子公司”的设计部招募一名年轻的无线电工程师，于是委派沃欣刺探此人的背景。沃欣还发掘并招募了另外两名前苏联间谍马里恩·戴维斯以及朱迪思·科普朗。这两个人均是沃欣在巴纳德学院的同学。

虽然马里恩·戴维斯的价值远不如科普朗那样重要，但是

她同样对前苏联情报部门具有相当的价值。根据共产国际档案记载，克格勃最初对戴维斯发生兴趣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克格勃的费庭将军要求共产国际提供“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工作人员马里恩·戴维斯”的情况。克格勃当时正在考虑录用数名美国人为特工，费庭为此向共产国际发出数份问询，有关戴维斯的问询是其中的一份。根据后来破译的维诺那计划的电文可知，沃欣是最早联络戴维斯的克格勃人员，可见，有可能是沃欣向克格勃建议将戴维斯发展为内线。

有三份被破译的维诺那密电中涉及招募戴维斯的情况。戴维斯于一九四四年底返回美国并与弗洛拉·沃欣接上关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于十二月五日发出的密电中指出，沃欣“正在启发（戴维斯）进入状态”，并向莫斯科方面汇报，克格勃准备“委托佐拉（即沃欣）负责说服罗（即戴维斯）提供我们感兴趣的情报（佐拉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逐步说服罗签约”。“签约”是指正式被录用为克格勃特工。密电中指出，克格勃驻墨西哥城情报站的工作人员已经与戴维斯进行初步接触。针对纽约情报站提出的正式招募戴维斯的计划，莫斯科克格勃总部于十二月八日致电墨西哥城情报站负责人列夫·塔拉索夫发出问询，要求塔拉索夫通过他与戴维斯的接触对戴维斯进行评估。一九四五年一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通知莫斯科，戴维斯已经在华盛顿的“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接受新的任命，请求准许沃欣完成对戴维斯的招募，理由是“既然罗（即戴维斯）已经开始新的工作，非常有必要从一开始就让她顺着我们的方向努力，为此必须与她直接沟通与指点。”

至于沃欣本人，她的克格勃上级对于沃欣的勤恳工作非常满意。一位克格勃官员在与沃欣会面时夸赞她“做事十分认真，发展全面，对于自己的任务理解透彻。”克格勃上级对于

沃欣提供的情报数量之大亦表示惊叹。一九四四年八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在密电中通知莫斯科，已经将沃欣获取的一批战争情报办公室的材料通过海运送往莫斯科。十一月，克格勃纽约情报站用略显惊异的语气在密电中汇报，“在她的寓所居然存有大批材料，她本想交给我们，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时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纽约情报站汇报，沃欣将最新录得的战争情报办公室文件递交给他们。不过，电文中称，这些文件的价值不是很高，原因在于沃欣在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令她没有机会获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因此，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一再敦促沃欣寻求新的职位，以便更好地为苏维埃利益服务，并在密电中表示，这位一向积极的年轻女子“正在寻求适合我们需要的工作”。一九四五年二月，沃欣成功地从战争情报办公室调往国务院，这是前苏联情报部门垂涎已久的部门。

沃欣所提供的情报数量的确惊人。根据维诺那电文，仅一九四五年一二月间，沃欣就亲自撰写并通过克格勃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提供了四份报告，而且每一篇报告都引起莫斯科方面的重视。在其中的一篇报告中涉及国务院经济官员拉尔夫·鲍恩（Raph Bowen），莫斯科克格勃总部要求纽约情报站对此事加以跟进。电文中称，沃欣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时结识鲍恩和他的妻子。

然而，同年三月底，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得出结论，沃欣的能量过于充沛，以至于她已经异常莽撞地超越了自己的职责范围，而克格勃的纽约情报站出于对沃欣所提供大量情报的敬慕，业已放松安全警戒。克格勃总部的官员惊恐万状地发现，由沃欣亲自撰写，而并非由她的克格勃上级动笔的报告中使用了大量克格勃内部对美国机构的标准化名，例如用“银行”代表美国国务院，用“餐厅表演”替代“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

室”等等。正常情况下，这些专用化名只有克格勃的官员才知道，美国的特工是不应该知道的。沃欣的报告中，种种迹象表明，她在迫使不同的人向她提供情报，并且铤而走险地与一些人接近。

莫斯科方面认为，沃欣如此不计后果地滥用间谍活动，一旦被曝光，将导致苏维埃与美国之间发生“严重政治纠纷”。为此，莫斯科方面命令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采取措施停止佐拉（即沃欣）的危险行为”，并要求纽约情报站对负责沃欣的克格勃官员的错误做法提出警告，下令“禁止佐拉（即沃欣）一个接一个地将她的相识招募为特工，作为对沃欣的最后通牒，如果她不遵守我们的命令，在未征得我们的同意之前擅自行动，我们将立即中断与她的所有联系。”

这封密电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发出，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是克格勃发出的最后一封涉及沃欣的密电，纽约情报站方面的答复未能记录在案。沃欣在国务院工作到一九四五年。有关她后来的情况只有一些零星信息。四十年代末，维诺那计划破译出有关沃欣的密电之后，联邦调查局曾试图找出这个人，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九四九年，联邦调查局向国家安全部提交备忘录称，有消息指出，沃欣在一九四六年或是一九四七年逃往苏维埃联盟，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后来与一名俄国人结婚。沃欣逃亡的时间与伊丽莎白·本特利叛变的时间吻合。随着联邦调查局反间谍行动日具规模，再加上风闻维诺那计划，克格勃担心沃欣的身份暴露，于是将她从美国撤回。一九五四年，联邦调查局对一九四九年的备忘录加上备注，称收到消息，沃欣后来去了共产主义北朝鲜，成为一名护士，后来死于北朝鲜。

国务院及战时外交机构

美国国务院是美国最主要的外交机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设立了多个临时战争机构，专门执行与战争有关的外交及外事任务。这些临时机构包括“经济战委员会”，后来被并入“外国经济部”；“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部分机构被解散，被保存下来的部门则并入国务院。

除了弗洛拉·沃欣（国务院）和马里恩·戴维斯（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以外，还有另外十八名隐藏在外交机构中的间谍在本书中被提及。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提到三名在外交领域工作的前苏联间谍，其中最知名的一位是在华府备受推崇的劳伦斯·达根。达根于一九三〇年进入国务院，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四年，一直担任“美洲共和国部”的负责人。离开国务院后，达根担任“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的外交顾问，后出任“国际教育学院”校长。他是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最亲近的外交政策顾问。

一九四八年底，联邦调查局传讯达根，查问他是否在三十年代时与前苏联情报部门有过联络。达根承认，在他任职国务院期间，前苏联情报部门曾两次透过亨利·科林（Henry Collins）及弗雷德里克·菲尔德（Frederick Field）试图将他招募为间谍，但是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向国务院汇报，达根没能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达根否认参与间谍活动，并且要求中断传讯。十天后，达根从他位于十六层楼的寓所跳楼而亡。

前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mer Welles），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诗人兼前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博尔德·麦克莱施

(Archibald Macleish)，知名记者德鲁·皮尔逊及爱德华·默罗 (Edward Murrow) 均出面为达根辩护，认为怀疑达根涉嫌参与间谍活动是毫无根据的。甚至连明明知道达根因何受到怀疑的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 (Tom Clark) 都表示，达根“对美国政府忠心耿耿”。达根的死亡令他的调查记录从此被封存，因此许多史书在涉及达根时，一直将他定义为忠心耿耿、无辜的公仆，被毫无根据的谣言困扰而自杀。而事实上，达根是一名克格勃特工。

一九三九年九月，惠特克·钱伯向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揭露达根参与美共地下组织及前苏联间谍活动。钱伯指出，三十年代中，他在负责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及美共的谍报网期间，注意到达根对共产主义持赞同态度。美共地下组织成员，钱伯的内线之一亨利·科林与达根是哈佛大学的同窗，非常了解达根的政治观点。科林曾经接触达根，希望他能协助地下组织工作，但是达根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钱伯的上级，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官员鲍里斯·拜科夫认为，达根的职务优势无论如何不能忽略，于是下令再次派人接近达根。这一次，由外交界的知名人物，秘密共产党人弗雷德里克·菲尔德出马。在菲尔德的反复游说之下，达根承认，他其实早已被海蒂·马兴 (Hede Massing) 招募为克格勃的间谍。一九四七年，联邦调查局传讯马兴。马兴早在一九三八年已经秘密叛变。她证实了钱伯的信息。一九四七年，从莫斯科的克格勃档案中亦可以找到证据证明马兴的供词。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大量证据显示，达根的间谍活动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达根通过九份密电向前苏联情报部门汇报了英美联军入侵意大利的计划，进攻挪威的纳粹占领区的计划（此项计划后来被取

消)，美国对阿根廷军事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英美双方对中东石油资源共同政策的秘密磋商。

一九四四年中，达根从国务院辞职。此前，达根是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手下，他的辞职很有可能由韦尔斯与当时的国务卿赫尔之间的不和导致。韦尔斯已经在一九四三年底被迫辞职。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份发自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密电中，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报告，内线“弗兰克”（达根的化名）从国务院辞职（达根正式辞职日期为七月十八日）。电文尽可能淡化达根辞职对前苏联情报工作的重大损失，并向莫斯科方面保证，“正在认真考虑未来的安排。”八月四日发出的密电中汇报，达根在“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获得新的任命（达根正式收到“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任命日期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底）。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同时在电文中提到，达根在辞去国务院职位之前，曾经提醒克格勃非法官员阿米洛夫，指出他在国务院的职位岌岌可危。由于八月四日的电文未能被全部破解，无法通读全文内容，据推测，阿米洛夫好像曾要求达根尽可能维持在国务院的职位。

十一月十八日的密电中，前苏联官员认为，罗斯福总统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免去国务卿赫尔的职位，达根有机会重返国务院出任“领导职位”。电文中称，这一推测的根据在于，有传言指出，罗斯福总统在一九四四年大选时没有选择亨利·华莱士做竞选伙伴，作为补偿，罗斯福总统有可能任命华莱士为国务卿。电文中认为，即便华莱士当不上国务卿，鉴于华莱士的显赫地位，达根依然可以利用与华莱士之间的友谊，从他那里“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一九四四年大选之后，罗斯福的确更换了国务卿人选，但是爱德华·斯特第尼被任命为新国务卿，华莱士仅仅被任命为商业部部长。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最早涉及达根的电文发自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这份电文内容很长，并且只是部分地被破解，其内容好像是提供达根的个人简历。电文中提到某个人是位“职业女作家”。达根的母亲是一位知名作家，因此电文中所指女作家应该就是达根的母亲。提供个人简历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在对被招募对象进行背景审核，其二，当事人有可能沉寂一段时间，正在考虑重新启用。钱伯于一九三八年叛变之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及克格勃很有可能将钱伯曾经负责的线索“冷藏”，直到确认钱伯没有向政府告发之后才重新启用。达根有可能就是这批被“冷藏”的内线之一。

维诺那计划中发现的潜伏在外交领域的另一名特工是海伦·基南（Helen Keenan）。三十年代，海伦·基南是一位自由作家，美共中的积极分子。一九四五年一月，海伦·基南就职“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担任作家及编辑。一九四五年中，有明显迹象显示，“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将会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解散，海伦·基南于是在“战争罪犯审判委员会”美国负责人办公室谋得一个职位。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向莫斯科方面表示，已经批准海伦·基南接受新职，原因在于，“毫无疑问，在这个委员会工作，（海伦·基南）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并且经过适当的指点，可以 [未破解电文] ……”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向莫斯科方面提供了接头暗号，以便在海伦·基南到达欧洲之后与克格勃特工接头。

维诺那计划发现的第三位外交间谍是“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的塞缪尔·罗德曼（Samuel Rodman）。一九四四年底，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汇报，美共的联络人伯纳德·舒斯特已经与美共成员罗德曼有过接触，要求罗德曼在代表“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前往南斯拉夫工作时收集情报。

除了被挖掘出真实身份的前苏联间谍之外，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另有大量化名。这些隐藏在化名背后活动的间谍均潜伏在美国外交机构，然而美国的分析专家却无法判定他们的真实身份。有些情况下，通过电文内容无法判定使用化名的人物究竟是真正潜伏在美国机构内部的间谍，亦或是转述间谍提供的情报的中间人。这些化名包括为克格勃工作的“道奇”（专门提供美国对前苏联的外交情报），“法可”（提供国务院文件，其所在机构正在考虑将其派往莫斯科），“弗罗拉”（提供“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的情报），“教母”（提供美国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政策的情报），“梦想”（提供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外交活动）。

在这些隐藏在化名背后活动的外交间谍中，有两名间谍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其中包括“第十二号内线”（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偶尔使用数字化名）。根据该名间谍提供的情报和文件来看，他有可能在“经济战委员会”工作。另外一名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的间谍曾在一九四五年克格勃的密电中出现，克格勃对他的化名是“罗伯特”。“罗伯特”是克格勃拟在国务院招募的数位间谍之一，不过克格勃莫斯科总部通知纽约情报站，“罗伯特”已经在为军事情报部工作。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出现的另外一名涉及外交领域的间谍是“第十九号内线”。这个化名曾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克格勃的密电中出现。克格勃本身很少使用数字化名，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很有可能是通过这份密电向总部汇报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间谍情况。“第十九号内线”在刚刚结束的英美两大盟国的华盛顿“三角”会议上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有过私下沟通，他将此次谈话内容通报给前苏联情报部门。从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往莫斯科的这份密电由克格勃非法官员依卡·

阿米洛夫签署。电文报告，“第十九号内线汇报，船长（即罗斯福）和公猪（即丘吉尔）在国家（即美国）对话期间，邀请十九加入他们及扎米斯泰图的谈话。”可惜，随后的电文内容只被断断续续地破解。不过，从被破译的电文可以清楚地推断，第十九号内线汇报，丘吉尔认为英美盟军于一九四三年联合进攻欧洲大陆的做法并不明智。电文中指出，扎米斯泰图支持开辟第二战场，但是显然，有关“重大军事决策”，罗斯福并不知会扎米斯泰图。

由于资料有限，没有办法确认第十九号内线的真实身份。根据电文内容可以推测，该名间谍曾经出席三角会议，或是参与过与三角会议相关的其他事宜。既然他被邀请加入罗斯福与丘吉尔的私下会谈，可见此人的官职很高。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线索可以确认第十九号内线的身份，甚至连他是不是美国人都是未知数，因为此人亦有可能是陪同丘吉尔的英国代表团成员，而且出席“三角”会议的人士还包括其他盟国的高层官员及数个流亡政府的高层官员。而且，从被破译的电文部分亦找不到第十九号内线参与罗斯福及丘吉尔的私下会谈的具体日期。

扎米斯泰图的真实身份也是个谜。在俄文中，扎米斯泰图的含义是“副手”，分析家们最初认为扎米斯泰图指的是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然而五年后，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可以清楚地断定，克格勃对华莱士的化名是“众人”。虽然出于安全考虑，克格勃要求定期更改特工的化名，但是对于特定机构的称谓以及经常会提及且并非间谍的特定人物的称谓，通常在确定之后便不会更改。例如，在所有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化名一直固定为“船长”和“公猪”。分析家们于是重新考虑扎米斯泰图的真实身份，并在重新进行

发音分析之后判定，扎米斯泰图有可能代表罗斯福的首席助理哈里·霍普金，而非华莱士。然而，在后来的维诺那密电中，霍普金的名字曾多次出现，而扎米斯泰图却一直没有再现。虽然在某个人的化名得到确认之后，克格勃的密码员并非百分之百地坚持使用化名，但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启用化名，由此可以推断，扎米斯泰图也并不是霍普金。

总之，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前苏联情报部门在三角会议中有一位身居高位的间谍。此人参与了罗斯福、丘吉尔及另外一名美国高层官员华莱士或是霍普金的私下会晤，从而向前苏联提供了政治及外交机密。

军事及战争生产机构

克格勃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在美国的军事及战争工业生产机构中拥有大批特工，在本书中被涉及的情报内线就有二十六人。伊丽莎白·本特利另外提供了两名潜伏在军事机构中的间谍，美国军校教官瓦迪米尔·卡扎科维奇（Vladimir Kazakevich）以及在“紧急管理办公室”和“紧急生产办公室”担任文员的伯尼斯·莱文（Bernice Levin）。

另外还有一大批隐藏在美国军事及战争经济部门的特工，他们的化名在维诺那计划中出现，但是真实身份未能被确认。其中为克格勃工作的间谍包括“冰山”（提供美国飞机在亚洲的活动情报）、“丽莎”（战争部秘书）、“不能”（提供租赁内阁的情报）、“员工”（任职美国陆军，是一条极有价值的内线，克格勃专门为其配备密码系统）以及“土尔”（提供盟国进攻法国的计划情报）。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的特工化名包括“唐纳德”（美国海军上校）、“法里”（提供“战争生产委员会”

及“战争部”的情报)，另外还有一名在“盟军战略委员会”工作的职员。

财政部及其他机构

在有关珀洛谍报组织及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组织的章节中共涉及八名潜伏在美国财政部的间谍。除此之外，在克格勃一九四五年的密电中提到，在美国财政部中有一位名叫瑟贝鲁斯的人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然而，此人后来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失去联络，并试图通过共产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克格勃从美共联络人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汇报给莫斯科总部。

其他政府机构

前苏联情报部门在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和机构中亦设有内线。潜伏在“参议院战争动员小组委员会”中的威廉·戈尔德和查尔斯·克雷默为前苏联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有关这两名间谍的情况在涉及珀洛谍报组织及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组织的章节中均有介绍。此外，本书还介绍了诺曼·贝斯勒（司法部）、朱迪思·科普朗（司法部外国机构登记部）、詹姆斯·沃特·米勒（邮政审核部）、沃德·皮格曼（国家标准局）以及杰克·费伊（内务部）。另有两名真实身份未知的间谍化名出现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的密电中提到安插在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前苏联间谍，但无法确认所提及的间谍是指朱迪思·科普朗亦或是指另外一名前苏联间谍。一九四三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发出的密电中亦提到一名在“海运局”工作的特工，真实身份未知。

共产党人

厄尔·布劳德：舵手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五年，厄尔·布劳德担任美共的领导人。在克格勃的密电中，布劳德的化名是“舵手”。这个化名自然与布劳德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有关，但同时，布劳德在前苏联谍报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同样给其他共产党人树立了表帅。

厄尔的妹妹玛格丽特·布劳德（Margaret Browder）亦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厄尔·布劳德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乔奇·迪米特洛夫递交备忘录：

我的妹妹玛格丽特·布劳德为克格勃的外国部工作了七年，曾被派往欧洲不同国家。据我了解，这份工作带给她成就感和满足感，她不想放弃这份工作。但是，考虑到我日渐频繁地参与全国性政治活动以及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子不断扩大，如果美国的敌对势力了解到我妹妹在欧洲的工作性质并加以渲染，将对我们的政治工作造成威胁。我

特此提出这个问题……采取措施，逐步将我妹妹从目前的岗位上替换下来。

迪米特洛夫同意布劳德的建议，并致信当时的克格勃负责人尼古莱·叶佐夫（Nikolai Yezhov）：“随信附上布劳德同志的建议……我本人认为，安排他的妹妹退出克格勃外国部是权宜之计。”

前苏联高级军事情报官员沃尔特·克里维斯基于一九三七年底叛变，布劳德的妹妹一度处于克里维斯基的领导之下，布劳德很可能因此担心玛格丽特充当前苏联间谍的事实被曝光，令他难堪。如果布劳德的担心真的是出于上述原因，事实证明，他颇有先见之名。一九三九年，克里维斯基公开揭露，玛格丽特·布劳德曾经利用虚假的美国护照，以简·蒙特格米利的名字在欧洲为前苏联开展间谍活动。

“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于一九三九年传讯布劳德和他的兄弟威廉，质询克里维斯基对玛格丽特的指控。布劳德兄弟早已精心准备好应答台词。当被问及玛格丽特是否为共产国际或是苏维埃政府工作时，厄尔回答：“我认为没有……据我所知，她无论是目前还是过去，从未与任何政府机构有过正式接触。”威廉·布劳德则证实“据我所知，而且我也相信”，玛格丽特没有为苏维埃政府工作。在后来调查美共制造假护照一事时，政府调查员发现，颁发给“简·蒙特格米利”的美国护照上，用的却是玛格丽特的照片，而在护照申请表上，简·蒙特格米利的哥哥作为证人签名，经检验字体证明，乃出自威廉·布劳德之手。

布劳德兄妹与克格勃高级官员瓦西里·朱比林和伊丽莎白·朱比林交情甚久。玛格丽特后来承认，她在德国与瓦西里·朱

比林结识，但只知道他的名字是何伯特。经辨认照片，玛格丽特认出朱比林和他的妻子，并向联邦调查局供认，曾于三十年代末，在威廉·布劳德和罗斯·布劳德夫妇的家中见过朱比林夫妇。玛格丽特称，她一直以为朱比林是电影公司的星探，而且一直当他们是一对普普通通的夫妻。尽管玛格丽特·布劳德否认曾在一九四二年与朱比林夫妇会面，但是一名投诚联邦调查局的前苏联特工露西·布克（Lucy Booker）供认，一九四二年，她和玛格丽特与朱比林夫妇在长岛的一个别墅里共度周末。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则进一步证实，朱比林与威廉·布劳德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多次会面。

厄尔·布劳德的名字出现在二十份被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在部分电文中，布劳德的名字只是一带而过，还有一部分电文，克格勃只是充当美共与共产国际的沟通桥梁，但是在其余的电文中，则记录着布劳德亲自参与前苏联在美国的情报活动。

从部分被破解的电文中可知，布劳德将美共方面获得的外交及政治情报提供给克格勃。例如，一九四三年五月，布劳德将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向一位知名作家透露的意大利政府内讧的情报提供给克格勃。偶尔，克格勃方面亦通过密电将一些情报知会给布劳德，而并非一味地由布劳德提供情报给克格勃。一九四五年一月，克格勃非法官员依卡·阿米洛夫在电报中指出，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组织成员所罗门·阿德勒要求将他猎取的有关中国的部分情报与布劳德分享。这种做法由三十年代华盛顿的地下组织沿袭而来，克格勃情报内线中的大部分人就是在这段时间进入对秘密行动的启蒙阶段。华盛顿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约翰·艾伯特在自传中承认，美共在政府机构内部的秘密小组经常向“党的领导人”提供针对政府计划及

行动的“看法和分析”，目的当然是协助美共的政治活动。因此，即便是在四十年代，秘密组织已经完全处于前苏联谍报机关的领导之下，仍然有成员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利用谍报手段获取的资料不同时提供给美共。在他们看来，为美共服务依然在他们的职责之内。

阿米洛夫之所以通过密电向莫斯科方面汇报阿德勒的要求，是因为阿德勒的要求并不符合克格勃的一贯做法。然而，克格勃的工作纲领只是近期才开始执行的新鲜事物。伊丽莎白·本特利指出，在约各布·格罗负责美共数个谍报网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期间，他定期与布劳德见面，就所获得的情报进行磋商，并且将美国共产党组织感兴趣的资料简要或是副本提供给布劳德。不过，格罗的做法在前苏联的谍报领域已经过时。格罗本人是一名公开的共产党人，他的一生都在为共产党工作，他将共产党的公开活动、地下活动以及前苏联的谍报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做法，被四十年代日渐专业化的克格勃认为隐患无穷。

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证词中讲道，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格罗逝世的第二天，布劳德在办公室约见本特利，一再叮嘱本特利，不要将格罗掌握的内线交由俄国人直接控制。此后，每隔两个星期，布劳德就在他的办公室和本特利会面。在格罗去世后的几个星期内，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发出三份密电，电文内容未能被全部破译。朱比林在密电中向费庭将军汇报，本特利两次与厄尔·布劳德会面，商谈有关格罗生前负责的谍报网事宜。然而，无论在共产党组织内部，亦或是在情报领域，本特利的地位远远不能与格罗生前的地位相提并论，因此她在与前苏联的谈判中不占据任何优势，更无法有效地担当起美共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虽然克格勃允许由本特

利负责联络格罗生前的谍报网，但是从一开始克格勃就将本特利的角色定义为由克格勃亲自接管谍报网之前的过渡性联络人。

布劳德亦为克格勃招募特工人员。一九四〇年秋，布劳德向克格勃提交了有关法国激进党人士皮埃尔·考特的报告。三十年代的法国政权交替频繁，皮埃尔·考特曾在多个内阁任职。他热忱支持反对德国的弗朗哥—苏维埃同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皮埃尔·考特任职航空部部长，曾经将他权力范围内所获知的秘密情报提供给苏维埃联盟，并因此受到起诉。一九三七年，沃尔特·克里维斯基背叛，并且供认考特是隐藏在法国政府内部的前苏联间谍。一九四〇年法国沦陷后，考特逃亡伦敦。他曾申请加入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但鉴于他的历史背景，考特的申请遭到拒绝。

一九四〇年九月，考特到达美国，很快与厄尔·布劳德建立联系。布劳德将此次会面的情况经密电汇报给克格勃外国情报部负责人费庭将军，之后由费庭转交给克格勃的总负责人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y Beria），再由贝利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汇报，并将报告提供给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果然发现了这份报告。布劳德在报告中称，考特要求他通知苏维埃，他依然致力于“建立法国与苏维埃之间的联盟”，而这一联盟“只有依靠法国共党（即共产党）才能实现”。布劳德指出，考特“希望苏维埃联盟的领导人能够了解，他愿意承担我们委派给他的任何使命，为此，他愿意转变他个人的立场。”考特所指的立场是指他本人对于纳粹—苏维埃协定的态度。一九三九年八月，纳粹—苏维埃协定落实之后，法国共产党摒弃过去用战争手段抵抗希特勒的立场，采用失败主义政策。一九四〇年中，法国战败，亲纳粹的维奇政府当权，法国

共产党实施中立态度，既不亲近维奇政府，也不表示反对。然而，戴高乐将军及其拥护者拒绝向纳粹投降，继续开展反希特勒运动，对此，法国共产党持仇视态度。考特亦无法接受维奇政府投降的决定而流亡海外。然而，他现在想通过布劳德向苏维埃方面传达一条信息，即如果苏维埃方面希望他放弃对待纳粹的立场，他愿意遵从。（一九四一年六月，纳粹进攻苏维埃，法国共产党转变立场，开始反对维奇政权，试图联合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法国共产党成为法国境内德国占领区中抵抗纳粹的重要力量。）

克格勃方面对布劳德的报告进行跟进。一九四二年六月，以记者身份做掩护的克格勃官员弗拉迪米尔·普拉丁利用考特发表演讲的机会与之会面。一份被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显示，考特对这样一个联络的开始表示欢迎。作为对此份电文的回复，莫斯科方面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发出密电指示，“可以招募皮埃尔·考特（考特从此化名‘第达拉斯’）”。在其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考特处于瓦西里·朱比林的直接领导之下。一批被破译的克格勃密电显示，一九四三年期间，考特向前苏联提交了数份报告，汇报他的活动情况以及对一些事务的分析。在与克格勃合作的同时，考特亦紧密同共产国际及法国共产党合作。克格勃从旧金山发出的一份电文中，有一条信息就是法国共产党领袖兼共产国际官员安德烈·马提（Andre Marty）通过克格勃转达给皮埃尔·考特。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的一份未能被全部破译的密电中，朱比林报告称，考特表示愿意前往阿尔及利亚，协助解决当地的一些问题。朱比林强调，考特“将无条件服从安排”。考特在北非的法国殖民地以及美国接触到很多流亡海外的法国政治家，他在提交给前苏联的报告中亦对这些人加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考特成功地重返

法国政坛，并再度出任航空部部长，不过任期十分短暂。考特在法国政坛继续致力于法国同苏维埃的友好关系，并于一九五三年获得斯大林和平奖。在维诺那计划将考特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曝光时，考特早已退出政坛，法国政府决定将考特与克格勃的这段历史封存起来。

布劳德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做出很多重大贡献，但是在一次提供罗斯福总统的情报时，布劳德的工作出现纰漏。一九四三年七月，克格勃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美国的情报机构分别向各自在莫斯科的上级汇报，布劳德的一位秘密共产党人朋友充当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布劳德之间的秘密沟通渠道，此人密见过罗斯福。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高级官员帕维尔·喀拉林（Pavel Klarin）在同年七月十八日的密电中向莫斯科汇报，约各布·格罗告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罗斯福总统知会布劳德称，他决定同年夏天进攻西西里岛，从而拉开大举进攻欧洲的序幕，但是丘吉尔首相对此表示反对。格罗另外指出，罗斯福总统对美共在新泽西政坛上的定位表示满意。同一天，纽约情报站又发出第二封密电称，布劳德要求将前一封电文内容转交给迪米特洛夫。电文内容很长，有将近两百个密码未能被破解，只有卡内罗（Carnero）的名字被辨别出来。

保存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里，有两份文件与布劳德的这条信息有关，其中一份由费庭将军发出，另外一份是布劳德经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两份文件的发出日期均为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比七月十八日的两封密电推迟五天。布劳德在报告中涉及的内容包括美国方面计划在攻占西西里之后继续发动进攻的设想、丘吉尔首相反对在欧洲大陆展开攻势以及罗斯福总统对美共在新泽西州的活动表示赞

赏。报告中有一段内容涉及墨西哥共产党领袖卡内罗在共产党内派系纷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共产国际档案中的这两份文件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七月十八日的两封密电有着因果关系。费庭发给迪米特洛夫的密电中将七月十八日的第二份电文全文附上，维诺那计划依旧未能将这份电文全文破译。共产国际档案中的文件与维诺那计划的密电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特别指出，罗斯福总统有关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以及对新泽西州政治活动的评价均是通过“口头”传达给布劳德。

就在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总部发出密电的第二天，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的机构亦致电莫斯科。虽然美国的密码分析员只部分地破译这封密电的内容，但依旧可以推断，此封密电的内容同样与罗斯福总统与共产党人内线的谈话有关。莫斯科方面显然就该情报向纽约情报机构提出质疑。两个星期之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机构负责人帕维尔·米卡洛夫通过密电回答莫斯科方面的疑问，称该情报来源于化名“西蒙”的西奥多·拜尔。拜尔是路斯奇·古罗出版公司总裁，他指出，在美共内部有一位妇女“出身贵族家庭，与罗斯福总统及夫人相识已久，显然她是公司（即美共）的秘密成员”。这位妇女据称曾与罗斯福总统有过多次沟通，拜尔通过与这位女性的谈话获知一些花絮性内容，诸如罗斯福对斯大林的领袖风范赞赏有加，认为蒋介石夫人“染有毒瘾”，等等。米卡洛夫于是将拜尔提供的信息转达给莫斯科，米卡洛夫同时指出，拜尔没有透露这位女人的姓名。米卡洛夫提醒莫斯科方面，所提供的信息均为第三手情报。米卡洛夫分析认为，罗斯福政府有可能试图“在一九四四年大选之前在民众中”树立良好形象，因此向美共表示友好。（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前苏联

军事情报部的官员对于美国政治是如何的无知。)八月中旬,米卡洛夫向莫斯科汇报,他已经得到与罗斯福总统有交往的妇女的姓名,名字是约瑟芬·特雷斯罗(Josephine Treslow)。

约瑟芬·特雷斯罗究竟是何许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莫斯科总部对此人一无所知。八月二十一日,军事情报部向迪米特洛夫发出问询:“据我们所知,美国公民约瑟芬·特雷斯罗根据布劳德的指示定期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面。请告知是否有此事,并请提供有关资料。”

从约瑟芬·特雷斯罗的档案可知,她的原名约瑟芬·特罗斯·亚当斯(Josephine Truslow Adams),一八九七年生于布鲁克林,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在斯沃斯莫尔学院教授艺术。亚当斯曾加入数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但是从未公开过她的共产主义信仰。亚当斯曾经受命为埃莉诺·罗斯福绘制肖像,从此与罗斯福一家发生接触。一九四一年,罗斯福夫人参观斯沃斯莫尔学院,与亚当斯见面。此后,亚当斯将另外一幅作品赠与罗斯福夫人,并不断地写下长篇大论邮寄给罗斯福夫人。当时,布劳德因假护照一案被判刑入狱,亚当斯是“释放厄尔·布劳德公民委员会”成员,她在给罗斯福夫人的信件中反复提到释放布劳德是明智之举。一九四二年五月,苏维埃联盟的莫洛托夫到访华盛顿,出于对两国友好的表示,并考虑到共产党组织近期以来对政府战争政策的支持应有所回报,罗斯福总统决定释放布劳德。没有证据显示,约瑟芬·特罗斯·亚当斯的游说令罗斯福总统做出了释放布劳德的决定,然而布劳德本人却不这样认为。一九四二年七月,在共产党的一次盛会上,布劳德与亚当斯见面,亚当斯提到,她曾多次与总统夫妇见面,已经成为罗斯福一家的好朋友,并成功地说服总统释放布劳德。布劳德对亚当斯的说法深信不疑。

亚当斯误导布劳德的原因并非单纯地由精神病所致。在一九五六年以前，亚当斯曾经多次入院接受精神科治疗。但是一九四三年时，亚当斯的精神病症状并不明显，因此令布劳德相信，他终于找到了通往白宫的秘密渠道。布劳德向亚当斯提供了大量材料，要求亚当斯在和罗斯福总统频繁会面时就某些政治问题进行探讨（这只是布劳德的一厢情愿）。事实证明，亚当斯并没有所谓地与罗斯福总统频繁会面，她只是不停地将布劳德提供的政治素材写成信件寄给罗斯福夫人。罗斯福夫人注意到亚当斯来信中的政治倾向，将信件转交给了她的丈夫，不过，在其中的一封信件上，罗斯福夫人备注写道：“此人是否可靠，我并不了解。”出于礼貌，罗斯福夫人对亚当斯的来信加以回复，其中最肯定的语言莫过于：“你的来信已转交总统，至于会如何处理，我不得而知。”然而，在布劳德面前，亚当斯却声称，她亲自与罗斯福总统会面，并针对布劳德的政治问题提供了大量所谓的总统意见。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意见完全是亚当斯编造出来的，她只是从政治评论性分析文章中摘选了布劳德最想听到的部分，以总统的名义讲了出来。

亚当斯的弥天大谎令布劳德相信，罗斯福总统支持布劳德致力密切美国共产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关系。随着共产国际的解体，再加上罗斯福、丘吉尔及斯大林一九四三年举行的德黑兰会议进一步确定了盟国之间在战后继续合作的方针，布劳德从一九四四年开始放心大胆地将美国共产党人带入一个新纪元。他首先将美国共产党改为“共产党人政治联合会”，进而将联合会进化为民主党的左翼组织。布劳德动用他的影响力，说服美共做出决定，反对新泽西州的改革派成立第三政党，并于一九四四年将共产党秘密控制下的农工党并入民主党，一九四五年初，又决定取消由秘密共产党人控制的“华盛顿州联合会”，

并试图将其并入华盛顿州民主党。

苏维埃方面并不赞成布劳德的新政治方向。迪米特洛夫警告布劳德，他已经偏离莫斯科的纲领，但是布劳德仍义无反顾地我行我素。没有办法考证克格勃方面是否知道布劳德被亚当斯一次又一次误导。苏维埃方面是否担心布劳德与罗斯福政府过于亲近？亦或是苏维埃方面已经了解到布劳德被人玩弄？总之，一九四四年秋，莫斯科方面有人起草文章，对布劳德的做法提出尖锐批判。一九四五年春，文章公开发表，美国共产党才意识到，他们的领导人布劳德的做法并没有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共产党人政治联合会”召集紧急会议，重新恢复为“美国共产党”，取消布劳德的领导职位，随后，更进一步将布劳德驱逐出党。

亚当斯的谎言不仅促使布劳德走上一条毁灭性道路，同时也令战后的美国政治更加混乱。布劳德经常隐讳地提及他与罗斯福总统的关系，于是在美共上层盛传布劳德与白宫之间有秘密渠道沟通。消息逐渐蔓延到美共的自由派同盟“群众阵线”，但是“群众阵线”的成员并不认为与美共的关系因此会有任何不妥。谣言同样传到反共产主义势力中去。一批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而退党的前共产党人，将所谓的布劳德与罗斯福关系的内部消息传播出去。反共产党势力中的大部分人对这一谣言将信将疑，但是也有一批保守派人士出于对罗斯福和美共的深恶痛绝，认定罗斯福与布劳德之间存在某些关联。所有相信罗斯福与布劳德有关的想法都是错误的，然而，错误的根源来自共产党内部对于这一说法的深信不疑。约瑟芬·亚当斯的妄想，再加上布劳德本人的轻信，令自由派人士相信，美共的背后有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因此更加放心地与美共联系在一起。保守派人士则愈发相信，罗斯福与美共之间阴谋勾结。二战后，美

国各党派因此在如何对国内共产主义问题定性的看法上存在很大分歧。

随着厄尔·布劳德被排除出党，亚当斯亦淡出共产党组织。联邦调查局曾多次传讯亚当斯，并对她提供的文件加以审查，认为亚当斯的言论并不可信。一九五六年末，亚当斯入住纽约精神病医院期间，辗转联络到“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声称要将其充当罗斯福总统与美共联络人的历史秘密公开。亚当斯还声称，“共产党医生”对她施用电击疗法、药物治疗，甚至脑叶切除疗法，企图让她相信自己患有精神病。亚当斯的说法本应该令她的可信度进一步受到质疑，但是她却被邀请到华盛顿，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在执行法庭上作证。亚当斯的证词节选于同年二月被公开，在一批一直将新政认定为共产主义阴谋的人士中引起骚动。亚当斯在证词中指出，她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直接会面近四十次，地点在海德公园或是白宫。

不过，这场骚动很快便平息下来。在出庭作证之后，亚当斯签下一部自传合约，并雇用记者及反共产主义人士艾萨·董·莱文（Isaac Don Levine）作为代笔作家。亚当斯将一批所谓的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通信提供给莱文。在罗斯福写给亚当斯的数十封信件中，其放荡轻浮的文风完全是亚当斯的风格，而绝非总统风范，莱文顿时产生怀疑。莱文进一步发现，有二十一封信件显示是由总统从华盛顿寄出，但是经核查，有十封信件显示的日期当天，总统并不在华府。莱文向亚当斯提出质疑，亚当斯被迫承认，所有信件均属伪造。这本原本命名为《我是罗斯福的密使》的自传因此流产。亚当斯的精神病症状日益严重，终于在一九五八年被送入宾西法尼亚的疗养院，一九六九年病逝于疗养院。

尤金·丹尼斯 (Eugene Dennis): 渗透战略 服务办公室及战争情报办公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金·丹尼斯是仅次于厄尔·布劳德的美共第二号领导人。尤金·丹尼斯一九〇五年出生于西雅图，一九二六年成为美共的全职组织委员。一九三〇年，丹尼斯在加利福尼亚参加工联主义运动被起诉，于是逃往莫斯科，更名为蒂姆·莱恩，并接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在中国、南非及菲律宾从事秘密工作。一九三五年，丹尼斯将他在美国出生的儿子以俄国人的名义留在共产国际寄宿学校，他本人采用吉恩·丹尼斯的化名回到美国威斯康星，担任共产党区支部组织委员。两年后，丹尼斯以美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年之后他返回美国，成为美共的全国领导人之一。一九四〇年，丹尼斯受命转入地下工作。当时，美共由于支持纳粹—苏维埃协定随时有可能遭到美国政府镇压，丹尼斯的工作就是为美共活动转入非法状态做准备。一九四一年，丹尼斯再次前往莫斯科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会晤。布劳德被排除出党后，丹尼斯当选布劳德的继任人，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直到一九五九年因健康原因这一职位由格斯·霍尔 (Gus Hall) 取代。

美共的前领导人，后来转为反共产主义人士的路易斯·比登兹 (Louis Budenz) 于一九四八年指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丹尼斯负责领导潜伏在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秘密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卡尔·马扎尼。比登兹曾经是二十年代的工人积极分子，是“美国人民自由工会”最早的官员。三十年代，比登兹倾向于左翼，先加入由独立激进人士穆斯特 (A. J.

Muste) 领导的美国工人党, 但是, 穆斯特的激进主义并不完全符合比登兹的理想, 他于是转入共产党。比登兹在共产党组织中很快受到提拔, 成为共产党纽约州委员会成员。一九四一年, 比登兹出任《工人日报》总编。此时, 比登兹的地位已经接近美共的最高领导层, 他甚至不定期出席美共政治局会议。然而, 一九四五年, 比登兹的信仰发生危机, 他离开美共, 加入罗马天主教会, 之后就职圣母和福德姆大学, 著书, 讲座, 并且出庭作证, 抨击共产主义颠覆行为。许多学者对于比登兹的观点嗤之以鼻, 但是俄国文献中心的档案以及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均有力地证实了比登兹对丹尼斯的指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丹尼斯的确负责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内部安插共产党人势力。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战略服务办公室负责人威廉·多诺万上校约见米尔顿·沃尔夫。在西班牙内战期间, 米尔顿·沃尔夫是亚伯拉罕·林肯兵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沃尔夫曾在美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西班牙期间加入共产党。返回美国后, 沃尔夫出任“亚伯拉罕·林肯兵团退伍军人组织”的负责人, 该组织由参加过国际纵队的美国人及亚伯拉罕·林肯兵团退伍军人组成。作为该组织的负责人, 沃尔夫一直严格遵从共产党的政策纲领, 因此在纳粹—苏维埃协定生效期间, “亚伯拉罕·林肯兵团退伍军人组织”采取与共产党相同的态度, 反对美国支持英国对抗德国。一九四一年六月, 德国进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该组织一改以往的政策, 开始积极支持美国对抗德国。多诺万要求沃尔夫招募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退伍军人, 配合英国突击队在欧洲被占领区活动。(当时, 美国虽然对外自称中立国, 但是事实上罗斯福总统尽一切可能地援助英国。) 沃尔夫同意多诺万的计划。珍珠港事件后, 美国

于十二月宣布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多诺万上校要求沃尔夫直接为战略服务办公室招募人员。于是，数十名国际纵队的退伍军人被纳入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旗下，与敌占区的抵抗力量合作。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迪米特洛夫向共产国际领导层发出密电，“我们得到消息，沃尔夫，重复一遍，原亚伯拉罕·林肯兵团的沃尔夫，正在招募该纵队的同志们从事特殊工作，”并且利用共产党的名义。“特殊工作”是对情报工作的别称。迪米特洛夫要求美共领导人“认真调查此事并火速汇报调查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丹尼斯发出一封内容简洁的密电，向迪米特洛夫汇报，“沃尔夫为政府工作一事已经征得我们的同意。”又过了几个星期，丹尼斯与克格勃官员在纽约见面，递交了一份更为详尽的报告，委托克格勃转交莫斯科。这份报告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被发现。丹尼斯在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多诺万于前一年十一月接触沃尔夫的经过，指出，多诺万“建议挑选可靠的退伍军人，由英国方面调配，安排在不同的国家，从事不同的工作。沃尔夫向工党（即美共）汇报此事并获得批准……美国加入二战之前，沃尔夫已经向英国方面提供了十二名南斯拉夫人、三名捷克人以及一名希腊人……沃尔夫还向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十名美国人、一名希腊人以及三名南斯拉夫人，他们将在陆军担负职责，并在特殊珍珠（即突击队）中接受训练。”丹尼斯指出，这些被选派的人员皆为共产党人。除此之外，沃尔夫还从国际纵队的退伍军人中招募了“六名非共产党人的匈牙利人和四名捷克人，提供给美国情报部门”。报告中指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共委派丹尼斯与多诺万商洽美共与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合作问题。丹尼斯向战略服务办公室提供了“一批意大利和德国移民，负责编写宣传材料及无线电

广播”。

五月十三日，克格勃外国情报部负责人费庭将军向迪米特洛夫发出一份措辞严肃的备忘录。费庭指出，克格勃认为“美共领导人在整个事件上犯有政治性错误。由于他们的错误，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不仅可以借机渗透美国共产党，而且有机会渗透到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中去。”（费庭的担心是多余的，战略服务办公室从未考虑过试图渗透美共或是前苏联情报机构。）然而，迪米特洛夫认同克格勃的观点，同一日，迪米特洛夫回复费庭，表示“允许沃尔夫为英国和美国情报部门招募人选是一个错误决定”，建议“中止招募工作，并中断与英美情报部门的关系”。在费庭发给迪米特洛夫的备忘录上有迪米特洛夫的亲笔备注：“已经命令纽约中止这一工作。”丹尼斯同样接受克格勃的观点。六月一日，丹尼斯通过克格勃致电迪米特洛夫：“我们完全同意你对沃尔夫工作的建议，已经采取措施停止工作。”沃尔夫随即中断了招募工作。

然而，毕竟有一批共产党人已经被沃尔夫招募。丹尼斯通过克格勃致电迪米特洛夫，解释道：“我们正在与外国宣传部以及美国情报协调人员联络。所谓的‘多诺万委员会’属于白宫直接领导，共有三个部门，外国宣传部是其中之一。我们另有几名同事在该部的对捷克广播小组及对意大利广播小组工作，并且有我们的人在部分负责对德国广播，但不负责整个节目。我们认为有必要让这些继续留在广播部门，当然，必须先征得你的同意。在‘美洲间事务委员会’同样有我们的人。”

在最后一封密电中，丹尼斯向迪米特洛夫及克格勃提出，在战略服务办公室、战争情报办公室及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均有共产党人任职，美共计划保持与这些共产党人的联络。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三年的一份密电中列有六名渗透

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及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前苏联特工。这份电文被部分地破译，六名特工中有五人被识别：莫里斯·霍尔珀林、邓肯·李、弗朗兹·纽曼、贝拉·约瑟夫（Bella Joseph）以及朱利叶斯·约瑟夫。这五个人皆为伊丽莎白·本特利谍报网成员。另外一个没能被确认的特工有可能是比登兹供认的卡尔·马扎尼（Carl Marzani），此人于一九四二年受雇于战略服务办公室展示部。

卡尔·马扎尼出生于意大利，一九二四年移民美国。一九三五年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后，马扎尼获得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就读，并加入英国共产党。马扎尼亦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但奇怪的是，他没有被编入共产党人组织的兵团，而是被编入无党派兵团。回到美国后，就在纳粹—苏维埃协定签订的当天，马扎尼加入美共，从此使用托尼维尔的化名在纽约东区如火如荼地开展工作。马扎尼在自传中坚称，他于一九四一年退出共产党，在加入战略服务办公室时，他称自己曾经是名共产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扎尼成为国务院官员，但是后来被判刑，理由是在他入职战略服务办公室时隐瞒共产党人身份。出狱之后，马扎尼成立“马扎尼和曼塞尔”左翼出版社。克格勃的一名退休官员于一九九四年称，在六十年代，马扎尼依旧为克格勃的联络人，他的出版社接受克格勃的资助。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有两份密电提到丹尼斯，但是两份密电均未能完全破解，无法揭示其中的内容。在两份密电中，丹尼斯的名字都和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成员哈罗德·格拉瑟联系在一起。

克格勃与美共

一九四三年六月，瓦西里·朱比林对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几名主要线索的上下级关系重新确认，并致电向莫斯科汇报。朱比林指出，他的妻子将负责约各布·格罗的谍报网，但是会通过中间人与约各布·格罗沟通。朱比林本人将负责三大主要线索：皮埃尔·考特、依卡·阿米洛夫及厄尔·布劳德。这封电文发出后不久，莫斯科方面下令重组克格勃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组织之间的联络。九月，费庭将军向克格勃驻澳大利亚、加拿大及美国的情报站发出警告称，如果克格勃官员继续频繁地与共产党领导人见面，容易给俄国的盟国造成错觉，让他们误解共产国际的解体只是一种假象。费庭将军要求克格勃官员停止接触共产党的知名官员，并且停止由共产党提供材料再由克格勃驻当地情报站转交莫斯科的一贯做法，与共产党组织的接触“只限于特别可靠的共产党组织的地下线索”，且“严格限于情报工作的某些方面，获得〔未破译电文〕联络，领导，对于正在培养中的线索加以复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约各布·格罗去世，克格勃与美共之间的联络重组工作变得越发复杂。一九四四年初，伯纳德·舒斯特成为美共与克格勃之间的最新联络人。伯纳德·舒斯特在共产党内部的称谓是伯纳德·切斯特。一九四五年，联邦调查局派特工监视舒斯特。据特工描述，舒斯特身材中等，谈吐轻声细语，“多疑，敏感，高度警觉”。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清楚地显示，从舒斯特开始出任美共与克格勃的联络人之后两年时间里，他接手大量的克格勃工作，包括参与原子弹谍报活动，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小心与多疑。

舒斯特一九〇四年十月十四日出生于华沙，一九二一年随父亲到达美国，一九二五年从纽约大学毕业。由于毕业成绩属于中等，舒斯特放弃了修读医学院的大学的想法，成为一名会计师。一九三〇年，他有可能为前苏联贸易部工作。三十年代初，舒斯特主持美共的反军国主义运动，负责在美共军事官员中发展共产党组织。一九三五年，舒斯特成为专门推行共产主义文化的“图书批发公司”财务总监。在随后的几年中，舒斯特与威廉·布劳德共同出任“联邦米内印刷公司”董事，专门印刷共产党的书籍。舒斯特还自己成立了“伯纳多销售公司”，与人合伙经营“国家商业贸易公司”，从事进出口生意，客户分布在墨西哥、乌拉圭及阿根廷。舒斯特同时有份参与“屏幕制作公司”，从事无线电设备生产。

舒斯特经商的目的依然是为从事共产党活动做掩护，他在大部分公司中只担任副职。一九三八年，伯纳德以伯纳德·切斯特的名义成为共产党组织纽约区负责人，翌年又出任共产党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第五届代表大会主席。一九四三年，舒斯特出任共产党组织纽约州财务总监，经常受共产党全国财务总监查尔斯·克伦宾（Charles Krumbein）委派，从事特别审计工作。几位前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均有提及舒斯特。路易斯·比登兹确认，“切斯特同志”是三十年代“纽约区秘密工作负责人”。在伊丽莎白·本特利的印象中，“伯尼·舒斯特”是约各布·格罗的老朋友，他曾“向我们提供谍报内线”。纽约市一位共产主义积极分子贝拉·多德（Bella Dodd）后来转变为反共产主义人士，在她的著作中提到，“切斯特”是共产党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根据多德的记录，切斯特从潜伏在其他左翼组织及政府部门的秘密共产党人那里获得情报，一批与美共有关的公司向他提供资金。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亦证实，前苏联在美国的谍报活动中，伯纳德·舒斯特扮演重要角色。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密电中，有数十份电文与舒斯特有关。根据费庭一九四三年九月的指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决定停止与厄尔·布劳德直接接触的一贯做法，指定由舒斯特担当克格勃与布劳德之间的联络人，并且在每一次透过舒斯特联络布劳德之前，都要征得莫斯科方面的同意。布劳德对美国政治局势的分析报告也全部通过舒斯特转交给前苏联。布劳德分析后认为，二战之后，美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紧张关系日趋缓和，他的这一理论亦通过舒斯特转达给前苏联，请求获得认可。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数份克格勃密电中均要求舒斯特对某些招募对象的背景加以调查。在其中一封密电中，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门要求美共提供马里恩·舒尔茨（Marion Schultz）的有关资料。马里恩·舒尔茨是俄国裔美国人，在费城船厂担任机械师，是“俄国战争救援组织”及其他一些斯拉夫组织中的积极分子。美国共产党人玛丽·安·格鲁（Mary Ann Grohl）曾经在“联合反法西斯难民委员会”任职，后来移居墨西哥，与一名正在等待上级命令的克格勃特工同居。舒斯特经调查指出，玛丽·安·格鲁是因为不称职而遭到解雇。“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雇员塞缪尔·罗德曼被派往南斯拉夫工作，他在舒斯特安排下向前苏联提供情报。约瑟夫·拉波波特（Joseph Rapoport）是一名共产党人，长期在“俄国战争救援组织”工作。舒斯特向克格勃证实，拉波波特是一名“可靠、负责的同志”。有些时候，对于克格勃的一些招募对象的背景，美共并不了解，舒斯特也会如实相告。正是由于接到舒斯特的报告，前苏联中断了与一位化名“福鲁克”的特工及其丈夫的联络。厄尔·布劳德对某些内线的怀疑也都通过舒斯特汇报给克格勃。

由于舒斯特与克格勃的联络关系，克格勃窃取科技情报及美国原子弹秘密情报的任务亦将舒斯特牵扯进去（详见第十章）。朱利叶斯·罗森堡定期与舒斯特见面，交纳党费。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方面汇报，舒斯特希望了解，克格勃方面对于罗森堡谍报网的工作表现是否满意。共产党组织中，有相当一批党员在与原子弹有关的项目中担任科学家和工程师。由共产党控制的“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及技术人员联合会”（简称“建工化技联合会”）是克格勃招募间谍最便利的渠道，罗森堡便是该联合会成员。受克格勃之托，舒斯特对一位招募对象的背景进行调查，发现此人是“建工化技联合会”中的捣乱分子，克格勃于是决定停止与此人接触，在联合会中“寻找另外人选”。鉴于舒斯特对克格勃提供大力协助，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方面请求，让“‘自由’（即朱利叶斯·罗森堡）将从曼哈顿计划及其他领域搜集的情报”通过舒斯特提供给前苏联。年轻的共产党人萨维尔·萨克斯（Saville Sax）和西奥多·阿尔文（Theodore Alvin）主动接触克格勃，汇报称，物理学家霍尔将被派往洛斯阿拉莫斯从事原子弹项目，克格勃方面亦委托舒斯特调查这两名共产党人的背景。

舒斯特还负责物色据点以便克格勃官员与情报内线秘密会面，为此他向克格勃提供了两名老共产党人的名字，即路易斯·霍维茨（Louis Horvitz）及保罗·伯恩（Paul Burn）。霍维茨在法庭办公室工作，伯恩是一名工人，曾参加林肯兵团。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六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将这条信息发往莫斯科，三天后，克格勃的费庭将军向迪米特洛夫发出问询，要求提供有关霍维茨及伯恩的资料。一九四四年底，克格勃官员昂尼德·卡瓦斯尼科夫曾经借用一位共产党人的寓所与一位内线会面，具体是在霍维茨的寓所亦或是在伯恩的寓所无从考证。

一九四四年底，舒斯特对于克格勃布置的任务开始有所回避，具体原因不明。当时，美共刚刚解体，改为“共产党人政治联合会”。厄尔·布劳德或许希望将共产主义融入美国政治主流，因此对于大批共产党人参与前苏联间谍活动的做法产生疑虑。总之，一九四四年十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总部抱怨称，舒斯特已经数次拒绝接受任务，并声称，他在“共产党人政治联合会”中的地位不允许他为克格勃安排据点，又或是安排人选渗透联邦调查局及执行其他任务。舒斯特建议克格勃要求布劳德“安排一位有权力的负责人，无需次次征求领导层的批准。”在另外一份密电中，克格勃转达舒斯特的怨言，称他的权力仅限于纽约地区，其他事宜均需征得布劳德的同意。两份电文说明同一个问题，自从布劳德实施改革之后，利用共产党人为克格勃从事间谍活动变得愈发困难起来。（可能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布劳德的改革并没有得到莫斯科方面的支持，反而为莫斯科所排斥。）

莫斯科方面的反应足以证明，克格勃对于某一个共产党人的独立行为是如何地排斥。共产党的秘密武装并不掌握在党组织的领导人厄尔·布劳德手中，而是对克格勃负责。费庭将军对于布劳德的做法极为不满，他命令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转告舒斯特，“从此以后，他必须执行我们的命令，无须向舵手（即布劳德）寻求帮助。”费庭的命令下达之后，舒斯特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前往墨西哥度假，其间，克格勃重新安排舒斯特将来的工作。纽约情报站在报告中指出，将安排舒斯特负责收集战略服务办公室的组织架构情报。舒斯特度假回来之后再没有提出抱怨，他再次开始执行克格勃分派给共产党组织的任务。一九四五年中，莫斯科方面将布劳德踢下台，布劳德的改革流产，“共产党人政治联合会”重新恢复为

美国共产党。

克格勃内部对于美共对情报工作是否重要的问题上存有分歧。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负责人是斯特班·阿普里希安（Stepen Apresyan），但是他的权限远远小于他的前任瓦西里·朱比林。瓦西里·朱比林于一九四三年从纽约调往华盛顿，他提出，克格勃驻美国的高级官员从此应该安排在首府华盛顿。然而，一九四四年，瓦西里·朱比林的下属瓦西里·米罗诺夫指控朱比林背叛（详见第二章），朱比林旋即被召回国，几个月后，阿纳托利·格罗莫夫才接替朱比林的职位，之前的几个月里，克格勃驻美国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人职位一直空缺。塔斯社驻美国的负责人弗拉迪米尔·普拉丁亦是克格勃官员，但是独立于阿普里希安的领导。两个人分别向莫斯科方面致电，贬低对方的工作表现。普拉丁认为，“没有美国共产党的帮助，我们将一事无成。”阿普里希安对此表示不屑，认为，虽然“我们需要借助美国共产党……但他们并非惟一的力量，特别是考虑到‘克拉克’（即托马斯·杜威）竞选（美国总统），共产党的支持有可能枯竭。”

阿普里希安对于美共及布劳德的不满显然与克格勃试图直接控制约各布·格罗生前负责的谍报网，尤其是西尔夫马斯特的谍报网有关。这些谍报网成员虽然有热情，但他们的间谍手法均属业余性质，当然把职业间谍出身的克格勃官员吓得目瞪口呆。谍报网的成员相互熟悉，并且将共产党运动与情报工作混淆在一起，他们将文件存放在西尔夫马斯特家中，甚至有意一同购置农场，违背了最基本的安全准则。阿普里希安试图将这些组织的谍报工作引向专业化，却遭到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的抵触。阿普里希安称西尔夫马斯特“不相信我们的正规做法”。克格勃方面提出，谍报网获取的情报不可以和美共领

领导人分享，这一要求遭到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成员的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阿米洛夫曾为此不得不向莫斯科方面要求特批，允许他将部分情报提供给布劳德。阿米洛夫气急败坏地表示，如果不然，“美国共产党人将会越过我们，将情报提供”给布劳德，其结果将比阿米洛夫直接将情报提供给布劳德更加危险。

西 海 岸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美共的地下武装在加利福尼亚便有一支分队，其负责人是一名老共产党人艾萨·弗考夫，又称波波·弗考夫。一八八一年一月十日，弗考夫出生于拉脱维亚，一九〇四年到达美国，一九一二年成为美国公民。身为美共的创始人之一，弗考夫在一九三二年前一直保持低调，但是联邦调查局相信，弗考夫曾在二十年代初到过苏维埃联盟。弗考夫是旧金山“模特绣品及裙装公司”的合伙人。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弗考夫担任加利福尼亚共产党组织财政委员会主席。在担任西海岸共产党地下武装负责人期间，弗考夫一直与惠特克·钱伯合作。和约瑟夫·彼得斯一样，一九三八年钱伯叛变之后，为避免曝光，弗考夫被调离这一职位。一九三九年，钱伯向助理国务卿伯利指证了弗考夫。

西海岸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旧金山《华尔街时报》的记者威廉·克兰（William Crane），他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共产党。克兰出生于明尼苏达州，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参与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非常短暂。多年之后，克兰向联邦调查局承认，是波波·弗考夫将他介绍给约翰·卢米斯·舍曼（John Loomis Sherman）（正如当年马克斯·贝塔赫将钱伯介绍给舍曼一样）。

舍曼要求克兰退出美共的公开活动“以便从事特殊工作”。在其后的几年里，克兰协助舍曼完成多项任务，将情报提供给共产党组织及前苏联情报部门。克兰担负的第一项任务是调查住在西海岸的日本人及华人人口，第二项任务是向一位日本共产党人教授英语。克兰只知道此人的名字叫“乔”，联邦调查局怀疑此人就是乔·考德（Joe Koide），三十年代为“红色国际劳动联盟”的泛太平洋工会秘书处工作。克兰与舍曼还在洛杉矶发行日文小报。一九三四年时，克兰从事地下工作的酬劳是每个月一百二十五美元。同年，克兰前往纽约与惠特克·钱伯及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美国机构负责人会晤。

回到旧金山后，克兰更加深入地投入到前苏联情报活动中，并开始充当莫里斯·艾斯摩（Morris Asimow）的联络人。莫里斯原先是地下组织的投递站，一九三六年，莫里斯开始从他所在的“美国钢铁”公司窃取工业数据。莫里斯后来向美国政府供认，他曾经向克兰提供一种工业合金钢的情报。克兰同时还从美国政府弹道专家弗拉迪米尔·德·斯维尼科夫（Vladimir De Sveshnikov）那里收集材料。一九四九年，德·斯维尼科夫向联邦调查局证实，他在二十年代中期被前苏联雇用，向前苏联提供专利情报以及美国出版的有关大炮及工程方面的期刊，并且每个月收取一百美元的酬劳。三十年代时，德·斯维尼科夫定期提供材料。此外，克兰还从莱斯特·马克斯·修蒂那里获取炮弹自动上膛系统的情报，之后提供给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鲍里斯·拜科夫。

一九三五年，钱伯携带近两万元美金前往旧金山，与化名凯斯的克兰联络。克兰将钱伯介绍给弗考夫，钱伯将现金交给弗考夫。钱伯原以为这笔钱是提供给泛太平洋工会秘书处，作为发展对日本的信使服务的经费，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这笔经

费没有被动用，一九三五年，克兰又将经费退还给纽约的钱伯。一九三七年，克兰开始担任钱伯在华盛顿谍报网的摄影师。一九三七年底，克兰离开地下武装，回到加利福尼亚，使用维尔·摩根的化名继续从事美共的公开活动，为西海岸报纸《人民世界》撰写文章。一九四七年，克兰断绝与共产党的关系。一九四八年，联邦调查局传讯克兰时，克兰对惠特克·钱伯所说的间谍活动供认不讳，只是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上略有些出入。

四十年代初，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开始独立于前苏联领事馆活动，弗考夫的名字开始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出现。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间被破译的密电中，共有十几份密电提到弗考夫的名字。从密电内容可以看出，弗考夫在西海岸从事的工作与伯纳德·舒斯特在东海岸从事的工作大体一致。弗考夫负责安排克格勃官员与克格勃有意招募的共产党人会面。被破译的电文中提到，弗考夫曾安排克格勃与美国共产党在旧金山地区的领导人纳特（Nat）见面。化名“叔叔”的弗考夫还向克格勃提供有条件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共产党人名单。例如，一九四四年二月，弗考夫就将在“标准石油”工作的工程师达西·亨伍德（Darcy Henwood）推荐给克格勃。克格勃在涉及亨伍德的密电中还提到，弗考夫获得五百美元的酬劳。一九四四年的一封密电中提到，弗考夫协助前苏联在码头工人当中招募内线。美共在码头工人当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

詹姆斯·沃特·米勒是弗考夫手下最具价值的特工之一。米勒在美国政府战时邮件监管办公室财务及贸易部门担任俄语翻译。该部门对邮件，尤其是美国安全机构特别留意的邮件拥有审查权，是前苏联情报部门感兴趣的部门。米勒在俄国出生，以维克托·米洛的名字在洛杉矶加入共产党，曾在美共的路斯

奇古罗出版公司及“美俄学院”工作，并在《人民世界》报社担任翻译。一九四三年，米勒多次向弗考夫提供情报，经弗考夫转达给克格勃。十一月，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向莫斯科方面申请“招募‘含糊’（即米勒）”，但是鉴于米勒的“大嘴巴”，旧金山情报站建议由弗考夫安排米勒将情报交给共产党方面的联络人，这样，米勒就“不会想到这些情报最终到达我们手中”。米勒对于情报工作十分积极，克格勃方面怀疑他是双料间谍。不过，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负责人格里高里·凯菲报告称，美共“排除了这种假设”。

很快，米勒提供的情报便经由米勒在《人民世界》报社的好朋友，共产国际的泛太平洋工会秘书处元老哈里森·乔治（Harrison George）提供给克格勃。其中的一条信息提到，由于米勒的努力，克格勃在墨西哥的对外通讯被确保万无一失。一九四三年末，米勒向他的联络人发出警报，邮件监管办公室在拆阅一封信件后得知，前苏联海军情报部的一名官员被派往墨西哥。克格勃提醒莫斯科方面务必将这一警报告知海军情报部。然而，一九四四年，联邦调查局在调查“共产国际武装”的过程中，米勒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米勒的美共成员身份被曝光。联邦调查局还发现，一九四四年的最初几个月里，米勒与克格勃官员凯菲会面达六次以上。他们通常在人迹稀少的街道上散步，米勒不停地讲话，凯菲则不停地记笔记。在联邦调查局的建议下，米勒的上级开始密切留意米勒的行为。终于有一次米勒未经允许私自将一封信件内容抄录下来而被发现，米勒被迫辞职。

美共在西海岸与前苏联谍报机构之间另外的一名重要联络人是史蒂夫·纳尔逊（Steve Nelson）。史蒂夫·纳尔逊有着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出生于克罗地亚，一九二三年在费城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纳尔逊在匹兹堡工作时曾经与南斯拉夫人鲁迪·贝克同住一个公寓，后来贝克前往莫斯科的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在贝克的鼓励下，纳尔逊迁到底特律。一九二九年，纳尔逊成为共产党全职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在贝克的推荐下，美共送纳尔逊前往国际列宁学校。在莫斯科的两年里，纳尔逊曾被派往德国、瑞士、法国、印度及中国执行任务，他的妻子亦在共产国际担任信使。他返回美国做短暂停留之后又被派往西班牙，担任亚伯拉罕·林肯兵团的政委。纳尔逊利用假护照经苏维埃联盟前往西班牙。

纳尔逊的政委工作进行得相当出色，回到美国后，成为美共领导人的第二梯队，并被派往南加利福尼亚从事党的工作。由纳尔逊主持的一个秘密特别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在于清查混入美共内部的敌人，并设法窃取敌对组织的文件。一九三九年，由威斯康星州进步党人、参议员罗伯特·拉福利特领导的“参议院教育和工人委员会”下属“公民自由小组委员会”就加利福尼亚州的工人关系召开听证会。作为调查工作的一部分，“公民自由小组委员会”亦将传讯“联合农场主”组织。该组织是加利福尼亚州最主要的雇主组织之一，对于共产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活动持敌视态度。

根据“公民自由小组委员会”掌握的证据，“联合农场主”组织曾经采用间谍及人身攻击等手段迫害加利福尼亚的农民联合会员，并且从事反共产党活动，收集了有关共产党的大量材料。美共方面急于了解“联合农场主”组织手中究竟握有哪些有关美共的材料，于是纳尔逊的秘密武装窃取了“联合农场主”组织的材料，拍照之后再偷偷归还原处。纳尔逊还同日裔美国人中的共产党人合作印制宣传材料，通过码头工人及水手带上船，发往日本。纳尔逊于一九三九年被调到旧金山，翌年

初开始从事地下工作，为美共一旦被划为非法组织后的活动做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尔逊担任旧金山及奥克兰市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一九四三年初，鲁迪·贝克通知迪米特洛夫，“我们已经委派一名有责任心的同志（麦克）负责加利福尼亚的工作”。虽然没有明确证据显示，麦克即为纳尔逊，但是，联邦调查局于一九四三年四月成功窃听纳尔逊与瓦西里·朱比林之间的谈话，获知纳尔逊已经于一九四二年底被任命为西海岸武装的负责人。虽然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并没有纳尔逊的名字出现，但是有一个化名“屠夫”很可能就代表纳尔逊。纳尔逊的任务之一是要设法窃取原子弹项目的情报。纳尔逊曾经与伯克利放射实验室的年轻科学家兼共产党员们会面，他们的谈话亦曾被窃听。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记录，有数位科学家曾与纳尔逊讨论原子弹项目，纳尔逊将科学家们提供的工作情况进行笔录。联邦调查局跟踪发现，纳尔逊曾经向前苏联的一名情报官员提供材料，估计这些材料就是纳尔逊所做的笔记。这名情报官员的对外身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外交官。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联邦调查局窃听了纳尔逊与克格勃驻美国高级官员朱比林之间的谈话。谈话记录的开始是朱比林将数好的一叠钞票交给纳尔逊，纳尔逊说：“我的天，你数起钱来简直像个银行家。”朱比林回答说：“要知道，我在莫斯科时就是在银行工作。”接下来，纳尔逊和朱比林探讨了美共秘密武装负责人的角色问题。此人化名“A1”，联邦调查局后来确认，此人正是鲁迪·贝克。纳尔逊指出，厄尔·布劳德很清楚纳尔逊的工作性质，知道秘密武装在为苏维埃联盟工作，并深入介绍了他在西海岸开展的地下工作。谈话中涉及的人物绝大

部分都用化名替代，只有在谈到弗兰克·比塞尔（Frank Bissell）医生和他的妻子尼娜（Nina）时用了真名实姓。这是一对活跃的共产党人夫妻，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双双参加医疗队。

对于自己领导的地下武装，纳尔逊亦有不满意的地方，并且对前苏联的某些做法有怨言。纳尔逊对于与南太平洋地区的信使联络以及部分日本共产党人表示不满。他尤其对地下武装的两名成员“乔治”〔后确认是盖兹尔·“乔”·霍克伯格（Getzel “Joe” Hochberg）〕及“拉普”〔即莫里斯·拉波波特（Morris Rappaport）〕表示极大不满，认为他们的工作缺乏效率。霍克伯格负责就秘密武装方面的事宜联络厄尔·布劳德，拉波波特则负责西海岸的海员信使工作。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原先在犹太共产党人报纸工作并以保镖身份陪同厄尔·布劳德出访的霍克伯格被从纽约调往底特律，并被取消党内职务。

莫里斯·拉波波特曾经是共产党内的一位重要人物，但是纳尔逊的一番抱怨令他的领导生涯从此画上句号。作为共产党的一名老资格领导人，拉波波特曾经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领导美共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活动。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一日，拉波波特出生于俄国，一九二二年经温哥华到达美国。美国政府于一九三〇年曾试图将拉波波特驱逐出境，但是未能成功。当时，拉波波特毫不隐瞒自己的信仰，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应该利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时，拉波波特表示，“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我认为推翻政府是历史的必然。”一九四一年，拉波波特被捕，再次面临被驱逐的境遇，但是后来被保释出狱，从此转入地下工作。纳尔逊对拉波波特的表现发出怨言之后，拉波波特被从旧金山调往洛杉矶。一九四四年，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发现拉波波特的踪迹，他当时以约翰·福克斯的名字经营一家香烟糖果店。拉波波特依然与地下组织的共产党人

保持联系，其中包括利奥·巴罗威（Leo Baroway）及加利福尼亚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威廉·施奈德曼（William Schneiderman）。拉波波特在加利福尼亚的佩塔卢马拥有一间养鸡场，并积极参加当地的党组织活动，但他再没有担任过美共的公开领导人。一九八二年，拉波波特去世。

纳尔逊在向朱比林发表对前苏联情报部门的不满时，主要强调前苏联情报部门的行为过于嚣张。前苏联的特工常常直接接触加利福尼亚共产党组织成员，要求他们协助执行某些任务，对此，纳尔逊表示不满。他的不满并非在于克格勃要求共产党人协助其执行任务，而是在于克格勃越过美共组织直接向共产党人提出要求。根据联邦调查局对纳尔逊与朱比林之间这场谈话的总结，“纳尔逊建议朱比林在每一个重要城市或每一个州安排一位值得信任的联络人，负责与执行前苏联特别任务的党组织成员联络。”

克格勃驻旧金山负责人格里高里·凯菲拥有多个联络人，其中最亲密的一位是旧金山市的一位富有人家出身的共产党人路易丝·布兰斯坦（Louise Bransten），很多人认为她是凯菲的情妇。路易丝一九〇八年生于旧金山，是一位经营农产品公司的犹太富商的独生女儿，她从父母那里继承的遗产多达一百万美元。路易丝嫁给著名的亲共产党记者理查德·布兰斯坦（Richard Bransten），后来离婚。路易丝是旧金山“美俄学院”的活跃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调查局曾密切监视路易丝的行踪，对她的结论是“犹如车轮的中轴，她参与众多的亲苏维埃活动，仿佛从车轮中轴向外放射的辐条，包括参加共产党组织……参与军事及工业谍报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宣传活动。”

联邦调查局发现，路易丝与众多的前苏联特工有联络。除

了与凯菲的暧昧关系之外，路易丝还是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的老朋友，曾前往华盛顿探望西尔夫马斯特。她经常与波波·弗考夫见面。被本特利指认为间谍的威拉德·帕克（Willard Park）和玛丽·普赖斯都是路易丝的朋友。联邦调查局发现，原子科学家马丁·卡门（Martin Kamen）曾经与克格勃官员凯菲见面，卡门后来承认，他曾向凯菲提供过情报，并且和路易丝见过面。曾经向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提供情报的哈康·切夫里尔（Haakon Chevalier）也和路易丝有关。切夫里尔在“美俄学院”有两个朋友，多利·艾庭顿（Dolly Eltenton）和罗斯·艾萨卡（Rose Isaak）。多利的丈夫在“壳牌开发实验室”工作，曾经要求切夫里尔接近奥本海默，意图向前苏联提供情报。一九四五年，罗斯·艾萨卡通知克格勃，她准备辞去在“美俄学院”的工作，要求克格勃“不要再和我们联络”。

路易丝的另外一条线索是俄国移民弗拉迪米尔·波兹那（Vladimir Pozner）。波兹那一家于十月革命时逃离前苏联，然而波兹那本人却在欧洲居住期间成为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一九三八年，波兹那在梅特罗·戈尔德温·迈耶公司设在巴黎的欧洲分公司担任首席工程师，曾经参加法国军队，抵抗德国入侵。法国沦陷之后，一九四一年，波兹那携法国妻子和儿子逃往美国。一九四三年，波兹那在美国战争部电影局的俄国部门任负责人。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三年的一封密电中提到，“我们正准备启用弗拉迪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波兹那（今后化名为‘普拉登’）。”电文中讨论了波兹那的背景，对波兹那广泛的社会关系大加赞赏。电文中还提到，波兹那的一名秘书“正在考虑被列为招募对象，以便于同普拉登联络”，并要求莫斯科方面“调查普拉登的背景，准许将他招募为情报内线”。

虽然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没有发现路易丝的名字，但是有一个化名“地图”很可能代表路易丝。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发出的数封密电显示，“地图”负责克格勃与多条情报线索之间的联络。

美共高级人物与前苏联间谍活动

在美共的高层中，有很多人同前苏联情报部门有牵连。其中包括鲁迪·贝克（中央控制委员会），西奥多·拜尔（路斯奇古罗出版公司总裁），马克斯·贝塔赫（“国际工人组织”负责人），厄尔·布劳德（总书记），威廉·布劳德（厄尔·布劳德的助手），莫里斯·切尔德（Morris Childs）（伊利诺斯州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尤金·丹尼斯（政治局），尼古拉斯·杜森伯格（国家文化局局长），艾萨·弗考夫（加利福尼亚州共产党组织财务总监），约各布·格罗（中央控制委员会），布鲁斯·明顿（Bruce Minton）（《新大众》编辑），史蒂夫·纳尔逊（海湾地区共产党组织负责人），约瑟夫·诺思（《新大众》编辑），约瑟夫·彼得斯（组织部负责人）以及伯纳德·舒斯特（纽约共产党组织财务总监）。

除了上述共产党人之外，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显示，美共的一位地区组织委员伯斯罗·（比尔）·格伯特（Boleslaw Gebert）亦积极协助克格勃工作。格伯特一九一八年从波兰移民美国，成为一名矿工。作为美共的创始人之一，格伯特在二十年代担任美共波兰语部门的负责人，三十年代升任芝加哥及匹兹堡地区组织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格伯特返回共产主义波兰，在政府领导的工会中担任负责人。一九五〇年，格伯特以“世界工会联合会”联合国代表的身份返回美国，后

来成为波兰驻美国大使。路易斯·比登兹指证格伯特充当前苏联间谍。他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伯特作为底特律区共产党组织委员，经常前往芝加哥，与斯拉夫语系社区中的秘密内线会面。根据比登兹的说法，格伯特与莫里斯·切尔德（伊利诺斯州共产党组织委员）之间存在矛盾，冲突的焦点在于格伯特向芝加哥的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位为格伯特从事重要地下工作的捷克同志”发号施令。

比登兹对格伯特的指证是正确的。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四年五月至十月的密电中，格伯特的名字曾在其中的九份密电中出现。在一份密电中，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同时使用了格伯特的真名及化名“阿塔曼”。电文中提到，格伯特的父亲是德国农民，母亲是波兰人。有数份密电的内容涉及波兰裔美国人社区中的政治动向。有一封密电中提到，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曾答应赞助格伯特一千美金用于出版一部波兰语著作，但实际上只支付了五百美元，格伯特要求将另外的五百美元支付给他。最有趣的几份电报涉及到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一位知名的波兰裔美国人，著名学者和经济学家。从电文中可以看到，格伯特如何一步步地培养兰格。电文中还涉及到一些有争议性的话题，例如二战后的波兰政府以及波兰对斯大林的“背叛”。

奥斯卡·兰格一九〇四年出生于波兰，是波兰知名的社会党人，对斯大林主要持批判态度。他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于一九三七年迁居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一九四三年成为美国公民，并开始投身波兰流亡人士及犹太人士的政治活动。在美国的绝大多数波兰人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人士，他们支持由波兰首相斯坦尼斯罗·米科拉兹（Stanislaw Mikolajczyk）设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一九四四年三月，由数个波兰裔美国人

组织共同组建“波兰裔美国人议会”，支持波兰摆脱前苏联的统治而独立。只有两个规模稍小的组织支持苏维埃联盟吞并波兰东部大部分地区，将普鲁士东部地区划归波兰作为补偿。这两个组织包括由斯坦尼斯罗·奥里曼斯基（Stanislaw Orlemanski）神父领导，位于底特律的“科修斯古峰同盟”以及由亲共产主义的工人领袖利奥·克里斯基（Leo Krzycki）领导的“美国斯拉夫议会”。一九四三年，苏联红军进入波兰，兰格摒弃过去不明朗的政治态度，表明他的亲苏维埃立场。一九四四年，约瑟夫·斯大林通知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viman），三位美国公民，即兰格、克里斯基和奥里曼斯基将成为波兰新政府成员。这一决定令哈里曼目瞪口呆。虽然罗斯福政府对于斯大林的决定并不十分欢迎，但还是准许奥里曼斯基和兰格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和五月前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期间，兰格会晤了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就在兰格与斯大林会面的当天，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密电，内容涉及流亡美国的外籍人士中的政治动向，格伯特认为有必要知会正在莫斯科的兰格。五月底，格伯特通过密电向克格勃提供兰格的情况。电文的开头部分未能被破译，不过从电文通篇内容来看，兰格的政治立场是在一九四三年发生转变，开始倾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兰格尚没有化名。五月底，兰格返回美国后，同正在华盛顿的波兰首相米科拉兹会面，一再向米科拉兹强调，斯大林的政策如何合理。与此同时，兰格联合美国国务院官员，敦促美国方面对流亡的波兰人士（特别针对米科拉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与苏维埃联盟合作。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显示，一九四四年，就在奥斯卡·兰格前往莫斯科之前，他早已通过克格勃与前苏联方面达成默契。克格勃方面为兰格准备了化名“朋友”，并通知莫斯科方

面，此人将“毫无疑问地在政治上影响到波兰的未来”。一九四五年，奥斯卡·兰格放弃美国公民身份，返回波兰。但是很快他便以共产主义波兰第一任驻华盛顿大使的身份返回美国。

美共、记者和间谍

三十年代，随着美共的壮大，开始从各行各业，包括新闻领域中发展共产党人。前苏联情报部门一向对新闻工作者感兴趣。毕竟，记者的职责就是要找出真相。而且，记者的职业也为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一个很好的掩护身份。约各布·格罗谍报网中的温斯顿·伯德特和彼得·罗兹就是美共从记者中招募的特工。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的约瑟夫·伯恩斯坦也是一名记者。

《工人日报》的记者詹妮特·韦弗·罗斯（Janet Weaver Ross）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共产党人记者如何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供帮助。詹妮特·罗斯陪同丈夫纳特于一九三九年到达莫斯科。四十年代初期，纳特是美共派驻莫斯科的最高层人物。詹妮特经常在莫斯科出席美国使馆召开的记者招待会，采访美国外交人员，并获得邀请，出席仅限于美国人参加的社交活动。然而，詹妮特的工作并不只是为《工人日报》发稿，她还利用进出美国使馆的优势将所见所闻以报告的形势秘密提供给共产国际，乔奇·迪米特洛夫再将这些报告呈交给苏维埃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罗斯夫妇于一九四三年六月离开苏维埃返回美国。在共产国际的档案中保留着数份由詹妮特提供的报告，写于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期间。在詹妮特的报告中不涉及秘密情报，她也未从美国使馆偷窃过任何文件，所以，罗斯并没有从事间谍活动，她只是充当苏维埃联盟的一名

信息人员。正如迪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提供詹妮特的报告时指出的那样，她是“我们的美国记者同志詹妮特·罗斯”。

有一批共产党人记者是在协助克格勃的工作。他们或者向克格勃提供情报，或者协助克格勃阻挠反共产主义势力。惠特克·钱伯在《时代》杂志任职时，已经是一名坚定的反共产主义人士。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钱伯负责外国新闻部。由他编辑的数篇稿件揭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阴暗的一面，从而引起几位记者的不满，他们联合要求发行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将钱伯调离外国新闻部。其中反应最强烈的两名记者是约翰·斯科特和理查德·洛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洛特巴赫是《时代》杂志驻莫斯科记者，有人称他是“钱伯最不信任的人”。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两封密电涉及洛特巴赫。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克格勃特工杰克·索布尔报告指出，洛特巴赫是美共的秘密成员，刚刚从苏维埃返回美国，并通知索布尔，《时代》方面（很可能是特指钱伯）强迫他撰写反苏维埃的系列文章，遭到他的拒绝，他甚至以辞职相要挟。洛特巴赫捍卫苏维埃的行为令索布尔感动，索布尔“建议招募他”为克格勃工作。弗拉迪米尔·普拉丁已经开始着手了解洛特巴赫的背景，密电中要求莫斯科方面就洛特巴赫驻苏维埃期间的表现提供情况，并赋予洛特巴赫化名为“爸”。几个星期之后，由于洛特巴赫很有可能被再次派往国外，克格勃方面发出另一封密电要求莫斯科“请尽快调查‘爸’的情况，并电告指示”。莫斯科方面的答复未能被破译。

约翰·斯科特是《时代》杂志社中另一名与钱伯对立的人物，他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时，曾积极向克格勃提供情报。至于斯科特在加入《时代》杂志后是否依然为克格勃服务便不得而知。

《时代》杂志社中另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史蒂芬·莱尔德 (Stephen Laird)，有一段时期，莱尔德负责《时代》杂志社的驻外记者。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数份电文显示，莱尔德是前苏联间谍。一九四四年八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委派康斯坦丁·沙别诺夫 (Konstantin Shabenov) 作为莱尔德的最新联络人。沙别诺夫向莫斯科方面汇报了他对莱尔德的评价：

云 (即莱尔德) 给我的印象是，他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并且愿意帮助我们。然而，他认为自己只负责杂志社的技术运作，因此潜力有限。他可以将记者们的电报提供给我们，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其他渠道可以得到这些资料。他可以利用与众多记者的联系，对杂志社获得的材料加以分析，汇总成政治报告提供给我们，但是他缺乏这样的韧性。另外，〔未破解密码〕与妻子分手。云表示，他已经习惯记者职业，希望能再次被派驻海外，但是杂志社方面不赞成他的激进观点，因此不肯派他出国。由于他与演艺圈有交往，一家电影公司聘用他担任制片人。云称，瓦多 (即伊丽莎白·朱比林) 对此并不反对，认为他或许可以有机会前往欧洲，借机为我们做事。九月中，云将前往好莱坞。我们认为有必要同他保持联络。请电告是否需要重新设置暗语。

此后的密电中显示，克格勃方面向莱尔德提供暗语，以便于他在好莱坞时与克格勃人员接头。(莱尔德将在贝弗利希尔斯酒店与克格勃特工接头。) 在前往好莱坞之前，莱尔德将《时代》的一名记者获得的美国与葡萄牙之间就美国在亚速尔

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外交谈判情报提供给前苏联。

在好莱坞开拓事业的同时，莱尔德继续从事记者工作并推广苏维埃信仰。一九四七年的波兰大选，几乎所有的美国记者都将其描绘成利用恐怖、威胁手段进行的虚假选举，然而，莱尔德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在《新共和》上发表文章指出，波兰的选举是一场自由选举，共产党政权获得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五的选票不应受到任何质疑，并且认为，共产主义波兰的民主政治可以和美国相媲美。〔有一条十分有趣的信息，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负责人斯特班·阿普里希安鉴于汽车在洛杉矶的普及以及与莱尔德会面的困难程度，要求莫斯科方面修改他的预算，让他可以有一辆汽车。阿普里希安对莫斯科方面称，“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即洛杉矶），我会走断双腿。”〕

维诺那计划中涉及的另外一名共产党人记者是沃特·索尔·伯恩斯坦（Walter Sol Bernstein）。用今天的职业标准来看，沃特·索尔·伯恩斯坦应该算是一名剧本作家，他的作品包括《安全失败》、《前线》等等。由于伯恩斯坦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于一九五〇年遭到好莱坞封杀。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伯恩斯坦写道，他于一九三七年在达特默斯就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的几年里，在《纽约人》任职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美国人》派驻欧洲和中东。他最风光的时刻是在一九四四年，由于共产党人的协助，伯恩斯坦有机会采访南斯拉夫共产党首脑铁托，这在西方记者中尚属首次。

伯恩斯坦在回忆录中记载道，一九四四年返回美国后，他的一位在共产党组织总部工作的姨妈问他是否可以和几名党组织领导人见面，称他们希望了解有关铁托的情况。于是，在党组织中负责少数民族工作的吉恩·丹尼斯（Gene Dennis）和阿

夫拉姆·兰迪 (Avram Landy) 来到伯恩斯坦的寓所。伯恩斯坦回忆道：“我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他们，其实这些内容已经全部都写在我的文章里。他们的问题很有深度。我请他们喝东西，他们拒绝了，向我道谢之后便离开了。”伯恩斯坦承认，“在一次聚会上，前苏联使馆的一位很和善的秘书曾经接近我。当时我仍然身着制服。他了解的情况非常微不足道，类似美国军队的士气如何等等。他知道我倾向于苏维埃联盟，问我是否愿意就此写些东西……我十分委婉地拒绝了，事后我感到有些后悔。我是否在背叛苏维埃？俄国是我们的同盟，我为他们写些文章又有什么不好？我在南斯拉夫时反对美国的政策，在战时从事过颠覆活动，如今和以前有哪些不同？我该不该向上级汇报？（我没有这样做。）”

伯恩斯坦与前苏联官员的这场小摩擦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一九四四年十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方面汇报，已经派“坎”接触过伯恩斯坦。电文中用了伯恩斯坦的真实姓名。伯恩斯坦“欢迎我们与他重新建立联系，并保证在十一月一日前完成一份报告。”

虽然国家全部和联邦情报局均未能确认“坎”的真实身份，但此人很可能就是阿夫拉姆·兰迪。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其他电文中，“坎”又或是“塞林姆坎”亦有出现，他的任务是负责克格勃及与美共民族部门有联系的特工之间的联络。坎的联络对象包括比尔·格伯特、艾伯特·卡恩 (Albert Kahn)、麦卡·特卡奇 (Mikhail Tkach)。所有这些人，兰迪在美共的日常工作中都可以接触到。而且，伊丽莎白·本特利供认时表示，兰迪由约各布·格罗招募，他的主要任务是招募间谍。

一九〇二年，兰迪出生于一个贫困的俄国移民家庭。他先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及威斯康星大学就读并当选为美国大学优

秀生联谊会会员。三十年代初，兰迪在《工人日报》担任编辑，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担任美共的教育部长。在专门从事党的少数民族工作后，兰迪成为“国际出版社”的合伙人。四十年代末或五十年代初，兰迪悄悄退出美共的工作。他于一九九二年去世。

克格勃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发出的密电或许同伯恩斯坦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殊途同归。密电中指出，伯恩斯坦欢迎克格勃与他“重新建立”联系，但是很有可能伯恩斯坦本人误认为试图与之接触的人来自美共方面，而在克格勃的“坎”看来，他的这一举动只不过是同一名特工建立联络。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数份电报中还涉及以亲共产主义观点而著名的广播新闻评论员、专栏作家约翰尼斯·斯蒂尔（Johannes Steele）。一九四四年七月的一封密电中显示，斯蒂尔负责为克格勃招募间谍。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官员弗拉迪米尔·普拉丁向莫斯科方面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设法接近设在美国的“波兰电报局”（一波兰语电报服务部门，与波兰流亡政府有关）负责人罗曼·莫祖斯基（Roman Moszulski）。化名“尾座”的斯蒂尔告诉普拉丁，莫祖斯基是一名秘密亲苏维埃人士，希望能与克格勃建立关系。斯蒂尔称，他与莫祖斯基相识很多年，莫祖斯基已经厌倦“波兰法西斯主义者”，有意辞去现在的工作。

斯蒂尔建议莫祖斯基继续目前的工作，阻挠波兰反动分子的宣传攻势。斯蒂尔安排普拉丁与莫祖斯基会面，莫祖斯基表示，他已经意识到，波兰的未来取决于能否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良好的关系，他“已经十分严肃地考虑过这一步可能带来的所有后果，决定听从我们的调遣，随时向共产主义提供他所知道的一切情报，并且有关他自己的每一步工作都

会征求我们的意见。”莫祖斯基向普拉丁表示，他惟有靠行动获得克格勃的信任，单单靠斯蒂尔的推荐是不够的，他要靠行动证实自己的真诚。“作为回应，我们对他的行动表示欢迎，并且表态，他的可信度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莫祖斯基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向克格勃提供了波兰流亡人士的名单以及波兰裔美国人的名单，并对他们对波兰与苏维埃关系的看法逐一加以点评。

从事国外新闻的记者对前苏联情报部门的作用在于，他们可以充当克格勃驻美国情报站与驻其他国家情报站之间的信使及联络人。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拉丁美洲部门的副主任理卡多·塞塔罗（Ricardo Setaro）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份一九四三年的密电中将塞塔罗指任为克格勃在中南美洲活动经费的中转站。作为对莫斯科方面问询的回复，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发出密电，概述了塞塔罗的工作：“‘格那特’（即塞塔罗）在哥伦比亚广播系统的省部（即拉美部）工作。他最初主要担任阿瑟的联络人，负责与信使们联络。同时，我们利用他处理省〔十七个未破译密码〕作为同胞（即共产党人）。我们现在要求他处理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及国家（即美国）的外交信息。”克格勃所谓的“处理”是指提供背景资料。由塞塔罗负责联络的阿瑟是何许人，美国国家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分析家们没有得出结论。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数十封电文涉及阿瑟，此人好像是克格勃驻美国情报站与克格勃驻拉美各国首都的情报站之间的主要信使。

新闻从业人员显然是谍报机构的招募对象。一名记者以合法的身份收集合法的信息资料刚好可以为搜寻秘密情报提供掩护。对于某些新闻工作者，虽然前苏联情报部门明知不可能将

其纳入旗下，但是依然想方设法从他们那里获取内部情报或是对政治事件的看法。以沃尔特·李普曼为例，他本人并不赞同共产主义，然而格罗的美共及克格勃谍报网仍然将玛丽·普赖斯安插在他的办公室做秘书，挖掘隐藏在著名专栏背后的情报。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四年的一封密电提供了另外一个实例，显示了克格勃如何将新闻工作者转化为“合法的”情报来源。当时，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致电莫斯科，汇报塔斯社记者兼克格勃高级官员弗拉迪米尔·普拉丁的活动。电文中指出，普拉丁的几位记者“朋友非常有潜力提供合法情报。他们的情报来源非常广泛，虽然他们不会将所了解的全部讲出来，但是可以针对美国外交政策等问题提供有价值的见解。”电文中特别提到约瑟夫·巴恩斯（Joseph Barnes）。巴恩斯原先在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后来在《纽约先驱报》担任外国部编辑。经常有传言指控巴恩斯是前苏联间谍，巴恩斯曾经发誓否认充当前苏联间谍，他的誓言被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所证实。电文中称，“招募巴恩斯显然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不必招募他但却可以利用他倒是不错的选择。”

作为记者，即便不担任间谍，他们同样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情报，这便是记者的职业特征，他们所了解的往往多过他们所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美亚》杂志编辑菲利普·贾菲试图说服他的朋友，美国海军上尉安德鲁·罗思（Andrew Roth）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担任间谍，罗思表示拒绝。自然，罗思并不了解贾菲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约瑟夫·伯恩斯坦）的关系是否真实，又或者他是美国反间谍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过，罗思建议贾菲可以利用《美亚》杂志及其他媒体刊登机密情报，同样可以达到向前苏联提供情报的目的，而风险却小很多。

“这个国度如此地开放，毫无遮拦，同样的消息可以有数十名记者搞到手，再以数十种方式公开将它表达出来，我们同样可以做到。”不过，经过一番辩论之后，罗思终于接受贾菲的观点。他辩解道，既然塔斯社总会将《美亚》的内容概述提供给前苏联领导人，贾菲与伯恩斯坦直接接触没有什么不妥。罗思同意，“只要条件允许，你如果遇到任何重要线索，可以告诉他（即伯恩斯坦）。”

共产党人记者塞缪尔·克拉夫瑟（Samuel Krafstur）是在塔斯社工作的美国人，他在为克格勃招募记者充当情报来源甚至特工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关克拉夫瑟生平背景的资料不多。他大概于一九一一年出生于波士顿，在东北大学就读过一年。克拉夫瑟是美共成员，曾加入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一九三七年负伤。一九四一年，克拉夫瑟进入塔斯社工作，最初在纽约分社工作，后调往华盛顿分社担任社长助理。一九四九年离开塔斯社后他在一家玩具厂工作。克拉夫瑟曾被“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传讯，但采取不合作态度。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证明，克拉夫瑟是一名重要的前苏联间谍，由塔斯社记者兼克格勃官员弗拉迪米尔·普拉丁招募为特工。克拉夫瑟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他在新闻从业人员当中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一九四四年五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电告莫斯科，经过数个月来对克拉夫瑟的研究，认为可以利用克拉夫瑟，其化名为“艾德”，他的任务是“在华盛顿的记者圈子中培养招募对象”。在别人的印象中，克拉夫瑟是一名共产党人，林肯兵团的退伍军人，“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无限忠诚，永远以极大的热情去完成”普拉丁为获取情报分派给他的“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任务”。他广泛的社交圈“有

利于他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并且对招募对象加以调查”。在向共产国际调查过克拉夫瑟的背景之后，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同意录用克拉夫瑟。

根据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克拉夫瑟至少向克格勃提供了二十名人选，其中包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助理约瑟夫·伯杰（Joseph Berger）。没有证据显示前苏联情报部门成功地将此人招募为间谍，但显然，克格勃一直将他作为招募目标。一年后的一份密电中提到，伯杰成为“遣返委员会”美国方面的代表。电文中还讨论了伯杰的背景。

约瑟夫·伯杰一九〇三年出生于科罗拉多的丹佛，一九二四年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在《堪萨斯城市之星》担任记者。一九三四年，他和妻子、幼女来到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文斯敦，成为一名自由作家。有一年的时间，伯杰一家的生活十分艰难，靠向当地人乞讨为生。后来他在“工作进展委员会”下属的“联邦作家计划”中找到一份工作，为《美国向导系列》撰稿，人生从此发生转变。由伯杰完成，以杰里米亚·迪格斯的的名字发表的《鳕角导航》（Cape Cod Pilot）好评如潮，伯杰因此获得“古根海姆奖”，从此开始写作生涯。伯杰出版了多部儿童作品，其中一部作品的主人公是来自怀俄明州的野马驯养师，身高八英尺的神话人物鲍莱格·比尔。

一九四一年，伯杰加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为罗斯福总统、哈里·杜鲁门参议员、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及其他民主党大人物撰写讲演稿。一九四五年，伯杰作为“遣返委员会”成员前往莫斯科。根据克格勃的密电，从莫斯科返回之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Robert Hannegan）被任命为邮政部长，他以年薪一万美元雇用伯杰作为他的助理。离开政府部门之后，伯杰为日间的电视剧撰写剧

本。一九五〇年，他成为一名演讲撰稿人，同时继续创作短篇小说和文章，直至一九七一年去世。

一九四五年，伯杰刚刚随“遣返委员会”离开美国前往苏维埃，普拉丁就向莫斯科发出密电汇报，克拉夫瑟与伯杰相识五年，认为伯杰是一名进步人士，对苏维埃联盟有好感。据克拉夫瑟称，伯杰曾经表达过想在苏维埃生活的愿望，并且希望与美共保持联系。电文指出，考虑到伯杰的社会关系及他将来的工作，“他可以成为有价值的见习人员（即特工）。我建议利用他去莫斯科的机会说服他并录用他。”普拉丁还提到，伯杰在出发之前曾与克拉夫瑟见面，“不停地询问”他在莫斯科应该与哪位朋友见面。

在后来破译的密电中，没有电文显示克格勃是否录用了伯杰。无论如何，伯杰于一九四六年离开政府部门之后就再无法接触到秘密情报。也有可能，伯杰决定离开政府部门的原因在于，他不想为前苏联从事谍报工作。

在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的要求录用的电文中同时提到，除了约瑟夫·伯杰之外，克拉夫瑟还提供了另外一位人选，他是“（被删节）一位知名记者的弟弟（被删节）。艾德与两兄弟的关系都很好。”国家全部将电文中两兄弟的名字划掉，但是注明，那位知名记者出生于一八九七年，他的弟弟生于一八九九年。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和他的同为记者的弟弟利昂。利昂曾经为德鲁工作，后来两人发生分歧，利昂开始独自闯荡新闻界。一九四五年，利昂陪同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前往莫斯科，后来成为“国际新闻服务部”巴黎署负责人，并担任新闻广播主持人。

即便克格勃真的接触过利昂·皮尔逊，也没有证据显示利昂接受克格勃的邀请。在德鲁·皮尔逊一九五一年的日记中记

载道，联邦调查局向多人查问，利昂是否认识一位不知名的俄国人，以及“一个名叫巴格的记者”。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罗·尼古拉斯告诉德鲁·皮尔逊，“向利昂的朋友们发出问询是为了追查一个潜伏在这个国家的俄国特工，此人认识利昂。不过，利昂并没有参与任何活动。”很可能联邦调查局在一九五一年时破译了克格勃的密电，发现克格勃对利昂·皮尔逊产生兴趣，因此想要查清利昂与约瑟夫·伯杰、塞缪尔·克拉夫瑟及弗拉迪米尔·普拉丁之间的关系。

克拉夫瑟还建议克格勃接触德鲁·皮尔逊的一位同事。一九四四年六月的一份电报被破译得支离破碎，普拉丁在电文中向莫斯科方面汇报有关“艾德（即克拉夫瑟）从记者戴维斯·卡尔（Davis Karr）那里获得的情报”。戴维斯·卡尔当时是皮尔逊的首席助手，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之一。他在事业上如日中天，在美国业界担当重要职位，并且与美国最显赫的政要保持好友关系。尽管如此，仍不时有传言指证他是前苏联间谍。卡尔的名字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份密电中出现，由于电文未能被全部破译，很难判断卡尔向克拉夫瑟提供情报的初衷是出于单纯的同僚之间信息共享的理念，亦或是故意在向一名前苏联特工提供情报。当我们了解过卡尔的一生之后便会知道，后一种推测的可能性最大。

一九一八年，戴维斯·卡尔出生于布鲁克林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他曾为《工人日报》撰写文章和书评，参加美共的会议，与共产党人交朋友。多年之后，他一再否认曾经加入美共，并声称，他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只是出于强烈的反法西斯主义信仰。

一九四三年，由共和党人马丁·戴斯（Martin Dies）担任主席的“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向数位政府雇员

发出质询，追究他们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在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的卡尔便是被质询对象之一。在委员会面前，卡尔声称他与共产党人的联系完全出于无知，并谎称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的内线。就在“民事服务委员会”认定卡尔的陈述并不可信的同时，一个特别国会调查委员会却宣布卡尔是清白的。此后，卡尔辞去在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工作，开始为德鲁·皮尔逊工作。事实证明，卡尔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他的冷酷和不择手段令他很快便闻名新闻界。为了获取新闻，他可以窃听别人的谈话，伪装自己的身份探听消息，甚至练就了一手绝活，即坐在别人的办公桌对面也可以倒读摆在对方面前的文件。卡尔在政界亦十分活跃。一九四四年，他为亨利·华莱士效力，试图保住华莱士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调查局曾经两度调查卡尔。第一次是因为他借用副总统华莱士工作人员的名义获取奥斯卡·兰格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第二次是因为在审理《美亚》间谍案时发现，几名被起诉的间谍均向卡尔提供过情报。一九五〇年，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毫不留情地将矛头指向皮尔逊，其间，麦卡锡谴责卡尔有如“克格勃头子”，控制着一批专栏作家，并且在众多著名反共产主义人士中进行策反活动。在随后近十年时间里，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等保守派专栏作家一直抨击卡尔是共产党人。

五十年代，卡尔开始参与企业策划，并发表著作，阐述公共关系在商业收购过程中的作用。很快，他从理论领域进入到实践领域。一九五九年，经过一番企业间的争斗，卡尔成为“法尔班-惠特尼公司”的执行总裁。这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国防物资承包商，其分支机构包括“考特枪支”。就职三年，卡

尔一直与股东不和，最终被股东们排挤出局。之后，他又涉猎电影业和酒店业，直到一九七二年与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结为合伙人。哈默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牢固的关系网（哈默曾在二十年代帮助美共洗钱，并长时间协助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经哈默介绍，卡尔很快便在苏维埃建立起宝贵的关系。仅仅几年时间，他便开始为西方公司充当经纪人，在苏维埃俄国寻找商机，其中最著名的项目是位于莫斯科的造价高达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科斯莫斯酒店。

一九八〇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凡是与苏维埃政要有着良好关系的西方商人均有机会获取丰厚利润。卡尔借助与前苏联主席阿列克塞·柯西金（Aleksai Kosygin）的女婿戴尔曼·维什阿尼（Dzherman Gvishiani）的好友关系，获得奥运会吉祥物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版权代理。他和哈默合资成立公司，制造和销售奥林匹克纪念币，公司资产达两亿美元。

戴维斯·卡尔不仅与前苏联高层保持关系，与美国政要同样保持联络。他常常炫耀自己与美国参议员及总统候选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声称他曾为这些人提供不菲的竞选经费。他还声称在国家关系、贸易、战略谈判以及前苏联犹太移民等问题上充当美国和前苏联政府之间的桥梁。

一九七九年，卡尔从莫斯科返回巴黎住所后不久突然去世。众多传言认为卡尔死于谋杀，以至于卡尔的遗孀要求推迟葬礼进行尸体检验。有说法认为，卡尔从前苏联合伙人那里骗取巨款。就在卡尔去世前不久，卡尔向“政权交易委员会”秘密作证，暗示哈默涉嫌贿赂前苏联官员。一时间，谣言四起，并且将维什阿尼也牵扯进谣言。以色列的情报官员更散布谣言称，卡尔参与秘密交易，将前苏联的武器出售给利比亚和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后，前苏联的一名记者发表文章，号称援引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材料证实，卡尔是“克格勃的重要内线”，他“向克格勃提供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技术领域方面的情报”。

由克拉夫瑟推荐的另外一名发展对象名叫斯通（I. F. Stone）。九十年代，学术界对于斯通究竟是不是克格勃特工存在很大分歧。斯通于一九八九年去世，他生前坚决捍卫记者的独立地位，他的文章，凡涉及美国政府官员的，均不含有任何偶像崇拜色彩，堪称为文化界的英雄。美国的左派势力无论如何不肯相信，这样一个人会和前苏联政府合作。他们认为，对斯通的指责完全是麦卡锡主义者的诬蔑。

斯通于一九〇七年出生于美国费城，他的父母是从俄国移民美国的犹太人。斯通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辍学成为一名记者。他最初为《纽约邮报》、《国家》等撰稿，一九五三年开始出版《斯通周刊》，这是一份专门揭发丑闻的杂志，获得广泛好评。三十年代，斯通曾一度成为社会党成员，并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支持苏维埃联盟。在《朝鲜战争秘密史料》（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一书中，斯通认为，引爆战争的原因在于南朝鲜凭借美国的支持入侵北朝鲜。虽然斯通偶尔也对前苏联的某些政策表示不满，但他一直信仰苏维埃，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他对苏维埃的幻想开始破灭。然而，斯通的一生对于美国及其政策持批判态度。退休后，斯通开始学习古希腊文，并撰写有关苏格拉底和雅典的书籍。

一九九二年，有关斯通与克格勃的关系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克格勃的一位退休将军奥利格·卡路金（Oleg Kalugin）向一名英国记者指出，“我们的一名特工是美国著名记者，拥有很高的声望，一九五六年后与我们有联络。我本人亲自说服

他恢复同我们的联络。但是，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表示再不会接受我们的报酬。”

“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前成员赫伯特·罗莫斯坦（Herbert Romerstein）认定，卡路金所说的记者就是斯通。英国记者再次采访卡路金。卡路金承认他所指的就是斯通，但否认斯通是间谍。后来，卡路金在自传中指出，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斯通曾经是苏维埃的追随者，且“从不隐瞒他对苏维埃制度的崇拜”。卡路金写道，他接受指令恢复与斯通的联络时，莫斯科克格勃总部“从未说过他是我们情报部门的特工，只说他时常与我们联络”。

六十年代，卡路金被派驻美国时，他定期与记者们会面，听取他们对政治局势的看法。斯通的拥护者们认为，卡路金当年的身份是前苏联大使馆的新闻专员，约见美国记者属情理之中。况且，即便斯通了解卡路金的克格勃身份，他与卡路金的沟通也无可厚非。斯通根本接触不到政府机密，他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卡路金在自传中写道，前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斯通决定放弃对苏维埃的信仰，拒绝与卡路金见面。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封密电中则有另外一番说法。从电文推断，克格勃方面一直想招募斯通。一九四四年九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汇报，斯通“在新闻界威望很高，交往广泛”。为了弄清“他和我们的关系究竟处于哪种程度，我们将委派‘回音’进行调查”。“回音”是美共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联络人伯纳德·舒斯特的化名。克拉夫瑟和普拉丁曾几次试着接触斯通，但是，对于前者，斯通表现出“拘谨”，对于后者，斯通又借口工作忙而回避。

一九四四年十月，普拉丁终于得以和斯通见面。克格勃赋予斯通的化名是“布莱尼”或“薄饼”。斯通知道，他面对的

不是一名普通记者。他对普拉丁说，“他已经注意到我们试图接近他，特别是艾德（即克拉夫瑟）和‘信任’（即前苏联大使馆）的成员几次想联络他，但是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后果，他的反应并不积极。他同时暗示，我们的接触方法不够谨慎，我们派出的人也不够负责任。‘西盖’（即普拉丁）向他表示，我们不想让他陷入麻烦，薄饼对此表示理解，但是他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到他有三个孩子，他不想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根据这封密电可以看出，斯通是在与克格勃兜圈子。如果他单纯地认为他所面临的人物是塔斯社雇员，他根本不会表现得如此谨慎，甚至可以说是惊恐。作为一名左翼美国记者，即便是一名中庸记者，也不会因为约见塔斯社记者而感到害怕，更不会担心在一九四四年那样的年代与某个普通人会面会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六十年代，美国对前苏联政府官员的态度尚不十分友好，但是斯通毫不介意定期与卡路金见面。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没有证据显示，斯通的确被克格勃录用。但是卡路金在九十年代提出，他曾经与斯通“恢复联络”，说明仍然有一种可能性存在，即在维诺那计划确认的那次会面之后，斯通很可能还在其他场合与克格勃特工见过面。



追踪斯大林的敌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苏维埃联盟向斯大林的劲敌列夫·托洛茨基以及身在海外却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苏维埃共产主义构成威胁的其他人士发动疯狂攻势。克格勃外国情报部门负责对流亡海外的苏维埃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他们的外国同志和政治联盟加以刺探、渗透，甚至实行暗杀。

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以及最新公开的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可以发现，美共及其秘密武装广泛参与了一九四〇年对托洛茨基的谋杀，并且尽一切可能为刺客洗脱罪责。此外，他们还参与刺探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敌对势力。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国内战争中，由托洛茨基组建的红军战胜了白军，托洛茨基因此在许多人眼中成为列宁的当然接班人。然而，一九二四年列宁去世后，在苏维埃共产党内部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托洛茨基不敌斯大林，他和他的支持者遭到党内及苏维埃大众狂轰乱炸般的政治抨击，托洛茨基被剥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的理论被定性为犯罪，他本人被开除出党，并遭到内部流放。到二十年代末期，一度具有相当规模的托洛茨基派系几乎销声匿迹。

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允许托洛茨基流亡海外，至于个中

原因，不得而知。然而，就在托洛茨基流亡海外之后，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仇视一路有增无减，终于到三十年代中，斯大林决定无论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都要彻底根除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自然也希望推翻斯大林，他便可以以凯旋者的姿态重返苏维埃，担任新领导人。托洛茨基一直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支持者保持联系，但是这些人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牢狱甚至行刑之灾。例如，托洛茨基最初流亡土耳其期间，克格勃在土耳其的一位高级官员雅各布·布鲁金（Jacob Blumkin）曾悄悄地与托洛茨基联络。布鲁金随即被召回苏维埃，落得被枪毙的结局。（关于这件事情还有一段花絮。布鲁金是被他的情人丽莎·格斯卡亚出卖。格斯卡亚也是克格勃官员，她后来嫁给瓦西里·朱比林，并以伊丽莎·朱比林的身份与丈夫一起在美国领导着一支高产谍报队伍。）

由于前苏联不断施加压力，土耳其方面不得不要求托洛茨基前往其他国家。就在托洛茨基漫游欧洲各国寻求避难的同时，要彻底根除托洛茨基的运动日益升级。前苏联的情报人员打入托洛茨基的流亡团体当中，详细汇报他的行踪，并窃取他的档案，谋杀他的同志。终于，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克格勃的杀手挥起斧头向托洛茨基的头颅砍去。即便是在托洛茨基遭到谋杀之后，斯大林仍不肯放过托洛茨基生前的一小批追随者。前苏联情报部门继续刺探托洛茨基的遗孀以及他的同志们的下落，并且展开一场秘密运动，试图将杀死托洛茨基的凶手从墨西哥监狱中解救出来。

渗透托洛茨基集团

前苏联惯用的反间谍手段便是渗透到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内部，从而诱导其内部发生分裂。流亡土耳其期间，托洛茨基一直试图建立自己的支持者网络，却未曾料到，他早已经被克格勃的特工包围。最先打入托洛茨基集团内部的是一对立陶宛共产党人兄弟。他们的美国姓名是杰克·索布尔和罗伯特·索布伦（Robert Soblen），于二十年代末被克格勃录用，并受委派打入刚刚成立的欧洲托洛茨基运动组织内部。两兄弟出生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姓氏原为索伯勒维奇，到达美国之后便根据译音改为美国式姓氏。他们从欧洲到美国，历时达二十多年之久，其间一直在为苏维埃联盟效力。

杰克生于一九〇三年，一九二一年前往德国莱比锡就读大学。十八岁那年，杰克加入德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毕业后，杰克旅行前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娶当地人为妻。回到德国后，他继续在柏林大学读书，并成为托洛茨基分子，于一九二九年被排挤出共产党。一九六一年，杰克为他兄弟的间谍案出庭作证时称，他于一九三一年被克格勃录用，当时他的妻子刚刚返回苏维埃探望病中的母亲。杰克表示，他被召到前苏联大使馆，大使馆人员以他的妻子相要挟，迫使他加入克格勃。杰克的说法是否真实无从考察，不过有证据显示，早在他名义上成为托洛茨基分子之前，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杰克就已经开始为斯大林效力。

在欧洲托洛茨基运动中，杰克·索布尔使用亚布拉罕·西宁的名字，分别于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在土耳其和哥本哈根与托洛茨基会面。杰克的兄弟化名为罗曼·威尔。兄弟二人在

一九三二年以前一直是德国托洛茨基组织的重要人物。一九三二年，托洛茨基对兄弟俩的行为产生怀疑并将他们驱除。一九三三年，罗伯特·索布伦/罗曼·威尔开始公开以斯大林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并加入德国共产党。杰克·索布尔则于一九三三年返回苏维埃，为“红色国际劳动联盟”工作。

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 Beria）是克格勃头子，他在一九四〇年首肯索布尔一家离开前苏联。于是，索布尔一家三代经西伯利亚海参崴前往日本，最后到达加拿大。随即，杰克和罗伯特便到达美国，重操间谍旧业。罗伯特·索布伦在医药界任职（他毕业于伯尔尼大学医学院），协助他的兄弟开展间谍活动。杰克·索布尔负责领导克格勃的一个重要谍报网，该谍报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渗透到美国的托洛茨基组织当中以及流亡美国的其他前苏联势力当中。被破译的克格勃密电中，在涉及杰克和罗伯特时，依然使用他们在打入欧洲托洛茨基组织内部时所利用的假名。杰克在密电中被称作亚布拉罕（他在欧洲时的假名是亚布拉罕·西宁），罗伯特在密电中被称作罗曼（他在欧洲时的假名是罗曼·威尔）。

一九三二年，杰克·索布尔和罗伯特·索布伦被驱逐出欧洲托洛茨基组织，但是克格勃在托洛茨基组织的高层内部仍设有奸细。一九五六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克·索罗斯基（Mark Zborowski）公认，他曾在三十年代作为克格勃的间谍在欧洲托洛茨基运动组织当中活动。

马克·格里高里维奇·索罗斯基（Mark Grigorievich Zborowski）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生于俄国的乌曼。一九二一年，他前往波兰，并于一九二八年到达法国。克格勃的档案中有关索罗斯基的材料显示，他于一九二六年在波兰加入共产党，一九三〇年被捕，后来越狱逃往德国和法国。一九三二

年，索罗斯基开始为克格勃驻法国机构工作，受命打入托洛茨基运动组织。索罗斯基在托洛茨基组织中使用假名艾蒂恩。他一连数年以自愿者的身份在托洛茨基组织法国总部工作，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色多夫（Leon Sedov）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索罗斯基、色多夫和莱利亚·埃斯特兰·达林在托洛茨基运动的喉舌《对立快报》（Bulletin of the Opposition）担任编辑。一九三八年，“第四国际”成立，索罗斯基成为专门负责报道俄国事件的记者，这也是该组织在当时关注的要点。索罗斯基显然利用他的职位之便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有关托洛茨基运动的情况。仅以一件事情为例：由于索罗斯基提供的情报，前苏联情报人员得以成功地窃取托洛茨基的部分档案。

一九三七年，色多夫出面揭露斯大林的恐怖清洗政策，克格勃于是将他列为铲除对象。一九三八年，色多夫因腹部疼痛入住法国的一家诊所，在一场常规阑尾切除手术之后，色多夫去世。这家诊所由一名法国斯大林主义者开办，索罗斯基向克格勃通报了诊所地点。事后经调查发现，斯大林的特工在色多夫入住诊所之后曾出入过这间诊所。色多夫之死或许属于自然死亡，但克格勃人员在诊所的出现令人不得不推测，色多夫有可能死于医疗谋杀。

一九三八年，克格勃高级官员亚历山大·奥洛夫（Aleksandr Orlov）秘密背叛，他向托洛茨基发出匿名信，提醒他，一个名叫马克的克格勃特工与他儿子关系密切。托洛茨基认定这封信由克格勃发出，旨在挑拨离间，并没有予以重视。然而，其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始对马克·索罗斯基产生怀疑。索罗斯基逐渐脱离托洛茨基组织，修读人类学学位。一九四一年，索罗斯基移民美国后，很快又开始为克格勃工作。

索罗斯基和克拉切科

有数十份维诺那破译的密电中提到索罗斯基在美国的工作。他的化名是“郁金香”，或是“坎特”。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可知，克格勃最初分派给索罗斯基的任务是刺探托洛茨基分子的情况，后来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索罗斯基成为克格勃方面与维克托·克拉切科（Victor Kravchenko）打交道的主要特工。维克托·克拉切科是前苏联的一名叛徒，令前苏联丢尽颜面。克拉切科原先是一名工程师兼政府中层官员，一九四三年作为前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成员到达华盛顿。克拉切科暗中对斯大林心存不满，一直在精心策划背叛前苏联。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克拉切科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谴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并将他的生命“置于美国公众舆论的保护之下”。克拉切科的这一举动不仅令前苏联慌了阵脚，美国方面也不希望看到自己军事同盟的形象受损，克拉切科险些被美国方面交给前苏联。然而，由于克拉切科公开背叛前苏联，并且得到大批记者的支持，在记者们的协助下，克拉切科才没有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

然而，克拉切科成为前苏联政府和美共猛烈进攻的对象。在随后的几年里，克拉切科不停地受到迫害和恐吓，他仍毫无畏惧地完成《我选择自由》一书（I Chose Freedom），讨伐被恐怖和压抑笼罩着的苏维埃。克拉切科的著作成为畅销作品，其可信性遭到前苏联方面的猛烈抨击。一九四九年，法国共产党杂志上发表一篇由自称是美国记者的塞姆·托马斯撰写的文章，攻击克拉切科的著作实由美国情报机关捏造。克拉切科为此向法国法院提出起诉，控告塞姆·托马斯的文章内容纯属子虚乌

有，并召集俄国难民出庭作证，证实克拉切科著作中记录的三十年代发生在前苏联的公社化运动、清洗运动以及集中营的情况全部属实。多名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支持者出庭为斯大林辩护，但最终克拉切科赢得这场诉讼。

在巴黎法庭上与克拉切科对峙的一位美国人是艾伯特·卡恩，一位左翼记者，美共的秘密成员。伊丽莎白·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供认，一九四二年，约各布·格罗曾带她到卡恩在纽约的住所，卡恩向他们提供了反对前苏联的乌克兰流亡人士的情况。据本特利回忆，她与卡恩的联络于一九四三年中断。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一个化名“斗士”，很可能就是卡恩。从密电中可知，“斗士”于一九四二年被克格勃录用，他向克格勃提供乌克兰流亡人士的情报以及美国记者中的政治倾向。一九四四年，“斗士”被“冷藏”。

事实上，一九四四年时，索罗斯基已经预先向克格勃发出克拉切科背叛的警报，只不过他自己当时并不知道。克拉切科与戴维·埃斯特兰·达林（David Estrine Dallin）和茱莉亚·埃斯特兰·达林（Lilia Estrine Dallin）夫妇住在同一幢公寓大楼里。三月的一天，一名俄国人寻找达林夫妇的住处，索罗斯基与他交谈了几句。后来，达林夫妇告诉索罗斯基，他们见过一个人，来自前苏联，很有可能会背叛前苏联，但是他们没有透露此人的姓名。虽然有传闻称，索罗斯基与克格勃有关联，但是茱莉亚·达林并不相信。奥洛夫将军在写给托洛茨基的匿名信中提醒托洛茨基小心马克，茱莉亚和托洛茨基一样，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捏造的。一九四一年，茱莉亚担保索罗斯基一家来到美国。她的丈夫戴维与许多流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保持友好关系，并撰写大量文章抨击苏维埃专制。鉴于达林夫妇反斯大林的立场，他们与索罗斯基的友好关系刚好对索罗斯基起到

掩护作用。索罗斯基对他们的回报却是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汇报给他的克格勃上级杰克·索布尔。索布尔将索罗斯基提供的情报转达给领导人。瓦西里·朱比林得知有人行将背叛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他专程面见索布尔，要求提供此人的详细情报。然而，在他们还没有落实此人的真实身份之前，克拉切科已经公开背叛前苏联。

一九四四年四月初，克拉切科背叛前苏联之后，克格勃委派索罗斯基接近克拉切科。（克格勃在密电中将克拉切科化名为“蚜虫”，可见他们对克拉切科的憎恶。）几个星期过去了，索罗斯基虽然想尽办法，仍没有机会接触克拉切科。他又不敢过分向达林夫妇追问克拉切科的情况，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一个化名“绿色”的内线也向克格勃提供了克拉切科背叛的情报，并且指出，克拉切科约见了两位反斯大林的知名记者尤金·莱昂斯（Eugene Lyons）以及约瑟夫·夏普伦（Joseph Shaplen）。这条情报令克格勃十分不快。莱昂斯曾经是联合新闻社驻莫斯科记者，后来将克拉切科的著作译成英文，并参与编辑。夏普伦也是联合新闻社记者，他替克拉切科出谋划策，协助克拉切科塑造在美国新闻界面前的形象，以扩大新闻覆盖面。

克格勃还收到渗透在美国战争情报办公室的特工克里斯蒂娜·克洛科娃（Christina Krotkova）提供的情报。和索罗斯基一样，克洛科娃也是通过与莱利亚建立友好关系获取有关反对斯大林的俄国难民的情报。在克拉切科背叛过程中，一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担任军士的俄国移民发挥了一定作用，克洛科娃为了从此人那里获得克拉切科的意图，与他一起喝酒，直到酩酊大醉。她还同夏普伦会面。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在报告中指出，克洛科娃的“任务是要小心谨慎地和他建立亲密关系”，

以便从夏普伦那里获得更多的情报。前苏联的另外一名特工，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工作人员瓦西里·苏霍林（Vasily Sukhomlin）向克格勃报告，克拉切科的藏身之所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小屋里，房子的主人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ksandr Kerensky），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推翻的俄国临时政府的流亡领袖。

索罗斯基源源不断地将从达林夫妇那里获得的信息提供给克格勃。他得知，克拉切科是尼古莱·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追随者。和托洛茨基一样，尼古莱·布哈林也是列宁的接班人之一，但是最终败给斯大林。（斯大林于一九三八年处决布哈林。）索罗斯基证实了“绿色”提供的情报，克拉切科正在向茱莉亚·达林口述书稿，内容涉及前苏联如何滥用租赁援助。与此同时，克拉切科还与一名相当活跃的敌视斯大林的记者艾萨·董莱文会面。最令克格勃担心的是，据索罗斯基报告，克拉切科“对克里维斯基事件了如指掌”。沃尔特·克里维斯基曾经是前苏联高级军事情报官员，后来背叛。一九四一年，他被人发现死于华盛顿的一间酒店的房间里。虽然事发现场的迹象表明这是一起纯粹的自杀案，但是很多传言认为，克里维斯基死于谋杀。

克拉切科对克里维斯基事件的了解令克格勃和索罗斯基如坐针毡。一九三七年，克里维斯基在法国背叛后，随即向列夫·色多夫及托洛茨基成员寻求保护。色多夫委派索罗斯基担任克里维斯基的保镖。毫无疑问，索罗斯基将克里维斯基的一举一动都汇报给克格勃。就在克里维斯基背叛之前，他的儿时好友兼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同事伊格纳斯·赖斯（Ignacy Reiss）也背叛了斯大林政权。身为克格勃官员的赖斯于一九三七年向苏维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递交一封信件，谴责斯大林背离十月

革命的宗旨。几个月后，克格勃特工在瑞士找到赖斯，并将其谋杀。赖斯的遗孀埃尔斯·伯诺特（Else Bernaut）在后来的自传中指控索罗斯基参与将赖斯交给克格勃执行谋杀任务的小组。

一九四四年六月底，索罗斯基报告，他终于在达林夫妇的公寓见到了克拉切科。他们的交谈从晚上九点钟开始，后来转到索罗斯基的公寓里继续交谈，直到翌日凌晨四点钟结束。索罗斯基的任务之一是要查清究竟是谁在协助克拉切科叛变。索罗斯基向克格勃上级汇报称，克拉切科只向他提到一位俄国朋友。此人名叫康斯坦丁·米卡洛维奇（Konstantin Mikhailovich），曾经获得冶金界的斯大林奖，一九三六年被克格勃逮捕。一九三八年，米卡洛维奇获得自由之后在莫斯科见到克拉切科，并鼓励克拉切科从事反苏维埃工作。在《我选择自由》（I Chose Freedom）一书中，克拉切科证实康斯坦丁·米卡洛维奇是他的朋友，但没有提及米卡洛维奇敌视苏维埃的观点。根据提供的情报，克格勃方面应该在克拉切科的书籍出版之前就已经着手对付米卡洛维奇了。

马克·索罗斯基还负责替克格勃监视其他前苏联流亡人士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行踪。一九四四年底，索罗斯基在瑞士与克格勃的叛徒伊格纳斯·赖斯的遗孀见面，并将谈话内容汇报给克格勃。一九四五年，托洛茨基运动领袖有意前往法国，索罗斯基将收集的情报提供给克格勃。索罗斯基从未在政府部门任职，也从未窃取过政府文件或工业机密，他的间谍活动仅限于出卖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士，即便他们是自己的朋友或同事。鉴于索罗斯基如此兢兢业业地工作，克格勃安排他成为美共成员。美共与克格勃的联络人伯纳德·舒斯特在报告中指出，根据程序，索罗斯基应该填写申请表格及问卷调查，但是如果

克格勃肯推荐，索罗斯基的美共成员身份可以即时被批准。他的真实身份只有舒斯特和另外一名成员了解。

杰克·索布尔在后来的证词中指出，一九四五年之后，索罗斯基的情报产量减少，他从克格勃定期领取的酬劳也被降低。不过，索罗斯基在美国学术界的声名日起，克格勃津贴的减少完全不影响他的生活。索罗斯基到达美国后曾经在布鲁克林的一间螺丝厂工作。一九四四年，他另谋新职，参与编写一部俄英字典。一九四六年，索罗斯基在“义夫科学院”图书馆工作，后来结识了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从而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学院顾问，并获得政府资助，于一九五二年出版了以东欧犹太人为研究对象的《生命在于与人相处》（Life is With People），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索罗斯基本人也成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研究部门的主任。之后，索罗斯基又获得一系列政府资助，研究课题是人类对疼痛的反应，研究著作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进一步巩固了索罗斯基的学术声望。

一九五四年，亚历山大·奥洛夫（Aleksandr Orlov）公开露面，索罗斯基的身份被揭穿。奥洛夫于一九三八年背叛，此后一直隐居美国。随着斯大林去世，奥洛夫开始出版书籍，揭发斯大林的行径，并竭力为自己的过去开脱。奥洛夫曾经致信提醒托洛茨基当心克格勃特工马克。他与达林夫妇见面后发现，这个马克正是眼下居住美国的马克·索罗斯基。奥洛夫向联邦调查局告发索罗斯基。索罗斯基为此受到传讯，两年后又被参议院委员会传讯出庭。索罗斯基承认他曾在欧洲托洛茨基组织内部充当间谍，但否定居美国后继续为克格勃工作。索罗斯基称，克格勃曾于一九四一年在纽约联络过他，但是他拒绝与他们合作：“这一次，我几乎是……发疯了。我记得很清楚，

我用拳头砸在桌面上说道，‘我不会再为你们做事。’然后，我就走了出去。从此，我再没见过他们。”索罗斯基承认，克格勃曾经要求他刺探克拉切科的情况，遭到他的拒绝。参照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索罗斯基的这一陈述是真实的，但他绝大部分供词都是虚假的。

索罗斯基以伪证罪被叛入狱五年。索罗斯基以他的辩护人未能获得监控方所掌握的全部材料为由上诉，且上诉成功。在索罗斯基的辩护人获得所有相关材料后，此案重新开庭，索罗斯基再次被叛入狱三年十一个月。出狱后，索罗斯基迁到旧金山，在“蔡恩山医疗中心”担任医药人类学家。

刺探持不同政见者

对于斯大林下令要处决的敌人，克格勃只是执行人，而非策划人，但是前苏联情报部门依然希望对他们所执行的任务，所接触的人有所了解。在某些情况下，渗透到流亡组织内部的目的是想发展内线，以获取情报。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只是想在流亡组织内部从事分裂瓦解活动。一九四五年，克格勃的一份指令传达到驻纽约、墨西哥城及巴黎的情报站，要求提供有关“新老俄国流亡人士、民族主义分子、俄国人、美国传教士、托洛茨基分子、犹太复国分子”的情况，可见前苏联想要刺探的范围之广。

在美国，克格勃有特工专门收集这些组织的情报。一个化名亚历山大·洛夫的特工负责提供俄国流亡人士的情报，他不仅获得津贴，还被许诺可以加入前苏联国籍。另一位特工尤金·奥凯恩（Eugenie Olkhine）曾有很长时间与克格勃失去联络。一九四五年，她与克格勃恢复联络，并提供在美国的俄国

东正大主教的情报。她同样也被许诺加入前苏联国籍。尤弗西娜·杜沃琴可 - 马可夫 (Eufrosina Dvoichenko - Markov) 向克格勃提供罗马尼亚人以及她认识的几名国务院雇员的情况。她的儿子迪米特里厄斯 (Demetrius) 是驻阿拉斯加美国陆军中士，参与军事反间谍任务。迪米特里厄斯弄到一部分手册交给克格勃。克格勃方面认为迪米特里厄斯有发展潜力，准备在战争结束后资助他读大学。

渗透在俄国流亡人士中最重要的前苏联间谍是瑟奇·库纳科夫。库纳科夫在沙皇时代曾经是骑兵军官，移民美国后开始热衷于共产主义，但没有宣誓成为共产党人。库纳科夫不仅向前苏联提供其他俄国移民的情报，而且是一名相当活跃的克格勃联络特工。作为对他工作的嘉奖，克格勃方面安排库纳科夫和他的儿子回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克格勃亦有特工负责提供比萨拉比亚人及乌克兰人的情报。麦卡·特卡奇主办一份乌克兰语亲共产党报纸，他同时还负责一个小型谍报网。特卡奇的女儿安·西多洛维奇 (Ann Sidorovich) 和她的丈夫迈克均为朱利叶斯·罗森堡谍报网成员。另有数名特工渗透到犹太组织当中。如果说克格勃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化名冠以“臭貂”反应了斯大林对其在精神领域的劲敌的藐视态度，犹太复国主义者被冠以“老鼠”的称谓则反应了斯大林对犹太人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战略考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鼓励俄国的犹太人成立自己的组织，以便在战争中获得他们的协助。然而，苏维埃对于犹太人的民族情结甚为担忧，所以犹太组织的活动完全处于克格勃的监控之下。一九四三年，苏维埃“犹太人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的代表所罗门·迈克尔 (Solomon Michoels) 和艾扎克·费弗 (Itzhak Feffer) 前往美国，受到犹太群体的热烈欢迎。费弗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特

工。一九四七年，格里高里·凯菲出任费弗的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部分时间，凯菲负责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然而，凯菲生不逢时。二战后的苏维埃笼罩在浓重的反犹太气氛中。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迈克尔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车祸中丧生，费弗被枪决，凯菲被关进监狱。

迈克尔与费弗一九四三年的美国之行由本·蔡恩·戈德堡（Ben-Zion Goldberg）安排。戈德堡是著名依地语作家舍伦姆·阿莱秦姆（Sholem Aleichem）的女婿，他出生在俄国，一九四五年曾回俄国游览。四十年代末，斯大林对犹太作家进行清洗，戈德堡被指控为美国间谍，几位曾经与戈德堡有过联系的苏联作家因此受到牵连被行刑。戈德堡的情况与纽·菲尔德（详见第三章）相似。在《走出红色阴影：斯大林俄国的反犹太主义运动》（*Out of the Red Shadows: Anti-Semitism in Stalin's Russia*）一书中，俄国史学家甘那地·科斯泰切科（Gennady Kostyrchenko）详细记述了克格勃如何利用俄国知名犹太人与戈德堡接触的事实作为指控他是美国间谍的证据，尽管在克格勃的档案里明确记载，戈德堡是“克格勃派驻苏维埃以外国家的外国特工”。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证实，克格勃在犹太人群体中布置了数条内线。一个化名马克的犹太记者〔梅纳什·昂格尔（Menashe Unger）很可能就是马克〕，不仅向克格勃提供有关犹太人的情报，还提供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情报。由于马克提供的情报价值有限，一九四四年，他被命令停止活动。一个化名“哈德森”的美国人及克格勃特工领导着一个小型间谍网，其成员渗透在不同的犹太组织及犹太复国组织中。埃斯特·兰德（Esther Rand）便是哈德森的间谍网中的一名女性成员。兰德一九〇七年出生于俄国，幼年时到达美国，是一

名老共产党人。一九四〇年，兰德从马萨诸塞迁到纽约，一九四四年时为“犹太人联合上诉法庭”工作，然而在这个职位上，兰德只可以向克格勃提供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情报。克格勃鼓励兰德在“犹太人作家及艺术家委员会”寻求行政秘书的职位，目的是，“她将有更多的机会利用犹太组织及其知名人物”。兰德可能没能获得这一职位，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联合上诉法庭”曾经派她前往意大利和以色列工作。在索布伦间谍案中，兰德的名字出现在未受检控的同谋名单中。

刺探社会工人党

与克格勃针对美国托洛茨基组织展开的渗透工作相比，犹太组织被克格勃渗透的程度远远无法企及。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坎农（他在二十年代初任美共主席）于一九二八年率领一百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与美共分裂。坎农的组织历经几次变迁，最终于三十年代末成立社会工人党（社工党），成为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附属组织。由于缺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声援，也不能像美共那样从苏维埃那里获得大笔资助，美国的托洛茨基运动一直未能壮大声势，最鼎盛时期的人数不过几千人，通常的人数只维持在几百人。美国共产党无论在规模上，亦或是组织架构上都远胜于社工党，在美国左翼运动中一直牢牢地处于领袖地位，社工党从未真正对共产党构成过威胁。即便如此，小小的社工党仍然是克格勃的首要目标。

一九三七年，路易斯·比登兹在美共的地位处于上升阶段，即将进入最高领导层。就在他前往芝加哥就任共产党地区性报

纸《中西部每日纪实》(Midwest Daily Record)的编辑之前,美共与前苏联情报部门之间的一位联络人格雷戈里·拉宾诺维奇博士(Dr. Gregory Rabinowitz)要求他寻找适合人选渗透到美国托洛茨基分子在纽约的总部。理由是,如果派纽约的共产党人打入社工党内部,很容易被识破,但如果从芝加哥选派一名共产党人,则比较容易伪装成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芝加哥共产主义青年团领袖杰克·克林(Jack Kling)向比登兹推荐了年轻的共产党人西尔维亚·卡伦(Sylvia Callen)。卡伦婚后的姓名是西尔维亚·富兰克林,她的丈夫扎蒙德·富兰克林(Zalmond Franklin)为克格勃工作,西尔维亚对于这项任务十分热忱。比登兹后来供认,据他所知,扎蒙德·富兰克林曾经在西班牙从事“秘密工作”,返回美国后,又被前苏联情报部门派往加拿大执行秘密任务。比登兹回忆,西尔维亚成功地渗透到社工党的纽约总部后,克格勃方面为扎蒙德单独安排了一所公寓,以便夫妻会面。

比登兹在证词中涉及扎蒙德·富兰克林的一些主要情况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四年五月的一份密电中得到证实。电文由美共与克格勃的联络人伯纳德·舒斯特发出,指出“美共报业同业工会”纽约分会负责人,秘密共产党人内森·艾因霍恩对富兰克林存有怨言。一九四三年,富兰克林夫妇离婚,扎蒙德娶罗斯·里克特(Rose Richter)为妻,罗斯的姊妹弗丽达是艾因霍恩的妻子。艾因霍恩向舒斯特抱怨,扎蒙德经常鼓吹他与克格勃的关系。艾因霍恩认为,虽然他们一家人及社交圈子里的人都是共产党人,如此夸夸其谈依然是不明智的。克格勃方面同意艾因霍恩的观点。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汇报,已经下令富兰克林尽快完成最后一项任务的报告,之后将不再启用他执行任何任务。纽约情报站还表示,将由舒斯特密

切留意富兰克林，防止他毫无顾及地乱讲话。联邦调查局对扎蒙德·富兰克林的调查结果，他的确曾经参加西班牙内战，至少有一段时间曾经在西班牙皇家医院任细菌学家。一九四三年，扎蒙德在加拿大的艾伯塔工作。迈克尔·斯特雷特向联邦调查局证实，他为克格勃服务期间，富兰克林是他联络的对象之一。

让我们将话题转回到西尔维亚·卡伦身上。遵照美共的指示，西尔维亚·卡伦以西尔维亚·科德威尔的假名进入到芝加哥社工党。在拉宾诺维奇的授意下，西尔维亚很快迁到纽约，兢兢业业地自愿在托洛茨基组织中担任文员工作。由于她的出色表现，很快便被委任为社工党领袖詹姆斯·坎农的秘书。卡伦后来向大陪审团供认，她将社工党的情报提供给拉宾诺维奇，她当时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杰克。后来，一个名叫萨姆的人代替杰克，这个萨姆后来被证实就是杰克·索布尔。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西尔维亚的化名是“萨塔”（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神）。克格勃方面在密电中指出，“萨塔”是索布尔谍报网的成员，“与‘臭貂’（即托洛茨基主义者）打交道”。维诺那计划的密电中证实，西尔维亚提供的情报包括：社工党领袖之间的往来信件，娜塔丽亚·托洛茨基（Natalia Trotsky）（托洛茨基的遗孀）的生活及财政状况以及托洛茨基组织内部的财政状况。

西尔维亚·卡伦于一九四七年退出社工党，刚好在路易斯·比登兹背叛共产党一年之前。比登兹背叛后揭发西尔维亚·卡伦是斯大林渗透到托洛茨基组织中的特工。然而，西尔维亚在托洛茨基组织中的同事拒绝相信比登兹。一九五四年，已经返回芝加哥，且更名为西尔维亚·道克西的卡伦被大陪审团传讯。大陪审团要求卡伦回答，她是否加入社工党，她与克格勃及路

易斯·比登兹的关系以及她在纽约期间的活动。卡伦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一九五八年，卡伦被另外一个陪审团再次传讯。这一次，卡伦比较合作，她承认曾经定期与拉宾诺维奇及索布尔会面，将托洛茨基组织的秘密材料提供给他们。会面地点是一所公寓，承租人是一位名叫露西·布克的女人。一九六〇年，杰克·索布尔以间谍罪被起诉，卡伦的名字出现在同谋的名单上，但是未被起诉，她亦没有公开出庭作证。

露西承租的寓所被用做卡伦与索布尔的会面地点，她在索布尔案件中同样出现在同谋的名单上，也没有被起诉。三十年代，布克与美共领袖布劳德的妹妹玛格丽特·布劳德一同在德国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一九三九年，布克返回美国，失去同克格勃的联络。一九四一年，约各布·格罗告诉伊丽莎白·本特利，他接到命令，要求他重新与布克建立联络。格罗执行了命令。布克曾执行过不同的任务，她的领导人包括格罗、克格勃老牌特工约瑟夫·卡茨以及索布尔和索布伦兄弟。杰克·索布尔供认，他是经瓦西里和伊丽莎白·朱比林介绍认识的布克，并且每个月向布克支付一百至一百五十美金的报酬。布克选择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她没有以证人的姿态出现在公开审判中。

另外一位渗透到社工党中的共产党人是弗洛伊德·克利夫兰·米勒 (Floyd Cleveland Miller)，他在社工党中使用的假名是迈克库特。米勒于一九五四年向联邦调查局招供，并作为证人出现在一九六一年罗伯特·索布伦间谍案的法庭上。他向联邦调查局及陪审团供认的情况在数份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得到证实。

米勒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在密执安州读书，一九三六年前往纽约，为广播电台撰写肥皂剧。一九三六年，米勒加入共产党，几个月后即被格里高里维奇·索罗斯基录用，从

事“对立工作”。美共所谓的“对立工作”是指针对对手的政治组织开展的秘密工作。米勒的第一项任务长达一年，专门收听从詹姆斯·坎农的家中窃听的录音带。之后，米勒加入社工党，成为该党派的积极分子，与此同时，他不停地向美共和克格勃提供报告。一九四一年，米勒被托洛茨基组织派往“太平洋地区海员工会”，成为工会期刊的编辑，同时亦为《第四国际》撰写军事事务方面的文章。这份期刊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杂志。“太平洋地区海员工会”由坚定的反共产主义人士领导，与共产党领导的“国际码头工人及仓储工人工会”抗衡，争夺在西海岸海事工人中的领导地位。米勒的职位令共产党人的工会组织在最主要的对手工会高层中有了自己的耳目。米勒后来供认，“作为一名斯大林主义者，我的任务是掌握所有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海员的出海行踪，监视所有进入到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分子。”

米勒在克格勃最主要的联络人是约瑟夫·卡茨。卡茨曾亲自在坎农的住所安置窃听装置。另外还有一位女联络人，米勒只知道她的名字叫西尔维亚·盖佐夫。此人的真实身份是丽贝卡·盖佐夫（Rebecca Getzoff），她的化名“亚当”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多份密电中出现。维诺那计划的电文显示，盖佐夫不仅同米勒合作，而且与马克·索罗斯基、约瑟夫·卡茨以及阿马德奥·萨巴蒂尼（详见第二章）合作。索布伦案件中，盖佐夫的名字出现在同谋的名单上，但是未被起诉，在公开资料中，有关她的情况只有极少部分被披露。

一九四四年春，社工党派米勒前往墨西哥，与娜塔丽亚·托洛茨基见面，将一卷微缩胶片交给娜塔丽亚，里面是托洛茨基生前撰写的斯大林传记。在出发之前，米勒与杰克·索布尔在纽约见面，索布尔将胶片翻拍后交给克格勃。有三份维诺那

计划破译的密电涉及米勒墨西哥之行的准备情况以及他如何在墨西哥为克格勃窃取有关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最有价值的情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方面征求意见，米勒是否应该同娜塔丽亚·托洛茨基多多接触，以了解她住宅的地形状况。米勒此行的一个棘手问题是，由于参与托洛茨基运动，联邦调查局已经将他列入被监视名单。克格勃方面担心，米勒在墨西哥的活动受到美国反间谍特工监视，克格勃将很难与米勒取得联系。

有关米勒墨西哥之行的密电内容很好地反映了克格勃当年的办事作风。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报告，米勒将于六月十一日前往墨西哥，并向莫斯科提供了接头暗号及接头方法，由莫斯科通知克格勃驻墨西哥城情报站。米勒将准时在当地时间早上九点半致电前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要求与大使馆秘书讲话，并自报姓名为列奥那德先生。此举意味着，他已经确认将在当天晚上七点钟，在一家指定的电影院门口与克格勃人员会面，他的手里将拿一本《生活》杂志，戴眼镜，并会不时地摘下眼镜，擦擦镜片。克格勃的接头人手里将拿一份《时代》杂志，并用英语问米勒：“你是多伦先生吗？”米勒将回答：“不是。我的名字是查尔斯·布鲁诺。”不过，克格勃驻墨西哥城的情报官员对于纽约同事选定的接头地点不大赞成。他们向莫斯科抱怨，纽约方面确定的接头地点正对着一间咖啡厅，是政治流亡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与米勒接头的前苏联大使馆官员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出来。

一九六一年，米勒供认，他一九四四年前往墨西哥，克格勃要求他调查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无政府主义组织以及由法国作家维克托·瑟奇（Victor Serge）领导的激进组织之间的最新联盟状况。米勒承认，前苏联驻墨西哥城大使馆中有人与他联

络，这一点在维诺那计划的密电中得到证实。米勒在托洛茨基的宅邸居住了六个星期，没有发现激进组织之间有联盟的迹象。回到纽约后，米勒将此行汇总为书面报告交给克格勃的联络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报告莫斯科，米勒已经从墨西哥返回，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不仅阐述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与瑟奇之间的关系，还提供了一份活跃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分子名单。密电中还讨论了对米勒将来的安排。为了躲避兵役，米勒在一条近海轮船上找到一份水手工作，因为要常常跑船，会影响在托洛茨基组织中的间谍工作。不过，“我们仍会让他继续留在员工（即社工党总部）当中，巩固他在臭貂（即托洛茨基主义）中的地位。”

米勒还供认，他经人介绍与露西·布克相识。一九四五年间，布克担任米勒与索布尔之间的联络人。米勒关于托洛茨基分子的报告就是在布克的公寓里用打字机完成的。一九四五年，索布尔通知米勒，他将向另一位上级汇报，并将他介绍给“堂兄”，这位“堂兄”正是罗伯特·索布伦。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份密电中证实，杰克·索布尔将他负责的打入臭貂的特工交接给罗伯特·索布伦。米勒坚称，他于一九四五年停止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从此致力于儿童书籍的写作。

从墨西哥回到美国后，米勒向克格勃表示，他担心自己的身份会暴露给托洛茨基分子。克格勃还有一位假意支持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特工。此人名叫罗伯特·欧文·美纳克（Robert Owen Menaker），是米勒的朋友，刚刚从拉丁美洲返回纽约。米勒获悉，美纳克对他的几位亲戚表示，他不是托洛茨基分子，而是因为执行共产党的任务才和托洛茨基分子在一起。克格勃报告称，米勒“担心这些言论会传到臭貂的耳朵中，他们

会怀疑他……（米勒）是鲍伯（即美纳克）介绍给他们的。”

罗伯特·欧文·美纳克出生于一个激进派家庭。他的父亲曾因参加俄国革命运动被捕，到达美国后成为一间手帕厂的合伙人，从此富足起来。为了避免剥削工人，他放弃工厂，转而从事农业。他的三个儿子分别以三位革命家和激进主义者命名：彼得·克洛波金·美纳克（Peter Kropotkin Menaker），威廉·莫里斯·美纳克（William Morris Menaker）以及罗伯特·欧文·美纳克。罗伯特的另外一名兄弟弗雷德里克·恩格尔·美纳克（Frederick Engels Menaker）的公开身份是共产党人记者，在法国经营“美国作家同盟”，为反纳粹的难民提供居所。后来，作家同盟被关闭，弗雷德里克又在墨西哥城阿雷纳尔的家中收留了部分流亡人士，并亲自为他们做饭。多年之后，恩格尔的侄子，即罗伯特的儿子丹尼尔·美纳克（Daniel Menaker）著书，用充满深情的笔触记述了他的共产党人叔叔的一生。

丹尼尔·美纳克在记述家史时提到，共产党曾经派他父亲前往墨西哥，“监视流亡的托洛茨基”。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十六份密电涉及罗伯特·美纳克，虽然无法通过电文辨别罗伯特的具体任务，但毫无疑问，监视托洛茨基是他的任务之一。正如维诺那的密电中所指，罗伯特曾协助弗洛伊德·米勒打入社工党。有数封密电提到美纳克的雇主，纽约“米德兰出口公司”的迈克尔·伯德（Michael Burd）。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美纳克在米德兰公司驻智利办事处工作，此间结识了智利外交官克里斯蒂琴·卡萨诺瓦·苏贝卡西斯（Christian Casanova Subercaseaux）。伯德和苏贝卡西斯均为克格勃特工。伯德利用公司的便利将大笔资金转移到拉丁美洲，提供给当地特工，并协助克格勃的两名非法特工利用虚假的瑞士公民身份，分别以尼古拉斯·菲施和玛丽亚·菲施的名字经美国进入

墨西哥。苏贝卡西斯则协助在拉丁美洲进行资金转移及传递信息。

作为一名特工，美纳克的日子并不好过。一九四四年，美纳克有一次从智利返回美国，希望能在美国找份固定工作。迈克尔·伯德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抱怨，美纳克对数家公司的生意不予过问。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负责人致电莫斯科指出，与美纳克合作，“需要容忍一些”，因为他在执行任务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

后来的一些密电中比较清晰地揭示了美纳克的任务。克格勃方面在一份密电中考虑，能否委派刚刚从美国国务院辞职的劳伦斯·达根前往智利，接手部分工作，甚至完全取代美纳克。一九四四年十月的一份密电被部分地破译，电文指出，美纳克将资金提供给在智利的某个人，并且指出，“鲍伯与 X（即老牌特工约瑟夫·卡茨）的关系不同寻常。”电文征求莫斯科对于美纳克工资的意见，并称有人肯向美纳克支付三万美元，但要一年后才能兑现。一九四四年，约瑟夫·卡茨在曼哈顿开办“坦帕斯进口公司”，美纳克与这家公司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

和他的朋友弗洛伊德·米勒一样，罗伯特·美纳克显然也在五十年代与联邦调查局有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在涉及前苏联间谍活动的调查中从未提及美纳克的名字，他也从未被国会委员会传讯或起诉。他的儿子在书中提到，五十年代时，有一位和善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经常到他家里，但是他的父亲从没透露过他在墨西哥从事什么活动或是他向联邦调查局讲过些什么。

曾与美纳克共事一段时间的卡茨是克格勃最活跃的联络特工。卡茨一九一二年出生于立陶宛，后移民美国，成为前苏联克格勃与多条情报内线之间的联络人。共有三十三份被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提到卡茨。卡茨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为前苏联

情报部门工作，他的联络对象包括厄尔·布劳德、伊丽莎白·本特利、弗洛拉·沃欣、哈里·戈尔登（Harry Gold）、托马斯·布莱克（Thomas Black）以及伯纳德·舒斯特。从被破译的维诺那密电中可以看到，克格勃向某些企业提供部分资金（包括“坦帕斯进口公司”以及较早前的“米德兰出口公司”），从而为卡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活动提供掩护。二战结束后，大约在一九四八年，克格勃方面可能认为本特利的叛变及维诺那计划有可能置卡茨于危险境地，于是卡茨离开美国。他继续在欧洲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直至一九五〇年与他的克格勃上级分裂，决定不再为前苏联服务，并移民以色列。卡茨从未向美国政府承认他曾为克格勃情报部门工作。

索布尔武装

杰克·索布尔与罗伯特·索布伦领导的武装，一方面负责刺探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政敌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派特工渗透到战略服务办公室，并同时开办公司以掩护前苏联的情报工作。一九五七年，三名要犯，即杰克·索布尔，迈拉·索布尔（Myra Soble）及雅各布·奥尔班被叛间谍罪。四年后，罗伯特·索布伦亦被叛间谍罪。该武装中的其他成员纷纷逃离美国，没有被送上法庭，其成员鲍里斯·莫罗思则被证实是双料间谍。

音乐奇才鲍里斯·莫罗思一八九五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九二二年，莫罗思离开俄国前往美国，在好莱坞帕拉蒙特创作室工作十六年，担任制片人及音乐总监，负责出品的电影包括斯坦·劳雷尔（Stan Laurel）和奥利弗·哈迪（Oliver Hardy）主演的《跃动的骰子》（Flying Deuces）以及波利特·戈达德（Paulette Goddard）及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主演的

《第二合唱曲》(Second Chorus)。在莫罗思的培养下，宾·罗斯比(Bing Crosby)、金格·罗杰斯(Ginger Rogers)以及鲁迪·瓦利(Rudy Vallee)踏上星途。莫罗思后来表示，他最初同意帮助克格勃工作是为了能够将食品包裹递送给在俄国的兄弟们及年迈的父母。一位自称爱德华·何伯特的俄国人于一九三六年委派莫罗思以帕拉蒙特创作室星探的身份前往德国。一九四二年，何伯特再次接触莫罗思，并表示，他的真实身份是瓦西里·朱比林。朱比林要求莫罗思与他合作，条件是可以协助莫罗思的父亲移民美国。

莫罗思坚称，他曾拒绝朱比林，并拒绝向前苏联特工提供商业掩护身份。但是联邦调查局在一九四三年收到的匿名信(详情见第二章)中，指控数名美国人与克格勃合作，其中特别提及两个名字，即厄尔·布劳德和鲍里斯·莫罗思。匿名信中称，伊丽莎白·本特利负责与莫罗思联络。可见，莫罗思为克格勃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他的自传中，他将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

莫罗思在自传中称，他曾试图阻挠克格勃利用他的公司做掩护。他向朱比林提出的借口是，他的公司规模太小，无法承担这样的职能。然而，朱比林自有办法。一九四三年秋，朱比林通知莫罗思，一对富有的夫妻希望投资一家乐谱公司，为前苏联的谍报活动提供掩护。同年十二月，朱比林开车载着莫罗思前往康涅狄格，与阿尔弗雷德·斯特恩(Alfred Stern)及马莎·多德·斯特恩(Martha Dodd Stern)见面。这对夫妇向“鲍里斯·莫罗思音乐公司”注资十三万美元。

在支持共产主义的人士中，斯特恩夫妇的背景可以算是独一无二的。阿尔弗雷德·斯特恩出生于一八九七年，先后就读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及哈佛大学。一九二一年，他与“西

尔斯—罗巴克公司”总裁的女儿马里恩·罗森沃尔德 (Marion Rosenwald) 结为夫妻，并执掌“罗森沃尔德基金”达十年之久。一九三六年，斯特恩离婚，得到一百万美元的财产。之后，斯特恩遇到马莎·多德，并与之结婚。马莎·多德的父亲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任美国驻纳粹德国大使。

马莎·多德出生于一九〇八年，是三十年代众多绯闻的女主角。她拥有很多情人，其中包括卡尔·桑德伯格 (Carl Sandburg) 和托马斯·沃尔夫 (Thomas Wolfe)。她与纳粹盖世太保头子鲁道夫·戴斯 (Rudolf Dies) 以及前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鲍里斯·维诺格拉多夫 (Boris Vinogradov) 的热恋令外交界震惊。维诺格拉多夫与多德于一九三六年向前苏联政府申请结婚，但遭到拒绝。维诺格拉多夫返回莫斯科，他们的关系结束。几十年后，多德从前苏联的关系人处了解到，维诺格拉多夫极有可能是克格勃官员，并于三十年代斯大林对情报特工的清洗活动中被枪决。杰克·索布尔后来证实，马莎·多德亲口告诉他，在她与维诺格拉多夫交往期间以及在美国驻柏林大使馆期间，她一直是前苏联的间谍。

一九三八年，阿尔弗雷德与马莎·斯特恩结婚后开始致力于极左路线。一九三九年，马莎·多德出版一部畅销书《透过大使馆的视野》(Through Embassy Eyes)，记述了她在德国的经历以及纳粹政权的恐怖。一九四一年，马莎·多德与她的弟弟威廉·多德将父亲担任驻德国大使期间的日记整理后出版，进一步揭示纳粹政权的实质，获得轰动。威廉·多德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三十年代末，威廉·多德曾参加共产主义前线组织，例如“苏维埃联盟美国朋友”组织，并为“美国和平民主同盟”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冠军》杂志上发表文章。一九四一年，他赞助“美国作家同盟”的周

年会议。当时的作家同盟全情支持纳粹—苏维埃协定，以至于同盟中的非共产主义人士早已退出。一九四三年，多德在美国政府外国广播监控服务部担任新闻编辑，国会调查委员会向他发出传讯，多德否认自己与共产主义运动有关联。他声称，并不知道《冠军》杂志与共产主义青年团有关，同样，对于他所参与的其他组织，他亦不清楚其共产主义成分。然而，威廉·多德的否认十分苍白，国会决议停止向他支付工资。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份密电中提到威廉·多德。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于一九四四年征求莫斯科的意见，是否允许化名“西西拉”的多德在前苏联新闻社——塔斯社担任临时工。电文中解释，多德曾经在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并且提供过情报，最近在“俄国战争救援会”工作。

一九四四年初，杰克·索布尔代替朱比林成为莫罗思的克格勃联络人。数份被破译的维诺那密电都提到莫罗思与斯特恩夫妇之间就生意问题上的摩擦。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先后四次致电莫斯科，指出化名路易斯的阿尔弗雷德·斯特恩认为，莫罗思将他们投入的绝大部分资金挥霍掉，因此拒绝额外注资。在其中一份密电中，斯特恩将这一结果归咎于朱比林被调离美国。克格勃方面要求斯特恩不要主动联络前苏联情报部门，克格勃会再派人与之联络。然而，斯特恩认为眼下的情形已经十分严峻：“我想重申，我很想提供帮助。我有足够的资产可以投放在实实在在有意义的生意上。但是，眼看着我所投入的资金、时间及精力被白白地浪费，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斯特恩曾向布劳德的侄女，阿米洛夫的妻子海伦·劳里递交一份备忘录，再由劳里转交给伊丽莎白·朱比林。他在备忘录中抱怨，十三万美元的投资付之东流。“鉴于管理知识的贫乏以及艺术家的特质，根本不适于管理一个严密的商业体系，这笔投资远

远不够……我的合伙人无视我的建议，我的一腔热情换来的却是别人的不屑。”

一九四五年三月，杰克·索布尔到达加利福尼亚，协调斯特恩与莫罗思之间的分歧。四月，斯特恩与莫罗思之间仅维持了一个季度的合作流产，莫罗思偿还斯特恩十万美元。此后，斯特恩夫妇继续在他们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豪宅以及纽约的豪华公寓里过上层人士的生活。一位记者这样描述：“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马克·布利茨坦（Marc Blitstein）、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urke-White）、克利福德·奥特茨（Clifford Odets）以及伊萨姆·诺古奇（Isamu Noguchi）都是斯特恩夫妇派对上的常客。此外还有苏维埃人士以及东欧外交界人士。”

与此同时，杰克·索布尔威胁莫罗思，如果他拒绝合作，他在苏维埃联盟的兄弟们将受到牵连。一九四七年，莫罗思向联邦调查局自首，同意成为双料间谍。从此，他开始向美国政府提供索布尔的活动情报，联邦调查局将索布尔的谍报网置于监控之下。

斯特恩夫妇极力宣扬苏维埃主义的做法最终引起国会调查委员会的注意。一九五三年，斯特恩夫妇被“众议院侵犯美国利益行为特别委员会”传讯，斯特恩夫妇没有出庭，而是逃往墨西哥。一九五七年，美国政府终于对索布尔谍报网采取行动，索布尔和他的妻子迈拉，助手雅各布·奥尔班以及斯特恩夫妇被判间谍罪。

逃往墨西哥的斯特恩夫妇害怕被引渡，于是又逃往捷克斯洛伐克。六十年代，他们曾一度前往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后来返回布拉格。对于斯特恩夫妇的指控于一九七九年失去效力，但是他们没再返回美国，最终在布拉格去世。

在莫罗思的协助下，美国政府掌握了大量不利于杰克·索布尔的证据。索布尔不想冒伪证罪的风险，他和妻子以及雅各布·奥尔班决定认罪。索布尔还就他过去的活动做了详尽陈述。他不仅供认了马克·索罗斯基，还协助政府于一九六一年以间谍罪起诉他的弟弟。杰克·索布尔被判终生监禁。他身患白血病，保外就医期间，利用一位过世的亲戚的护照逃往以色列。然而，以色列方面拒绝索布尔入境，将他送回美国。在飞机上，索布尔企图自杀，飞机被迫降落伦敦。在伦敦接受治疗期间，索布尔试图寻求避难。他最终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于是服用大剂量安眠药死亡。

索布尔谍报网的另外两名成员简·福斯特（Jane Foster）和她的丈夫乔治·兹拉托维斯基（George Zlatowski）也于一九五七年被起诉。当时，他们居住在法国，拒绝回国受审，法国政府也拒绝将他们引渡，法国政府很可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要求他们提供前苏联谍报活动在法国的情况。简·福斯特是位富商的女儿。一九三五年从米尔斯学院毕业后，简·福斯特游历欧洲，于一九三六年与荷兰的一位政府官员结婚，并随丈夫前往印度尼西亚。一九三八年，简·福斯特返回加利福尼亚探望父母，其间加入共产党，之后不久便与丈夫离婚。一九四一年，简·福斯特迁居纽约后不久，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乔治·兹拉托维斯基。兹拉托维斯基来自明尼苏达州，一九三七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作战。简·福斯特与兹拉托维斯基结婚后不久，兹拉托维斯基即应征入伍。

几乎在同一时间，福斯特结识了阿尔弗雷德·斯特恩及马莎·斯特恩，并成为朋友。福斯特还结识了美共领袖的弟弟威廉·布劳德。福斯特后来写道，威廉·布劳德和马莎·斯特恩都提醒她，“不要将我所从事的党的工作太过公开化，如果我更

加谨慎，则对党更加有帮助。”福斯特认为这是对她“表示欢迎的暗示”。乔治入伍后，一九四二年，福斯特搬往华盛顿，从亨利·科林夫妇那里租了一个房间。科林的妻子苏珊·安东尼二世是美共在华盛顿地下组织中的积极分子。福斯特在她的自传中承认，就在她迁离纽约之前，威廉·布劳德将一位年轻女子（福斯特没有提及此人的姓名）介绍给她，此人将会在华盛顿与福斯特碰面，“这样，我可以继续与党组织保持联络。”由于福斯特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居住过，她的马来语特长令她很快在“荷兰研究中心”找到工作。这是一个战时机构，专门负责协调在印度尼西亚的情报工作，后来被并入“经济战委员会”。福斯特写道，她在“经济战委员会”中最要好的朋友查尔斯·弗拉图是一名克格勃特工。一九四三年秋，福斯特被调往战略情报办公室，一九四四年初，被派往锡兰。

根据鲍里斯·莫罗思的说法，简·福斯特亲口告诉过莫罗思，她于一九三八年被马莎·多德·斯特恩招募为前苏联特工。（不过，根据福斯特的说法，她与斯特恩夫妇相识于四十年代初。）在福斯特的自传中，她否认自己是前苏联特工，对于她与杰克·索布尔及鲍里斯·莫罗思的关系，她的解释十分令人费解。福斯特称，杰克·索布尔及鲍里斯·莫罗思是一对奸商，利用了她和她的丈夫。福斯特写道，她于一九四六年回到美国时结识杰克·索布尔，并借给他一千八百美元在法国开设公司，但是福斯特从未提供过收据或是借条作为证据。福斯特承认，向索布尔提供过一份战略服务办公室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报告，并辩称，虽然在报告上有“绝密”的字样，但内容并非什么秘密。同年，她的丈夫乔治加入“美国陆军情报学校”（陆军部当时并不了解乔治的共产主义背景），成为美国军事情报部驻奥地利的审讯官。一九四八年，乔治从部队退伍。莫罗思曾经

与乔治发生过接触，但是根据福斯特的说法，身为杰克·索布尔情报下属的莫罗思只不过通知乔治，福斯特于一九四六年借给杰克的资金暂时无法归还。福斯特承认，她和丈夫通过索布尔的介绍结识鲍里斯·莫罗思，但是坚称他们之间的接触属纯粹的朋友间接触，他们甚至还借钱给莫罗思。

然而，根据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可以证实，福斯特在自传中的陈述是谎言。克格勃的密电证实了福斯特的间谍身份，只不过莫罗思将福斯特被招募的时间记错了，又或是从别人那里得到错误的信息。朱比林于一九四二年六月致电莫斯科：“〔未破译密码〕丽莎（即马莎·斯特恩），我们正在培养美国人简·福斯特，希望能够录用她。此人大概三十多岁，在华盛顿的荷兰〔未破译密码〕工作，担任马来语翻译……她是同胞（即共产党人）。她的同胞（即共产党人）同事认为她〔未破译密码〕，工作认真。”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的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福斯特的化名“俚语”曾多次出现，电文中涉及她向前苏联提供情报及从事其他谍报任务。

索布尔间谍案的大陪审团罗列了一批索布尔谍报网同谋的名单，但是未加以起诉，原因是，这些人有些是外国人，早已不住在美国；有些已经去世；有些人与法庭方面合作；还有些人虽然涉及在托洛茨基组织及犹太复国组织中从事间谍活动，但并未针对美国政府展开间谍工作。他们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工作，刺探托洛茨基组织及犹太复国组织的行为虽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没有触犯联邦法律。

在这些人中，有三位德国人值得一提，他们是著名的德国共产党人威廉·科尼恩（William Koenen）的女儿约翰娜·科尼恩·贝克（Johanna Koenen Beker）、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略服务办公室顾问汉斯·赫希菲尔德（Hans Hirschfeld）、战略服务

办公室顾问霍斯特·比伦斯普隆（Horst Baerensprung）。在纳粹掌握德国政权时，约翰娜·贝克的父亲正在共产国际担任高级职位，约翰娜前往莫斯科，为一家美国公司担任翻译。根据约翰娜的供词，她于一九三七年被克格勃录用，负责刺探美国游客，一九三九年被派往美国。一九四二年，朱比林将约翰娜介绍给罗伯特·索布伦，并担任索布伦的信使。索布伦每个月向约翰娜支付三十五至四十美元作为报酬。约翰娜的公开职业是在纽约的一家律师公司任档案文员。

在审讯索布伦案件中，约翰娜·贝克证实，赫希菲尔德和比伦斯普隆都向她提供过情报，再由她转交给索布伦。约翰娜称，比伦斯普隆提供的情报包括德国流亡组织的情况以及从战略服务办公室窃取的人物档案。二战结束后，比伦斯普隆返回前苏联占领区，在新成立的东德政府担任警察官员，于索布伦案件在美国被揭露之前去世。贝克证实，赫希菲尔德向她提供的情报同样包括德国流亡人士的现状，包括他们专注的领域以及政治观点，还有他道听途说的关于美国正在开发一种新式武器的情况。二战后，赫希菲尔德前往西柏林，一九六〇年成为西柏林市长的新闻负责人。对于约翰娜的指控，赫希菲尔德在西柏林予以否认，但是他拒绝前往美国作证，除非他被豁免一切刑事责任。美国政府只允许赫希菲尔德被部分地豁免刑事责任，但是一旦他犯伪证罪，则不能被豁免。考虑到否认约翰娜的指控有可能导致犯伪证罪，赫希菲尔德最终决定留在德国。在与美国情报特工的一次会面上，赫希菲尔德承认“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在欧洲从事非法活动，并与共产党人有过联络”。但是在这次会面之后，赫希菲尔德再次对约翰娜的指控表示否认。他亦辞去在西柏林市政府中的职位。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关这三位索布尔谍报网成员

的内容十分有限。约翰娜·贝克大概在三份密电中出现，化名有可能是“温柔”，又或是“李”，但未能得到证实。根据电文内容，温柔/李的任务是在德国移民及流亡人士当中活动，并负责主持一个安全据点。在维诺那计划的一份密电中，有大批人名未能被破译，但是可以辨别出，罗伯特·索布伦向哥哥杰克推荐了汉斯·赫希菲尔德及其他一些德国移民。

在被指控的索布尔情报网中还有两位神秘人物，亨利·斯皮茨博士（Dr. Henry Spitz）和他的妻子比特丽斯·斯皮茨博士（Dr. Beatrice Spitz）。这对夫妇均为物理学家，是美国公民。他们被指控一九五〇年居住在新墨西哥州时，曾经对制造原子武器的军事基地拍照，并将胶片提供给索布伦博士。同年，他们回到出生国奥地利。索布伦被逮捕之后，他们放弃美国公民身份。

罗伯特·索布伦和杰克·索布尔的一位亲戚也加入到他们的谍报活动中。此人名叫依亚·沃尔斯坦（Ilya Wolston），是罗伯特和杰克姐姐的儿子。鲍里斯·莫罗思在自传中写道，杰克·索布尔曾经向他提起过沃尔斯坦，称他在阿拉斯加为前苏联工作，化名是“斯拉瓦”。维诺那计划的密电证实，莫罗思的说法是正确的。

依亚·沃尔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美国陆军，成为军事情报官员。很快，他便开始向克格勃提供位于马里兰陆军情报学校的组织架构、课程等情报。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沃尔斯坦指出，他所接受的培训是专门针对前苏联事务而设置，他的一项任务是要刺探那些有可能被录用为前苏联特工的人士。克格勃认为，沃尔斯坦在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工作非常有价值。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方面保证，“我们已经提醒过斯拉瓦，做事要小心谨慎。”

从陆军情报学校毕业之后，沃尔斯坦被派往阿拉斯加执行一项针对前苏联的反间谍任务。当时，由于租赁援助计划，前苏联的海军及空军均频繁经过阿拉斯加。作为前苏联间谍的沃尔斯坦，他所要执行的任务是保卫美国不被前苏联特工所渗透，而事实上，他却是在为前苏联服务，完成着前苏联梦寐以求的计划。沃尔斯坦被派往阿拉斯加期间，他的名字没有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出现。不过，由于前苏联特工的化名会经常转化，所以，有一个化名“斯克里普”很可能就是沃尔斯坦的。此人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从阿拉斯加向“冰霜”（即鲍里斯·莫罗思）表示，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沃尔斯坦在他舅舅杰克领导的谍报网中继续为克格勃工作。五十年代，沃尔斯坦的健康状况不佳，回到乡间过起隐居生活。在被联邦大陪审团传讯之前，沃尔斯坦曾经六次被传讯，但均不予理睬，被判藐视法庭罪。沃尔斯坦认罪，但以精神病症为由要求轻判。结果他被判刑一年，缓期执行。

在索布伦案件中未被起诉的同谋中大多是渗透到托洛茨基组织及犹太复国组织中的人士，包括弗洛伊德·米勒、西尔维亚·卡伦·富兰克林、埃斯特·兰德、西尔维亚·盖佐夫及露西·布克。然而，单单渗透到托洛茨基组织仍难以满足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是想永远地根除托洛茨基。刺杀列夫·托洛茨基以及协助杀手逃避罪责的任务落在美国的秘密武装及克格勃身上。

美国人和刺杀托洛茨基案

克格勃高级官员帕维尔·苏托普拉托夫曾经成功地主持过

数起克格勃的刺杀计划。一九三九年，斯大林及克格勃负责人拉夫连季·贝利亚召见苏托普拉托夫，任命他为克格勃外国部的副部长，并委派他负责铲除托洛茨基。苏托普拉托夫将克格勃元老利奥尼德·爱丁根（Leonid Eitingon）纳入旗下。（爱丁根曾经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出现，化名汤姆。）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另外一位元老列夫·瓦西列夫斯基（Lev Vasilevsky），常驻北美时的名字为列夫·塔拉索夫，负责这项刺杀计划的协调沟通工作，并被派往托洛茨基的流亡地墨西哥城。一九三九年，爱丁根到达纽约，成立一家进出口公司作为掩护。

为了完成刺杀托洛茨基的计划，爱丁根和苏托普拉托夫发展了一批武装网络。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爱丁根的对外身份是克托夫将军，专门负责国际纵队的一支特别队伍，执行突击队任务及蓄意破坏任务。他将这支特别队伍的人马招募到手下，从事反托洛茨基活动。一位富有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卡丽达·麦卡德（Caridad Mercader）是其中一个武装网络的负责人。爱丁根启用麦卡德的儿子拉蒙（Ramon）作为该网络的主要执行人。移居墨西哥的西班牙画家戴维·西奎罗斯（David Siqueiros）领导着另外一个武装网络。爱丁根另外还有一批备用武装力量，一旦麦卡德和西奎罗斯的武装未能完成任务，他将启用备用武装铲除托洛茨基。美国共产党人托马斯·布莱克供认，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负责人盖卡·奥瓦金米安于三十年代中期将他招募为间谍，从事工业谍报活动。布莱克指出，一九三七年，克格勃方面要求他加入托洛茨基组织，并做好前往墨西哥托洛茨基宅邸的准备。布莱克后来了解到，他的这项任务是为了配合刺杀计划。然而，由于个人原因，布莱克没能前往墨西哥，几乎没有参与反托洛茨基的行动。

西奎罗斯领导的武装最先采取行动。大约二十名西班牙及

墨西哥共产党人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向托洛茨基的住处发动武装攻击，其中的大部分人是西班牙内战的退伍军人。这次行动的结果仅刺杀了托洛茨基的保镖罗伯特·谢尔登·哈特（Robert Sheldon Harte），托洛茨基本人安然无恙。同样是国际纵队退伍军人的西奎罗斯被捕。他的手下在这次行动中共发射数百发子弹，然而西奎罗斯却坚称，他们行动的目的只不过是收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在被保释期间，西奎罗斯在当时的智利驻墨西哥外交官帕布罗·那鲁达（Pablo Neruda）的协助下逃亡。那鲁达是一名共产党人，后来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墨西哥新闻界报道，杀害罗伯特·哈特的两名枪手是利奥波罗·阿里纳和路易斯·阿里纳，兄弟两人出身于富裕家庭。（事实上，哈特并没有在保卫托洛茨基的枪战中阵亡，而是被俘虏后杀害。）一九三九年春，约各布·格罗将伊丽莎白·本特利介绍给利奥波罗·阿里纳。利奥波罗·阿里纳的兄弟路易斯娶了美国人罗斯·毕格尔·阿里纳，居住在纽约。阿里纳的一个姐姐安杰莉卡（Angelica）嫁给了戴维·西奎罗斯。在格罗的安排下，利奥波罗将信件寄给罗斯，再由本特利前往罗斯的住处取回交给格罗。罗斯·阿里纳后来向联邦调查局供认，她的确收到过利奥波罗的信件并转交给本特利，进而提供给格罗。她从未打开过信件，不过，她估计信件的内容是关于刺杀托洛茨基的行动计划。

虽然罗斯·阿里纳表示，她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被牵扯进一场谋杀案中，但是维诺那计划的密电中却证明，她一直与克格勃保持联络。一九四三年七月，她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官员汇报，伊丽娜〔经分析家认定，此人为埃琳娜·许尔特·穆奎兹（Elena Huerta Muzquiz）〕在财政上遇到麻烦。显然，伊丽娜

握有前苏联的一些把柄，正准备起诉前苏联驻墨西哥大使康斯坦丁·乌曼斯基。罗斯对克格勃称，她已经建议伊丽娜不要这样做，并要求克格勃“将目前的状况汇报”给有关方面。同时，罗斯还向克格勃建议，可以将阿里纳家族的另外一名成员招募为特工。她丈夫的堂兄阿尔伯特·阿里纳（Alberto Arenal）在来信中称，他被委任参与墨西哥的一项军事任务，即将动身前往美国。罗斯对她的克格勃联络人说，阿尔伯特“是一个正直的人，支持我们的工作”。

西奎罗斯领导的武装刺杀托洛茨基的行动失败后，苏托普拉托夫和爱丁根不得不采用第二套方案，动用麦卡德领导的武装。该武装的成员已经悉心筹划了多年。路易斯·比登兹后来供认，一九三八年，他将美国秘密武装成员鲁比·韦尔（Ruby Weil）介绍给格雷戈里·拉宾诺维奇。韦尔当时正在试图和西尔维亚·安格洛夫建立朋友关系。安格洛夫是一位热忱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是她并不知道韦尔是一名秘密的斯大林主义者。一九三八年，在前往巴黎出席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大会的旅途中，韦尔将西尔维亚·安格洛夫介绍给化名“杰克·莫纳德”的拉蒙·麦卡德。莫纳德追求安格洛夫，两人成为情侣。安格洛夫返回美国后，一九三九年九月，拉蒙前往墨西哥时途经纽约探望安格洛夫。几个月后，西尔维亚·安格洛夫前往墨西哥，一方面作为志愿者为托洛茨基工作，另一方面与男友团聚。（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家中的工作人员以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大多由美国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成，他们常从事几个月的志愿工作。被西奎罗斯武装杀害的哈特也是一名志愿者。）莫纳德利用安格洛夫在托洛茨基住处工作的机会，得以出入托洛茨基的宅邸，并同托洛茨基的警卫及助手成为熟人。莫纳德表达了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兴趣，但表示有一些问题没能透彻理

解，并以此为借口，得以在一九四〇年八月见到托洛茨基本人，与之探讨莫纳德的一篇哲学文章。莫纳德正是利用这次与托洛茨基独处的机会，用一把小斧头砍向托洛茨基的头颅。

莫纳德原计划悄悄杀死托洛茨基之后逃走，没料到，托洛茨基大声呼叫，莫纳德被警卫抓住。墨西哥法庭裁决莫纳德谋杀罪名成立。莫纳德一直坚称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因为怀有不满情绪而采取谋杀手段。墨西哥方面试图判定莫纳德的真实身份，但毫无结果。莫纳德在进入墨西哥时，使用的是一本被涂改过的加拿大护照，护照的真正主人曾经参加过国际纵队。虽然普遍有人怀疑莫纳德是前苏联特工，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莫纳德的真实国籍。

莫纳德被捕后，前苏联情报部门立即行动，试图将莫纳德从监狱中解救出来。这一行动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被称作“利塔计划”，后来又被称作“地神计划”。“利塔”和“地神”均为麦卡德的化名。该计划涉及俄国、墨西哥及美国共产党人。正如刺杀托洛茨基的计划需要美国共产党人的配合一样，解救杀人凶手的行动同样需要一大批美共成员的协作，他们以特工、投递站及信使等身份为克格勃工作。从莫斯科、纽约及墨西哥城发出的数十份密电涉及这项头绪纷繁的计划。

在刺杀行动之前，克格勃利用罗斯·阿里纳充当纽约的投递站，刺杀行动后，克格勃启用了另外一个共产党网络。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期间，联邦调查局共截获二十四份往来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秘件或隐含暗语的信息。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没有透露他们最初是如何得知这些信息的。为这些信件及信息充当投递站的人士均为居住在纽约和墨西哥城的老共产党人。联邦调查局挖掘出的第一个投递站是莉迪亚·阿特舒勒（Lydia Altschuler），一名在“消费者联合会”工

作的德国移民。在此之前，阿特舒勒曾在美国的前苏联电影发行部门工作。

其他的投递站包括纽约的一位律师夫人波琳·巴斯坎 (Pauline Baskind)，共产党领导的“纽约教师联合会”成员弗朗西丝·西尔弗曼 (Frances Silverman)，为前苏联政府所雇用的纽约动画片放映员路易斯·布洛克 (Louis Bloch)，华盛顿艾文中学文员范妮·麦克匹克 (Fanny McPeck)，巴尼特·谢泼德 (Barnett Shepard)，埃塞尔·沃格尔 (Ethel Vogel)。沃格尔的丈夫悉尼 (Sidney) 曾经作为医生参加国际纵队。《工人日报》的专栏作家海伦·利瓦伊·西蒙 (Helen Levi Simon) 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前往墨西哥城参加“联合反法西斯难民会议”，一九四四年又向墨西哥城汇款三千七百美元，作为解救麦卡德的资金。

另外还有一个名叫安娜·科洛姆 (Anna Colloms) 的女人承担起投递站的职能。一九四三年八月，联邦调查局跟踪科洛姆前往墨西哥。科洛姆随身携带一批加密文件，藏在一个装文具的空盒子里。八月十五日，科洛姆前往墨西哥时，美国海关官员将文具盒没收，随后破解了加密文件，将文具盒退还到科洛姆的家中。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发现，被破解的加密文件全部涉及解救麦卡德的方案。

身为华盛顿艾文中学的教师及美共成员，科洛姆在携带的文具盒被没收之后继续前往墨西哥城，并且颇为心不在焉地与一个名叫雅各布·爱泼斯坦的老相识见面。(在海关没收科洛姆的行李那一刻开始，科洛姆一定怀疑到她在被人监视。)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日，科洛姆回到美国后收到被没收的行李，将文具盒交给她的嫂子埃塞尔·沃格尔，沃格尔又再转交给雅各布·爱泼斯坦的妻子鲁思·威尔逊·爱泼斯坦 (Ruth Wilson Epstein)。一九五〇年，科洛姆被传讯，当被问及她所参与的美

共活动时，她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数份密电证实，克格勃驻拉丁美洲情报站主要利用莉迪亚·阿特舒勒和安娜·科洛姆充当投递站，而且，当其中的一个投递站在前往墨西哥之后被曝光时，克格勃方面很快便得到消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六日，克格勃布宜诺斯艾利斯特工致电纽约称，他寄给莉迪亚·阿特舒勒的几封信件均被美国的邮件监管部门截获。他提醒纽约方面妥善“处理莉迪亚”。布宜诺斯艾利斯提到的信件的确被美国政府截获，信件中的内容涉及特工的调遣、资金调配、建立秘密电台以及为常驻几个南美国家的克格勃特工提供联络人。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要求布宜诺斯艾利斯特工停止使用莉迪亚的地址，“目前状况下，只可使用安娜·科洛姆的地址，并将此事转告亚历山大（真实身份未知）。”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四年的一封密电中提到科洛姆的墨西哥之行，指出“‘无’（即鲁思·爱泼斯坦）和信使‘A’（即安娜·科洛姆）受到监视。‘A’去了农村（即墨西哥）与哈里（即雅各布·爱泼斯坦）联络，但未成功。”电文中向莫斯科方面保证，将会采取反跟踪措施。

雅各布和鲁思·爱泼斯坦夫妇是前苏联特工，他们的行踪在数份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出现。常驻墨西哥城的雅各布·爱泼斯坦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日出生于布鲁克林，父母是俄国人。他在纽约就读公立学校，并从康奈尔大学毕业。一九二四年，他在校园里结识了同为学生的安娜·科洛姆。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八年，爱泼斯坦先后在数家服装公司工作，直至他加入国际纵队。爱泼斯坦在战场上身负重伤，在养伤期间，与护士鲁思·威尔逊相识并结为夫妻。

没有证据显示爱泼斯坦是在西班牙期间，亦或是在他返回

美国之后被克格勃录用，但是有一条线索可以证明，他在一九四一年时已经与美共的秘密武装有联系。爱泼斯坦在前往墨西哥之前向美国政府申请护照，他的见证人之一亚布拉罕·赫尔德（Abraham Held）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是约瑟夫·彼得斯的生意伙伴。一九四一年，雅各布凭旅游签证进入墨西哥。翌年，他受聘为“奥尔顿地毯厂”代表，并因此获得墨西哥居留权。这家地毯厂由詹姆斯·刘易斯·马库斯（James Lewis Marcus）设立，实为前苏联情报部门的据点。一九四三年，爱泼斯坦申请到学生签证。同年末，他又申请成立家具公司，但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绝。事实上，爱泼斯坦在墨西哥的真正目的并非旅游、求学或是经商，他此行的目的是作为“地神计划”的负责人，旨在将麦卡德从墨西哥监狱营救出来。

爱泼斯坦需要向一系列前苏联高级情报官员报告。列夫·塔拉索夫名义上是前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实际上是克格勃的职业官员，他亦被派往墨西哥负责刺杀托洛茨基的行动，并且成为克格勃驻墨西哥城的负责人。克格勃高级官员帕维尔·喀拉林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从纽约抵达墨西哥，负责指挥营救麦卡德行动。利奥尼德·爱丁根则从莫斯科遥控整个劫狱行动。然而虽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劫狱计划始终没有实施。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最早提及爱泼斯坦劫狱行动的密电发自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天后，另外一份密电中指出，哈里（即爱泼斯坦）已经在关押麦卡德的监狱中安插了两名特工，其中一名特工化名“医生”，另外一名特工化名“病人”。（克格勃方面对这次行动的所有暗语及化名均采用医学用语，例如，墨西哥监狱被称作“医院”。）此次行动的安排是在将麦卡德营救出狱后安排他出境墨西哥，再由另外一批特

工接应。不过，喀拉林向莫斯科方面承认，这次行动准备工作的进展“异常缓慢”。

美国反间谍部门截获身在纽约的喀拉林与身在墨西哥的爱泼斯坦之间的加密邮件，经破译发现，爱泼斯坦说服喀拉林亲自前往墨西哥坐镇整个行动。喀拉林以前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的身份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墨西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塔拉索夫从墨西哥城致电莫斯科的贝利亚称，“医生正在准备外科手术”，将于四日之后做手术，并要求立即支付两万美元。

然而，几天之后，塔拉索夫便报告行动失败。劫狱计划原订在麦卡德被从监狱押往法院的途中进行。从监狱前往法院共有九条路径，爱泼斯坦的手下通过贿赂狱警得知确切路线。克格勃的战斗队将在途中发动进攻，营救麦卡德，将其送往隐秘地点，之后再协助他逃出墨西哥。但是，由于该计划中存在几个难点导致计划被搁置。行动之前本应有一次重要会议，出席者包括喀拉林、爱泼斯坦、出租车司机胡安·戈多伊（Juan Godoy）以及为这次行动提供大部分行动人员的墨西哥行动小组负责人。然而，这个重要会议并没有举行，再加上其他一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导致行动计划流产。

爱泼斯坦对于克格勃的用处也就此结束。克格勃发现，爱泼斯坦在墨西哥的行动已经受到监视，他的妻子在纽约亦被人跟踪。克格勃认为，爱泼斯坦继续留在墨西哥将对“地神计划”的成功构成威胁。一九四四年五月，爱泼斯坦返回美国，其后有关他的行踪不得而知，不过，他的妻子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联络一直保持到一九四五年。

劫狱计划流产之后，在爱丁根的授意下，喀拉林将战斗队解散。他一直在努力寻求其他的解救方案，但始终未果。在一

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密电中，塔拉索夫提出两个方案。其一，利用复活节期间监狱保卫松懈的时机采取行动。一个化名“风筝”的监狱员工将引见一名高级狱警，协助解救麦卡德行动。其二，将依靠一位化名“地主”的墨西哥司法部成员实现解救计划。

然而，所有的努力都没能成功。五月二十四日，喀拉林离开墨西哥。六月，塔拉索夫再次致电莫斯科，电文很长，详细论述了一个全新计划，即利用安插在墨西哥监狱，化名“发明”的特工与伊达尔戈州州长的关系实施营救计划。电文中的大部分内容未能被破译，但依稀可辨的是，该计划将牵扯正在为麦卡德治疗的共产党人医生埃丝特·察巴（Esther Chapa）。然而，这项计划同样以失败告终。

克格勃始终没有放弃解救托洛茨基杀手的希望。卡丽达·麦卡德于一九四五年前往墨西哥探望她的儿子。莫斯科方面下令，要求“仔细研究地神医院（即监狱）的作息，以及‘竞争者’（即墨西哥反间谍部门）的特工对他的监管情况。”莫斯科方面同时提醒道，鉴于莫纳德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即便是动用麦卡德的真实护照，也很难通过墨西哥的层层关卡。一切的努力均无济于事，麦卡德在墨西哥监狱一直呆到一九六〇年刑满释放。他最终回到苏维埃联盟，靠克格勃提供的退休金生活。

基蒂·哈里斯（Kitty Harris）和克格勃驻 墨西哥的谍报活动

由于墨西哥共产党组织规模较小，克格勃决定与墨西哥的其他政治势力建立关系。在墨西哥，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工人

领袖，墨西哥最大的工人联合会主席文森特·隆巴德·托雷达诺（Vincente Lombardo Toledano）。在墨西哥政坛上，托雷达诺是最知名的亲苏维埃人物，但是他一直与墨西哥共产党保持距离。

托雷达诺本人定期向克格勃提供政治情报，并协助克格勃特工获得文件及签证。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托雷达诺的化名只被部分地破译为“施××”。托雷达诺与克格勃特工，一位名叫基蒂·哈里斯的女人合作密切。基蒂·哈里斯为共产国际及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数十年，足迹遍及几个大洲。虽然有关她的一些谜团至今仍未解开，但是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已经有相当多的线索供我们了解她的背景。

基蒂·哈里斯于二十世纪初出生于伦敦，她的父母是俄国人。后来，她随家人经加拿大到达美国。二十年代，基蒂和她的哥哥姐姐们同成为共产党积极分子。她的一位兄弟、两位姐夫曾参加过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另外一位哥哥和姐姐为前苏联贸易部工作，还有一个姐姐在前苏联新闻社塔斯社工作。

基蒂·哈里斯于一九二三年加入美共。很快，她便成为厄尔·布劳德的情人，并于一九二八年陪同布劳德前往中国。他们共同生活在上海，基蒂协助布劳德为共产国际的秘密工人组织“泛太平洋工会秘书处”开展工作。上海警方收到风声，开始追捕布劳德。共产国际的特工要求基蒂立即搬离原住所，但是基蒂没有立刻行动，因此引起共产国际特工的不满。一九二九年，布劳德和哈里斯分头回到美国，从此开始担当起完全不同的角色，布劳德成为美共的公开领袖，哈里斯则更多地参与地下工作。一九三二年，哈里斯办理护照续期手续时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她被驱逐回加拿大（哈里斯从未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从此销声匿迹。一九九七年，哈里斯的一个侄子称，根

据家族里的说法，哈里斯在三十年代为前苏联在海外执行任务时去世。

虽然哈里斯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期间的行踪并不明确，但一九四三年，基蒂·哈里斯持假身份出现在墨西哥，成为克格勃与托雷达诺的联络人。至于她在墨西哥期间使用的姓名及对外职业不得而知。

和她在中国时的做法一样，哈里斯过分独立，不肯听从命令的性格令她的上级恼羞成怒。哈里斯负责的任务之一是协助克格勃为一对化名“巴黎”和“暗礁”的夫妇尼古拉斯·菲施和玛丽亚·菲施取得合法的美国过境文件。这对神秘夫妇显然是克格勃的一对十分重要的非法官员，克格勃方面投入大量的金钱和精力，试图为他们弄到合法的过境文件，经美国前往墨西哥。在墨西哥，克格勃动用了墨西哥政治家阿道夫·奥莱夫德·阿尔巴的关系。阿尔巴是墨西哥“国家灌溉委员会”成员，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被任命为灌溉部长。在一份密电中，莫斯科方面命令塔拉索夫“安排‘施××’（即托雷达诺），通过阿达（即哈里斯）寻求阿尔巴的帮助”，为菲施夫妇获得入境及过境签证。塔拉索夫向阿尔巴支付酬劳，但“托雷达诺不允许他接受酬劳”，理由是众所周知，阿尔巴靠薪水生活，他没办法向外界解释这笔突如其来的巨额财产。罗伯特·美纳克的生意伙伴迈克尔·伯德动用他在华盛顿的关系，请求总统助理戴维·奈尔斯协助为菲施夫妇申请过境签证。起初，奈尔斯一口回绝，但最终表示首肯。（伯德称，他向奈尔斯的政治同僚们行贿后才说服奈尔斯答应帮忙。）然而，即便是有了奈尔斯的协助，并不代表这项任务已经有了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由于联邦调查局方面对菲施夫妇何以在一九四二年获得瑞士公民身份持有怀疑态度，菲施夫妇的过境签证一直没

有获得颁发。克格勃的一份密电中解释道，联邦调查局对于所有涉及墨西哥的问题均十分谨慎，因为他们认为，墨西哥“是（克格勃）情报部门的活动重点之一”。

托雷达诺不希望他的同僚阿尔巴接受前苏联的酬劳足以证明，他在与前苏联情报部门合作时非常小心。基蒂·哈里斯显然是托雷达诺与克格勃之间的惟一联络人。一九四四年四月，托雷达诺前往美国访问，塔拉索夫向莫斯科方面指出，哈里斯认为，让托雷达诺与另外一位特工接触是不明智的做法。还有一次，费庭将军提醒塔拉索夫，不要冒风险直接与托雷达诺会面。由于前苏联驻墨西哥大使康斯坦丁·乌曼斯基的外交职责之一便是定期与托雷达诺会面，托雷达诺可以将情报通过乌曼斯基转交克格勃。

从另外几份密电中可以看出，托雷达诺对于自己可以为克格勃做哪些工作有着严格的限定，也因此屡屡激怒莫斯科。克格勃驻墨西哥城情报站的一项任务是要帮助数名特工“获得合法身份”。这些特工中的大部分人是西班牙难民，正准备前往其他国家执行情报任务。在一份密电中，莫斯科方面表示，急于为一名化名“鸚鵡”的特工活动合法身份，命令驻墨西哥城特工“通过阿达（即哈里斯）联络‘施××’（即托雷达诺），”以获得阿尔巴的协助。然而，哈里斯拒绝直接联络阿尔巴，理由是“施××（即托雷达诺）不允许她在没有知会他的情况下联络任何人”。（托雷达诺当时正在美国访问。）莫斯科方面在得知自己的特工对于托雷达诺俯首帖耳后勃然大怒。莫斯科方面很快回电，语气强硬地要求塔拉索夫转告哈里斯，“我们要求所下达的命令立即执行，不容任何争辩。告诉她，她只接受并执行你的命令。”于是哈里斯被再次命令去获得所需文件。

哈里斯的一些不谨慎行为亦曾激怒莫斯科。她秘密地与在

美国的家人保持联络。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哈里斯入院接受阑尾切除及肿瘤切除手术。一九四四年初，莫斯科方面得知，由于病情原因，哈里斯与她的一个姐姐联络。莫斯科方面十分担心安全问题，下令宣布，“我们严禁阿达（即哈里斯）与她的家人联络。”不过，莫斯科方面最终还是同意哈里斯通过安全的克格勃渠道与她的姐姐通信，不知道这一决定是出于人道原因，亦或是考虑到哈里斯一直以来的忠心耿耿而给予的奖励。

然而，哈里斯在克格勃驻墨西哥的谍报工作最终还是遭到灭顶之灾，其原因并非因为她与家人的沟通。一九四四年六月，塔拉索夫向莫斯科发出预警，由于托雷达诺、瓦西里·朱比林以及墨西哥国会成员卡里罗的失误，“我们的非法人员阿达的活动被曝光。”莫斯科方面的回答是，“为她安排一个新的掩护身份。”

后来，克格勃决定中断哈里斯与托雷达诺的联络。一九四五年五月从莫斯科发出的一份密电中有部分内容得以破译，“不要让施××感觉失去联络。”从这句话可以推断，哈里斯已经不再是托雷达诺的联络人。莫斯科方面后来又发出密电，要求提出“将来如何安排她的方案，以及如何帮助她获得合法身份”。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涉及基蒂·哈里斯的最后一份密电发自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莫斯科方面询问，安排哈里斯离开墨西哥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至于哈里斯的去向及后来的命运没有人知道。

工业间谍和原子间谍

前苏联在美国展开情报活动之初的主要任务是窃取科学和技术情报，即便是后来谍报活动范围扩大，刺探科技情报依然在前苏联的谍报活动中占据很大比重。从窃取具有商业价值的工业机密到渗透到把守严密的军事科学重地——原子弹基地，所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

正如在其他领域从事谍报活动一样，在工业谍报领域，前苏联同样利用意识形态观念作为激励谍报活动的借口。随着美国共产党人的人员素质不断提高，为前苏联提供了更多的可招募人选。在二十年代，美共成员主要由第一代移民组成，他们大多教育水平有限，绝少有机会晋身科技领导领域。然而，到了三十年代，美共成员大多在本土出生，教育背景大幅提高，而且美共吸引了大批科技方面的专业人士。美国共产党人认为，他们所供职的资本主义公司从道德观角度来看属非法机构。所以，当前苏联情报官员要求他们将各自公司的科学秘密提供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前苏联分享时，他们基本上不存有道义上的障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面临着被纳粹德国击溃的困境，美国共产党人将所在公司或政府部门的科技秘密提供给前苏联的热情有增

无减。当共产主义的发源地面临困境时，“同胞”们（克格勃对美国共产党人的称谓）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进行援助。

主要致力于工业谍报活动的前苏联特工哈里·戈尔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里·戈尔德在因间谍罪被捕之后，全盘交代了他的谍报活动。戈尔德的父母是俄国犹太人。他本人于一九一二年出生于瑞士，两岁前随家人到达美国。中学毕业后，戈尔德在宾夕法尼亚糖业公司担任实验室助理，并于一九三〇年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然而，由于经济原因，他被迫于一九三二年辍学。同年末，他被糖业公司解聘。怀着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没有失业、没有反犹太运动的憧憬，戈尔德本想移民苏维埃的犹太人自治区，但是他的朋友兼药剂师托马斯·布莱克帮他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令他渡过难关，直到重新被宾夕法尼亚糖业公司录用。

布莱克将戈尔德介绍进美共，但是戈尔德觉得，党组织的活动太过沉闷，拒绝成为正式党员。布莱克本人于一九三四年退党，也就没再敦促戈尔德加入党组织。然而，一九三五年，布莱克再次接触戈尔德，并解释说，他退出党组织的公开活动是为了替前苏联贸易部开展秘密工作。布莱克说服戈尔德，虽然戈尔德觉得共产党组织比较沉闷，但是作为一名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他理应为苏维埃这个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尽一份力，而他所能做到的便是将资本家的科学秘密提供给苏维埃。戈尔德后来讲道：“能够帮助苏维埃联盟强大起来，这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

最初，戈尔德的间谍活动局限于窃取宾夕法尼亚糖业公司实验室中的化学配方，但是很快他便成为前苏联与一个阵容庞大的工业谍报网之间的联络人。戈尔德在他的供词中指出，他的间谍工作繁多且艰苦：

安排与苏维埃的一名特工见面；审慎地计划如何从宾夕法尼亚糖业公司得到数据，如何将技术报告以及图纸偷偷地抄录下来（然后再归还原处）；前往纽约或辛辛那提与保罗·史密斯、鲁卡、弗雷德或是塞米诺夫见面……千方百计地哄劝布拉泽曼工作，采用恐吓手段强迫本·斯米尔格听命；还有不停向家人、朋友编造谎言，为我不在家时的去向编造一个理由（莫姆认定我在外面有风流韵事，事实居然可以和想象有如此大的差异）；还有那些疑惑且恐惧地在陌生的城镇街角漫长的等待，以及在电影院里打发时间。

尽管如此，戈尔德还是坚守着他的职责，并且与他的克格勃上级成为朋友和知己。每逢遇到令他难解的问题时，例如他对于纳粹—苏维埃协定的费解，他的上级便会鼓励他，安慰他，向他保证，苏维埃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一九四二年之前，戈尔德一直处于克格勃技术及工业情报专家塞姆扬·塞米诺夫的领导之下。一九四三年，塞米诺夫通知戈尔德，他，即戈尔德，将被调往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他目前的工作将由其他人代替。这一次，戈尔德仍然扮演联络人的角色，但是所联络的对象将是职位更加高级的科学家，其中最主要的联络对象就是克劳斯·富克斯，前苏联渗透在美国原子弹项目中的内线。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证实了戈尔德参与原子间谍活动，其内容将在本章的后一部分讨论。维诺那计划的密电中同样涉及戈尔德的工业间谍活动。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致电莫斯科，要求允许其工业间谍成员全部向戈尔德（戈尔德的化名为“鹅”，后来为“阿诺德”）以及一个化名“聪明”的特

工汇报。至于“聪明”的真实身份未能被落实。电文中同时提出，戈尔德每个月一百美金的酬劳没有及时支付，戈尔德要求解释原委。同年十二月的电报中指出，戈尔德希望成立自己的实验室，研究气体的热量传播课题，要求克格勃提供两千美元的资助。不过，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认为，戈尔德低估了建立实验室所需的资金。戈尔德的要求遭到克格勃拒绝之后，他在亚布拉罕·布拉泽曼（Abraham Brothman）领导的公司里任职。

戈尔德供认，布拉泽曼是他在工业间谍网络中最主要的同僚。布拉泽曼在“共和钢铁”公司任职化学家时，就开始为前苏联刺探情报，将工业生产的图纸及文件提供给前苏联。戈尔德指出，布拉泽曼曾经将制造合成橡胶及开发工业喷雾气的工业流程提供给前苏联。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四年的两份克格勃密电中提到布拉泽曼，他的化名是“专家”和“建筑家”。电文中称，布拉泽曼在离开合成橡胶及工业喷雾气厂之后，成立了一家新的从事机械行业的公司。一九五〇年，戈尔德招供之后，布拉泽曼和另外一名同事米里亚姆·莫斯科维奇（Miriam Moskowitz）因向大陪审团否认从事过间谍活动而以妨碍司法公正罪被判入狱。

戈尔德的供词中还提到阿尔弗雷德·斯莱克，此人是一名化学家，亦是戈尔德技术谍报网成员。斯莱克将位于纽约罗切斯特的伊斯曼柯达公司的情报提供给戈尔德，其中包括如何从废弃的胶片中提炼银及彩色摄影技术，此外还将位于田纳西州军工厂正在开发的炸药技术情报提供给戈尔德。被戈尔德供认之后，斯莱克认罪，被判十五年徒刑。

戈尔德提到的另外一位前苏联特工便是将戈尔德招募为间谍的托马斯·列西·布莱克。一九五〇年，联邦调查局传讯布莱克。布莱克承认戈尔德的证词，声称确实是他将戈尔德招募为

间谍，并承认参与工业间谍活动。在当时，对于工业间谍活动是否触犯法律的定义并不明确，而且没有因从事工业间谍活动而被起诉的先例。有鉴于布莱克的合作态度以及难以对工业间谍活动定性，布莱克没有遭到起诉。

事实上，布莱克于一九三一年加入美共，一九三三年底或一九三四年初的时候，他主动向前苏联贸易部咨询，如何可以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工作。当时接待布莱克的是前苏联贸易部官员盖卡·奥瓦金米安，此人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官员。奥瓦金米安告诉布莱克，在获得前往苏维埃联盟工作的机会之前，他需要向前苏联提供一批技术情报，以证明他的价值。布莱克遵照奥瓦金米安的指示去做了，然而，有关布莱克前往前苏联工作的安排，克格勃方面却一拖再拖，布莱克最终成为一名全职的前苏联特工。根据克格勃的指示，布莱克退出美共，专心致力于工业间谍活动。

布莱克的职责并不仅局限于工业间谍活动。一九三七年，前苏联委派布莱克加入美国的托洛茨基运动，并一度有意让他前往墨西哥，渗透到托洛茨基的宅邸，但这一决定后来不了了之。（克格勃还曾委派哈里·戈尔德参与反托洛茨基的工作。）一九四〇年，约瑟夫·卡茨成为布莱克在克格勃的主要联络人。布莱克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与卡茨见过几面，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四六年。

被破译的克格勃密电中，有七份密电涉及布莱克。电文证实，布莱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大量间谍活动，但是为了免于因间谍罪被起诉，他故意隐瞒了二战时的行径。从电文中可知，布莱克在二战期间的主要职责是作为一批前苏联内线的联络人。从被破译的电文内容推测（在被破译的七份密电中，有几份电文未能被完全破译），布莱克负责联络的情报内

线专门窃取工业秘密。但是，有一份密电提到，布莱克的一条内线潜伏在美国标准局，该部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负责高科技军事项目。

在克格勃的特工中，并非只有哈里·戈尔德曾经向克格勃申请资金创办自己的公司。前苏联的另外一名工业情报内线也曾向前苏联申请秘密资助，此人就是威廉·马里索夫（William Malisoff）。威廉·马里索夫出生于俄国，幼年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并随父亲加入美国籍。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马里索夫在纽约开办了自己的公司“联合实验室”。马里索夫是一名十分活跃的前苏联情报内线，他的名字在九份被破译的维诺那密电中出现。一九四四年，克格勃专门负责科技谍报活动的官员利奥尼德·克瓦斯尼科夫（Leonid Kvasnikov）向莫斯科汇报，他在一九四三年与马里索夫会面达二十次之多。

一九四四年中，马里索夫要求克格勃向他的公司注入大笔资金购置生产设备。不过，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致电莫斯科，“安冬（即克瓦斯尼科夫）告知‘天才’（即马里索夫），我们没有可能一次注入这样大的一笔资金。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对此表示极为不满。”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指出，马里索夫不仅向克瓦斯尼科夫提出注资的要求，而且向克瓦斯尼科夫的两位前任麦卡·夏里亚宾（Mikhail Shalyapin）和奥瓦金米安提出同样要求。纽约情报站称，马里索夫抱怨道，“由他提供的情报，单单在石油产品方面，他认为，已经在过去几年为苏维埃带来上亿美元的收益。他所要求的资助只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马里索夫的要求再次被拒绝。马里索夫威胁说，苏维埃方面“将再得不到他的帮助”。克瓦斯尼科夫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适宜将他冷藏起来，否则会让他感觉我们在抛弃他。”克瓦斯尼科夫建议，待马里索夫的情

绪稳定下来之后继续与他保持联络。

并非所有向前苏联提出资助要求的特工都向戈尔德和马里索夫那样遭到拒绝。利用前苏联方面提供的原始资金，克格勃在纽约至少成立了两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由化名“奥德森”的特工负责，克格勃提供了两千美元的资助，用于购置相机、风扇、冲印设备、收银机、办公家具、橱窗用品以及货品。另外一家公司则由化名“二手书店”的特工负责。从数份密电中可以看出，这两家公司的相似之处在于均可提供伪造证件及翻拍情报材料。

除了戈尔德、布拉泽曼和布莱克以外，被破译的密电中还提到其他数名工业及科学情报间谍。其中包括亚历山大·贝伦基 (Aleksandr Belenky) (俄国移民，在通用电器工作，通过另外一名移民向克格勃提供情报)，迈克尔·莱星 (Michael Leshing) (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实验室总监，于一九四三年向前苏联提供彩色影片技术及其他胶片制造技术情报)，弗兰克·第兹克 (Frank Dziedzic) (国家石油产品公司雇员，曾提供医疗化合物方面的情报)，赫尔曼·雅各布森 (Herman Jacobson) (艾维利生产公司雇员)，布尔顿·佩里 (Burton Perry) (向克格勃提供雷达导航导弹的技术资料)，肯尼思·理查森 (Kenneth Richardson) (世界电子公司雇员)，尤金·富兰克林·科尔曼 (贝尔电话公司电子工程师)，琼斯·奥林约科 (飞机工程师，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四年间提供民用及军用航空设计情报) 以及丹尼尔·亚布拉罕·扎拉特 (美国陆军火药部安全总监)。除了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提到的工业间谍之外，前苏联还有两名技术间谍，奥托·阿里曼 (Otto Alleman) (杜邦公司化学家) 及阿瑟·杰拉尔德·斯坦伯格 (Arthur Gerald Steinberg) (动物学家，任职美国科学研究及发展办公室)。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还有一批前苏联技术情报内线的化名，其真实身份至今未能被落实。其中包括“螺栓”（一九四四年曾提供无线电控制技术情报），“兄弟”（从事与航空有关的技术谍报活动），“奥本”（一九四三年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提供军事工业情报），“乳剂”（一九四四年提供军用飞机工业情报），“渔民”（负责与工业间谍联络），“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下属间谍，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很可能专注于石油工业），“瑟伯”（与利奥尼德·克瓦斯尼科夫联络），“杰克”（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情报内线，负责提供导弹试验情报，并且是美共的联络人），“约翰”（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情报内线，提供过长达一百五十页的技术报告），“辛烷值”（活跃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很有可能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开始谍报活动）以及“卡尔”（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从事技术间谍活动，有可能是美共秘密武装成员，因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曾经征求莫斯科方面的意见，是否可以接受卡尔提供给厄尔·布劳德的材料）。

联邦调查局曾经部分地粉碎了克格勃工业间谍刺探纽约军事航空工业情报的企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租借援助计划，美国向前苏联提供了上万架飞机。贝尔飞机公司是飞机供应商之一，由该公司生产的贝尔 P-39 型战斗机在东部战场上被广泛使用。前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作为美国租赁计划的助理机构，委派航空检察员安德鲁·史夫切科前往位于布法罗的贝尔飞机工厂，对每一架运往前苏联的飞机进行检验。史夫切科于一九四二年中到达美国，一直在美国呆到一九四六年初。

虽然史夫切科的本行是一名航空工程师，但他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职业官员，因窃取美国航空工业机密而遭到起诉。他

在贝尔飞机公司及纽约飞机工厂中招募了多条内线。（与前苏联的绝大部分情报内线不同，由史夫切科招募的内线基本上与美共没有任何联系。）联邦调查局究竟在何时及通过何种渠道确认史夫切科的间谍身份一直是个谜。有可能是基于一九四三年八月收到的俄文匿名信（详情见第二章），联邦调查局开始跟踪监视史夫切科。匿名信中指出，史夫切科是克格勃官员，并指明史夫切科的工作地点（布法罗）及对外身份（前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官员）。联邦调查局发现，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史夫切科与列奥娜·法兰尼（Leona Franey）和约瑟夫·法兰尼（Joseph Franey）会面。列奥娜是贝尔飞机公司图书馆负责人，约瑟夫在靠近贝尔飞机公司的霍克电子化学公司的橡胶部门工作。七月三十日，联邦调查局发现，史夫切科再次与法兰尼夫妇在尼亚加拉瀑布附近会面，并邀请他们一同进餐。

联邦调查局怀疑，史夫切科正在试图将法兰尼夫妇招募为内线。一九四四年八月，联邦调查局接触法兰尼夫妇，夫妇二人同意协助美国政府。他们称，列奥娜最初认识史夫切科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当时，史夫切科第一次使用贝尔飞机公司的图书馆。他向法兰尼夫妇赠送戏票和小礼物，邀请他们吃晚餐，向他们宣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比美国优越。在联邦调查局的要求下，法兰尼夫妇同意将计就计地接受史夫切科将他们招募为间谍。一九四九年，法兰尼夫妇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陈述他们充当双料间谍的经历。他们指出，克格勃方面向他们支付现金奖励，并提供一架照相机，便于列奥娜拍摄贝尔飞机公司图书馆中的秘密资料。史夫切科特别关注的领域在于贝尔公司开发的美国第一代喷气式飞机的雏形 P-59 型飞机，要求法兰尼夫妇提供有关喷气式飞机引擎设计中的技术问题资料。当然，法兰尼夫妇提供的所有资

料都经联邦调查局审阅之后才交给史夫切科。

维诺那计划破译了五份涉及史夫切科和法兰尼夫妇的克格勃密电。最早的一份密电发自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电文称，史夫切科正在试图用小礼物与列奥娜建立关系，并向莫斯科方面申请批准招募法兰尼夫妇。七月四日和七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密电均提到，在列奥娜被正式招募为前苏联间谍之前她就已经向前苏联方面提供了有关喷气式飞机开发情况的秘密资料。这一行为发生在八月，即联邦调查局与法兰尼夫妇接触之前，从而令法兰尼夫妇同意充当双料间谍的动机受到质疑。法兰尼夫妇的初衷有可能出于爱国主义热情，但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他们发现与史夫切科的接触已经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为了避免背上间谍罪名，他们才下定决心与联邦调查局合作。

史夫切科有意招募为间谍的人选还包括贝尔飞机公司工程师，负责培训前苏联工程人员的洛伦·哈斯（Loren Haas）。联邦调查局同样约见了哈斯。哈斯同意协助联邦调查局，他接受了史夫切科的录用。与法兰尼夫妇一样，史夫切科同样提供给哈斯一架照相机，方便他的谍报活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四年末的一份密电中提到，哈斯将正在研制中的喷气引擎的详细图纸提供给史夫切科。一九四五年，哈斯离开贝尔飞机公司，在威斯丁飞机公司任职，很快成为该公司喷气式飞机引擎的主要设计师。史夫切科再次与哈斯接上关系，哈斯则继续充当联邦调查局的双料间谍。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共有二十九份密电涉及史夫切科，从电文内容来看，没有迹象显示，克格勃方面已经怀疑到史夫切科受到监视，又或是史夫切科的三条情报线索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线索。联邦调查局本想逮捕史夫切科，或是将他驱逐出境，但是遭到美国国务院的反对，理由是不想因

此影响前苏联与美国的关系。于是，史夫切科继续从事他的谍报活动，联邦调查局只好尽最大可能地在暗中粉碎史夫切科的计划。

除法兰尼夫妇和哈斯之外（这三个人均作为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人员），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显示，史夫切科还同时掌握着其他情报线索，包括亚历山大·佩特罗夫（Aleksandr Petroff）（克提斯莱特飞机公司雇员，曾提供飞机生产方式方面的情报），威廉·品斯利（William Pinsly）（克提斯莱特飞机公司雇员）以及威廉·普鲁德（William Plourde）（贝尔飞机公司工程师）。此外，维诺那计划的密电中还有五个化名，亦为史夫切科的情报内线，其真实身份未知。他们是“斯普兰”、“夹板”、“号角”、“盔甲”，还有姓名缩写“B”。“盔甲”显然在贝尔飞机公司工作。“B”在共和航空公司工作，将美国方面研制的与德国 V-1 型巡航导弹媲美的导弹资料提供给前苏联。其他三名情报内线的任职公司未知。

朱利叶斯·罗森堡的共产党人工程师谍报网

许多人一提到朱利叶斯·罗森堡，便将他和原子间谍活动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罗森堡向前苏联提供的非原子领域的情报远远多于他所窃取的原子弹秘密。三十年代末，罗森堡在纽约城市学院机械系就读，是该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心人物之一，共青团组织中的大部分人后来被罗森堡纳入前苏联谍报网。

伊丽莎白·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供认，一九四二年，有一个名叫朱利叶斯的人与约各布·格罗接触，表示可以将一批由工程师组成的情报内线提供给前苏联。该谍报网最初由格罗负

责，一九四三年转交给克格勃。本特利并不知道朱利叶斯的姓氏，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任职。如果仅凭本特利提供的线索，联邦调查局至少要花费五年时间才能找出这个人。不过，本特利对此人外形的描述与朱利叶斯·罗森堡十分吻合。罗森堡究竟如何知道可以联络格罗？一位共产党人工程师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罗森堡一直与美共官员保持接触，直到有人指点他应该与哪一个人接触。

克格勃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发出的被破译的密电中有二十一份电文涉及朱利叶斯·罗森堡。其中的第一份密电发自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第二份发自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电文指出，罗森堡的谍报网已经准备就绪。在第一份密电中，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要求莫斯科“对阿尔弗雷德·萨兰特进行调查后批准将其录用”。电文中简单介绍了萨兰特的背景，称萨兰特“是由‘触角’领导”——“触角”是罗森堡的化名。在第二份密电中，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提出，鉴于所窃取的情报量之大以及联邦调查局定期对前苏联官方人员进行跟踪监视，克格勃官员一贯将窃取的情报交给前苏联领事馆进行拍照的做法应该有所改变。纽约情报站称，他们正在向克格勃官员提供照相机，由他们在各自的住处翻拍由下属情报内线窃取的资料。在要求将翻拍职责下放的同时，纽约情报站还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由‘触角’本人安排翻拍他的见习人员（即特工）提供的资料。”这两份电文显示，朱利叶斯·罗森堡的谍报网已经建立得相当完善，且情报量之大，有必要拥有独立的翻拍设备。而且，克格勃方面对罗森堡十分信任，允许他担负起翻拍的职责，并且将他推荐的一名新的特工人选提供给莫斯科。

一九五〇年，维诺那计划破译了一份发自一九四四年七月

二十六日的克格勃密电，从而澄清了“触角”的真实身份正是朱利叶斯·罗森堡。在这份密电中，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汇报，“触角”动身前往华盛顿，招募一名新的情报内线。电文中提供了内线人选的真实姓名马克斯·伊莱特（Max Elitcher），指出此人是罗森堡的老朋友，纽约城市学院机械系毕业，且他和他的妻子均为共产党人。电文中指出，伊莱特夫人在战争部工作，伊莱特则在美国标准局担任部门负责人，负责研究海上重型武器的火力控制系统。“触角”称，伊莱特“可以接触到相当有价值的情报。”

国家安全部的密码分析员成功地破译这份密电时，国家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均不了解“触角”的真实身份，然而，伊莱特的情况却不同。密电中使用了伊莱特的真实姓名，而且美国政府早已对伊莱特产生怀疑。早在一九四〇年，海军情报办公室就注意到，伊莱特和他的朋友莫顿·索贝尔参加美共前线组织“美国和平动员”组织。海军情报办公室曾对此事加以调查，但伊莱特否认与共产党组织有联系，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事实上，伊莱特不仅是一名共产党人，而且加入了由任职于国家标准局海军部门的共产党人组成的秘密小组。联邦调查局在掌握了维诺那计划提供的证据之后于一九五〇年传讯伊莱特。伊莱特承认他是一名共产党人，并且供认，一九四〇年，他的老友朱利叶斯·罗森堡前往华盛顿探望他，要求他充当前苏联间谍，伊莱特当时拒绝表态。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期间，罗森堡反复向伊莱特提出同样的要求达六次至八次之多。伊莱特同时供认，他的工程师同事莫顿·索贝尔当时已经成为罗森堡谍报网成员。伊莱特曾经陪同朱利叶斯·罗森堡前往纽约与索贝尔秘密会面，索贝尔偷偷将拍摄的胶卷交给罗森堡。索贝尔当时在“里夫电子公司”工作，该公司签约美国政府，

负责秘密军事研究项目。海军情报办公室明明知道，索贝尔积极参与“美国和平动员”组织，并且在共产党青年营担任教导员，索贝尔也从不隐瞒自己对斯大林的崇拜，然而他却依然为美国国防项目工作直到一九四九年，可见美国政府的内部安全制度是多么的松散。

一九九七年，曾经负责罗森堡谍报网的克格勃官员之一亚历山大·费利索夫（Aleksandr Feklisov）指出，阿尔弗雷德·萨兰特和乔尔·巴尔是该谍报网情报产量最高的两名间谍。他们都是罗森堡当年在大学读书时结交的工程师共产党人圈子中的成员。其中，巴尔与罗森堡同在纽约城市学院读书，萨兰特则在库伯联合会接受培训。巴尔和萨兰特这两位电子工程师是好朋友，在从事谍报活动期间，两人居住在同一所公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同时在美国陆军信号特种部队在蒙默思堡的实验室从事军事雷达方面的工作。一九四二年，陆军方间谍部门掌握了巴尔信奉共产主义的证据，巴尔因此失去在蒙默思堡实验室的工作。不过，当时在美国并非人人笃信共产党人从事谍报活动，因此，巴尔没费吹灰之力便在“西方电子”公司找到工作，负责开发一项绝密的雷达投弹瞄准器。萨兰特最终也丢掉在信号特种部队的工作，理由并非因为他的共产主义倾向，而是因为参与工会活动。和巴尔一样，萨兰特随后也就职于“西方电子”，从事雷达工作。

有七份被破译的克格勃密电中提到巴尔，四份被破译的密电提到萨兰特。克格勃方面将他们二人看做是一个小组，一份密电中经常同时涉及两个人。最早一份涉及巴尔或是萨兰特的密电发自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电文中提到招募萨兰特的事宜，当时，萨兰特尚没有化名。不过，在后来的密电中，巴尔和萨兰特便有了化名，萨兰特化名“修斯”，巴尔的化名最初

是“侦察员”，后来改为“公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汇报，朱利叶斯·罗森堡“已经安全同‘修斯’（即萨兰特）签约”，并指出，“修斯”是“公尺”（即巴尔）的好朋友。“签约”即意味着将萨兰特正式招募为间谍。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建议“将他们两人组成一个小组，由他们自己将各自的材料拍摄下来，并向他们提供照相机。‘修斯’是一名出色的摄影师，有一间很大的暗室以及冲洗设备，但是没有自己的莱卡照相机”。萨兰特后来向联邦调查局供认，他是一位业余摄影师，并将公寓的一个房间改建成暗室。他说，巴尔对摄影亦有兴趣，并且最终得到一架莱卡照相机，而他自己的照相机则没有巴尔的相机先进。

克格勃的密电中指出，罗森堡将从萨兰特和巴尔那里收集胶卷，提供给克格勃。电文中还提到，虽然罗森堡是萨兰特和巴尔的主要联络人，他们两人同时还与哈里·戈尔德会面。哈里·戈尔德也是一名活跃在克格勃与技术间谍之间的联络人。对于提交给莫斯科方面的技术资料的胶卷，克格勃纽约情报站很少在密电中加以评论。不过，在一份密电中，纽约情报站自豪地表示，“修斯”（即萨兰特）刚刚“提交了有关 APQ-7 的十七份图纸真迹”。APQ-7 是一种先进的、属高度机密的空中雷达系统，由麻省理工学院与“西方电子”联合为美国军事部门开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萨兰特和巴尔成立机械公司（萨兰特实验室），专门与美国国防部门签约，从事项目研究开发。但是，公司的生意并不景气，两个人最终分道扬镳。一九四六年，萨兰特前往纽约的伊萨卡，在康奈尔大学物理实验室工作，与菲利普·莫里森成为邻居。菲利普是康奈尔大学的物理

学家，曾经是曼哈顿项目的科学家，和萨兰特不仅是朋友，而且是政治同盟。（莫里森于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〇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院就读时加入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巴尔继续从事秘密军事雷达系统斯佩里回转仪的研究，但最终由于未能通过空军部的安全审核而失去这份工作。一九四八年，巴尔前往欧洲修读机械硕士学位。

一九五〇年五月底，联邦调查局逮捕哈里·戈尔德；六月，逮捕朱利叶斯·罗森堡的内弟戴维·格林格拉斯。当时居住在巴黎的乔尔·巴尔则悄然失踪。巴尔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潜逃计划，他没有携带任何衣物或私人物品便离弃了他的寓所。七月十七日，联邦调查局逮捕朱利叶斯·罗森堡，两天后传讯阿尔弗雷德·萨兰特。联邦调查局因为尚没有确认萨兰特是否从事间谍活动，所以没有逮捕萨兰特，但是警告他，已经开始对他进行调查，他的任何旅行计划必须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七月二十五日，萨兰特通知联邦调查局，他正准备驱车前往长岛与亲戚们度假一个星期。然而，到达长岛之后，萨兰特便与他在纽约伊萨卡的绯闻邻居卡罗琳·戴顿（Carolyn Dayton）会合。他们向亲戚们谎称准备出国度假，并且在亲戚们的掩护下，避开联邦调查局的监视，逃出国境。八月中，萨兰特和卡罗琳进入墨西哥（萨兰特在穿越国境时使用的是卡罗琳丈夫的名字），此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将各自的配偶和孩子们丢在身后。

一九八三年，俄国移民、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工作人员马克·库赫曼（Mark Kuchment）在阅读《罗森堡档案》时，其中的萨兰特和巴尔让他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前苏联两位著名的科学家。这两位科学家讲一口地道的英语，其中一个人名叫约瑟夫·勃格，自称来自南非，另外一个人名叫菲利普·乔治维奇·

萨塔罗，自称来自加拿大。后来，另外一名俄国移民科学家在见过萨兰特的照片后确认，此人正是他在苏维埃结识的萨塔罗。（萨塔罗/萨兰特于一九七九年在苏联死于心脏病。）

在前苏联化名安娜·萨塔罗的卡罗琳·戴顿于一九九一年返回美国，巴尔于一九九二年回到美国。直到此时，有关萨兰特和巴尔失踪后的情况才被公开。一九五〇年，萨兰特和戴顿到达墨西哥后，由于害怕联邦调查局监视，他们没有前往苏联大使馆寻求帮助，而是在波兰大使馆的协助下经危地马拉抵达共产主义波兰。他们在华沙停留六个月后前往莫斯科，并且联络到经捷克斯洛伐克到达苏维埃的巴尔。前苏联情报部为他们准备了新身份，即约瑟夫·勃格和菲利普·萨塔罗，并把他们派往共产主义捷克担任电子工程师。萨兰特和戴顿虽然没有正式注册为夫妻，但一直以萨塔罗夫妇的名义生活在一起。巴尔/勃格娶了一名捷克妇女为妻。

一九五六年，前苏联将萨兰特和巴尔调往列宁格勒，担任军事电子研究学院负责人，并且向他们提供前苏联上流人士所享有的待遇，包括政府汽车、宽敞的公寓以及丰厚的薪金。萨兰特和巴尔成为前苏联微电子工业的创始人。巴尔称，他们研制了前苏联第一部利用雷达测定的防空大炮以及地对空导弹。这些武器在越南战争中对美军发挥了极大威力。萨兰特被批准加入共产党，一九六九年，被授予国家奖，以表彰他在科学领域的贡献。

一九九二年，巴尔返回美国后，否认自己曾参与前苏联间谍活动。戴顿也出面替已过世的萨兰特发表声明，称萨兰特没有参与过前苏联间谍活动。他们均表示，秘密逃往苏维埃的原因是害怕在美国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牵连。然而，任凭他们为各自的行为辩护，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以及从其他渠道

收集的证据显示，巴尔和萨兰特是克格勃最具有价值的技术特工。

莫顿·索贝尔亦曾试图潜逃，但未能成功。就在巴尔在巴黎失踪的同时，任职“里夫电子公司”的索贝尔告请病假，仓促处理一下私事之后，携家人逃往墨西哥。他本想从墨西哥前往苏维埃，无奈没有随身携带护照。（从美国进入墨西哥不需要出示护照。）索贝尔尚没来得及离开墨西哥，就被墨西哥方面发现，并驱逐回美国，美国方面随即逮捕了索贝尔。他以间谍罪遭到起诉，被判刑入狱三十年。

罗森堡谍报网的另外一名成员威廉·珀尔虽然接到警报，但是没有选择逃亡，而是寄希望于能够蒙混过关，并且险些就阴谋得逞。珀尔是一位杰出且享有盛名的航空学家，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曾经参与过一系列美国绝密军事项目。由于才能突出，他很快成为“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是“国家航空航天部”前身。珀尔最初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试验场工作，后来被调往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路易斯飞行推进力实验室”工作。一九四六年，“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选派珀尔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与当时的“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西奥多·凡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一起工作。一九四八年，珀尔返回“路易斯飞行推进力实验室”，成为由十五人组成的喷气推进力及超音速飞行课题组负责人。一九五〇年，联邦调查局对罗森堡谍报网的调查刚刚有所眉目时，有关方面正在考虑将珀尔调往属于绝密部门的“原子能委员会”。

珀尔最终没能得到这项任命。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日，他被联邦调查局传讯，被问及数年前承租萨兰特在纽约的寓所一事。当时，联邦调查局只不过希望能从珀尔那里了解有关萨兰特、巴尔和罗森堡的情况，并没有怀疑到珀尔也在从事间谍活

动。然而，珀尔却误认为联邦调查局已经抓住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于是在七月二十四日主动向联邦调查局坦白了他在前一天与薇薇安·格拉斯曼（Vivian Glassman）的会面情形。珀尔显然认为，联邦调查局一定已经知道他与格拉斯曼会面，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对此事并不了解，他们也没有派人监视珀尔。珀尔解释说，格拉斯曼是乔尔·巴尔的未婚妻，这次会面，他觉得格拉斯曼的表现有些异常。他们谈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话题，还提到朱利叶斯·罗森堡。珀尔说，格拉斯曼交给他一张纸，并且让他赶快离开美国，那张纸上画有前往墨西哥的路径。格拉斯曼还应承，只要珀尔马上离开美国，她会给他两千美元。珀尔对联邦调查局称，他完全不知道格拉斯曼为什么对他讲这些，并且拒绝了格拉斯曼的建议。

联邦调查局传讯了格拉斯曼，格拉斯曼称自己只是受人之托转达口信而已。她说，有一个男人找到她，而她并不知道这个男人的身份。这个男人要她到克利夫兰向珀尔提供两千美元，劝他前往墨西哥，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格拉斯曼表示她不清楚。格拉斯曼称，她的建议遭到珀尔的拒绝后，她便回到纽约，将美元还给那个男人，也没有向那个男人要求支付此行的费用。格拉斯曼的说明并不能令人信服，但也不足以构成有力证据将她或是珀尔送进监狱。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大陪审团面前，珀尔在发誓之后表示，他从来就不认识朱利叶斯·罗森堡或是莫顿·索贝尔。他的谎言很轻易地被击破。由于美国政府不愿意在法庭上公开暴露维诺那计划中的证据，所以即便珀尔承认他认识罗森堡或是索贝尔，他也未必会背上任何罪名。而他的这句谎言却足以令他的伪证罪名成立。一九五三年，珀尔被判入狱。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克格勃密电中，有十四份密电涉及威

廉·珀尔。从电文中可以看出，珀尔是一位相当有价值的高产技术间谍。有关珀尔的第一份密电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由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珀尔提供的情报涉及瓦提飞机公司正在研制的远程战斗机以及美国喷气式飞机雏形。十天后，珀尔提供了威斯丁飞机公司正在开发的喷气引擎的情报。一九四四年七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汇报，由珀尔提供的“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的报告已经外交邮袋寄往莫斯科。同年九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方面提出，珀尔收到的酬劳只能应付他从事间谍活动所需要的额外开支，鉴于珀尔提供了众多情报，他应该和罗森堡谍报网的其他成员享有同样待遇，应考虑给予他五百美元的奖励。

莫斯科方面同意向珀尔发放奖金，而且这笔奖金的确物有所值。二月份，克格勃莫斯科总部通知纽约情报站，经评定，珀尔提供的情报“极具价值”。四月，珀尔提供的情报中，除部分资料被评为“有价值”之外，其余资料均被评为“极具价值”。联邦调查局经调查发现，珀尔有机会接触到有关高级军用飞机研究项目的众多档案，而这些项目与他所负责的研究项目并没有任何联系。一九四八年，珀尔从克利夫兰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时，窃取了正在研制中的喷气涡轮直升飞机以及对喷气式飞机雏形风力试验结果的绝密文件。珀尔的职业令他得以向前苏联提供美国进行的航空研究方面，特别是军用喷气式飞机方面最高级最先进的成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方面指出，珀尔提供的情报不仅有价值，而且数量之大，需要专门派人前往克利夫兰加以处理。朱利叶斯·罗森堡推荐迈克尔·西多洛维奇和安·西多洛维奇承担这项任务。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同意罗森堡的建议，并向莫斯科方面汇报，罗森堡对迈克尔·

西多洛维奇的评价是：“他是同胞（即美共成员），自愿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现居纽约西部，以往三年未从事政治活动。‘自由’（即罗森堡）自幼与他相识，对他的政治活动了解，并且说，他和他的妻子都很忠诚。他的妻子是位裁缝，在城里开了一间店铺做掩护……‘自由’称，‘林兹’（即迈克尔·西多洛维奇）已经做好准备，与我们重新建立联系。”

由于美国的摄影胶卷短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要求莫斯科方面安排克格勃驻墨西哥情报站向罗森堡在纽约的谍报网成员以及在克利夫兰的西多洛维奇提供胶卷。十二月，纽约情报站汇报，西多洛维奇夫妇卖掉纽约的寓所迁往克利夫兰，并获得五百美元的奖金。罗森堡亦前往克利夫兰，介绍珀尔与西多洛维奇相识。联邦调查局后来调查罗森堡谍报网时发现，西多洛维奇夫妇拥有一架莱卡照相机，并于一九四五年直接用现金购买了一辆汽车，而他们的银行账户却没有提取现金的记录。

一九四五年三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建议让安·西多洛维奇承担更多的任务，并每个月向她支付五十美元的报酬。这一建议得到莫斯科方面的批准。和她的丈夫一样，安·西多洛维奇也曾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安的父亲麦卡·特卡奇是美共乌克兰语报纸编辑，亦是克格勃的特工，向克格勃提供乌克兰移民的情况，并担任克格勃几条内线的联络人。

罗森堡的谍报网规模庞大，包括六条内线：巴尔，珀尔，萨兰特，索贝尔，戴维·格林格拉斯以及一个化名“奈尔”的特工，真实身份未知。此外，该谍报网还包括两名信使联络人，迈克尔·西多洛维奇和安·西多洛维奇以及三名从事支持工作的人员维维安·格林斯曼、鲁思·格林格拉斯、埃塞尔·罗森堡。

朱利叶斯·罗森堡不仅仅负责谍报网的运作，他本人也是

一名情报内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罗森堡在陆军信号特种部队担任工程监测员，负责检验电子设备以及由信号特种部队负责的项目，他因此有机会接触大批美国军事技术秘密。一九四四年，陆军反间谍部门掌握了罗森堡信仰共产主义的证据，强迫他离开陆军部队。不过，正如乔尔·巴尔一样，罗森堡凭借深谙美国安全条例的一技之长很快在爱默生无线电公司找到工作，负责绝密军事项目。他在爱默生公司最大的收获是窃取了美国在二战中最先进的备有近爆引信的炮弹资料。前苏联显然十分重视罗森堡这条线索。一九四五年三月，莫斯科方面要求纽约情报站向罗森堡支付一千美元奖金，作为对罗森堡所做贡献的奖励，并授权向罗森堡负责的情报内线提供小额奖励。

向斯大林提供原子弹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于一九九五年被公开，但是在此前，已经有几部著作推测，被破译的前苏联密电在挖掘原子间谍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事实证明，这一推测是正确的。正是依据被破译的密电，数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原子弹项目做出重大贡献的间谍被挖掘出来。

克劳斯·富克斯和哈里·艾尔德

英国早在美国之前开始原子弹计划，前苏联很快便在该项目中发展了一条重要内线。在英国原子弹项目中有一位杰出的英国籍青年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富克斯以德国难民的身份到达英国，他本人是德国共产党人。富克斯于一九四一年加

人英国的原子项目之后，与同样是难民身份的德国共产党领袖朱尔金·库辛斯基（Jurgen Kuczynski）联络，表示愿意为前苏联充当间谍。库辛斯基将富克斯介绍给前苏联大使馆，很快，富克斯便源源不断地将英国原子弹项目的秘密通过朱尔金·库辛斯基的妹妹乌尔苏拉·库辛斯基（Ursula Kuczynski）提供给前苏联。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将原子弹项目上的资源投入到美国原子弹项目中去，希望凭借美国雄厚的工业实力，尽快开发出实用原子武器。

一九四三年底，富克斯等十五名英国科学家到达美国，揭开曼哈顿项目的序幕。（此时，克格勃已经取代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负责控制富克斯。）最初，富克斯与曼哈顿项目的一个小组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试验如何利用气化方法分解铀的同位素。

自然状态下的铀有两个同位素 U-235 和 U-238。U-235 具有高放射性，更加适用于原子爆炸，但是，U-235 在自然铀中的成分比例不足百分之一。由于两个同位素的化学成分完全相同，因此难以将两种成分分离，这成为建造原子弹的一大技术障碍。曼哈顿项目研究了几套分离 U-235 的方案，方法之一便是将固态的铀转化为气态，经过滤网过滤，同位素 U-235 较 U-238 轻，更容易发散，从而可以和较重的 U-238 分离开。这一物理操作过程非常复杂，在当时被许多科学家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同位素分离的课题结束之后，富克斯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被调往洛斯阿拉莫斯美国原子弹项目的机密核心从事理论研究。富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到一九四六年中，当时，英国重新开始独立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富克斯被调回英国担任领导职位。他在英国的项目中继续为前苏联从事间谍活动。

一九四八年底，联邦调查局将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提供给英国同行，指证富克斯为前苏联间谍。十二月，英国情报机关传讯富克斯。富克斯的防线很快崩溃，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向英国情报机关彻底交代，最终被以间谍罪起诉，被判入狱十四年。一九五九年，富克斯在服刑九年后被释放。出狱后，富克斯前往共产主义东德，成为一家原子能研究院的院长。

由于富克斯主动交代，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只起到佐证的作用。作为富克斯与克格勃之间主要联络人的美国人哈里·戈尔德的证词也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得到证实。维诺那计划中最初涉及戈尔德的密电发自一九四四年，电文中提到戈尔德与富克斯的联络工作。正如之前所介绍的，戈尔德为前苏联充当技术间谍长达九年。根据富克斯的供词以及维诺那计划提供的证据，联邦调查局于一九五〇年传讯戈尔德，并从其住所发现大量证据，证明戈尔德长期以来替前苏联从事间谍活动。和富克斯一样，戈尔德也很快招供。他被判入狱三十年，在服刑十六年后，一九六六年获假释。

一九四四年二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汇报，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抵达美国的富克斯已经与戈尔德建立起稳固联系。电文中称，富克斯将美国原子项目的组织架构，他所从事的利用气态分离铀的同位素的方法以及由巴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放射实验室研究的利用电磁场分离铀的同位素的情报提供给戈尔德。此后，克格勃又陆续发出密电称，富克斯源源不断地将原子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利用气态分离铀同位素的技术细节提供给前苏联。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对于富克斯提供的情报质量非常满意，决定向他发放五百美元奖金。

然而，同年八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汇报，富克斯在几

次与戈尔德约定的会面中均没有露面。起初，克格勃方面以为富克斯可能返回了英国，于是派戈尔德与居住在波士顿附近的富克斯的妹妹联络，才发现富克斯已经被调往洛斯阿拉莫斯，由于洛斯阿拉莫斯的项目基地保安严密，富克斯无法联络克格勃。不过，在一次前往芝加哥出差的途中，富克斯设法给他的妹妹挂了电话。富克斯得知戈尔德询问过他的下落时，要求妹妹转告戈尔德，圣诞节期间他将回家度假，到时候再与戈尔德联络。富克斯的确在圣诞节期间与戈尔德恢复联络，并从此在洛斯阿拉莫斯继续开展间谍活动。

富克斯被调往洛斯阿拉莫斯之后，有机会向前苏联提供更为广泛的秘密情报。除了他长期从事的利用气态分离铀的同位素工作之外，富克斯亦参与利用钷取代 U-235 制造原子弹的工作以及利用向心聚爆方式引爆钷的研究工作。

曼哈顿计划研制了两枚不同类型的原子弹。第一枚是利用铀制造的原子弹，被投放在广岛，采用“枪管式”引爆方式。第二枚原子弹利用钷制成，被投放在长崎，利用向心聚爆原理引爆。铀弹的引爆是依靠从枪管中以惊人速度射出的微量 U-235 撞击一小片铀，由碰撞产生的原子裂变带动一系列反应，最终导致原子爆炸。困扰铀弹的最大难题在于，分离同位素 U-235 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

鉴于要获得足够的 U-235 面临着重大难关，曼哈顿项目研制出另外一种方法。一九四一年，位于伯克利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利用回旋加速器制造出自然界并不存在的钷。经研究发现，钷比 U-235 更容易裂变，而且可以大批量生产。钷的发现虽然不能完全取代铀，从而彻底取消分离同位素的复杂工作，但是大大降低了对 U-235 的需求量。

然而，钷弹的引爆方式不同于铀弹。钷的稳定性低于铀，

如果采用铀弹的枪管式引爆方法，在两片钚充分引燃之前就已经产生系列反应，从而大大降低核爆炸的威力，难以产生令城市毁灭的能量。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是采用向心聚爆，即将核心钚放置在球形爆炸区的中心位置，利用引爆装置确保球形爆炸区的各个方位同时引爆，令核心钚在同一时间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同等压力，核心钚得以充分爆破。

富克斯被安排在洛斯阿拉莫斯项目基地的理论研究部门工作，有机会接触到钚弹及向心聚爆装置等绝密，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因此对富克斯表现出浓厚兴趣。由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发往纽约情报站的密电证实，克格勃方面不仅收到富克斯提供的情报，而且迅速将情报提供给前苏联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并收集科学家们提出的问题，转交给富克斯以及其他隐藏在曼哈顿项目内部的前苏联情报内线，寻求解答。

根据富克斯在英国的供词，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哈里·戈尔德。戈尔德的供词又将其他前苏联特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有一批人拒绝相信在美国存在着猖狂的前苏联间谍活动，他们对于哈里的供词发动猛烈攻击。然而，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则从一个中立的角度证实了哈里所交代的许多事实。

格林格拉斯和罗森堡夫妇

哈里·戈尔德的供词不仅仅是证实了克劳斯·富克斯的供认。虽然戈尔德多次前往新墨西哥的主要目的是从富克斯那里获取情报，但是，有一次，他却是从潜伏在洛斯阿拉莫斯项目基地的另外一位前苏联特工那里获取情报。戈尔德在供词中对此人的描述是，“是一名士兵，没有军衔，已婚，没有子女

(姓名记不清)”。根据戈尔德的供词，联邦调查局很快将疑点集中在洛斯阿拉莫斯一个秘密实验室的机械师戴维·格林格拉斯的身上。格林格拉斯承认参与间谍活动，并交代，他的妻子鲁思以及他的姐夫朱利叶斯·罗森堡亦参与间谍活动。鲁思的供认证实了戴维的说法，戴维是被朱利叶斯·罗森堡录用为前苏联的情报内线。经过进一步审问，格林格拉斯夫妇交代，戴维的姐姐埃塞尔（朱利叶斯的妻子）也有份参与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将写有化名的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与富克斯、戈尔德的供词以及联邦调查局自己的调查结果加以对照。联邦调查局早已确认，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休息”和“查尔斯”是富克斯的化名，戈尔德的化名是“鹅”和“阿诺德”。六月底，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部确认，朱利叶斯·罗森堡的化名是“触角”和“自由”，戴维·格林格拉斯化名“内径”，鲁思·格林格拉斯则化名“奥萨”。

戴维和鲁思·格林格拉斯都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年轻时就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戴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然而，他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因为经济原因被迫辍学。一九四二年底，戴维结婚几个月后应征入伍。年轻的陆军士兵戴维在写给新婚妻子的信件中不仅仅表达爱意，而且表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另外一封信中充满对战争结束后的生活展望，“我们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起建设我们的未来。”戴维在一封信中提到，他在战友中宣扬共产主义：“亲爱的，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信仰传递给其他人，因为我们相爱，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在一九四四年六月的信中，戴维这样看待共产主义信仰与前苏联政权所表现出的强硬：“亲爱的，我读了很多有关苏维埃联盟的书籍。

亲爱的，他们的领导人真是有远见，而且非常聪明。他们都是天才，每一个人都是天才……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我相信，苏维埃政府每一次使用武力都需要克服内心的苦痛，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苏维埃联盟只有变得越发强大起来，苏维埃人民才能过上殷实的生活。”

戴维·格林格拉斯写这封信时已经是陆军的一名熟练机师，正准备被派往海外工作。不过，他最终被意外地调往一个秘密项目基地工作。八月时，格林格拉斯已经身在洛斯阿拉莫斯，他所在的部门负责为各科学家小组正在试验的导弹部件制作模型，格林格拉斯本人则专注为钚弹的向心聚爆装置制作模型。

戴维利用电话和书信将他所从事的工作告诉鲁思。鲁思则将戴维的信息提供给戴维的姐姐埃塞尔·罗森堡。虽然格林格拉斯并不了解朱利叶斯的具体工作内容，但他们知道，朱利叶斯与一批在国防工厂工作的秘密共产党人工程师有联系。朱利叶斯立刻就明白了戴维所在的项目基地的重要性，并以最快速度将信息提供给克格勃。一九四四年九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的密电中称：“‘自由’（即罗森堡）推荐了他的弟媳鲁思·格林格拉斯。此人现年二十一岁，是城里人（即美国公民），体操运动员（即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自由’和他的妻子认为此人聪明……鲁思获知，她的丈夫虽然入伍，但没有被派往前线。她的丈夫是位机械师，现在新墨西哥的巨型（即原子弹项目）工厂工作。”

罗森堡夫妇向格林格拉斯夫妇建议，戴维应该运用他所了解的情况为苏维埃服务。戴维工作的洛斯阿拉莫斯项目基地安全措施严格，因此他最初在电话和书信中都采用暗语。不过，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戴维在写给鲁思的信中毫不隐讳地表

示，他“非常愿意成为朱利叶斯和他的朋友们所从事的活动中的一分子”。

其后不久，戴维获得五天假期，鲁思决定到新墨西哥的圣菲市探望戴维，这是距离洛斯阿拉莫斯基地最近的城市。鲁思供认，在动身之前，她曾与罗森堡夫妇共进晚餐。朱利叶斯和埃塞尔一再要求鲁思设法说服戴维加入朱利叶斯的谍报组织。罗森堡谍报网被曝光之后，仍有一批人相信罗森堡夫妇是无辜的，他们认为鲁思的供词以及这次所谓的会面完全是编造的。然而，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有一份克格勃密电发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电文全部是关于朱利叶斯·罗森堡的谍报活动。其中提到，鲁思·格林格拉斯答应说服戴维“参与进来”，并且在鲁思前往新墨西哥之前，朱利叶斯还将与她面谈。

至于埃塞尔的角色，克格勃的密电中亦有记载。一九四四年九月，克格勃发出的密电中第一次提到，埃塞尔与鲁思·格林格拉斯接触后，建议将她的弟媳录用为前苏联间谍。格林格拉斯夫妇后来供认，埃塞尔对于朱利叶斯的谍报工作了如指掌，并协助朱利叶斯打印材料。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的密电中再次提到埃塞尔。电文中，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总部询问有关“‘自由’的妻子的情况。她随夫姓，名字是埃塞尔，二十九岁，结婚五年，高中毕业，一九三八年成为同胞（即美共成员），政治上十分成熟。她了解丈夫的工作以及‘公尺’（即乔尔·巴尔）和‘尼尔’（真实身份未知）的角色。健康状况欠佳，不适合工作，但思想上积极热情”。

十二月十三日，克格勃密电中指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决定启用朱利叶斯·罗森堡作为格林格拉斯夫妇的联络人。几天之后，十二月十六日，纽约情报站传来捷报称，鲁思已经从

圣菲市返回，戴维同意充当前苏联情报内线，并期待着下一个假期，希望尽早返回纽约。电文中指出，朱利叶斯·罗森堡认为，仅凭自己的专业知识无法向戴维提出专业问题，希望在戴维回纽约度假时，克格勃能委派一名助手协助他一同听取戴维的汇报。终于，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发出密电称戴维在纽约度假期间已经完成对他的录用工作，有关情报材料的递交途径亦安排妥当。戴维还递交了第一份有关向心聚爆装置的报告。所有这些信息与戴维和鲁思·格林格拉斯的交代完全吻合。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官可以依据电文中的材料判定富克斯、戈尔德、格林格拉斯以及其他特工所供证词的真实性。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为审讯官的提问以及追踪其他证人提供线索。由于有政策规定，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内容不可以作为呈堂证供，检控官在法庭上无法出示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的证据。但是，这些电文毕竟为联邦调查局及其他司法部门提供了可靠依据，用来确定哪些人应该受到起诉。

联邦调查局调查原子间谍案件的初始阶段体现了侦探过程中找准一个突破口可以挖掘一连串内幕的传统法则。先是富克斯落网，富克斯的供认令戈尔德浮出水面，戈尔德又将戴维·格林格拉斯供认出来，紧接着，格林格拉斯招供，他的妻子随后也供认不讳。然而，线索到这里便中断了。在这个谍报网中的另外一个环节就是朱利叶斯·罗森堡，但是罗森堡和妻子埃塞尔都拒不交代。

美国政府以间谍罪起诉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他们很快便被判刑，甚至无须借助维诺那计划所提供的辅助证据。戴维和鲁思·格林格拉斯以及马克斯·伊莱特作为目击证人提供

的证词，还有哈里·戈尔德提供的旁证，配以一批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令朱利叶斯·罗森堡很快被判间谍罪名成立。戴维·格林格拉斯被判处十五年徒刑。鲁思·格林格拉斯因为本人及其丈夫配合态度良好，被免于起诉。莫顿·索贝尔与罗森堡夫妇一同被审判，他同样拒绝交代。不过，有伊莱特的证词，再加上索贝尔曾经飞往墨西哥，索贝尔被判处三十年有期徒刑。

由于罗森堡夫妇及索贝尔拒绝交代，美国政府无法对罗森堡谍报网的其他成员加以起诉。威廉·珀尔虽然被判刑，但却是以伪证罪名，而并非以间谍罪名被起诉。巴尔和萨兰特秘密逃亡苏维埃，躲过牢狱之灾。其他人的下场无非是失去在政府或从事国防项目公司的任职而已。

美国政府要求判处罗森堡夫妇死刑。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罗森堡夫妇被处决。有迹象显示，美国政府的初衷只不过想利用死刑做要挟，强迫罗森堡夫妇将前苏联谍报组织的其他成员供认出来，并非真的想要处决他们。然而，罗森堡夫妇拒不合作。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克格勃密电不仅证实了富克斯、格林格拉斯及罗森堡参与前苏联原子间谍活动，同时证实，在曼哈顿项目中至少还潜伏着另外三条前苏联情报内线。

“定量”：一九四三年的一个 未知真实身份的原子间谍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密电中指出，一个化名“定量”的情报内线于一周前，即六月十四日，在华盛顿与前苏联官员会面。这份密电只部分地被破译，但有几点内容十分清晰。电文中指出，“定量”最初与前苏联

的一名高级外交官会面。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将此名外交官称为“祖父的副手”。“祖父”是克格勃对前苏联驻美大使马克西姆·里维诺夫（Maksim Litvinov）的密称。美国国家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分析人员认为，电文中所指的副手很可能就是里维诺夫的首席助理及下一任驻美大使安德雷·葛罗米柯（Andrey Gromyko）。经过简短交谈后，葛罗米柯将“定量”介绍给“伊哥”。“伊哥”的真实身份始终未能被落实。不过，在另外一份密电中显示，“伊哥”是前苏联大使馆中一位克格勃官员的化名。“伊哥”以前听说过“定量”，他立即请来又或是在后来请教克格勃负责科学情报的官员塞姆扬·塞米诺夫（由于电文未能被破译，所以无法搞清“伊哥”究竟如何联络塞米诺夫）。塞米诺夫也一直致力于在“巨型”（克格勃对美国原子弹项目的密称）内部建立内线。

克格勃密电中指出，“定量”“深谙他所提供的资料价值，希望我们对他的付出予以补偿——以经济奖励的方式予以补偿”。电文中提到“材料”一词，证明“定量”不仅口头向前苏联提供信息，而且还提供文件。不过，他要求薪酬的做法确属非同寻常。虽然从克格勃的密电中可以看出，对于那些高产情报人员，克格勃每年会提供礼物并予以现金奖励，向工作负担及开销负担沉重的谍报人员定期支付酬劳，然而，在当时，很多人背叛美国的动机并非是为了金钱。对于共产主义的认同，而并非出于对金钱的贪婪，是绝大多数谍报人员的共同动机。向提供情报的人支付费用在当时并非普遍做法。

由于尚有大批克格勃密电没有被破译，无法判定“定量”从何时开始与前苏联接触。而六月二十一日的那份克格勃密电更加令人难以推断“定量”第一次与前苏联接触的确切时间。不过，从电文内容来看，六月十四日的那次会面即便不是“定

量”与前苏联的第一次接触，他也不过是刚刚开始与前苏联的接洽。“伊哥”要求塞米诺夫对“定量”提供的情报加以评判。如果“定量”已经是名老情报内线，那么他所提供的情报无须经历这一例行手续。而且，他们接洽的方式表明，“定量”是刚刚开始接触前苏联，甚至有可能是“贸然闯入”前苏联大使馆。理由是，前苏联的外交官员虽然与克格勃合作，但是双方都在尽可能避免让外交官与间谍直接接触。外交部方面认为，直接参与谍报活动会影响外交官的主业，而克格勃方面也从不介意与不属于克格勃直接领导的谍报人员接触。而六月十四日的会面，“定量”最初会见的却是前苏联高级外交官。“定量”很有可能在此次会面之前尚没有与克格勃建立联络，而是径直与前苏联大使馆的高级官员约定会面。外交官员在了解到“定量”希望从事间谍活动的意图之后，又将他介绍给克格勃官员。

“定量”提供的情报令塞米诺夫十分满意，很快向他支付了三百美元。其后，克格勃在两天之内共发出三份甬长的密电，电文显示，塞米诺夫对所获取的情报非常满意。“定量”提交的情报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气态分离铀的同位素。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初，前苏联的科学家们也考虑过利用气态分离铀的同位素，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然而，在间谍情报的帮助下，前苏联的科学家们改变了这一看法。前苏联的情报特工们了解到，英美的科学家们已经摸索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克格勃的特工们将现成的方案结果提供给自己的科学家，“定量”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定量”的真实身份如何？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查个水落石出。此人很有可能是名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因为如果缺乏必要的科技知识，他很难意识到利用气态分离铀的同位素

的重要性。“定量”既然有能力约见前苏联高级外交官，又能说服克格勃官员，说明他的科学学术背景非同寻常。从他的化名“定量”推测，此人可能是一位物理学家。不过，所有这些都是推测，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定量”有机会接触到美国原子弹项目的绝密级科学情报，并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四日将情报交给前苏联大使馆。

“定量”后来的结局如何？一九四三年八月的一份密电中再次提到“定量”于六月中提交的报告。不过，在后来的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定量”的名字再没出现过。或许是“定量”转换了化名，又或许后来涉及到“定量”的密电没有被破译。也可能，“定量”于六月中提供情报的行为只是一次性行为，目的不过是为了换取现金。又或许，克格勃最终将“定量”正式录用为间谍。所有这些猜测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

“弗哥” / “波斯”：一九四四年的一个 未知真实身份的原子间谍

另外一位未能被落实真实身份的前苏联特工在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的密电中出现，化名“弗哥”，一九四四年九月，化名改为“波斯”。一九四四年二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发出一份长长的密电，内容涉及由“弗哥”提供的原子弹情报。遗憾的是，电文的内容只是部分地被破译。不过，从被破译的部分还是可以看出，电文的内容与科技信息有关，但更具体的细节无法辨别。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在六月份发给莫斯科的密电中，“弗哥”提供了曼哈顿项目生产车间的平面图。电文中没有注明是哪一个车间，不过根据在同一时

间提供给前苏联的情报内容分析，此车间应该是曼哈顿项目设在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工厂。同年十二月，还有一份密电与“弗哥”的谍报工作有关。电文的内容未能被完全破译，但可以推测出与“一号营”（克格勃对橡树岭的密称）有关。有关“弗哥”的情况，惟一能够肯定的是，此人有机会接触到原子弹项目的技术情报，极可能是一位工程师或科学家。但这仅是猜测而已。

“小伙子”：西奥多·霍尔的背叛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最令人感到震惊的莫过于一位早已为美国政府所知的前苏联特工，他不仅没有被曝光，亦没有被起诉，而且在英国过着舒适且受人尊敬的退休生活。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一个化名“小伙子”的前苏联特工的真实身份被美国政府落实，并且在密电的注脚上写明此人的真实姓名。然而，一九九五年，维诺那计划档案对外公开时，美国国家安全部将这一注脚涂黑。不过，众多电文内容已经提供了大量有关“小伙子”的信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迈克尔·多布斯（Michael Dobbs）最终将西奥多·霍尔的间谍故事公布于众。从维诺那计划档案中有关“小伙子”的注脚来看，国家安全部很早以前就已经了解西奥多·霍尔的间谍行径，很明显，国家安全部并不想对此事采取措施。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本名为《炮弹壳》（Bombshell）的著作面世，其内容专注于西奥多·霍尔充当前苏联间谍的事实。该书的作者约瑟夫·奥尔布莱特（Joseph Albright）和马西娅·昆斯特（Marcia Kunstel）为完成这部著作查阅了维诺那档案，对霍尔本人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采访，并收集了其他方面的证据，采访了有关证人。

克格勃的密电中，有八份密电提到西奥多·霍尔，记载着西奥多·霍尔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录用为前苏联特工直到他一九四五年七月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期间的谍报活动。霍尔的智商极高，十八岁便从哈佛大学毕业。如此骄人的成绩自然引起曼哈顿项目人材猎头的注意，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新星被曼哈顿项目录用，于一九四四年初被派往洛斯阿拉莫斯，参与钚弹最关键的爆破机制研究工作。

洛斯阿拉莫斯基地的保安措施严密，霍尔无法自如地通知其他人他所从事的工作。然而，一九四四年十月，霍尔返回纽约的家中度假，与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同屋好友萨维尔·萨克斯交流。霍尔和萨克斯有很多共通点，其中之一便是，两个人均为年轻的共产主义狂热分子。

霍尔和萨克斯都认为，霍尔应该将他所获得的秘密提供给苏维埃联盟。（和富克斯一样，霍尔也属于主动请愿，他主动与前苏联联络，而并非单纯地等待前苏联方面与他接触。）萨克斯随后拜访了美共在纽约的总部。他本想直接约见美共领袖厄尔·布劳德，然而，作为一名年轻的哈佛大学学生，即便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人，萨克斯也不可能逾越布劳德的秘书直接与布劳德会面。萨克斯最终被引见给美共的《个人日报》记者瑟奇·库纳科夫。此人负责《工人日报》的军事事务及主流事件的报道，同时亦是克格勃特工，由他负责接待萨克斯最适合不过。

库纳科夫听了萨克斯的陈述之后决定约见霍尔。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汇报，库纳科夫认为，霍尔“思想上十分积极，而且视野广阔，政治上成熟”。所谓政治上成熟，意味着霍尔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历史学家阿伦·温斯坦有机会目睹到库纳科夫通过外交邮袋寄往莫斯科的详细报告。温斯

坦援引库纳科夫一九四四年的报告内容写道：

霍尔还“建议，如果需要，可以面谈，向我们提供……的进展情况，爆破的试验情况及爆破的控制情况以及炮弹壳的构造等等……”

库纳科夫虽然欣喜若狂，但他仍保持审慎的态度，可能出于担心，害怕半路杀出来的霍尔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于是，他问霍尔：“你是否了解你的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你要将美国的秘密泄露给苏维埃？”霍尔回答：“如此可怕的事件，苏维埃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有权利了解它的存在。”

霍尔与库纳科夫初次会晤便提交了一份报告，内容涉及洛斯阿拉莫斯基地情况，研究工作的进展以及研制原子弹的几位主要科学家各自的工作。库纳科夫立即将报告提交给他的上级、克格勃专门负责科学情报的官员阿纳托利·雅兹科夫（Anatoly Yatskov）以及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负责人斯特班·阿普里希安。这两个人的对外身份都是前苏联外交官。由于霍尔很快就将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必须尽快决定如何安排霍尔。在阿普里希安的授意下，库纳科夫再次约见霍尔，对霍尔的背景进行初步了解，并为霍尔拍了照片，以便克格勃特工将来与之联络。由于录用霍尔的过程仓促，又未能进行例行的背景调查，为了降低风险，避免让自己的特工暴露在霍尔面前，克格勃决定在最初阶段由萨克斯担任霍尔的联络人，负责前往新墨西哥从霍尔那里收集情报。直到一九四五年春末，克格勃才派出职业特工、美国共产党人劳纳·科恩前往新墨西哥收取情报。

在后来的密电中，克格勃向美共的联络人伯纳德·舒斯特查询了萨克斯和霍尔的背景，并将霍尔化名为“米拉德”，俄文的意思是“小伙子”，萨克斯的化名是“星星”，后来又称作“老家伙”。霍尔提供的情报包括钚弹的向心聚爆系统以及如何利用气态分离 U-235 和 U-238。霍尔虽然不像富克斯那样是一位资深科学家，但他所从事的工作却可以广泛接触到高度机密的情报。一九四五年三月，克格勃莫斯科总部通知纽约情报站，霍尔提供的情报“非常有价值”。克格勃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前苏联原子弹项目负责人艾哥·库卡托夫（Igor Kurchatov）对霍尔的情报所做的评估。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期间，霍尔亦应征入伍。鉴于他的科技才干，霍尔随即被授予军衔，并和所有的军官一样，宣誓效忠美国。之后，霍尔重返洛斯阿拉莫斯，继续从事着违背誓言的间谍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尔离开原子弹项目。他前往芝加哥大学深造，于一九五〇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转向生物放射科学以及 X 光的医学应用方面，就职斯隆·凯特林学院的癌症中心。一九六〇年，霍尔前往英国，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做生物物理学家。虽然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没有记录，但事实上，霍尔的间谍活动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初期。他甚至在四十年代末将美国的两位原子科学家招募为间谍，为克格勃工作。

一九四九年，维诺那计划部分地破译了一份密电，电文中提到西奥多·霍尔和萨维尔·萨克斯的名字，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这份密电由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汇报了情报站第一次接触霍尔和萨克斯的情况，尚未赋予他们化名。）一九五一年，联邦调查局传讯萨克斯和霍尔，然而，他们坚持否认与前苏联情报部门有染。霍尔还反复抨击联邦调查局，谴责联

邦调查局因为他持有进步观点而对他加以迫害。由于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内容不可以在法庭上出示，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萨克斯和霍尔五年前从事的间谍活动，美国政府无法对他们起诉。而且，霍尔当时已经彻底退出军事科学工作，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萨克斯或是霍尔依然从事间谍活动。一九五二年，联邦调查局决定放弃此案。虽然，维诺那计划后来陆续破译的一批密电足以证明霍尔和萨克斯的罪行，但是再没有人旧案重提。联邦调查局将他们的背叛行为一直隐瞒下来，直到一九九五年，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原子间谍莫里斯和劳纳·科恩

前苏联解体后，克格勃外国情报部的继任组织——“俄国外国情报服务部”有选择地将一批文件向媒介公开。这些文件以及连带的由前苏联退休及现任情报官员撰写的文章着重描述了前苏联在谍报领域的辉煌成就。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前苏联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渗透到美国的原子弹项目内部。

俄国情报服务部的新闻官员弗拉迪米尔·契科夫上校于一九九一年发表过一篇有关前苏联原子间谍活动的文章。文章的篇幅很长，里面特别提到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两名美国人莫里斯·科恩和他的妻子劳纳·科恩。俄国外国情报服务部向来严格为所有特工人员，无论是在世的亦或已经去世的特工的真正身份保密。在俄国国内，有法律规定严禁泄露前苏联时代的特工资料，除非该特工自己选择暴露身份，或是政府部门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要将特工身份公开。科恩夫妇的身份之所以对外公开，正是基于这两点原因。一九五〇年，科恩夫妇秘密离开

美国前往苏维埃联盟，为执行一项新任务做准备。几年后，他们持假新西兰护照，化名彼得和海伦·科罗格，以从事古书生意的商人身份出现在伦敦。一九六一年，英国安全部门将他们逮捕，理由是参与前苏联谍报网对英国海军开展间谍活动。在科恩夫妇的住处搜出谍报网使用的电台及制作微缩胶片的设备。

科恩夫妇坚称他们的真实姓名就是科罗格。然而，英国安全部门早已从美国联邦调查局得到确认，识破了他们的假身份。早在一九五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联邦调查局从线人那里了解到，莫里斯·科恩是一名狂热的共产党人。依照惯例，联邦调查局对莫里斯进行调查，却发现科恩夫妇已于一九五〇年九月从美国消失。莫里斯是纽约市一所学校的教师，他突然向校方提出辞职，随后，夫妇二人便离开纽约，且没有携带寓所的任何家具。他们留给亲戚们的信中称将迁往西部生活，但是没有留下新地址。虽然这一系列的举动让联邦调查局感觉蹊跷，但是由于缺乏证据，联邦调查局只能将其作为平常事件处理，直到一九五七年，利用假身份证件在美国活动的克格勃上校鲁道夫·埃布尔（Rudolf Abel）落网，对科恩夫妇的调查才取得进展。联邦调查局在埃布尔的保险箱里发现了科恩夫妇的照片以及克格勃特工之间第一次接头时使用的暗语。这一次，联邦调查局自然不会放过对科恩夫妇的追查。然而，调查的结果，联邦调查局除了对他们的背景有所了解之外，对于他们在一九五〇年九月以后的行踪依然一无所知。终于，一九六一年，英国安全部门逮捕科罗格夫妇，他们的照片及指纹证实，科罗格夫妇正是失踪已久的科恩夫妇。

英国法院以间谍罪名囚禁科恩夫妇。一九六七年，前苏联政府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承认科恩夫妇是前苏联特工，并采用与

英方互换的方式令科恩夫妇重新获得自由。其后，科恩夫妇一直居住在前苏联，由克格勃提供退休金，直至去世。劳纳死于一九九二年，莫里斯于一九九五年去世。

契科夫在他的文章中并没有泄露其他特工的真实身份，而是对那些一生为苏维埃联盟鞠躬尽瘁的克格勃特工们加以赞扬。无论是克格勃，还是后来的“俄国外国情报服务部”，始终将科恩夫妇奉为英雄。在苏维埃时代，科恩夫妇双双获得红旗勋章和国家友谊勋章，即便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之后，叶利钦政府亦授予他们俄国联邦英雄的称号。

契科夫认为，科恩夫妇在前苏联渗透曼哈顿项目内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一九四二年，化名“路易斯”的莫里斯亲自将美国原子弹项目的一位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科学家招募为间谍。契科夫公开了克格勃驻美国的一名官员在一九四二年发出的信息：“物理学家……与‘路易斯’联络。他们在西班牙内战时相识……我们建议，由‘路易斯’负责录用此人。‘路易斯’从事过同样的工作，且十分成功。”根据契科夫的说法，这名物理学家使用过多个化名，其中之一是“佩索斯”。莫里斯·科恩于一九四二年中应征入伍，直到一九四五年退伍，在此期间，无法从事间谍活动。契科夫指出，劳纳负责担任“佩索斯”的信使，并专程前往洛斯阿拉莫斯从“佩索斯”那里收集情报。克格勃的退休官员阿纳托利·雅兹科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克格勃派驻美国的高级官员，他证实了契科夫文章中的内容。契科夫和雅兹科夫均拒绝透露物理学家的身份。契科夫惟一透露的信息是，莫里斯与此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相识。

事实上，科恩正是在西班牙成为间谍。科恩一九三五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年仅二十五岁。两年后，他与其他两千名年轻

的美国共产党人一起前往西班牙，与共产党领导的国际纵队并肩作战。科恩所在的兵团名义上是加拿大兵团，但实际上美国人占了绝大多数。一向积极上进的莫里斯很快成为兵团的政治干事。一九三七年十月，莫里斯受伤入院，伤愈后，他没有返回前线，而是被派往由苏维埃领导的一所西班牙学校，接受秘密电台的操作培训，并被录用为前苏联特工。回到美国后，莫里斯·科恩曾与一九三九年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为苏维埃展台工作，后来就职于前苏联贸易部，同时在纽约的学校里任代课老师。不过，这些都是他“表面”的工作。暗地里，莫里斯为克格勃官员塞姆扬·塞米诺夫担任信使，并且负责招募间谍的工作。一九四一年，莫里斯与共产党人劳纳结婚。劳纳很快成为莫里斯谍报网的全职搭档。

对于契科夫在文章中提供的有关“佩索斯”的细节，我们应持保留态度。契科夫的文章及著作需要经过俄国外情报服务部审阅，凡俄国外情报服务部认为不妥之处均被删节。维诺那计划的档案则是在契科夫的文章发表之后才对外公开，其内容未经俄国外情报服务部删改，作为证据，维诺那档案的可靠性远远超过契科夫所提供的、已经被人为改动过的二手资料。与对外公开的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相对照，契科夫所提供的信息真假参半，并且存在故意歪曲的现象。契科夫指出，“佩索斯”这一化名后来被改为“小伙子”。然而，根据维诺那计划的档案，“小伙子”是西奥多·霍尔的化名。霍尔/小伙子直到一九四四年底才被招募为间谍，科恩夫妇根本没有参与过霍尔的招募工作。契科夫在撰写文章和著作时，霍尔依然健在，其前苏联特工身份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契科夫将“佩索斯”和“小伙子”混为一谈，证明俄国外情报服务部有意混淆历史事实，竭力掩护那些身份依然保密的前苏联特工。

那么，在契科夫的陈辞中究竟有没有可信的成分？契科夫称，科恩夫妇是前苏联极具价值的间谍，这一点千真万确。前苏联给予科恩夫妇如此高的荣誉，并且罕有地采用间谍互换的方式向英国方面换取科恩夫妇的自由，足以证明科恩夫妇的价值。契科夫称，科恩夫妇在前苏联的原子间谍活动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一点也是准确的。奥尔布莱特和昆斯特在《炮弹壳》一书中证实，劳纳·科恩的确充当过霍尔的信使。一九四五年，劳纳至少去过一两次新墨西哥。除了以上两点之外，契科夫的文章和著作中的其他内容便缺乏可信度。契科夫很有可能将“弗哥”/“波斯”和“小伙子”的素材，甚至第三名间谍的素材同时赋予“佩索斯”身上。

在契科夫的陈辞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契科夫指出，前苏联于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即曼哈顿项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将那位真实身份未知的物理学家招募为间谍。根据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来看，前苏联的原子间谍极有可能就是在一九四二年开始渗透美国的曼哈顿项目，至于这条内线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克劳斯·富克斯一九四三年底才到达美国。“定量”出现在一九四三年中，“弗哥”/“波斯”直到一九四四年才露面。霍尔和戴维·格林格拉斯活跃于一九四四年底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曾经指挥过原子谍报活动的克格勃退休官员帕维尔·苏托普拉托夫在回忆录中指出，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塞姆扬·塞米诺夫在曼哈顿项目内部有一条十分重要的内线。苏托普拉托夫十分肯定地指出，这条内线曾经将曼哈顿项目设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小组有关原子连锁反应的报告全文提供给前苏联。一九四三年二月，斯大林的助手莫洛托夫将这份报告，连同其他窃取来的原子情报交给前苏联核物理学家，刚刚被任命为前苏联原子弹项目负责人不久的艾哥·库卡托夫。由此可见，契科夫的说

法，即前苏联于一九四二年在曼哈顿项目内部拥有内线的说法大致准确，不过，莫里斯·科恩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这名内线的身份始终是未解之谜。

科恩夫妇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出现的次数非常有限。被破译的密电绝大部分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发出，其间莫里斯正在部队服役。有关科恩夫妇在这段时间的行踪，可以参考契科夫文章中的内容。契科夫指出，劳纳曾经使用过化名“莱斯丽”，由科恩夫妇负责的谍报网成员被称为“志愿者”。奥尔布莱特和昆斯特经研究发现，莫里斯的化名就是“志愿者”，劳纳的化名是“莱斯丽”。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五年的一份密电中提到，“志愿者”在欧洲牺牲。在维诺那计划档案公开前发表的契科夫的文章中也提到，一九四五年，由于公告中误将莫里斯的名字写进阵亡名单，令劳纳悲痛欲绝。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的密电中曾经提到劳纳，对她的称谓是“莱斯丽”及“‘志愿者’的妻子”。

然而，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科恩夫妇谍报活动的实质性信息。奥尔布莱特和昆斯特的著作以及契科夫的文章中都提到，在莫里斯服役期间，由劳纳独自负责谍报网的工作，其成员包括在纽约军工厂和飞机厂工作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其中的一名成员甚至从任职的工厂里偷了一把新型机关枪模型。联邦调查局后来了解到，劳纳本人曾在两家公司国防工厂工作。一九四二年，劳纳就职于纽约的“公共金属公司”，一九四三年就职于长岛的飞机推进器厂。一九四三年，在俄国外国情报服务部发布的采访记录中，莫里斯·科恩暗示，他曾在四十年代末期接触过霍尔，并且将国际纵队中的一些战友发展为前苏联间谍内线。莫里斯还简单提到二战后他和劳纳与鲁道夫·埃布尔共事的情况。

核查史密斯报告

一九四五年秋，曼哈顿项目军事事务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Leslie Groves）将军负责对外公布原子弹研究进展情况报告的准备工作。这份报告由物理学家亨利·史密斯（Henry D. Smyth）执笔，报告的标题是《原子能军事应用方法研究概述》。史密斯报告的目的是满足公众希望对原子技术有所了解的需求。同时，格罗夫通过这份报告为曼哈顿项目涉及的众多科学家的对外言论设定上限，即他们对外谈及曼哈顿项目时，所涉及的内容不可以超越报告中的内容，以确保美国的利益及原子弹机密的安全。

前苏联研究原子弹项目的科学家们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史密斯报告。前苏联情报部门怀疑，史密斯报告中不仅没有涉及绝密情报，而且还故意掺杂了错误信息，目的是为了对前苏联产生技术误导作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显示，克格勃委派化名“欧里”（后来改为“欧尼斯特”）的特工核查此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在密电中称，为了核实史密斯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已委派“欧尼斯特”与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项目工程师莫里斯·佩雷曼（Morris Perelman）以及一位教授见面，该教授的姓名未能被破译。佩雷曼和这位教授都与史密斯有接触，“欧尼斯特”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听取他们对史密斯报告的看法。很明显，这两个人深知，与他们对话的人是前苏联特工，而绝非美国的科学家同行。“欧尼斯特”还与另外一位科学家见面，此人在被破译的克格勃密电中化名缩写是“D”。“D”向欧尼斯特提供了史密斯报告中特意隐去的内容。从克格勃密电被破译的部分内容来看，“D”十分清楚

他是在协助前苏联间谍。克格勃在密电中提到，“D”很愿意“随时向我们提供（技术情报）”。

美共与录用原子间谍

克格勃曾透过美国共产党组织试图将克拉伦斯·希斯基（Clarence Hiskey）招募为间谍。希斯基是一名化学家，一九四三年九月加入设在芝加哥大学的原子弹项目的“冶金实验室”，在此之前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时，希斯基就积极参与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自然成为克格勃关注的对象。一九四四年五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在密电中指出，根据克格勃的指示，美共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伯纳德·舒斯特专程前往芝加哥。克格勃在密电中转述了舒斯特对他在芝加哥见到的几个人的描述：“奥尔森是芝加哥兄弟会（即共产党）的区域领导人。奥尔森的妻子也是一名积极同胞（即共产党人），负责依照组织的指示与拉姆西（即希斯基）会面。根据我们的指示，回音（即舒斯特）从奥尔森那里拿到一封信，我们的人可以凭这封信与拉姆西会面，建立联络。”美国国家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分析家们没能确认奥尔森的真实身份，很有可能这是当时的伊利诺斯州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切尔德的化名。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奥尔森的妻子正在发展希斯基，而克格勃希望能借助这一关系让自己的特工与希斯基建立联系。

七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致电莫斯科，附上由舒斯特提供的：胜利者（真实身份未知）和罗斯·奥尔森写给希斯基的两封信的副本。电文中所指的罗斯未必是莫里斯·切尔德的妻子，而有可能是他的嫂子罗斯林（Roselyn）。罗斯林的丈夫杰

克·切尔德 (Jack Childs) 是美共的全职工作人员，他的工作有可能与地下组织有关。由于电文未能被全部破译，所以没有办法了解这两封信件的详细内容。从断断续续被破译的内容来看，克格勃好像是委派老牌特工约瑟夫·卡茨负责希斯基的发展工作。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回电莫斯科，就莫斯科方面之前发出的几点问询予以答复，其中的问询之一便是与希斯基接触的进展情况。纽约情报站在电文中解释，由于伯纳德·舒斯特和约瑟夫·卡茨都不在纽约，化名“费罗斯”的罗斯·奥尔森和她的丈夫去了“拉姆西所在的地方”，故而需要迟些时候才能答复莫斯科方面的问询。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通知莫斯科，“迪克（即约瑟夫·卡茨）直接与费罗斯的丈夫，而非费罗斯（即罗斯·奥尔森）本人联系。之所以委派费罗斯的丈夫与拉姆西（即希斯基）会面，是为了确保直接下达指令，避免不必要的耽搁。”这句话意味着，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已经决定，将由杰克·切尔德与希斯基接触。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杰克与希斯基的联络并不成功。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克格勃驻旧金山市情报站发出的一份密电被部分地破译，电文中证实，克格勃的确利用美国共产党人搜集美国原子项目的情报。电文中提到，一位“值得信任”的轮船公司文员杰罗姆·卡拉汉 (Jerome Callahan) 从加利福尼亚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以及党组织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鲁道夫·兰伯特 (Rudolph Lambert) 那里听到一些消息，又或是听到一些有关兰伯特的消息，并将消息转告给克格勃。虽然电文中没有被破译的部分无法识别，但是可以隐约推断出，卡拉汉和兰伯特提供的情报与铀矿有关。如果不是授意于克格勃，包括卡拉汉和兰伯特在内的美共成员很难对铀矿发生兴趣。

前苏联原子谍报活动的其他案例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发出的密电中，只有极少部分被破译。但是，从其他渠道收集的证据显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同样在曼哈顿项目中发展内线。三十年代末期，持伪造加拿大护照混入美国境内的阿瑟·亚当斯（详情见第六章）就曾试图从曼哈顿项目中招募内线，并且取得初步成功。

一九四四年，美国反间谍部门发现了亚当斯的前苏联特工身份，并且发现，亚当斯曾经与克拉伦斯·希斯基会面。克拉伦斯·希斯基同时也是克格勃试图接近的目标。美国的安全人员怀疑，希斯基偷偷摸摸地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非法官员会面，很有可能是在从事间谍活动。为了杜绝希斯基的间谍活动，安全人员于一九四四年中安排希斯基入伍，并将他派往阿拉斯加的陆军部队。在希斯基前往阿拉斯加的途中，美国反间谍人员偷偷搜查了希斯基的行李，发现了长达七页的保密记录，内容涉及希斯基在“冶金实验室”的工作。在后来的一次跟踪追查中，这些笔记不见了踪影。希斯基有可能已经将它们交给前苏联的联络人。也有可能，他怀疑自己受到监视而将记录销毁。

在希斯基前往陆军部队报到之前，他将原子弹项目的一位化学工程师约翰·蔡平（John H. Chapin）介绍给亚当斯。然而，这次会面没有逃过美国安全官员们的监视。经传讯，蔡平承认，希斯基告诉他，亚当斯是前苏联特工，但是蔡平否认自己向亚当斯提供过任何秘密情报。希斯基还将原子弹项目的一位技术员爱德华·曼宁（Edward Manning）介绍给亚当斯。美国政府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起诉曼宁和蔡平，只好像对待希斯基

那样，将曼宁和蔡平调离机要部门，以杜绝他们的谍报活动。

一九四四年冬，亚当斯再次试图渗透曼哈顿项目。他的发展对象之一是任职于战争情报办公室影视部的欧文·勒纳（Irving Lerner）。勒纳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曾试图拍摄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院的生产铀的回旋加速器，被反间谍人员当场抓获。然而，同样是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勒纳没有被起诉。迫于压力，勒纳辞职，之后就职于阿瑟·亚当斯所在的“主音录制公司”。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并没有明确提到亚当斯、蔡平、勒纳或是曼宁。不过，由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发出的一份密电中好像提到，亚当斯试图从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中获取情报。一九四三年八月，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负责人帕维尔·米卡洛夫与亚当斯会面。之后，米卡洛夫致电莫斯科，谈到克格勃特工、农业联合实验室的创办人威廉·马里索夫。米卡洛夫称，马里索夫“认识一批人，与艾斯库拉普的妻子在同一特殊领域里工作，他可以推荐人选接替艾斯库拉普的妻子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位”。艾斯库拉普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被确认。不过，米卡洛夫又接着气急败坏地指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必须放弃这条线索，他们的特工阿奇里斯（有可能是阿瑟·亚当斯的化名）“无法接触马里索夫，因为马里索夫是邻居（即克格勃）的人。”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还试图透过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院的放射实验室获取哪怕只是一点点与曼哈顿项目有关的情报。史蒂夫·纳尔逊是美共的公开官员，同时是西海岸秘密武装的负责人。联邦调查局在纳尔逊的住处安装了窃听器，并于一九四二年十月窃听了放射实验室的年轻科学家、共产党人乔瓦尼·洛马尼茨（Giovanni Lomanitz）与纳尔逊之间的谈话。洛

马尼茨告诉纳尔逊，他正在研制一种属于高度机密的武器，言下之意是指原子弹项目。纳尔逊婉转地表示，他之前对此项目有所了解，并建议洛马尼茨谨慎行事，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地下党成员。一九四三年三月，纳尔逊在家中与另外一位共产党人物理学家约瑟夫·威恩伯格（Joseph W. Weinberg）会面，威恩伯格提供了他在放射实验室的工作情况等秘密情报。纳尔逊将威恩伯格提供的情报笔录下来。几天后，纳尔逊与前苏联驻旧金山市领事馆副领事彼得·伊凡诺夫（Peter Ivanov）会面，伊凡诺夫的真实身份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官员。美国安全官员监视发现，纳尔逊将一包东西交给伊凡诺夫，相信里面装有对威恩伯格提供的情报的笔记。美国政府后来传讯纳尔逊和威恩伯格，问到当时的情况。纳尔逊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威恩伯格则否认曾经与纳尔逊会面，显然，他是在撒谎。

在原子弹项目设在伯克利分院放射实验室的科学家中共有六名共产党人，洛马尼茨和威恩伯格只是其中的两位。这六名共产党人都积极地想在放射实验室建立起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小型白领工会——“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及技术人员联合会”（简称“建工化技联合会”）放射实验室分会。在前苏联试图窃取原子弹项目的情报活动中，这个小型白领工会曾多次发挥作用。

虽然伯克利放射实验室中的青年共产党人科学家与前苏联情报部门之间的联络工作由纳尔逊负责，但是有一名化学家马丁·卡门却直接与格里高里·凯菲和格里高里·卡斯帕洛夫（Grigory Kasparov）等克格勃官员联络。这两个人的对外身份是前苏联驻旧金山市领事馆外交官。一九四四年，美国安全官员偷听到卡门与凯菲谈论原子弹项目的情况，卡门因此遭到解雇。然而，卡门并不知道与自己与凯菲的谈话已被窃听，所以当

他被传讯问及这次会面时，他没有交代真相。

一九四三年八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致电莫斯科称，将与一位科学家会面，并称此人是一名“有进步思想的教授”，担任放射实验室的负责人之一。克格勃在密电中提到，这次会面由美共成员、“建工化技联合会”北加利福尼亚州组织委员保罗·品斯基（Paul Pinsky）安排。但是在后来破译的密电中，再没有提及这次会面。美国的安全部门也注意到前苏联利用“建工化技联合会”开展谍报活动。安全部门将这一情况汇报给白宫。白宫方面与美共负责人之一菲利普·默里（Philip Murray）联络。默里强行要求放射实验室的“建工化技联合会”分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止一切活动。保罗·品斯基试图阻挠这一决定，但未能成功。联邦调查局后来发现，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官员伊凡诺夫曾于一九四三年十月拜访品斯基的住处。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一九四五年九月发给莫斯科的一份密电中好像隐约地提及“建工化技联合会”。这份密电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朱利叶斯·罗森堡，但也提到另外一条化名“沃洛克”的内线。“沃洛克”是一名共产党人，在曼哈顿项目基地工作，但具体在哪个部门工作，电文中没有透露。电文指出，非常不幸，“沃洛克”刚刚在前一天“得知他被解聘，解聘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积极参与进步组织的活动”。在“沃洛克”的名字出现之前的一段电文未能被破译，所以无法肯定“沃洛克”是不是罗森堡负责的情报内线。不过，紧挨着这段未破译电文的前后两段电文内容均与罗森堡的谍报网有关。“进步组织”是共产党人对与共产党有关联的组织的统一称谓，“建工化技联合会”应该属于进步组织之一。有数位工程师和科学家因为被美国安全官员发现曾参与“建工化技联合

会”而被曼哈顿项目解聘。

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有一条内线，化名“内弟”，专门负责向前苏联提供过美国反间谍官员、曼哈顿项目安全问题负责人鲍里斯·帕斯中校（Lt. Col. Boris T. Pash）的情报，可见，前苏联对曼哈顿项目怀有多么浓厚的兴趣。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于一九四四年发出一份密电，虽然电文破译得不完整，但可以隐约推测出，电文中涉及接近弗兰克·奥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的可能性。弗兰克·奥本海默是曼哈顿项目的科技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本人也是名物理学家，是共产党人。然而，这份密电好像是在提醒莫斯科，弗兰克·奥本海默正处于美国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之下。

那么，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情形又如何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方面发现曼哈顿项目已经被前苏联渗透后，奥本海默的背景，他那颇为诡秘的行踪以及他对自己与美共的关系讳莫如深的做法令他成为受怀疑对象。三十年代末直至一九四二年，罗伯特·奥本海默曾参加“群众阵线”，积极支持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八月，纳粹—苏维埃协定确立之后，罗伯特依然不改对共产主义的初衷，可见他与共产党的渊源有多么深厚。其间，奥本海默通过加利福尼亚共产党组织领导人、西海岸共产党组织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艾萨·弗考夫向美共捐赠了大笔资金。在加入曼哈顿计划前不久，奥本海默结识了西海岸共产党组织的另外一名高级官员，秘密武装领导人史蒂夫·纳尔逊。和弗考夫一样，纳尔逊也是共产党组织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

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以及弗兰克的妻子都是秘密共产党人。一九四九年之前，弗兰克一直坚决否认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后来，他承认自己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间是共产党

人。罗伯特的妻子凯瑟琳也是一名共产党人。凯瑟琳的前夫约瑟夫·达雷（Joseph Dallet）生前是共产党组织的全职干事，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担任国际纵队的政委，不幸牺牲。

美共反间谍情报机构对罗伯特·奥本海默发生怀疑并非因为他与共产党组织有牵连的背景，而是由于他的行为令人费解。一九四三年八月，奥本海默向曼哈顿项目的安全官员汇报，他从间接渠道得知，曾有人与曼哈顿项目的几位科学家接触，要求他们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供秘密情报。安全官员要求奥本海默详细汇报他的这一消息来源，奥本海默于是改口表示，是有人亲自找到他本人，要求他与前苏联合作。奥本海默告诉安全官员，一九四三年初，加利福尼亚大学罗曼语教授哈康·切夫里尔要求他将原子弹机密泄露给前苏联。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切夫里尔是奥本海默所在的自由阵线政治圈子中的风云人物。奥本海默称，前苏联的一位化学工程师乔治·艾腾顿（George Eltenton）找到切夫里尔，希望他能作为中间人，在曼哈顿项目中寻觅几位科学家，让他们将原子弹项目的秘密提供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分享（所谓分享，是对间谍活动比较委婉的讲法）。奥本海默表示，他回绝了切夫里尔的要求，但他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为何直到数月后才将这件事情报告给安全官员以及他为何在第一次报告时说谎。奥本海默还向安全官员提供了曼哈顿项目中亲近共产党而值得注意的科学家的情况，其中包括乔瓦尼·洛马尼茨、约瑟夫·威恩伯格以及戴维·博姆（David Bohm）。（这三位年轻的共产党人科学家都曾与史蒂夫·纳尔逊会面。）但是后来，奥本海默再次部分地推翻原先的说法，令事实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切夫里尔对于奥本海默的说法加以驳斥。他否认自己信仰

共产主义，并且表示，他只是非常随意地向奥本海默提起艾腾顿的计划，而且他本人当场回绝了艾腾顿。切夫里尔承认曾经与伊凡诺夫及凯菲见面，但是他坚称，事先并不知道他们是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官员。然而，从所掌握的证据来看，切夫里尔是名不折不扣的秘密共产党人。艾腾顿也是一名秘密共产党人。美国安全官员发现，一九四二年，艾腾顿曾多次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官员彼得·伊凡诺夫会面。

综合以上情况，奥本海默最终没能通过一九五四年安全核查，成为参与谍报活动的怀疑对象。那么，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是否可以找到有关奥本海默的信息？事实上，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直接提及奥本海默的电文很少，不过，倒是有些电文间接地提及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的真名实姓曾经在几份密电中出现。在这些密电中，前苏联特工向莫斯科方面汇报了曼哈顿项目中有哪些科学家在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事实上，这些电文是前苏联特工汇报有关奥本海默的情况，并非是由奥本海默向前苏联提供任何情报。有两份密电中提到化名“维克索”。联邦调查局的分析家们认为，“维克索”就是罗伯特·奥本海默。不过，这两份电文的内容也无法证明奥本海默从事间谍活动。其中的一份密电中提到，“维克索”负责曼哈顿项目的一个基地，克格勃称之为“保护区”。从电文内容分析，“保护区”指的就是奥本海默当时负责的洛斯阿拉莫斯基地。在另外一份密电中，莫斯科方面指示纽约情报站派特工赫龙（Huron）前往芝加哥，与曼哈顿项目的两名科学家“重新建立联系”。这两名科学家包括“维克索”和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海曼·戈尔德史密斯（Hayman H. Goldsmith）。从电文内容分析，赫龙有可能是名科学家，他曾经与“维克索”和戈尔德史密斯相识。克格勃方面

希望赫龙能从两位科学家那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电文中并没有证据证明，戈尔德史密斯和“维克索”为克格勃服务。

克格勃发出的众多密电只有一小部分得以破译。在被破译的电文中没有提及的人或事，并不意味着他们绝对与克格勃无关。不过，克格勃的电文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原子间谍活动、洛斯阿拉莫斯基地以及奥本海默的名字。从这些内容判断，作为曼哈顿项目负责人之一的学识丰富的奥本海默并没有参与到原子间谍活动中。

另外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虽然前苏联情报部门的档案目前依然没有对外公开，但是，在俄罗斯政府向世人公开的一些文件中，有些文件涉及当年提供给前苏联的原子弹项目情报。从这些文件中找不到任何线索用以判定原子弹情报的来源，但是却可以看出，克格勃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当年的情报内线向前苏联提供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情报。奥本海默作为洛斯阿拉莫斯基地科学项目负责人，他所了解的秘密绝不仅仅局限于原子弹项目的某一领域，而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所有的秘密。如果奥本海默果真积极参与前苏联的原子间谍活动，相信前苏联获得的原子情报，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会较业已窃取的情报质量和数量更上一层楼。而且，从时间上来看，也会比业已耗费的时间更加迅速。

有证据显示，在一九四一年前，奥本海默与共产党有着紧密联系。至于他成为“群众阵线”的一分子，对美共在某些领域的运作持反对意见，也绝非出于一时的冲动。奥本海默于一九四三年主动与美国的安全官员接触，在此之前，他对于美共针对曼哈顿项目可能从事的谍报活动几乎是漠然视之。一九四三年中，奥本海默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看来是发生了转变，他

意识到了曼哈顿项目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但即便如此，他也只不过是向安全官员们提供有限的信息，从而达到消除安全隐患的作用，但又不致令有关人员遭到处罚。奥本海默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拒绝提供他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与美共的关系，并拒绝提供在曼哈顿项目工作的共产党人的情况。虽然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奥本海默涉嫌积极参与前苏联谍报活动，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能忽略，即很有可能，奥本海默于一九四三年中向美国安全官员反映切夫里尔的情况时，他故意忽略了其他共产党人的行为。虽然他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人的行为产生质疑，但是他与这些共产党人的私交以及曾经有过的共同政治信仰令他决定低调处理他的质疑。



前苏联谍报活动与美国历史

根据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上千名为前苏联情报部门服务的美国人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前苏联利用战时机构，采用非常规手段，在短时间内招募大批特工人选，令其情报攻势获得巨大成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报机构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就潜伏着十五名到二十名的前苏联间谍。其他四个战时机构——战争生产委员会、经济战委员会、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及战争情报办公室的每个机构的雇员中隐藏着至少达六名以上的前苏联内线。

虽然，一些制度比较完善的政府机构不容易被间谍渗透，但是，前苏联间谍总是有机可乘。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就有至少六名情报内线在活动。在国务院最高级的官员当中，阿尔杰·希斯和劳伦斯·达根协助前苏联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达十年之久。由于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怀特施加影响，财政部成为前苏联特工滋生的摇篮。财政部中已经被确认的八名前苏联情报内线中，六人曾任职货币研究部。该部门的第一任负责人就是哈里·怀特，待怀特在财政部内被提升之后，由另外一名前苏联内线弗兰克·库尔接替他的职位。

前苏联的情报内线不但素质高，而且数目惊人，其中包括总统的行政助理（洛赫林·柯里），在原子弹项目的重要部门工作的科学家（西奥多·霍尔和克劳斯·富克斯），战略服务办公室负责人的高级助理（邓肯·李），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怀特），国务卿特别政治事务助理（阿尔杰·希斯），国务院“美洲共和国部”负责人（劳伦斯·达根）以及数十名分布在美国政府各部门的中层官员。

但并非所有参与前苏联谍报活动的美国人都是情报来源。在每一名真正窃取秘密情报的特工，诸如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和莫里斯·霍尔珀林的背后，都有专门提供支持和联络的特工人员，例如阿马德奥·萨巴蒂尼和伊丽莎白·本特利。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情报内线顺利完成提供情报的工作。每一条真正的情报内线都需要一个精密组织的配合：需要有人发现他们，并将他们招募为情报内线；需要有人对他们的背景加以调查；需要有信使传递文件和指令；还需要有人提供据点、投递站，开公司掩护身份以及协助获取伪造的身份证明。所有这些，都是谍报活动所不可或缺的。

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仅仅记录了前苏联特工对美国政府的渗透活动，但无法估量前苏联间谍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的损失。前苏联特工向情报机关提供了大量情报，但是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只提到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有情报内线提供的报告或是窃取的文件是通过外交邮袋寄往莫斯科，如今依然被封存在前苏联的档案中。惟有一些特别紧要的情报透过密电传递给莫斯科。透过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投诚的特工的证词以及被逮捕的间谍的供词，我们可以了解有哪些类别的情报被泄露给前苏联。但是，我们无从了解前苏联如何处理这些情报。既然无从了解前苏联间谍所窃取情报的具体内容以

及前苏联如何利用这些情报，我们只能粗略估计前苏联谍报活动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毋庸置疑，美国所遭受的损害是严重的。

在所有被窃取的情报中，惟一内容比较公开的是有关原子间谍的情报。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将前苏联时代的原子间谍“获得”的绝大部分情报对外公开。假以时日与资源，前苏联靠自己的一批天才科学家及工程师也能自行研制出原子弹。然而，借助于克劳斯·富克斯、戴维·格林格拉斯、西奥多·霍尔以及数名至今真实身份未知的间谍提供的情报，前苏联的科学家们无须重复英美科学家们所走过的弯路，也无须在关键性问题的研究上投入巨大的资源，前苏联间谍早已将英美科学家们花费无数资金找到的可行方案及宝贵数据提供给科学家们。前苏联科学家们无须再冥思苦想地寻求意识上的突破，依靠间谍们窃取的向心聚爆及钷元素的研究成果，他们节省了本来会花费在研制铀弹上的巨额资金与时间。依靠间谍活动，前苏联节省了大笔工业投入，比预期提前数年成功研制出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共成员超过五万人。尽管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美共成员并非间谍，但是每当克格勃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想要在美国寻找特工人员时，他们总能在美国共产党内找到最坚决、最合资格的候选人。大部分背叛祖国，将美国的工业、军事及政府机密交给前苏联的美国人并非出于受到恐吓，需要金钱，或是心理错位等原因，而是出于对苏维埃的信仰。这本著作中有太多有价值的前苏联特工，例如西奥多·霍尔、克劳斯·富克斯、朱利叶斯·罗森堡、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查尔斯·克雷默以及维克托·珀洛等人，他们并非被前苏联招募为间谍，而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主动与克格勃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联络，要求协助前苏联的谍报工作。当

然，仍有很多情报内线是由前苏联方面主动接触并招募成功的。尽管有一些美国共产党人因为害怕被捕拒绝充当前苏联间谍，但是从没有人出于维护民族利益而拒绝前苏联的要求，更没有人将前苏联的做法报告给美国政府。

前苏联的特工人员和情报内线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在新政初期蜂拥到华盛顿的一批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中有数百人加入共产党组织，并被派往党组织的各秘密小组。绝大部分人愿意将政府中的信息提供给共产党，希望能够有助于实现共产主义政治目标，更有小部分人员在发现自己有机会接触到政府的秘密情报后，毫不犹豫地将机密提供给前苏联情报部门，以期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所帮助。在前苏联的谍报网中，西尔夫马斯特和珀洛各自领导的谍报网就是其中两个最大的间谍网络。第二个来源是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自愿参加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作战的数千名年轻美国共产党人。美国志愿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人员损失惨重，在幸存者中，有数十人积极参与前苏联谍报网的工作。莫里斯·科恩就成为克格勃的职业官员，一生为前苏联从事间谍工作。第三个来源是忠心耿耿为美共的“秘密武装”工作的美共成员。多年来，他们的工作职责是确保美共的内部安全，为美共一旦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开展工作做准备，并且渗透到非共产主义组织中开展分裂活动。美共成为前苏联情报部门的辅助机构，美共的一些领导人，例如加利福尼亚的史蒂夫·纳尔逊就积极参与前苏联的谍报活动。

美国的共产党人为什么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充当间谍？问题的答案，至少部分答案是由美国共产主义的性质决定的。西奥多·霍尔、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戴维·格林格拉斯以及哈里·戈尔德就表达过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执著信仰，

认为能够有机会通过谍报工作为苏维埃的强大尽力是莫大的荣幸。美国共产党组织也一直在宣扬这种理念。一九三五年，美共发言人写道，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团结多达一百个民族的人民。虽然不同民族的经济、语言以及风俗传统各不相同，他们却为着共同的理想团结在一起，建设富强、多姿多彩的社会主义……（他是一位）世界级的领导人，他针对共产国际的每一个党组织中的每一个问题所提出的每一项建议都是正确的、清晰的，为坚决进行阶级斗争指明方向。”一九四〇年，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杂志中写道：“斯大林同志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盏明灯，为青年运动指明方向……资本主义国家中年轻的工人以及遭受资本主义制度迫害的劳苦大众对斯大林同志充满爱戴与期许……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极其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苏维埃人民得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斯大林如同呵护鲜花一样精心培育着年轻一代。”

一九四一年，美共的理论性杂志《共产党人》宣传，斯大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这位杰出领袖分分秒秒地愈发和世界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九四三年，美共专门负责知识分子工作的杰罗姆表示，“斯大林是一位真正的有远见卓识的人物……一位赋予天分，同时又具备社会经验的自由战士。”一九四九年，美共的思想家亚历山大·比特尔曼（Alexander Bittleman）断言：“斯大林的伟大之处以及他的天分必然为后人所认识……能够与斯大林生活在同一时代，能够同他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能够接受他的指导是一件非常令人骄傲的幸事。”被类似的言论所熏陶并且持认同态度的共产党人，一旦有机会为苏维埃的谍报工作服务，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投入进去。

除了思想上的宣传，一些共产党人出于对俄国的爱国情

结，更加坚定了为苏维埃工作的决心。为前苏联从事间谍工作的美国人中，有一部分是俄国移民，或者是俄国移民的后代。为克格勃工作的年轻共产党人萨维尔·萨克斯的父母本身就是激进的俄国移民。他们的孙子回忆，祖父母居住的公寓楼里的其他人家也都有着相似的背景与信仰。“他们将自己封闭在这个小团体内，认为美国社会无处不在迫害来自沙皇俄国的犹太人。”同时，他们相信，在自己的祖国，所有的不公平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政府所纠正。正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对苏维埃的忠诚，令这些移民或移民的后代对苏维埃的爱国热情远远超过对美国的忠诚。

美共及其共产党人协助前苏联从事谍报活动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反共产主义情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展的调查与起诉活动，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政府认为，美共与前苏联间谍活动有关。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杜鲁门总统一九四七年颁布执行法令，规定所有政府雇员要经过安全审核，这一法令于五十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时代得到进一步加强。一九四八年，杜鲁门政府根据史密斯法案以煽动罪起诉尤金·丹尼斯及其他美共领导人。美国政府于四十年代末对政府雇员实施的安全审核制度虽无可厚非，但是该法令在设计与实施方面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且没有杜绝不公正甚至滥用法令的现象。

随着冷战的到来，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给美国的安全工作笼罩上一层阴影。被破译的电文中提到的与前苏联情报部门合作的美国人中，仍有一半人潜藏在化名之下，其真实身份至今没有获得确认。在这近两百人中，有多少人依然在机要岗位上任职？他们是否在从事涉及政策决策的工作？上千名安全官员多年来一直在试图挖掘这些化名背后的真实身份，为此他们调

查了成千上万人。特别是在外交及国防的决策部门,因为考虑到仍有前苏联特工活跃在这些部门,美国官员之间的相互信任遭到破坏。与此同时,前苏联的间谍活动还引发了美国政党之间的争斗。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发动抨击,认为民主党的执行官员做事不力,甚至指责他们与间谍勾结。面对共和党的指责,民主党的做法亦或试图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态度在美亚案件的处理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亦或对共产党人的颠覆及间谍活动采取强硬措施,杜鲁门总统颁布的执行法令就是很好的实例。

五十年代中,美国政府确认威廉·韦班和金·菲尔比将维诺那计划成功破译前苏联密电的信息透露给前苏联方面。然而,美国的安全官员分析认为,前苏联方面尚不确切了解究竟有多少二战时期的密电被破译,有鉴于此,决定对维诺那计划严加保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用作测试前苏联投诚间谍供词的真实性的作用日益淡化。七十年代,已经没有太大必要依旧对维诺那计划加以保密。然而,整个八十年代,维诺那计划一直被封存,直到一九九五年,美国人民才有机会获得有助于重新理解本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总而言之,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公开的联邦调查局档案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后对外公开的俄国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最新证据。再加上较早前投诚的前苏联谍报人员,诸如惠特克·钱伯和伊丽莎白·本特利在国会委员会面前的证词以及对主要的前苏联间谍的审判,可以证实,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间,苏维埃联盟针对美国展开大规模谍报活动,且谍报活动的规模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苏维埃采用友好和宽容政策期间达到极点,其性质绝不是一、个国家对于盟国所进行的有限度的情报侦察,而完全将美国视为临时联盟,长期来讲,则将美国视为敌对力量。斯大林的间

谍政策是影响冷战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根据维诺那档案中的证据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证据均证实了前苏联正在对美国开展广泛且恶劣的谍报活动。美国的反间谍专员及高层政策继承人确认，前苏联正在对美国进行颠覆活动。美国方面由此推断，并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开始冷战，斯大林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秘密行动。事实证明，美国方面的推断是正确的。



与前苏联情报特工秘密联络的美国公民及美国居民

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共发现三百四十九名与前苏联情报机关保持秘密联络的美国公民、移民及永久居民。本附录所列举的名单不包括以合法的外交身份活动的前苏联情报官员，但有四名以移民身份出现的非法情报官员，其姓名被包括在本附录的名单中。

在这三百四十九人中，有一百七十一人的真实姓名被落实，其余的一百七十八人只能援引维诺那计划破译的电文中所使用的化名，且绝大部分化名没有查出真实身份。其中的一大批人的姓名没有在本附录中出现，原因在于，根据被破译的电文内容，这批名称所代表的是持外交身份的前苏联人员，又或是因为从电文内容无法判定化名者的国籍和身份。只有那些虽没有落实真实身份，但可以推断此人为美国公民的化名者被载入本附录。

由于前苏联情报人员经常转换化名，有可能某个化名与另外一个化名甚至真实姓名所指的是同一个人。一些没能落实身份的化名，其背后的人物很可能在附录 B 中得到记载，因为附录 B 中列举了被确认与前苏联情报部门有染，但却未曾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出现的美国人名单。

在斯大林时期，有大批美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士协助前苏联的谍报工作，附录 A 和附录 B 中所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小

部分。

国家安全部只对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年内发出的情报密电进行追踪，且只有一小部分电文被破译。

对于每一个人名的注解，凡是在本书的章节中有过提及的，注解比较简单，而对于本书章节中没有涉及的人物，注解则比较详细。其中的一部分人为珀洛组织和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组织成员，在开始阶段属于美共秘密组织成员，后来为克格勃所控制。下列名单中，凡化名使用斜体字，真实姓名使用标准体。

A.：见 Colloms, Anna。

Abram：见 Soble, Jack。

Abt, Jhoh：约翰·艾伯特。工人律师，秘密共产党人，一九四四年将珀洛组织交由克格勃控制。

Achilles：真实身份未知。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人员，活跃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间，曾参与对芝加哥大学的科技谍报活动。有可能就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阿瑟·亚当斯（见附录 B）。

Acorn：见 Gold, Bela (William)。

Ada：见 Harris, Kitty。

Adam：见 Getzoff, Rebecca。

Adler, Solomon：. 所罗门·阿德勒。财政部官员，秘密共产党人，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化名“萨哈”。

Aida：见 Rand, Esther Trebach。

Aileron：见 Silverman, Abraham George。

Akhmed：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领导。此人提供的情报包括美国高级记者

的情况，反苏维埃流亡人士的活动；曾协助追踪苏维埃判国者维克托·克拉切科，并担任克格勃与其他苏维埃特工之间的联络人。考虑到其工作性质，此人可能是来自俄国的移民。其另外一个化名是 Thrush。

Akhmerov, Iskhak Abdulovich: 依卡·阿布杜拉维奇·阿米洛夫。克格勃高级非法官员，以美国移民身份活动，从三十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在美国活动。他一手招募了数十名美国内线，为克格勃所赞赏。曾用名包括威廉·格里科 (William Grienke) 和迈克尔·格林 (Michael Green)。在维诺那计划中使用的化名包括“市长”和“艾伯特”。有关阿米洛夫的克格勃职业生涯，见附录 E。

Albert: 见 *Akhmerov, Iskhak Abdulovich*。

Aleksandr (Alexander): 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二年被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录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的一些被部分破译的电文中曾提到此人。一九四三年的电文显示，此人与克格勃在墨西哥的活动有关。

Aleksandrov (Alexandrov): 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提供有关反苏维埃流亡人士的活动情报。接受克格勃提供的报酬。一份密电中显示，此人有可能是尤金·奥凯恩 (见下) 的父亲。

Ales: 见 Hiss, Alger。

Alma: 见 Ievanas, Leo。

Altschuler, Lydia: 莉迪亚·阿特舒勒。在克格勃在墨西哥的反托洛茨基活动中担任美国方面的投递站。化名丽迪雅。

Antenna: 见 Rosenberg, Julius。

Arena: 真实身份未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人员，在政府机关任中级官员，具体部门未知。曾与瓦西里·朱比林直接

会面。住处被用作据点。

Armor：克格勃成员，真实身份未知，在贝尔飞机公司工作。另一化名是“邮票”。

Arnold：见 Fakir; Gold, Harry。

Arrow：克格勃成员，真实身份未知，在移民中开展工作。

Art：见 Koral, Helen。

Arthur：见 Bisson, Thomas Arthur。

Aster：克格勃成员，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从事过反托洛茨基工作。

Ataman：见 Gebert, Boleslaw K。

Attila：见 Linn Markley。

Augur：前苏联内线，在芝加哥居住，与克格勃没有直接联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由于无法联络到此人，曾向莫斯科方面咨询，是否可以通过前苏联外交人员与之建立联络。

Australian Woman：见 Mitynen, Francia Yakilnilna。

Author：见 Morkovin, Vladimir Borisovich。

B.：克格勃内线姓名缩写，真实姓名未知。此人在共和航空公司工作，曾将美国方面研制的与德国 V-1 型巡航导弹媲美的导弹资料提供给前苏联。

Babin, Thomas：托马斯·巴宾。一九四三年曾向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提供美国离岸船只的情报以及在战略服务办公室所获得的情报。化名“布雷姆”。

Baker, Rudy：鲁迪·贝克。一九三八年开始担任美共地下武装领导人。贝克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一直使用化名“儿子”。（见鲁迪。）“俄罗斯近代史文献保存及研究中心”的档案中保存有共产国际与美共之间往来的加密信件，莫斯科方面的“兄弟”与在美国的“父亲”和“儿子”之间的信件多达

数十封。从信件中的注解可以推断，“儿子”代表鲁迪·贝克，“兄弟”代表迪米特洛夫，“父亲”代表厄尔·布劳德。一九三九年一月，贝克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的官员简要陈述了他对于领导美共秘密武装的一些看法。这些信件都是在那次莫斯科之行之后发出。一九四二年五月，克格勃外国情报部负责人费庭将军给迪米特洛夫发出一封信，写道：“随附鲁迪从纽约发给你的电报。”那封电报上的签名就是“儿子”。

Barash, Vladimir: 弗拉迪米尔·巴拉什，俄国移民，曾与克格勃的一名特工接触，并为苏维埃联盟服务。

Bark: 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汇报。经核查，是苏维埃的支持者，在纽约的一家广播电台工作，是克格勃准备渗透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候选人。

Barr, Joel: 乔尔·巴尔，秘密共产党人，工程师，罗森堡谍报网成员，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汇报。化名“侦察员”和“公尺”。

Barrows, Alice: 艾丽斯·巴罗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二年期间，任职教育办公室。一九四四年任职美共在芝加哥的亚伯拉罕·林肯学校。克格勃的报告中指出，此人于一九四五年向查尔斯·克雷默提供过情报。

Bass: 见 Burd, Michael。

Bayer, Theodore: 西奥多·拜尔，路斯奇古罗出版公司总裁，出版的俄文报纸与美共有关。一九四三年向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汇报。化名“西蒙”。

Beam: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在移民中，特别是波兰移民中活动。一九四四年，因工作表现出色，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向莫斯科建议向其颁发奖金。

Beaver - Cloth: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三年与克格勃非法官员依卡·阿米洛夫合作。

Beck: 见 Kurnakov, Sergey Nikolaevich。

Beer: 见 El。

Beiser, George: 乔治·拜瑟，贝尔飞机公司工程师，曾将机器工具方面的情报提供给安德鲁·史夫切科。被人称为“左翼人士”及“理想主义者”。史夫切科是贝尔飞机公司检验员，拜瑟可能没有意识到史夫切科是克格勃特工。

Belenky, Aleksandr: 亚历山大·贝伦基。俄国移民，在通用电器工作。经另外一名移民向克格勃提供情报。

Belfrage, Cedric: 锡德里克·贝尔弗雷奇。记者，秘密共产党人，出生于英国，在美国居住数十年。二战期间被英国安全部门派往美国，将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提供给克格勃。代号“第九号”。

Ben: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活跃于一九四四年。与克格勃在美国最活跃的间谍约瑟夫·卡茨一起工作。

Bentley, Elizabeth: 伊丽莎白·本特利。三十年代中加入美共，成为秘密武装成员。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汇报，负责由政府部门中的美共成员组成的几个大型谍报网的工作（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和珀洛谍报网）。

Berg: 见 Koral, Alexander。

Bernstein, Joseph Milton: 约瑟夫·伯恩斯坦。记者，一九四三年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工作。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与潜伏在美国政府中的内线之间的联络人。化名“侯爵”。

Bernstein, Walter Sol: 沃特·索尔·伯恩斯坦。记者。克格

勃称此人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与克格勃重新建立联络，并将他的一次海外之行写成报告。其本人承认曾与美共代表见面，但否认与前苏联情报部门有关。

Bibi: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活跃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一九四四年，为设在华盛顿的戴高乐自由法国运动经济委员会工作，并借助职务之便在美国租赁内阁及外国经济部中发展内线。将自由法国运动的大量内部政治情况泄露出去。有可能是美国人，但也可能是法国人。性别未知。

Bisson, Thomas Authur: 托马斯·比森。亚洲问题专家，一九四三年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工作。先后任职“经济战委员会”和“太平洋关系学会”。化名为“阿瑟”。

Black: 见 *Black, Thomas Lessing*。

Black, Thomas Lessing: 托马斯·布莱克。化学家，三十年代中为前苏联从事工业谍报活动。化名“黑色”和“彼得”。

Block: 见 *Osprey*。

Bob: 见 *Menaker, Robert Owen*。

Bolt: 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提供无线电控制方面的情报。

Borrow, Robinson: 鲁宾逊·博罗。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活跃于一九四三年。化名“理察得”。

Bredan: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二年曾与前苏联有意录用为间谍的一名人选保持联络。

Brem: 见 *Babin, Thomas*。

Brook: 前苏联海军情报部驻华盛顿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活跃于一九四三年，具体任务未知。

Brother: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有可

能从事科技，特别是航空领域的谍报活动。化名“托马斯”。

Brother - in - Law (Svoyak): 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曾泄露美国原子弹项目的情报。

Brothman, Abraham: 亚布拉罕·布拉泽曼。化学家，长期为克格勃开展工业谍报活动。化名“建筑家”、“铬黄色”和“专家”。

Browder, Earl: 厄尔·布劳德。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共领袖，负责美共与前苏联谍报部门的合作。化名“舵手”。

Browder, Rose: 罗斯·布劳德。美共与克格勃之间的信使。威廉·布劳德的妻子。

Browder, William: 威廉·布劳德。厄尔·布劳德的弟弟，长期担任厄尔·布劳德的助手。与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负责人有过几次会面。

Bugle: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活跃于一九四四年，处于安德鲁·史夫切科的控制之下。安德鲁·史夫切科是克格勃官员，在贝尔飞机公司任检验员。

Bumblebee: 见 *Greenglass, David*。

Burd, Michael: 迈克尔·伯德。“米德兰出口公司”负责人。在克格勃为特工尼古拉斯·菲施和玛丽亚·菲施办理美国过境签证一事上发挥重要作用，并利用其公司为克格勃划转大笔资金。化名“男高音”和“男低音”。

Burns, Paul: 保罗·伯恩。美共秘密武装成员，国际纵队退伍军人。根据美共指示，为克格勃提供据点。后来受雇于前苏联新闻社塔斯社。

Bursler, Norman: 诺曼·贝斯勒。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成

员。美国司法部中级官员。

Butcher: “屠夫”。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活跃于一九四四年。为前苏联情报机关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和航空工业领域寻求录用对象。有可能是史蒂夫·纳尔逊的化名（见附录 B）。

Caliber: 见 Greenglass, David。

Callahan, James: 詹姆斯·卡拉汉。船务公司文员。一九四五年向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提供情报，被认为“值得信任”。

Callen, Sylvia: 西尔维亚·卡伦。三十年代后期及四十年代初期，受美共委托渗透到美国托洛茨基运动组织内部，后来成为索布尔谍报网成员。使用过的姓氏包括“富兰克林”、“科德威尔”和“道克西”。化名“萨塔”。

Carmen: 女性，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间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担任信使，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有可能参与克格勃在拉丁美洲的工作，但一九四四年时身在纽约，克格勃有意派她同美国境内的特工合作。

Carter: 见 Coleman, Eugene Franklin。

Catalyst: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二年十月，前苏联曾考虑是否可以继续利用这条线索。

Cautious: 见 Joseph, Julius J。

Cavalryman: 见 Kurnakov, Sergey Nikolaevich。

Cedar: 见 Perry, Burton。

Cerberus: 美国财政部工作人员，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五年克格勃的电报中指出，此人曾经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后来与军事情报部失去联络，正试图恢复联络。

Char.: 伊丽莎白·本特利谍报网中的一名成员，其姓名被部分破译。美共秘密成员，一九四四年被克格勃接管。从维诺

那计划破译的电文内容来看，此人有可能是查尔斯·弗拉图。

Charlie：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提供过有关中国及其他方面的机密情报。有可能是亚布拉罕·温斯坦（见附录 B）的化名。

Chef：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充当克格勃官员与情报内线之间的信使。

Chen：（1）一九四三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提供过有关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情报及美国国务院对待德国流亡组织的态度。（2）见 Franklin, Zalmond David。

Chester：见 Schuster, Bernard。

Chrome Yellow：见 Brothman, Abraham。

Clemence：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在德国移民和流亡人士中活动，并提供据点。后来曾转换化名“李”。有可能是约翰娜·贝克（见附录 B）的化名。

Clever Girl：见 Bentley, Elizabeth。

Coe, Virginius Frank：弗兰克·库尔。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部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货币基金任领导官员。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成员。化名“山峰”。

Cohen, Lona：劳纳·科恩。美共积极分子，被她的丈夫莫里斯招募为前苏联间谍，一直积极从事间谍活动，包括前往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弹项目基地，从基地内的前苏联间谍那里收集情报。化名“莱斯丽”及“志愿者的妻子”。

Cohen, Morris：莫里斯·科恩。美共积极分子，国际纵队退伍军人，克格勃职业间谍。化名“志愿者”。

Coleman, Eugene Franklin：尤金·富兰克林·科尔曼。电子工程师，秘密美共成员，一九四三年被前苏联海军情报部驻华盛顿情报站录用。化名“卡特”。

Colleague: 见 Joseph, Bella。

Colloms, Anna: 安娜·科洛姆。纽约市学校教师，是克格勃在美国与墨西哥反托洛茨基组织之间的信使。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四年的一封密电中将其称为“A.”，密电中指出，安娜已经从美国到达墨西哥。

Condenser: 见 Richardson, Kenneth。

Constructor: 见 Brothman, Abraham。

Coplon, Judith: 朱迪思·科普朗。秘密共产党人，克格勃潜伏在美国司法部外国机构登记部的间谍，有机会接触到美国反间谍情报。化名“西玛”。

Cora: “考拉”，美共成员，一九四四年被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录用。其丈夫及丈夫的兄弟均为共产党人。依卡·阿米洛夫有意录用此人及其丈夫，想逐步让他们脱离美共的活动，调往另外一个城市为克格勃工作。后来的情形未知。其丈夫的化名是“罗依”。

Cork: 见 Pinsly, William。

Corporant: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对美共及其成员的称谓。

Costra, Louis: 路易斯·科斯特拉。国际纵队退伍军人。其住址被克格勃的一名间谍用作邮寄地址。

Crow: 一九四五年被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录用为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具体情况未知。

Cupid: 一九四四年被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录用为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曾一度为“通讯姑娘”的候选人。所谓“通讯姑娘”，有可能是指杰克·索布尔谍报网的通讯员。又化名“珍妮特”。

Currie, Lauchlin B.: 洛赫林·柯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高级行政助理，曾任多个职务，曾作为总统的特别代表前往中

国，并曾担任外国经济部副部长。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成员，化名“书页”。

Czech：见 Menaker, Robert Owen 以及 Soble Jack。

D.：克格勃一条内线的姓名缩写，曾向克格勃提供曼哈顿项目的情报。

Danilov：见 Mok。

Dasha：见 Wicher, Maria。

Dauber, M.：纽约市“多伯及派恩书店”，是克格勃的投递站。

Daughter：见 Voge, Marietta。

Davis：（1）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2）见 *Long* 和 *Spark*。

Davis, Marion：马里恩·戴维斯。克格勃潜藏在“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的内线。化名“娄”。

Dennis, Eugene：尤金·丹尼斯。美共领导层的高级成员，与战略服务办公室及战争情报办公室中的秘密共产党人组织联络。

Dick：见 Schuster, Bernard。

Dicky：见 Steele, Johannes。

Dinah：见 Kahn, Mrs. Ray (Gertrude)。

Dir：见 Price, Mary Wolfe。

Dodd, William E., Jr.：威廉·多德，群众阵线积极分子。其父亲曾经是罗斯福时期驻纳粹德国大使。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征询莫斯科方面意见，鉴于多德与克格勃的关系，是否可以在前苏联通讯社塔斯社中公开任职。化名“西特西拉”。

Dodger：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特工，真实身份未知，一九

四三年曾提供外交情报。

Donald: 唐纳德美国海军上校，真实身份未知。前苏联海军情报部于一九四三年发出一份密电，列举了与前苏联海军人员有密切联络的美国海军成员，其中确认此人“忠于我们”。无从考证此名为真实姓名亦或化名。

Donald: (1)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三年由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特工艾文·威尔森招募为特工。(2) 见 Ullmann, William Ludwig。

Dora: 见 Silvermaster, Helen Witte。

Douglas: 见 Katz, Joseph。

Drugstore: 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三年被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录用。具体活动未知。

Duggan, Laurence: 劳伦斯·达根。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为克格勃从事间谍工作。从三十年代中至一九四四年担任美国国务院“美洲共和国部”负责人。后来在“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任职。化名“弗兰克”、“王子”和“舍乌德”。

Duke: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好像与战争情报办公室的法国部有关联。

Duya 's son: 杜雅 (Duya, 真实身份未知) 的儿子，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称，此人过去曾经是克格勃间谍。杜雅很可能是个化名。

Dvoichenko - Markov, Demetrius: 迪米特里厄斯·杜沃琴可 - 马可夫。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在阿拉斯加从事美国军事反间谍工作时，弄到一部分书籍与手册交给克格勃。化名“吊钩”。其母尤弗西娜亦为克格勃工作。

Dvoichenko - Markov, Eufrosina: 尤弗西娜·杜沃琴可 - 马

可夫。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负责提供在美国的流亡组织的情报，特别是罗马尼亚人以及她认识的几名国务院雇员的情况。化名“马莎”。

Dziedzic, Frank: 弗兰克·第兹克。国家石油产品公司雇员，曾提供医疗化合物方面的情报。

Eagle: 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六月被克格勃冷藏以备将来利用。具体活动未知。

Echo: 见 *Schuster, Bernard*。

Economist: 克格勃间谍，有可能是渗透到美国托洛茨基运动内部的人。

Egorn: 见 *Einhorn, Nathan*。

Einhorn, Nathan: 内森·艾因霍恩。记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任“美共报业同业工会”纽约分会执行秘书。协助美共与前苏联谍报部门之间的联络。化名“艾根”。

El: 真实身份未知，与身在华盛顿的前苏联非法官员依卡·阿米洛夫一起工作，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汇报。一九四四年十月，化名转为“啤酒”。鉴于此人与阿米洛夫关系密切，而阿米洛夫的妻子海伦·劳里化名“伊莎”(Elsa)，El 或许是劳里化名的缩写。El 的俄文含义是“冷杉”或“云杉”，也是海伦·基南和另外几名真实身份未知的特工的化名。

Eleanor: 一九四三年克格勃海军情报部间谍，据称是弗兰克·格兹格(Frank Gertsog)的女儿。格兹格于一九三四年从俄国移民美国，一九三五年成为美国公民。具体活动未知。

Ellis: 一九四三年前苏联海军情报部驻华盛顿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曾经与所谓的“农业部副部长”共进午

餐，之后将所获得的外交情报提供给海军情报部。其他活动未知。

Elsa：见 Lowry, Helen。

Emilia：见 Stella。

Emulsion：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在军事飞机工业领域从事间谍活动。后来的化名是“信号”。

Engineer：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担心，美国政府已经对该间谍进行监视，并发现他曾经将一批文件交给克格勃最活跃的通讯员之一阿马德奥·萨巴蒂尼。萨巴蒂尼当时居住在西海岸，由此推断，该间谍应该是在西海岸将文件交给萨巴蒂尼，其本人有可能也居住在西海岸。见 York, Jones Orin。

Epstein, Jacob：雅各布·爱泼斯坦。美国共产党人，曾经参加国际纵队。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在克格勃驻墨西哥城情报站工作，试图将刺杀托洛茨基的凶手从墨西哥监狱中解救出来，但未能成功。化名“哈里”。

Erie：见 Ernest。

Ernest：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从事科技间谍活动，有可能是一名科学家。化名“伊利人”。

Ernest 或 *Ernst*：一九四三年前苏联海军情报部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具体活动未知。

Expert：见 Brothman, Abraham。

Express Messenger：见 Setaro, Ricardo。

Fahy, Jack Bradley：杰克·费伊。曾经在“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经济战委员会”及“内务部”工作。化名“马克斯威尔”。

Fakir: 法克，是一个化名。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克格勃电文中指出，此人曾将国务院的材料提供给克格勃，并且正在考虑代表某个机构前往莫斯科，但也有可能在美国的杂志社任职。另一个化名是“阿诺德”。克格勃的一份密电中提到从“阿诺德所在部门的统计分部”的一名“官员”那里得到情报，可见法克/阿诺德有可能在政府部门工作。

Fan: 一九四二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负责提供审核报告。

Farish, Linn Markley: 林·法拉什。共产党人，战略服务办公室官员，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势力联络，克格勃间谍。化名“阿提拉”。

Farley: 法利。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从战争部的战争生产委员会窃取情报。

Farmhand: 克格勃技术情报专家，据称一九四四年曾前往新英格兰的一家工厂，并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Fellowcountryman: 同胞，克格勃对美共成员的统称。不过，在克格勃一九四四年发出的两份密电中曾用此化名特指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的某一名间谍，其真实身份未知。

Ferro: 见 Petroff, Aleksandr N.

Fighter: “斗士”。一九四二年被招募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负责提供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移民的情况以及调查美国记者对苏维埃的看法。有可能是艾伯特·卡恩的化名（见附录 B）。

Fin: 见 Petroff, Aleksandr N.

Fir (或 *Spruce*): 见 Keenan, Helen Grace Scott.

Fitzgerald, Edward J.: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珀洛组织成员。在战争生产委员会工作。化名“泰德”。

Flato, Charles: 查尔斯·弗拉图。珀洛组织成员。任职经济战委员会。

Flora: 弗洛拉。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内线，提供有关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的情报。

Fogel: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提供曼哈顿项目的科技情报，极有可能是名科学家，另外一个化名是“波斯”。

Folkoff, Isaac: 艾萨·弗考夫。加利福尼亚州共产党组织高级人物，西海岸克格勃与美共之间的联络人，负责与多条前苏联内线的通讯往来，负责发掘间谍人选并对候选人的背景进行调查。领导几名下属间谍。化名“叔叔”。

Foster, Jane: 简·福斯特。秘密共产党人，一九四二年任职经济战委员会，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七年任职战略服务办公室印度尼西亚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杰克·索布尔领导的前苏联谍报网成员。化名“俚语”。

Frank: 见 *Duggan, Laurence* 及 *Moosen, Arthur*。

Franklin, Zalmond David: 扎蒙德·富兰克林。美共成员，克格勃间谍，一九四四年被冷藏。曾与西尔维亚·卡伦结婚。化名“陈”。

Fred: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负责协调奥地利事务，但具体在哪一部门未知。有可能曾任职，又或是与战争情报办公室有过密切联系。

Friend: 见 *Lange, Oskar*。

Frost: 弗罗斯特，化名“冰霜”。见 *Morros, Boris Mikhailovich*。

Gallardo, Isabel: 伊沙贝尔·加德勒，智利人，与一名美国船长劳伦·黑（Lorren Hay）结婚。为克格勃开展的与智利有关的任务工作。

Gebert, Boleslaw K.: 博尔斯罗·格伯特。共产党工会组织委员，是波兰裔美国人亲共产主义活动的领袖。是“国际工人组织波兰社团”的官员。化名“阿塔曼”。

Gel: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记者，一九四三年在一家新闻社工作，但具体名称未知。

George, Harrison: 哈里森·乔治。美共高级官员，主编西海岸报纸《人民世界》。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有意正式录用一位间谍人选，乔治负责确认此人对共产主义是否忠诚。

Getzoff, Rebecca: 丽贝卡·盖佐夫。克格勃间谍，参与反托洛茨基活动。化名“亚当”。

Girl Friend: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被克格勃冷藏。

Glasser, Harold: 哈罗德·格拉瑟。珀洛组织成员，经济学家，任职财政部，化名“卢布”。

Glory: 见 Wolston, Ilya Elliott。

Gnome: 见 Perl, William。

Godmother: 戈德马瑟。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曾提供外交情报。

Gold, Bela (William): 贝拉·（威廉）戈尔德。西尔夫马斯特情报组织成员，先后任职“参议院战争动员小组委员会”以及外国经济部下属经济计划办公室。索尼亚·戈尔德的丈夫。化名“橡树”。

Gold, Harry: 哈里·戈尔德。三十年代中被招募为前苏联

间谍，在美国从事工业谍报活动。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最活跃的通讯员，并负责同几名下属特工联络。化名“鹅”，“阿诺德”。

Gold, Sonia Steinman: 索尼亚·戈尔德。西尔夫马斯特情报组织成员，曾任职财政部货币研究部。威廉·戈尔德的妻子，化名“索尼亚”。

Golos, Jacob: 约各布·格罗。美共高级元老，美国政府部门内部的多个秘密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人。他通过其领导的共产党武装获取情报，提供给前苏联，并负责为前苏联发现和招募间谍，是克格勃与美共领导层之间的联络人。化名“声音”。

Goose: 见 Gold, Harry。

Gorchoff, George: 乔治·戈尔乔夫。一九四三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化名“加斯塔夫”。

Gordon, L.: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据称是一位女性，前美共官员。很有可能是美共在俄亥俄州官员路提·戈尔德。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有意安排此人担任其在纽约市的一个间谍组织的负责人，并向此人定期提供报酬。

Green: 格林。曾经将维克托·克拉切科背叛前苏联的情报提供给克格勃。曾担任“保护外国出生人士美国委员会”执行主席。

Greenglass, David: 戴维·格林格拉斯。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由他的妻子鲁思·格林格拉斯以及姐姐埃塞尔·罗森堡、姐夫朱利叶斯·罗森堡招募为前苏联间谍。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曼哈顿项目基地任机师。化名“熊蜂”，“内径”。

Greenglass, Ruth: 鲁思·格林格拉斯。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被埃塞尔·罗森堡和朱利叶斯·罗森堡招募为前苏联间谍，并协助其丈夫进行谍报工作。化名“黄蜂”。

Growth：见 Odessan。

Gustav：见 Gorchoff, George。

Gymnast：克格勃对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的统称。

Hall, Theodore Alvin：西奥多·霍尔。哈佛大学年轻的物理学家，共产党人，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曼哈顿项目基地工作。主动要求为克格勃工作，是前苏联在原子领域的重要情报来源。化名“小伙子”。

Halperin, Maurice：莫里斯·霍尔珀林。秘密共产党人，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担任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门拉丁美洲组的负责人，并在此期间成为克格勃间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在国务院担任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化名“野兔”，“偷渡者”。

Hare：见 Halperin, Maurice。

Harold：哈罗德。一九四四年五月，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曾向莫斯科方面申请完成对此人的录用手续。

Harris, Kitty：基蒂·哈里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格勃驻墨西哥城情报站间谍。出生于英国，后随家人经加拿大到达美国，与美共有着密切联系。一九二三年加入美共，二十年代末为共产国际工作，后来转入克格勃工作。化名“阿达”。

Harry：见 Epstein, Jacob。

Havre：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的化名，为英国情报机关驻美国的“英国安全协调部”工作。克格勃报告中称，此人曾提供有关捷克流亡政府的情报，并且负责与“英国安全协调部”的另外一名克格勃特工锡德里克·贝尔弗雷奇（Cedric Bel-frage）联络。“Havre”究竟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不得而知。

Hedgebog：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通信员，真实身份未知。

Helmsman：见 Browder, Earl。

Henry: 见 Malisoff (Malisov), William Marias。

Henwood, William: 威廉·亨伍德。加利福尼亚州标准石油公司工程师。出生于南非，后来成为美国公民。专门负责西海岸共产党组织与前苏联情报机关联络的美共成员艾萨·弗考夫于一九四四年将此人介绍给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

Hiss, Alger: 阿尔杰·希斯。美国高级外交官，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重要间谍成员。化名“阿列斯”。

Hook: 见 Dvoichenko - Markov, Demetrius。

Horus: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任职于战略服务办公室。

Horvitz, Louis D.: 路易斯·霍维兹。美共秘密武装成员，国际纵队退伍军人，根据美共的指示为克格勃提供安全据点。

Hudson: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另有化名“约翰”。其活动包括参与克格勃的“前线”工作（即情报工作），在犹太组织及犹太复国组织中安插前苏联内线，并与多名前苏联内线联络。

Hughes: 见 Sarant, Alfred Epaminondas。

Huron: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从事科技谍报活动，有可能是一名科学家。有可能是布鲁诺·普特科夫 (Bruno Pontecorvo) 的化名。

I.: (1)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从事科技谍报活动，有可能专注石油领域，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克格勃称此人的同事暂时不让他从事谍报工作，不过此人仍然“对苏维埃忠心耿耿”。(2) 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五年曾将战略服务办公室发出的电报提供给前苏联，内容涉及战略服务办公室在南斯拉夫的运作情况。

Iceberg: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将美

国飞机在亚洲的情况提供给前苏联。

Ide: 见 *Drafsur, Samuel*。

Informer: 见 *Katz, Joseph*。

Ipatov: 克格勃驻芝加哥情报站联络人，真实身份未知。

Isaak, Rosa: 罗斯·艾萨卡。女性，“美俄学院”执行秘书。一九四五年通知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她有意辞去这一职位，并中断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联系。

Ivanov: 见 *Scott, John*。

Ivanova: 伊万诺娃，女性，克格勃间谍，任职战争情报办公室法国部。有可能是外来移民，一九四三年成为美国公民。

Ivy: 见 *Joseph, Emma Harriet* (附录 D)。

Izra: 见 *Wheeler, Donald Niven*。

Jack: 一九四三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曾提供美国试验导弹的情报及海运货物的情报，并负责对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有意招募的候选人进行背景核查。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与美共之间的联络人。

Jacob: 见 *Perl, William*。

Jacobson, Herman R.: 赫尔曼·雅各布森。“艾维里制造公司”雇员，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工作。化名“S-I”。

Jean: 见 *Setaro, Ricardo*。

Jeanne: 见 *Krotkova, Christina*。

Jeannette: (1) 见 *Cupid*。(2) 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联络人，真实身份未知。

John: 见 *Hudson*。

Johnny: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三年曾向前苏联提供长达一百五十页的技术报告。

Joseph, Bella: 贝拉·约瑟夫。秘密共产党人，任职战略服务办公室电影部。朱利叶斯·约瑟夫的妻子。化名“同事”。

Joseph, Julius J.: 朱利叶斯·约瑟夫。秘密共产党人，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在战略服务办公室远东部（即日本情报部）工作。化名“谨慎”，其妻子亦为战略情报办公室工作。

Julia: 朱莉娅。依卡·阿米洛夫的联络人，克格勃非法官员，一九四四年的一份密电中提到，此人曾与克格勃失去联络多年，一直居住在纽约，靠富有的父亲提供的资产生活。

Jupiter: 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

Jurist: 见 White, Harry Dexter。

Kahn, Mrs. Ray (Gertrude): 雷·卡恩，女性，由莫斯科方面提议从事间谍工作。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认为此建议并不明智，应避免过于频繁地利用此人。

Kant: 见 Magdoff, Harry Samuel 和 Zborowski, Mark。

Karl: 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是名科技间谍，且有可能是美共地下武装成员。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曾经致电莫斯科总部，称此人将一批材料交给厄尔·布劳德，要求莫斯科方面指示，是否可以收取这批文件。

Karr, David: 戴维·卡尔。记者，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

Katz, Joseph: 约瑟夫·卡茨。克格勃最活跃的美国间谍，为前苏联的多条情报内线担任通信员，对前苏联有意招募的间谍候选人进行背景审核，并负责传送克格勃和美共领导人之间的往来信件。化名“线人”、“道格拉斯”和“X”。

Keen: (1) 见 *Wicher*, *Enos Regent*。(2) 见 *Osprey*。

Keenan, *Helen Grace Scott*: 海伦·基南。最初是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后来成为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间谍。一九四五年在“战争罪犯审判委员会”美国负责人办公室工作。化名“冷杉”(或“云杉”)。

Keeney, *Mary Jane*: 玛丽·简·基尼。秘密共产党人，一九四〇年被招募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间谍(其丈夫亦为军事情报部间谍)。曾任职“经济战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合国工作。一九四五年成为克格勃成员。

Keeney, *Philip Olin*: 菲利普·基尼。秘密共产党人，一九四〇年被招募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间谍(其妻子亦为军事情报部间谍)。一九四一年任职“情报协调办公室”(即后来的战略服务办公室)。一九四五年成为克格勃成员。

Khan: “坎”。克格勃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是前苏联克格勃官员与克格勃内线之间的联络人。由此人负责联络的克格勃内线中，很多人是美共的少数人种活动中的积极分子(艾伯特·卡恩、伯斯罗·格伯特、尤弗西娜·杜沃琴可·马可夫)。有可能是美共负责少数人种工作的官员阿夫伊姆·兰迪的化名。

Khan's wife: 克格勃间谍“坎”的妻子。克格勃曾经招募一名芬兰裔美国女人充当谍报人员，但是由于该人对斯大林的清洗政策持怀疑态度，克格勃决定放弃启用这名谍报人员，并由“坎”的妻子负责监视。

Khazar: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美国公民，有可能是南斯拉夫血统。曾经将战略服务办公室派驻被占领的南斯拉夫人员情报提供给前苏联。至于其本人是否为战略情报办公室服务，不得而知。

Khe...: 见 *Miller*, *Floyd Cleveland*。

Kinsman : 见 *Solid*。

Klara : 见 *Stridsberg, Augustina*。

Klo : 见 *Rand, Esther Trebach*。

Koch : 见 *Lee, Duncan Chapin*。

Koral, Alaxander : 亚历山大·科罗。美共成员，与其妻子一起为克格勃充当通信员。化名“勃格”。

Koral, Helen : 海伦·科罗。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协助克格勃非法官员依卡·阿米洛夫工作，并接受薪金。化名“米”。

Krafsur, Samuel : 塞缪尔·克拉夫瑟。美共成员，国际纵队退伍军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前苏联塔斯社记者。克格勃曾利用此人在美国记者中培养力量，为克格勃招募间谍。化名“艾德”。

Kramer, Charles : 查尔斯·克雷默。珀洛组织成员。经济学家，曾任职“参议院战争动员小组委员会”及“价格控制办公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任职“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化名“丰”、“鼠”。

Krotkova, Christina : 克里斯蒂娜·克洛科娃。克格勃间谍，任职战争情报办公室。主要工作是针对前苏联叛徒维克托·克拉切科。化名“珍妮”、“奥拉”。

Kurnakov, Sergey Nikolaevich : 瑟奇·库纳科夫。曾经是俄国沙皇骑兵队军官，后移民美共并成为共产党人。负责监视俄国移民，充当多名前苏联内线的通信员以及为前苏联招募适合的间谍人选，并对候选人进行背景调查。化名“骑兵”、“贝克”。

Kurt : 见 *Plucky*。

Laird, Stephen : 斯蒂芬·莱尔德。新闻广播员，记者，电

影制造人，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任克格勃间谍。化名“云”。

Lambert, Rudolph Carl: 鲁道夫·兰伯特。加利福尼亚共产党工人运动领袖以及党组织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维诺那计划曾部分地破译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发出的一份密电，电文中提到兰伯特的名字，电文内容涉及美国西海地区的铀矿资源。

Lange, Oskar: 奥斯卡·兰格。波兰移民，后成为美国公民，支持亲苏维埃的波兰政府，并且在持这一政见的美国势力中极具号召力。化名“朋友”。

Laszl: 一九四三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据称是军事情报部约瑟夫·伯恩斯坦的朋友。没有资料显示此名是真名实姓亦或是化名，亦无从判断此人是否了解自己正在从事间谍活动。

Lava: 见 Schultz, Marion Miloslavovich。

Lawyer: 见 White, Harry Dexter。

Lee: 见 Clemence。

Lee, Duncan Chapin: 邓肯·李。战略服务办公室国家官员，是战略服务办公室负责人威廉·多诺万的助理，并曾被派往中国。通过美共的秘密网络为克格勃服务。化名“考哈”。

Lens: 见 Sidorovich, Michael。

Leona: 利昂娜，女性，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曾向战争情报办公室求职。其丈夫有可能就职于纽约一主要广播电台，并对妻子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的联系有所了解。此人的具体活动未知。

Leshing, Michael S.: 迈克尔·莱星。“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实验室主管。一九四三年曾将制造彩色电影及其他胶片冲

印技术提供给前苏联。

Lesley: 见 Cohen, Lona。

Levanas, Leo: 利奥·利瓦纳斯。壳牌石油公司化学家。在与克格勃的一位特工谋面之后，主动要求与驻旧金山情报站负责人见面，希望有机会“帮助我们”。化名“阿尔玛”。

Levenson, L.: L. 利文森。纽约市“电子物理实验室”工作人员，充当克格勃的投递站。

Levi: 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曾提供政治情报。此名有可能是真实姓名。

Lewis (Luis, 或 Louis): 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二年被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招募为间谍。阿尔弗雷德·斯特恩的化名与此名相同，但无法确认是否是同一人。在维诺那计划朋友的密电中，有另外一位以此名出现的人物也参与克格勃在拉美情报站的工作。

Libau, Morris: 莫里斯·里鲍。德国移民，一九四四年主动找到前苏联情报机关，并提供东部前线的情报。克格勃将此线索交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

Liberal: 见 Rosenberg, Julius。

Lidia (Lydia): 见 Altschuler, Lydia。

Lily: 见 Olkhine, Eugenie。

Link: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有可能任职军事部门，但极有可能任职战略服务办公室。根据克格勃一九四三年发出的一份密电，此人曾刚刚结束在意大利的培训，正在休假，即将被派往英国。（克格勃方面准备了接头暗语以便此人到达英国后与驻英国的克格勃官员接触）。一九四四年，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的劳纳·科恩提供情报。劳纳·科恩本人也是

克格勃间谍。此人有可能就是威廉·韦班。

Lira：见 Strong, Anna Louise。

Liza：“丽莎”。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任职战争部，是弗拉迪米尔·波兹那的秘书，并担任波兹那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

Liza：见 Stern, Martha Dodd。

Loesh：洛什。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间谍，真实身份未知。

Long：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其间谍身份始于一九四一年，甚至更早，其前苏联上级是盖卡·奥瓦金米安。一九四一年，奥瓦金米安被捕，此人与克格勃失去联络，直到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才通过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里夫（Aleksandr Raev）与此人恢复联络。里夫报告，此人惶惶不可终日，不过他接受了克格勃提供的五百元酬劳，并且要求克格勃提供更高的酬劳。另外一个化名是“戴维斯”。

Lot：见 Kramer, Charles。

Lou：见 Davis, Marion。

Louis：见 Stern, Alfred Kaufman。

Lowry, Helen：海伦·劳里，克格勃驻美国机构负责人、非法官员依卡·阿米洛夫的妻子，担任阿米洛夫与克格勃之间的通信员。

Lynch：林奇。根据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一九四三年发出的一份密电，此人曾与“战争生产委员会”的副主席会面，并将此次会面的情况提供给克格勃的一位官员。未知此人是否了解自己在从事间谍活动，亦未知此名究竟是真实姓名亦或是化名。

Lyuba：女性，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与美共有若干联系。一九四四年时身在纽约，并

准备回国生活，不过，要视克格勃派给她的任务而定。

Mabel：一九四三年前苏联海军情报部间谍，真实身份未知。

Mackey, William：威廉姆·麦基。俄勒岗州波特兰市居民，为高级共产党人、美共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艾萨·弗考夫工作，具体工作内容未知。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有意将其作为直属间谍。

Magda：女性，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与多名记者及《时代》杂志有联系。

Magdoff, Harry Samuel：哈里·马道夫。珀洛组织成员，任职“战争生产委员会”。化名“砍特”。

Malisoff (Malisov), William Marias：威廉·马里索夫。克格勃间谍，在纽约开办自己的公司“联合实验室”。化名“天才”和“亨利”。

Map：化名“地图”，女性，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担任克格勃官员与多条情报内线之间的联络人。有可能是路易丝·布兰斯坦（见第八章）的化名。

Margarita：玛格丽塔，女性，克格勃间谍，出生于美国，父母是芬兰移民，一九三三年随全家移民苏维埃的卡累利阿。曾在苏维埃控制的英文报纸《莫斯科每日新闻》工作。回到美国后，曾先后任职美国战时邮政及新闻审查办公室及“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克格勃通过约瑟夫·卡茨与此人建立联系。此人虽然持亲苏维埃观点，但是在苏维埃清洗运动中，定居在卡累利阿的大批芬兰裔美国人被关进监狱，甚至被枪毙，此人对于克格勃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有鉴于此，克格勃决定

不再启用此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认为，此人与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有过联络，将其视为安全隐患。由于此人的哥哥是红军队员，在战争中负伤，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因此建议莫斯科方面利用其兄长写信，将此人引诱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纽约情报站还指出，“这将是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案”，其含义在于，此人一旦回到前苏联，将因为表达过反苏维埃言论而被捕入狱。不过，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最终还是认为此人对于苏维埃依然忠心耿耿，因而没有采取这一极端行动。此人的谍报活动被中断，并被置于监视之下，以防止其向美国政府投诚。

Mark：马克。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负责提供犹太组织、犹太复国组织、欧洲社会民主党及社会党流亡人士的情报。有人认为，此人的真实身份是梅纳什·昂格尔，即“犹太作家、艺术家及科学家美国委员会”主席。一九四四年，此人被克格勃冷藏。

Marquis：见 Bernstein, Joseph Milton。

Masha：见 Dvoichenko - Markov, Eufrosina。

Master (Master Craftsman)：见 Sheppard, Charles Bradford。

Mateo：克格勃间谍，为克格勃驻墨西哥城情报站工作，真实身份未知，负责安排假身份证件，协助有关人员往返美国与墨西哥之间。至于此人是美国人，亦或是墨西哥人，不得而知。

Matvey：见 Schwartz, Milton。

Max：一九四三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间谍，真实身份未知。

Maxwell：见 Fahy, Jack Bradley。

Mayor：见 Akhmerov, Iskhak Abdulovich。

Menaker, Robert Owen: 罗伯特·欧文·美纳克。克格勃间谍，参与克格勃在美国及拉丁美洲的活动。

Meri: 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所从事的活动未知，但有证据显示，此人与美共关系密切。

Meter: 见 Barr, Joel。

Miller, Floyd Cleveland: 弗洛伊德·克利夫兰·米勒。克格勃的重要间谍之一，潜伏在美国托洛茨基运动内部，曾用名迈克·库特。

Miller, James Walter: 詹姆斯·沃特·米勒。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间谍，经由美共的艾萨·弗考夫招募为间谍。曾就职美国战时邮政审查办公室。化名“含糊”。

Mins, Leonard Emil: 伦纳德·明斯。秘密共产党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间谍，任职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俄国组。化名“史密斯”。

Mirage: “梦想”。一九四三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曾任职国务院，又或是能够接收国务院颁布的文件的政府部门。曾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外交活动情报提供给前苏联。此人有可能是查尔斯·帕奇。

Mirage's wife: “梦想”的妻子。克格勃曾经对一名美国记者产生兴趣，“梦想”的妻子将该名记者即将前往瑞典出差的情报提供给克格勃。有可能是查尔斯·帕奇的妻子玛丽·帕奇，任职邮政审查办公室。

Miranda: 见 Koral, Helen。

Mitron: 一九四三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

Mitynen, Francia Yakilnilna: 弗朗西斯·亚克尼娜·米第能。前苏联海军情报部非法官员，一九四三年非法进入美国，在美停留至一九五六年，其间用名伊娜·玛格丽特·帕特森。化名“萨丽”、“澳大利亚女人”。

Mok: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人员，利用假身份活动。一九四三年从美国返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具体活动未知。此人有可能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官员弗拉迪米尔·加维里洛克 (Vladimir V. Gavrilyuk)。克格勃密电中曾提及此人被调离美国一事。

Mole: 见 Kramer, Charles。

Moosen, Arthur: 阿瑟·穆森。一九四三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化名“弗兰克”。

Morkovin, Vladimir Borisovich: 弗拉迪米尔·马克温。贝尔飞机公司航空工程师，曾将技术情报提供给同在贝尔公司担任检验员的克格勃特工安德鲁·史夫切科。史夫切科对此人的评价是谨慎，对苏维埃持友好态度，但并不知道史夫切科的前苏联谍报官员身份。化名“作家”。

Morros, Boris Mikhailovich: 鲍里斯·莫罗思。俄国移民，好莱坞制作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双料间谍。

Muse: 见 Tenney, Helen。

Musician: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

Myrna: 见 Bentley, Elizabeth。

Napoli, Nicola: 尼古拉·内波里。“阿特奇诺公司”总裁。该公司发行俄国电影。此人负责将美共的信息传递给克格勃的一名特工，将有意联络克格勃的人员情况提供给克格勃。

Nat: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美共在旧金山地区组织的领导人物。此人有可能是纳特·亚尼施 (Nat Yanish)。

Needle: 见 York, Jones Orin。

Nelly: 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就职于美国租赁内阁。

Nemo: 见 Pinsky, William。

Neumann, Franz: 弗朗茨·纽曼。克格勃内线，就职于战略服务办公室。

Nick: 见 Sabatini, Amadeo, 或 Velson, Irving Charles。

Nile (或 *Neil*, 又或 *Nearle*):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最初阶段，此人将情报提供给美共，再由美共转交克格勃。后来，此人有可能成为罗森堡组织成员。

Nina: 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

NN-32: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后其谍报活动被中断。曾受克格勃之委任充当投递站，接收来自西班牙的信件。有证明显示，此人与国际纵队有关。

Noah: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曾向克格勃提供美国对德国内部政治情况的分析报告，被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评为是“极具价值”的情报。

Noise: 见 Splint。

Nona: 见 Wilson, Ruth Beverly。

Octane: 真实身份未知，与克格勃的科技情报官员塞姆扬·塞米诺夫有联络。活跃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

其谍报活动有可能从一九三九年就已经开始。

Odessan：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从事科技谍报活动，并从事商业活动，营运资金由克格勃提供。亦化名“增长”。

Okho（有可能是 *Ojo*，即西班牙文的“眼睛”）：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曾提供有关战略服务办公室的情报。

Ola：见 *Krotkova, Christina*。

Old（或 *Oldster*）：见 *Sax, Saville*。

Olkhine, Eugenie：尤金·奥凯恩。女性，克格勃间谍。曾与克格勃失去联系，一九四五年，克格勃设法与其重新恢复联络。此人出生于美国，其父亲是俄国人。克格勃方面有意委派其打入联邦调查局。此人负责向克格勃提供俄国移民的情况，克格勃应允帮助其获得苏维埃公民身份。

Olsen：奥尔森。一九四四年曾向克格勃的一名特工提供介绍信，协助该名特工联络美共的培养对象，同时又是曼哈顿项目中的一名科学家。有证据显示，奥尔森是伊利诺斯州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因此，此人有可能就是一九四四年担任伊利诺斯州美共负责人的莫里斯·切尔德。

Olsen, Rose：见 *Phlox*。

Oppen：奥本。一九四三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负责提供美共军事技术情报，并协助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招募新人。

Original (Odd Fellow)：见 *Jupiter*。

Orloff, Nicholas W.：尼古拉斯·奥洛夫。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俄国移民，曾经是沙皇贵族。负责提供俄国移民组织的情报，并负责物色间谍人选，克格勃则定期向其提供酬

劳。一九四四年，克格勃汇报，此人正在申请美国公民身份，并希望在战略服务办公室或美国国务院中谋求职位。此人的妻子出生于美国，他向妻子表示，已经与前苏联情报机构断绝一切关系，以防止其妻向美国政府告发。根据战略服务办公室的记录，此人在一九四四年中成为美国公民，随即向战略服务办公室申请职位，其本人的优势在于精通欧洲数国语言，并曾在欧洲居住多年。不过，根据记录，此人的求职申请有可能遭到拒绝。

Osipov: 见 Orloff, Nicholas W.。

Osipovich, Nadia Morris: 莫里斯·奥赛波维奇。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间谍。美国公民，但居住在波兰。

Osprey: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从一九四四年开始享受克格勃月薪。

Padva's wife (Padua's wife): “Padva”的妻子。“Padva”于一九四四年前往前苏联领事馆与克格勃官员见面，提出他的妻子曾经与另外一名克格勃官员有过联络，并且有一批材料想交给前苏联方面。

Page: 见 Currie, Lauchlin B.。

Painter: 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负责纽约的一个谍报网络。

Pal: 见 Silvermaster, Nathan Gregory.。

Patriarch: 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常有一些人表示愿意为克格勃工作，此人的职责之一就是提供这些人的背景资料，尤其是其中在美国商船上担任海员的个人背景。

Peak: 见 Coe, Virginius Frank.。

Perch: 见 Tkach, Mikhail.。

Perl, William: 威廉·珀尔。航空科学家，从事高科技含量的军事项目，特别是喷气式飞机的研制项目。罗森堡谍报网成员。

Perlo, Victor: 维克托·珀洛。珀洛组织负责人。本人是一名经济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就职“价格控制办公室”下属的“国防顾问委员会”，后来就职“战争生产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职财政部的货币研究部。化名“袭击”。

Perry, Burton: 伯顿·佩里。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间谍。负责测试雷达导航导弹，一九四四年将所了解的技术细节提供给前苏联。

Pers (Persian): 见 Fogel。

Peter: 见 Black, Thomas Lessing。

Petroff, Aleksandr N.: 亚历山大·佩特罗夫。克提斯莱特飞机公司雇员，曾提供飞机生产方面的情报。

Phil: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联络特工，一九四三年负责美国军事部门内部间谍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门之间的联络，真实身份未知。

Philip: 一九四六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的联络人，曾与克格勃官员及美共在西海岸的高级官员见面，真实身份未知。

Philosopher: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在美国战争情报办公室法语部工作。

Phlox: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与美共之间的联络人，女性，驻扎芝加哥。克格勃方面有意将曼哈顿项目中的一名高级科学家招募为间谍，此人曾试图接近该名科学家。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曾提到此人，用名是罗斯·奥尔森，很可能是此人

在美共内部的用名。此人有可能是杰克·切尔德或莫里斯·切尔德的妻子。

Phlox's husband: *Phlox* 的丈夫。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告知莫斯科，有意将曼哈顿项目中的一名高级科学家招募为内线，并希望利用此人接近该名科学家。此人有可能就是美共地下组织干事杰克·切尔德，或是杰克的兄长，伊利诺斯州共产党组织负责人莫里斯·切尔德。

Pillar: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具体活动未知。其联络人是克格勃高级官员帕维尔·喀拉林。喀拉林返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后，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未能确定替代人选。

Pilot: 见 Ullmann, William Ludwig。

Pinsky, Paul: 保罗·品斯基。加利福尼亚州共产党工会组织官员。克格勃有意利用此人接近为曼哈顿项目工作的一名科学家。

Pinsly, William: 威廉·品斯利，纽约克提斯莱特飞机公司雇员，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化名“软木塞”及“尼莫”。

Plato: 见 Pozner, Vladimir Aleksandrovich。

Plourde, William Alfred: 威廉·阿尔弗雷德·普鲁德。纽约贝尔飞机公司工程师，一九四四年与克格勃有联络。

Plucky: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为克格勃工作四年，但只有一份报告中清楚地涉及此人的谍报工作，其内容有关比萨拉比亚移民的情况。另有化名“库尔德”。

Plumb: 见 Kramer, Charles。

Pozner, Vladimir Aleksandrovich: 弗拉迪米尔·亚历山大洛

维奇·波兹那。俄国移民，在美国战争部电影局的俄国部门任负责人。化名“普拉登”。

Pratt, Gertrude: 格特鲁德·普拉特。“反法西斯主义学生委员会”积极分子。一九四三年，克格勃建议利用此人收集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背景资料。

Price, Mary Wolfe: 玛丽·普赖斯。美共秘密武装成员，一直处于约各布·格罗的领导下，后来被克格勃接管。曾担任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的秘书，并负责担任多名前苏联内线的通信员。化名“迪尔”。

Prince: 见 Duggan, Laurence。

Purser: 曾经是克格勃内线，但是加入美国海军之后，与克格勃失去联络。

Quantum: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三年六月曾向克格勃提供有关曼哈顿项目的高级科技情报。此人有可能是名科学家。

R.: 见 Witczak, Ignacy。

Raider: 见 Perlo, Victor。

Rand, Esther Trebach: 埃斯特·兰德。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负责刺探犹太复国运动的情报，是索布尔谍报网成员。化名“艾达”和“克洛”。

Randolph: 一九四三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在纽约工作，但频繁前往华盛顿。此人有可能是一名记者，所提供的情报包括从政界及政府要人以及从知名记者那里获得的信息。

Ray: 见 Karl。

Redhead: 真实身份未知。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一九四四年密电中曾提到此人，早在一九四〇年甚至更早之前便与克格

勃官员依卡·阿米洛夫相识。有可能是海蒂·马兴（见附录 B）的化名。马兴在一九三六年担任克格勃在美国的一个谍报网的负责人时曾使用过相同的化名。

Reed: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曾经居住在华盛顿。

Relay: 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为前苏联的多条内线充当通信员。据称居住在费城，装有假肢。后来曾使用化名“塞伯”。

Rhodes, Peter: 彼得·罗兹。记者，曾任职“外国广播监控服务部”、伦敦的“盟军军事总部”所属的“心理战争部”以及战争情报办公室。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通知莫斯科总部，罗兹原先一直透过美共组织与克格勃联络，但是后来这条线索中断，美共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建议重新建立这条线索。

Rich, Stephan: 斯蒂芬·里奇。一九四三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化名“桑迪”。

Richard: 见 *Borrow, Robinson* 及 *White, Harry Dexter*。

Richardson, Kenneth: 肯尼思·理察森。世界电子公司雇员，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提供科技情报。化名“冷凝器”。

Rit: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被另外一名谍报人员替代。

Robert: (1) 一九四五年任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在克格勃列举的招募名单中有此人的名字，该名单上的所有人员均在美国国务院有各自的内线。鉴于此人已经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间谍，克格勃莫斯科总部要求纽约情报站不要打此人的主意。(2) 见 *Silvermaster, Nathan Gregory*。

Rodman, Samuel Jacob: 塞缪尔·罗德曼。记者，曾经为“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一九四四年，克格勃在美共的联络人报告，罗德曼将代表“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前往南斯拉夫，美共方面已经安排他在南斯拉夫期间收集情报并执行任务，具体任务内容未知。

Roman: 见 Soblen, Robert。

Rosenberg, Allan: 艾伦·罗森堡。珀洛谍报组织成员，任职“经济战委员会”/“外国经济部”。

Rosenberg, Ethel: 埃塞尔·罗森堡。共产党人，朱利叶斯·罗森堡的妻子。克格勃的密电中显示，此人对其丈夫的谍报活动了如指掌，并协助将其弟弟及弟妹戴维及鲁思·格林格拉斯招募为间谍。一九五三年，罗森堡夫妇被判间谍罪处死。

Rosenberg, Julius: 朱利叶斯·罗森堡。工程师，秘密共产党人，招募并组建以工程师为主的谍报网，该谍报网中的大部分工程师成员均为秘密共产党人，负责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搜集军事科技情报。一九五三年，朱利叶斯·罗森堡与妻子被判间谍罪处死。化名“触角”和“自由”。

Ruble: 见 Glasser, Harold。

Rudi: 一九四三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担任前苏联多条内线，包括位于加拿大的内线的负责人，负责与美共的直接沟通。有可能是鲁迪·贝克的化名。

Ruff: 见 Neumann, Franz。

S - 1: 见 Jacobson, Herman R.。

S - 2: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根据克格勃一九四五年发出的密电，此人为女性，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有可能与赫尔曼·雅各布森有联络。

S - 8: 一九四五年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

未知。

Sabatini, Amadeo: 阿马德奥·萨巴蒂尼。美共成员，国际纵队退伍军人，是克格勃最活跃的通信员及联络人之一。克格勃负担此人的交通费及生活费，并每月向其妻支付薪金。此人居住在加利福尼亚，主要在西海岸执行任务。化名“尼克”。

Sachs: 见 Adler, Solomon。

Sally: 见 Mitynen, Francia Yakilnilna。

Sam: 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间谍，据称是伯顿·佩里的弟弟，并说服佩里将雷达导航导弹的资料提供给前苏联。

Sandi: 见 Rich, Stephan。

Sarant, Alfred Epaminondas: 阿尔弗雷德·萨兰特。秘密共产党人，工程师，罗森堡谍报网成员，在新泽西州美国陆军信号特种部队蒙莫斯堡的实验室从事军事雷达方面的工作。化名“修斯”。

Satir (Satyr): 见 Callen, Sylvia。

Sax Saville: 萨维尔·萨克斯。哈佛大学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与西奥多·霍尔同住一间公寓。担任霍尔与克格勃之间的通信员。化名“老家伙”。

Schultz, Marion (Marian) Miloslavovich: 马里恩·舒尔兹。俄国移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负责从移民中刺探情报，在费城船厂任机师，担任“援救祖国俄国人联合委员会”负责人。化名“拉瓦”。

Schuster, Bernard: 伯纳德·舒斯特。纽约共产党组织负责内部安全的武装官员，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与美共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联络人，同时为克格勃工作，包括对克格勃有意招募的人选进行背景调查，安排美共成员担任克格勃通信员。曾使用的化名包括“切斯特”（在党内的用名）、“回音”、“迪克”以

及“索斯”。

Schwartz, Milton: 米尔顿·施瓦茨。一九四三年任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其工作性质未知，不过，他曾向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申请一千两百美元的资助以解决个人财务问题，可见他对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具有一定的价值。化名“麦特维”。

Scott, John: 约翰·斯科特。前纽约共产党工会组织委员，任职战略服务办公室俄国部门之后，开始为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效力。化名“伊万诺夫”。

Scout: 见 *Barr, Joel*。

Second - Hand Bookseller: 一九四四年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中，克格勃中断其谍报活动，但同年秋又恢复谍报活动，主要任务是建立商业机构，为明显的谍报活动提供掩护。与美共有密切联系。

Selim Khan: 见 *Khan*。

Serb: 一九四五年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与克格勃科技情报官员列昂尼德·卡瓦斯尼科夫有联络。

Serpa: 前苏联内线，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克格勃总部要求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对此人提供的情报加以评估，并决定是否可以直接与此人联络，亦或是通过美共联络人与之联络。

Setaro, Ricardo: 理卡多·塞塔罗。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拉丁美洲部门副主任，秘密共产党人，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化名“特快信使”和“琼”。

Sheppard, Charles Bradford: 查尔斯·谢泼德。无线电工程师，在海森泰恩电子公司雷达设计办公室工作。要求克格勃方面为他本人及家人办理苏维埃公民身份，并协助全家移民苏

维埃。

Sherwood: 见 Duggan, Laurence。

Sidorovich, Anne: 安·西多洛维奇。罗森堡谍报网成员，迈克尔·西多洛维奇的妻子，协助其丈夫工作，并每月从克格勃那里领取薪金。化名“松鼠”。

Sidorovich, Michael: 迈克尔·西多洛维奇。罗森堡谍报网成员，担负大量的通信员工作，并将收集的材料拍照，提供给克格勃。化名“镜片”。

Silverman, Abraham George: 亚布拉罕·乔治·西尔夫曼。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陆军空军部”助理部长的经济顾问。化名“副翼”。

Silvermaster, Helen Witte: 海伦·威特·西尔夫马斯特。在其丈夫内森·西尔夫马斯特领导的谍报网中担任管理工作，是谍报网中的活跃分子。化名“多拉”。

Silvermaster, Nathan Gregory: 格雷戈里·内森·西尔夫马斯特。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负责人，该谍报网是情报产量最大的前苏联谍报网。西尔夫马斯特本人是一名经济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就职“经济战委员会”/“外国经济部”和“战争财产部”。化名“罗伯特”和“帕尔”。

Sima: 见 Coplon, Judith。

Simon: 见 Bayer, Theodore。

Sitsilla: 见 Dodd, William E., Jr。

Skrib: 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阿拉斯加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

Slang: “俚语”。见 Foster, Jane。

Smart: 一九四四年担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从事技术情报收集活动。此人是美国人亦或是俄国人，不得而知。

克格勃亦曾安排此人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联络。

Smith: 见 *Mins*, Leonard Emil。

Sobell, Morton: 莫顿·索贝尔。工程师，罗森堡谍报网成员，曾受雇于“通用公司”及“里夫电子公司”，从事军事项目及政府合约项目的工作。一九五一年被美国法院以间谍罪判刑入狱。索贝尔是前苏联间谍这一事实已无可争辩，但此人是否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出现，这一点无法确认。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一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的密电中汇报，已经向罗森堡谍报网的一名成员提供了一架照相机，此人化名“传递”，国家安全部/联邦调查局认定这一化名就是指索贝尔。然而，在这份电文的注解中又提到，在九月份发出的一份密电中，“传递”的化名又被更改为“瑟伯”，这一次，国家安全部/联邦调查局认为，“瑟伯”与索贝尔并非同一个人。一九四四年七月四日，克格勃发出的一份密电中同样提到“传递”这个化名，而这一个“传递”与罗森堡谍报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且其个人特征也完全不同于索贝尔。

Soble, Jack: 杰克·索布尔。克格勃老牌间谍，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初期渗透到托洛茨基组织当中。一九四五年中，克格勃将其调离刺探托洛茨基运动的任务，另分派其他任务。与罗伯特·索布伦是兄弟。化名“亚布拉罕”和“捷克人”。

Soble, Robert: 罗伯特·索布伦。克格勃老牌间谍，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初期渗透到托洛茨基组织当中。一九六一年以间谍罪被判刑。与杰克·索布尔是兄弟。化名“罗曼”。

Solid: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另有化名“亲戚”。

Son: 见 *Baker Rudy*。

Sonya (Sonia): 见 *Gold, Sonia Steinman*。

Sound: 见 *Golos, Jacob*。

Sounding Board: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

Source No. 12: 一九四三年任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间谍。从此人提供的报告及文件来看，此人有可能在“经济战委员会”工作。

Source No. 13: 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间谍，在军事情报部的反复逼迫下，此人终于一九四三年提供情报。

Source No. 19: 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三年三巨头会议召开时，此人在美国政府内部就任高职，曾向克格勃提供其与罗斯福及丘吉尔会谈的情况。

South: 见 *Schuster, Bernard*。

Spark: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在美国和加拿大活动，具体活动内容未知，但克格勃曾经向美共提出，有消息称，虽然此人在公开场合表示亲苏维埃的观点，但暗地里却是持反苏维埃的立场，克格勃方面要求美共协助调查。由此可见，此人有可能是一个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人物。另有化名“戴维斯”。

Spline: 斯普莱因。克格勃官员安德鲁·史夫切科在纽约的内线，一九四四年曾提供飞机工业领域的情报。另有化名“噪音”。

Spruce: 见 *Keenan, Helen Grace Scott*。

Squirrel: 见 *Sidorovich, Anne*。

Staff-Man: “员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任职美国陆军。克格勃曾向此人提供密码，以便与克格勃沟通。其他情况未知。

Stamp: 见 *Armor*。

Steele, Johannes: 约翰尼斯·斯蒂尔。德国移民，记者。一位流亡的波兰记者有意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作，斯蒂尔安排克格勃官员与该记者会面。化名“尾座”。

Stella: 斯特拉。前苏联海军情报部间谍，从海军情报部领取薪金。所担负的使命中包括协助调查海军情报部对有意招募的人选进行背景审核，并担任海军情报部与其内线之间的联络人。另有化名“艾米利亚”。

Stern, Alfred Kaufman: 阿尔弗雷德·斯特恩。伊利诺斯州群众阵线积极分子。家境殷实，与妻子马莎共同投资鲍里斯·莫罗思的好莱坞音乐发行公司。化名“路易斯”。

Stern, Martha Dodd: 马莎·多德·斯特恩。美国三十年代派驻德国大使威廉·多德之女，知名作家，群众阵线中的积极分子。阿尔弗雷德·斯特恩的妻子。化名“丽莎”。

Stevens, Edmund: 埃德蒙·史蒂文斯。记者，秘密共产党人，克格勃联络人。

Storm: 珀洛组织成员，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是约瑟夫·彼得斯的化名。

Stowaway: 见 *Halperin, Maurice*。

Stridsberg, Augustina (Augustina Jirku): 奥古斯蒂娜·斯特里兹伯格。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担任克格勃间谍，化名“克拉拉”。其女儿玛丽艾塔·沃格 (*Marietta Voge*) 亦为克格勃工作。

Strong, Anna Louise: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激进派记者，支持苏维埃及中国革命运动。否认加入共产党及参与前苏联间谍活动。一九四四年曾计划前往莫斯科旅游。密电中显示，此人与克格勃内部有联系，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为她提供接头暗语，以便她在莫斯科与克格勃接头人员联络。化名“里拉”。

Suk: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 真实身份未知。提供的情报涉及美国知名记者以及与参议员汤姆·杜威关系密切的高级共和党人。此人有可能是一名记者。

Talent: 见 *Malisoff (Malisov)*, *William Marias*。

Tan: 见 *Magdoff*, *Harry Samuel*。

Ted: 见 *Fitzgerald*, *Edward J.*。

Tenney, Helen: 海伦·坦尼。秘密共产党人, 在战略服务办公室的西班牙部任分析员。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化名“缪斯”。

Tenor: 见 *Burd*, *Michael*。

Thomas: 一九四四年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 真实身份未知。早期时化名“兄弟”, 隶属于克格勃的一位负责航空科技谍报工作的官员领导。具体活动内容未知。

Thrush: 见 *Akhmed*。

Tkach, Mikhail: 麦卡·特卡奇。《乌克兰每日新闻》编辑, 共产党积极分子。在乌克兰移民当中刺探情报, 提供给克格勃。负责一个小型谍报网。化名“鲈鱼”。

Trio: 一九四三年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 真实身份未知。据称与美共没有任何联系。有可能是弗莱德里克·汤普森的化名(详见附录 D)。

Tu……: 见 Nile。

Tulip: 见 *Zborowski*, *Mark*。

Tur: “土尔”。真实身份未知。曾将美国入侵法国的计划提供给前苏联。

Tuvin: 克格勃间谍, 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是波兰裔美国人中亲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一九四四年克格勃密电中指

出，由于失去补贴，此人的经济陷入困境。

Ullmann, William Ludwig：威廉·厄尔曼。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成员，曾任职财政部下属“货币研究部”以及位于五角大楼的陆军空军部下属“物资及服务部”。化名“飞行员”和“唐纳德”。

Unbroken Cover Name No.6：“未破解化名第六号”。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三年中曾就职战略服务办公室驻阿尔及利亚机构。

Unbroken Cover Name No.9：“未破解化名第九号”。见 *Bel-frage, Cedric*。

Unbroken Cover Name No.13：“未破解化名第十三号”。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三年直接受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领导。

Unbroken Cover Name No.14：“未破解化名第十四号”。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担任克格勃与美国之间的联络人。

Unbroken Cover Name No.19：“未破解化名第十九号”。克格勃间谍，一九四三年任职于战略服务办公室，亦或是战争情报办公室。有可能是朱利亚·奥德（详见附录 B）的化名。

Unbroken Cover Name No.22：“未破解化名第二十二号”。克格勃间谍，与阿米洛夫联络。一九四三年曾有机会以记者身份被派往斯德哥尔摩。美国国家安全部经破译发现，此人的真实姓名的最后一个字是“哥”。

Uncle：见 *Folkoff, Isaac*。

秘密情报内线之一：克格勃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与“公共关系委员会”有关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称此人是“朋友兼同胞（即共产党人）”。此人向克格勃透露，美国国务院正在对克格勃的一名美国间谍的兄弟进行审问。

秘密情报内线之二：真实身份未知。任职美国陆军特种服务部。一九四三年曾将美国工业情况提供给前苏联海军情报部驻华盛顿情报站。至于此人是自愿从事间谍活动，亦或是无意间参与间谍活动，不得而知。

秘密情报内线之三：真实身份未知。任职美国陆军办公室新闻部。一九四三年，乔治·马歇尔将军、罗斯福总统及丘吉尔首相就第二战线问题展开讨论，此间谍将讨论内容提供给克格勃。至于此人是自愿从事间谍活动，亦或是无意间参与间谍活动，不得而知。

秘密情报内线之四：真实身份未知。任职联邦调查局。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发出的密电中提到潜伏在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前苏联内线。未知密电中所提及的内线是否指朱迪思·科普朗，亦或是另有其人。

秘密情报内线之五：真实身份未知。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纽约情报站内线，一九四三年任职美国船坞局。

秘密情报内线之六：真实身份未知。任职盟军战略委员会。一九四三年曾将美国驻芬兰大使馆的外交报告提供给前苏联海军情报部。

V.：见 *Morros, Boris Mikhailovich*。

Vague：见 *Miller, James Walter*。

Valentina：克格勃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曾渗透美国托洛茨基运动。

Velson, Irving Charles：查尔斯·维尔索。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间谍，负责一组小型谍报网，并负责为前苏联招募间谍。向前苏联提供武器方面的情报。化名“尼克”。

Vick：一九四三年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与国务院官员有联络，有可能是国务院雇员。

Vita: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 真实身份未知, 一九四四年被中断谍报活动。

Voge, Marietta: 见 *Stridsberg, Augustina*。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间谍, 化名“女儿”。

Volunteer: 见 *Cohen, Morris*。

Volunteer's wife: 见 *Cohen, Lona*。

Vuchinich, George Samuel: 乔治·塞缪尔·武切尼克。战略服务办公室官员, 曾向托马斯·巴宾提供情报。托马斯·巴宾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间谍, 亦任职战略服务办公室, 曾负责处理南斯拉夫事务。至于该名间谍是自愿从事间谍活动, 亦或是无意间参与间谍活动, 不得而知。

Wasp: 见 *Greenglass, Ruth*。

Watchdog: 见 *Osipovich, Nadia Morris*。

Wedge: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 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中被中断谍报活动。

Wheeler, Donald Niven: 唐纳德·惠勒。珀洛组织成员, 任职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门。化名“伊砸拉”。

White, Harry Dexter: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成员, 财政部“货币研究部”助理部长, 后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美国方面负责人。怀特据称是克格勃最有价值的间谍, 他的名字曾多次在克格勃密电中出现。化名“法学家”、“律师”及“理察得”。

Whitefish: 一九四四年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 真实身份未知。最初阶段, 透过美共组织向克格勃提供情报, 后来受克格勃直接领导。

Wicher, Enos Regent: 伊诺斯·莱格尼特·威赫。曾任威斯康星州美共组织委员, 一九四五年充当克格勃间谍, 当时任职

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的电波宣传小组。其妻（玛丽娅·威赫）和继女（弗洛拉·沃欣）均为克格勃间谍。化名“热切”。

Wicher, Maria：玛丽娅·威赫。共产党人，克格勃间谍，其丈夫（伊诺斯·莱格尼特·威赫）与女儿（弗罗拉·沃欣）均为克格勃间谍。化名“大莎”。

Wilson, Ruth Beverly：鲁思·威尔逊。协助其克格勃间谍丈夫雅各布·爱泼斯坦的工作，并直接与克格勃联络。化名“诺娜”。

Witczak, Ignacy：伊格纳斯·维萨卡。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一九三八年开始以加拿大移民身份居住在洛杉矶，直到一九四五年被联邦调查局发现。

Wolston, Ilya Elliott：依亚·沃尔斯坦。克格勃间谍，美国陆军军事情报学校官员，曾将陆军军事情报学校的情况以及接受情报训练的士兵情况提供给前苏联。化名“斯拉瓦”。

Wovschin, Flora Don：弗洛拉·沃欣。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任克格勃间谍，先是在纽约从事谍报活动，后前往华盛顿任职战争情报办公室，继续从事谍报活动。其母（玛丽娅·威赫）和继父（伊诺斯·莱格尼特·威赫）均为克格勃间谍。化名“佐拉”。

X.：见 *Katz, Joseph*。

York, Jones Orin：琼斯·约克。航空工程师，三十年代中被招募为克格勃驻旧金山间谍。曾经将美国方面正在试验阶段的飞机资料制成微缩胶片提供给克格勃，并因此得到丰厚的酬劳。化名“针”。另有可能采用化名“工程师”。

Youngster：见 *Hall, Theodore Alvin*。

Yun：见 *Laird, Stephen*。

Yur：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

间谍，负责刺探移民及种族情报。

Zaret, Daniel Abraham：丹尼尔·亚伯拉罕·扎拉特。美国陆军火药部安全监测人，曾将弹药技术文件提供给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共产党人，曾担任国际纵队的官员。

Zborowski, Mark：马克·索罗斯基。克格勃老牌间谍，根据克格勃指示，渗透到托洛茨基组织内部，并主动接近前苏联判国者维克托·克拉切科。化名“郁金香”、“坎特”。

Zone：女性。一九四四年任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克格勃曾与其失去联络，并试图通过厄尔·布劳德与之重新建立联络。然而，布劳德认为此人已经不具有价值，建议克格勃无需与之重新建立联络。

Zora：见 *Wouschin, Flora*。



与前苏联情报部门秘密往来， 未曾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 中出现的美国人及美国居民

本附录中列举了一百三十九名与前苏联情报部门有秘密往来的人员，有关证据来自于维诺那计划以外的其他渠道。凡本书中涉及过的人物，在有关章节中均已引述证据出处，书中未涉及的人物，有关证据将在本附录中列举。本附录列举的人员不包括利用合法外交身份活动的前苏联情报部门官员。很有可能，本附录中提到的一些人与附录 A 中的一些化名实为同一人。附录中包括了以移民身份活动的前苏联非法官员。在一百三十九人中，只有五个化名没有被落实真实身份，化名以斜体字出现。

Adamic, Louis: 路易斯·阿达米克。作家，南斯拉夫移民的发言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向战略服务办公室就巴尔干问题提供咨询。是格罗—本特利谍报网成员，地位并不突出，通过路易斯·比登兹提供情报。

Adams, Authur: 阿瑟·亚当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间以移民身份居住美国。化名有可能是“*Achilles*”（见附录 A）。

Aden: 被西奥多·霍尔招募为克格勃情报内线，真实身份未知。原子科学家，有可能在位于华盛顿的原子弹用钚元素实验室工作。

Albam, Jacob: 雅各布·奥尔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担任杰克·索布尔的主要助手，负责间谍武装。一九五七年被判刑。

Alleman, Otto: 奥托·阿里曼。杜邦公司化学家。一九四五年之前与克格勃官员盖卡·奥瓦金米安联络，涉嫌工业谍报活动。一九四五年受雇于一家进口公司。联邦调查局怀疑此人秘密协助转移前苏联情报部门的活动资金。

Anta: 被西奥多·霍尔招募为克格勃情报内线，真实身份未知。有可能是原子科学家，又或是原子科学家的妻子（见 *Aden*），有可能在位于华盛顿的原子弹用钚元素实验室工作。

Arenal, Rose: 罗斯·阿里纳。美国人，墨西哥人路易斯·阿里纳的妻子。居住在纽约。在墨西哥共产党人暗杀托洛茨基的计划中，充当约各布·格罗与墨西哥共产党人之间的联络人及投递站。

Aronberg, Philip: 菲利普·阿朗伯格。二十年代美共积极分子。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时担任通信员，并为共产国际、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及克格勃执行任务。

Asimow, Morris: 莫里斯·艾斯摩。工业间谍，一九三六年任职美国钢铁公司。

Baskind, Pauline: 波琳·巴斯坎。纽约兼职教师，担任墨西哥克格勃反托洛茨基组织在美国的投递站。

Bedacht, Max: 马克斯·贝塔赫。美共的奠基人之一，二十年代时担任美共高层领导人。三十年代初，负责将数名共产党人从公开活动转入地下活动，并负责协助克格勃的情报工作。

Beker, Johanna Koenen: 约翰娜·科尼恩·贝克。德国共产党领袖威尔海穆·科尼恩的女儿，一九三八年移民美国。化名有可能是“克莱门斯”和“李”。

Bernay, Eric: 埃里克·伯奈。共产党人，“主音录制公司”

负责人，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阿瑟·亚当斯提供掩护身份，一九四五年曾协助阿瑟·亚当斯逃避联邦调查局的监视。

Bloch, Louis: 路易斯·布洛克。纽约电影放映员，担任墨西哥克格勃反托洛茨基组织在美国的投递站。

Booker, Lucy: 露西·布克。三十年代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在德国执行任务，就读于柏林大学。约各布·格罗告诉伊丽莎白·本特利，克格勃方面曾一度与此人失去联络，由他负责与布克重新建立关系。一九五一年，克格勃官员弗洛伊德·米勒委派布克担任他与负责反托洛茨基活动的克格勃官员杰克·索布尔之间的联络人。

Bransten, Louise: 路易丝·布兰斯坦。旧金山地区共产党人，家境殷实，负责前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内的情报官员与美共成员及具有情报价值的美共支持者之间的联络。化名有可能是“地图”（见附录 A）。

Browder, Margaret: 玛格丽特·布劳德。美共领袖厄尔·布劳德的妹妹，三十年代为克格勃在欧洲工作。

Budenz, Louis: 路易斯·比登兹。《工人日报》编辑，负责将美共成员及支持者提供的情报转达给格罗一本特利情报网。

Buerger, Ruth Marie: 鲁恩·伯格。美国人，三十年代初是美共领导的“失业委员会”中的积极分子。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阿诺德·依卡的妻子。依卡于三十年代在美国活动。

Burdett, Winston: 温斯顿·伯德特。化名“戒指”。一九四〇年被格罗招募为谍报人员，在欧洲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一九四四年退出共产党，后来与美国政府合作。

Burtan, Valentine (William G.): 瓦伦丁·伯坦。一九〇〇年出生于俄国，一九〇七年到达美国，一九二一年成为美国公民。二十年代是美共成员，因追随洛夫斯通，于一九二九年被

驱逐出党。曾协助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间谍尼古拉斯·杜森勃格成立公司，为其谍报活动提供掩护，并试图将杜森伯格提供的十万美元假钞混入流通领域，伯坦因此被判刑入狱。

Chambers, Whittaker: 惠特克·钱伯。二十年代后期美共积极分子。三十年代退出美共的公开活动，加入地下武装，后来负责一个谍报网络，并向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汇报。一九三七年，钱伯背叛美共，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向美国政府提供部分线索，但隐瞒了自己在谍报活动中的角色。一九四八年，钱伯参与谍报活动的背景被曝光。

Chapin, John Hitchcock: 约翰·蔡平。科学家，在曼哈顿项目芝加哥冶金实验室工作，曾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阿瑟·亚当斯秘密会面。

Chapman, Abraham: 亚伯拉罕·查普曼。记者，纽约共产党组织官员。一九五〇年与家人仓皇逃亡墨西哥。前苏联情报部门协助他们秘密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凭借假身份重新开始生活。有可能因为了解或是参与前苏联在美国的谍报活动而被撤出美国。具体活动未知。

Chevalier, Haakon: 哈康·切夫里尔。秘密共产党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院法语教授，试图将罗伯特·奥本海默招募为间谍。

Cohen, Leonard: 伦纳德·科恩。美国内务部律师，曾经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伊格纳斯·维萨卡的联络人并互换材料。

Collins, Henry: 亨利·科林。美共华盛顿地下组织成员，负责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发掘并招募间谍。

Crane, William: 威廉·克兰。一九三二年加入美共，很快便加入地下组织。在惠特克·钱伯负责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

谍报网内担任通信员和摄影师。一九四九年，钱伯向美国政府供认此人，克兰随即招供。

De Sveshnikov, Vladimir V: 弗拉迪米尔·德·斯维尼科夫。美国政府弹道专家。二十年代中至三十年代，将美国的军事情报提供给前苏联情报部门。

Devyatkin, Boris: 鲍里斯·德夫亚金。一八八八年出生于俄国，一九二三年到达美国，一九二九年成为美国公民。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化名“迪克·莫金”协助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在美国的非法官员从事谍报活动。

Dozenberg, Nicholas: 尼古拉斯·杜森勃格。拉脱维亚移民，美共奠基人之一，二十年代任美共中层领导人，一九二八年成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特工。一九三九年被捕后招供，并签署认罪书，请求从轻判处，最后以假护照的罪责被判入狱。

Eltenton, George Charles: 乔治·艾腾顿。加利福尼亚壳牌公司化学家，曾在苏维埃联盟工作过数年，是共产党领导的小型组织“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及技术人员联合会”中的积极分子。一九四二年与前苏联外交官及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官员彼得·伊凡诺夫会面，后来通过中间人，又或是直接与哈康·切夫里尔等曼哈顿项目中的几名科学家接触，旨在向前苏联提供情报。

Feierabend, Albert: 阿尔伯特·弗拉本德。拉脱维亚移民，后成为美国公民，美共成员，在尼古拉斯·杜森勃格负责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谍报武装部工作。一九三〇年从海外返回美国时以偷渡罪被捕。此人当时自称名叫约各布·克雷兹，从他的身上搜出一块隐藏极巧妙的白色缎带，上面有美共执行秘书长马克斯·贝塔赫的签名，称“凡携带此物者均可完全信赖，应给予其一切可能的协助以便其顺利完成肩负的使命”。一九三

三年，此人从国外返回美国时，因使用假身份再次被捕。他随身带有两万八千美元，是前苏联提供给美共或前苏联情报机关的经费。被保释后从此再未被捕。

Field, Frederick Vanderbilt: 弗雷德里克·菲尔德。秘密共产党人，知名的自由阵线自由派人士，三十年代时为美共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秘密武装招募间谍，惠特克·钱伯也是该武装的一员。一九四五年，负责美共与克格勃之间谍报网的伊丽莎白·本特利与厄尔·布劳德利用此人的住处作为据点会面。

Frankfurter, Gerta: 格塔·弗兰克福特。三十年代时是海蒂·马兴负责的克格勃谍报网成员。

Gayn, Mark: 马克·盖恩。左翼记者，曾在美亚事件中协助菲利普·贾菲。

Glassman, Vivian: 维维安·格拉斯曼。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律师勃格谍报网时，曾代表前苏联情报部门向威廉·珀尔发出警报并提供经费，敦促珀尔逃往墨西哥。

Goldberg, Ben - Zion: 本·蔡恩·戈德堡。记者，前苏联的文件中记载此人为前苏联间谍。具体活动未知。

Granich, Grace: 格雷丝·格拉尼奇。美共元老及领导人，负责为约各布·格罗招募间谍。

Greenberg, Michael: 迈克尔·格林伯格。“经济战委员会”及“外国经济部”中层官员，负责中国事务。为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提供情报。

Gregg, Joseph: 约瑟夫·格雷格。共产国际退伍军人，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先后任职“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和国务院。

Hammer, Armand: 阿曼德·哈默。其父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奠基人之一。二十年代协助将前苏联资助给美共的经费合法

化，后来利用其富商的身份协助前苏联情报工作。

Heiman, Julius: 朱利叶斯·海曼。俄国移民，后成为美国公民。秘密共产党人，二十年代初从事珠宝生意，秘密将前苏联以珠宝形式提供给美共的经费转化为现金。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初，负责协助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在美国的运作，特别是作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阿瑟·亚当斯的搭档。

Heller, Ferdinand: 费迪南德·赫勒。其父富有的美国共产党人。向联邦调查局供认，他于一九三五年被盖卡·奥瓦金米安招募为前苏联间谍。

Hiskey, Clarence 克拉伦斯·希斯基。科学家，任职曼哈顿项目芝加哥冶金实验室，曾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阿瑟·亚当斯秘密会面。亦是克格勃的招募对象，在克格勃密电中曾提到此人，化名“拉姆西”。

Huettig, Lester M.: 莱斯特·马克斯·修蒂。工业间谍，三十年代曾将炮弹自动上膛系统的图纸提供给前苏联情报部门。

Hutchins, Grace: 格雷丝·哈钦斯。知名作家，秘密共产党人，协助美共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秘密武装工作，怀特克·钱伯也是该武装的一员。钱伯背叛并隐居后，此人曾透过间接渠道向钱伯的内弟发出警报称，如果他肯将钱伯的隐藏地点透露给她，她将保证钱伯妻子和孩子们的安全。

Ikal, Arnold: 阿诺德·依卡。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三十年代初至一九三七年被派驻美国。

Inslerman, Felix: 费利克斯·英斯勒曼。惠特克·钱伯负责的美共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谍报网成员。后来与美国政府合作，并称于一九三九年开始不再为前苏联工作。

Jacobson, Arvid: 阿维·雅各布森。芬兰裔美国人，共产党人，被招募为惠特克·钱伯负责的美共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

谍报网成员，在芬兰开展活动。一九三三年于芬兰被捕。

Jaffe, Philip: 菲利普·贾菲。与厄尔·布劳德及美共是老朋友，《美亚》杂志编辑及发行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美国政府秘密文件数千页，并试图将这些文件提供给前苏联情报部门。被叛以擅自拥有政府文件罪。

Jerome, V. J.: V·J·杰罗姆。美共元老及领导人，主要负责党内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为格罗谍报网招募间谍。

Josephson, Leon: 利昂·约瑟芬森。共产党人律师，三十年代参与美共与前苏联伪造护照的工作。

Kahn, Albert: 艾伯特·卡恩。记者，美共秘密成员。一九四六年，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有意将其招募为间谍。然而，伊丽莎白·本特利向联邦调查局的供词中称，她和约各布·格罗于一九四二年就曾与卡恩会面，卡恩向他们提供了乌克兰移民中对苏维埃的不满情绪。有可能采用化名“斗士”。（见附录A）。

Kahn, M. G: M·G·卡恩。协助开办公司，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阿瑟·亚当斯提供掩护身份，一九一九年参与从前苏联偷运珠宝进入美国。

Kamen, Martin: 马丁·卡门。化学家，任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院放射实验室，曾与前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克格勃官员格里高里·凯菲会面。一九四四年，美国安全官员窃听了卡门与凯菲的谈话，因谈话中涉及原子弹研究项目，卡门被开除出曼哈顿项目。

Kaplan, Irving: 欧文·卡普兰。秘密共产党人，就职“战争生产委员会”，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

Kazakevich, Vladimir: 瓦迪米尔·卡扎科维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陆军学校担任教师，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的联

络人。

Kent, Tyler: 泰勒·肯特。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九年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密码文员，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担任密码文员。一九四〇年因窃取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的往来信件被英国安全官员捕获，直到一九四五年被判刑入狱。美国安全官员后来确认，此人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期间已经变节，并将美国的外交情报提供给克格勃。此人的变节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是克格勃的一位女性特工利用性诱惑将其网入“甜蜜的陷阱”。此人在英国从事的谍报活动并非为前苏联服务，而是因为此人在英国期间与英国的反犹太组织及亲纳粹组织有关，出于反对美国参战的目的而从事谍报活动。

Kowan, Maurice: 莫里斯·科瓦恩。芝加哥医生，共产党人，担任威廉·克兰和约翰·卢米斯·舍曼的投递站。

Kruse, William: 威廉·克鲁泽。二十年代美共积极分子，支持洛夫斯通，于一九二九年退党。但是三十年代时协助尼古拉斯·杜森勃格开办公司，掩护杜森勃格在菲律宾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开展谍报工作。

Landy, Avram: 阿夫拉姆·兰迪。美共高级官员，主要负责少数民族工作。替格罗招募间谍。有可能使用化名“卡恩”（见附录 A）。

Larsen, Emmanuel: 伊曼纽尔·拉森。美国国务院研究员，菲利普·贾菲的内线之一，负责窃取政府文件，引发美亚事件。因以非法手段获取政府文件遭到判处，并失去在国务院的工作。

Lerner, Irving: 欧文·勒纳。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阿瑟·亚当斯的同僚，就职于战争情报办公室影视部，曾试图在

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拍摄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院的回旋加速器。

Leshinsky, Sol: 索尔·列辛斯基。“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官员，珀洛组织成员，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

Levin, Bernice: 伯尼斯·莱文。在“紧急管理办公室”和“紧急生产办公室”担任文员。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但作用不大。

Levy, Philip: 菲利普·利维。秘密共产党人，与利昂·约瑟芬森关系密切。美共地下组织成员从持不同政见组织那里窃取文件后存放在利维的住所。

Lieber, Maxim: 马克西姆·利伯。一八九七年出生于俄国，后成为美国公民。美共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谍报网成员，与惠特克·钱伯和约翰·卢米斯·舍曼共事。

Lomanitz, Giovanni Rossi: 乔瓦尼·洛马尼茨。科学家，在伯克利放射实验室工作，一九四二年与美共的史蒂夫·纳尔逊会面，讨论其在曼哈顿项目的工作情况。

Lovestone, Jay: 杰伊·洛夫斯通。二十年代末担任美共领袖，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党。随后几年里，与其追随者协助前苏联的情报工作，希望可以因此重新参与共产主义运动。

Marcus, James Lewis: 詹姆斯·刘易斯·马库斯。“奥尔顿地毯厂”负责人，该厂实为前苏联特工提供掩护。

Marzani, Carl: 卡尔·马扎尼。一九四二年就职战略服务办公室，一九四五年成为战略服务办公室展示部副部长，该部的职能在于利用图表、图片等方式展示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各种情报信息。战略服务办公室被解散后，马扎尼被调往国务院。由于在填写国务院的各种雇用表格时故意隐瞒其共产党员身份，一九四七年马扎尼被判刑。

Massing, Hede: 海蒂·马兴。三十年代时，负责领导克格勃的一个谍报网，该谍报网的成员中有两名国务院官员，即纽·菲尔德和劳伦斯·达根。后来与其丈夫一同退出前苏联谍报活动，并完全脱离共产主义运动。一九四七年向联邦调查局自首。有可能化名“Redhead”（见附录 A）。

Massing, Paul: 保罗·马兴。克格勃特工，与妻子海蒂·马兴拍档从事谍报活动。

McPeck, Fanny: 范妮·麦克匹克。纽约市学校文员，担任墨西哥克格勃反托洛茨基组织在美国的投递站。

Miller, Jenny Levy: 詹尼·利维·米勒。罗伯特·米勒的妻子，伊丽莎白·本特利的联络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职驻华盛顿的“中国政府采购委员会”。

Miller, Robert T.: 罗伯特·米勒。任职“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

Mink, George: 乔治·明克。二十年代，美国共产党工会组织委员。三十年代，为共产国际的海事工会工作，并协助在共产党员船员中建立秘密通信系统。因间谍罪在丹麦被捕并被判入狱。

Minton, Bruce: 布鲁斯·明顿。美共《新大众》杂志编辑。负责招募间谍，并将莫里斯·霍尔珀林介绍给约各布·格罗。霍尔珀林任职战略服务办公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前苏联情报产量最高的间谍。

Mitchell, Kate: 凯特·米切尔。《美亚》杂志编辑，协助菲利普·贾菲的工作。

Miyagi, Yotoku: 犹托库·米亚奇。一九一九年，只有十几岁的米亚奇从日本移民美国，一九三一年加入美共，经日本共产国际代表招募为前苏联间谍。一九三三年被派回日本，成为

由克格勃官员理查德·佐尔格领导的前苏联谍报网成员。一九四一年被日本警方逮捕，一九四三年死于狱中。

Morgan, Will: 威尔·莫根。海员，担任美共秘密武装的通信员，一九四三年将美国的材料经伊朗送交共产国际。

Morris: 莫里斯。克格勃联络人，最初在英国活动，后前往美国。一九四二年，克格勃委派此人的老相识，非法官员阿诺德·杜哈前往美国，试图与之重新恢复联系。然而，杜哈搭乘的船只被德国船只撞沉，杜哈葬身海底。

Moskowitz, Miriam: 米里亚姆·莫斯科维奇。亚布拉罕·布拉泽曼的同僚，因试图隐瞒布拉泽曼从事工业谍报活动的事实，以干预司法公正罪被判刑。

Nelson, Steve: 史蒂夫·纳尔逊。美共官员，秘密武装成员，协助克格勃及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官员工作。有可能化名“屠夫”。（见附录 A）。

North, Joe: 乔·诺斯。美共高级官员，《新大众》编辑，为前苏联招募间谍，所招募的间谍包括温斯顿·伯德特、威廉·雷明顿等人。

Novick, Sam: 萨姆·诺维克。“美国电子公司”负责人，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阿瑟·亚当斯提供掩护身份，并协助其利用假身份进入美国。

Older, Julia: 朱利娅·奥尔德。战略服务办公室雇员，曾受艾伯特·卡恩委托，试图接触有关乌克兰民主主义的档案，遭到战略服务办公室的解聘。经上诉后被重新安置在战争情报办公室。三十年代时曾居住在莫斯科，为多家与美共有关的组织工作。其兄安德鲁是一名秘密党员和记者。“未破解化名第十九号”（见附录 A）有可能就是指的此人。

Osman, Robert: 罗伯特·奥斯曼。美国陆军下士，被派往

巴拿马运河区，向前苏联军事情报部谍报网提供军事情报。

Park, Willard: 威拉德·帕克。先后任职“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及“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但所担任的角色并不重要。

Perazich, George: 乔治·佩拉兹。任职“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南斯拉夫部。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所担任的角色并不重要。

Peters, Josef: 约瑟夫·彼得斯。三十年代初至一九三八年中担任美共秘密武装负责人，负责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及克格勃的联络。有可能化名“风暴”（见附录 A）。

Pigman, William Ward: 威廉·沃德·皮格曼。秘密共产党人，三十年代任职于“国家标准局”，为惠特克·钱伯负责的美共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谍报网服务。

Poyntz, Juliet Stuart: 朱利叶·斯图尔特·波因茨。美共奠基人之一，二十年代负责美共的妇女部及纽约工人学校，“苏维埃朋友及国际工人护卫”组织成员。一九三四年退出美共公开活动，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一九三七年从位于纽约的住所失踪，警方调查后未取得任何线索。一九三八年，意大利裔美国人激进组织领袖卡罗·特雷斯卡（Carlo Tresca）公开控诉前苏联方面为了防止波因茨背叛而将其绑架。特雷斯卡称，波恩兹失踪前曾与他见过面，讲述了她于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亲眼目睹的斯大林清洗运动初期的情形，并表达了不满。伊丽莎白·本特利与朱利叶相识，但一直以来只知道她的姓名是朱利叶·格雷兹。本特利称，约各布·格罗与克格勃官员阿纳托利·格罗莫夫分别于三十年代末及一九四五年提到，波因茨是一名叛徒，并已经去世。惠特克·钱伯表示，他也听说波因茨因蓄意背叛而遭到杀身之祸，钱伯因此在一九三八年背叛时倍加小心。

Price, Mildred: 米尔德里德·普赖斯。与玛丽·普赖斯为姊妹，身为“援助中国委员会”负责人，为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招募间谍。

Rabinowitz, Gregory: 格雷戈里·拉宾诺维奇。克格勃特工，三十年代末，协助反托洛茨基运动，并参与克格勃方面刺杀托洛茨基的计划。

Redmont, Bernard: 伯纳德·雷德蒙。记者，任职“美洲间事务协调办公室”，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所担任的角色并不重要。

Remington, William: 威廉·雷明顿。“战争生产委员会”官员，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所担任的角色并不重要。因伪证罪被判刑入狱，一九五四年在狱中被谋杀。

Reno, Vincent: 文森特·雷诺。美国陆军文职官员，曾向惠特克·钱伯负责的美共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谍报网提供军事情报。后来与美国政府合作。

Rivkin, Ruth: 鲁恩·里夫金。在“联合国救灾及重建委员会”的前身组织任职，珀洛组织成员，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所担任的角色并不重要。

Rosenberg, Simon: 西蒙·罗森堡。波兰移民，后成为美国公民，三十年代在前苏联贸易部担任工程师，在克格勃非法官员盖卡·奥瓦金米安的领导下从事工业间谍活动。

Rosenblit, Philip: 菲利普·罗森布里。共产党人，在纽约从事牙医工作，协助将前苏联的资金提供给在美国的情报机构以及将资金提供给美共。

Roth, Andrew: 安德鲁·罗思。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与国务院之间的联络官员，在美亚事件中曾协助菲利普·贾菲。

Salich, Hafis: 哈费斯·萨里奇。俄国移民，后成为美国公

民，任职“海军情报办公室”。一九三八年被招募为前苏联间谍，一九三九年与其前苏联上级麦卡·格林（Mikhail Gorin）一起以间谍罪被捕。萨里奇被判监，麦卡·格林是苏维埃公民，被获准以一万美元保释后返回前苏联。

Schuman, Irving George: 欧文·乔治·舒曼。克格伯特工约瑟夫·卡茨利用此人监视前苏联叛徒沃尔特·克里维斯基。

Shepard, Barnett: 巴尼特·谢泼德。担任克格勃墨西哥反托洛茨基组织在美国的投递站。

Sherman, John Loomis: 约翰·卢米斯·舍曼。二十年代末美共积极分子，一九二九年因追随洛夫斯通而被排挤出美共，但很快便转入地下组织工作。主要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工作，与惠特克·钱伯和威廉·克兰合作。三十年代末放弃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但保持共产党人身份。

Silverman, Frances: 弗朗西丝·西尔弗曼。美共的好战分子，“纽约市教师联合会”成员，担任克格勃墨西哥反托洛茨基组织在美国的投递站。

Simon, Helen Levi: 海伦·利瓦伊·西蒙。美共《工人日报》专栏作家，协助为刺杀托洛茨基的凶手拉蒙·麦卡德提供经费。

Slack, Alfred D.: 阿尔弗雷德·斯莱克。化学家，四十年代初曾向哈里·戈尔德所在的工业谍报网提供情报。戈尔德将斯莱克供认之后，斯莱克本人认罪，被判十五年监禁。

Soble, Myra: 迈拉·索布尔。克格勃特工杰克·索布尔的妻子，一九五七年因间谍罪被判刑。

Source No. 19: “第十九号内线”。克格勃联络人的化名，三十年代中在英国被发展为前苏联间谍，后前往美国。一九四二年，克格勃委派此人的老相识，非法官员阿诺德·杜哈前往美国，试图与之重新恢复联系。然而，杜哈搭乘的船只被德国

船只撞沉，杜哈葬身海底。与附录 A 中所提到的“未破解化名第十九号”可能并非同一个人。

Spiegel, William: 威廉·施皮格尔。共产党人，其寓所被惠特克·钱伯负责的美共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谍报网用作据点。

Spitz, Beatrice: 比阿特丽斯·斯皮茨。物理学家，美国公民。见亨利·斯皮茨。

Spitz, Henry: 亨利·斯皮茨。物理学家，美国公民。一九五〇年与妻子比阿特丽斯前往新墨西哥州，对制造原子武器的军事基地拍照，并将胶片提供给克格勃的索布伦。

Stahl, Lydia: 莉迪亚·斯塔尔。美国人，阿尔弗雷德·蒂尔顿的助手。阿尔弗雷德·蒂尔顿是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二十年代末派驻美国。

Steinberg, Arthur Gerald: 阿瑟·杰拉尔德·斯坦伯格。加拿大人，一九四〇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博士学位，一九四五年任职“美国科学研究及发展办公室”。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加拿大谍报网成员。

Stenbuck, Joseph: 约瑟夫·斯坦布克。一九三三年负责接收罗伯特·奥斯曼窃取的图纸。

Stern, Moishe (Mark Zilbert): 莫伊谢·斯特恩，又称马克·兹伯特。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派驻美国。

Stone, Victoria Singer: 维多利亚·斯通。共产党人，协助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在美国的工作，主要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非法官员阿瑟·亚当斯合作。

Straight, Michael: 迈克尔·斯特雷特。美国人，三十年代中就读剑桥大学时成为秘密共产党人。前苏联间谍安东尼·布伦特的门徒，后来以秘密身份返回美国，成为罗斯福总统的演

讲撰稿人，曾多次与克格勃非法官员依卡·阿米洛夫会面，一九四二年双方中断联络。

Switz, Robert Gordon: 罗伯特·斯维兹。三十年代初在前苏联军事情报部驻美国情报站担任秘密摄影师及通信员以及罗伯特·奥斯曼与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之间的联络人。

Tamer, Joshua: 乔舒亚·塔莫。三十年代初，惠特克·钱伯负责的美共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谍报网成员。

Taylor, William: 威廉·泰勒。财政部官员，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伊丽莎白·本特利的自传发行后，泰勒对出版商予以起诉，出版商不顾本特利的反对，答应庭外和解。泰勒发表长篇文章，对本特利供词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联邦调查局支持本特利，并准备了详细材料驳斥泰勒的攻击。

Tilton, Alfred: 阿尔弗雷德·蒂尔顿。二十年代末，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派驻美国的非法官员。以加拿大移民的身份活动，并采用约瑟夫·帕凯（Joseph Paquett）的名字。

Ulanovsky, Aleksandr Petrovich: 亚历山大·佩特洛维奇·乌拉诺夫斯基。三十年代初，前苏联军事情报部派驻美国的非法官员。曾使用过多个假身份，包括利用美国人尼古拉斯·舍曼的身份。

Ulanovsky, Nadezhda: 那达日达·乌拉诺夫斯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人员，亚历山大·乌拉诺夫斯基的妻子。

雷达间谍：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二年春，克格勃特工莫里斯·库恩将此人招募为前苏联间谍。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费利索夫在提及此人时讲道：“他每年向我们提供两三千页（有关雷达开发方面）的秘密文件副本，其中的大部分情报被我们评定为‘有价值’或‘极具价值’。”

Vogel, Ethel: 埃塞尔·沃格尔。担任克格勃墨西哥反托洛

茨基组织在美国的投递站。

Volkov, Anatole: 阿纳托尔·沃尔科夫。海伦·西尔夫马斯特的儿子，格雷戈里·西尔夫马斯特的继子，曾短期担任西尔夫马斯特谍报网与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之间的通信员。

Wadleigh, Julian: 朱利安·沃德利。国务院中层官员，惠特克·钱伯负责的美共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谍报网成员。后来与美国政府合作。

Weil, Ruby: 鲁比·韦尔。秘密共产党人，曾渗透到美国托洛茨基运动中。参与克格勃刺杀托洛茨基的计划。

Weinberg, Joseph W.: 约瑟夫·威恩伯格。化学家，秘密共产党人，任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院放射实验室，曾秘密会晤美共驻西海岸官员史蒂夫·纳尔逊，并将有关曼哈顿项目的文件提供给纳尔逊，纳尔逊继而将情报提供给在前苏联驻旧金山领事馆担任外交官的克格勃官员彼得·伊凡诺夫。

Weinstein, Abraham: 亚布拉罕·温斯坦。纽约牙医，为多名参与秘密工作的美共官员及为前苏联从事谍报活动的政府雇员提供牙医服务。联邦调查局经调查确认，此人实际上在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很多前来应诊的病人是在将情报提供给温斯坦，再由温斯坦提供给另外一方。伊丽莎白·本特利供认，约各布·格罗有一位联络人是名牙医，但她只知道此人名叫查尔斯。根据本特利对查尔斯的描述，联邦调查局断定，温斯坦就是查尔斯，而且有可能就是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的化名查尔斯（见附录 A）。

Weisband, William: 威廉·韦班。语言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职“美国陆军信号安全部”，后来加入维诺那计划。一九五〇年，前苏联特工琼斯·约克供认，韦班在四十年代初担任前苏联联络人，韦班因此被解雇。由于拒绝回答美国大陪

审团的问询，韦班被判监禁一年。有可能化名“连接”（见附录 A）。

Yano, Tsutomu: 苏图姆·亚诺。日裔美国人，美共官员，一九三一年将犹托库·米亚奇招募为间谍，并将这位年轻的日裔美国人派往日本，为前苏联情报部门开展谍报活动。

Zilbert, Mark: 马克·兹伯特。见 Stern, Moishe。

Zimmerman, David: 戴维·齐默尔曼。马里兰美共组织中层官员，使用戴维·卡彭特（David Carpenter）的名字。惠特克·钱伯负责的美共和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谍报网成员。

Zlatowski, George: 乔治·佐拉维斯基。国际纵队退伍军人，秘密共产党人，美国陆军情报官员。与简·福斯特（见附录 A）结婚。简·福斯特是前苏联特工，任职战略服务办公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索布尔谍报网暴露，佐拉维斯基被判有间谍罪。当时，佐拉维斯基身在海外，拒绝返回美国。



与前苏联情报部门有秘密 联络的短期留美的外国人

有三十三名外国人在短期留美期间与前苏联情报部门有着秘密往来，其中部分人的真实国籍未知。本附录不包括近一百名以外交身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前苏联公民，其中的大部分人为专业情报官员。所有化名均以斜体字出现。

英 国

Burgess, Guy: 盖伊·伯杰斯。英国外交官，老牌前苏联间谍。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一九五一年逃往莫斯科。

Edward: 爱德华。克格勃间谍，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提到此人，一九三九年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华盛顿工作，与政界要人有往来。有可能持英国国籍。

Fuchs, Emil Julius Klaus: 克劳斯·富克斯。被英国方面派往美国参与曼哈顿项目。一九五〇年承认参与谍报活动，在英国被捕。化名“休息”和“查尔斯”。

Maclean, Donald: 唐纳德·麦克林。英国外交官，老牌前苏联间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高级职务。一九五一年，英国安全部门加紧对其调查，麦克林逃往莫斯科。化名“家人”。

Philby, H. R. (Kim): 金·菲尔比。英国高级情报官员，四十年代末及五十年代初负责英国情报部与美国情报部之间的联络。老牌前苏联间谍，一九六三年逃往莫斯科。

加 拿 大

Losey, Mary (Mrs. Spencer Mapes): 玛丽·露西。加拿大国家电影局驻华盛顿办公室雇员。为前苏联军事情报部在加拿大的一个谍报网招募间谍。

May, Allan Nunn: 阿伦·南·梅。被英国方面派往美国参与曼哈顿项目。主要在加拿大工作，但几次前往美国原子弹研究基地。一九四五年，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密码员艾哥·郭岑可叛变，阿伦的前苏联间谍身份暴露。阿伦招供，被判监禁。

Pontecorvo, Bruno: 布鲁诺·庞蒂科沃。难民身份，意大利物理学家，被英国方面派往美国参与曼哈顿项目。主要在加拿大工作，通过克格勃驻渥太华情报站向克格勃提供情报。四十年代末前往英国，为英国的核武器项目工作。一九五〇年，福克斯被捕后，此人逃往苏维埃。有可能化名“Huron”（见附录 A）。

Size, Hazen: 黑曾·赛斯。加拿大秘密共产党人，曾参与西班牙内战，在医疗队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的代表派驻华盛顿。格罗一本特利谍报网成员，提供有关加拿大使馆及英国使馆的情报，所提供的情报内容不是很多。

法 国

Authur: 克格勃间谍，真实身份未知。克格勃驻拉美情报站的中心人物，频繁前往纽约，向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汇报。负责克格勃与遍布中南美洲的前苏联内线之间的联络，在西班牙亦安排有联络人。有可能在政府部门任职，又或是所在行业需要经常出差。本人有可能是克格勃非法官员。

Muzquiz, Elena Huerta: 埃琳娜·许尔特·穆奎兹。居住在纽约，参与克格勃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化名“南方人”。

Subercaseaux, Christian Casanova: 克里斯蒂安·卡萨诺瓦·贝卡西斯。智利外交官，克格勃间谍，参与在拉美的谍报活动，往返与纽约、葡萄牙和南美之间。化名“卡罗斯”。

罗马尼亚

Davila, Carol A: 卡罗尔·A·达维拉。罗马尼亚外交官，一九四四年被招募为克格勃特工。化名“码头工人”。

捷克斯洛伐克

Fierlinger, Jan: 简·弗林格。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驻纽约领事馆情报官员，一九四三年成为克格勃内线。主要提供美英两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之间的外交情报。化名“官员”。

Sukhomlin, Vasily: 瓦西里·苏克霍姆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流亡人士，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被驻美国的捷克斯

洛伐克情报部（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一个部门）录用。克格勃间谍，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活动以及流亡美国的欧洲政治人物，尤其是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士的情况提供给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克格勃向其提供薪金，并承诺协助其成为苏维埃公民。化名“火星”。

德 国

Baerensprung, Horst: 霍斯特·比伦斯普隆。德国难民，曾经是德国警察局官员，担任战略服务办公室德国事务顾问。

Hirschfeld, Dr. Hans E.: Dr·汉斯·E·赫希菲尔德。德国难民，战略服务办公室德国事务顾问。

Lund: 克格勃非法官员，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三年被派往美国。据称是德国人，具体任务未知。

Mann, Heinrich Ludwig: 海因里希·路德维格·曼。将美国政府与德国流亡政府官员之间的谈话内容透露给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

Poet: “诗人”。联邦调查局经调查认为，此人有可能是贝托特·布雷赫（Bertolt Brecht）或贝特霍尔德·维特（Berthold Viertel）。布雷赫是德国著名剧作家，一九四一年中到达美国，并表示希望成为美国公民（但从未正式申请）。布雷赫后来成为东德共产主义政权下的知名知识分子。维特是一名作家，是布雷赫的好朋友和同事，同样是德国难民，一九四二年到达美国。一九四三年，“诗人”向克格勃驻旧金山情报站提供有关德国流亡政治人物的情报。

波 兰

Moszulski, Roman: 罗曼·莫祖斯基。波兰流亡政府下属“波兰电报局”官员，一九四四年成为克格勃间谍。化名“加拿大人”。

南 斯 拉 夫

Ivancic, Anton S.: 安冬·S·伊凡赛克。克格勃间谍，一九四〇年到达美国，成为南斯拉夫流亡政治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一九四四年初成为设在纽约的“南斯拉夫海员工会”负责人。化名“鲫鱼”。

Kosanovio, Sava N.: 萨瓦·N·科萨诺维。德国入侵南斯拉夫时此人担任记者及南斯拉夫政治家。克格勃间谍，美国南斯拉夫流亡政治活动中的积极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铁托政府官员。化名“科洛”。

Subasic, Ivan: 伊万·苏巴西克。南斯拉夫流亡政治家，后成为克格勃间谍。在南斯拉夫流亡人士中开展谍报活动，将美国政府对流亡人士采取的措施提供给克格勃。纳粹失败后，参与控制南斯拉夫人的计划。化名“塞雷斯”。

荷 兰

驻华盛顿荷兰海军武官（真实身份未知）：向前苏联海军情报部驻华盛顿情报站提供情报。华盛顿情报站对此人的评价是“对我们忠诚”。

国籍不明人员

Contact: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是由流亡人士构成的特工组织中的一员。

Dan: 特工，与美国方面有联络。在伦敦接头时的暗语是：“我们是不是在康涅狄格大街上的维克餐厅见过面？”

Guard: “卫士”，化名。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曾经从英国提供有关英国海运方面的情报，并且经瑞士将微缩胶片及秘写信邮寄到美国。克格勃的一份密电中提到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有“卫士的人”。

Saffian, Alexander: 亚历山大·萨费恩。有可能是外国政府或外国公司驻美国的代表。曾将中东国家对美国公司在石油方面做出让步的情报提供给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化名“合同工”。

Senor: 真实身份未知，一九四四年九月从丹麦到达美国（也有可能在一九四四年之前就到达美国），一九四四年末至一九四五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最活跃的间谍，克格勃每个月向其支付薪金。一九四四年秋，其化名改为“勃格”。

Yur: 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间谍，真实身份未知，是由流亡人士构成的特工组织中的一员。

前苏联情报部门有意 招募为情报内线的美国 公民及美国居民

根据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以及俄国文献中的文件可知，有二十四人被前苏联情报部门列为有意发展的对象，但是没有证据显示，这二十四人成功地被前苏联情报部门录用。并且，有证据显示，前苏联情报部门对这二十四人中某些人的招募工作并没有进行，而对另外一些人的招募工作，因被招募对象对美国的忠诚，则在行动初期就宣告失败。本附录中凡化名均以斜体字出现。

Bachrach, Marion: 马里恩·巴拉克拉克。约翰·艾伯特（见附录 A）的妹妹。三十年代初，秘密加入美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担任约翰·伯纳德（明尼苏达州，“农民工人党”）的私人秘书及国会办公室主任。一九四二年，克格勃外国情报部向共产国际调查巴拉克拉克的背景，调查结果令克格勃满意。

Barnes, Joseph: 约瑟夫·巴恩斯。知名记者，曾任职战争情报办公室及《纽约先驱报》外国新闻部负责人。鉴于巴恩斯有几位朋友是美共成员，又或是与美共有密切联系，克格勃有意将巴恩斯招募为情报内线。不过，克格勃最终认为，“招募巴恩斯显然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

Berger, Joseph Isadore: 约瑟夫·伯杰。曾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助手，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演讲撰稿人。一九四五年，担任“遣返委员

会”的美国方面代表。克格勃方面曾花费多年心血试图将伯杰招募为情报内线。

Bloomfield, Samuel: 塞缪尔·布鲁姆菲尔德。一九四二年任职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东欧组。秘密共产党人。克格勃向莫斯科方面汇报称，此人亦担任与美共有关的“华盛顿进步书店”的经理。然而，美国政府注意到此人的共产主义倾向，公开对其审查。一九四三年，此人离开战略服务办公室，在英国情报部驻旧金山的机构任职。

Bowen, Ralph: 拉尔夫·鲍曼。国务院经济学家。与妻子均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并与克格勃特工弗洛拉·沃欣是朋友。弗洛拉·沃欣也任职国务院，同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鲍曼化名“艾伦”。

Breit, Gregory: 格雷戈里·布赖特。俄国移民，科学家，在曼哈顿项目工作。在一九四五年的密电中提到此人的名字。在该份密电中，克格勃莫斯科总部提供了一份名单，要求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考虑接近这些人，其中便包括此人。然而，莫斯科方面有所不知，此人坚决捍卫曼哈顿项目的保密工作，并因为抗议曼哈顿项目的保密工作不够充分而最终离开该项目。

Clarke: 克拉克。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的招募对象，有可能任职政府部门，极可能任职战略服务办公室。任职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特工伦纳德·明斯曾负责试探此人对谍报工作的态度。据了解，此人虽然亲近苏维埃，但并非美共成员。无从考察“克拉克”这个名字是真名，亦或是化名。

DuBois, Josiah Ellis: 乔赛亚·杜波依斯。财政部部长助理，一九四五年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前往莫斯科出席“联盟赔偿委员会”会议。财政部高级官员兼克格勃间谍哈罗德·格拉瑟建议克格勃考虑招募杜波依斯为情报内线。

Elitcher, Max: 马克斯·伊莱特。国家标准局海军部门工程师。秘密共产党人。一九四四年，朱利叶斯·罗森堡向克格勃报告，他与伊莱特见过面，感觉伊莱特对谍报工作态度积极，认为可以开展招募工作。

Joseph, Emma Harriet: 埃玛·哈里特·约瑟夫。共产党人，透过伊丽莎白·本特利负责的谍报武装与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联络。就职战略服务办公室，一九四四年被派往锡兰。克格勃特工朱利叶斯·约瑟夫的妹妹。化名“艾维”。

Larin: 拉林。真实身份未知，是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克格勃有意将其招募为情报内线，但后来放弃招募计划。据称是美共成员。克格勃经美共对此人进行背景调查后发现，此人在共产党领导的“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及技术人员联合会”中获得的评价是，“自私”，不肯服从命令，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遂决定取消招募计划。无从考察“拉林”这个名字是真名，亦或是化名。

Lauterbach, Richard T.: 理查德·洛特巴赫。记者，秘密共产党人，任职《时代》杂志。克格勃特工杰克·索布尔在与洛特巴赫交谈之后，向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申请正式招募此人为情报内线。在维诺那计划破译的密电中没有发现莫斯科方面就此事的答复。化名“爸”。

Magidov, Nila: 奈拉·马吉多夫。女性，作家，《美国杂志》有意将此人作为驻外记者派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期一年。一九四四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建议莫斯科方面考虑“最终录用（此人）”。

Oppenheimer, Frank: 弗兰克·奥本海默。物理学家，秘密共产党人，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兄弟。

Oppenheimer, J. Robert: 罗伯特·奥本海默。物理学家，一

九四一年以前，一直支持美共。曼哈顿项目科学家负责人。

Rappoport, Joseph: 约瑟夫·拉波波特。共产党元老。有可能与妻子于一九四五年一同被招募为前苏联情报内线。

Roy: 罗伊。“考拉”（见附录 A）的丈夫，克格勃非法特工依卡·阿米洛夫有意利用此人为克格勃工作。

Steinberg, Isodore N.: 伊萨多·斯坦伯格。“战争部出版局”的美术编辑，秘密美共成员。任职于战略服务办公室的前苏联军事情报部特工伦纳德·明斯建议招募此人为情报内线。

Stone, Isidor Feinstein (“I. F.”): 斯通，记者兼评论员，克格勃曾多次试图将此人发展为情报内线。化名“薄饼”。

Tanz, Alfred: 阿尔弗雷德·坦兹。律师，美共成员，一九三七年，作为共产国际的国际纵队成员前往西班牙期间，曾被俄国政府评价为是一名“可靠”的同志，适宜从事“组织工作”。一九四三年，克格勃外国情报部向共产国际调查此人的背景，调查结果令克格勃满意。

Thompson, Frederick: 弗莱德里克·汤普森。出生于旧金山富裕家庭，秘密共产党人。一九四三年五月，克格勃向共产国际了解西班牙内战时期此人在共产国际的表现。克格勃的这一举动是对招募对象进行背景审核的必经过程。有可能化名“Trio”（见附录 A）。

Traugott, Lillian: 莉莉安·特劳戈特。女性，战略服务办公室劳工部官员，曾被派往英国、瑞典、挪威和法国执行任务。一九四五年被派往挪威负责调查工人运动被共产党人渗透的情况。一九四四年，克格勃外国情报部向共产国际调查此人的背景。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此人应该在一九三七年成为美共成员，其兄长亦是美共的“积极分子”。战略服务办公室可能并不了解此人与美共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人加入知

名的群众阵线政治组织“国家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一九四八年成为卡尔文·勃德温的助手，并结为夫妻。勃德温是亨利·华莱士总统竞选活动的全国总负责人。

Tuzov：图佐夫。克格勃特工尼古拉斯·奥洛夫（Nicholas Orloff）有意将此人发展成为情报内线，但在最后关头，此人对谍报工作表现出恐惧，表示不想为克格勃工作。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最终决定，鉴于此人年纪已大，不适宜发展为情报内线。

Volok：真实身份未知。工程师或科学家，据称因为参与“进步组织”而被曼哈顿项目解雇。克格勃汇报，此人为美共秘密成员。由克格勃发出，涉及朱利叶斯·罗森堡谍报组织的密电中提到过此人，并有电文称，此人计划在共产党人工程师中招募情报内线。



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前苏联克格勃官员简历

有关本附录涉及的克格勃官员的职业简历主要摘自《莫斯科：俄国外情报部，一九九五》。

Akhmerov, Iskhak Abdulovich (1901 - 1975): 依卡·阿布杜拉维奇·阿米洛夫。一九一九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就读于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大学。一九三〇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国际关系系之后加入克格勃，参与镇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亚共和国的反苏维埃运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阿米洛夫被调往外国情报部，以驻土耳其外交官的身份做掩护。一九三四年，阿米洛夫被派往中国，成为一名非法情报官员。一九三五年，阿米洛夫持假证件到达美国，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担任克格勃非法情报站负责人。一九四五年末或一九四六年初，阿米洛夫返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为克格勃外国情报部下属的非法分支的负责人，被晋升为上校，并被授予“荣誉奖章”，两次被授予“红旗勋章”，并获得“荣誉契卡人”称号。

Fitin, Pavel Mikhailovich (1907 - 1971): 帕维尔·米凯洛维奇·费庭。一九三二年从“铁木耳雅佐夫农业学院”工程系毕业后加入红军，后来在“国家农业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一九三八年，苏共选派费庭参加克格勃培训学院的外国情报特别

课程。一九三八年，费庭出任克格勃外国情报部副部长，一九三九年担任部长，当时年仅三十一岁。俄国外国情报部认为，费庭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将清洗运动之后百废待兴的外国情报部一手重建，并且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向前苏联提供了大量有关德国即将进攻苏维埃的情报。然而，这些情报正是斯大林所不想听，也不愿意相信的。如果不是费庭的预警被事实印证，克格勃的总负责人贝利亚早已将费庭军法处置。贝利亚留任费庭继续担任外国情报部部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费庭降级使用。一九五一年，贝利亚开除费庭，并剥夺了费庭的养老金福利。费庭一直处于失业状态，直到一九五三年，贝利亚本人遭到处置，费庭的境遇才得以改善。费庭被提拔为中将，两次被授予“红旗勋章”，并被授予“荣誉奖章”。

Gromov, Anatoly: 阿纳托利·格罗莫夫，在美国期间使用假名阿纳托利·万尼亚米诺维奇·戈尔斯基。一九二八年加入克格勃，最初任职克格勃内部政治警察局，一九三六年被调往外国情报部。一九三六年出任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副站长，一九四〇年成为该情报站总负责人，一手安排了“剑桥五杰”以及渗透英国原子弹项目内部等行动。一九四四年被召回莫斯科，在克格勃总部工作，但随即又被派往华盛顿，接替被突然召回国内的瓦西里·朱比林的职位，担任克格勃驻美国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人。一九四七年再次返回莫斯科，在外国情报部担任督导工作，一九五三年开始负责内部安全事务。上校军衔，曾被授予“红旗勋章”、“工人红旗勋章”、“荣誉奖章”及“红星勋章”。

Kvasnikov, Leonid Romanovich (1905 - 1993): 利奥尼德·克瓦斯尼科夫。一九三四年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建筑学院，其后的几年里一直担任工程师。后来攻读工程研究生学位，一九

三八年加入克格勃，成为科技情报专家，并被短期派往德国、波兰执行任务，很快便升任克格勃科学情报部副部长。一九四〇年，克瓦斯尼科夫敏锐地发觉，英国、美国及德国的科学家们曾经定期发表文章，阐述他们对于铀及相关的核研究的进展情况，然而，在这一年，诸如此类的文章不再公开发表。克瓦斯尼科夫提醒克格勃，应该专注搜集原子研究方面的情报。俄国外情报部认为，这也是克瓦斯尼科夫最突出的成就。克瓦斯尼科夫在莫斯科遥控指挥克格勃特工渗透到美国和英国的原子弹项目中，之后又于一九四三年以外交官身份亲自前往纽约，指挥科技谍报工作，尤其是对原子弹项目的谍报活动。一九四五年，克瓦斯尼科夫返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九四八年出任克格勃科学情报部部长。上校军衔，曾被授予“列宁奖章”、“工人红旗勋章”（两次）以及“红星勋章”（两次）。

Ovakimian, Gaik Badalovich (生于 1898): 盖卡·奥瓦金米安。有美国背景，一九三一年尚在莫斯科保曼高等技术学校读书时即加入克格勃，并随即就职外国情报部。曾经被派往德国执行科技间谍任务。一九三二年返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工农红军军事化工学院”负责高级技术培训。一九三三年以前苏联贸易部工程师的身份前往美国，担任美国克格勃科技情报部副部长。一九三九年升任美国科技情报部总负责人，与此同时在纽约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一年与联邦调查局监视的一名特工会面时被捕。纳粹入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后，美国方面同意取消对奥瓦金米安的起诉，允许他返回莫斯科。一九四三年，奥瓦金米安成为克格勃外国情报部副部长，并获得少将军衔。一九四七年离开克格勃，从事科研工作。

Semenov, Semyon Markovich (1911 - 1986): 塞姆扬·塞米诺夫。一九三六年毕业于莫斯科纺织学院动力工程专业。一九三七年加入克格勃，随即作为情报官员被派往美国。在美国期间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并于一九四〇年毕业。在美国以前苏联贸易部工程师的身份从事科技谍报活动。俄国外国情报部的史料中援引克格勃保存的塞米诺夫的个人档案，“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在美工作期间，塞米诺夫是情报站最活跃的工作人员。他创建了科技谍报工作的运作模式，并且从数十名任职弹药、雷达科技及航空领域的特工那里收集了宝贵资料。”塞米诺夫后来曾先后在法国及莫斯科执行任务，并被提拔为中校。一九五三年，在一次反犹太主义的清洗运动中被克格勃开除，直到七十年代才被恢复职务。

Yatskov, Anatoly Antonovich (1993 年去世): 阿纳托利·雅兹科夫。一九三七年毕业于莫斯科印刷学院，一九三九年加入克格勃。曾被派往克格勃的培训学院受训。一九四〇年或一九四一年，作为初级情报官员被派往美国，利用外交身份活动。主要负责收集科技情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执行过多项情报任务，并且在克格勃下属的一家红旗学院担任校长，为克格勃培养人材。上校军衔，并被授予“十月革命奖章”、“工人红旗勋章”、“爱国战争奖章”以及“红星勋章”。

Zubilin, Elizabeth (1900 - 1987): 伊丽莎白·朱比林。在美国时使用假名伊莱扎维塔·米克哈洛维奇·扎鲁宾娜，另曾用名利萨·戈斯卡娅。出生于俄国，有罗马尼亚背景，先后在俄国、法国及奥地利的大学就读。一九二三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一九二五年成为克格勃特工，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在克格勃驻维也纳情报站工作。曾被短期派往海外执行任务，其中一次任务的地点在土耳其。在土耳其期间，伊丽莎白与克格勃

高级官员雅各布·布鲁金发生关系，并提醒莫斯科，布鲁金与托洛茨基有联络。布鲁金随即被召回国，并被处决。此后不久，伊丽莎白与瓦西里·朱比林结婚。婚后的伊丽莎白继续担任克格勃官员，并协助瓦西里完成多项任务，偶尔也单独执行任务。俄国外国情报部指出，四十年代初在美期间，伊丽莎白共为前苏联情报机构招募二十多条情报内线。

Zubilin, Vasily (1894 - 1972): 瓦西里·朱比林，在美国期间使用假名瓦西里·米克哈洛维奇·扎鲁宾。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在俄国皇家部队服役并负伤，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加入红军。一九二〇年加入克格勃，任职内部安全部，直至一九二五年被调往外国情报部。曾作为非法官员被派往中国（一九二五年），作为合法官员被派往芬兰（一九二六年），作为非法官员被派往丹麦和德国（一九二七—一九二九），法国（一九二九—一九三三），之后再次作为非法官员派驻德国（一九三三—一九三七）。一九三七年返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克格勃总部工作。一九四〇年，有人控告朱比林为德国人做事以及参与将一万五千余名波兰战俘处死在卡廷森林（见第二章），但是朱比林在克格勃的事业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一九四一年，朱比林被派往中国，从蒋介石的德国顾问那里获得情报，了解到希特勒计划于一九四一年中进攻苏维埃。一九四一年秋，朱比林出任克格勃驻美国情报机构总负责人。一九四四年，再次被人控告为德国人工作，因此被召回国，并再次度过难关，最终成为克格勃外国情报部副部长。少将军衔，被授予“列宁奖章”（两次）、“红旗勋章”（两次）以及“红星勋章”。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维诺那计划 前苏联间谍揭秘

作者 =

页码 = 501

ISBN = 501

SS号 = 11225348

dxNumber = 000003135066

出版时间 = 2004

出版社 = 北京市：群众出版社

定价：28.00

试读地址 = <http://book.szdn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3135066&d=D58AA3B7A1AD9F85C68E6990444D1CD4&fenlei=040803&sw=%CE%AC%C5%B5%C4%C7%BC%C6%BB%AE%A3%BA%C7%B0%CB%D5%C1%AA%BC%E4%B5%FD%BD%D2%C3%D8>

全文地址 = <http://png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9&pid=D21A1633FD0745FB90B55D98D940115D0E02A0205676BFB7B6C3607D4D19B9031B07E83A4C0A92963F642CF45C51AAD60F5241E8F5D27A20212C57044E5AD1BFBAC660AB6ADFB45A4F96AD2040AC4DD2E2DFDA8BEA9CDE897FC431DFB95BD137C51F62A44A1DC6222AA81EE3ECB44C112C4A&jid=/000001.jpg>